

〔美〕费正清 赵世华 周
阵宇 麦秋明 陈祖泽 陈
国权 陈子善 陈鹤生 编

中国： 传统与变革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本书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书中不仅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脉络，还通过大量的史料和案例，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许多细节和变化。本书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 录

译者说明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背景

- 第一节 东亚的地域、种族和语言 3
- 第二节 中国的地理背景 9
-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13

第二章 早期中国：一个文明的诞生

- 第一节 考古记录 17
- 第二节 早期中国的传说 20
- 第三节 汉字 23
- 第四节 商文化 27
- 第五节 周代前期 31

第三章 经籍时代的中国：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

- 第一节 周代后期 34
- 第二节 哲学家与经籍时代 41
- 第三节 儒家和道家 45
- 第四节 其他哲学学派 51

第四章 早期的中华帝国：秦与汉

- 第一节 秦王朝开创帝国 58
 - 第二节 汉王朝继承天命 62
 - 第三节 汉代思想与学术 68
 - 第四节 王朝循环 73
 - 第五节 东汉王朝 78
 - 第六节 早期中华帝国的覆灭 82
-

第五章 帝国的复兴

- 第一节 对中国制度的挑战 87
 - 第二节 佛教的传入 91
 - 第三节 “夷狄”恢复帝国 96
 - 第四节 隋朝和唐朝 99
 - 第五节 中央集权统治的恢复 103
 - 第六节 佛教的融合 109
 - 第七节 中国文化的发展 114
-

第六章 唐代后期与宋代：中国文化的繁荣

- 第一节 中国从古典时期向近代早期的过渡 118
 - 第二节 唐代后期 121
 - 第三节 宋朝 125
 - 第四节 商业革命 134
 - 第五节 社会与文化 141
 - 第六节 新儒学 149
-

第七章 中国与“夷狄”：蒙古帝国

- 第一节 草原社会 157

-
- 第二节 蒙古帝国 165
 - 第三节 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 171
-

第八章 明代的国家与社会

- 第一节 中国的“文化主义” 180
 - 第二节 明代的政府 182
 - 第三节 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190
 - 第四节 对外关系 196
 - 第五节 明代经济 207
 - 第六节 明代统治的覆灭 211
-

第九章 清代：传统中国的极盛时期

- 第一节 满清王朝的兴起 215
 - 第二节 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 225
 - 第三节 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233
 - 第四节 王朝衰落的开始 241
 - 第五节 早期与西方的接触 246
-

第十章 19世纪中国面临的入侵和叛乱

- 第一节 传统中国对变革的抵抗 262
- 第二节 学术与思想 271
- 第三节 广州制度的崩溃 275
- 第四节 鸦片战争 280
- 第五节 西方通过早期通商口岸产生的影响 290
- 第六节 叛乱的兴起 294
- 第七节 条约体系的最终建立 302
- 第八节 清政府的中兴 308

第十一章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 第一节 以自卫为目的的早期洋务运动 313
 - 第二节 儒家政府的中兴 318
 - 第三节 对基督教传教团的反应 326
 - 第四节 条约体系下的经济发展 331
 - 第五节 早期工业化的困境 341
 - 第六节 现代化的缓慢发展 347
-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

- 第一节 外国势力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353
 - 第二节 中国在越南败于法国 359
 - 第三节 中国在朝鲜败于日本 367
 - 第四节 对中国的强权政治 375
 - 第五节 维新运动 381
 - 第六节 义和团暴动 389
 - 第七节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的反应 393
-

第十三章 从君主制度到军阀政治

- 第一节 晚清的改革 403
 - 第二节 辛亥革命 420
 - 第三节 共和制蜕变为军阀政治 432
-

第十四章 国民党中国的兴衰

- 第一节 思想和文化革命 447
-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背景 462
- 第三节 国民党夺取政权 470
- 第四节 南京政府的十年 477

第五节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488

第十五章 人民共和国

- 第一节 毛泽东领导的兴起 498
 - 第二节 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506
 - 第三节 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520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531
 - 第五节 中美关系 541
 - 第六节 台湾的发展 547
 - 第七节 转变中的革命 552
-

索引 558

¹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背景

对西方人来说，有关中国最重要的事实，首先就是那儿居住的人口众多；其次是中国具有十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自古至今与西方人在文化上泾渭分明；再就是他们正在经历着迅速的发展与变化。古代中国在人口和国力上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今天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约有九亿或是更多的人民。近几十年的情况表明，在迅速缩小的世界上，与人类的这一庞大大部分的关系，对西方人的生活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自1941年以来在中国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三次战争已使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需要以相互的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之上。相隔遥远，要做到这些实非易事。文化上的隔阂是巨大的。过去一个世纪内急剧增强的接触趋于减少这一文化隔阂，但另外一些因素又扩大了彼此间的距离：一是中国民族主义意识以及爱国主义自豪感的极大高涨；二是中国人与大多数西方人在物质生活水准方面的差异；三是对战争与革命的不同体验。部分地出于历史和地理的偶然因素，西方在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所

获致的平衡要远胜过中国。这种经济差距使文化差异长期存在，有时并使之激化。美国人尤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在国内饱经战患，美国人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是渐进性的，而非革命²性的。他们继承的文化以及在现代史上的经历都使他们有别于中国人。

寻求和平并不是更多了解中国的唯一原因。对兴趣在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堪称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体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以及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不管是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历史学研究，中国在某些时期和某些领域中所保存下来的人类历史记录远比西方丰富得多。

通过历史能最好地理解中国。之所以这样说，有如下原因：一是比起世界其他民族来，中国人更注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遗产具有强烈的意识，通过历史来观察中国人就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他们；二是中国在艺术、思想和制度方面的独特成就，只能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才可得到最佳的研究，这些成就都应与当代中国分开加以考察。只有审视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才能领悟发展的方向，并对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有所理解。

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新兴力量不少又源自西方。本书的内容也就自然地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中国传统文明在过去三千多年间相对孤立的演化和该文明自近代以来因同西方现代世界接触而产生的动荡与转变。

第一节 东亚的地域、种族和语言

晚近人们终于称之为东亚的地方，是世界伟大文明地域之一，而中国则是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老发祥地，且至今仍是该文明的中流砥柱。当欧洲人最初向东方远行到达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时，他们自然笼统地称呼这个遥远的地方为“远东”。按照同样的逻辑，向西越过太平洋的美国人或许可以称呼这同一个地方为“远西”。然而对生活在那儿的人来说，既不是“东”又不是“西”，更谈不上“远”。这一地区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东亚”，这个名称才不含欧洲人是文明中心这种陈旧的观念。

中国占据东亚的地域是如此之大，在这一地区据主导地位为时如此之久，研究中国必然要涉及到整个东亚地区。在3本章后面段落中，我们将先探讨中国所在的范围较为广阔的东亚地区，然后再较细致地审视中国的地理以及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东亚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界说：从地理上说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大屏障以东的地区；从人种上说是蒙古人种（作为蒙古人种分支的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除外）居住的地区；从文化上说是植根于古代中国的那种文明所分布的地区。最后一个界说最受限制，因为它除中国本身以外仅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不包括也在高山沙漠屏障以东、居民基本也属蒙古人种的其他两大地区，一个地区是亚洲腹地，尤其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

联系。另一地区是东南亚，其较高的文化大部分来源于印度而非中国。可是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战略方面与东亚其他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

自然环境

对东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影响是其相对独立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以外。由于距离遥远以及难以逾越的高山沙漠阻隔，东亚发展了独特的文化类型，其大部分一直保留到今天。例如世界其他所有地区的现代文字系统归根结蒂都起源于在西亚出现的一系列发明，只有在东亚，汉字这种文字以完全不同的原则为造字基础。

西方文明成长于诸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希腊这些紧密相连的地区。只是在西方文明传播开来包括了欧洲大部、北非和西亚以后，才分成为现在的两部分：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现在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是早期文明的另一个伟大的中心。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河流域只是古代西方与印度之间有着较早密切接触的一例。

在中国北方的早期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比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要孤立得多。一边是似乎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另一边是巍然耸立的巨大的亚洲中央山系——喜马拉雅山、海拔一万英尺以上的西藏高原以及从这一世界屋脊向四方辐射的高大山脉。山系以北横亘着广阔的沙漠和中亚草原，这些地方寒冷荒凉，早期人们只是在驯养了马和骆驼后才能从这里通过。山系以南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崎岖山地和丛林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古代从西伯利亚的北极地带到马来西亚的丛

林，地形和气候造成的这种巨大障碍阻碍了人口的自由迁移。甚至在今天也只依靠两条铁路和仅有的很少几条公路跨越这一障碍。

气候也对东亚的文化独特性起了作用。欧洲和西亚的天气主要受大西洋制约，在较冷的月份里雨量充沛。北欧日照量相对较少，而地中海地区和西亚的降雨量相对较少。结果欧洲和西亚的土地绝大部分耕作不够精细，通常每年只种一熟作物。

东亚的气候与印度差不多，主要受亚洲大陆制约。在冬季，中亚上空的气流完全不受海洋调节影响，非常寒冷暴烈。冷气流向外移动，使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带天气干冷。在夏季情况正好相反，中亚上空的气流变暖上升，湿润的海洋气流侵入，给大陆边缘地区带来大量雨水。因为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大部分地方和印度许多地方在最适合作物生长的月份里降雨充沛，这些地区比欧洲南部在纬度上要向南得多。⁵ 因为通常水量供给充足，加之日照充裕，所以能够精耕细作，许多地方一年收两熟作物。

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使东亚的农业类型与欧洲大不一样。东亚的许多主要谷物和家畜，著名的有稻米、大豆、鸡、水牛和猪，似乎都最早出现于炎热潮湿的东南亚。在西方，养牛业和养羊业已成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农业更精耕细作的东亚，却是家畜用得少，人力用得多。西方人食用的主要谷物一直是小麦，而东亚大部分地方和印度许多地方人们食用的主要谷物是稻米。稻米在水田生长得最好，也很适应于这些地方夏季炎热湿润的气候条件。稻米每英亩产量比小麦要高出许多，这就能在这块土地上养活较稠密的人口。正是由于农业的起点不同，使得东亚、印度与西亚、欧洲在人口和土地的比例上有明显不同。甚至在近代，工业化

已使欧洲人口剧增，而当时基本上仍处于前工业化社会的东亚和印度，人口还是要比欧洲稠密得多。

种族

亚洲大陆高山沙漠大屏障以东的地区大部分为蒙古人种居民所占据。在这一屏障以西的地区，包括印度的大部分、伊斯兰文明的绝大多数地区以及整个西方文明区域，是白色人种或称作高加索人种居民的家园。第三种主要的人种——黑色人种居民占据了偏南的非洲、沿亚洲南部边缘一些分散的地区以及美拉尼西亚群岛等不连成一片的地带。

人类人种的起源仍然是个无人知晓的谜。现代东亚人的祖先之一是北京人，1927年在北京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北京人的骨骼残骸。北京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四十万年以前，已能制造工具，使用火，且以狩猎为生。北京人的某些体质特征与各现代人种相比更符合蒙古人种的特征。最近在中国西北地区西安附近的蓝田遗址发现了一种更早的蒙古人种的祖先，这种人大约生活在六十万年以前。

当东亚一出现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时，就可以发现几乎这整个地区已全部为蒙古人种所占据。他们的四肢相对来说较短，这有利于保存身体热能；眼睑肥厚细长，这有利于保护眼睛免受耀眼白雪的刺激。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蒙古人种居民最初在亚洲东北部寒冷地区居住的结果。蒙古人种肤色的变化从北部的较淡肤色到像印度尼西亚这样南部地区的深棕肤色，这种变化显然是环境的产物。所谓白色人种肤色的相对变化也是如此。蒙古人种居民其他的特征是他们有不卷曲的黑发、较为扁平的脸和黑眼睛。

蒙古人种并不仅仅分布在东亚，有些蒙古人种居民向西 6

迁移到高山沙漠大屏障以北的地区定居。爱斯基摩人的存在就表明蒙古人种较迟的一次进入北美的迁移活动，而美洲印第安人也被看作是最早从西伯利亚借道阿拉斯加迁移来的。考古学发现表明蒙古人种分布在从东亚北部和中部向南直至沿海岛屿的广大地区。其中有一次大迁移是约七百年前泰人从中国西南地区迁到他们现在在泰国的家园。

可是蒙古人种并不是这部分世界唯一的一种居民，东亚边缘地区有许多非蒙古人种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居住在日本北端的阿伊努人，他们身上有某些高加索人种的特征。比如阿伊努人脸上身上多毛，这显然是大多数蒙古人种居民都不具备的一种特征。

汉语系

在东亚内部划分人种的重要标准与西方一样主要是靠语言而不是种族。在东亚和西方都有一种共同的误解，认为语言的不同与种族的划分一致，但实际上既没有德语或是匈牙利语种族，更不会有汉语或是日本语种族。

在东亚最大的语系是汉语系(又称汉藏语系)，这一语系分布之广足可与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许多地区的庞大印欧语系相媲美。汉语系的分布在东亚中部占绝对优势，范围包括中国本土、西藏、泰国、老挝的全部以及缅甸的绝大部分，可能还包括越南。除藏族以外，使用汉语系语言的其他所有民族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似乎就是以农耕为业，在世界的一侧过着定居生活，这与早期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恰好相反，这些民族常常都是些过着漂泊不定生活的游牧民族。

在汉语系内，汉语是最大的一种语言。自最早有文字记

载的时代起，讲汉语的人就住在中国北部。他们四处迁移分布开来，同时也吸收了在文化和语言上相近的成份。他们最后差不多占据了中国整个本土以及后来满洲的全部、内蒙古的许多地方、新疆的部分地区和台湾(福摩萨)的大部分，还有部分中国人去东南亚，尤其是去现在华人已占总人口40%以上的马来西亚和华人已占多数的新加坡。

在这一扩展范围的过程中，汉语分化成几种互不相通的方言，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瑞典语和德语彼此间的区别一样。中国本土所用的汉语被称为“官话”，将这种语言当作母语使用的人数之多超过其他任何语言。“官话”的各种方言分布在整个中国北部以及大部分中部和西南部地区。从上海向南直到越南边境的沿海地带，这些地方使用的各种汉语口语与“官话”完全不同，常被人误称为“汉语方言”。在上海地区有“吴方言”，在福建有“闽方言”，又细分为福州方言和闽南方言；在一些相当分散的地区有客家话，最后还有粤语。沿海地区这些不同的“方言”也是台湾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使用的语言，粤语则是美国华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除汉语外，在中国西南部以及邻近地区的各民族使用汉语系中其他几个语族的语言。藏缅语族包括藏语、缅甸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包括泰国和老挝所用语言的泰语族以及现代越南人所用的越南语通常也归入汉语系。

阿尔泰语系与其他语系

汉语系地区以北还有许多蒙古人种民族，他们所用的语言与汉语系语言和印欧语系语言都不同。这些语言所属的语系被称为阿尔泰语系，得名于蒙古的阿尔泰山脉。这些民族

都是些过游牧生活的骑马牧羊人，这很像早期说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却与在南方过定居生活的相邻民族完全不同。他们频频迁徙，确曾有些民族完全离开了东亚。

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通常被认为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说突厥语的民族现在居住在土耳其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曾融合了一度人数占优势的高加索人种的居民。蒙古人占据蒙古的许多地方以及中亚和西亚不少小块与外界隔绝的地区。像满族这类说通古斯语的部落一度曾是住在北方的满洲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居民。因为朝鲜语和日语与典型的阿尔泰语系语言结构很相似，所以朝鲜人和日本人可能是说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东迁进入以农业为主地区的两支。

东亚的第三大语系是南岛语系，包括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以及台湾土著居民的口语。柬埔寨的高棉语可能属于另一语系。

在古代，东亚西北部的一些畜牧地区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直至9世纪在新疆还居住着说伊朗语或是现已消失的印欧语系语言的白种人。说突厥语的民族西进的浪潮终于使这些语言消失。就这样，在一千年前印欧语系的语言成份从东亚消失，只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进行的殖民活动才使之又重新出现。

9 第二节 中国的地理背景

因为中国没有地中海或其他地区的一些大平原所提供的交通便利，所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传统区域及印度相比，在地理上比较松散。华北平原比印度北部的平原小得多，更不

用说与更大的北欧平原和美国中西部平原相比。

中国被两群平行的山脉相互交错切割成棋盘状。在内地一条长长的山脉从中国西南向东北延伸经山西直至满洲西部。与此平行的沿海山脉从广州向北伸至长江边，再断续在山东半岛和朝鲜满洲边境出现。与这两条西南—东北走向山脉相交错，三条平行的山脉相隔距离大致相同，从西向东延伸至太平洋岸。最南端的山脉构成划分广州地区的西江水系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最北端的另一条东西走向山脉将华北与蒙古高原隔开。在这两个山脉之间，至关重要的秦岭山脉作为西藏北部高大昆仑山的东部余脉，成为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同时（连上淮河）又是中国南北分界的标志。山脉的阻隔造成了一些不同的地理区域。这就产生了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问题，并制约着军事战略。

河流水系

中国的大河向位于山脉之间的居民聚居中心供水。黄河长约二千七百英里。当黄河离海五百英里远时流入华北平原，这时河水越过多年来由它的淤泥堆积而成的辽阔冲积平原。这里河床每英里向下倾斜仅一英尺左右。在夏季洪水季节，从西部缺少植被的高山上淌下的水流裹挟来大量的黄土淤泥，黄河也因此而得名。因为黄河河床不断升高，从远古时起中国行政官员就不得不修筑堤坝以防河水溢出。这条“中国害河”的河水通常是在高出周围地面十至四十英尺的堤坝内流经平原。河堤上只要有一处溃决可能就会使成百上千平方公里的地区淹没在几英寸甚至几英尺的水中，使几百万农民的生路断绝。遭受洪水肆虐的土地往往要过许多年以后才又被人开垦。洪水泛滥的同时饥荒随之而来。只是到1949年

以后，通过植树造林修堤筑坝才开始解决这一多年的老问题。

10 黄河问题之严重从黄河河床由山东半岛以北移至以南又由以南移至以北的历史变迁中也可以看出。从1191年至1852年，黄河多半从山东半岛南面入海；从1852年至1938年，改道从北面入海；1938年至1947年又改回到南面。现在的河道在天津附近入海。

长江是条比黄河更大的河，有三千二百英里长，流经区域大小和降雨量多少都是黄河的两倍。长江可以通航，而黄河却无此便利。在长江通航季节里万吨轮船可上行六百三十英里到汉口，较小的船还可再向前航行一千英里。在洪水季节江水以时速十四海里的急流冲过汉口上游著名的长江三峡，这时要有特种船舶才能逆流航行。长江有庞大的支流水网，江水裹挟大量淤泥流入中国海，以七十年增加一英里的速度扩大上海三角洲。一些大湖成了长江下游的蓄水池。即便如此，雨季还会使水位在江堤内升高达四五十英尺，常有洪水泛滥。

气候

中国的位置比欧洲大部分地区要偏南得多。北京比那不勒斯和马德里都要靠南些，广州与撒哈拉沙漠在同一纬度。中国比美国东半部更向南，北京与费城、上海与莫比尔^①、广州与古巴的哈瓦那都在同一纬度上。中国所在的这块广袤大地与美国同纬度地区相比大陆性气候更明显，冬天气温低得多，夏天气温要高一些。北京在7月会像开罗一样热，而

① 莫比尔是美国南部城市。——译者注

在1月又像斯德哥尔摩一样冷。

中国是寒冷干燥的大陆气流和带来大部分雨水的温暖湿润的海洋气流交汇的场所。在夏季期间这股海洋气流深入内陆，有时甚至远至蒙古。南方大多数地区年降雨量超过六十英寸。这一充足的水资源不仅可用于灌溉稻田，而且还可用于运输。可通航的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遍布长江中下游流域大部分地区。与此明显不同，西北地区年降雨量低于耕种旱地必需的最少雨量二十英寸数额，这里极少甚至没有水上运输。11

秦岭山脉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超过四十英寸，确保了维持三分之二中国人生计的水田稻米经济。在这条分界线以北遍布着用于旱田耕种的焦干的褐土地，运输依靠马车或手推车。另一条气候分界线在中国本土农耕区与过于缺水无法农耕的北方草原之间。这条气候线显然是以长城为界，中国人修筑长城以抵御其北方相邻的说阿尔泰语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进攻。

地质学家推断在最后一次冰河时代，亚洲冰冻腹地吹来的巨风使细小黄土沉积下来遍布在中国西北大约十万平方英里的范围内。黄河冲下其中一部分黄土形成华北冲积平原。幸运的是黄土地土壤肥沃。在这一降水不多的地区，黄土地依然未遭水冲击，也就是说其矿产资源没有因水流不停的冲刷而分散。可是中国北方尽管有肥沃的黄土地，但仍然危险地处于饥荒的边缘。生长季节短，降雨量少且极不稳定。在没有用电动水泵灌溉农田之前，北方的农民时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一千八百年中，据历史记载曾有过一千八百多次饥荒。

在中国南方降雨比较充沛，土壤都经过雨水冲刷。另外在南方只有15%的山地还算平整能用于耕作。但因为这里绝

大部分地区一年可收两熟作物，所以中国南方的人口比北方稠密，营养标准也比北方高。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中国最大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农耕土地，所以可以理解气候和地形在中国人经济和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中国的历史记载像其他国家一样总是忽视普通人民的生活，但我们仍能概括出中国民众生活的一些特点。首先，现在几乎是美国人口四倍的众多中国人口必须要在只及美国耕地一半大小的耕地上获得食物供应。80%的人种地以农业为生，生产的多余食物勉强能养活另外20%的人。除了吃腐食的猪和鸡以外，他们没有饲料养别的家畜。因为家畜少，农民主要依靠人粪便作肥料。中国的农业充其量也总是一种不稳定的行业。¹²

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劳动力密集型，也就是说主要靠人的体力。农业从种到收一个周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先在秧田里密密播下稻种。同时在大田里收割冬季作物，然后为准备种稻平整大田并放水。当稻秧长了一个月有八英寸左右高时，农民用手将秧苗插入大块水田中，这样干法同用手工种美国小麦和玉米差不多。机械化有困难，因为要为这样多的人找到别的活干不是件小事。

与此相类似，出名的丝綢业也要耗费无穷无尽的劳力。一磅初生的幼蚕约有70万条，人工采摘桑叶喂蚕，细心照料五周直到其成熟，此时这一磅的蚕可长至五吨重，在生长过程中要吃掉十二吨左右的桑叶，而最后仅能生产出大约一百五十磅重的蚕丝，半机械化的从蚕茧抽丝工序只是在耗费了

大量手工劳动以后采取的最后一步。另一种中国南方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是制茶，也要耗费相当多的人力去采摘、选拣，然后再分类、烘炒，直至包装茶叶。

体现这种劳力密集型经济特点较为典型的是用人力送水灌溉，通常是用一种简易的脚踏水车车水，甚至还有更简易的是两个人拉住水斗的绳子戽水。运输通常也耗费人力，在山路上挑夫用扁担挑，在平地车夫推小车，在水路船夫用桨划小船，在城里轿夫抬轿子（在近代已为人力车所代替，后来又被三轮车代替）。即使现在，骑自行车的人数量看来也不比乘汽车的少。

从古代起中国的农业就要耗用大量劳力，有可能时还要在小面积土地上用去大量的水。因此拥有土地是人们经济努力和投资的主要目标。在每一朝代，地主所有制和农业税收都是民众和官僚阶层注意的问题。此外农民因缺乏资金和贮仓而受着中间商的支配，这些中间商在收获季节低价买进，而在青黄不接时再以每月 2 % 或更高的利息向穷困的种田人贷款。租佃土地还要受地主更多的剥削。农民也许不得不把自己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

向市场运送农产品总是成问题，因此以分散的集市类型为主，每个村社在当地集镇以易货方式交换产品。一个集市中心与附近步行可达范围内的乡村组成一个单元，当然这个单元遇上像水灾、旱灾这类自然灾害时可能被毁灭，但反言之只要自然条件良好差不多也能自给自足地生存。传统的集市中心和乡村经济小型分散的性质使之不受战争、入侵以及在有历史记载的城市和行政中心出现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影响，能以极大的惰性或是原有途径的稳定性生存下来。近几十年来革命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修建蓄水坝、较多的输水灌渠、抽水灌溉土地的电气设备，植树造林以及改

良谷种等，这些改进只是改造中国人生活的开端。

社会遗产

把中国这样庞大、古老、多样的社会用简短的语句来概括，尽管会引起误解，但对一个外来的旁观者而言仍有几个要点要记住。首先，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是教会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每个人的家庭是他经济资助、安全、教育、社会交往和娱乐的主要来源。祭祖甚至是个人主要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儒家的五种著名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三种由亲属关系所定。中国整个伦理体系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或国家为核心。

中国的亲属群庞大，每一支总是算到第五代。人们的理想是在世的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分别住在一个大院落内的各个小院中，实际上除富人外很少有人能这样做。一个典型的家庭看起来平均是五口人，实际上与西方的典型家庭相类似，而与理想的中国大家庭不同。

家庭制度是等级制的同时又是专制的。每个人的地位由其辈份和婚姻状况而定。有复杂的专门名称详细说明亲属等级。一家之长的父亲是权力的中心。至少在理论上父亲掌管家产，安排儿孙的婚姻。作为个人服从家庭的一种标志，子女孝顺是最受称赞的美德（参见第45页）^①。婚姻由各自的家庭安排——大多数情况无疑要请聪明的媒人说合——这比其他任何事都更清楚地体现出个人的服从。婚姻更像是家庭的结合，而不是个人的结合。

传统上妇女年轻时服从父亲，中年时服从丈夫，老年时

^①参见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所列边码。下同。——译者注

服从儿子。妇女如果丧夫被要求守寡，但男人却能娶妾回家。除嫁妆外，妇女没有财产权，结婚时以卑下的新来者的身份进入丈夫家。这一传统预示着妇女是期待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变革的巨大潜在力量。

这一专制的家庭模式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皇帝与其臣僚的作用只是父亲作用的扩大。一个地区的行政官员被称为人民的“父母官”。

在像现代西方这样多元化的社会中，教会和国家、资本和劳工、政府和私人企业诸种力量在法律规定下保持平衡。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耿直和忠心、真诚和仁慈这些整个家庭体制反复灌输的个人美德才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法律是政府必需的一种工具，而个人道德才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法制观念淡薄而出现无政府状态，整个社会被儒家学说牢固地连在一起。这一伟大的伦理制度在中国的地位之重要相当于法律和宗教在西方共同所占的地位。

同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农民社会里一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和威望有着天壤之别。传统上，社会分为四个阶级，由上而下依次为士大夫（或古代的军功贵族）、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受过教育的士大夫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人，士大夫代整个中国社会至尊的皇帝行使最高权力，控制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自然是按统治阶级观点写成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浩瀚材料。

¹⁷ 第二章 早期中国：一个文明的诞生

第一节 考古记录

看起来农业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有山林高地、东有沼泽低地的边缘地带，渔猎先民为获得食物而在这里驯养家畜并开始栽培植物。接着这个地区沿着黄河中下游扩展并囊括华北平原，这些地方在远古时代尽管要度过严冬但仍非常适于农业。事实上这一早期中国文明的中心在一些方面与其他文明发源地（埃及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现代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这几条河流的冲积平原）有相似之处。这些地方降雨量都太少以致森林无法生长，因而用不着在耕作开始前清理森林。这些地方都有大河，只要控制适当，供水就源源不断，在间断性洪水泛滥时河水重新又给土壤带来肥力。

有意义的是华北平原是很容易由陆路从印度和西亚进入的东亚农业区的一部分。就我们现在所知，古代文明的许多基本成份在西亚和印度河流域比在东亚出现得早，因此这些成份很可能是缓慢地越过中亚的草原和山脉传播到华北平原的。例证是种植小麦这种粮食；驯养牛羊马这类家畜；使用车轮和双轮战车；出现青铜和铁器等。

另一方面最近的发现表明陶器在东亚的出现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久远，可能约有一万年；而在泰国北部青铜的铸

造可能比中东还要早。今天在东亚作为主要谷物的稻米起源 18 于东南亚，早在史前时代就在长江流域广泛种植。史前社会的中国人也生产在很久以后才传到西方的丝。几种主要的家畜用途不同，猪鸡狗作食物，水牛用于种稻。在东亚基本的农业工具一直是锄头，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用犁。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最典型的遗物是砍砸石器，而在“旧世界”的其他地方则是石斧。在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以半月形石刀和绘绳纹的粗制灰陶为典型，这两种器物都与欧亚大陆西部的制作器物大不一样。

因此很有理由认为，东亚的农业和早期文明未受欧亚大陆西部的影响，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兴起于中国西北黄河河套地带的文化可能就是以这种东亚文化为基础，但似乎也吸取了来自西方一些地区的文化养料。可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外来的因素是入侵者或移民带来的。中国北方的新石器时代人，可能还有其旧石器时代的前辈，看来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甚至在这早期时代，中国北方的文化就带有其独特的东亚特征。

彩陶与黑陶文化

新石器时代后期有两种以独特陶器命名的不同文化分布在中国北方。这两种文化最初被认为是表现了西亚和当地两种影响的冲撞，但较近的研究证明黑陶文化主要继承了彩陶文化而占据了它的大部分分布地区。

彩陶文化以河南省西北一个有代表性的遗址仰韶命名，除最东面的山东省外这一文化在整个中国北方都有发现，而在西北的甘肃省存在时间最长。这一文化最著名的遗址是在西安（古代称长安）附近已被部分发掘的半坡村，年代定为公

公元前5000年。彩陶文化的典型器物是球茎状大陶罐，通常还绘上红黑相间的粗犷几何图纹。这种陶罐与西亚的彩陶器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能断定这是从西方传来的文化，因为在考古学上没有发现其传入的迹象。

以山东的代表性遗址龙山命名的黑陶文化与彩陶文化分布在同一地区，也发展到山东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但其范围不包括西北边远地区。其典型器物是一种很薄发亮的黑色陶器。这一文化反映出自彩陶时代以来西亚的新影响，比如驯养的羊马和制造陶器用的转盘，已出现在中国北部。另外19它还反映出一直延续至后来青铜时代的那种强烈的文化连续性，例如都出现了相同的空足鼎，同样的占卜方法，以及与今天中国北方的土墙很类似的夯土城墙。

青铜时代

至迟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了青铜器，其铸造工艺与古代西亚所用的方法不同。已知青铜时代第一阶段的遗址分布在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从黄河河套向东延伸，遗址中的青铜器仅有些小型兵器。

第二阶段有代表性的遗址在同一地区的郑州附近，这里曾是一座坚固的都城，四周筑有二十多英尺高一英里见方的夯土墙。在城外有两个制作精美礼器的青铜作坊。

青铜时代第三阶段以河南黄河以北安阳附近的一个遗址最有代表性。这一遗址由中国学者发现，1899年学者们对北京药店准备磨成粉末作药用的“龙骨”上刻有可能是古代文字的符号很感兴趣。他们寻踪找到安阳附近的骨片来源地，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骨片上刻的是已知最早的文字书写形式，并证实了许多早期的历史传说。

骨片刻辞中有传说中的古王朝商实际上所有统治者的名字以及商代后期的丰富材料，商代后期都城据说在安阳（约从 20 公元前1400年至前1050年）。显然考古记录与历史传说在这一点上相吻合。这时原对商代是否存在完全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不得不改弦易辙，同意商的存在是可信的历史。

第二节 早期中国的传说

公元前1000年代前半叶出现的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中国古籍，并未告诉我们多少在此之前各个时期的事。可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写了大量有关中国文明开端及其早期历史的著作。事实上越往后越接近公元初年，中国文人对越早的事就谈得越多。当然这些著作所告诉我们的关于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和习惯要比关于较早时期的历史更多，但其中仍包含许多有关早期神话和传说的材料，无疑也有一些有关历史的确凿片断。

从这些著作和考古记录中，我们有了一个先是母系的但又逐渐过渡到父系的社会的粗浅印象。这个社会又分成各个氏族，起源于氏族名称的“姓”在古代就已出现，而且就像现在一样，姓总是放在人名的开头，而不是按欧洲人的习惯，姓放在人名的结尾。当时很重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的族外婚，以致甚至到今天中国人还认为同姓之人即使实际上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应该结婚。

宗教观念以氏族以及常被氏族当成祖先的氏族神为中心，祖先崇拜至今仍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在一个农业社会中，自然也很重视作为农业控制因素的天，重视土地的肥力、各类谷神以及有关宇宙和历法的知识。权力有强烈的宗

教色彩，统治者在特定意义上是总祭司，也是历法的制订者。

- 中国人早就对历史有强烈的意识并怀有政治统一的理想，他们不知道西方的伟大文化，把中国看作是“四夷”围绕的唯一文明之地。因此他们称之为国，字面意思是“中央之国”，但通常被译为“中央王国”。“中国”仍然是他们所在的这块国土的汉文名称，“天下”一词意为“苍天之下的万物”，是指世界但逐渐被用来指中华帝国。有关早期情况的材料和推
21 测被人排列成一个严格的历史事件序列，并将这些历史事件说成是由一个构成整个文明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统一的中国的统治者们创造的。

神话人物

对早期这段不可靠历史有几种说法。通常的排列顺序：可能是父系氏族集团统治者的三皇在前，五帝在后，再后面是已进入有史时代的三个王朝。三皇五帝现在常被称为“神话人物”，因为早期文明的成就都被当作是他们以及与他们类似的一些次要人物的贡献。这些成就有火的发现、渔猎农业的起源、历法的制订、医学的发展和文字的发明等。由于丝绸生产是典型的妇女劳动，所以五帝之首的妻子被认定对养蚕业的发展有过贡献。

五帝中最后二帝尧舜以不传位给儿子而传位给品行高尚的大臣而最为著名。尧选择舜作继承人，舜选择了一位叫禹的男子，三人一道以三位圣君闻名。禹又以治水出名，他排干华北平原上的洪水并分帝国为九州，在这个故事中可以发现中国人对整个世界都有的关于洪水的传说的看法。

早期王朝

由禹开始，传说中的内容也就有了较为可信的成份。禹开创了年代确定为公元前2205—前1766年的夏王朝（另一说认定是公元前1994—前1523年）。夏代统治者以统治时间长短适中而颇为可信，与此相比那些神话人物的统治时间都像玛士撒拉般的漫长。^①

夏王朝末代国王非常腐败，这使得人民在新王朝商的建立者领导下起来反抗。据传说存在于公元前1766—前1122年或是公元前1523—前1027年的商王朝已经考古学证实完全有历史依据，因为在安阳发掘出的文物肯定属于商代后期，在郑州发掘出的文物可能是在此之前几个世纪的遗物。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有关夏王朝的传说中间有哪些真实的事情，夏王朝是否就是青铜时代的初期，抑或就是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时代？

商王朝末代国王据说是个放荡暴君，安阳的甲骨刻辞证实了这一说法。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曾臣属于他而饱受欺凌。按照传说周文王的继承人其子武王最终于公元前1122年或是前1027年起兵反抗，建立第三个王朝，武王以自己部族的名称定名为周王朝。武王的弟弟周公，作为武王的继承人、其年幼儿子的睿智正直的辅佐者，巩固了这一王朝。

虽然周王朝建立的传说带有后来理想化的痕迹，但周代前期几百年的许多记载仍被视为信史，因为保存至今最早的古籍都是这一时期的。公元前841年以后，传说中的年代显

^① 玛士撒拉是《圣经》中的人物，据说他在世969年，是传说中的长寿者。——译者注

得很可靠，到公元前 8 世纪开始有了第一批完全得到证实的历史事件——当时中国文献记载的日食日期，都与确实发生的完全一致。

第三节 汉字

在安阳出土的商代后期文物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其中的文字，它不仅肯定是汉语，而且还是现在仍在东亚文明区域广泛使用的汉字的一种早期形式。有些字符甚至未经正规训练的人也能认出，看起来同今天报纸上出现的字差不多。这种情况很像说阿拉伯语的埃及居民或伊拉克居民能认出象形文字或是楔形文字中他们现在仍在使用的同样语言文字，偶然也能指出几个连小学生也会念的词。中国人总是感到在文化和种族上与他们所在这块国土上的古人完全一致，从文字上显然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很有理由强烈地感到自己与商代人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西方人对自己与早期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甚至与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渊源关系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汉语所属的汉语系的特点之一是有相当多的词是单音节词。与现代汉语相比在古代汉语中更是如此。汉语和汉语系中其他大多数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词尾的变化，例如汉字“山”既能表示有一座山又能表示有几座山。就动词来说与西方语言的区别更为明显，汉语没有英语中像“go”、“went”、“gone”或是“look”、“looks”、“looked”这样的变化。大多数汉语系语言的第三个特点是有声调，在说话时发音相同的单音节词借助声调来区别，有点像我们在对话中所用的不同语调：“What's your name?”“Name?”“Yes, name.”在

现代“官话”中有四声，比如“ma”第一声是“妈”，但第二声是“麻”，第三声是“马”，第四声是“骂”。

汉字

汉语单音节无词尾变化的特点有助于解释中国人保留汉字书写形式的原因。汉字与古埃及文字一样都起源于象形文 23 字，但又与埃及象形文字不同，汉字一直恪守一个单音节词应该有一个相应字符的基本原则，要是有词尾变化，在很早以前汉字就已成为比较灵活的拼音文字了。

在安阳发掘出的文物上的汉字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远不是简单的象形文字。事实上这种文字的前身在公元前5000年代的遗址中就已出现。书写通常从上至下，直到近些年人们都一直沿用这一规则。在商代文物中发现的两千 24 多个字中绝大部分看起来与现代汉字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字都与其后来的字形有明显相似之处，在现代通常使用的八九千汉字（字典中收有多达五万汉字及其异体字）中出现的所有造字规则在商代文字中都有。

商代的象形文字虽然常常颇有抽象意味，但绝大部分比现代的字形更像图画。例如“日”字最初是一个圆圈中间一横，“月”字很像一轮新月，“木”字在商代写作“丶”，这一图形代表一棵树的根枝。有些象形文字很复杂，例如“祭”字表示两只手倒举着一只鸟在有“神”含意的符号上。

另外大量的表意文字是些与其意有关的图形而不是实际的图画，数字“一”、“二”和“三”可能应该算在这类中。“上”字最初是上面一短横下面一长横，“下”字依此类推，这两个字肯定也属这类。更多的合体字也是这样，像“林”字由两棵树组成，“明”字由“日”和“月”组成。许多表意字很形象：一

个女人在屋内是“安”，一个女人在孩子身旁是“好”(hǎo)或“好”(hào)。

第三类字至少部分是按语音规则而定的。到商代已有许多字虽然是用象形字写出，但实际上表示用得更多的一些同音字。“来”字原是某种谷物的图形，大概因为发音为“lai”，就被用作表示发音也为“lai”但意思是“到来”含意的那个字。

表音字中有一大部分是由声旁和形旁组成的形声字。声旁用来表示与形声字相近的音，形旁用来表示字意的所属类别。因此有几百个字因某一方面与树或木有关，诸如“枫”、“梨”、“枝”、“植”、“架”、“枪”和“梯”等就都由“木”字与另一个纯系标明其发音的字组成。

现在使用的绝大多数字都属于这类形声字，这些字中的形旁已成为最常用的汉字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这一体系中，通常主要被用作形旁的二百一十四个字被选作部首，所有汉字都根据部首和部首以外部分笔划的多少分类排列，这样

25 “梯”字被分在“木”旁(第75个部首)的七划内。与按字母拼音分类法相比这是一种很麻烦的分类体系，许多字的分类很勉强，不过这样分类至少使这种独特文字的字海有了一些条理。

汉字的利弊

汉字与比较简易的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有某些弊端，显然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汉字。一个字往往很复杂，平均每个字的笔划可能有十二至十三划，有几个字笔划多达二十五划，甚至要看懂简单的教科书也至少必须记住二三千字。不适当鼓励记忆力，强调死记硬背学会所有这些

26 字可能限制了中国的教育。这套复杂的文字与那些在文化上

比较简易的文字相比增加了识字的难度，这样也就使只有相当少的有时间用于长期苦读的人才能进入上层阶级生活。随着普及文化需要的增长，这种文字在现代越益成为阻碍，即使是由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但汉字的印刷比西方文字的印刷在技术上要困难得多。到目前为止制造一种还不是像小型印刷机或电脑那样的中文打字机所作的一切努力结果都不很成功，最近简化了一些比较常用的字，这样做纵有补益，但没有解决汉字内在的主要问题。

另一方面汉字有某些西方文字缺乏的优点。字体非常复杂及其象形的特点使汉字有单纯拼音文字不具备的美学价值，书法在东亚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并且是所有象形艺术的鼻祖，写字的毛笔也被当作画笔使用。写一手好字总是被看作是一个人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

汉字本身还有一种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活力。人们一旦学会汉字以后，谁会忘记“安”字是一个女人呆在屋里，“明”是“日”“月”的组合？汉字本身似乎比其所要表达的口语词义更丰富，用法更微妙，这就使汉字在散文和诗歌中的用词简洁生动，而这在我们的拼音文字中就根本办不到。一旦学会了汉字，阅读速度也要比拼音文字快。

像古代中国人无疑做过的那样，很容易使汉字充满魔力。书面语总是比口语重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奏章、文论和诗歌，但却很少有伟大的演说辞。所有写成的文字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几乎都被认为其价值不容怀疑。这种态度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东亚民族高度重视读书和正规教育，在东亚识字人的比例要比其他经济水准相似但使用比较简单文字的地区高得多，这一点虽有讽刺意味但又并非出于偶然。

汉字的另一个大优点是它很容易就克服了方言的差异或

是其他更大的语言障碍。所有识字的中国人尽管他们说着互不相通的“方言”，但都能读同样的书，都把标准的书面汉语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假如他们是用一种拼音文字，或许

27 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情况一样。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一点至少有部分原因应从其文字中找到解释。

东亚文明形成一个较大的统一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汉字，对汉字的热爱和尊重使不同国家之间有着牢固的联系。直至一个世纪以前，朝鲜和越南的大多数著作，日本的许多著作都是用古汉语写成，而不是用本民族语言。甚至在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都能认识对方国家书中几千用汉字写的词，尽管他们对这些词的发音完全不同。如果中国使用拼音文字，那么东亚在世界文明中肯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整体。

第四节 商文化

除了文字以外，在安阳和其他商代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青铜器，其中大多是武器和精致礼器，器形一般相当大。青铜器上饰有深雕线条和高凸浮雕的富丽图案，这说明是有陶模或木模的。青铜器埋在地下，周围泥土引起的化学反应使铜锈泛绿，深浅各异，而益加精美。商代后期浇铸的青铜器质量非常好，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望尘莫及。青铜器的造型看起来完全具有东亚特色，例如青铜鼎可溯源到黑陶文化中的空足鼎。有些器物按照动物比如大象的形状浇铸，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当时还有象在那里生活。

青铜器上的主要图案是饕餮纹。饕餮纹的形状中间是水牛或公羊这类动物头的正面图形，四周按固定规制饰以方形条纹。同样的图案在安阳出土的骨器和石雕中也有发现，整个商代出现的图案与已发现的西方史前时代和古代动物总是侧面排列的图案完全不同。可是商代图案却与其他东亚国家、南太平洋地区出现的图案以及太平洋沿岸北美西北印第安人的图案有相似之处。这就产生了太平洋区域型图案的概念，商代提供了这一类型图案最早例证。

一些早期青铜器上出现了铭文，但商代文字大多刻在“龙骨”片上。这些“龙骨”实际上是龟甲、牛肩胛骨和其他一些表面光滑的骨片。因为这些甲骨在黑陶文化时期就开始被用于占卜，所以又常被称为“卜骨”，而这种占卜方法称为“骨卜”。²⁸ 在骨片的一侧用刀刻一道浅槽，然后在这个槽口附近加热，占卜者根据烧灼后产生的裂纹推断自己求卜问题的结果是“吉”还是“凶”。

大约十分之一的“卜骨”上刻了求卜的问题，也有一些刻有占卜的答案，有时甚至还刻有最终的结果。求卜的问题包括祭神、天气、收成、战争、田猎、祖先对后代生者的庇护或惩罚以及未来十天内的运气等各种事宜。十天一旬当时已被确定为东亚的“星期”。国王的重臣好像全是占卜者，我们可以由此看到占卜活动多么重要。祭祀也极为重要，通常用动物祭祀，但有时用酒，在祭祀时把酒洒在地上，这可能是一种麦酒。祭祀对象是各种自然神、东南西北四极以及可能是商族人“始祖”的帝或上帝。

商代国家与社会

商代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当时也有牛羊，但那时中国

人可能已有厌恶牛奶和乳制品的习惯。因为青铜器少且造价
29 高昂，农具都是木制或石制。海贝被当作一种早期货币使用，
产自南方的海贝在文字中留下了痕迹：许多与财富商业有关
的字都以“贝”作偏旁。玉石的价值很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
是这样。

商王的继位常常是兄终弟及（十三次）而不单是父传子继
(十七次)。这些商王的一连串都城中有两座无疑就是在郑州
和安阳附近发掘出的两个城址，商王在都城以外实际统治的
范围有多大还不清楚。商代文化遗址分布在从黄河河套至山
东中部之间中国北方广阔的地区内，但是这一地区内许多地
方是由商的藩国甚至敌对国家统治，商王实际控制的地区可
能很小。商王常与附近的邻国以及掳掠成性的游牧民族交
战。

另一方面，商王国还是比较大的，国家可投入战场的军
队人数达三千至五千人，另外在郑州和安阳发掘的商代遗址
也很壮观。商代的建筑风格与现代中国的建筑风格基本一
致，而与西方古代的石砌建筑不同。屋顶用一排排木柱支撑，
墙壁先是夯土墙后来一般是砖墙，这些墙壁仅仅是不起支撑
作用的间隔物。木柱竖立在石础上，下面是夯土平台。就像
30 中国北方仍保留的习惯一样，人们细心地把建筑物正面朝
南。

与宫殿建筑不同，普通人的住宅与新石器时代的建筑一
样都是些简陋的地穴房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通
过在安阳的规模宏伟的王陵进一步表现出来。这些王陵墓穴
巨大，深四十三英尺，面积达五千平方英尺，随后再填满经夯实
的土。一般还埋有可供日用且价值昂贵的各种殉葬品，大
概是供死者身后享用。在陵墓中发现了战车，这表明商王朝
是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波及从希腊到中国的整片文明世界的

战车文化的组成部分。

许多贵族和商王随从的尸体也埋在王陵中，另外还有其他人殉的方式，通常一次埋几十人，有时甚至要埋几百人，有些历史学家得出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结论，总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商王开始仅仅是沟通人与祖先和神之间联系的大巫师，但经过商王朝近五个世纪的发展已上升成为拥有很大权威的统治者。因此中国人建立和容忍统一专制主义国家的倾向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

专制主义类型的起源

对早期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类型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理论。在商王朝统治时期，对青铜冶炼、青铜兵器和马车实际的垄断可能给了统治阶级凌驾于国家其他成员之上的极大权力，一些波及面更大的因素可能也在起作用，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的家庭模式使家庭本身趋于专制主义。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感到需要统一起来抵御邻近的游牧民族，比如长城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有些学者认为，为控制黄河以及修建水利排灌设施需要付出巨大的共同努力，这是中国出现专制主义国家的另一原因。为完成这些工程，必须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来指挥众多的人，可以说，无论什么地方需要大规模治水，专制类型的或称“东方”类型的社会就会在那里发展起来。在这类社会中，专制君主得到控制众多农民的官僚阶级的支持，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就是这样。

夏王朝建立者禹在中国治理洪水的神话与这一理论很吻合。在第一个伟大中华帝国创建的年代确实有过很多人合力 31

治水的事。但这是离商代大约一千年以后的事。在商代，人们从事农业依靠的是降雨而不是水利灌溉，因此治水理论虽然有助于解释后来专制主义类型的延续和强化，但不能用来解释商代国家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产生的原因。

第五节 周代前期

周代国家

公元前1050年前后征服商的周部族居住在黄河大弯曲地带西部的渭河流域，周民的都城在现代的西安城附近。周族本身是个农业民族，但他们与中国西北牧羊的蛮族为邻，在文化上与商族完全不同。大概直到周征服商时，在渭河流域还一直保存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

周族显然曾作为保卫商王国西部通道的商的藩属，但在连续三代领袖文王、武王和武王之弟周公的领导下，周灭了商，席卷整个中国北方。事实上早期周代遗址分布很广泛，表明周征服的地区从渭河流域至山东东端，再由满洲南部到长江中下游流域，范围比商代曾经统治的地区要大得多。

靠当时用马车传递的原始通讯方式不可能直接管辖这样大的地区，周公在商代旧地的中心、现代的洛阳城处建了一座陪都。另外周王还授权给一大批诸侯，这些诸侯大部分是国王后裔和亲戚，但其中也包括一些承认周宗主权、与国王没有血缘关系的国王亲信和地方贵族。这些诸侯很快按声望排列形成一个严格的等级，封号通常称为公、侯、伯、子、男。各诸侯国实质上就是一个小城邦国家，由一座有城墙的

城市和周围的农村组成。这样的国家有多少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8世纪，在许多国家相兼并，又有新的国家增加进来以后，总数目可能是二百个左右。

每个诸侯名义上承认周的宗主权，但在自己国家内享有自主权，这种制度常被称为“封建”，东亚人也用这个词指西方和日本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可是“封建主义”是否是合适的词似乎还令人怀疑。我们对周代前期的许多看法受到后来的中国思想家态度的影响，他们把周代前期视为“黄金时代”，32掺杂了他们自己对政治统一与政治制度的企望，强调他们认为应该作为政治指导准则的礼仪、公允和道德。由此而绘成的一幅图景与西方的封建主义确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内容可能相差甚远，它主要依靠血缘的和非血缘的亲属关系纽带来进行有效的控制，其次才依靠封建的法律准则。周王朝的这种制度可能与同一时期在西亚通过地方总督统治的制度比较相近，而与两千年后的欧洲的封建制度差别较大。

周王朝与商王朝一样有着截然分明的阶级社会，世袭君主得到贵族武士的支持，统治农民和大多充当家内仆从的真正的奴隶。后来有些文人提出在周代前期每户农民有一块田，八户农民共同耕种他们所占土地正中的一块田供养君主。这种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因为汉字“井”描绘出九块田组成一个整体的形状。显然这是后人理想化的结果，但也可能反映了这是一个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共同享用的时期。

周文化

在周代前期，商文化的许多内容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下来，这证明周族征服者的文化落后。在这时继续铸造外观堂皇的青铜礼器，许多器物上刻有大段铭文，但有时器形比商代粗

糙。随着时代发展，青铜器的细部逐渐趋于平淡质朴，可能是因为青铜礼器已失去原有的宗教意义，仅仅是一种传统。文字继续不断地演变，虽然很快有其他占卜方法代替了骨卜的地位，但骨卜仍在使用。

与商王朝时的做法不同，继位是父传子继（周公不能继位正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国王死后埋在有着巨大方形封土堆金字塔形的陵墓中。周王朝的主神是天，其原本明显是拟人化的，因为“天”这个字最初是一个人的大致图形。周王自称为“天子”，以证明他们的征服活动是因为接受了“天命”。国王的主要礼仪活动都与其先祖“天”有关，而每一地区的居民则要对生命之源的“后土”奉献祭品。一直到20世纪各朝代继续采用这些古礼，在北京现在还保存着一座圆形天坛和一座方形地坛。

第三章 经籍时代的中国：中国 思想的黄金时代

第一节 周代后期

我们不知道周代前期对其征服的广阔地区保持了多长时间的有效统治，可能不会长久，或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诸侯与国王之间原先效忠的纽带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削弱。公元前841年，第十代周王被臣民赶出都城，接着是十三年的空位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这一事件当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民起义。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动荡，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此之后中国传说中的历史纪年才比较可靠。

下一位国王致力于复兴周政权，据说他拥有三千辆战车，三万名军卒，与此相比最初征服商王朝时才动用了三百五十辆战车。可是在公元前770年，“犬戎”联合叛乱的中国诸侯平毁了周王朝的都城，残存的周政权灭亡。传说第十三代国王曾点燃烽火，多次召集各路诸侯军队到来，而仅仅是供其一位宠妃取乐，结果当确实需要帮助时却无人响应前来。在东面的陪都洛阳王统得以重建，但国王不再行使任何真正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直到公元前256年最终灭亡时周王都只是起着某些宗教和礼仪的作用。

因都城的位置，公元前770年以前这段时期称为西周，公元前770年以后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尽管中国人非常重视计数

的十进位制（他们不用十二进位制，七天的星期和其他类似 34 进位方法），但他们习惯上不以世纪作为计算时间的单位。

他们是把历史分为各个王朝，比如像西周和东周。中国人再进一步把东周分为两个比较短的时期，其名称将在后面解释。这两个时期是年代通常定为公元前722—前481年的“春秋”时期和年代一般定为公元前403—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后世满怀建立统一帝国理想的中国人把东周看成是一个无望的分裂时期，但这恰是一个发展迅速、充满活力且有着极大创造力的时代，可能正是因为根本不存在集中的权力和敌对国家的多元化起了刺激作用。就许多方面来说，东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令人兴奋并充满浪漫色彩的阶段。

公元前8世纪，中国在技术上还落后于西亚，但到东周末年已基本上赶了上来，并且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中国内部七个最大的国家加在一起可能已有约两千五百万人口，与整个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差不多。公元前5世纪铁在中国已很常见，这种金属在西方的出现比中国早约一千年。铁代替青铜作兵器，铁农具和牛拉犁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农业革命。到这时中国北方的荒地得到开垦，“蛮夷”民族所占的孤立地区融入主体文化之中。修建的大型灌渠和其他水利工程使粮食产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花费了极大人力开凿运河，这表明经济组织有了发展，长途运送大量税粮和其他商品的需要也有了增长。

产量增加以后，商业也在迅速发展，财富急剧积累。在周代，越到后期，各种类型的富商就出现得越多。这一新兴的阶级对旧贵族阶层不利，可能出于自卫，贵族阶层宣传一

种理论，认为社会由四个阶级组成：首先是士，其次是农（主要的生产者）。第三是工（次要的生产者），最后是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对贵族来说是值得怀疑的。不管这一理论甚至在周代后期就是多么的不合实际，但在以后的两千年中仍然是东亚人的信条。

丝帛和贵金属锭很早就当作交换媒介使用，后来一直沿用到现代。另外这时铜币也很流行，最初铜币在中国西部铸成小农具形状，在东部铸成小刀形状，但到周王朝灭亡前可用绳串起来的圆形方孔钱投入了使用，这种钱直至19世纪后期一直被作为中国的标准硬币。周代后期还出现了中国文明的其他典型器物，比如筷子和漆器。35

东周列国

正如这一时期后几个世纪治水活动的情况所清楚表明的那样，由于技术和经济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有效率的政治实体的稳定发展。分布在华北平原的城邦小国在攻伐争战过程中，至公元前8世纪大约有十个国家已经比较强大，其统治比较有效能。可是这些国家的领导地位在以后几个世纪中为周文化边缘地区的国家所占有。这十个国家都挤在中心地区，很少有发展的余地，它们可能受到传统较多的束缚而不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技术的革新。以鲁国和宋国为例，尽管这两国统治者都有着值得骄傲的传统，一是周公的后代，另一是商王室的后裔。在东周初年两国地位显赫，但后来都逐渐降到边缘地区国家藩属的地位。

齐国是典型的边境地区国家。齐国位于华北平原东端，后扩展势力达到多山的山东半岛大部分地区，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间领土增加了六倍，所控制的地区相当于现代中国

的一个省。在北方现代山西省境内，晋国有着相当大的版图。在其东北方，即现代北京附近地区是燕国，由此北京又有了一个雅称：“燕京”。在西面被别的国家看成半“蛮夷”的秦国在渭河流域代替了周。

在南方，至公元前8世纪，半“蛮夷”的楚国已沿着长江中游一带拥有庞大的领地，从此开始楚国称自己本国统治者为“王”，以否认周对其拥有统治权的虚名。楚国东面的吴国到公元前6世纪时已控制了长江下游附近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吴国是从周代前期一个处在“蛮夷”民族中的边区发展而来的，在吴国旁边的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越国。这三个南方国家都位于大湖和可通航的大河地区，因此36 三国都是既有船舰又有士卒的水上强国。吴国是上海地区所用的“吴方言”名称的来源。至于越国，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与不断向南推进的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区密切联系的名称，这一南进的界线最后一直延伸到越南才抵终点。

由上述这些外围国家统治的地区绝大部分都在周代前期曾经征服过的地区范围内，但其中部分地区的居民被住在中国中心地带的人视为“蛮夷”。在北面和西面，这些“蛮夷”大概都是游牧民，有些民族可能已经说汉语。南方的“蛮夷”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农耕民族，但据说他们的话很难懂（尽管这些话可能与汉语系语言有关），他们显然还有许多不同的文化特征。在东周时期这些“蛮夷”并入中国文化地区是一个文化交融重大过程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原37 先的非中国民族逐渐汇入中国文明的巨流之中，只是在西南边远地区有一些地方仍然没有被同化。

政治与社会革新

周代前期的城邦国家都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这些国家的诸侯因提供奉祀共同祖先的祭品而要求在宗教上应有一种合法地位，他们手下的士大夫大多是他们自己的亲戚。但随着技术进步，财富增加，商业得到发展，政治机构扩大，这种近乎氏族制的贵族组织开始过时，许多国家已变得太大和过于复杂而不宜采用这种家庭式的统治了。

旧的公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那些以其拥有的土地或经商为基础聚敛大量财富的强大的新家族，代替了与诸侯有亲属关系的旧贵族。这类新兴的家族有时推翻并代替了旧的统治者，这方面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北方的晋国被继起的韩赵魏三国瓜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53年，公元前403年得到周王正式承认。这两个年代都被作为“战国”时期的开端。

为了控制广大的领地，不让臣民威胁诸侯的权威，就必须采用比旧的贵族社会更强有力、更有效的统治方法，结果是一种更加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以及更强大的集权制发展起来。像这样的几个重要的改革得力于东方齐国的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及其能干的大臣管子，后来有一本以《管子》为书名的书，一般人认为就是他写的。据说他们把齐地分成若干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单位，制定统一的税制，重新组织军队，要求各个地区为中央军队提供兵源，而不再依靠世袭贵族可能投放到战场的那种由亲属家人组成的队伍。据说齐国还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力图控制物价，管理度量衡并鼓励商业。后来成为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主要经济来源的盐铁国家垄断生产，据传说最早也是管子在齐国实行的。

很难说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多少内容确实是公元前 7 世纪第一次在齐国出现。国家盐铁垄断可能不会出现得那样早，但归功于管子的所有改革都是周代后期在中国出现的重要革新措施。毫无疑问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一个统一 38 的集中控制的地方政府体制，制订一套明确的农业税制度。

另一个主要方面是行政官僚代替了旧的血缘贵族作为王侯的助手出现，管子本人就是这种官僚的第一个典型代表。成文法典代替了以现成传统为基础的旧的个人裁决制度，历史上记载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魏文侯（公元前 445—前 396 年）统治时所制订的，魏国是由晋国分裂成的三国中的一国。

军事发展

同时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早期，交战双方显然遵守作战的严格规则，人们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即使被征服，贵族的世系也不应该消失。正是通过强调正统性，位于中心地区比较弱小的国家试图遏制外围强国的威胁。但现在战争的规模更大更加无情，被征服的国家灭亡后成为胜利者的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郡。公元前 4 至前 3 世纪，所有大国的国君都仿效楚国的做法称王，因此也就表明他们即便在形式上也不再承认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直到周代后期战车仍在使用，但造价低廉的铁兵器使军队人数大大增加。农民参加的步兵作为军队的主力，代替了装备有昂贵的青铜兵器的贵族参加的战车兵，这时军队的人数达到几万人。

另一个军事创新是使用骑兵。最初由中亚和西亚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骑马术，对中国人除了有军事影响以外，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骑马能够快速运动，加快

了西亚和东亚两大农业文明之间的交流。这可以用来解释这时西方的发明和思想更快传入中国的原因，这些外来文化有助于弥平两个地区过去存在的技术上的差异。例如甚至在视觉艺术领域，西方人所重视的那种侧影排列的图案，经过居间的游牧民族传播，在中国开始代替过去商代流行的图案。

马的使用使邻近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比以前更大。这种威胁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北方的国家修起了长长的城墙，后来这些城墙被连接起来成为中国的长城。另一结果是骑兵在中国军队中代替了战车兵，弩——很可能是当地的发明——的采用可能加速了这一变化，它和本地原有的弓一起使骑兵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骑兵出现的一个结果是传入了紧身衣裤，这种衣服比宽袍大袖的传统服装更方便。因此中国人开始逐渐成为第一个男女都穿长裤的伟大农业民族。 39

寻求政治稳定

面对周天子权威的衰微以及战争的更加残酷，东周时期的列国对减少战事稳定政治局势做了许多努力。他们相当频繁地举行两国和多国参加的会议，讨论弭兵方案，签订和约，缔结同盟。王室间的联姻是加强同盟的一个重要手段，到处都扣押人质以确保藩属国家的忠诚。

南方半“蛮夷”的楚国对华北平原上的国家形成了特别的威胁，这些国家常常结盟以抗楚国。这一联盟最早在公元前651年成立并发挥作用，齐桓公被公认为联盟的霸主。可是称霸制度只能使中国保持短暂的稳定，持续时间不超过能够称霸的强者活着的时间。齐桓公之后，下一个称霸的是在公元前632年成为霸主的晋公。当楚王在公元前7世纪末成为霸主时，称霸制度原来的目的已不存在了。公元前6世纪，

通过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之间形成的均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同时吴国在楚国东部边境迅速兴起，于公元前 482 年 40 被公认是中国首要的军事强国，但公元前 473 年吴国反而被所有国家中最不开化的“蛮夷”越国打败并被并入越国。

在中国古代没有更进一步出现建立国与国之间秩序的尝试，蛮横的征服一时成风。公元前 453 年晋国分裂以后，争霸的主要对手是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公元前 334 年 楚国灭了越国，公元前 249 年又灭了中部的小国鲁。经过一次篡位之争后的齐国于公元前 286 年兼并了中部的宋国，公元前 256 年秦国不声不响地灭了周国自身。最后经过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之间一系列大战，秦国征服了所有尚存的独立国家，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哲学家与经籍时代

早期哲学家

东周是一个经济大增长、社会大变动同时又政治大发展的时期，旧的精神和世俗的权威失灵加上正在进行的改革带来了新的问题。过时的传统不得不被抛弃，不得不去发现新的有指导意义的价值，人的思想可以任意驰骋，探讨问题在东亚历史上确实比任何时候都更自由。

人们感到震惊，中国这时思想的繁荣与希腊哲学家、希伯来先知、历史上的佛祖释迦牟尼以及其他印度早期宗教领袖活动的全盛期是在同一时期。在整个文明世界中，这是一

个奇特的哲学活动的时代。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时交往增多，各个伟大文明中心之间不同思想相互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所有这些地区到这时都比较富裕，能够养活一大批思想家。另外，人类越来越多的发明正在摧毁传统的观点，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有意识地力求解决人生与社会的意义和目的这些主要问题。挑战是同样的，但反响却有很大不同，地中海、南亚和东亚的各个文明沿着显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各种思想层出不穷的伟大时代产生出的不同哲学态度现在仍然是区分各大文化区域的突出要素之一。

从这时起中国人的哲学趣味主要集中于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动物的人。这种哲学趣味绝对是“人文主义”的，也可能应该说是“社会”的，因为其强调社会多于个人。这与印度和地中海世界的传统哲学强调神与来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难断定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向这一特定的方向发展，可能是 41 政治和社会问题本身对中国人的思想更有吸引力，因为在周代，在统一的庞大文化体内部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无政府状态。

不管怎么说，早期中国的哲学家首先是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是因文化传播以及日益复杂的政治制度之需要而产生的新的官僚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些人常常周游列国，在受人赏识时为人所用。这些人中的伟大思想家们，不管他们作为实际政治家是否得志，都吸引了自己的追随者而成为授徒讲学的老师。他们的门徒逐渐形成哲学学派，在这些学派中学派创始人的言论经许多后人加工补充，最后成为周王朝时期的哲学著作。

经籍

虽然哲学家经常是大胆的创新者，但他们中许多人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把过去看成是令人鼓舞的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在一个特别注重社会问题的文明中，很自然，作为人类经验宝库的历史应该特别为人们所注意。这种对过去的兴趣与中国人对书面文字的特别尊重造成了人们对早期著作的极度崇拜。当然这是全世界各地共同的特点，但似乎在中国人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孔子和其他古代哲学家把早期的著作视为他们从中引出自己学说的经典。这样的看法在东亚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两千多年中，中国学者在遇到新问题时，总是企图从这些经学著作的重新解释中找出答案。

对热衷于等级和层次的中国人来说，“经”不仅是个泛指古代各种文献总体的含意模糊的词，而且还确指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有关的那一类书。这些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大量注疏著作组成了中国文献四种传统分类中的第一类。各种经籍书目都是在周代以后拟定的，因而包括不同时代的著作，但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的最早最重要的书目五经，其中包括一些最古老、最受人尊重的著作。

五经中的第一本是《诗经》，由305首公元前10至前7世纪时的诗组成。其中有些是爱情诗，另一些是政治诗或是宗教礼仪颂歌，但所有的诗歌都有一定的音步、节奏和韵脚，因而很明显这些诗歌不仅是民歌，而且是一种复杂文学传统的42产物。甚至在早期，诗歌显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背诗和作诗此后一直是一个人受过教育的标志。

《书经》包括周代头几个世纪的一些不完全可靠的历史文

献和演说，不过现在已知文章中大部分内容是后人的伪托之文。在公元前2世纪《书经》的两种不同版本的发展以及对书中后人伪托部分的质疑，自此以后造成了无穷无尽的语言学和哲学的争论。

《易经》是另一本在不同年代中写成的著作。此书的核心是八卦和六十四重卦，用以替代骨卜的另一种占卜制度。在东亚艺术中经常画出的八卦是三条完整横线和断裂横线所有可能排列出的八种组合图形，假如用六条线代替三条线，可能排列出的组合图形数目就达到六十四个。可能是从卜草梗的奇数和偶数排列中，定下了这种特定的卦与重卦，于是查阅《易经》是为了问卦。换句话说这是一本占卜手册。

《春秋》是在鲁国发生或是在鲁国听到的重大事件的简要编年记录。书中所涉及的时期从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后来以“春秋”时期而闻名。此书行文简洁，完全符合事实，据传说孔子对记述每一事件的用词都曾赋予深刻的哲理，后来的哲学家肯定也这样做过。不过孔子亲自编《春秋》的传说无疑是不真实的。

五经中最后一本《礼记》在公元前2世纪编成，内容是早期有关礼仪的材料。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是儒家有关社会秩序整体观念的要点。这部经书显然出自儒家传统，其他几部经书也与儒家学说有密切联系，因而这五部书通常都被看作是儒家经典。

在周代灭亡一千多年以后，从浩瀚的古典文献中选出了四本相对来说部头不很大的著作作为儒家学说的最高体现。这四本书以“四书”闻名，包括《礼记》中的两章：《大学》和《中庸》。另两本书是孔子本人的对话录《论语》和他的最伟大的继承者的一本同样的著作《孟子》。《论语》和《孟子》以及五经和其他几部早期著作通常也被归为十三经。在十三经中，

43 《春秋》算作三本书，因为有三本注释《春秋》的著作号 称“三传”，其中两本是简单的注解著作，但第三本《左传》是一部叙事详尽的政治史，内容中有许多地方对细节的记述掺杂了作者的想象，但《左传》仍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史料来源。

非儒家哲学家的著作从不包括在经籍范围以内，其他各种在史学或文学重要性上可与经籍相比的早期典籍也得不到官方承认。周代后期最优秀的诗集《楚辞》，其中大多是公元前3世纪初在世的南方楚国贵族屈原写的诗。他写的《离骚》有着超越时空的奇想，显示出《诗经》中根本缺乏的丰富想象力，这可能是南方半“蛮夷”民族的特点。

44 第三节 儒家和道家

孔子

恰当地说，我们所知的中国第一位职业教师和哲学家也应该在东亚被看作是最伟大的教师和哲学家，这个人就是孔子。他生活在公元前551至前479年左右，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论语》。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孔子回答问题，用“子曰”开头。《论语》是由孔子的门徒或是门徒的门徒写成，许多是后人附加上的内容。

孔子是深受传统束缚的中部国家鲁国人，他渴望获得高官，徒劳地周游列国以求职，因此作为他所选择的职业——实际政治家，孔子是失败者。可是他所顺带从事的职业——教师，时间证明孔子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初一看孔子所教授的那些观念好像既不能令人兴奋又很平淡，他的主要兴

趣在于政治问题，显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倾向。虽然孔子完全承认神和天，有时还表现出一种源自于天命的使命感，但他明显地对冥冥之事没多大兴趣。在问到死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甚至在政治领域，他仅宣称自己是古制的热心研究者以及过去知识的传播者。他认为人们只要返回到想象中的由周王朝创始人文王和周公所制定的那种政治和社会秩序中去，当时天下无道的状况就会得到纠正。

孔子认为，为恢复古制，人们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权力社会中各安其位。这一思想被简单明了地表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这一概念又被说成是“正名”，由此孔子实际是指要使构成社会的诸要素名实相符。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好像是极端保守的，但就孔子的仁政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的基本思想来说，事实上他是一位伟大的、虽然可能是不自觉的改革者。他没有对君主世袭统治的权利提出疑问，但他坚持君主首要的责任是树立一个合乎道德的品行优良的适当的榜样。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他提出，政治成功的真正标准不是权力，而应是统治者具有美德，被统治者感到满意。孔子以前中国人的思想可能是以不讲伦理道德为特点，以占卜和祭祀为中心。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伦理学家，是这个最重视伦理价值之文明的伟大伦理传统的缔造者。

孔子理想中的人是“君子”，字面意思是“君王之子”或“贵族”，这个词在孔子手中意思从“贵族”变为“崇高的人”。按照有教养的人或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含意可能最好译为“gentleman”。孔子谈了许多有关“君子”应该具备的美德，这些美德是“直”、“义”、“忠”、“恕”，尤其是“仁”。4546

孔子认为“君子”必须具备的素质不仅限于这些内在的美德，“君子”还必须具备“文”和“礼”，“文”就是“有文化”，可

能还指“优雅”；“礼”就是对应有的礼仪和社会习俗的了解。孔子对培养出“虽有好资质但无教养的人”没有兴趣，正如他所说：“质胜文则野”。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认为高尚的音乐有助于陶冶高尚的道德观。他对古礼的强调形成了礼仪在后来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以及后来在东亚总是依靠外部活动以灌输的观念——这在当代西方可能很不受重视，但却是一种很有教益的方法。

内在的美德和外在的文雅保持适度的均衡，体现出孔子思想里中庸的特征。在印度和西方，哲学家和宗教领袖通常处事绝对，也就是说他们趋向于强调逻辑和数学上的绝对。孔子是个相对主义者，按照社会和人文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他确定了东亚的那种总是寻求妥协和中间道路的模式，正如《孟子》中很确切地评述：“仲尼不为已甚者。”

中庸和均衡或许有助于解释儒家学说为何最后获得胜利。儒学基本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使之深受东亚后来大多数统治者的欢迎，儒学高层次的道德准则比单纯的世袭权利更为政治权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始终是政治改良的促进因素。儒学胜利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合乎时势。受过教育的官僚阶层适应政治的需要在中国逐渐壮大起来，这一职能集团需要一种哲学，孔子相当好地提供了这种哲学。在从不对世袭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提出疑问的同时，孔子设想饱学之士不论其原来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权告诉统治者应该怎样做，如何管理政府。因此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这基本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对世袭统治权力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道家

儒家以外，中国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潮是道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些被长期的战争、混乱和死亡吓坏了的思想家因不愿追逐权力、地位和财富而表现出来的消沉退却的哲学。面对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他们承认个人的渺小，纵使人类是 47 巨大宇宙力量的个体表现。这种哲学是普通人对统治者日益专制不满的抗议，也表达出有才能的杰出人物对步孔子后尘的道德家们日趋僵化的反叛。道德家和统治者企图使人符合社会规范，而道家坚定地提倡每个人的独立，他们认为个人唯一应该关心的是适应自然的大规范，这就是“道”。孔子用“道”指他所鼓吹的那种社会制度，但在道家学说中“道”得到了玄妙的解释。

有些学者把早期道家与长江流域的楚国联系在一起，提出道家可能体现出中国思想一部分内容来自于“蛮夷”文化的这种丰富性。道家企图使人的生活与自然节律相适应，这也可能是早期中国人对自然神、祈祷丰年以及统治者在自然与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所起作用诸方面兴趣的哲学表达。作为道家思想核心的道家神秘主义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巫师，巫师通过自己搞的阴魂附体直接与神交往，而道家通过“打坐”和“禁思”也像巫师一样神情恍惚，由此达到“真人”的境地，领悟到宇宙的独一。这样的做法可能受到印度瑜伽术的影响，因而像印度人一样，道家强调运气。

我们对周代道家的主要知识来源于三本作者年代都不明的书。其中最受重视的一本是《老子》，又称《道德经》。这本书内容混杂，可能出现于公元前 3 世纪。虽然书的作者假定是一个名叫老子的神秘哲人，而在传说中老子要比孔子略年

长一些。《道德经》文字风格精炼而晦涩，使得后来的中国思想家的解释各不相同，译成西方文字的各种译本差异之大也令人吃惊。

第二本书《庄子》可能也出现于公元前 3 世纪，但被人们认作该书作者的庄子是公元前 4 世纪后期的人。书中充满了生动的寓言、比喻和诗句般的段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现出早期道家思想最重要的特征。第三本著作《列子》内容和风格都很像《庄子》，对其出现的年代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另有人认为成书于公元 3 世纪。

像所有的神秘主义者一样，道家发现难以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基本思想。正如他们所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建立在无形无名的“无”之上，实质上“无”是自然过程的整体。无论怎样不断变动，“道”不会改变，没有大小、善恶、生死之分。万物的相对性以及任何特性都依靠其对立面而存在是道家永恒的命题，正如他们所说：“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能超越人间殊荣而与“道”合一的人就能“无害”，并达到“无所争”的境界。与“道”合一的关键是“无为”，至于“无为”，道家的意思不是完全不行动，而是做顺其自然的事，“无为无不为。”如若任其自然，宇宙就能按其自身的和谐缓慢地运行。人改变或改进自然的努力都只是在破坏这种和谐，造成混乱。所有自发的成就都有一个诀窍，而自觉的努力只会破坏自发的成就。圣贤没有野心，因此也就不会有失败，他甚至不准备教化别人。按这个标准，道家的学者他们自己显然是没有完全做到的。

道家很适应当时社会的主要兴趣所在，描绘出他们自己设计的一幅完美社会的图景。像其他中国哲学家一样，他们也回顾昔日的黄金时代，但对他们来说这个过去只是有着完

善知识的时代，它甚至在先民们意识到“万物生成”之前就存在，更不用说他们知道物与物之间的“差别”，以及随后得出“是与否”的看法。他们感到善恶的观念以及这一观念在礼仪中的体现是人痛苦的真正根源，因而儒家圣贤是历史不自觉的罪人，其所提出的美德是罪恶存在的原因。法律是犯罪之源，没有财富也就不可能有偷窃。

另外浑沌也是道家的理想，知识只会使人堕落。在《庄子》中有一个寓言，讲浑沌有两个朋友，叫倏和忽，他们决定给他凿上视听食息必需的七窍，日凿一窍。七窍凿好了，但浑沌也就死去了。道家赞美一个明知有水车但仍从井里背水的农民，因为这个农民懂得奇巧之物会使人产生邪念。道家的政治理想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家，在道家哲人统治的这种混沌消极的社会里无所谓作为，无所谓仁爱，由无为实现一切。

作为一种哲学流派，道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势力大衰，但其基本看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有影响。道家学说明显提供了没有它中国社会就很不足或有所欠缺的东西。政治上的日趋一致以及沉闷的儒家道德不利于美的创造，可是中国人总是有强烈的美的冲动，这是受到道家鼓吹个人自由及其神秘的与自然合一的主张的鼓励。中国的艺术家和诗人无论与儒家传统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在内心深处总是个道家学说的信奉者。

事实上道家学说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思想观念的极好平衡在起作用。集权给人民的自由以极大限制，儒家道德及其坚持社会的一致起了更大的限制作用，但在道家学说中，个人能够自我表现，人的才智可以随意发挥。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绝对排它性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可以同时既信奉儒家又信奉道家，在这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可

能要比在单单一种学说的基础上更能够达到健全的心理上的平衡。一个人掌权时通常是儒家的实证主义者，试图拯救社会，而在无权时就成了道家的无为论者，寄情于自然。在早晨是积极的官员，晚上就成为好幻想的诗人或是爱好山水之徒。这种哲学和人格上的均衡二重性一直保持到现代。

第四节 其他哲学学派

阴阳家和名家

儒家和道家决不是在周代后期蓬勃出现的所有哲学学派。中国人有喜爱分类的特点，他们称这一时期繁荣的哲学思想为“百家”。

称作阴阳家的一派都是些试图以某些宇宙规则为基础分析自然运行的人。他们有一个观念是自然最基本的二重性：“阳”是男性、明亮、灼热、主动的，“阴”是女性、黑暗、冷峻、被动的。与地中海世界善恶处于永恒冲突的二重性不同，阴阳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阳”越盛，就会越快地让位于“阴”，太阳到正午时开始让位于黑夜。阴阳二者相互依存由一个环形图表现出来，今天这一图形是南朝鲜国旗的主要图案。实际上阴阳观念用于分析自然和人类社会事务常常比

50 西方的二重性更有用，阴阳观念与日夜、冬夏以及男女相互制衡作用的循环往复很吻合。将这一观念用于本章所述的内容，可以说儒家是中国思想的阳，道家是阴。

阴阳家的另一基本观念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由木、金、火、水、土“五行”的不同结合所组成，与希腊(土、火、气、水)

四要素观念如此接近实在令人吃惊。“五行”观念很快导致大量一直保存到后来的伪科学的发展，宇宙间的相互作用都在五行以及其他多种五要素中起变化，那就是五色、五味、五音、五宿和五方（包括中央）等等。加上象数术和占星术，各种可能性是无穷的。古代的纪年符号也融入这一体系中，这就是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与黄道十二宫有关）。天干地支两两依次排列的结果，形成以六十为一循环，用来计算以六十天或六十年为一个时间段。这一伪科学用于看地形以及给房屋、坟墓和类似建筑确定合适的地点，成为叫做“风水”的学问。

另一哲学学派像希腊的诡辩学派一样是一个分析词语意义、研究逻辑体系的学派，例如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提出一个著名命题“白马非马”，在此命题中假定用了形容词“白”，那“白马”就不再算是一般概念中的“马”了。名家的思想被后代的中国人指责为是没有意义、没有益处的。

墨子

儒家早期的主要对手是生于孔子去世前后不久的墨子的学派。墨子的学说见一本叫《墨子》的书，书中有文章和像《论语》那样的对话。墨子主要攻击儒家，表明他可能代表儒家的一个异端支派，另外墨子对逻辑的兴趣可能使名家得以出现。

在大多数问题上，墨子采取比孔子更激进的立场。孔子鼓吹有知识的人应该指导统治者，而墨子认为世袭的王侯没有理由不把宝座让给明显比他们有才干的人。孔子在内心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人，而墨子是一个严格的功利主义者。墨子鼓吹要采取措施使国家富裕、人口增加、社会安定。他极力

攻击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任何事。衣食住都应限制在仅能满足需要的范围内，他用不着任何美的表现，鼓吹禁绝一切感情的流露，音乐和儒家的礼都是奢侈的。墨子尤其抨击厚葬以及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期限，这些都是儒家所定之制。战争是最大的糜费，他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增强防御使进攻徒劳无功。后来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墨子的和平主张完全失败了，后来人们对他的著作的尊重远逊于对周代后期军事艺术经典《孙子》的尊重。

墨子赞成能给人世间带来幸福的祭神活动，他承认有着一个用适当奖惩对他的学说给以最后判定的道义上的天。因此在他的学说中有着非常独断的倾向。他要求自己的大量信徒严格服从，他还把权力给予学派中一批叫“巨子”的首领。很自然，他憧憬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各等级的下属在一切事情上都要追随其上级的领导。

墨子实现其功利主义乌托邦国家的万灵妙方是兼爱学说。承认宗法制度以及社会有复杂层次的儒家这时正按个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制订出一种爱有等级的理论。而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则所有人的利益都能更好地得到兼顾。

墨家学派为什么未能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流传下来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墨子的门徒比孔子的门徒组织得好，一度墨子学说流传得更广。西方人从他的“兼爱”学说中发现了功利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别的世俗内容，另外还发现墨子对逻辑问题有兴趣，这些观念都可以大大丰富中国人的思想。但墨子的思想对他所处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太走极端，他们不喜欢墨子严格的功利主义及其完全缺乏心理上的敏锐感受。他们喜欢孔子的有节制但较为实际的有等级的爱，而不喜欢墨子的崇高但似乎不实际的“兼爱”。

孟子和荀子

墨子未能将其学说传诸后代但有一位哲学家却获得了成功，那就是孟子。他的著作《孟子》在12世纪上升为经，其地位仅次于《论语》。《孟子》是一本有很高文学价值和很深心理感受而篇幅较大的著作，对东亚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

孟子生活于公元前370—前290年左右，是鲁国附近地区人，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以求官职而不成。但孟子及其大批门徒却得到一连串统治者的热情接待，而孟子却极度蔑视这些人。⁵²孟子把自己仅仅看作是孔子的先人之道的传播者，但事实上他还加上了一些重要的新内容，其中一点是人性本善。他指出，任何人当他突然看见一个孩子就要掉进水井时他会本能地感到惊恐和怜悯。（举例说理以及类推手法是孟子和当时大多数哲学家的特点。）内心的自我修养和教育可以发展这种生来就有的善，人应该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的爱超出只是本能地产生这种感情的狭窄的家庭圈子。

在政治领域，孟子比孔子更加坚定地认为政府主要应按伦理标准行事。他认为墨子的功利主义是十足机会主义的，主张政府的指导原则不是为谋利而是为求正义。他满怀信心地相信假如有个统治者自己是一个完全守道德的人，那么天下就必然会尽归其手。这就是真正的“王道”。他提出真正有道德的国王的统治是以对人民的仁爱为特点，国王给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注意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孟子在解释“井田制”时赞扬在这一想象中的古代制度之下大家财产共同所有。他推想除了能使民富足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之外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国王，事实上主要证明统治者的权力为正当的“天命”，也只有在统治者得到人民承认时才出现；假如人民

杀了或是废黜了国王，显然他是失去了天的支持。孟子由此采用了周族证明其推翻商王朝为合法的观点，并将之变为使任何成功的造反都可被看作是合法的工具。

孟子对中国思想主流的贡献仅次于孔子。他的性本善的观点实质上认为所有人生来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这一观点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平均主义有很大影响。他坚持认为政府必须代表人民，要得到人民的承认，这一观点有助于说明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一直主张的崇高政治理想。

荀子（公元前300—前237年左右）是对中国文明留下深刻影响的另一位儒家学者，不过后人指责他不属正统。可是在当时他作为政治家和教师都很成功，他的著作《荀子》都是些很有条理的文章，其中一部分被编入《礼记》。

荀子直接与孟子性本善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荀子提出人性来自于无人格无道德的天，人的情感和自然欲望会引起冲突因而人性本恶。解除这种状况的办法是通过教育得到改进，教师最重要所以应该得到尊重，学习的过程以“诵经始学礼毕”。荀子的观点，如他把“经”和“礼”看作是一切基本智慧的源泉，强调正规教育和教师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对神明确的不信，所有这些都为儒家的主流思想所接受。他所强调的教育、礼仪、等级制度以及通过赏罚维持的严格统治这些看起来对政府正在增长的专制主义倾向也有影响。

法家

被称作法家的哲学家和实际政治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些专制主义倾向和荀子对人性的悲观评价，这些人多数与秦国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一学派的主要思想家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秦国著名政治家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都是荀子

的门徒。法家还可能受到墨子的功利主义学说及其绝对服从思想以及道家非道德性自然秩序的思想及其对通常道德伦理和书本知识蔑视观点的影响。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本书的内容是哲学家韩非子所写的一些文章。

法家相信严刑峻法虽然为人民所恨但却是能带来人民所渴望的秩序和安全的唯一手段，人民就如同医生割去其疖子时啼哭的婴儿一样。法家不考虑其他哲学家热衷的先人之道，认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制度。因为人民愚昧自私，而官僚阶层又都是些不可信任的自私自利者，所以统治者不能依靠他们有德行而必须靠赏罚分明来控制一切，换言之就是依靠条文详尽的刑法典。评价人不能看其动机而要看其行动的效果，任何人不能完成应做之事都必须受罚。人民彼此之间要实行连坐以对相互的行为负责，不告发罪犯的人与罪犯同罪。假如刑罚严酷，那么人民会被迫循规蹈矩，事实上就使刑罚无作用了。

对法家来说，统治者所企望的就是对的。他们虽然否认除统治者的世袭权利以外的一切世袭权利，但承认有世袭王权，他们整个哲学的目的就是帮助统治者巩固其地位和权力。他们认为统治者的目的理应是建立一个经济繁荣军力强盛的国家，不应该容忍商、士和其他不事生产不事争战的社会集团存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应该作调整以适应为国家积聚最大量的财富和军力。54

在近些年法家常被称为极权主义者。假如他们有其20世纪的同行所具备的控制民众和宣传的技术手段，这种叫法完全合理。就法家所处的时代来看，由于他们率直地接受了王室专制主义和早期农业社会，所以他们是反动的。同时，毫无疑问他们又是未来强调统一法制以及政府与被统治人民之

间应有不受人情影响的不变关系这股浪潮的组成部分，强调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当时建立更庞大复杂的政治统一体这种需要的产物。

虽然法律观念是西方文明的荣耀之一，但法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中一直带有贬意。这是因为法家的法制观远远不如罗马人的法制观。西方的法律里含有上帝或是自然某种较高层次的秩序在人类中的体现，而法家的法律只体现出统治者的旨意。中国几乎没有保护公民的民法，法律依然主要是人民想尽可能避开的行政法规和刑法。西方人感到在非人格化的法律统治下要比在易出差错的个人发号施令统治下更安全，而中国人大概是听从孟子对人性的估价，感到在满头脑伦理道德的官吏统治下要比在非人格化的和在他们看来是纯粹专横的法律统治下更安全。

尽管有后世的指责，法家学说还是给中国文明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通过秦国的胜利以及秦国创建的帝国制度，法家学说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之有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及其严厉且常是专横的统治，部分地归因于它。法家学说自然引起了公元前3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政治大转变，当时秦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华帝国。

第四章 早期的中华

55

帝国：秦与汉

第一节 秦王朝开创帝国

秦国首都所在的地区是渭河流域，这里以前是周朝兴起的地方。这一地区易于防卫，因为从中国其他地区进入这里的通道被限制在黄河大弯曲部的山脉和大河之间的狭小地带。渭河流域另外还有发展空间的周边地区，当然这损害到西北游牧民和西南技术不发达的农耕民的利益。公元前318年秦国兼并了四川盆地的两个半“蛮夷”国家，与“蛮夷”民族的不断接触使秦国的军事技能得以发展，例如公元前4世纪秦国发展了骑兵。秦国在渭河流域面临的治水问题也比那些治理黄河水患的国家要简单。公元前3世纪，秦国修建了一条用于灌溉和水运的运河，这使渭河流域粮食产量和人口大大增加，四川成都平原奇迹般的灌溉工程应归功于秦国的治水专家。

秦国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全力以赴地采纳法家所鼓吹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中的新方法。第一个大的高潮发生在商鞅主事时期，商鞅的名字被不正确地与公元前3世纪的一部法家著作《商君书》联系在一起。商鞅是中国东部人，从公元前361年在秦国为相，直至公元前338年遭贬而死。据说他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赏罚制度，迫使每个人都各务其“业”，并建立 56 了一套在人民中间连坐告讦的制度，力图用一种新的纯以奖

励军功而定的贵族制度代替旧的世袭贵族制度。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是把全国领土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一度时间在秦国和其他一些大国，新获得的领土定为“县”，每个县可能都代表了过去的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和附近供给城市的农村组成的旧行政单位。另外沿着大的军事防区的边沿建立了“郡”。公元前 350 年商鞅第一次把秦国全国分为 31 个县。这些集中政治控制和增强军事力量至最大限度的不同措施使秦国能击败敌对国家的联盟，然后在公元前 256 年着手消灭了周。

秦始皇的统一

中国的统一与公元前 246 年一位冲龄继位的秦国国王分不开。他的统治先由原来靠经商致富的吕不韦辅佐，公元前 237 年吕不韦倒台后由荀子先前的弟子李斯辅佐。最后的统一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在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之间，韩、赵、魏、楚和齐等国被相继兼并。公元前 221 年，秦王创建了他自认是天下一统万世永存的帝国。他夸张地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用了一个新词“皇帝”，这两个字原先是用来称呼神和神话中的早期统治者的。

就像印度和西亚新兴的帝国的情况一样，对秦始皇来说把他所征服的地区分封给他担任“总督”的亲属和将军看起来也很自然。可是他接受了李斯的劝告，在其征服的所有地区实行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将领地分为 36 个（后来为 42 个）郡，并又将郡分为县。他还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秦国平等的不带人情色彩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他没收被征服国家的武器，把各国的世袭贵族迁到位于渭河流域古代周王国首都附近的秦国都城，在这里修建了巨大的宫殿，筑起了有着山一样巨大封

土堆的陵墓。最近在附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武士、侍者和乘骑陶俑。

不满足于对整个中国文化地区的征服，秦始皇派军队向南兼并了大批在中国南部的“蛮夷”民族融入帝国，并渗入现代广州附近的沿海地带以及现在越南的北部。在西北边境地区秦国军队赶走了他们昔日的对手游牧民族，这一时期游牧民族第一次组成了一个大的政治联盟。为了保卫边境地区不受草原游牧民族侵扰，⁵⁷ 秦始皇大量强征人力将北方国家所建的长城连接为一个统一的防御体系，从甘肃的西南沿着蒙古的南端直至满洲南部绵延一千四百英里。这一长城的目的是作为隔开农业地区的中国与游牧的“戎狄”民族的永久屏障。只要防守适当，长城可挡住成群游牧骑兵的进攻直至可以积聚起足够的防御力量来对付骑兵。后来的一些王朝，按照军事和气候条件在旧长城的南北修起了新长城，秦长城简单的土建筑后来变为比较壮观的砖建筑，但长城基本上仍然是秦代首创的那种统一的防御体系。

为了巩固广大的征服地区，秦始皇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统一了度量衡，使货币标准化，甚至规定了马车车轴的长度标准。这最后一种措施在中国西北对交通来说很重要，因为在那里的马车碾过黄土留下沟槽。据说李斯还曾统一文字，因为以前在政治的分裂地区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文字写法。由于李斯的努力和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的影响，在公元前2世纪汉字和中国文章的正式文体得到统一，基本上形成了现代这个样子。

秦代统治者认为哲学家的著作、哲学家推崇的古代经籍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典籍有害于秦国的制度，因此想毁掉这些书。李斯在公元前213年开始了一场被称为“焚书”的摧残文化的活动，所有的书都被毁，只有一些实用的书，诸如农

业、医药和占卜之书除外，另外藏于中央政府手中的书也除外。不顺从的儒生被放逐或被处死，据说实际上有七百名儒生被活埋。因为玷污了斯文，李斯在后代落下了骂名。李斯的政策确实使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终结，但另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诸如暴力争战使秦王朝获得了短暂的霸权，并导致中央集权帝国出现，在这个帝国中容不得文化上的异端。这一极大的中断使哲学分为先秦和后秦哲学，周代思想的活力和丰盛使中国历史上即使会有与之匹敌的时期但也为数不多。

秦王朝的覆灭

虽然秦始皇认为他建立了一个将传之“万世”的王朝，但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死后仅 4 年秦王朝就灭亡了。他的成功 58 太突然，他的统治太严酷。他征服的各国上层阶级仍忠于旧王族，全国受过良好教育的集团因他对旧哲学家的镇压而被排斥。老百姓因他征用人力对外征战对内修建从未有过的巨大工程如宫殿、驿道、运河和长城等而感到负担沉重。在证明法家统治思想效用的同时，秦王朝也体现出孟子的一个思想的正确：政府最终还要依靠被统治者默默的同意。中国人民毫不迟疑地抛弃了秦王朝，不可战胜的帝国瓦解了。

秦始皇使中央政府过于集权，上层领导的一个失败立刻会影响全局。虽然秦始皇办事勤奋，不知疲倦地四处巡行，但他看起来仍是个把自己思想动机藏在神秘外衣下的妄自尊 59 大者。他也曾着迷于通过巫术以求长生不老，这在当时是正在兴起的道家的思想。 he 去山东沿海地区巡访方士，派人远航去寻找东海中的“仙岛”。当他去世时，李斯和其他人迫使太子自杀，秦始皇的一个年幼无经验的儿子继位称为秦二

世。李斯本人很快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秦二世接着被杀，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完全垮台。

秦始皇根本不能建立一个传之万世的王朝，但他所建立的帝国制度虽偶有间断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持久的政治制度。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被当作暴君遭到责备，但今天的中国学者很正确地把他看作是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建立者。秦的名称“Chin”很恰当地成为中国在西方文字中的名称“China”的来源。

第二节 汉王朝继承天命

汉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死后只有11年，在原来楚国的地区爆发了一场暴动，接着很快在整个帝国内爆发了一连串的叛乱。大多数起事者都由倒戈的士兵或盗匪领导，他们通常支持秦国所灭的某一国家的王室后人的事业。起义首领之一项羽是楚国将军的后代，在公元前206年最终消灭最后一支秦国军队时，他让一位楚国王子作为皇帝登位，把其他的地方在其他王室拥护者之间分配，他自称霸王。可是旧的周代的制度未能恢复，另一个叛乱将领刘邦在公元前207年控制了渭河流域，他向项羽挑战，在公元前202年消灭了项羽而成为皇帝。他在渭河流域的秦故都附近的长安建立了都城，称其王朝为汉，其名来源于长江的一条主要支流的名称。

刘邦成功地建立了秦始皇未能建立的一个历时长久的王朝。他的后代统治了二百多年直至公元8年，以后在一个短

暂时期的僭位事件后，汉王朝以东汉的出现又得以恢复，东汉存在的时间从公元25年至220年。两汉帝国存在时间大致与古罗马的鼎盛时期相同，在权力、威望和历史影响方面也与古罗马差不多。甚至今天中国人还自称为“汉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称中国文字为“汉字”。

像大多数后来的中国皇帝一样，刘邦不是以个人名字而是以其庙号“高祖”而为人熟知。他的成功可以归于几个因素：他能够依靠秦国的成就；横扫整个中国的战事进一步切断了人民与周代传统的联系；另外他本人更能体现出与过去的完全决裂。与统治时间很长的王公后代秦始皇以及旧贵族项羽都不同，汉高祖与旧贵族毫无瓜葛，出身于普通的平民家庭。最重要的是他很精明地致力于慢慢巩固其帝国，不太苛待其臣民。他减少酷刑并减轻赋税，结果中国人民背弃秦而忠于汉。换句话说，汉王朝赢得了孟子所说的天命。

早期汉代统治者基本上延续了秦代的政府制度，但汉高祖作了对中央集权统治来说引人注目也可能是必要的一个退步。他分封自己的一些亲属和将军为藩国的王侯，可是后来他又消灭了异姓王，并在公元前195年死之前规定今后只有皇室成员才能被封为王。他的继承者削减余下诸王的领地，将封国分给诸王的各个儿子，最后派出中央政府的官员去控制各封国，以此削减诸王的权力。公元前154年，最大的七个封国被消灭，封王的威胁消除。王侯领地在西汉一直存在，但到西汉末年，汉有一百零三个郡而仅有二十个王国，有一千三百一十四个县而只有二百四十一个侯国。

另一个对汉王朝统治的威胁，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后来经常出现的一种威胁，乃是外戚造成的。中国皇帝都有许多妃嫔，但通常只有儿子成为太子的妃嫔被承认是皇后，在儿子继位后作为皇太后往往就成为宫廷中最显赫的人物。在汉高

祖死后高祖的皇后成了中国真正的统治者，近乎篡位。皇太后吕氏家族成员统治朝政直至公元前180年皇太后死时为止，他们被忠于汉朝的皇室支持者所屠戮。

对汉王朝的第三个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当时中国人称其为匈奴，后来西方人称之为“Hun”。到公元前3世纪，这些可能说突厥语的民族创建了一个部落联盟，其地域跨越满洲西部经过蒙古和西伯利亚南部直至远在帕米尔高原的中国土耳其斯坦。这些善于骑射的民族不断成群袭击和掳掠华北，汉高祖在惨败于匈奴以后试图用汉公主与匈奴单于通婚以及每年纳贡的办法收买他们，但匈奴的袭扰仍然不停。

政府与社会

61

尽管有这些困难，汉代统治者仍然逐渐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在几百年几乎不断的战事中全国大大地繁荣起来。在公元前1世纪，据说全国有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名官员。官员及其他有声望人士分为十八个等级，官品可以减轻刑罚，上层官员还可以免税。虽然这一官僚阶层可以说很庞大，但与其管辖的国家相比还算是小的。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报告上有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传说中的中国人口数字显然不可靠，这些数字主要是税收登记，可能会假报偏低以逃避交税，也可能虚报偏高以显示其行政效能。但看起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稳妥的，汉王朝统治的人口比接受古罗马统治的人口更多。

汉代政府没有行使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政府的全部职能，其注意力主要用于提供皇帝及其亲属的奢侈消费以及王朝的防卫。对政府来说人民之所以值得关注，只是因为他们是交纳赋税者、从事苦役者或是潜在的叛乱者。苦役比税

收对中央政府来说是更重要的支柱，政府通常要求每个农民每年服一个月劳役，在当地修路开河以及修建王宫和皇陵，还有许多不常有的军役，戍守边境和在都城服役。只要人民交纳规定的税收并服徭役，不从事任何破坏活动，他们通常可以自由地管理自己本村的事务，执行自己的习惯法。因此政府是一个漂在半隔绝的农民社会海洋之上的相当小却高度集中的机构，两者之间的接触点是县城，在那里县令和两三位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吏与乡村首领、大地主以及其他地方领导人交涉。

上层统治者决不像周代那样是世袭贵族，甚至王侯家族也以惊人的速度兴衰荣枯。官僚阶层和整个上层阶级基本上由有足够才能和财富，受过足够教育能在中央政府中任职的人组成，可是商人阶级特别被排斥在领导阶层之外。像以前的秦王朝和其他大多数以农业税为基础的专制统治者一样，汉王朝也对商人抱有很大的偏见，因而作为官僚阶层主要来源的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主要是比较富裕的地主。

除了最上层的皇族和最下层的为数不多的奴隶以外，社会似乎由两大集团组成：交纳赋税的农民和富裕的地主。地主某种程度上是免税的，他们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并作为地方领袖起着联系中央政府和乡村的作用。这一直是以后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两个集团不是印度的种姓，甚至也不是欧洲中世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命运的轮回可能会使一个政治领袖沦为奴隶而使刘邦这样的普通人上升登上皇位。

汉王朝权力的极盛

汉代统治的头六十年是国家休养生息巩固王朝的时期，

接着而来的是如同秦始皇统治时一样中国权力骤然急剧扩张的时期，这种情况在后来所有较强大的王朝统治时都不断重现。汉代的扩张是在汉武帝的长期统治时出现的，从公元前141年持续到公元前87年。

中华帝国的政府有一种倾向，皇帝的个人统治时期与 63 高级官僚占优势时期轮流交替。在皇帝统治下，政策能得到更有力的贯彻，但因为皇帝不受批评，也就无法制止他的蠢举。汉武帝也不例外，他制定了庞大的修筑运河的计划，把首都直接与黄河连接起来，从而大大便利了将作为赋税交来的粮食从中国东部运往长安。他也进行了一连串的对外征服，对手下的将军和官员严厉而不公正，自己还常受方士的愚弄。

汉武帝大大扩展了汉帝国，使其疆域很接近中华帝国近代的版图。他征服了在浙江和福建省内南方沿海当地的小国家，将其居民内迁。公元前111年，他消灭并兼并了在现代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半汉化的南粤国，开始了中国对河内附近地区上千年的统治。公元前108年，他推翻了在朝鲜北部和满洲南部的半汉化国家卫氏朝鲜，在现在作为北朝鲜首都的平壤建立了乐浪郡，这里直至313年一直是中华帝国一个经济繁荣的军事前哨。

汉武帝发动的最大的征战是为对付西北的匈奴，这部分是为了防卫，因为这些高度机动好战的民族不断骚扰中国的北方。可是汉武帝也可能想控制途经中亚与西亚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他也许还有着促使早期中国统治者对外远征的那种“亚历山大情结”。公元前129年至前119年，他派出了好几批大军，其中有些人数多达十五万人，以对付匈奴，并竭力消灭匈奴人在蒙古大戈壁以南的势力。

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不仅仅是动用武力，他也在寻求同

盟者以对付匈奴。早在公元前139年，他派出一位叫张骞的官员去与一个叫月氏的中亚民族结盟。月氏可能是印欧民族，它被匈奴人赶出甘肃西部。在张骞所处的时代月氏已一路迁至阿富汗，几乎就要进入印度，在那里月氏建立了贵霜帝国。张骞尽管在匈奴人手中当了很长时间的俘虏，最后终于还是到达月氏，但月氏对再度卷入东亚的战争已没有兴趣。公元前126年他回到中国，但公元前115年又一次被派出到另一个居住在中亚伊犁河流域的印欧民族处。虽然这次努力也失败了，但张骞的两次出使大大增加了中国人对中国以西地区的知识和兴趣。

64 汉武帝还试图从侧翼进攻匈奴。他在西藏和蒙古之间现在甘肃西部的狭长地区建立了两个郡，在这一地区迁来七十万中国的移民。为了保卫这一说汉语民族居住的西部突出地区，他修筑长城向西延伸远至玉门。接着汉王朝的统治区域扩大到中亚腹地塔里木盆地边缘附近说印欧语民族居住的小块农业绿洲，这一地区被置于一位都护管辖下。这些绿洲是东西方之间古代商路上的重要驿站，中国军队在公元前104年和前102年甚至越过高耸的帕米尔高原去在今天苏联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大宛。

对匈奴的战争在汉武帝死后继续进行，最后在公元前52年南匈奴单于归顺汉朝。公元前42年，一支中国军队再次越过帕米尔高原远达以前希腊人的古代粟特王国，在那里击溃
65 了一支可能包括有罗马俘虏在内的军队。中国军队进入除无法进入的高山沙漠以外的所有地区，使汉代军事力量离首都的距离（超过二千英里）比罗马军团离罗马城更远，虽然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往要便利得多。

第三节 汉代思想与学术

没有一种先秦的思想流派能作为一种单独的互不相容的哲学体系存留至汉代，这最清楚地表明秦汉两朝的连续胜利怎样完全摧毁了过去的传统。但旧思想的部分内容保存下来，在这些思想中有周代后期阴阳家的“阴阳”二元观念和“五行”观念。与这些思想有密切联系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不寻常的自然现象是反映统治者个性或预示未来的征兆。

由这些思想在汉武帝时代发展出一种主要根据其祥瑞含意而定的“年号”纪年方法。假如情况稳定，一个“年号”可以使用一个很长时期；假如有灾难发生或有特别大吉大利的预兆出现，在几个月中这个“年号”就废弃不用了。结果这种混乱的纪年方法，使得中国人更加依靠王朝来计算时间。尽管这一制度落后，但仍在东亚广泛地使用。后来唯一的进步是把年号与统治时间一致起来，中国人在1368年后来日本人在1868年采纳了这一改革。

道家的传统比别的思想流派在公元前3世纪的政治大动乱中保存得更好，但在这一过程中《道德经》和《庄子》的哲学意味几乎丧失，剩下的是原始的信仰，尤其是寻求长生最后谋求不死之术。人们对寻求长生的炼丹术以及炼金术有很大兴趣，这些显然是世界上化学的起源。另外还很重视寻求长生的摄生术，诸如忌吃谷物或是像瑜珈术那样练气功。各种流行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也流传下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与道家学说融为一体丰富的神话。当然旧日贵族的祭祀活动消失

了，但人们对此还记忆犹新。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接受劝告以神秘的形式大规模地恢复这些祭祀活动，去山东的圣山泰山顶祭天，又去山脚下的矮山丘祭地。

66 在较高的文化阶层，有学问的人在忙于使早期的典籍恢复原貌。公元前191年秦代对哲学和历史著作的禁令正式取消后，一些高龄的学者显然还能凭记忆复述某些经文，同时另一些经书在墙壁中发现。结果是有时同一经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本，比如《书经》，发现了用先秦文字所写的“古文”，同时又出现了用新的标准文字所写的今文本。

汉代学者很少表现出其哲学理解力，而只是把古籍同样都看作是古人思想的不易之论。但他们用五经这样的分类方法试图把古籍理出头绪，并花很大努力去解释这些并未完全理解的古代著作。他们的注释著作或是评论著作是中国这一重要学术活动的开端。第一部系统的大辞典《说文》也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出现的，在书中九千多字按照五百四十个部首排列。

汉代书籍在其哲学内容中常常明显是折衷主义的，就以《淮南子》一书而言，在汉高祖一个孙子庇护下编成的这本书中有与宇宙观、道家和其他方面有关的知识。尽管大多数汉代书籍是学究气的或说教式的，但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种重要的诗歌形式，这就是赋，因为赋的长度和韵律都不规则，因而有时又称为“散文诗”。赋与屈原的《离骚》很相近，以对中国京城和风景名胜的大段描写以及丰富的想象和夸张为其特征。

史书

汉代最大的文化成就是历史著作，对一个如此重视过去

记录的文明来说这不值得惊奇。中国人把历史当作四大类文献中的一种，其他几类是经类、子类和集类。

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5年左右)的《史记》代表了中国历史学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司马迁是宫廷星相家，他宣称自己只不过是要完成其父开始写的一部历史，但这可能部分是为其实际上最为胆大妄为的行为所作的一种伪装虔诚的借口，即对人们认为是孔子的最大的成就加以继承和发扬，也就是用适当的形式编纂史籍。司马迁显然是一個学识渊博、胆子也大的人，公元前99年，他为一位被迫投降匈奴的中国将领辩护，汉武帝下令处其宫刑以惩罚他的大胆。

司马迁不仅为后来的大多数中国史书定了格式，而且还决定了其风格和学术研究方法。他限制自己只简括信实地记述他所知道的史实，从他认为最可靠的来源引用材料时只作最微小的改动，所以他的著作绝大部分由早期著作中文献的段落组合而成。他因而为中国的历史学术定了标准，可能直至相当迟的近代在西方都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司马迁致力于写一部通史，其成就可与任何人的成就相比拟。《史记》有一百三十篇，七十多万字。因为古汉语文字简洁，所以《史记》是一部接近于读者所看到的这本书十倍容量的著作。开头十二篇是“本纪”，包括从“神话人物”时代经夏商周三代、秦汉两朝诸帝直至汉武帝统治时的大事记。下面十篇是周代王侯和汉代王侯将相的年表。再下面八篇不按年代处理，而是有关礼仪、音乐、历法、天文、河渠和经济诸问题。⁶⁸还有三十篇用于记述周代的各个国家，最后七十篇有重要人物的传记和几篇有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简要记述。

许多后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仿照司马迁的史学著作样式。班固(死于公元92年)与他的父亲和妹妹一起编纂了第二本这种类型的伟大著作《汉书》。这本著作有一百篇，与《史记》的

样式主要不同之处是其集中于记述一个朝代——西汉，自然也就没有与记述周代各国历史相应的部分。班固另外增添了有关文化和地理的很有用的内容，《汉书》成为所有后来断代史的范本。这些史书或记叙一个大朝代的历史，或记叙一组小朝代的历史。这类官方承认的“正史”的数目历经十几个世纪共有二十四部，直至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承认一部“新”元史时才又增加了一部。

儒学的胜利

汉武帝差不多像秦始皇一样是一个完全信奉法家的君主，可是人们一般认为在他统治时期儒学成为中国宫廷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实际上儒学的胜利是一延续整个汉代的缓慢过程，而获胜的儒学是古代哲学和当时迷信的奇特混合物，根本不是孔子、孟子的纯粹伦理说教。除开汉代思想的折衷性不谈，学者们似乎日益与儒家传统打成一片，这可能是由于儒家学说是为官僚和受教育者特定的哲学。这从“儒”的原意也说明这点：“儒”有“文人之学”之意，还有“文弱书生”的含意。认为儒家哲学赢得了汉代的思想家还不如说汉代的学者逐渐将孔子作为他们的理想典范。

同时遵从儒家传统的学者们进入起初是纯粹法家类型的政府。汉高祖尽管自己未受过教育，但他意识到需要在政府中任用受过教育的文人。汉高祖的继承者们甚至举行考试以选拔合格的文人进入政府任职，到汉武帝时，中央政府中已有相当强烈的儒家倾向以至统治者下令禁止法家门徒进入朝廷任职。在汉武帝时有相当大影响的两个所谓儒家学者是公孙弘（死于公元前121年）和比他年轻的董仲舒，两人都主要以能解释预兆和分析《春秋》而出名。这本书被认为是通过

其用词来体现孔子的道德判断，在董仲舒有关《春秋》的著作 69 中，论述“五行”和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不科学说法与孔孟的思想相差甚远。

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在宫廷中设当时遵从儒家传统的五个五经博士。公元前 124 年，他指定五十名太学生随这五个五经博士学习，从而创办了一所国立大学。据说这所学校在公元前 1 世纪后期发展到三千人，而至公元 1 年每年有一百人通过官方学者控制的考试进政府任职。因此从汉武帝统治时开始，相当一大批下级官僚通过由政府出资主办的教育造就出来。

儒家关于恰当礼仪的教诲也逐渐被融入法律，这一发展与儒家原来强调以伦理代替法律的说法有很大不同。儒家学说开始被承认为国家的官方哲学，在公元前 51 年和公元 79 年两次由国家主持召开大规模学者会议以确定对儒家经典的确切解释。公元 175 年政府在京城竖立大石碑刻上官方认可的经典文本，同时在公元 58 年，政府下令所有的国立学校都必须祭孔。

将儒家学说融入法家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这有助于解释中华帝国的制度为什么比其他帝国的势力更大更持久。用刀剑赢得的国土只能用毛笔来治理，信奉法家的征服者需要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因而为他们在政府中安排了有实权且荣耀的职位，结果受过教育的人成为国家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和未来官员的选拔制度，一个有效率的官僚阶层开始发展起来。总之，中国早已开始发展一种以功绩为依据的现代类型的文官制度。只是几乎在两千年以后，西方才采用了与此相似并部分受到中国影响的文官制度。

对中国人来说足够幸运的是儒家传统成了受过教育的阶

级中的主要思想动力。虽然汉代的儒家学说是一些思想的奇怪混合物，但儒家学派周代奠基者的伦理观念又逐渐居于汉代早期学者的各种信念之首。因而由秦王朝基于法家准则开创的无情专制统治逐渐由强调伦理道德的人所掌握。在法家帝国和儒家官员之间最终实现的这种平衡再次表明具有相反

- 70 相成二重性的阴阳观念的作用，表面上看起来摧毁了儒家学说的法家的胜利实际上只是开创了一个儒家能繁荣发展的稳定社会，而不损毁法家学说的儒家的胜利使法家的帝国差不多坚如磐石。

第四节 王朝循环

中国人传统上把他们的过去解释成一连串王朝的循环，每一个王朝重复着一个令人厌倦而多次出现的故事：一位英雄开创一个权势极盛的时期，然后长期衰落，最后总崩溃。中国人按王朝编纂历史就与这幅图景有关，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人们最希望的是再现古代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

- 71 文明的巨大发展就只不过隐藏在这种表面的人间诸事的循环运动之中，中国以后的历史成了一系列或多或少成功地重复西汉故事的努力。

必须承认中国人王朝循环的观念有正确的地方，至少作为凌驾于更重要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之上的表层上的政治模式是这样。前后两汉各延续了两个世纪左右，后来的那些在更先进条件下存在的大王朝都长达三个世纪左右。在各个王朝时期，诸如财政状况、行政效能以及军事力量这些方面，都表现出相当一致的倾向。

个人因素

中国的历史学家受儒家所坚持的政府以伦理为基础观点的影响，在解释王朝循环时总是强调个人因素。像汉高祖这样成功地接受天命的王朝建立者不仅被看作是强者，而且还能被看作是超人。而像夏桀和商纣这样失去天命的末代君王不仅被当成是不幸或软弱的人，而且还被当作是万恶的昏君。实际上王位的继承者确实总是在退化，开国之君自然肯定是有能力和力量的人，而在奢侈无度充满阴谋的宫廷中长大的末代君王很可能是个弱者。通常一个王朝至少还会再产生一位强者，像汉武帝这样使国家更加强大的人，或是使王朝重振雄威的人，但总的来说各王朝统治者的能力是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皇帝周围的人的素质一般说来比皇帝本人更重要，这方面的情况不很清楚。皇位之争以及敌对集团间的宫廷阴谋在各王朝历史上几乎自始至终屡见不鲜，在汉代以后的一些王朝中，党争有时是围绕政策这样的大事而展开，但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这些党争主要是权力和利益之争。在一个王朝的后期，中央政府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正在不断被削弱时，这类党争、政变和宫廷革命的作用自然比王朝鼎盛时期更加有害。

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问题是外戚造成的，汉高祖的妻室的情况就是这样，她差一点就让其吕家占据了皇位。大臣、将军和大地主家族也可能会利用皇帝的软弱或宫廷的混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独掌权力者，最终使帝国瓦解。

另一类各朝代都有的党派之争是官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宦官们在宫廷中保卫和管理后宫，但他们的作用发展到

包括军事在内的其他领域。他们出身低微，又无后嗣能与皇室争位，所以也就成了皇帝天然的同盟者，皇帝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去遏制骄横贪婪的官员。官员们自然极其不满地看待这些有权势的宦官，这些宦官缺乏官员们所受过的教育，其社会背景又不同，且在宫廷中是官僚们权力和利益的竞争对手。正是一个宦官在公元前 208 年除掉了秦国的政治家李斯，公元前 47 年另一个宦官排斥了他在宫廷中的官僚对手。因为历史由官僚们来编纂，所以我们发现历史学家都一致谴责宦官的暴政。

经济和行政因素

尽管中国人强调个人的道德和品性，但王朝循环还是从财政稳定、行政效能和军事力量这些问题上着手才能得到较好的解释。所有大的王朝开始都有一个繁荣的时期，夺得皇位的集团都比较小，内部比较团结。争夺皇位的战争消灭了大多数竞争者，所以国内的财富大多落入其内库。在新建立的和平环境中国家繁荣，人口迅速增长，中央政府的国库和粮仓丰盈。

但“阳”盛过头就会导致“阴”长，富裕的中央政府建造了巨大的宫殿、道路、运河和城垣。帝国军事上的胜利形成了远及四方要耗费巨资来维持的防线。皇族、贵族和高级官僚的数目增加，并习惯于前所未有的奢华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农民被用于供养统治阶级个人，而越来越少的纳税者被留作供养中央行政机构。因为开支不断增加而收入常有些减少，所以每个王朝在建立后不出一百年就开始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

接着实行经济和行政的改革，有时暂时止住了财政的颓

势。可是衰退的趋势最终会再次出现，经济和行政上的困难积聚成堆。官员追求私利和腐败现象日趋严重，造成行政效能下降以及宫廷内的竞争加剧。皇族潜在的对手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独立于中央政府，并且基本上不受惩罚地向中央政府挑战。为弥补政府的亏缺，纳税农民的负担增加到了极点。因为政府财政上的困难，运河和堤坝失修，使旱涝灾害频繁出现。过去可以由政府粮仓的粮食来弥补的粮食歉收现在引起了饥荒，再导致匪乱，最终引起农民起义。防守不足的边境防线开始瓦解，各地官员及其军队背叛，中央政府分裂。接着出现的战争消灭了旧政权并为新王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经济和行政螺旋形的下降趋势可以从大多数为时较长的王朝历史中看到，这在前汉王朝历史上特别明显。汉武帝修运河的计划及其对外战争使王朝达到权力的顶峰但也造成了财政危机，政府大大增加了开支迫切需要国家有新的收入。汉武帝的整个统治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都在长期不断地努力以补救王朝的财政状况。

汉武帝最重要的经济措施是重新规定国家对某些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垄断，更确切地说是特许制度。这些商品都是些出力少而获利多的东西，他恢复了政府对铸造铜币的垄断，公元前119年他又采用了过去秦王朝对盐铁的垄断，后来增加了对酒的垄断。这些垄断措施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但总是引起很大争论。早在公元前81年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宫廷会议，以讨论垄断是否合宜，主要是谴责垄断的会议结论三十年后被编纂成书，冠以《盐铁论》的书名。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实行了所谓“平准”制度，由政府在丰收时或丰收的地区收购多余的产品以在歉收时或歉收的地区卖出。这一制度或许有助于稳定物价，但其动机是为国

库谋利。汉武帝还以特定的关税征收一定数量商业税，但他的其他改革很成问题。他规定某些刑罚可用罚款来代替；出售爵位以赚取现金；降低货币的成色，使铜币更小以及强迫富人收下毫无价值的鹿皮票据。

王莽篡位

汉武帝在财政上的努力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政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在经济上还付得出钱。但同时一个严重的问题产生出来，人口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农民平均拥有的耕地少于其前辈。此外，大部分农民此时耕种大地主实际上不纳税粮的土地，因而其他地方交税的农民被迫承担比以前沉重的负担，而占有的土地却比以前少。国家的收入不断减少，随之而来的中央政府的各个机构不断削弱。公元前22年一连串大规模的反叛开始了。

在这个关节点上，皇后的侄子王莽掌握了权力，他厉行
74 改革以竭力阻挡这股潮流。他最后在公元8年篡位，以其“新”朝代替汉朝。（这日期按西方历法是在公元9年1月10日，但按中国的阴历岁首始于冬末）。王莽看起来是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他把自己的改革看成是再现周公的黄金时代。在儒家学者的帮助下，他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些至当时为止很少有人研究的某些古代经籍文字上，并大大有助于儒家学说最后的胜利。但他的改革更多内容是属于法家传统，主要是汉武帝政策的恢复或发展。他实行了垄断，恢复了“平准”制度并使铜币成色不足。他还制定了有关给农民提供农业贷款的政策。

王莽最为大胆的改革是对当时重大经济问题的正面挑战。
75 当时有这样多农民生活在不纳税的土地上以致中央政府

没有足够多的农民纳税供养，因而王莽下令禁止私人拥有大块土地，公元9年他规定土地“国有”，分给纳税的农民，禁止蓄奴。这样严厉的政策甚至在汉武帝时代也极难实行，而在一个世纪以后，这样做完全超出了中央政府执行的权力范围。王莽因其篡位受到传统历史学家的指责，同时他使土地“国有”和放免奴婢的努力赢得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错置时代的称号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赞扬。

王莽扭转王朝循环及其再现王朝初年景况的大胆努力可能加速了中央政府的崩溃。中央政府已经遭到长期的财政和行政问题的损害，现在又失去了有权势家族的支持，因为王莽企图没收这些家族的土地。一连串的歉收和水利系统的损坏也造成了饥荒，公元18年在山东爆发了一次农民大暴动，很快波及整个地区。暴动者自称赤眉，他们把眉毛涂红作为标记以示区别，赤眉起源于一个有道家特点的秘密社团。像后来许多标志王朝结束的群众暴动一样，经济的必然性是真正的动力，但民众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使暴动具有稳固持久的力量。同时边境防御瓦解，边境上的小国又再次宣告独立。游牧民入侵了边境地区，都城遭暴动者劫掠，公元23年王莽死于暴动者之手。汉高祖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最终瓦解完全毁灭。

第五节 东汉王朝

帝国的重建

虽然赤眉军攻城掠地，进展顺利，但他们像许多群众暴

动的领袖一样缺乏行政经验，不懂得用自己的中央政府去代替已被推翻的政府，重建中央权力的任务落在了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身上。汉代皇帝的许多后裔，通常这些人本身就是大地主，也在反叛中崛起。其中一人刘秀最终在王莽倒台后的群雄相争中获得胜利。公元25年他自立为皇帝并重建了汉王朝，但他的都城在长安东面的洛阳，刘秀的王朝就被称为东汉或后汉。

76 刘秀，其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庙号光武帝，公元37年他统一了国家，平息了战乱并按西汉的模式重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行政机构。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碰到王莽所碰到的那样多的无法解决的财政问题。战争消灭了前汉的贵族以及其他一些大地主，另外新王朝还没有背上庞大的皇族和统治阶级这一大负担。

光武帝重新征服了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在其继承人汉明帝（公元57—75年）统治时，坚决地致力于恢复中国对中亚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控制。历史学家班固的弟弟班超公元73年被派往中亚，他最终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从公元91年至他去世时的102年班超一直担任西域都护。在这一时期，他率领一支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还派出一位副将途经安息去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

在这同时，匈奴人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东汉。公元89年中国军队进军越过蒙古的大戈壁，大败北匈奴。这次战役可能使匈奴开始西迁，在4世纪后期到达俄罗斯南部草原，半个世纪以后又到达了欧洲的腹地。

文化发展

两汉王朝时对中亚的控制使得与西域的陆上通商大大增

加，在这几个世纪海上的接触以及与印度和古罗马东方省份的少量海上贸易也发展起来。公元120年一群自称来自罗马帝国的杂技艺人出现在中国宫廷，166年一些商人自称是罗马皇帝马可·安东尼的使者，这无疑是不可靠的。中国人通过这一贸易获得了中亚的好马以及南亚和西亚的许多奢华商品，他们特别欣赏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皿。但罗马帝国对中国丝绸的需要量更大，事实上，大量的丝绸从中国出口西方，以致罗马的硬币耗竭在经济上造成了危害。从中亚经过的商道被称为“丝绸之路”。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要超过中国对外国商品的需要，直至19世纪这一直是中国贸易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时间内中国的技术与其他地区相比处于领先地位。

与西域的贸易给中国的艺术和音乐带来了外国的影响并 77 引入了新的农产品，汉代高水平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可能是受到印度和西亚的影响。但到汉代时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许已超过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汉代的纺织技术比西亚和欧洲领先几个世纪，在东汉时期已有了水力磨坊。在汉代中国人改进了马的挽具使马作为牵引力的效率大大提高，在这同时铸铁技术开始从中国向西传播。

中国人所有的发明中重要的两项造纸和瓷器也在汉代出现。纯由麻制成的纸出现于公元100年左右，这种纸已在中亚汉代的军镇遗址中发现。纸很快便自然而然地代替了原用来书写的笨重木片和竹片，也减少了造价昂贵的帛的使用，但过了一千多年造纸技术才传到欧洲。釉陶在汉代已很常见，但直至汉代末年才出现了最早的瓷器，换言之中国人正在开始发明瓷器。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逐渐生产出了世界其他地区极欲进口并最终在近代仿制的精美瓷器。

无疑长安和洛阳是可与罗马城相比的城市，但巨大的汉

代都城现已荡然无存。木建筑太容易腐烂，后来的居民太多
78 并具有破坏作用。可是丰富的汉代遗物仍能在汉墓中找到，在朝鲜乐浪郡的墓葬中有遥远的四川制造的精美漆器碎片。

王朝的衰落

尽管这一时期在文化上成果辉煌，但东汉再不可能有西汉王朝鼎盛时的财力。公元前 1 世纪过多的大块私人土地在东汉时期仍然存在，这就不能为新王朝的诞生在经济和行政上提供汉高祖及其继承者所曾利用过的那种同样廉洁的场所。大地主的地位很稳固，汉代的土地税通常仅有产量的三十分之一，而地租却高达产量的一半。这样他们仅交纳了微不足道的土地税并占据朝廷高位以能保护其财富。虽然中央政府不断竭力建立一个按功绩而定的有效率的官僚阶层，但大部分官员还是通过世袭、荫庇以及掌管官吏考试的官员公开舞弊获得官职。

东汉财政和行政上的脆弱在纳税户籍的人数上也反映出来。在公元 105 年人数最多时东汉的人口数也未达到西汉的人口数，在中国北部和北方的边境地区纳税服劳役的农民减少得最多，而在那里却最需要他们参加军事防卫并为都城提供补给。中央政府为维持自身而不得不向中国北方人数不断减少的纳税农民征收逐渐加重的税收，负担最终变得难以忍受，许多农民逃往税收较松的南方或是大地主的土地上。在地主土地上，地租对自由农民来说没有税收重。这类逃亡的结果是不逃亡的农民所交纳的税收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因而负担沉重的农民被迫为匪或是公开反叛，这又进一步削弱了王朝的财政。这种螺旋形的下降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停止。

就像西汉时一样，对皇族第一个大的挑战来自外戚，但

皇帝在有权势的宦官的帮助下镇压了外戚。公元89年窦家被压制，160年梁家被消灭。其他较大的外戚家族在当时据说有三千人的太学生支持下企图不让得胜的宦官垄断权力，但宦官反击在166年囚禁了数百名官员和太学生，在169年又再次杀戮囚禁了几千人。

宦官所进行的大清洗表明行政的衰落以及政府的进一步解体。到184年在中国东部和四川爆发了两次大暴动。⁷⁹ 这两次暴动都由以治病传教的道教领袖领导，在中国东部的暴动者被称为“太平道”，但通俗的名称叫黄巾军，因为暴动者用黄巾裹头。在四川，暴动者称为五斗米道，因为要向教主交付五斗米。这些群众参加的道教暴动闹腾了三十年，使国家严重分裂。

第六节 早期中华帝国的覆灭

帝国的分裂

正像后来的王朝经常看到的情况那样，对汉王朝的最后一击是其将军作出的。纳税农民的瓦解造成劳役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民服兵役制度的废弛，取而代之的职业军队成为指挥军队的富有且占有土地的将领的私人武装。在群众暴动爆发后，将领实际上成为独立的军阀，很快完全压倒了中央政府。逐渐地在主要的将领中权力三分，在北方有一个宦官的养子曹操掌权，在四川有刘备，在长江下游和南方地区有孙权。这种划分在地理上是自然的，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还多次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当曹操在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篡夺了汉位，称自己的王朝为魏。东汉王朝在过去三十年中仅在法统上徒有虚名，但这一次正式告终。第二年刘备也称帝，沿用了汉王朝名，因为他是旧的汉皇室后裔。由于四川曾有一个蜀国，所以他的王朝又称蜀汉。222年孙权在南方也这样做，他的王朝名为吴，因为在周代时吴国曾统治长江下游流域。中国分为三个国家的这半个世纪被称为三国时期。

制度的废弛

按照王朝循环的理论，继承汉代的三个国家之一或是新的反叛集团应该很快重新统一全国，开始另一个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大一统统治的循环。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比单行政机构的瓦解更严重的事情正在中国出现。汉代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整个制度正在趋向崩溃，这种情况与罗马帝国同一时期正开始解体的方式有些相仿。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有着差不多的技术水平，但它们都表明其不能适应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增加以及高度集权统治所造成的复杂制度的发展。

早期中华帝国的衰落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的财政困难。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这种困难变得突出起来，因为大家族在这时巩固了他们所占的大块土地。重建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的光武帝比西汉的皇帝更容易容忍私人占有大块土地，从这时起衰落加速了，东汉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此加以制止。事实上，中央行政机构就是其本身最坏的敌人，皇帝给自己的亲属、亲信、显赫的将军以及行政官员大量可永久使用的土地和农民作为赏赐，高级官员们欲壑难填再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及其亲属获利。

到公元2世纪后期地方的豪族已经很富裕强大，以致中

央政府不能对其进行管束。事实上他们控制了中央政府，
220年后国家分裂为三国仅仅是对真正统一政府不再存在这一事实的正式承认。⁸¹三个继承国中没有一个是强大的统一帝国，一切都或多或少在这些国家世家大族和将军的控制之中。三国以及后来的一些王朝都企图恢复汉帝国的制度，但都只能作拙劣的模仿。这些国家大多是孤家寡人王朝，由一位有权威的将领创建，在一两代继承者手中失去。

三国时期是个战事不断的时代，这在后来的中国人看来令人兴奋且有浪漫色彩。最后在263年，魏消灭并兼并了蜀汉，但两年以后一个魏国将领从曹操继承者的手中篡夺了魏国皇位，建立了晋朝。在历史上他被称为晋武帝，280年他征服了南方的吴国，短期内统一了全国。他勇敢地致力于恢复昔日汉代的制度，可是没有人能扭转历史的潮流。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下降到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人，这明确表明一大部分人口在政府的有效控制和税收范围之外。晋武帝并不真正企图划分土地让农民重新登记在纳税名册上，事实上晋朝被证明是典型的孤家寡人王朝。290年晋武帝死后不久，晋王朝在内战中土崩瓦解。

“夷狄”入侵

帝国制度解体的一个新的方面这时也开始显而易见。中国在对付北方的草原民族方面差不多毫无防卫能力，征服的钟摆在几个世纪中向外摆向草原地区后现在开始荡回中国。汉族人与游牧民之间力量关系的这种急剧变动可以部分地用我们的阴阳二元论的有用概念来解释。汉王朝对草原游牧民族的征服播下了“夷狄”征服中国的种子，归顺的匈奴人在中国的北部边境作为半农业的部落定居下来。“夷狄”因为精于

骑术且有尚武的传统成为中国军队中的重要成份。因此边境地区和整个中国的防卫体系都在半汉化的“夷狄”控制之中，情况与欧洲罗马帝国后期差不多，当时边境地区和防卫力量大部分控制在日耳曼“蛮族”手中。

当中华帝国解体时，北方半农业的“夷狄”与附近纯粹的草原游牧部落很容易就深入中国腹地以寻找更好的草原和战利品。304年中国北方的一支匈奴人宣布独立，316年匈奴军队劫掠了晋王朝首都洛阳，屠杀了三千居民。在此之后的 82 一个多世纪中，这些“夷狄”集团在中国北方混战、劫掠并实行统治，只有四川的山脉屏障以及长江流域和南方的大河水系才使这些地区免遭北方骑兵的蹂躏。

自然有大批中国人想逃脱“夷狄”的劫掠以及中国北方极度混乱的景况，他们向南迁至安全的四川和长江南岸地区，结果在 3 至 4 世纪之间中国南方的人口增加了数倍，这一地区非汉民族的融合加快了。

南方的国家

洛阳陷落的那一年，在中国南方有一位晋朝王子在南京称帝，他的王朝称为东晋，与此相对的前一个晋王朝称为西晋。他们使在南京（意为南方都城，尽管这是该城很晚以后的名称）的都城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继续过着汉代的奢侈生活方式。可是政府软弱，继续控制在重要将军手中，这些人一再几乎要置王朝于死地。东晋着迷于恢复北方失地的想法，但对“夷狄”的战争没有带来任何永久的战果，而东晋王朝还受到国内反叛和政变的袭扰。

最后在420年一个叫刘裕的将领篡夺了皇位，建立了宋朝，通常称为刘宋以与后来历史上的大宋王朝相区别。以后

的一个半世纪又一再重复无甚趣味的同样史事：不停地与北方“夷狄”国家作战而通常战争又不成功，一个接一个将领从前一个篡位者的懦弱后代手中夺取皇位。篡位之事很快接连发生：479年建立南齐王朝，502年建立梁朝，557年建立陈朝。

在三个多世纪中，一个接一个的王朝建立者企图恢复汉代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但都失败了。每一个王朝都只是旧帝国的幻影，至多是恢复了汉统治末年中央政府无能、世家大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状况。就像在西方拜占庭帝国能较长时期地维持衰落的罗马传统一样，崩溃的汉王朝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汉王朝本身不能复兴，至少不能由汉族人单独来复兴。中华帝国后来的历史将发展成为在中国北方的“夷狄”和汉族人混合的历史，正像后来欧洲的历史发展成为拉丁族人和日耳曼族人结合的历史一样。

83 第五章 帝国的复兴

第一节 对中国制度的挑战

六朝时期

东汉王朝倒台后的时期称为六朝时期，六个相继的王朝于222年至589年间在南京建都。这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通常被看作单独的一段历史——一种反方向的王朝循环，从统一经长期的分裂再实现统一。在这一时期外来的民族及其影响对中国文明挑战的严重程度超过19世纪前的任何时期，最后中国人将这些挑战与中国的制度相融合从而克服了这一危机。从这种融合物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更加丰富的中国文明，再生的帝国超过了汉代最辉煌的时期。

对中国古典文明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夷狄”的威胁，入侵者劫掠中国北部，外来宗教印度佛教威胁到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但这一挑战的起因更多是内部因素而非外部因素。只有在汉代的政治制度因自身内部矛盾瓦解后“夷狄”才能涌进中国，只有在汉代的儒家思想、伪科学的迷信与法家的实践这种诸家文化的混合体在精神上不能令人满意，在政治上不适用时，中国人才容纳了佛教。实际上，思想家们在转向佛教前是先用道家学说来代替儒家学说。

在东汉王朝及其后一段时期整个社会秩序发生崩溃，情

况与罗马帝国在稍后一点时期所发生的崩溃一样。这两个国家甚至都可以看作是原始封建时期的，当中央政府衰落时，大量的土地及其耕作者落入大地主手中。这些大地主为求自卫结合成大家族集团，他们也就巩固了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租佃农民其地位逐渐沦为实际上的农奴，躲避政府税收官员和“夷狄”的贫穷农民使自己依附于有势力的地主以换取经济上的安全和保护，成为其荫庇者的世代依附民或“客”。依附民和农奴中习武者成为大地主的私家武装，私人军队代替了以前征募农民组成的军队。每一个大家族都拥有其设防的庄园和城堡。“夷狄”的入侵、不断的战争和篡位以及整个家族作为军事和经济单位迁往南方，这一切都造成了社会的军事化。

自给自足的大庄园成为主要的经济单位，结果商业衰落。行政中心的规模变小，商业城市大大减少。铜币实际上在一些地区已废弃不用，一直在农村采用的以货易货办法再次在全国盛行。

道家学说的兴盛

儒家官员发现自己在新的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受到限制，他们那种强调礼仪和过去的陈规偏见对解决当时的问题毫无用处。在东汉时期儒家传统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但随着中央政府的解体，思想家们背离儒家的社会教义开始内省。因为社会和政府现在看起来毫无希望地在衰落，人们再次对过去道家所谈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完善或得救这些问题有兴趣。这一道家的思想潮流无疑特别是在普通人民中早已存在，但现在明显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表层。王充(死于公元100年左右)可能是汉代最有创造性的思

想家，他在自己反传统且敢于怀疑的著作《论衡》中预示了知识分子背离儒家学说的趋势。早慧的王弼(226—249)是当时最有才华的人，他详加注释《道德经》和《易经》，表现出对道家学说的新兴趣。

3世纪新道家思想潮流的典型表现是清谈，有这一习惯的人自己不屑于涉及令人生厌的政治事务和其他所有世俗事务。他们对当时社会和政治令人失望的情景的回答是发展自己的艺术感受，随心所欲地表达其个人主义。这种人的典型是竹林七贤，一群住在西晋都城的富裕怪异的隐士。他们喜欢在一起谈论哲学、赋诗、弹琵琶、赏景并且酗酒。另一个与此相似但更怪异的集团是4世纪住在南京的八达。这些人不与政府合作，使社会丧失了一些天然的领袖，这就促进了混乱。

道家兴盛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作为长生不老之道的炼丹术的兴趣不断增加。有关炼丹术的重要专著《抱朴子》出现在4世纪前期，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能使得人们试验性地吃过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或许这就使中国人口味特别广泛以及其烹饪术很丰富。这也使得医药知识通过发现许多有用药物得到发展，并引起范围极广的对原始科学的探求。后来为什么中国的思想家厌恶科学实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科学实验在思想上与道家学说密切相关。

另一种流传更广的道家长生之术主要是体内养生之道，通过戒食酒、肉和谷物，练功者想象中在体内净化三个“丹田”区，滋补三万六千个体内神灵，再除去引起疾病、衰老和死亡的三虫。这种兴盛于3至6世纪间的迷信最后被融入了现在仍在中国流行的气功和各种养生之道中。

流行的道教

道家学说兴盛最引人注意的方面是其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流行宗教。很可能其集体礼拜和宗教组织的整个观念都来自于这时正渗入中国的佛教。后来发展起来的许多道家典籍肯定只是完全模仿佛教经文。

公元184年的黄巾暴动和五斗米道的暴动是道家衍生为有组织的流行宗教最早的明确标志，以符咒治病是这两次宗教运动的核心。流行的道教很快发展出许多神，以三清为首，而在其下层是些神仙和历史人物。道教内容多借诸佛教，最终接受了佛教灵魂不死在天堂永生而不是肉体不死为进天堂不进地狱而行善的观念。在后来的几百年中流行道教和流行佛教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两种宗教以其神话、迷信和法术的融合有趋于混合的倾向。⁸⁶

东汉王朝末年黄巾和五斗米道暴动被镇压以后，道教再也没有建立有效的统一的教会，但分散的道众仍存在，在他们的像原子裂变一样的领导下道教运动仍繁荣兴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教徒以其奉献以及按传统交的五斗米供养地方道士。道观也明显地按佛教的寺院形式发展起来，但通常允许道士结婚，道士的思想和道德标准也很低。道教的流派也在中国佛教各流派影响下大量出现。

人们作了很多努力以求统一道教的各区各派，但都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444年“夷狄”建立的北魏王朝有一个皇帝在人劝说下宣布道教为国教，后来有许多统治者也对道教予以官方承认。1019年有个自称是2世纪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后代的一派道教世袭领袖受赐得到中国南部江西的一大块土地，还得到“天师”的封号。在13世纪后期张家被官方承认是

道教的领袖，至14世纪获得官方认可的控制全国道士的权利。这个所谓道教的“教皇”其世系直至1927年一直拥有某些权利，至少是名义上的领导权。

第二节 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

在中国政治混乱的同时道家学说兴盛是很好理解的，但佛教流传更广却很叫人吃惊。印度的宗教直接与中国人最为珍视的观念和理想相冲突，佛教甚至比19世纪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明提出更直接的挑战，对佛教的容纳是中国人在近代以前对外来事物最大的一次吸收。佛教是东亚和南亚民族的主要文化纽带，但其在印度和中国不同历史突出表现了世界上两种精神和心理之间的区别而不是相似之处。

印度佛教是在一系列中国人从没有理解的前提基础上建立的。佛教假定生活总是痛苦的，还假定生命没有止境，因为今世与来世通过“羯磨”相连，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是“行动”，但有因果报应的含意。在一连串的因果报应中出生的结果是衰老、死亡和再生，以此解释人们在世界上所看到的地位的不同和表面上的不公平。印度的佛教徒与中国的儒家学者不同，他们不想纠正这些不公平之处使社会制度完善，而只是在逃避生存的痛苦循环。
87

历史上以释迦牟尼尊称的佛陀于公元前500年前后生活在现在印度以北尼泊尔的南部边缘地区。他因为看到自己身边有着各种苦难境况而感到苦恼，抛弃了家庭过起苦行者的

生活，但发现这无甚收获。后来通过静坐沉思实现了顿悟，发现自我放纵和自我约束这两端间的“中道”。因此他成了佛陀，意即“觉者”，开始向一批虔诚的信徒宣传他的奇迹般的发现。

佛陀思想的实质表现为四谛：生活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在于欲求；断绝欲求才能不痛苦；达到这个目的要通过八正道——也就是他定下的规矩生活的戒条，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是绝对苦行的生活方式。最终的目标是“涅槃”，这不是按西方人的意识通过神或灵魂得救实现的，而仅仅是通过断绝所有的欲求使生存之链中断而实现的。虽然涅槃字面上有“空”的意思，但其不是简单的灭绝，而是生出更多的东西，就像一滴水平静地汇入海洋。

佛教早就发展成为寺院式的教会，公元前1世纪前后其一直口传的教义开始用两种关系密切的印欧语言记录下来。巴利文的手稿保存在锡兰，梵文的手稿主要通过译成中文和藏文保存下来。称为三藏的佛教经典传统上分为有关寺院生活的“律藏”、包括主要教义的“经藏”以及对教义作详细阐释的“论藏”。这是一部巨大的著作集成，例如中文的三藏由一千六百多种五千多部组成。

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佛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在佛教教义中人人平等。像地中海地区的两大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佛教传播广泛。印度的商人和旅行家从东南亚经海路将佛教带至中国南部。佛教还传到亚历山大远征时在印度次大陆西北边境建立的希腊人王国。在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边境地区的犍陀罗成为佛教的一个重要据点。在公元100年左右统

88 治印度北部至塔里木盆地的月氏人贵霜帝国的强大君主也是佛教的热心庇护者，他在中亚鼓励人信仰佛教，由此佛教传入中国北部。佛教向北传播的第三个浪潮是几个世纪后经过西藏传入蒙古，这是一种后来退化的佛教形式，包括很多印度教的成份并很快吸收了西藏流行的鬼神崇拜的内容。由此产生的喇嘛教及其在西藏和蒙古建立的神权社会与佛教的原始教义只有很少的相似之处。

甚至纯粹形式的佛教在早期也分为两种。这通常称为大乘和小乘(或“上座部”)。小乘教比较接近原来的佛教学说，现在仍是锡兰、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宗教；而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主要源自大乘教。

大乘教从其包容一切的意义上来说是“大”的，因为大乘教能分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所以它能容忍代表不同程度相对真理相矛盾的思想以适应不同层次信徒的理解能力。大乘教发展出一大套玄学教义和神谱，代替了历史上佛陀的那种无神的宗教。在大乘教中有金字塔形排列像神一样永存的佛，还有一种新型的神“菩萨”或“觉有情”。虽然菩萨也能像佛陀一样实现顿悟，但其呆在世上是要在自己涅槃前帮助别人得救。

因为有菩萨救助弱者的观点，大乘佛教的核心强调的也由通过“自度”以顿悟转为通过“他度”以得救，信仰就是必需的一切。有一本流行的大乘教经典《妙法莲花经》预言最后所有的动物都会得救(佛教认为人与动物没有区别)，自然菩萨也就成为大乘教中深得人心的大神。例如阿弥陀佛原是一位菩萨，作为西天极乐世界的接引佛而成为大救世主。同样，性别在逐渐变化的观音以仁厚的“慈悲女神”的面目出现，因此大乘教就每个人的需要提供了同情人、安慰人的各种神。

至少对那些较天真的大乘教信徒来说涅槃的意思也逐渐

在改变。慢慢地它是特指人来世在极乐世界得救。对这种极乐世界的叙述和描绘很具体，对地狱的叙述和描绘甚至更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而生畏。菩萨助人的理想导致大乘教非常 89 强调善行，即做好事帮助别人并借以自救。因此佛教偏离了其原本与社会隔绝冥思苦想的倾向，其行善的观点使得社会工作很重要，通过信仰得救的可能性使得入寺庵、独身和苦行都不是很必要的了。

佛教传入中国

大乘教的这些发展有许多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的，但早期大乘教对其他宗教观念的宽容及其兼容并蓄精神使之一开始就比原来的宗教更投合中国人所好。佛教在中国人眼里起初被认为是道教的变体，因而在“夷狄”所占的中国北部和陷入混乱的南方有强烈的吸引力。对迷信者而言这是灵验的新法术，对受过教育者而言这是令人兴奋的新思想。佛教是中国人遇到的第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性信仰，在佛教背后还有若干另一伟大文化的成果——印度的玄学和早期科学、优秀的文学、美丽的宗教艺术、壮丽使人满意的宗教礼仪、在遇到麻烦时过平静寺院生活的吸引力以及人们在无法解决世 90 俗问题时个人可以得救的允诺。

按照传说，佛教是在公元64年因东汉的第二个皇帝明帝做了一次梦而最早传入中国。这个故事不足为信，但这时在长江下游的一个贵族宫廷中已有佛教徒团体，至下一个世纪佛教已进入现在的越南北部。很快信徒在中国各个地区建造了佛塔并按照中国的建筑观念作了修改，这些佛塔很快发展成为石塔、砖塔或木塔，这已成为东亚典型景观的一部分。 91

佛教最早的传播者可能是商人，但很快由僧侣更积极地

宣传这种宗教。有一个安息王子在历史上的中文名字叫安世高，2世纪后期他在洛阳为僧，热心地翻译佛经。另一个更有名的佛教传播者是鸠摩罗什，他生于中亚，父亲是印度人，382年前后被中国出征的军队所俘带来中国。他在中国主持了一个庞大的译经计划，他所译的佛经九十七卷中至少有五十二卷至今没有散佚。

在将印度宗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信徒最后比外来的僧侣更重要。我们知道在2至8世纪间经过长途艰苦旅程去印度取佛经的近二百位东亚僧侣的名字，其中九人是朝鲜人。这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留学浪潮，法显399年经中亚去印度，414年又经海道回国，他因写了旅行记而特别著名。因为印度人对历史没有多大兴趣，很少顾及记录年代，所以法显和其他中国的佛教朝圣者的年代详细的记述在编写印度和中亚的编年史时显得很有价值。在佛教朝圣者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他在629年至645年间借道中亚往返旅游印度，他的旅行记《大唐西域记》是这类著作中最重要的。第三个中国朝圣者义净于671年至695年间经南路往返旅游印度，他编辑了其他五十多个朝圣者的记述。

佛教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不同，显然在向下传播到穷人中之前为富人所接受。起初佛教似乎在“夷狄”所占的北方传播得比南方更快，因为这一地区非汉族的统治者对这一外来宗教没有偏见。对新宗教最大的帝王庇护者是“夷狄”的北魏王朝(386—534)的皇帝，在山西北部北魏前一个都城附近的云冈和后一个都城洛阳附近的龙门有两组佛教石窟，其中有一些早期中国佛教的精美艺术遗迹。到6世纪佛教像在北方一样完全渗透进了南方。

佛教胜利的部分原因是其愿意与道教和儒学妥协，容忍道教作为次一等的真理，而将儒学作为与佛教基本教义相一

致的政治和社会哲学。自此以后中国人总是有这样的倾向把 92 三者合为“三教”或是将它们并列，然而这时佛教在三者中占了明确的统治地位。中国人的大量思想智慧和艺术才干用于翻译和解释佛经以及建造和装饰庙宇。

从 4 至 9 世纪的整个时代最好称为中国和亚洲历史上的佛教时代。在这一时期，佛教席卷除了西伯利亚和西亚以外的整个亚洲大陆，给这一广大的地区以从未再有过的一种文化凝聚力。可是这只是短暂时期的一种宗教凝聚力，佛教早在 6 世纪就在印度开始衰落，至 15 世纪实际已消失。9 世纪在中亚因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被消灭，同时东南亚的小乘教和东亚的大乘教开始分道扬镳，在中国佛教也开始大大衰落。

第三节 “夷狄”恢复帝国

93

帝国传统的力量

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4 世纪时世界历史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罗马帝国总算历劫而存，而中华帝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帝国的心脏中国北方完全遭“夷狄”蹂躏；中国南方显然不能恢复帝国的统一。一种外国宗教席卷全国，这种宗教强调来世，要过禁欲苦行的生活，这损害了中国的哲学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的根基。

可是中华帝国在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时最后重新组成。北方的“夷狄”皇帝在希望自己能占有他们打败的帝国上与古罗马“蛮族”皇帝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与西方的“蛮族”皇帝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 5 世纪中期重建

了与旧帝国相类似的国家，由此开始至 7 世纪使得中华帝国比汉代更富强。这与罗马帝国慢慢沉沦的命运相比差异很大，形成了在欧亚大陆两端不同民族之间相对立的两条历史道路。

中华帝国为什么能恢复而罗马帝国却不能，对这一问题没有肯定的答案。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南方的王朝比希腊人的拜占庭帝国更充分地保留了帝国的传统，并因为中国在地理上的联系更密切，所以南方王朝对北方的影响比拜占庭对意大利和法国更强烈。另一原因可能是汉代的帝国思想比罗马的优越，如果皇帝获得天命就表明他获得人民支持，如果皇帝依靠不是按照出身或机遇而是按才干选拔的官僚知识分子行使权力，那他就会实行公正的道德的统治。这种观念比罗马人通过非人格法律实行统治的思想更易让当时人理解。中国的文字也比西方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有着更大的文化上的连续性，“夷狄”民族如果要想读写就必须学汉语，因为汉字不易于写出他们的语言，即使是说互不相通“方言”的中国人也有着共同的书面语言。最后中国人口的众多稠密可能比欧洲能更迅速完整地同化“夷狄”入侵者。因为中国的农业比欧洲更精细，也就产生出更稠密的人口，因此入侵者也就更快地淹没在其周围的大量中国人中。

94 五胡十六国

中国人传统上把4世纪在中国北方的入侵者称为“五胡”，这些是突厥人种的匈奴以及另一个突厥人集团羯、来自东北的蒙古人种的鲜卑以及来自西部的两个藏人集团氐和羌。鲜卑人早在281年就蹂躏了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区，藏人在296年开始了其劫掠活动，但主要的灾难却来自304年中国北方的

匈奴造反。

在304年至439年之间一些互相争斗的“胡人”和汉人集团对中国北方的皇权提出要求，历史学家恰当地称之为十六国。316年毁了洛阳的一帮匈奴人称其王朝为赵，这个王国通常称为前赵，因为与此相对有个后赵，是由329年灭了前赵的叛乱将领石勒所建。石勒企图恢复比汉化较深的前赵更加严厉的部族统治，他对待汉人极为严酷，最后在349年人民起来推翻了他的继承人。

同时有一个汉人将领在甘肃的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前凉王朝，鲜卑部族在北京地区建立了前燕，而351年一个强大的氐族领袖苻坚在历史上的都城长安建立了高度汉化的国家前秦。前秦370年征服了前燕，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较为和平统一的短暂统治时期。

这种和平被384年在长安篡位的一位羌族将领破坏了，他建立了后秦。在一连串政权的迅速更替中鲜卑部族在东北建立了后燕，在山西建立了西燕，同时氐族人集团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后凉，在西部边远地区建立了西秦。这些都是很短命的王国，依次为六个同样短暂的所谓王朝所代替。

北魏

最后，一个“胡人”部族建立了一个较长久的政府并统一了北方，这就是鲜卑的拓拔部，在匈奴人南迁时他们向山西北部迁移。拓拔部在386年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魏国（称北魏）并成功地击退了在北方草原新兴的一些游牧对手。至439年他们还灭了其在中国的“胡人”对手，统一了北方。

在北魏将华北平原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这个“胡人”帝国中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像以前最

强大的“胡人”王朝前秦一样，北魏从一开始就是半汉化的
95 国家。但此时文化融合的过程加快了，农业地区没有分给拓
拔部族而是按传统的中国方式管理，拓拔部民的地位下降以
从军为业。

至5世纪后期，文化移入的过程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北魏
朝廷自觉地采取汉化政策。在493—494年间都城从现在山西
北部的大同迁至以前是东汉和西晋首都的洛阳。约在同时，
汉语成为唯一的官方宫廷语言，拓拔部贵族被指令采用汉族
的服饰、习惯和姓，并被鼓励与当地居民通婚。

朝廷完全的汉化引起524年仍然是部分部族化的武装力量的严重叛乱，中央政府逐渐为世家大族所控制。534—535
96 年北魏分为在两个傀儡皇帝名下的东魏和西魏王朝，历经篡
位之争后成为550年建立的北齐和557年建立的北周。北周以其首都长安所在的渭河流域为基础，在577年征服北齐，再次
表明这一地区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第四节 隋朝和唐朝

隋重建统一帝国

四年后一个有着汉族和鲜卑混合血统的将领杨坚夺得皇位建立了隋王朝。可是到这时“胡人”已被中国北方的居民和文化所同化，以致夷夏之别主要是理论上的。这位中国和“胡人”传统兼容的继承人很轻易地在589年征服了南方的陈朝，恢复了统一的中华帝国。

隋王朝所起的作用很像八个世纪以前的秦王朝。王朝的

建立者重新统一了帝国，但其继承者却不能守业。像其秦代的前辈一样，隋的统治者可能也过于雄心勃勃。他们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过多的东西，滥用了其新臣民的忍耐和忠诚，第二个统治者隋炀帝（604—618）更是如此。不过在这两个隋代皇帝统治时，中国开始了第二个伟大的帝国时期，在整个中国重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重修了长城；开挖了很长的运河，使得以后的几个世纪能够非常繁荣；建造巨大的宫殿；中华帝国的声势也完全得到恢复。

征服的钟摆再次由内向外从中国指向“夷狄”地区。“夷狄”在中国统治的“阴”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尚武精神，再次产生出中华帝国对外征服的“阳”。中国人重新控制了越南北部，派出远征军以对付越南南部的占城国，还去了台湾。在北面，突厥人摆脱统治他们的游牧民族但在 581 年分为东西两部。这时东突厥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509 年隋王朝还征服了在西藏北部的藏族和鲜卑族混合的国家（叫吐谷浑）。

可是隋炀帝却因其发动无休止的战争以及征发巨大的人力去修运河、长城和宫殿而疏远了人民，隋朝的声势也因 612 年在对位于朝鲜北部满洲南部的朝鲜人国家高句丽的战争遭到大败而大为受损。严重的叛乱爆发了，这使隋炀帝只得毫无所获地停止 613 年和 614 年对高句丽的战争。⁹⁷ 615 年隋炀帝又被一直是其忠实藩属的东突厥大败。以后帝国开始解体，隋炀帝逃往中国南方，618 年在那里被人杀害。

唐代的世界帝国

在隋代崩溃后的群雄相争中取得胜利的人是李世民，他是在北方山西的一个有着汉族和“胡人”混合血统的著名官员

和将领。617年他占领了首都长安，第二年建立了唐朝，将他的父亲扶上皇位。626年他在消灭了自己的兄弟以后使其父亲退位，从此用自己的名义统治直至649年。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太宗，他的在位时期(626—649)被看成唐朝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整个唐朝像西汉王朝一样被看成是中华帝国两个黄金时代中的一个。

630年唐太宗降伏了东突厥，经过639—640年和647—648年的大战他从西突厥手中夺得了塔里木盆地。⁹⁸ 他在这次胜利中得到突厥人的回纥部队的支持，回纥在这时脱离了西突厥帝国成为唐朝的忠实同盟者并是唐朝在中亚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中国人的宗主权逐渐越过帕米尔高原扩展到乌浒河流域的国家，657年西突厥帝国最终瓦解，许多突厥人部落向南进入印度，向西进入西亚和欧洲。

607年第一次统一起来的西藏也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一个中国的使臣从西藏率领藏族军队平定了印度北部的一部分，648年他带回长安一个被俘的印度王公。这一事件是除近年的冲突以外中国和印度之间唯一的一次军事冲突。这也体现出两大人类文明之间山脉阻隔的作用。唐太宗的军队两次被高句丽击退，但在668年其继承者唐高宗(649—683)在朝鲜南部国家新罗的帮助下成功地击溃了高句丽、百济（在朝鲜南部）和日本的联军。从此在新罗统治下的统一的朝鲜成为唐朝的忠实藩属国。

唐代的力量扩展到一个广大的地区，从西伯利亚南部直至东南亚，向西经过西藏和中亚直至里海。在中国本土的边境周围有六个都护府控制的众多藩属国，有四个都护府的名称来源于基本方位，如在塔里木盆地的安西、在朝鲜地区的安东，还有安南，中国通常将越南称为安南即源于此。除这些藩属国以外还有一些国家如日本和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

的许多国家偶而朝贡礼物，不明确地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因此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唐代的统治实际上遍及世界。

像以前的汉代一样唐代差点被一个皇后使之完结。皇后武则天统治着唐高宗在位的后期，并在高宗死后通过傀儡皇帝统治了一段时期，后来在 690 年她称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妇女称帝）并改朝代名为周。作为一个篡位者而且又是一个女人，她遭到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指责，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强大有为的统治者，她努力进一步使贤良官僚的地位高于贵族。705 年在武皇后八十多岁时因一次宫廷政变把她赶在一边，在几年的混乱之后另一个能干的统治者于 712 年继位，他在历史上称为唐玄宗或唐明皇。他长长的统治时期（712—756）代表了唐朝的第二个繁荣时期。

实际上这时的唐朝比唐太宗时期人口更多更富裕，但也开始表现出腐败的迹象。财政问题成倍增加，征服的钟摆开始回摆指向中国。747 年在唐朝任职的一个朝鲜将领高仙芝率领一支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去切断假想中的阿拉伯人和吐蕃人之间的联系，但这是唐代力量最后高潮的迹象。751 年高仙芝被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面的怛逻斯大败，几年后玄宗的统治在一次叛乱中完结，帝国显然瓦解。在“夷狄”同盟者的帮助下帝国得以恢复并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但再没有显出其前期的力量和活力。

第五节 中央集权统治的恢复

土地占有和军事制度

6世纪由军队来重新统一中国以及7世纪帝国遍布四方的征服只是一个更深刻得多的过程（稳定中央集权政府的恢复）¹⁰⁰的表面现象。几个世纪以来，南方强大的独立家族和北方“胡人”的部族分立使中央集权统治无法实现，另外佛教带来了经济破坏的一个新因素。富裕的寺院成为大地主，因此加入了世家大族与中央政府争夺农民劳动成果的斗争。北魏和隋唐最大的成就是使遏制这些分裂力量的制度得以发展。

在5世纪北魏开始解决使汉王朝灭亡的基本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又采用王莽的做法使土地国有。因为土地税不重，主要的税收负担尤其是劳役按人头由人身自由的农民承担，所以一个政府为了国家繁荣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农民纳税，而不让农民成为大地主土地上的农奴或奴隶。485年北魏制定了“均田”制，规定每个成年的壮健农民都能分到同样大小的耕地。这些耕地中只有一小块可以永久占有作为养蚕的桑田或种其他树，其余部分在农民死后或到一定年龄要还给政府。虽然“均田”制没有规定没收大家族占有的地产而只适用于自由农民，但这有助于阻止土地和农民流入私人手中，从而稳定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

北魏还制定了一种把人分成组以相互对别人的行为和纳税情况进行担保的制度。自古代起这种集体保证制度以这种那种形式出现，直至不久以前发展成为确保地方秩序的保甲

制度。这一制度使得邻里之间相互监督，因为他们彼此都负有责任。

在这一时期还在北方边境建立了兵农合一自给自足的军事屯区。在汉代最早出现与此相似的屯区，但自六朝时期以来这成为帝国防御中固定的成份。另一种重要的军事制度府兵制度由北魏在长安地区的后继国家西魏（537—557）和北周（557—581）所开创，它对壮健农民给以军事训练并像部族士兵一样编成正规军。在唐代府兵服役成为农民在“均田”制下占有土地所承担税役负担的一部分。

在隋代和唐代“均田”制更为精细。隋代在全国推行，强 101 迫大家族也执行这一制度，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定为“品分田”，规定最高品级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一千三百七十英亩。在唐代大家族和官员分到相似的“品分田”和按官员在政府的职位不同所分土地也不同的另一种“职分田”，地方政府机构得到“职分田”财政资助。然而大多数土地平均地分给了农民。按规定，每个年龄在十八至五十九岁间的壮健男子可得到十三点七英亩左右的土地，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可以作为永久占有的“桑”田。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农民必须向政府交税，即交固定数量的粮食和作为他所在地区纺织品的一定数量的丝或麻，还要为中央政府服二十天劳役，在其他时候要为地方政府机构服劳役，有时可用交丝麻或钱代替。另外有些不交税不服其他征调的壮健农民必须服一定时期的军役，没有报酬，一切要自己花钱。

为推行这种复杂的土地占有制度，必须在全国进行详细的人口和土地登记。保存至今这类调查的例证表明每一块土地确实按各类别划归各个纳税者，这可能是一种与19世纪后期以前世界各地所能找到的一样复杂的土地和税收制度，但这一制度在约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很起作用，在这一辉煌的时

代供给中华帝国所需。

唐代的繁荣

在初唐，中央政府有充足的税收收入，只有在皇族和政府机构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以后开支才抵得上收入。中国人富有组织天才，在这时对经济中的主要商品制定了价值大致相等的度量单位。因此一串一千枚铜钱、一“两”银、一“石”粮、一“束”丝以及一“堆”丝絮价值大致相等。按照这一价值标准“单位”计算，依上述钱物中的一种来看，中央政府的税收超过五千二百万“单位”。另外中央政府还享有作为税收制度一部分的几百万农民的无偿劳动及其所服的军役。

无疑政府比汉代时要富裕得多。技术和行政管理上的进步可能起了部分作用，但主要的原因是外来入侵的那些世纪中长江流域的人口大大增长。虽然政府仍在西北并控制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贵族手中，但主要的粮食产地不再是渭河流域和华北平原出产小麦、谷子的旱地，而是长江下游流域种稻

102 的水田。

这种情况可以解释隋代为什么大修运河。在南方与北方的都城以及边境地区之间需要一个有效的运输系统以便帝国能充分利用南方的富裕省份。隋炀帝连接了许多旧运河修了新运河，在610年建成了大运河水系，从长江以南的杭州地区起到黄河，而后向西到长安向北到北京地区。现代的大运河远至北面的淮河一段与旧大运河一样，但然后就直接穿过华北平原到北京。

在理论上“均田”制过一段时间就要在纳税农民中重新分配大部分耕地，但实际上是否曾进行大量土地重新分配却令人怀疑。因为国内无战事，人口增加得很快，所以农民比土

地资源增加得更快。结果大多数从父亲那儿得来的土地比规定的足额份地要少，而大多数土地被登记作为永久的产业。同时像东汉时一样皇帝不断的赏赐减少了可给纳税农民的土地总量。至3世纪前期，整个制度显然崩溃。唐玄宗统治末期唐政府的垮台可能部分归因于这种土地和税收制度的失效。总之这时“均田”制已被废弃，再也难以照原样重新实行。

官僚和科举制度

一个可靠的官僚阶层对中央集权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汉代的国家学校和考试制度衰败后，3世纪的魏和西晋王朝企图通过让地方当局把人按品行分为九等推荐最佳者去政府任职的办法来获得有才干的行政官员，但因有势力的地方豪门将自己家族的成员和部属划为一等而败坏了这一制度，分等很快只是按社会地位来分。

直至隋唐时代才能制订出一种有助于使中央政府摆脱完全由富裕的贵族家庭统治的官吏选拔制度。第一个隋代统治者恢复了汉代过去对儒家传统的强调，儒家传统最适宜作为中央集权政府的思想基础。他还重新规定了（虽然要比汉代详尽得多）汉代那种以儒家教程为基础的选拔未来官吏的考试制度，他还提出郡县的官员不应由地方贵族担任而应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原则。

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代的国家学校和科举制度。在京城 103 有一系列特殊的国立学校，郡县也有当地学生可以完成其学业的学校。科举考试只允许京城学校的学生和地方政府推荐的人参加，礼部主管这些礼仪复杂的考试。有几种不同的科举等级，如考现实政治问题的“秀才”、考文学的“进士”，还

有考经学、法律、书法和数学的。可是后面三种只是些仅能获得低级职务的技能，很快进士一级最受人重视，成为获得政府高官的主要途径。在任职之前，通过进士考试的人要经过由吏部主持的新的一系列考试，不仅要看其书面的答卷，还要看个人相貌和口才。对在职官员还要对其业绩进行考核，这发展成为文官的考评制度。

104

这一复杂的制度发展很慢直至八世纪才达其高峰。在当时这对有钱有势的人极为有利，为准备考试要花多年时间学习儒家经典，这只有富人们才能做到。京城的学校主要对贵族开放，地方政府推荐的应举考生很可能来自特权阶级。另外大官们总是有特权推荐自己的儿子和门生不用通过这种科举制度就担任官职。

不过唐代的科举制度有助于产生一个与汉代十分不同的因才录用的官僚阶层。除了通过武力获得权力的唐代最早的领导者集团以及王朝崩溃末期的领导者外，那些高层官僚中的大多数人（显然也还有中等阶层官僚中的大多数人）起初都是获得进士而出人头地的。

唐代科举制度是作为中国文明伟大成就之一的量才录用的文官制度的真正开端。因为科举成为人们在政治和财政上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途径，所有要想在国家任官职的人都要接受同样的经学和文学教育，因此也就在思想上统一了国家，这使人想到古典教育在近代曾为英帝国培养了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教育的基础，所以统治阶级饱受伦理准则、忠君和重视礼仪这些观念的影响。正如在其他许多社会中一样，有知识的人都经考试制度选拔出来，他们就成了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不是批评者。这一制度甚至还赢得现有秩序中低层阶级的支持，因为出身低微的人总算有可能通过进士考试最终成为皇帝的大臣。

自然，科举制度也有其缺点，所引起的学业的显赫地位加上传统的政治官职的显赫地位，使得在中世纪贵族的权力消退以后中国社会因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阶层。在科举中重文、重史和学究的科目也可能使统治集团有过于学究、书卷气和好古的倾向，而影响他们具备其他一些更实用的素质。这一有助于中国在以后一千年中特别稳定的制度，或许也使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慢了下来。

政府的机构

105

隋代废除了过去的郡，将全国分为更加统一的县制，再由一些县组成州。唐代给这一制度增加了由一些州组成的道，起初有十个道，后来发展到十五个道。

为把帝国连接起来，唐代还创造了在从都城出发的水陆通路上设立驿站的周密制度。通常十英里距离设立一个驿站，这些驿站为带有政府凭证的因公旅行者提供食宿，并备有马匹或船只供他们使用，自此驿站制度成为中国政府正式的组成部分。唐代还在主要的商路设立关卡严格控制城市市场，作为收税和管理商业的办法。可是尽管这表明人们对收商业税有兴趣，仍然还可看出中国人传统上对商人的蔑视。

在唐代中央政府的最高层机构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是政府政策和皇帝诏旨的主要制订者；作为官僚权力据点的门下省有权审议这些诏旨，因此起了限制皇帝权力的作用；尚书省执行前两省同意的诏旨。这种权力的三分以及高官们在各自机构内分享领导权的做法，确保了皇帝以下高层官僚的分权和制约。尚书省下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直到20世纪，中国政府内行政机构一直分为这六个部。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机构是御史台。它有权侦查叛乱和吏治不良的案件，直接向皇帝报告。其成员还要向皇帝（冒有一些风险）指出皇帝行为的不当之处。御史台在后来的王朝中仍是中华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机构。

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世界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包括城市、郊区和一小部分附近农村的首都人口高达一百九十六万零一百八十六人。城郭为长方形，长六英里，宽五英里多一点。城市按现代的棋盘形状排列。又宽又直的南北和东西向大道将全城分为一百一十个部分，每一部分是一个行政单位“坊”，坊内还有条条小路。一条五百英尺宽的中央大道从城市的正南门直
106 通往皇城（政府机构所在地），在皇城以北是皇宫，这条大道把城市分为东西两个行政区，各有一个政府所办的大市场。

长安的整个规制和结构表现出唐代初期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7世纪时期的中国雄踞于当时其他国家之上，在汉代中国与地中海世界并驾齐驱，这时中国开始了其近一千年的盛世，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先进的国家。

第六节 佛教的融合

宗派的发展

就像中国人将“夷狄”同化在一个新的更大的帝国中一样，
107 他们也逐渐融合了佛教，从中丰富自己的文化并使之不

损害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北魏和初唐皇帝的庇护下佛教在经济和思想上都兴旺起来。可能在 700 年前后在一度削发为尼的武则天的热心支持下，佛教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在 5 至 8 世纪之间繁荣起来的佛教慢慢被改造成一套与原始佛教很少相似之处但却很适应中国制度的思想和习惯。

印度人对哲学思辨的喜爱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而这时中国人对类聚群分的喜爱导致其中一些不同的哲学思潮发展成为宗派。一些佛教宗派的哲理是直接从印度移植而来的，如法相宗在 645 年由大旅行家玄奘带回国内。可是最兴盛的宗派的思想内涵主要是中国人原有的思想，其中一个宗派是智𫖮（538—597）所创立的天台宗，因其中心在浙江的天台山故名。天台宗之所以流行是其以中国典型的折衷主义为基础，热衷和解，精于分类。它发展了大乘教相对真理的观念，将佛教相互冲突的庞杂教义归结为不同层次的真理，各有其用途。天台宗在 8 至 9 世纪成为主要的宗派，并使《妙法莲花经》成为东亚佛教最流行的经文。

另一个大约在同时出现的宗派是真言宗。这是一种深受印度教坦特罗崇拜影响的秘传宗教。它教诲人们最终的实在不能用言语表达而只能用显灵的征兆和迹象充分体现出来。真言宗所强调的符咒、显灵的术语和礼仪很为中国人所喜爱，他们很熟悉道教以及强调礼仪的儒家学说中类似的内容。真言宗为死人所作的道场尤其变得极为流行，因为这与传统的祖先崇拜很吻合。真言宗对其宇宙观所作的图绘称为曼荼罗（坛场），对后来中国的佛教艺术有很大影响。

大乘教通过信仰得救的观念也成为一个称为“净土”的强大宗派运动的基础，“净土”是西方极乐世界之名。这一宗派只强调念佛这单一的信教活动，至 5 世纪这些思想植根于中国。从隋代开始民众的反叛是从这类佛教而不是从道教获取

精神启示。“净土”宗对普通人有吸引力，就其信徒人数而言是东亚佛教中最大的一股力量。

这些宗派运动中最后一宗最终证明其意义最大的，这就是禅宗。¹⁰⁸ 唐代初期它在中国出现，但直至9世纪才特别流行。禅宗接近早期佛教，强调冥思和顿悟，但这可能更多地来自也强调这些特性的道家哲理。禅宗教诲人们唯一真实的实在是每个人心中的佛界，虽然这来自于印度的来世和无尽的观念，但这种神秘主义以典型的中国方式施加于每个人的世俗生活。在中国冥思苦想的生活也就是苦行以及艰难自给的生活，禅宗的非经院不用经文的倾向是纯粹道家的一套。它不用经文，强调口头传教，特别是提出一些看起来无意义的问题，旨在使信徒不再依赖通常的逻辑思维。就其崇尚自然和简朴而言，禅宗仅仅是在新伪装之下旧的道家传统，所以很自然成为艺术和诗歌创作重要的灵感来源。

虽然禅宗从没有在中国形成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教会，但其冥思的戒律以及强调自给使之比其他宗派从其寺院戒规和繁琐哲理中获得的力量要大得多。禅宗是在唐代以后其思想生活还很活跃的唯一的佛教宗派。其他的中国佛教宗派逐渐地被禅宗和流行的净土宗所吸收，很快甚至这两种宗派也失去了区别，结合成为由中国佛教最终退化成的迷信的混合体。

佛教在社会上的作用

在中国人改变佛教思想的同时，他们也正在改造其机构，使之更适应中国的社会。佛教寺院开始作为旅舍、公共浴室甚至早期的银行机构发挥社会作用，他们直至近代还接受殡葬死者。被中国人看作佛教最厌恶的方面是寺僧过独身生

活，但这方面的限制很快放松了，以允许和尚结婚从而能传宗接代。

大佛寺占有许多财产，这是中国国家碰到的唯一真正的教会问题。寺院由统治者和富人建造与布施，并通过虔诚信徒赠送的土地和财富而积聚到更多的财富，寺院还通过放高利贷和大家族积聚财富的许多其他合法或不合法的方法扩充其产业，因此他们在统治者眼中构成对国家财政的威胁，使一些土地和人口逃脱了税收。所以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应该限制寺僧的数目及其产业的规模；同时还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假如佛教真对国家有价值，就应该由国家控制并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精神分支由国家供养，不能有任何超出早期印度佛教作用的地方。¹⁰⁹

南朝对佛教寺院像对大家族一样难以控制，但在北朝产生了一种管理制度。至4世纪时，统治者任命“方丈”以便于控制寺院，北魏时规定对寺院及其所有土地的限制。在唐代出现了这样的理论，认为每个州应该有一所有三十个和尚的官办寺院，729年开始每三年对寺院作一次僧众登记以便实施这一制度。747年政府颁布法令限制新出家和尚的数目，可是控制寺院和寺僧数目的企图从长远来看总是失败。虔诚的统治者和政府官员不断破坏自己所订的规章，秘授僧职是常有的事。

控制佛教寺院的努力偶而也升级为严厉的迫害。许多中国人仇视佛教因其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或是厌恶佛教的一些做法，例如自损肢体、火葬和独身，人们认为这些威胁到传宗接代并损伤人受之父母的躯体。道士的嫉妒有时也起作用，但佛教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需要。迫害的主要做法是使寺院的土地和和尚重入税册，将寺院的镀金铜像和其他财富归入帝国国库。个人信徒则没有遇到很大的麻

烦。

446年在北魏有一次对佛教的迫害，574年在北周包括对道教在内又有一次迫害。最大最严重的一次迫害于841—845年间在一个已成为狂热道教信徒又有些精神病的唐朝皇帝统治时发生。按照官方记载，有四千六百所寺院和四万个佛龛被毁，二十六万僧尼及其十五万奴隶重入税册。因为印度来的宗教已失去其内在的活力，所以这次迫害是对佛教的沉重打击。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再次集中注意于经学著作和儒家思想，结果上层阶级正在失去对佛教的兴趣。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禅宗继续发展并扩大其影响，但其他佛教宗派却迅速衰落。

幸运的是，在中国佛教思想和艺术上的繁荣无可挽回地消失前，佛教在西北边远地区甘肃河西走廊的西端敦煌留下了一组永久的佛龛。在这里诸多装饰精美凿石而成称为“千佛洞”的佛洞中，有一座很大的佛教图书馆为避免吐蕃人袭扰于1035年前后封存。这座有数千卷手稿的图书馆直至1900年才重新打开，其中许多手稿用不同的中亚语言写成，证明这是中国佛教时代独一无二的宝库。

110 虽然佛教在中国文化最辉煌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来说却很少给中国文明留下长久的影响。其长久的贡献是对传统中国文化增添些内容而不是对当地的价值观念作根本的改动。佛教是老百姓许多流行宗教和神话传说的来源，它为中国的思想增添了玄妙的内容，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因此佛教给中国文化增色，但是并不像基督教在欧洲那样改变整个文明。

第七节 中国文化的发展

与外部世界的接触

在六朝和唐代前期，中国充满了文化宽容的精神。“夷狄”入侵使中国北方对外来影响开了大门；佛教既是中国与遥远地区进行密切文化联系的工具又是这种联系的动力，海陆两路的地区间贸易发展远远超过汉代时的情况；初唐帝国使中国直接与印度和西亚两大文明中心进行了接触。直至20¹¹¹世纪中国才再次开始表现出对外来影响有这样的反应。

与外国的接触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和一些技术。例如茶叶从东南亚传入中国，起初是作药用和提神，到唐代后期茶叶用途更为广泛，后来由中国向外传播，成为世界上最普遍的饮料。椅子也从西方传入，几个世纪后逐渐代替了坐垫和地席。更多的技术进步出自中国自身。早期纸张和瓷器的发明有了很大的发展，还发明了火药，虽然还只是作烟火用。另一个发明是手推车，这成为在中国狭窄小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许多世纪后才传到西方。早在4世纪中国北方就用了煤，到13世纪对欧洲人马可·波罗来说这仍是一个奇迹。

贸易和外国的使团给唐代都城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这些人还随之带来了许多宗教。波斯的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或马兹达教）6世纪传到中国，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成份的摩尼教就像基督教的支派景教一样在初唐就传来。一块大石碑立在长安城景教教堂中，只是在17世纪才被重新发现。所有这三种西方传来的宗教都在841—845年

的宗教迫害中实际被消灭，但其他两种宗教保存下来。犹太教直至19世纪在一些孤立的小社区中继续存在，伊斯兰教稳步发展，拥有数百万信徒，主要分布在中国新疆和中国内地的西北和西南角。

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邻近民族的极力仿效。人类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国，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这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曾再有。

7世纪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藏族政府以及740年左右在云南由傣人部族建立的南诏国都直接受到唐朝统治制度的影响，东面的民族甚至更全面地接受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模式。朝鲜的几个国家在几个世纪中深受中国影响，668年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成了唐朝的微型翻版。在713—926年间兴起于满洲南部和东部以及朝鲜东北之间林区的通古斯人的渤海王国也完全模仿唐代的制度。7至8世纪日本人在其遥远的岛屿上创建另一个小的唐帝国的努力更是明显的例证。
112

艺术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唱经对中国的音乐有深刻的影响，中亚的音乐和乐器实际上代替了中国旧的音乐传统。在艺术上尤其在雕刻方面佛教的影响也很大，事实上，制作佛像的需要使这一时期成了中国雕刻最辉煌的时代。这种在早期较次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几个世纪内发展到高峰，然后在唐代以后随着佛教一起衰落。

相继保存在云冈、龙门和敦煌一个个石窟中的中国佛像雕刻各有其不同的艺术风格。有些直接受印度的影响，但六朝时期在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艺术风格来自中亚佛教，而中亚

佛教又是受到在现在巴基斯坦西北和阿富汗的犍陀罗及其周围地区有强烈希腊色彩的佛教艺术的影响。可是正如人们在 113 深刻的宗教艺术中所能遇到的那样，中国早期的佛雕与希腊雕刻就其精神而言完全不同，人体形象远不是写实的，而是对神灵僵硬冷酷的抽象化，有限的希腊现实主义只表现在诸如衣褶这样的表面现象上。而到唐代，中国人文主义的趣味使佛教神的概念更富人情味，这也反映在雕像上，佛像更丰满生动，很接近唐代人体美的观念。这一时期也有大型世俗雕刻。许多美丽的陶俑，有跳舞女郎、骆驼、马、中亚牵马人以及类似陶俑在葬礼时被埋入墓中。

除了敦煌石窟的壁画外，在六朝和唐代很少有佛教画保存下来，但佛教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虽然这时中国的大部分艺术人才致力于宗教艺术，世俗艺术也还是繁荣起来，在中国南方开始出现了一些艺术倾向，后来发展成唐代后期及以后一些时期中国绘画的伟大传统。尽管这一时期的世俗艺术几乎没有留传到今天，公元 400 年前后进入盛年的顾恺之还是被誉为第一位伟大画家，王羲之（321—379）被看作最伟大的书法家。

除了砖塔和石塔外，唐代以及唐以前时期没有留下多少世俗或宗教建筑遗迹。可是日本在 7 至 8 世纪按中国风格所建的佛寺保存了下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这时中国建筑形式传统的简朴匀称的建筑思想。

文学和学术

114

在佛教时代一大批最优秀的文学和学术人才自然大部分献身于后代中国人一般不重视的佛学著述，不过也有不少人致力于较为传统的文学和学术道路，大部分文学作品继续主

要是贵族艺术。在六朝时期赋依然很流行，与之平行的还有对仗精巧通常是四六言的散文骈体文。六朝时期最重要的诗歌形式是最早出现在东汉的五言诗，其内容是典型道家趣味的，惋惜世风的沉沦并提倡个人的隐逸生活。当时最伟大的诗人陶潜（又叫陶渊明，364—427）是个按典型道家方式寄情于酒的南方人。

早在3世纪就开始出现了文学批评著作，在6世纪南朝梁太子萧统（501—531）编了中国最著名的文集《文选》。这时还出现了正史、注经和其他传统类型的学术著作。500年左右还产生了一本在后来中国的启蒙教育中用得很多的奇怪著作，这就是《千字文》，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总结中国的历史和儒家哲学观点。

中国学术研究一个新的方面是编纂百科全书性质的著
115 作，这在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门类。这类著作有许多种，但最常见的一种是地方志，涉及诸如州县这样一个行政区的历史、自然概况以及政治和社会组织。保存至今最早的地方志是4世纪的。

所有这些新的文学和学术潮流源出于早期的中国传统并在唐代继续存在得以发展。因此六朝以其较高文化表现出与过去的联系并平稳地延续到唐代及以后的时期。这可能是因为新旧时代大重合，中国南方那些继承国继续汉代的文化传统，而在北方是新兴的半“夷狄”半佛教文化，这两者长期共存。尽管有“夷狄”入侵和外来宗教对中国社会的挑战，汉代与唐代之间的文化连续性还是要比罗马和中世纪欧洲之间的文化连续性大得多。

第六章 唐代后期与宋代：

116

中国文化的繁荣

第一节 中国从古典时期向近代 早期的过渡

把一个王朝分为两大时期有悖于对中国历史整体循环的解释。假如被分段的王朝是唐朝——这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持传统观点的人或许会特别气愤。但如果我们要想看到潜藏在王朝循环之下更深刻的趋向，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们习惯于考虑在军事失败或政治混乱时出现的文化和社会大变化，但最不可避免地导致变化的是各方面的发展，在和平时期要比混乱时期人口更容易得到增长，生产、商业、文化和制度更容易得到发展。这就是唐代出现的一切。在隋代和唐代前期以较完善的形式重建了古典帝国，接着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带来了使中国跃入比汉代更高层次的发展。制度和文化发生惊人进展，这又促使社会有了更多的发展。

六朝和唐代前期在许多方面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后阶段；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事实上人们可以称这一时期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

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

117 在唐代后期和宋代所达到的文化和制度的水平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没有很大改变。这一时期很快表明是一个停滞时期，起初中国人高踞于西方成就之上，但在后来中国人在技术上低于西方。在宋代以后中国看起来比以前的世纪变化更少，肯定比在近代变化速度加快的西方要慢得多。

古典后期中国和近代早期中国之间的过渡时期主要在 8 世纪前后，这时唐朝的衰落以及征服的钟摆开始长期指向中国是典型的王朝循环，并是以前与“夷狄”关系的重演，但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在发展着的变化 将改变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例如思想的主流开始排斥佛教并转向儒学，但其中显然有新的重点，因而唐代以后的中国哲学通常称为新儒学。中国人还在以后的一千年中再次强调使东亚文明与南亚和西方文明相区别的强烈世俗倾向。另外在排斥外来宗教 及其对“夷狄”作战遭到失败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失去了在六朝和唐代前期所有的世界主义和文化宽容精神，变成很偏狭的民族中心主义者。

在 8 世纪还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以人头为基础的税收制度转变为以土地面积为基础的税收制度，在唐代这一税制的变化加上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使得政府以后面临与前代完全不同的财政和行政问题。这些经济的变化还导致社会的大变动，直到唐代前期统治阶级都是由以武力起家的有势力的贵族家庭组成，但逐渐地领导权落入常带有商业背景通常被称为“士绅”的人数多得多的地主阶级手中。

随着旧的贵族体制的衰落，官僚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胜利。或者换句话说，在唐代随着得到充分发展的科举制度的出现，贵族社会开始衰落。直至 7 世纪主要来自世袭贵族有组织的官僚被用来支撑一个有着贵族传统的军事帝国统治。

在唐代以后，中国和“夷狄”的军人继续用武力建立王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更多靠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出身获得官职的官僚垄断着政府和文化。这意味着一个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理想被接受，这一理想蕴含在儒家学说中，但直至唐代后期和宋代之前并未在中国社会获得真正的胜利。这还意味着领导权基本上从军人手中转到文官手中，到宋代文官的主张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蔑视军人的职业。118

另一个变化是中国中心地区的转移。虽然首都通常还在北方，因为那儿有着重要的防御问题，但长江下游流域已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来自这一地区的人逐渐支配了文化和政府。文化重心也从中国农村转向城市。新的士绅阶级不必光依靠农村产业而过农村生活，他们还常去城镇做官经商，让其年轻的家庭成员在农村管理田产。

较高层次的文化自然也受所有这些潮流的影响，学术、文学和艺术更加精致，在其作品的范围和绝对数量方面也有很大发展。这一文化活动主要出自以前的文化传统，但也有其丰富的创造力，产生了自此以后似乎一直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事实上，在唐代后期和宋代所确定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政府模式直至20世纪初一直统治着中国文明。就此意义来说，8至13世纪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第二节 唐代后期

制度的蜕变

自然上面所勾勒的这些大变化是缓慢发生的，其中一些只是在唐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唐玄宗统治时期（712—756）可能是古代中国向近代早期中国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也显然是王朝循环的重要转折点，这种循环在唐代也像汉代一样不可抗拒地出现。

在唐玄宗统治时唐朝达到了第二个高峰，他统治时期在财富、威严以及文化成就方面远胜过一个世纪前唐太宗统治时期。但维持皇室和政府的花费数倍增加，收入绝对跟不上。整个政府制度运行很不顺利，很像汉代发生的情况，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税收和军事防卫开始崩溃。“均田”制（参见第100—101页）延缓了这一颓势，但不能中止这一颓势。

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皇帝赏赐大臣土地和人口（一次多达一千五百户）的习惯使得按“均田”制规定在农民中重分土地让每户有足够的份地已不可能。¹¹⁹包括劳役和军役在内的税役负担落在拥有土地逐步变小、人数不断减少的农民身上。当负担难以忍受时，农民就会离开土地或是把土地通过名义上的买卖转为一些富人的地产，农民将50%的收获作为地租交给富人，这实际上比政府的税收负担轻些，这只是加剧了当时还存在的自由农民的困境。

随着“均田”制的崩溃，与“均田”制有关按人收税制度的税收也急剧减少。政府不得不寻找其他形式的收入，例如征收

大地产和农民土地的土地税原来很轻，这时逐渐增加，商业税发展起来，按财产分为九等的户税也出现了。可是这样的税收改革并不能挽救劳役和府兵制度。服劳役的农民渐渐不再是沿运河运漕粮去北方的主要力量，723年大约有十二万募兵代替了在京城防卫的府兵，职业兵也开始代替在边防军队中的府兵。虽然劳役和府兵制度直至近代还以不同形式继续起作用，但对中央政府来说不再像在7世纪时那样重要。

虽然这些变化部分反映了与正在发展的货币经济有关的一种制度上的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困难。领有薪俸的差役和募兵使政府的开支增加，另外，通常从社会底层和“夷狄”部族招来的职业兵不可能是中国的忠诚保卫者，因为长期服役常常使他们更忠于其将领而不是忠于朝廷。这种情况使那些有野心的将领实际成为独立的地方军阀。

751年高仙芝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怛逻斯被阿拉伯人打败是东亚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以及中华帝国在五个世纪中军事力量逐步衰落的开始，这也是伊斯兰教渗入中亚的开始。大约与此同时，在塔里木盆地的孤立绿洲地区的国家中说突厥语的人也开始取代说印欧语的人。

在怛逻斯之败后不久，唐朝内部崩溃。唐玄宗时的地方将领或多或少都成为永久性的官员，控制着十大边境藩镇的民政和军事事务。其中一个地方将领有突厥人血统叫安禄山，¹²⁰他控制了三镇并通过其养母、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庇护获得在朝廷的权力。755年安禄山为控制中央政府与杨贵妃之兄发生冲突而叛乱，他攻占了京城，不满的士兵强迫逃亡的皇帝处死了被认为对这场灾难负有罪责的杨贵妃及其哥哥，这个悲惨动人的故事是中国诗人和作家喜爱的主题。757年安禄山为其子所杀，他的继承者一个“夷狄”将领又遭到同样的命运。同时唐玄宗退位，762年忠于唐王朝的军队在突厥族

的回纥人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可是唐代昔日的强盛再也没有恢复。

政治分裂与财政改革

安禄山叛乱对中央集权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反映在官方人口统计数字的下降上，754年有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而在764年仅有一千六百九十万。唐王朝也完全依靠外族的军队，不再能对中国本土以外地区真正行使权力。回纥人继续统治中亚许多地区，直至840年左右他们被黠戛斯人所代替。唐王朝对中国本土的控制也遭到削弱，地方节度使制度扩大到全国，许多节度使把自己的地区变为个人控制的领地，在某些情况下其地位实际上是世袭的，有时他们公开反叛朝廷。

中央政府还遭到内部不和的破坏。在唐玄宗统治时就已不断出现唐代的旧贵族和新官僚为权力而发生的斗争，一个世纪科举制度的成功推广以及皇后武则天的有力庇护使官僚具备了对旧的权力来源提出挑战的力量，安禄山叛乱以后业已占统治地位的官僚本身分裂成纷争不已的集团。宦官像东汉时一样也很有势力，并与官僚争夺领导权。在9世纪宦官控制了大多数唐代皇帝。

尽管有这些情况，唐王朝在安禄山叛乱以后还是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中央政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情况也没有那样混乱。这样的情况总是相对的，日本僧人圆仁838—847年间在中国，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描述了一个繁荣而又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有着后来相当晚的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可能都无法相比的严密官僚阶层和集权统治。

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的恢

复时期政府有了新的财政基础，把粮食由长江流域送到京城 121 的运输得到改进，并完全由专职劳工所从事。过去的政府垄断体制得到恢复，对盐、茶和酒的垄断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780年各种地税、人头税和户税合并成所谓“两税”，不管主人是谁，按土地每年征税两次，而不是按农民个人征税。

这一改革完成了业已进行一个世纪之久的划时代转变。自此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而不是个人成为农业税收的基本单位，收税也容易多了。中央政府可以不太注意私人产业的发展情况，因为这些产业不再是国家财政基础的威胁。实际上中国的整个土地占有制度改变了，地主不再需要在政治上有势力以保护其地产实际免税的地位，他们仅仅是由佃户耕种纳税土地的主人。换言之，这是从这时起直至20世纪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特点的那种地主所有制的开端。

最后的崩溃：五代时期

比以前更简便的土地占有和税收制度，加上政府有更多样化的财政基础以及以科举制度为基础得到改进的行政机构，这一切可以解释唐代及其后来的王朝为什么能维持长达三个世纪的循环，而与之相比西汉和东汉只维持了两个世纪的循环。但长期衰落的唐王朝迟早会完全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最后的崩溃于874年随着北方一场大暴动开始了。有一个暴动领袖黄巢是政府科举考试的落第考生，他甚至占领了首都，但这次造反最后在884年被一个突厥裔将领镇压。可是在暴动时对地方节度使所有表面的控制都失去了，907年有一个曾是黄巢支持者的节度使篡夺了皇位，使唐王朝正式告终。

接着中央集权统治比东汉王朝的垮台更彻底更快地瓦

解。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被以前的一批地方节度使所瓜分，每人都自称是中国的皇帝。总共有十四个这样的王国，而正史将之归结为“十国”。同时在中国北方五个短命王朝一个接一个迅速更替，一批有野心的将领篡位企图建立长久的政权而未获成功，这被称为五代时期(907—960)。
122 没有一个王朝存在超过十六年。最后一个王朝后周(951—960)主要被人记起的是其对佛教的大迫害，目的在于试图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

五个篡权将领中有三人属于“夷狄”——两人属突厥人，一人可能是伊朗人。因此中华帝国再次将“夷狄”士兵引入其腹地。同时“夷狄”部落又充塞中国边境地区，满洲南部的契丹人帮助“五代”中的第三个王朝后晋(936—946)获得皇位，得到的报酬是现在北京附近的十六个边境州。虽然契丹人后
123 来灭了后晋并蹂躏了中国北方，但他们不能控制这一地区。然而他们对边境十六州的控制使辽代(947—1125)在中国正史上占了一席之地。顺便说一下，契丹(Khitai)后来称为“Kitai”，俄语中对中国的叫法就是“Kitai”，并由此产生了中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Cathay”。

第三节 宋朝

宋朝的建立

有关五代时期分裂局面最有意义的事是其持续的时间只有半个世纪，而六朝时期政治分裂的局面长达三个半世纪。或许集权统治的传统和技能至10世纪时已相当有影响以致国

家的长期分裂不再可能。总之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不再有分裂为一些不断争斗的政治单位达半个世纪的局面。外来的征服只是将中国分为纯由中国人统治的南方和“夷狄”统治的北方，但到20世纪初旧制度崩溃时帝国又分裂为一些独立或自治的单位。换句话说，中国自唐代以来实际上是一个破坏不了的政治单位。

距唐代灭亡只有53年的960年，另一个将领赵匡胤成为第六个在北方夺取皇位的人，这次努力获得成功。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太祖，他建立的宋朝一直存在到1279年。976年在他去世前已统治了除两个小国以外的所有中国各地，这两个最后的小国被太祖的弟弟、继承人太宗于978年和979年并入帝国。

宋太祖建立一个长期王朝的成功主要可以归因于他致力于解决当时最严重政治问题（地方军事将领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决心。他让自己的主要将领退居次要的职位或给以适当的赏赐让他们解甲归田。在地方他把节度使限制在一个州内，在他们去世或退休后从中央官僚机构派出文官去代替他们。他还执行了将最好的军队编入京城禁军的政策，将全部军队直接控制在中央政府之下。用这些不同的方法他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军权的控制，消灭了使唐朝灭亡并在五代时期使中国动乱分裂的军阀势力。

可是宋太祖实行这些军事改革的胜利可能造成了宋代最大的问题——面对“夷狄”威胁军事上的软弱。宋代从来没有 124 汉唐时期那样的军事威力，宋代不能将越南北部（安南）并入帝国，也不能控制中亚或北方草原的任何部分。宋代甚至不能收复926年为契丹族辽王朝所占的十六州，在1004年还同意向辽交纳三十万匹两绢银的年贡。在西北宋受到羌族人的党项部落的很大压力，这些人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黄河最北内侧

的鄂尔多斯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1038年他们确定其王朝汉文名称为夏（在历史上称为西夏）。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后，宋王朝1044年开始也向西夏交纳年贡。自此在宋王朝和其两个劫掠成性的邻国之间发展出一种三边的军事和外交的对峙局面。

政府和文官

宋太祖和他的继承者在京城设立了一系列行政官职，使之比唐代的政府机构更直接地在皇帝个人控制之下。例如在唐代后期出现的皇帝左右的两个不很重要的官署这时成为政府的主要机构，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机构是学士院，原来是起草文书的机构，这时发展成为皇帝主要的顾问组织。另一个机构是枢密院。宰相继续用唐代三个最高机构中两个的名称，在此之下管理六部和下级行政机构，就像唐代的尚书省一样。另两个重要的政府机构是御史台，这个机构很快发展出一套监视政府一切行动的周密制度；以及管理国库、税收、专卖和其他财政事务的三司。与唐代不同，宋代对帝国的整个税收入以严密直接的控制。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11世纪初政府的收入是唐代鼎盛时政府收入的三倍，很快就积累了大量盈余。

宋代整个帝国的行政机构比中国历史上以前任何时期更多地集中在京城。如同五代大多数时期一样，京城在开封，开封位于大运河水系和黄河交接处附近，仍然在中国过去北方的中心地区，但比长安离出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地区几乎近了三百英里。宋代继续沿用唐代的州县制度，但增加了道125（后改为“路”）的数目。宋代道对州的监督权力比唐代的“道”大，为了确保道不会像唐代那样落入军人控制之下，这些道

所获得监督的职能和地区同军事机构的监督权明确分开。

宋太祖及其继承人有意识地把行政机构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在京城集中对全国的控制，这些做法使中国政府自此以后不仅更加集权而且还更加专制。所以以后一千年的中国历史常被称为“专制时代”，相对于以前的“贵族时代”而言。可是“贵族时代”这个说法是用错了，虽然在“天命理论”中隐含着人们有权反叛这一点，但中华帝国在强有力的统治者统治下¹²⁶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的，在实践上完全是专制的。主要有所改变的地方是其更有效率，因而更成功地集中权力。这是因为其官员的性质有了变化，不再是由贵族担任官员。

宋代政府的主要力量是其高级文官的素质。这又主要取决于在唐代有了很大发展、这时形式已很完善的科举制度，皇帝周围的宫廷宦官和其他非官僚集团被成功地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这时对在政府任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在实践中不允许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高级官吏在公事上有密切的关系，并规定禁止皇后和皇妃的亲戚以及其他皇室成员担任任何重要职务。

职务较高的文官从较低职位的能人中提拔，并允许高级官吏提名自己的亲戚就任一些不重要的职务，甚至是出钱买官。可是职务较高的文官的最重要来源是科举制度，在997年至1124年间每年平均有二百多人通过考试成为文官，可能构成了一万二千多名高级文官的微弱多数。另外，那些获得科举功名的人实际上垄断了最高的官僚职位。

科举有不同的种类，但有关文学的进士比别的仅仅强调记忆的科举科目更强调创造性和论证的技能，因而在11世纪后期最受重视，别的科举科目仅存空名。为了确保在科举考试评卷时没有个人的好恶，仔细地采取一种办法，即试卷上标号码而不是标考生姓名，以免考生暴露身份，试卷重新誊

录以便不让人认出考生的笔迹。

1065年以后科举考试固定为每三年一次，包括三种不同层次的考试。首先参加各州或国立学校主持的考试，通过这一级考试的人据说是考生数的1%至10%之间。他们再去京城参加中央政府主持的考试，大约有10%的人通过考试然后参加“殿试”，再淘汰很少一些而给未淘汰者定出等次，这将决定他们最初所任官职职位。落榜的考生通常一次次参加考试，结果，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多岁不等，不过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是三十五岁左右。

127 官员的提升依靠这样几个因素——任职时间长短、考核政绩的制度、某些与特定任职有关的特定考试、原来参加科举考试的等第以及高级官员的保荐。按照保荐制度规定，某些高级官员有责任提名提升一些有前途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可能被忽视的低级官员。被举荐者不能是举荐者的亲戚，而举荐者对被举荐者负有责任，如荐人不当可能要受到惩罚。

文官制度成功地给政府送来大批有才干的人。这一制度向有才能的人打开了有吸引力的大门，也就使这些人不会进行颠覆活动。在科举制度发现新人才这一方面还能从1148年和1256年中榜考生的名单看出来，其中一半以上的考生来自父系三代从未当过官的家庭。

主要是因为宋代完善了文官制度，中国政府相当稳定。赵匡胤960年的篡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在以前，皇帝不断被他的大将、皇后和其他有权的大臣夺去皇位，960年以后，这种情况不再出现。王朝继续被外来征服或民众革命所灭亡，皇室的一些成员将皇位抢来抢去，但不再有臣下成功地篡夺皇权的事例。

经济问题

尽管宋代比以前任何王朝更繁荣，但在宋代建立一个世纪之后，过去王朝循环通常所有的行政机构的衰败和财政困难又再次出现。在前六十年内政府的收入迅速增加，至1021年上升到一万五千零八十五万贯之多，每贯大约价值相当于用绳子串好的一千文钱，但后来收入逐渐下降，至1065年政府收入几乎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关于这种下降趋势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在一个基本是农业经济的社会中，人口的增加使税收来源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但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还耗尽了有限土地资源上增加的产品。结果，更多的人要吃饭，更少的剩余产品交给收税人。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土地更加集中在大地主手中，虽然自唐代中期以来征税主要按土地而不是按人口计算，但负担仍然主要落在只有最少经济收入的小农身上。人口的增加只是意味着土地更少以及耗竭地力，结果许多小农沦为乞 128 丐或是成为地主阶级土地上的佃农。虽然在理论上地主与农民同样要交税，但他们能通过与官府的关系经常不交税或是逃避部分负担，因此国家的收入随着地主产业的增加而不断减少。

可是政府的支出却不能调整以适应收入的减少。像过去的王朝一样，政府的开支随着宫廷机构扩大花费更加奢华、政府机构的发展以及官僚阶层的人数增加而慢慢增多。有些历史学家将宋代的财政困难归于为求和付给辽与西夏的年贡，但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年贡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匹两绢银，这甚至从未达到政府预算的 2%。一个大得多的开销是军费开支，用来代替唐代花费相对小一些的府兵制的职业

兵事实证明不仅无用而且花费大。宋代军队马匹不足，其成员主要来自乞丐，因而不能与北方“夷狄”士气高昂的骑兵相匹敌。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增加军队的人数，至1041年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要用去近80%的政府预算。

王安石变法

因为财政上的困难，政府给官员的俸禄不足，这结果败坏了道德，鼓励官员滥用职权，可能还造成对宋王朝后期有破坏作用的官僚党争的发展。然而出现党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时由官僚而不是由贵族、皇后或宦官控制政府，他们面临着很困难的财政问题和危险的军事形势，自然因政策问题有很大分歧，但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些政策分歧，唯有通过党争和皇帝的异想。

1069年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神宗任命能干但固执的王安石(1021—1086)为宰相。王安石是遭到保守派反对的改革派人士，保守派支持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固定官僚程序。王安石立即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变法以扩充政府的财政并增强其军队。

王安石让政府从事几个世纪以来都不曾考虑的经济事务，他让政府在一地区买规定的产品到别的地区去卖，以此
129 稳定物价并为政府谋利。他规定政府以20%或30%的利率借钱给农民，这在当时是很低的利率，这样做可能有助于使较穷的农民能维持下去，但肯定把借贷之利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转入国库。他进行新的土地丈量以消除过去不公正的现象并按照农产品的数量制定了不同等级的土地税标准。他将当时尚存的劳役改为税收，他还为收税估定所有个人财产，并试图调整价格，通过政府的当铺向小业主提供利率相对较低

的贷款以及实行迫切需要的对水的控制。

在军事方面，王安石在保甲的名义下恢复了六朝时期集体担保的方式，规定在保甲制下每个保甲要自己花钱提供一定数量受过训练有武装的民兵。为建立一支骑兵，他让政府花钱采购马匹再分给中国北方的农家，作为回报每个家庭派一人在需要时带马组成骑兵。

王安石还扩大了政府所办学校的数目以与这时统治教育的私人资助的书院竞争。他坚持认为科举考试应该少考记忆和文学才能，而应该直接考政策和行政上的实际问题。像汉代的王莽一样，他宣称他的改革符合古代经籍的内容。

与王莽相仿的另一方面是王安石被作为社会主义者受到指责和赞扬，但其动机并不比他的著名前辈具有更多社会平等的思想。他的一些改革例如等级土地税、低息信贷制度以及完全放弃劳役制等显然是在经济和行政上向前迈出的步子，而其他的措施例如调价、政府控制商品以及集体担保和民兵制度只是以前制度的恢复。改革自然激起遭到损害的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集团的坚决反对，来自地主阶级的大部分官僚也表示反对。当时大多数有名的士大夫如司马光、欧阳修和苏东坡也反对这些革新，王安石还遭到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严厉指责。

然而官僚和文人对变法的反对基本上不可能是阶级利益的不同，这更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官僚国家行政上天然的惰性——更趋于守成不变，自此以后这成为中国政府的特征。改革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并损害了现有制度中的各种控制和制衡手段。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原因，即使改革并不真正是革命性的且常常只是以前做过的事的恢复，但这些变法还是在以后 130 几十年中激起政治上激烈的党派之争，自此以后不同党派争吵不休。1085年宋神宗去世，保守派重新掌权，破坏了王安

石的改革。此后改革派和保守派轮流执政，经过激烈的斗争使变法可能取得的财政和军事上的成果付诸东流。这场官僚间的争战一直延续到他们在一场更大的灾难中被淹没时为止。

南宋

皇帝宋徽宗(1100—1125)是艺术的热心赞助者，他本人也是位有才干的画家。¹³¹徽宗管辖着一个在文化上很繁荣且又奢华的朝廷，这又进一步耗竭了政府的财政。在他统治后期，帝国遭到人民暴动的削弱，但主要的打击来自外部。除了辽以外，称为女真的通古斯部族逐渐在满洲东北部兴起。1114年女真人起兵反辽，第二年采用了汉语的朝代名金(1115—1234)。宋朝为了收复两个世纪以前被辽割去的边境十六州，愚蠢地与金缔结反辽同盟。可是中国军队没有获得胜利，而女真人的骑兵于1125年彻底灭了辽。当宋对自己分得的战利品太少表示不满时，女真人于1126年出兵攻占开封并追击中国军队过长江。然而南方的许多河渠成了不利于女真骑兵的障碍，女真人最终撤出南方，他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徽宗的一个儿子历史上叫高宗(1127—1162)，他在南方恢复了宋王朝的统治，1138年在现代浙江的杭州建立了都城。自此以后宋帝国限制在淮河以南的地区，后来被称为南宋(1127—1279)，相对于在北方统治差不多整个中国本土的北宋(960—1126)而言。

一度时间南宋在能干的将领岳飞指挥下不顾一切地用武力收复北方，岳飞被现代的爱国者当作民族抵抗外来统治的象征。可是以秦桧为首的议和派占了上风，岳飞被处死，

1141年与金签订了和约。这个和约规定宋是金的藩属国，应该交纳年贡二十五万匹两的绢银。1165年金征服南方的失败使年贡减少了十万匹两并使宋不再是完全的藩属国，但1208年宋讨伐金的一次更大的失败使年贡增加到六十万匹两，还交纳一次性赔款三百万匹两。

虽然南宋是个地理上不完整的国家，政府也因为分为和战两派而受到削弱，但南宋几乎在各方面都比北宋富裕。南宋占据了中国经济的腹地，同时这是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南宋的军事预算比北宋多，所供养的官员也多。南宋在杭州的都城比开封壮观得多，甚至在杭州度过了鼎盛时期落入“夷狄”手中后，马可·波罗还为之震惊，称之为世界上“毋庸置疑最精美最华贵的城市”。¹³²

南宋在其存在的一个半世纪中与以前的王朝一样未能摆脱王朝循环，整个南宋时期行政管理上在不断衰退。尽管如此，政府因为有坚实的财政基础以及实力雄厚的文官，所以没有因内部压力表现出崩溃的迹象。与北宋的情形相似，南宋是被强大的外部敌人蒙古经过多年大规模的战事才灭亡的。

第四节 商业革命

从8世纪帝国的鼎盛时期至13世纪整个中国最终为蒙古人所征服这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史表明国家的军事力量逐步衰落，但这仍是制度和文化有重要发展的时期。隐藏在这一发展后面的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的发展使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这一经济惊人发展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口的总体增长。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的人口数字一般来说更多表明行政机构所知的情况而不是人口的真实情况，但这些数字还能表明当时人口的增长。事实上南方的人口在8至11世纪期间大约增长了两倍，而中国的总人口在北宋时可能就已超过一亿。

技术进步

在宋代农业生产力也有很大提高，例如11世纪初从越南南方的占城国传入了更快成熟的稻种使得能够一年种两熟作物，因而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另一个因素是宋代修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这样做大大扩大了水田耕种区域。在山坡上种的茶树也有增加，12世纪前后棉花开始成为一种常见的作物，扩大了中国的纺织品来源。

除了农业以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进步，像纺织业一样技术发展水平已很高的漆器和瓷器的生产得到进一步完善。
133 在宋代后期开始用算盘，自此以后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技术上的另一进展是火药用作爆炸性的武器，至11世纪初发明了各种地雷、一种手雷以及其他爆炸火器，这有助于中国人弥补其骑兵的不足。

印刷术的发展虽然对经济的发展只起了间接的作用，但却却是最重要的技术上的进步。出现这一伟大发明最初的动机是想确定并传播一些重要著作的真实文本。这可能受到从碑铭上拓印碑文一事的影响，拓印时将一张薄薄的潮湿的纸紧贴石碑，将墨迹拓在凸起的纸面上因而出现了黑底白字原始
134 的刻版印刷。可是实用印刷术可能是从大尺寸的官印刻制发

展而来的，到7世纪发展为整页木版印图片或文字，一块块不间断的印版就能印出整卷的书。印出来的长纸片按固定间隙折叠起来并在另一边将之装订在一起，这就成为总是对折页的标准中国印书。

868年在中国印了整部佛经，至10世纪中叶在四川和中国南部的一些独立政权印了所有经学著作以及全部佛教三藏经书。在宋代，印刷术已极为普遍，各种类型的印刷著作大量出现。

因为汉字数目很多，中国人通常认为最简便的方法是雕刻整块木版用于印刷。15世纪这一发明通过中亚和中东传到西方，欧洲人很快抛弃了木版采用活字，因为他们所用的字符不多。但实际上木活字、瓷活字和铜活字早就在东亚发展起来，1030年前后在中国出现，15世纪前期在朝鲜得到广泛使用。

贸易的发展

8至13世纪经济大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贸易的巨大发展，这使得各地能更加专业化因而增加了总的产量。在唐代前期中国人仍带着传统的轻视商业的看法，政府企图控制并限制贸易。但到唐代后期和宋代贸易摆脱了政府的束缚，贸易活动不再局限于过去政府的市场范围内。到宋代，像现代中国一样主要街道两侧全是商店，开始第一次出现了大的商业城市，也就是说与以前的中国城市不同，人口聚居的中心不再主要是政治行政中心，而主要是大的贸易活动中心。

以前地区间的商品交换主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垄断专卖以及其他经济控制措施来管理，私商基本上买卖奢侈商品。然而到唐代后期和宋代私人贸易有很大发展以致使政府的商

业活动相形见绌。批发商将各地多余的产品和手工业品卖给行商，行商范围很广，从游街串巷的小贩到有广泛货栈网为其服务的大垄断商人。大行商通过各地的批发商把货物批发给众多的店铺和商贩。
135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行会也在增加。这些行会称为“行”，因为此名来自唐代前期市场上按街道(行)组织的商人团体。最重要的行会通常是那些运送和出售粮食、盐、茶和丝绸这些基本商品的行会，或是具有银行存款贷款作用的行会。11世纪京城范围内有一个行会由一百家运粮商人组成，据说这些商人每年营业额有一千万贯，由此可见大行会活动的规模。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当时商业发展的一个突出方面并可能对整个商业革命也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借道中亚与西方的贸易自汉代以来继续进行，到这一时期与中国北方和西北近邻国家的陆上贸易大大增加。这些地区的民族喜爱像丝、茶这样的中国产品，数百万汉族人被并入辽、西夏和金大大提高了这些商品的需要量。这些出口品所获利润使宋朝能抵得上交纳给北方国家的年贡并能用来从草原地区购买中国防卫所需的马匹。

海外贸易好像对这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更大的刺激作用。与印度和中东重要的海上贸易自东汉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在8世纪这一贸易开始迅速发展并开始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上大规模远洋贸易的第一时期。16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在亚洲南部沿海地区加入这一有利可图的贸易标志着西方历史上海洋阶段的到来。

造船和航海技术上的改进有助于说明海上商业为什么得

到发展。用帆和桨的大船投入使用，发展了一套横向水密船舱体系使船不容易沉。至少早在 3 世纪中国人就知道指南针，中国有一段文字清楚地表明 1119 年在南方贸易活动中已经使用了罗盘，几十年后经过阿拉伯人之手罗盘传入欧洲。
海洋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后西亚人势力的激增，事实上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起初主要控制在 136 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和阿拉伯人手中。但对这一贸易最起作用的可能是唐宋时期中国从未有过的繁荣，这必然使商人来到中国港口以及从日本直到东非各地不断需要来自中国的产品。

远洋贸易的发展很快改变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趋向，曾经是边远不重要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逐渐成为对外贸易和接触的主要地区，而曾是中国大门的西北省份开始降到边远内地的地位。在宋代，海外贸易集中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几个大城市，受到市舶司的监督。为了能征收关税将对外贸易限制在某些官方控制的大港口的制度开始于 8 世纪，在宋代这些关税成为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唐代后期和北宋时期大部分外贸通过广州进行，而在南宋时期，位于福建茶叶和瓷器重要生产地区附近的泉州（马可·波罗称刺桐）成为主要港口。

在 9 世纪朝鲜人可能掌握了中国与朝鲜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而阿拉伯人和伊朗人控制着中国同南亚和西亚之间的大多数贸易。这些在港口城市中指定区域居住的外国人有自己的习惯法，这一制度与近代的治外法权相似，不过并无外来文化优越的意味。西亚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并建造了清真寺，外国商人的社区可能相当大，在 8 世纪据文献记载在广州和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城市扬州有“积千累万”的外国人。在宋代中国人逐渐开始成为海外贸易中的主角，至宋代后期中国

控制了与朝鲜日本和的贸易。因此原先被陆地封锁的中国人慢慢成为一个海洋民族，他们的船舶开始远航，很快一路航行到了非洲。

这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主要作用。除了质地优良的棉织品外，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原料——来自草原地区的马匹和兽皮以及来自热带地区的宝石、香料、象牙和其他奢侈品。另一方面，除一些矿产品外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像朝鲜和日本这些其较高文化来自中国的地区迫切需要书籍、绘画和艺术品；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对中国铜钱的需要量也很大；丝织品和瓷器在世界各地受到高度评价。¹³⁷ 宋代瓷器的碎片在桑给巴尔这样远的地方都有发现，据说在波斯湾和埃及的中世纪商业城市遗址中也到处可见这些瓷器碎片。

先进的货币经济

在唐代后期和宋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突出方面是货币制度的大发展。铜钱早在周代后期就已出现，自此以后一直得到广泛使用。但这时铸币的数量大大增加，货币制度也更加复杂，结果使得货币在贸易和政府财政中所起的作用更大。

与绢谷相对，每年税收货币数量在749年只有二百万贯，但到1065年宋代政府所收货币税收达到三千七百万贯，到南宋时政府收入中货币税收完全超过了绢谷这些实物税收。与以前的大多数中国政权一样，唐代前期几乎完全依靠农业税，但到北宋时期来自政府专卖和各种商业税的收入开始超过农业税，而到南宋时期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商业。虽然以后的王朝表明比宋代更依靠农业税，但在宋代作为国家收入来源

的商业的大发展使中国政权从这时起有了第二个主要的财政支柱，因而也就使其比以前的王朝在财政上更稳定。

唐代后期和宋代货币使用的迅速发展给中国货币的来源以很大的压力。在唐代每年铸币平均在十三万至三十万贯之间，至10世纪后期每年产量为八十八万贯左右，到11世纪年产量高达一百八十三万贯。甚至到这时钱币的需要量通常还要超过产量，为满足这一需要，政府有时企图限制铜只能用来铸币或是减少一貫钱中铜币数目使其分量不足。政府还试图禁止铜币出口，当这样做无效时就对铜币课以50%的出口关税。在四川和山西这样的边境地区甚至还试验用铁币，徒劳无功地企图在中国与其“四夷”邻国的钱袋之间设置一道“铁幕”。金银的使用——金粒按重量计，银则制成按规定标准重量和纯度的银铤——有助于解除对铜币的压力，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只是偶而冶铸这些贵金属。

解决货币问题最有趣的方法是纸币的发展，这最恰当显示出先进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和大行商面临着长距离运送大批钱的问题，铜钱太重运输不够方便，结果为满足需要出现了各种纸信用单和纸币。早在811年唐朝就发行所谓“飞钱”以支付在遥远地区所买的货物，这些汇单在京城兑现。这种在唐代出现的制度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因为这种方法简便，这些政府的汇单在一些想带钱的商人中互换。

同时另一种纸币在私人银行家手中出现，他们发行一种收3%手续费的存款票据。这些票据因为方便就按面值自由流通。四川成都银行家发行的票据最为著名，1024年这些票据为政府所接受时也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真正纸币。政府纸币发行多种，其面额在二百至一千钱之间，通常收取3%的手续费，而且由于纸币易于破损，有效期限制为三年。

成都纸币最初发行的面值限制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贯，

在早期还有三十六万贯现钱作其后盾。宋代还发行了其他各种不同的地方纸币。可是在有财政困难时，政府不能克制住印刷超出其兑现能力的更多纸币的诱惑，因而开始出现了以后很快在整个世界范围都出现过的现象。在货币发展和经济的其他许多方面，宋代所取得的成就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其他时期一般都未能被达到也没有什么具有实际意义的突破。

第五节 社会与文化

士绅阶级

中国的商业革命没有像后来欧洲的商业革命那样使社会和政府发生重大变化，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商业革命在一个有高度组织官僚化的帝国内发生，很容易适应这一经济发展并从中吸取新的力量，而欧洲的封建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却相当不能适应经济的大变化因而崩溃，造成欧洲社会的基本变化比中国大得多。另一方面，与中国8至13世纪经济的大发展相适应，社会和文化也出现了很重要的变化。因为这时
139 出现的社会直至19世纪都保持了中国的特征，此外这一社会又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总之，12世纪的欧洲文化好像只是19世纪西方很遥远的前辈，而12世纪的中国文明看起来却只是西方人19世纪所见中国的一个更年轻更活跃的阶段。

六朝时期和唐代前期高度贵族化的社会向宋代基本上非贵族化更平等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占有和税收制度的变化。在这一变化出现前，土地大部分由自由农民和世

家大族分别占有，自由农民实际把自己全部的剩余产品和劳动作为赋税交给政府，而世家大族能使其土地免交大部分税，还能指望得到其庄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同时因其财富以及有独立的力量作基础能够影响政府。在出现这一变化以后，政府不再反对私人积聚田产，而私人的产业也无需特殊的权势就能得到保护，结果一大批中小地主产生出来。另一方面，新的简化了的税制使旧贵族很难保持其免税的地位。

商业和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旧式自给自足的田产不再是一个有效的经济单位，同时大地主的政治权力由于科举制度在产生领导人才方面越来越起作用，也由于权力越来越集中在皇帝及其官僚手中而不断缩小。旧贵族逐渐融合在人数多得多的士绅或地主阶级中，分散的小地块而不是大田产成为最常见的土地占有方式，依靠地主田产生活的农民是佃农而不是依附民。

新的士绅阶级比旧的贵族对农业财产的依赖要少，实际上自宋代以来农业好像在经济上就不是赚钱的营生。因为拥有土地地位显赫以及地产相对比较安全不会遭政府没收，剩余资本通常都投入土地。但是，这些士绅地主的财富常常来源于商业，并能靠其在政府所任的高官得到最好的保护。士绅不单纯是地主阶级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有效地把自己的财富转变为在中央政府的权力，经过科举考试之路获得政治上的高位。士绅作为一个阶级直接地靠其知识成就而只间接地靠其财富和产业获得全国性的政治影响。140

与旧贵族另一不同之处是到宋代世袭地位已相当无足轻重。在一个经济上更多样化的社会中社会流动大大增加，并因平等原则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整个社会的思想状态是不同的，这反过来又影响了高层次文化的精神。

神。

社会的城市化

新社会的另一特点是其不断的城市化。在12世纪初有五十二个居住十多万户人家的大城市，而在8世纪中期只有二十六个这样的大城市。可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城市化不在于城市的数目，而是从这时起城市和城市居民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与旧贵族不同，新的士绅很大程度上在城镇生活，他们与其说是乡村地主不如说更像在外地主。因为所有的官员和富商都在城镇生活，所以领导集团中大部分人都集中在城市地区。因而高层次文化自然也就高度城市化，发展出来的兴趣和态度看来更具有城市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的特征。

与军人看法相对的文人看法的胜利是新的城市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直到唐代前期中国人像其他强盛民族一样对其军事力量颇为自得，而从宋代开始中国文明的特点是非常强调文人的成就而轻视军人生活，这种情况看来也在西方现代城市社会中出现。人们认为军人是由社会的糟粕来充任，正如中国人所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有意义的是唐代以后的四个王朝中只有两个“夷狄”王朝是四处远征的。

在城市环境中，高层次文化比以前更复杂多样，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文化活动之中。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娱乐自然惹人注目，像骑马狩猎这样的乡村娱乐活动在西方一些团体中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大多数从事农耕的中国人差不多在一千年前就不喜爱这些乡村娱乐。同时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开始表现出西方人在开始城市化所具备的那种喜爱自然美的浪漫色彩。

141 宋代的城市生活是自由奢华的。城市不再是由皇宫或其

他一些行政权力中心加上城墙周围的乡村组成，相反，现在娱乐区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在这里可以发现有无数的酒店、茶馆以及精通各种烹调技艺的饭馆，还有与日本后来的艺妓差不多的职业卖笑女人的居处。这些居处和饭馆常常变成妓院，那里还有戏剧、木偶戏、杂技、说书和其他各种娱乐活动。

也就在这时最早发现了城市社会的弊端。在外地主和佃户在中国农村造成的问题延续至今，在城市贫民中出现了众多的乞丐。唐代后期出现了私人慈善机构，照料孤儿和穷苦老人，埋葬倒毙的乞丐，这些机构在12世纪初由国家主办并获得很大发展。宋代军队是安置无业者的主要场所，但政府还为救济穷人提供工赈并开仓赈济。142

妇女地位的变化可能也与文化城市化有关。妇女一直依附于男子，而在上流阶层集中的城市里妇女的劳动不像农村那样重要，可能这就使得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妇女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这种变化表现在当时纳妾制度的发展，社会上更进一步地反对寡妇再嫁以及上流阶层中流行妇女缠足的习俗。当女孩很小时，就用布紧紧地缠足，脚逐渐弯曲直至脚弓被扭坏，除大脚趾外其余脚趾都向下弯曲。这就使之成为只有正常脚一半大小的“金莲”，实际使女孩终身走路不便也就因此要求男子有钱能养得起这样无用的玩物。外国人看到中国妇女缠足和蹒跚行走的样子很反感，而中国男子却因缠足产生出强烈的性的联想。这一习俗逐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143

艺术思潮

尽管唐代征服地区很大以及宋代与外界的商业交往很广

泛，但8至13世纪的文化受外来新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这时文化的特点是本民族传统丰富复杂的再创造，在艺术和其他领域都是如此。建筑仍然保持原有的柱梁结构，不过多层建筑已很常见，原来笔直的瓦顶逐渐在两端翘起。在佛教影响下大量出现的宗教雕塑作品在宋代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峰，然后迅速衰落。工艺品也很繁荣，宋代的青瓷和其他瓷器在全世界都很闻名。

然而，绘画的发展最为丰富，自宋代以后大多数中国人都很有理由地认为这是他们最伟大的精美艺术品。其源远流长的丰富传统可追溯到汉代，中国作画的法则在宋代已完全定型，绘画作品本身也达到一个后来王朝不可能超越的完美程度。进一步来看后来的中国画种类很多也很有活力，但只要视野开阔就会发现这些似乎主要都是在宋代已得到充分发展的那些内容基础上的变化。

有着浓烈肖像画成份的佛教画在有宋一代仍很有地位，不过其很快就让位于纯粹的世俗艺术。在世俗艺术作品中，强调的重点从人像和人的活动转为风景，人至多只是画中的次要内容，作一丛翠竹这样自然景物的陪衬。方法完全是印象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色彩被认为无关紧要，以黑白画为主。艺术家有目的地选择细部集中力量描绘他认为是主题本质的东西，一幅景物从整体上表现自然，一丛翠竹就是宇宙的缩影。道教和禅宗对这一艺术的影响是明显的。

宋代绘画的风格与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的艺术相比对我们来说完全是近代的，整个宋代对艺术的态度基本上是近代的。艺术不再是宗教的婢女，绘画不仅是神像和建筑的装饰，有其自己的艺术价值。画家不是无名的工匠，而是有名气受人尊敬的艺术家——通常是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社会地位的人。

唐代后期和宋代著名艺术家很多，最有名的有唐玄宗时代的吴道子、北宋时的米芾(1051—1107)和南宋时的山水画家马远和夏珪。中国人喜欢类聚群分的习惯也用于艺术，有许多著作论述南宋和北宋的山水画流派。人们还产生了收藏艺术品和古物的很大兴趣，公私收藏数量都很大。著名的收藏家在重要的画上盖上印章以表示其所有又作表明作品真伪的凭证，因而也就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作品的价值。还有人编写了艺术品的详细目录和学术性的评论著作。收藏古物的爱好也刺激了人们仿制古物，这本身成为一门艺术类别。

文学

在中国的上流社会中会作画是一种受人称赞的才能，另外俊秀的书法和文学才能特别是作诗的才能实际是必不可少 145 的。书面文学总是很受人们尊重，作为获得名声和财富主要门径的完全采用书面考试的科举制的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书面文学的声望。在10世纪私人学校和书院有很大发展，印刷术的传播自然使各种文字材料容易得到，因而也就使文学和其他学问都得到普及。

自六朝时期以来一直很流行的诗繁荣于唐代，在形式上更自由而不受束缚。诗在8世纪通过李白（李太白，701—762）和杜甫(712—770)可能发展到了顶峰。李白是个道教徒，嗜酒而放浪，另外他还是个意气消沉的行吟者。从关于他死后的一个人生不足为凭的故事可看出他为人的态度：据说他在船上因酒醉恍惚想捞出水中月亮的倒影而淹死。杜甫是个很严肃的儒家道德家，他深深地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和生活的不平。毫不夸张，唐宋时期还有其他几千位诗人给后人留下了自己 146 的名字。诗风简朴用口语写诗的白居易(772—846)在整个东

亚都很有名。到宋代因为总是重复那些内容，诗变得总是老一套而失去了一些活力，但还是有像苏轼（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苏东坡，1036—1101）这样的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大散文家和哲学家。

当诗越来越没有新意时，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原先作为民间歌曲歌词的词起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词有许多格式，比较容易使用口头语。起初词被文人们所轻视，但到宋代所有的大诗人包括苏东坡都写词。但这种形式很快也成为老一套，一种新的歌词，即散曲开始代替词的地位并成为后来蒙古人统治时和明代最受人喜爱的一种韵文形式。

唐代后期和宋代也是正规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韩愈（768—824）反对六朝以来出现的华丽排比的散文风格，采用一种朴实直率的风格。可是这种风格有些过于古朴，趋向于恢复古文的样式，这样就扩大了汉语书面与口语之间的鸿沟。但为使散文写作从受束缚的矫揉造作中解放出来的斗争继续在进行，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词作者欧阳修（1007—1072）认为，作家应该用他以为最好的形式完全自由地表达思想。当时出现的用俗语写哲学著作以及记录禅宗大师的对话无疑也与这一观念相符合。

这一时期还开始出现了两种新的文学形式——通俗戏剧和话本。虽然传统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视之为粗俗不堪之术，但这些文学形式很快达到相当的水平，发展成为后来成熟的戏剧和小说。当时这些通俗文学形式的出现显然与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文化整个的城市化这些因素有关。

唐代后期和宋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多数有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像李白和杜甫一样，也都是官员，即使有时他们很不得意。反过来说，大多数有名的政治家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家。王安石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同时也是著名

诗人。在以前，诗人、学者和政治家的作用分得很清楚，但宋代理想的儒家类型是“通才”，一个人同时是学者、诗人和政治家，可能还是哲学家、画家。

在唐代后期和宋代，以前的那些学术形式得到很大发展和丰富。人们比以前更热情地编纂正史，并有新类型的史书来作补充。历史文献的数量相当多以致有必要作一次新的努力编一部中国以前历史的通史。与王安石对立的政治家司马光(1018—1086)编的《资治通鉴》是自司马迁以后第一部通史。这是一部严格按编年记述的历史，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分294卷。这部书名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家的整个哲学。

这部巨著的材料12世纪在著名哲学家朱熹的指导下被节录重编，编成的著作《通鉴纲目》，它从现有的材料中挑选来论证其历史观，所强调的内容主要是其道德观念。袁枢(1131—1205)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是另一部根据同一材料重编的著作，但按大事件划分内容，这很像近代西方历史著作的编写方法。这三部著作成为后代中国学生的历史入门著作。

在这时，早期编百科全书性质著作的趋向也大为高涨。801年编成了《通典》，在以前编纂的基础上961年编成了有关唐代政府和经济材料总汇的《唐会要》，这些著作成为各种百科全书著作的典范，自此以后各种百科全书著作作为过去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材料来源补充了正史。

第六节 新儒学

新思潮

在思想观念和正统哲学方面，唐代后期和宋代产生出的思想和哲学模式显然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被西方称为新儒学的复杂哲学思想就是在这几个世纪的思想活跃时出现的，从这时起几乎一直是中国思想的核心，直至20世纪在西方思想和革命性的政治与社会变动的影响下崩溃时为止。

在重新恢复对儒家哲学兴趣的背后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人在长期败于北方“夷狄”的时期将注意力转向内部。

148 在唐代前期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对外部世界感到好奇并能加以容忍。713年伊斯兰教哈里发派来的第一个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因宗教原因拒绝按传统方式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而中国人也愿意放弃自己的要求。而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中国人在19世纪对外国使节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通融态度。可是到唐代后期对“夷狄”逐渐增长的畏惧和不满越来越明显，佛教因其是外来宗教总是遭到批评，但这时这种对佛教的攻击更加常见且更有影响。当时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是819年大学者散文家韩愈向皇帝上了一个著名奏章，批评皇帝敬奉所谓佛骨。二十年以后发生了841年至846年对佛教的大迫害。

恢复对儒学兴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旧的中国政治理想的明显胜利。六朝时期政治上的幻灭这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在一个重新建立的官僚国家中对受过教育官员的需要使得科举制度重新建立，并重新重视作为科举考试重点的儒家

著作和思想。当然儒家的观念就是在佛教的鼎盛时期也从没有消失，但是在帝国再次统一以后其力量和声望都在慢慢增长。到9世纪知识阶层完全受儒学影响以致他们逐步排斥道家不问政治的思想观念，并抨击他们所认为佛教不关心社会的那些方面。

可是新儒学的兴起不是周代或汉代存在的儒学思想观念的简单继续，这部分是令人兴奋的重新发现，部分是有创新的发展。对学者来说很明显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与经籍中所描述的社会完全不同，新儒家们希望再体验原来的理想——重建他们相信古代出现过的儒家理想社会，但他们是按自己所在时代的态度和兴趣这样做的。

新儒学思想家受前几个世纪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占很重要地位的一些佛教观念的强烈影响，他们中许多人在转向儒学前信奉佛教或道教，有些人甚至住在禅宗寺院中。佛教使人们按玄学的方式思考问题，新儒学之所以新，其中有一点是其给儒学增加了玄学的内容，自由地采用了佛教的思想和道家的术语。

就像汉代的儒学有当时折衷主义的内容一样，新儒学来自于当时的不同思想流派，然而它基本上排斥道家的长生之术以及佛教关于神和来世的观念。新儒学像古代中国人一样强调世俗的社会和政治事务，尤其是伦理道德，并重新倡导中国人思想中旧的不可知的无神论的倾向。

新儒家及其思想

9世纪的著名散文家和批评佛教者韩愈可以称为第一个伟大的新儒家。然而哲学最活跃的时期是在11和12世纪，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在这时出现。例如陆九渊（又叫陆象山，

1139—1192)发展了一种像禅宗那样强调个人直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明代达到了顶峰。在11世纪，伟大改革家王安石代表一种务实进取的儒学，他的同时代人学者欧阳修和诗人苏东坡是其他重要哲学流派的领袖。

在王安石的反对派中有一个特别的哲学流派最终获得胜利，成为正统的新儒学。在这一思想流派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是周敦颐(1012—1073)，他从基本上不属儒家的《易经》中吸收了“太极”的说法，画了一张宇宙运行图表明阴阳五行如何从中产生。程颢(1031—1085)和程颐(1032—1107)兄弟使这一玄学更加复杂，程颐还有一个功绩，即选择了两部在一定意义上是由韩愈重新发现的著作——《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再加上《礼记》中的另一章《中庸》和孔子的《论语》组成四书，从此成为儒学的主要经典，并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教科书。

这一学派的最后集大成者和组织者是朱熹(1130—1200)，他可与阿奎那斯^①相比，总之是位完善的儒家学者。正如我们所知，他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作为政治家发挥过短暂的带有戏剧性的作用，但最主要的他是古典时代以后的注经大家，中国重要的哲学家。他对新儒学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在东亚他的思想常被称为朱子哲学。

在朱熹学派的新儒学玄学中，万事万物都被看作有着各自的“理”和“气”。当“理”提供房子的样式后，实际的房子就可用砖木的“气”建造而成。所有的各种“理”是无限、无始终、独一无二的“太极”的一部分，“理一分殊，若月印万川。”

^①阿奎那斯(1225—1274)，意大利天主教僧侣，是13世纪影响最大的经院哲学家，著作有《神学大全》。——译者注

佛教思想的影响也很明显。宋代的新儒家很接近佛教因而他们相当重视这种玄学，他们仔细地将太极与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精密系统化，并发展了可以引起人们联想的佛教轮回理论。但与以前的各种儒学一样，新儒学的核心是将其思想运用到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制度中。对后代那些或许部分是由于冷漠而毫无疑问愿意接受宋代玄学的人来说，这一学派的伦理和社会观念确实重要。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只需要教化和自我发展，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因此需要严格控制并强行给以灌输，这两种不同观点之间旧的冲突到宋代愈益严重。朱熹及其学派支持孟子的观点以此解决了这一争论，他们认为作为人性的“理”自然是纯洁善良的，由“理”发展成五种基本美德，可以归纳为仁、义、礼、智、信。但一个人“理”的珍珠总是在他的“气”的污泥中发现的，这就需要擦拭使之充分显出原有的光泽。因此虽然自我修养更为重要，但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儒学，也就是过去一千年中所了解的儒学，到宋代的新儒学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内容主要强调孟子和宋代文人官僚的观点。这是一种特别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观，强调在《孟子》一书中最早提出的五种人伦关系，这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除了最后一种关系以外，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尊卑关系。其次还有儒家的仁爱家长制的政治理想，国家被看成是家庭的扩大。统治者的权威被看成像父亲一样主要是道义的，就像孟子所坚持的那样。最后是在文官制度和科举制中所制定的官僚化的理想，按照具有良好品行和德政这些古代原则培养出的有道德的儒生应该来指导并治理社会。他们有责任将公共事务置于私人利益之上，正直地规劝天子，甚至个人甘冒风险。

文化的稳定

在朱熹去世后，他对新儒学的综述逐渐获得固定的地位。1313年朱熹对经籍的注解成为标准文本，文官考试中的答卷必须与之相符，因此朱熹的重要学术成果及其哲学观点阻碍了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朱子哲学因传统上对过去和书面文字的尊重而得到加强，一旦被定为正宗，就表明这是对思想的束缚，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僵化。

因而新儒学有助于使近代早期的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稳定和传统的社会，这一社会与欧洲相比变化如此之小以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接受了认为中国总是“不变”的荒谬说法。宋代以后中国文化和制度变动的缓慢使国家19世纪在西方文化的进攻面前显得软弱，在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发展相当可观，因此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相对来说所处的惰性状态通常即使不被看作是民族耻辱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一场历史的悲剧。然而也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对生活在这一长时期的许多代中国人来说，他们所享有的政治、社会和精神上的高度稳定性可能胜过在这几个世纪中欧洲人生活和思想的那种动荡不定的混乱的状态。生活在由迅速变化的西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很不稳定的世界文明中的现代人，可能还会带着羡慕的眼光来看13至19世纪间中国的和平和稳定。

问题依然还是中国是如何才能保持这样长时期的文化稳定的。主要的原因也许是中国人在13世纪使政治、社会和思想各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这是一种在当时思想和技术条件下的完善状态。这一平衡很牢固，只是到19和20世纪在外来的

强力打击下才被破坏。中国人很自豪地看待他们文化的黄金时代，这种态度可能是正确的，当时文化的稳定程度是其他任何发达文明都从未能达到的。

152 第七章 中国与“夷狄”：蒙古帝国

从13至19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当稳定，三个统治家族控制了三个朝代的政权：元（1271—1368）、明（1368—1644）和清（1644—1912）。混乱主要在王朝衰落并更替的14、17和19世纪发生。

然而这种政治稳定的情况有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元代和清代是外族征服者建立的王朝，他们作为帝国权力的合法统治者控制着人口大为增多的中国。显然，中华帝国不仅包括长城以内的农业区，而且还包括亚洲腹地的边缘地区，尤其是还包括蒙古和满洲。像汉、唐、明那样强大的中国王朝就会统治这些地区，但中国扩张的“阳”定期地要让位于“夷狄”入侵的“阴”，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就会获得政权并统治帝国部分地区。然而他们总是利用其传统的政治制度，通过庞大的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官僚维持帝国的中央统治。中国政治秩序之所以稳定，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有能力使处于强盛时期的外族人在统治它时对其基本特点不作变动。

下面的中亚民族与王国图表说明了历史上在中国北部的草原地区兴亡的主要“夷狄”的名称和活动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向西迁移，一个又一个民族被中国人或者胜利的游牧民族驱赶着西迁。早期民族一般属于突厥语族，后来蒙古语的

民族占主导地位。不时地从这些草原部落中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和军队成功地控制了部分或整个中国地区。

中国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响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所

中亚的民族与王国

153

(说明：下面的资料尚无定论，许多问题学术界还有争论。)

民族	语族	时间和地区
匈奴	突厥语	公元前3世纪建立草原帝国，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被汉征服。
月氏	可能为印欧语	公元前2世纪中国汉代寻求其为对付匈奴的盟国；后从甘肃迁往伊犁、大夏，然后又迁至印度西北部，建立贵霜帝国。
鲜卑	蒙古语	公元3世纪在蒙古东部，公元4世纪入侵中国。
拓拔	主要是蒙古语	386—534年在中国北方建立北魏王朝。
突厥	突厥语	约552年建立帝国；约600—744年分裂为在鄂尔浑河的东突厥和与波斯萨珊王朝有来往的西突厥；659年后进入印度和欧洲。
回纥	突厥语	744—840年征服东突厥在鄂尔浑河建立帝国；后为黠戛斯所败，840年后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

		建立帝国。
契丹	蒙古语	947—1125年在中国北部及其附近地区建立辽王朝，后被女真人驱赶向西；1124—1211年在今新疆一带地区建立西辽帝国。
女真	通古斯语 (满族祖先)	1122—1234年在中国北方建立金王朝。
党项	藏语	1038—1227年在中国西北建立西夏王国。
蒙古	蒙古语	1271—1368年建立元朝统治整个中国。

154 致——草原和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地理上的不同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这一区别内在的原因是降雨量的不同，亚洲腹地草原干燥，没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从事大面积农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资源，因而人口稀少。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区大约是中国面积的两倍，但人口可能不超过中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夷狄”的力量来自何处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当他们的骑兵弓箭手进入长城后，其军事上的优势常常表现出来，但是什么原因使其能有如此骁勇快捷的战士？

第一节 草原社会

在草原主要是靠放牧而不是种植谷物来维持生活。完全的游牧民族靠牧羊牧马的经济来生活，羊皮作衣服，羊毛作

帐篷，他们吃羊肉和用马奶、羊奶制成乳酪与黄油。妇女拣粪作为燃料，男人用马来运输和放羊，还用来打猎作战，对此作为补充的是用骆驼来穿越沙漠，用牛来拉车。只要能与定居的地区进行少量的贸易以获得粮食、纺织品、茶叶、其他“奢侈品”以及制作武器的金属，游牧经济就基本上不需要农业。因此广阔草原上的游牧民在短期内是自给自足的，但不能完全与商业中心隔绝开来。

因为城市不能在草原上繁荣起来，所以对文化和技术有很大的限制。财富储藏在妇女的银首饰上。主要的艺术形式是动物形状的所谓西徐亚式金属器，这种器物在整个欧亚草原从伏尔加河下游和里海到黑龙江，都有发现。文化和文学均不发达。游牧民的宗教是由巫师主持的原始萨满教，这种情况与相隔遥远的一些通古斯民族美洲印第安人情况差不多。¹⁵⁵草原上的大神是天神。

游牧民的迁移不是无目的的漫游，而是按照季节迁移，通常是在夏季把畜群赶到开阔的草原，在冬季把畜群赶到像山谷这样比较避风雪的地方。牧民的主要权利就是迁移牧场的权利，而不像农业地区是对土地的控制权。部落酋长有权控制牧场的迁移，决定在某些季节使用某些牧场。牧民对耕作、收获、建房、修路这些定居活动没有兴趣。牧民听天由命，没有保障，因为一场严冬会毁了他的羊群。居住在定居农业社会边缘的半游牧民也处在这种经济上总是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因为缺乏大量的储存，这两种游牧民周期性地不但要增加商业往来，而且要进行军事扩张。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什么古迹，与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的民族相比他们要算是穷人。

与只要生产不遭破坏一般不会离开土地的农民不同，草原上的牧民和猎人可以迅速迁徙，从童年起他们就在马上生

活，他们能很快把这种从放牧羊群或追逐猎物中练就的本领用于消灭敌人。这种积极的户外生活产生了一种独立、自立和全能的个性(类似于早期美国的牛仔)。草原上的游牧狩猎武士必须准备干任何事，妇女管理营帐，除战争和政治外她们能处理游牧生活中碰到的所有问题，这又增强了武士的战斗力。

部落的社会组织增强了其军事力量，管理部落的酋长靠个人的勇敢而产生出来，当他们年老或体弱时就被人取代。在大小酋长之间以及武士们之间保持着效忠和保护的个人关系，因而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很快上升到个人关系形成的等级的顶端。

游牧民族的惊人力量来自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因素。一个技术上的因素是用了铁马镫，早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中就使用了，它使骑兵有一个牢固的站脚之处可骑着射箭。骑着受过很好训练的马比较安全，装备的弯弓比较小，便于在马上使用，这时游牧民在军事战术上胜过农民组成的步兵。在以后的一千年(约400—1400年)中，直到火器传入前，在亚洲，军事技术的天平都倾向于骑兵。

农耕民和游牧民交界的长城一线处在不稳固状态之中。

157 降雨量极其有限，农业不时地遇到灾难。汉人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用粮食、丝绸，后来还用茶叶换马——很容易带有政治色彩。居住在这一边境地区的半游牧民族可以作为中国的藩属定居下来，甚至完全被汉化。反过来说，假如中国的统治很软弱，边境上的华夷混合的民族可能就效忠于新兴的游牧领袖。这种领袖崛起的秘诀通常在于他了解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能力，以便他能在控制商人、农民和部落武士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混合的政权。汉族人自然会在边境“夷狄”统治者的崛起过程中起作用，在这种不稳定的合作过程中，外

来统治者起着特殊的作用——既是战士又是掌权者。

契丹帝国

契丹部族的辽帝国（947—1125）就表现出一个双重国家的特点。这一帝国扩及满洲和蒙古的许多地方以及中国本土的东北角，因此它包括中国北部和满洲南部的农业地区、满洲西部和蒙古的草原以及满洲东部和北部的山谷森林。国内的非汉族人包括几个部族，在满洲东部是通古斯人（满族祖先），他们靠狩猎、农耕和养猪生活。在西部的蒙古草原是突厥部落，完全靠游牧生活，不从事农耕和养猪，但养了许多羊、马和骆驼。在这两个部族之间是半游牧的契丹民族，他们靠混合经济维持生活，既种谷物，又养骆驼、猪、马和牛。在混合经济中心地区的契丹部族建立了帝国，开始成为十八个部落的核心，后来发展到有五十四个部落。

契丹社会由一个氏族领导，这个氏族再分为八部，一般都娶别的大氏族的女子为妻。非契丹的部族包括定居的汉族农村和城市居民都被并入这一社会，汉族人的地位悬殊很大，从奴隶到受许多约束、部分自由的人直至完全自由的人。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在满洲东部被征服的渤海国（713—926）民。

与中国永不间断的氏族制度不同，大部分的契丹氏族没有名称，在几代以后就失去了认同感。只有占统治地位的氏族模仿汉族人祭祖。与汉族的做法大不一样，婚姻遵守部落的习惯。也就是说可以完全忽视汉族人辈份的戒规，一个男人可以娶父母的妹妹或者他的寡嫂。

907年契丹人组成了与早期匈奴人相似的部落联盟，这一 158

年酋长宣布自己为契丹皇帝。^①他很快地建立了王朝，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又卷入不断的争战，就连与自己的兄弟也没有少打仗。当帝国扩张时，完全采用了中国的世袭君主制。

除了他们集中领导的能力之外，契丹人靠骑兵来建立帝国。统治者的骑兵弓箭手被组织在“斡尔朵”(Ordo)中，组成营帐卫士并成为西方人称为“horde”(营帐)的原型。早在922年他有选自各部落的组成这种近卫军的大约二千名勇士，这支精锐骑兵像西方皇帝的骑兵一样，开始是贴身卫兵后来逐渐发展到包括五千到七千名骑兵的军队。

在战斗中骑兵可能用三匹马（两匹供换骑）。骑兵穿上铠甲，在作战时用两把弓，带一把斧、一柄剑、一根绳和一些干粮。训练时由五名或十名骑兵为一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跟着首领演练打猎。在开阔的平原上，契丹武士发明了一种连锁阵，由十人、百人和千人为组，有先锋、两翼、中心和皇帝的卫队组成。军队的前面有侦察部队，或许会有万人之多，他们夜间还派巡逻队，使用复杂的信号，有烽火、鼓声、号声、旗号、口令、锣声，甚至鸟叫。他们一般不用优势兵力发起近战，而是采用切断敌方供给以及伏击和诱敌的战术。在围城战中他们将汉族百姓赶进城壕，用汉族人的弩炮破城。在攻城时他们把汉族人俘虏赶在前面以对付这些俘虏的同胞和亲属。

辽王朝

947年，契丹人的力量向南扩大到前面已提到过的中国

^①实际称帝的年代应为916年。——译者注

北方的十六州，攻占了大小城市。这一年他们采用了汉文王朝名辽，利用唐王朝的瓦解，他们这时建立了一个包括北方的“夷狄”成分和南方的汉族成分的双重制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主要得益于汉族谋士的帮助，这些谋士参与其事，带来了城市文化和官僚政府的统治方法。

辽代的行政机构设有五京，其中上京在长城以北。每个京城都是一个区域的中心，下面有一连串所辖的单位，有其军府、要塞和设防的城市以拱卫京城。这种双重政府的两部分各有宰相、中书和大臣，两个政府的首脑都在上京办公。南部地区的政府采用唐制，比如设立六部和御史台，它在988年后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以确定汉族人当官的资格。辽 159代君王们在采用中国统治制度的过程中，契丹人还接受了中国的纪年习惯，挑选太子，尊奉孔子为国师，采用儒家的祭祖习俗，用汉语和汉字为官方用语，甚至在南方地区时他们还穿着汉族服装。

为抵制汉化过程，契丹人保持自己的部落制度和礼仪，更重要的还有自己的饮食和穿着方式。与以前的“夷狄”入侵者不同，他们自觉地不说汉语，以免被淹没在汉族人的海洋中。他们发展了两种文字来拼写自己的蒙古口语，小字是拼音文字，大字以汉字为基础。两种契丹文也为官方所用，但没有用这些文字写下真正的文学作品。

辽帝国可能人口从未超过四百万，与北宋相比人口少得多。实际上，真正的契丹人口仅有七十五万左右，作为统治者的契丹部落只占辽帝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不得不努力维持统治。最后，他们不是被汉族人打败，而是被在自己后面的另一个部落国家所征服。

西夏王国

宋王朝能够顶得住辽国，部分是因为在西北出现了力量三分的局面。属羌族的党项族在现代的甘肃地区建立了一个名为西夏的王国，首都在黄河边的宁夏，位于蒙古和中亚之间西行的商路上。他们从事半绿洲式经济，兼事灌溉农业、畜牧业和商业。在向宋朝进贡以后，党项统治者于1038年宣布独立，自称为夏国皇帝。他为其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采用很复杂的类似汉字的文字来写党项语，结果这一文字直到今天大多数还无法认出。党项族按照中国的样子建立了政府和教育制度，但他们使佛教成为国教。

女真人的金王朝

满洲北部的女真部落是契丹的藩属，因为不允许他们向更有吸引力的满洲南部地区迁移，他们变得很不安分。后来他们强大起来，1115年一位著名的领袖统一了女真部落，自160称为皇帝，并很快攻下了上京。辽王朝崩溃，但辽政权的残余向西逃亡，建立了另一个游牧帝国。这就是哈喇契丹或称“黑契丹”，其自称为西辽帝国（1124—1211）。西辽控制了帕米尔高原东西两面的绿洲，从甘肃西夏的边界直至阿姆河，但1211年最后被蒙古人推翻。

女真人与辽不同，不是局限于中国的北部边境，而是蹂躏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1126年攻占了宋京开封。他们的军队向南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但其与南宋的界线最后大致稳定在淮河一线，约略与主要稻米耕作区的北界相符。

女真人按照其家乡的一条河流名称其王朝为金（1122—

1234)。与他们统治的汉族人的人数相比，在比例上他们甚至比以前的契丹人还要少。他们继承了契丹统治者的双重行政管理制度和混合文化，但不可避免还进一步采纳了中国的模式。在其主要的京城现代北京所在的燕京，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官僚国家，按宋制设十九个路，以下分为州县，按 161 唐制设六部进行统治。汉族官员最终超过了非汉族的官员，比例为三比二。

女真人像契丹人一样面对中国的传统既想统治大量的汉族臣民，又想保持自己的文化。唐代以后的这些非汉族民族在这方面的表现使人想到欧洲的部落民族，比如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强调自己的民族性以反对罗马帝国的传统。因此女真人使用契丹拼音文字，还设计了两种女真文字，一种是拼音文字，另一种来源于汉字。

起初，女真部落与契丹人以及其他非汉族盟友一起，随时准备立即投入战斗，但这种武装的民族一旦在中国的农耕居住区定居下来就不再是有用的武士。通过与汉人的经济来往，女真人常常成为汉人土地的佃户，有时还沦为乞丐，最终允许两个民族之间互相通婚。1141年与南宋的和约确立了金名义上的宗主权并使贸易扩大。在女真贵族相互之间为皇位争战时，他们的汉族臣民在有创新地研究和平的技艺，如印刷术、学术、绘画、文学，还有戏剧。金统治者自己也逐渐遵循儒家的规范，学习经籍，写汉诗。1189年后，金卷进了两条战线，与蒙古和南宋进行着为时长久的战争。他们继 162 承了北宋的做法滥发纸币，遭致了通常出现的不幸后果。1215年在蒙古人的压力下，他们被迫将首都从北京向南迁往开封，蒙古人1234年在开封灭了金王朝。

第二节 蒙古帝国

在北魏、辽和金这些王朝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蒙古和满族征服时更为明显：(1) 入侵者通常在混乱时期在中国北方获得权力。(2) “夷狄”得到汉族人的建议和帮助，尤其是从边境地区来的汉人。(3) 占优势的“夷狄”骑兵用来装备的草原马比农业地区的马又多又好。(4) 通过一种宽容政策——如果说不是安抚政策的话，地方的汉族首领被吸引安排到人数较多的汉族税收官员和行政队伍中。(5) 入侵者利用中国的政府制度，也能够继续让传统的行政制度和汉族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延续下去。(6) 但是，入侵者在长城以外保留一块自己的家园以保持他们的民族意识，以免于被同化。(7) 在地方一级实行汉人—“夷狄”双重行政管理，在征服者监督下主要由汉人管理。(8) 入侵者在行政机构中也任用其他外族人。(9) 他们通过集结的军队保持控制权，军队包括汉人能够参加的地方军队和驻守在京城与要害地区的入侵者游牧民部队。(10) 对待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这些征服者王朝采用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11) 在长时期内，处于人数占绝对优势汉族臣民中的“夷狄”征服者开始借用汉人的文化成份：饮食、服装、姓名，甚至语言。(12) 结果是同化或排斥。所有这些特点在蒙古征服时期都表现出来。

蒙古民族分成几户家庭组成的小圈子生活，每个家庭有自己的毡包。在季节迁移时，这些分散的单位可能组成有几百个毡包的大团体。这些基本的社会政治单位就是家长制的

氏族。精神生活集中于在篝火祭礼时所表达的对氏族的效忠，一些氏族由血缘关系所联系组成大的部落。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不同氏族的两个成员可能成为“把兄弟”。同时一夫多妻制使得需要从氏族外获得更多的女人，结果常常要抢才能得到妻子，这造成了世仇、报复性的袭击和小规模的战事。结果一些氏族成为另一些氏族的藩属，整个部落依附于别的部落，这壮大了其力量。因此在蒙古人中发展出一种“领主”、“骑士”、“平民”和“农奴”（借用不完全恰当的欧洲人用语）之间反映效忠与保护关系的封建等级制度。通过这些个人关系，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崛起而占据领导地位。163

成吉思汗的生平

当成吉思汗约在1167年（有些人认为应更早）出生时，说蒙古语的部落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后来他成了蒙古族的伟大组织者和统一者。他的名字叫铁木真，出身于贵族，但在幼年时父亲被杀，他艰难地努力为父亲报仇。他只是慢慢地崛起，因为建立对个人效忠是个缓慢的过程。在反抗原来的统治者时，他先征服了一个部落，后来又征服了各个部落。最后1206年各蒙古部落在克鲁伦河畔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他被冠以成吉思汗的称号，这一称号可能有“大王”的含意。从很久以后波斯、中国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述的少量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成吉思汗的组织方式。为得到宗教的认可，他宣称自己受神差遣，是天神的代表。他的政治结构按照家庭的原则组织，家庭组成氏族，氏族组成部落，以此类推。他起草了一部作为统治永久基础的帝国法典，又称大札撒，地位在汗本人之上，1206年首次颁布，1227年在他死之前作了进一步充实。尽管留传下来的文本不完整，我们还是知道这

部法典规定了组织机构的基本准则。这位没有文化的部落酋长力量的一个来源在于他能够向别人学习，在建立民政行政机构时他任用了维吾尔—突厥人，这是一个商业民族，许多人是景教徒，主要居住在吐鲁番绿洲一带。蒙古人还用维吾尔拼音文字来记录蒙古语。

成吉思汗的个人卫队最终发展成一万人的精锐部队，从氏族首领、将领以及亲属的子弟中招募，成吉思汗从这个与现在的军官训练团相似的组织中选择将领和高级行政官员。军队按十人、百人和千人的单位组织，各氏族被仔细地混编。1227年全军约为十二万九千人，按游牧民族的标准是支大军，但对中国来说数量不大。蒙古人的总数没有超过二百五十万人，这时人数可能接近一百万人。蒙古骑兵在世袭贵族首领率领下作战，骑兵穿着皮毛衣服，带上备用马供换骑，可以一次在马上生活十天十夜，他们可以走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比如在匈牙利曾三天走完二百七十英里。因为这些军队靠战利品生活，前方新的供给基地引诱他们不断地扩张。
164

在战斗中蒙古人使用奔跑的马队包围和压迫敌人，就像他们在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时追赶猎物一样。他们的重弓比英国的长弓更强劲，有效杀伤射程为六百英尺。他们惯于诱敌，先让敌人追击，然后返回、包围，把敌人切断，“在这种战斗中”，马可·波罗说，“对手以为自己胜了，但实际上输了。”在另一种战术中，把重兵隐藏在两翼等待敌人被诱入中心，而使其侧翼暴露。经过运动与配合，压倒优势的兵力会集中起来打击敌方的薄弱点，因此在火器出现前的时代蒙古人的进攻力量达到了顶峰。他们还是谍报活动和心理战术的老手，从商路上商人中的间谍那儿，蒙古人打听到对手的情况。在进攻城市时，他们总是在此之前让人感到恐怖可怕。为利用这种恐怖，他们也到处许诺宽容信教的少数民族以及

给商人以自由，但要求所有人立即投降。

1205年至1209年间成吉思汗征讨中国西北的西夏王国，西夏最终于1227年灭亡。1211年至1215年间他第一次对金帝国作战，摧毁了金国首都，他还得到懂得如何攻城和统治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人的帮助，其中最著名的是契丹皇室后代耶律楚材（1190—1244），此人劝告自己的新主人不把中国北方改为空旷的牧场更有利！另外他教会蒙古人征收农业税以及扶持尚存的采矿业和工业。然后在1219—1221年成吉思汗蹂躏了突厥人的帝国花刺子模（在俄国土耳其斯坦）。他不仅夺得像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样富裕、有水灌溉的绿洲城市以及工艺品生产、陆上商业和伊斯兰文化的中心，而且还有穆斯林商人和理财家为他服务。突厥人部落也被并入蒙古人群体。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他已征服了横跨中亚的大陆腹地，为一个广阔的欧亚帝国奠定了基础。许多人认为这归功于成吉思汗的天性，除了他的所有才能之外，其征服的动机显然很简单。据说他曾这样宣称：“胜利之时，歼灭仇敌，追逐仇敌，夺其财产，乘其骏马，纳其妻女，乃人生最大乐事。”在欧亚大陆人们都记得蒙古人野蛮的入侵，这肯定是在这时由成吉思汗开始的。

四大汗国

165

按照部落制的方式，成吉思汗把帝国分给自己正妻的四个儿子。后来他的众多孙子又进一步扩大帝国，帝国由四大汗国组成（加星号者为成吉思汗之孙）：

（1）大汗（东亚）：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1229—1241，蒙哥*1251—1259，忽必烈*1260—1294（1279年后统治整个

中国)；1368年明将蒙古人逐出中国。

(2) 察合台汗国(在土耳其斯坦)：察合台(成吉思汗二子)1227—1242；1370年后西部被并入帖木儿帝国(1336—1405)。

(3) 伊儿汗国：旭烈兀^{*}所建；1258年攻占巴格达，1335年后瓦解。

(4) 钦察汗国(金帐汗国)在伏尔加河下游，拔都^{*}所建1227—1255；统治俄罗斯，15世纪被帖木儿征服后分裂。

在他们向已知的大部分世界扩张的过程中，蒙古—突厥
¹⁶⁶ 人混合的军队1231年蹂躏了波斯，1258年在巴格达灭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东亚的蒙古军队完成了对中国北方(1241年)和朝鲜(最终在1258年征服)的征服，西亚的蒙古军队向西猛进。在拔都率领下他们焚毁了莫斯科，占领了基辅，并侵入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多瑙河流域(1241年)。在欧亚大草原的西端，他们到达了亚得里亚海。但拔都得知“大汗”窝阔台1241年在蒙古去世的消息，就撤军以便争夺继承权，处在分裂无准备中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由于蒙古的国内政治而得救。

拔都的金帐汗国的继承人在俄国南部统治了两百年，所谓伊儿汗(意为藩属汗)在波斯统治了一个世纪。三个农业地区——俄国、波斯、中国——都位于蒙古草原和土耳其斯坦绿洲这一要冲地区的周围，因此察合台汗国成为政治和对抗的战略中心。在这一地区通往中亚道路上的蒙古驿站提供了食宿以及防盗匪的庇护所。商人和旅行者行经这条路，官邮办理政府公务，运货送人并给统治者带来所发生大事的消息。强壮的蒙古信使不停地换驿马可日行二百英里。

帝国的统一起初因为四大汗国的各自征服活动而得到加强，但成吉思汗的后代很快屈服于各自广阔统治范围内的分

离势力。在西亚的蒙古统治者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在中国他们成为佛教徒和儒家政治家。中国人、波斯人和俄国人的国家有他们不同的语言、文化、官制、宫廷政治和地方需求，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必然会造成员数很少的蒙古—突厥领主之间的分裂。地方官僚行政机构是内向型的，只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蒙古人庞大的超级国家只存在了一个世纪。

对南宋的征服

蒙古人直到1279年才完全控制中国，花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对中国人的生活留下了相当深的影响。南宋重犯以前助金反辽的错误与蒙古人联合反金，因而有助于清除他们与自己最终征服者之间相隔的屏障。然而对中国南部的征服花费了好几十年，这是南宋力量的明显例证——对蒙古人来说这次征服比征服西亚诸帝国要困难得多。

入侵者的战略是从西面迂回进攻南宋。1253年他们占领了首都在云南大理的非汉族人的南诏王国，使这一地区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南宋的征服在成吉思汗最有才能的孙子忽必烈（1215—1294）统治时完成，忽必烈1260¹⁶⁷年成为大汗，统治了三十四年。他把北京建为冬都。他的军队南下长江，攻占了宋朝在杭州的首都，接着攻下了广州，宋朝庞大舰队（大部分已投向蒙古人）残余部分1279年最终在广州西南被毁。1271年忽必烈采用汉文的王朝名元，意思为“初始”或“起源”，这是第一个不源自地名的王朝名。

蒙古人把征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派出使臣和远征军继续渗入东亚的边远地区，使用了得自宋朝的海军力量。由几千艘船组成庞大舰队于1274年和1281年被派去攻打日本，但无功而回。至少还从陆上四次远征越南，五次远征缅甸。蒙

古使臣从海路访问了锡兰和印度南部。13世纪80年代南方的十个国家前进来贡，1292年一支蒙古舰队进攻了爪哇，但胜利维持的时间不长。这种征服已知世界的不断努力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因为忽必烈还要与皇室西部派系叛乱首领进行长期的斗争。其对手成吉思汗继承者窝阔台的一个孙子1268年反叛，占据了察合台汗国，一直到他1301年死去时为止都不断地给中国的大汗造成威胁。

第三节 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

蒙古人慢慢地正视这一现实，被征服的中国农民、商人和城市工匠不能并入蒙古的部族社会。1230年后在中国北方被征服地区担任主要大臣的耶律楚材兴办了学校，举行科举考试让汉人进入官僚机构。但蒙古人像女真人一样发现他们不能采用辽代所制定的很简单的“华夷分治”的双重管理制度，所以元代继续采用唐宋的行政管理结构，尤其是在京城设立六部。从唐代前期到1906年的一千三百年中，这一基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元代还继续把中央政府分为行政、军事和监察三部分，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作了较大的革新，采用金代的做法设立在中书省直接管辖下的行省政府，这是完善中华帝国结构的重要一步。

蒙古征服者面临如何按汉族方式统治又能保持权力的老问题。必须劝说汉人默许外来的统治，为做到这一点，外来的王朝必须维持地方的安宁，使汉族有才能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僚政治生活，并扶植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来引导士大夫阶级。对这一艰难的任务，普通的蒙古人没有准备。所以蒙古

人在元初的胜利必须归功于忽必烈的个人指挥才干以及他采用了儒家的原则并任用儒生为合作者。

蒙古人与其臣民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不仅是在语言和地位上。说到服装，他们喜爱草原牧民的皮毛衣服，至于饮食，他们喜食马奶和乳酪以及马奶制成的酒和奶茶。因为几乎在无水的草原上生活，蒙古人不习惯于洗涤。他们甚至不用姓。他们与众不同的道德准则（在汉族人眼里是不道德的）给妇女以更大的自由。另外蒙古人与汉族不同的特点因他们与中国以外广大地区的接触而愈加明显，他们是建立了征服者王朝的唯一地道的游牧民族。因此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隔阂在文化上从一开始就很大，后来在政治上也一直很强烈。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差距更大的是，元代挑选南方汉族人才做官的做法遭到那种宋代过去对劫掠成性的“夷狄”仇恨的阻碍。总是来给征服者下结论的后代中国历史学家，把蒙古人描写成只会破坏和狂饮的原始野蛮人。后来有一份汉文材料记述，“他们身上的味道很重，以致没人能靠近他们。他们用尿液洗手洗脸”。

面对当地人的仇视，在中国的蒙古人任用其他地方许多外族人，尤其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正如马可·波罗所记载：“你看到大汗不是靠世袭权力继位统治中国，而是靠征服控制中国。因此他不相信本地人，而是把一切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和基督徒，这些人得到宅第，忠心为大汗效劳，他们在中国是外国人。”蒙古人建立了一种社会的阶级等级制度：蒙古人位于最高等级，非汉族的蒙古人的合作者位于第二等级，其次是北方较早归附的汉族人，位于最下层的是南方的汉人，他们的人数自然超过其他几个等级。同时蒙古统治阶级规定了用于汉人和蒙古人的不同法律制度，并以此与汉族人的生活相区别。大汗继续夏天居住在长城以

北的上都。大汗的外族统治使得传统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更加集权和残酷。

元朝统治下的生活

忽必烈一继位就保护孔庙，很快便恢复了孔子在全国受尊重的地位，后来又让儒家学者免交赋税。但在更重要的为政府选拔官吏的问题上，忽必烈不去挑选中国南方有才能的人。¹⁶⁹ 1237年后在北方停止实行科举制度，1274年后在南方也停开科举，延至1315年才得以恢复。汉族的小吏自然可以进入官僚机构，但儒士常常不能升至高位。

儒士阶层还受到蒙古人庇护的外来宗教的对抗。在波斯，许多人信仰伊斯兰教，在中亚信仰景教。在中国，佛教、道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建筑像孔庙一样都全部免税。金代和元代在中国北方新建了许多道观。这一多种宗教发展的局面对新儒学的朱熹学派来说分明是一种挫折。

以前信仰萨满教迷信的蒙古人倾向于接受在西藏发展起来的佛教变种，即喇嘛教。按照传说佛教在8世纪由印度西北传入西藏，一经传入就受到西藏本地宗教本教的影响，本教中许多内容是巫术和占卜术，结果产生的混合宗教称为喇嘛教（“喇嘛”词意为“上师”）。13世纪在皇帝的支持下喇嘛教很快传到蒙古和中国。

忽必烈作为一位理想的信佛君主受到中国佛教僧侣的欢迎。在他的庇护下，佛教寺院包括山西五台山这样的大山中的修行场所在内数目达到四万二千个，有二十万三千名僧尼，其中许多是喇嘛。在儒士阶层看来，皇帝参加祭孔抵不上对某种宗教的庇护，他没有使用人力和制订政策来鼓励中国在文学、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蒙古人在中国未能发挥上

流阶层的领导作用，而是保持一个世界性的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汉族官僚阶级没有什么地位。

另一方面在维持人民的生计上，忽必烈取得了一些暂时的成功。南宋的土地占有状况没有改变，赋役制度以及通常政府的专卖制度发展起来，贸易因开展了远距离的与亚洲其他地方的交往而得到推动。阿拉伯和波斯的水手与商人经常来像广州、泉州（刺桐）这样的大港口城市，陆上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由中亚血统的穆斯林商人进行。他们的团体不仅作为商业团体活动，而且还为他们的蒙古庇护者作包税人。这些成员之间相互担保的商业“公司”在征收元帝国的剩余农产品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把积累的一些资本投入已得到扩展的商业。他们也沾染了蒙古人统治带来的放纵贪污和腐败的恶习。商业最终还受到整个国家统一纸币制度的促进，来自经济落后得多的欧洲的马可·波罗看到用纸作钱时很吃惊。170

忽必烈将大汗的首都从外蒙古的和林迁至经长城进入华北平原主要门户的北京。在那儿他建了一座叫“汗八里”的新城，这是突厥语，意即“汗城”。在城内有两道墙围绕的宫殿，还建有花园、库房、湖泊和挖湖堆成的土山。为供给新都城，将大运河由黄河向北延伸至北京，由此运河将粮食从长江下游运来。这第二条大运河的石砌护岸形成一条从杭州至北京的铺石大路，有一千一百英里长，走一趟要花四十天。

忽必烈的孙子铁木耳1294年继位，保持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在1307年他去世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迅速削弱。在以后的二十六年中有七个统治者占据皇位，1328年公开的内战开始。同时，以前曾促进贸易的纸币这时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大量发行，因此不能再用纸币交税，纸币在慢慢贬值。另外，黄河不断泛滥毁了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这些灌溉条件优越的生产地区。因此财政、道德和政治

的崩溃一齐来临。

最早与西方人的直接接触

蒙古帝国对中亚商路的控制使许多欧洲人来到中国朝廷，马可·波罗只是到过中国的许多人中的一个。约从1240年至1340年的一个世纪是前后两个时代的间隔时期，在这前后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近东给中国与西方之间造成阻碍。在这一蒙古人的世纪中，欧洲旅行者通过几条路来到中国：通过俄国南部和伊犁穿越草原，这是一条艰苦的旅程；渡过黑海穿越古代丝绸之路的中亚绿洲，像马可·波罗父子叔侄这样的意大利商人走的就是这条路；由海路去叙利亚和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国家，然后再经过巴格达和中亚；最后一条路是从海路经印度洋和东南亚沿岸去中国南部的港口，由于阿拉伯人的阻碍这条路很难走。通过这些挤满西亚人的通道许多欧洲人来到中国，只有几个人留下了他们的旅行记。

171 据他们记载，在大汗的宫廷中有许多东正教信徒，主要是被俘的俄国工匠和士兵。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中国之间的接触还进一步表现在异端的景教早就从波斯渗透进这一地区。虽然景教在中国曾绝灭，但又在契丹人和女真人中兴起并且在维吾尔—突厥人和几个蒙古部落中流行，忽必烈的亲生母亲就是个景教徒。景教教会大约有二十五个主教教区：1275年在巴格达的总主教决定在北京设置一个大主教职位。虽然被看作异端，但景教教会还是与教皇有联系。

这时，西方的基督教世界热衷于组织十字军，这就为西方基督教世界、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外交关系提供了172 活动的舞台。萨拉森人的使臣寻求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以阻止

蒙古人在近东的扩张，蒙古人征服波斯和巴格达以后伊儿汗国在1267年至1291年间至少派出七批使臣去西方以便得到帮助来对付伊斯兰教徒。在教皇这方面，当1241年蒙古人对欧洲的威胁不复存在以后，他派出一批显赫的方济各会士去波斯、蒙古和中国从事外交和传教活动，显然是想探求得到蒙古人帮助以对付萨拉森人的可能性。在东西方之间来往的这些使臣虽然没有取得外交上的成果，但教皇所派使臣的努力最后在孟德高维奴的约翰管理下在中国建了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边远教会。在大汗的保护下，他传教并在意大利商人帮助下建了一座教堂。他还教一百五十名唱诗班的孩子唱歌，皇帝喜欢听他们唱的格里高利赞美诗。1304年在北京有六千名信徒举行洗礼仪式，其中许多人可能不是汉族人。罗马天主 173 教的传教活动在中国越到元代后期发展越快，但后来又被禁止了。

西方来的商人人数肯定大大超过穿越亚洲来传教的传教士，但马可·波罗是唯一留下记录的人。1271年他和父亲、叔叔离开家乡，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威尼斯商人，这次是第二次来中国。在到了上都和北京(汗八里)以后，马可·波罗用了十七年时间为忽必烈做事(1275—1292)，1295年回到威尼斯。《马可·波罗行记》是他在热那亚狱中口授给一位职业小说家写成的。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而是一部系统的科学著作，材料丰富，内容客观。(原稿已散失，但有约一百二十种抄本，内容有许多不同之处，有意大利文、拉丁文、法文和其他语言文本。)从未有别的旅行家像马可·波罗这样留下一本无比绝伦的游记，他是第一个向欧洲公众对中国的地理、经济生活和政府作系统介绍的人。人们不相信这些介绍，因为13世纪后期的中国不仅在幅员而且在文化和技术上都超过欧洲。在中世纪后期，马可·波罗成为难以置信事情的代 174

名词。然而他的影响还存在，哥伦布有一本马可·波罗的书，他在书上标上记号。时间证明这位威尼斯人是正确的，例如他提到从山中挖来可以烧的“黑石头”被证明是煤。19世纪他的旅行记在具体细节上都得到了证实。

在东亚有一个与马可·波罗相似的旅行家，他是生于北京的景教僧侣列班扫马。1278年他穿越中亚到伊儿汗国宫廷，然后被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国家的帮助以对付伊斯兰国家。1287年他途经君士坦丁堡去了那不勒斯、罗马和巴黎。他见到了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向枢机主教团讲述景教教义，并在教皇面前领受圣餐以表明语言可以不同但仪式一样。

在蒙古人统治时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同与西亚的交往相比要少得多。蒙古人的征服大大推动了阿拉伯贸易。这一贸易此时陆上从巴格达到北京，海上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刺桐（福建泉州的阿拉伯文名称）和其他中国南部的港口。在所有的中世纪旅行者中，阿拉伯人虽然大多不为欧洲所知却对东亚很熟悉，蒙古人统治时期记载最详细的游记是伊本·白图泰写的，他于1325—1355年间漫游南亚，当他沿阿拉伯商路环行时曾在几个地方定居安家。他说曾在中国遇到一位阿拉伯人，而在撒哈拉沙漠遇到这位阿拉伯人的兄弟。

在蒙古人统治时，俄国、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的技术成就一般总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一千年将近末尾时，蒙古人的这个世纪有许多中国的东西西传——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纺织品、纸牌、医药发明和艺术品，这里提到的仅是其中的很少的几种。这种文化影响在波斯和阿拉伯世界最大，常常再从这里间接地传到欧洲。反过来，中国受阿拉伯—突厥文化影响也最大，伊斯兰教在中国打下了永久的根基，而基督教却没有。在甘肃和云南，伊斯兰教的势力至今仍很强大，在广州和泉州这样

的海港，阿拉伯人社区被允许在自己的法律习惯和负责首领管理下生活。

蒙古人统治时的中国文化

尽管有这一个世纪的接触，但正像蒙古征服者本身一样，外来的东西在中国总是表面的。像科举制度这样一些传统的制度只是部分地保持着，但不能被取代。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如此之强以致一些中亚人——党项人和维吾尔人，景教徒和穆斯林——以儒家学者或是典型的中国书画家成名，编纂宋、辽、金的官修朝代史由一个蒙古人领着修史机构来完成。中国的学术没有明显地繁荣起来，但也没有衰败下去，绘山水画的伟大传统很好地保存下来。175

在这一时期，因为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话写作以代替传统的文言文，出现了两种新的文学形式——杂剧和小说，这两种文学形式都必须用接近口语的形式以便满足当时众多的城市观众。元代行政机构本身在文书中也采用近乎白话的形式，以便许多未受过中国经籍教育的官员能比较容易看懂。176而中国的文人发现很少有机会当官，研究经籍也得不到鼓励，于是就将自己的才能转向纯文学创作。12世纪在金代的北京和南宋的杭州戏剧创作开始繁荣，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剧目名称几乎有一千种。从元代开始有了许多印刷的剧本，这些剧本的主题是典型中国式的，涉及在忠孝这些社会束缚下人的感情冲突。

中国的戏剧是半歌剧式的，在音乐伴奏下夹有大段的唱和舞。像莎士比亚时的英国一样不用布景和道具，取而代之的是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格式——手、袖、眼和脚的程式化动作，登上假想的山坡，踏着不存在的台阶，骑上假想的战

马。女角色一般由男人扮演，他用假声吐出的唱，还有舞姿和复杂的手势特别受人欢迎。浪漫的情节、精湛的演技、幽默的对话、精美的服装以及激烈的武打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广泛流行的城市艺术。

戏剧主要在京城发展，在这同时由职业的说书人在群众中创造了小说。唐代佛教神奇故事发展成为历史故事或是纯虚构的爱情和惊险故事。说书人把这些故事再加工成结构松散的长篇传奇。供江湖说书人用的话本是这些片断故事最早的文字形式，当经过许多人手逐渐充实内容后成为早期的小说。它们绝大部分篇幅很长，其中主人公通常不是士大夫，而是社会下层人物或是军人出身的人。所有的小说都用接近当时口语的风格来写，后来的小说通常是由一个作者完成的著作，这些人虽然常常不留姓名，但都是些受过教育有文学才能的人。（主要的几部小说将在第235—237页作较详细的探讨。）虽然大部分重要的小说都是在明清时期成熟或是写成，但这些小说的根可以追溯到元代或是更早。

小说发展成为大多数有文化的中国人最喜欢鉴赏的一种文学。虽然受经籍熏陶的学者习惯上轻视小说，但小说还是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作为反映社会价值的宝库和镜子有着广泛的影响。小说和戏剧在元代的出现表明在蒙古人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活跃以及儒士阶层的失意。

第一节 中国的“文化主义”

从1368年至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在相对和平的二百七十六年内平均人口约为一亿左右。后来由明到清统治的更替也相对比较容易，1644年明政权衰亡，满人攻占了北京城，接着满族人征服了整个中国，但这场战争及其破坏与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中当时欧洲军队有组织的劫掠和屠杀相比是有限的。总之，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以致1644年至1912年在外族的清朝统治时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二百六十七年。因此从14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国又走其传统的老路。

对近代中国人来说不幸的是，在近代欧洲迅速兴起的几个世纪里还保持着这种惊人的稳定。在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对新世界和全球的扩张，接着是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中国自己的经历中没有事能真正与近六个世纪西方的这些根本变革相比，中国仍然处在正席卷世界的汹涌潮流之外，结果到19世纪 178 在物质文化和技术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落在西方后面。东亚文明这一长时期的稳定使之相对“落后”或是“不发达”，但这一与发展中西方的比较不应该把明清时期说

成是倒退而忽视其真正的成就。当我们对这几个世纪有较多了解时，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有关革新和发展的材料。中国社会远不是没有改变，但与西方相比步子比较慢，改变的幅度也较小。

造成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在传统以内变化”的历史观。社会的领导人倾心于传统，现在发生的任何事都必须适合于过去经验的丰富模式。今天西方人从19世纪继承来的是发展的理想，而明清时代的中国人所看到的是在遥远过去的理想模式。

这种对两汉唐宋伟大时代的缅怀是随着对蒙古人的痛恨而来的。外来的统治激起了对整个外来事物的敌视，逐渐这种看法对中国文明以外的任何东西毫无兴趣。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厌恶随着中国人生活中内省意识的增强而来，我们在宋代嗜古的艺术趣味和历史学术的勃兴中已经见到了这种意识。从那时起，一定程度的对外部世界害怕和轻视的混合感情以及过分强调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民族中心主义。最后这支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使中国对外来的刺激有了思想和心理上的免疫力。

这种态度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一个民族主义集团因为害怕被其他一些集团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淹没而维护自己的特性和优越性，因此民族主义好像与总的纷争和不安全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通常是由一个文化上的小单位尤其是语言上的小集团排斥同一文化中别的小单位，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文化中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如此。与此相比中国人没有表现出文化上的自卑感，他们或许害怕政治上的征服，但对文化上的征服连想也不去想。因此中国的排外性与完全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中国不是作为一个文化小单位，而是作为一个

大的民族中心主义的世界作出反应，甚至在其军事力量相对落后于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区时仍然非常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因为有这些与民族主义的异同之处，我们称中国人先前的这种态度为“文化主义”，也就是说按中国人的观点有意义的单位确实是整个文明而不是在一个较大的文化整体中比较 179 狹隘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单位。

在这种对中国生活方式的满足背后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整个中国仍然是一个中央政府统治下的行政实体。与相对较小的欧洲国家间一直处在分裂状态相比，这种极大的凝聚力不能归之于地理因素。皇帝的诏书派人骑马送到广东、云南、中亚和东北这些中国的边境地区通常要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西欧范围内的任何距离都远。中国长期形成的统一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已在社会上确立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着手。中国国家被看作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整个生活方式与统一的帝国是密不可分的，就好像罗马帝国在西方存在时的情况一样，它阻碍了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兴起。文化和政府的统一使明清时期的中国领导阶层对外国的东西不感兴趣，有时还表现出敌视。因此文化主义是整个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态度。

第二节 明代的政府

明王朝的建立

在皇族成员中兄弟的阋墙争夺，加速了蒙古人统治的衰落。1333年后十五年内中国北方经常出现饥荒，黄河的频仍

水灾更严重，饥荒和水灾使仓库一空。14世纪40年代几乎每个省中都零星地出现过暴动。1351—1353年间出现了几位主要的反叛领袖，在他们中间开始了一场典型的王朝交替时期的争斗，以决定谁应幸存下来成为继承天命最合适的人选。有些人自称是宋代皇帝的后裔，有些人预言弥勒佛出世以祈求宗教的认可。其他人得到秘密会社之助，所有秘密会社中最著名的是白莲教，其最初是在12世纪前期作为佛教天台宗的一支出现，正像反对统治王朝的任何团体一样，这一组织为求生存必须处于秘密状态。

所有这些中国的反叛英雄中最后的胜利者是朱元璋
(1328—1398)，他的名字总是与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相提并论，两人都是出身低微的普通人，靠自己和机遇成为天子。
朱元璋出生在南京西北的淮河地区，是个孤儿，后进一家佛
·180 寺当和尚，这给了他识字的机会，有一度时间他甚至靠乞讨
为生。但在1352年他二十五岁时加入了一个反叛团体。(他还可能加入了白莲教，但他后来否认这件事——这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不明智的先例。)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渡过长江，1356年攻占了靠近长江三角洲重要经济地区的战略基地南京。1367年在打败了上游和下游的对立政权后，他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同时蒙古将领不是攻击汉族暴动者而是互相残杀。1368年朱元璋攻占了北京但继续将南京作为首都，他自称为明朝的第一个皇帝，选择洪武为年号，但他在自己的整个在位时期都用这个年号。这位明代的开国皇帝将年号变为他在位时期的称号，这在明清时期成为一种惯例，一位皇帝在自己的整个在位时期只用一个年号，因而人们一般用这个年号称呼这一时期在位的皇帝。

第二个强大的统治者是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

他是洪武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所拥有势力的基础在北京，在这里他起兵反抗在南京继承皇位的自己的侄子——当然也是洪武的孙子。他进行了一场破坏性的内战直至最后攻占了南京，作为四十三岁的篡位者他把自己在位的年号定为永乐。

洪武把南京建为帝国的首都，城墙有六十英尺高，周长超过二十英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墙。1421年永乐把明代的首都迁往北京，让南京作为陪都。他按照一项比蒙古人更庞大的计划重建北京，北京的主要城墙有四十英尺高，周长超过十四英里，组成有九个城门的城区，每个城门还有一个外城门保护。城中心坐落着一座皇城，周长约五英里。而在皇城中有高高红墙围绕的紫禁城，也就是周围围有约两英里长护城河的皇宫本身。位于穿过皇宫从南至北全城中轴线上的是几座屋项金光灿烂的辉煌大殿，每一座宫殿都建在汉白玉的平台之上。明代的这一伟大建筑物的许多部分至今还作为帝国无可比拟的丰碑巍然屹立。在16世纪北京城南的城墙又开了七座城门。

明代的专制主义

明代十七位皇帝的统治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 洪武皇帝(1368—1398)建立和巩固王朝的开创阶段；(2) 永乐皇帝(1403—1424)及其继承人锐意建设和扩张的阶段，可是到15世纪中期耗尽了帝国的库藏；(3) 帝国力量在国内¹⁸¹外逐渐衰落的一个世纪；(4) 16世纪后期的改革时期；(5) 到17世纪前期弊端的严重以及最后的崩溃。

明代后期重视伦理道德的儒家学者目睹中国正在走向崩溃，仔细地研究了这一概况。他们及其在清代的后继者对王

朝的衰败从道德上进行解释，分析一个个皇帝个人的缺点、官员的错误以及使官僚阶层分裂的竞争。今天，我们对此所作政治上的主要批评可能是皇帝不从属于更高一层的法律或是不受宪法的制约，权力集中在皇帝个人手中。他或者是位
182 仁慈的君主，或者是位暴君，要不然就是把权力交给其他一些宠臣在不正规、不稳定个人基础上来掌管。明代的政府必须由一位伟大人物居首位，不然就面临灾难。

由于统治三十二年的明代建国者对这个王朝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因此他的个性有特殊意义。洪武皇帝在画像中是一个容貌丑陋脸形像猪的男子。他年轻时生活艰苦，成为皇帝后依然性格孤僻严肃。他崇尚简朴，比较容易恐惧多疑，有时会因误解而大发脾气。他变得很残酷，对轻罪给以严厉的惩处。他在最后的遗诏中写道：“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心切，日勤不怠。”可能这位王朝创建者颇有几分偏执狂的气质，这有助于解释明代专制主义发展的原因。洪武皇帝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也可能是归因于他作为有杰出才能、靠个人奋斗的胜利者的经历，他使自己的个人作用制度化。

1380年在镇压了他的丞相所进行的大规模阴谋活动以后，洪武废除了过去王朝的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从此皇帝的统治是个人的直接统治。这一制度的变化使明清时期的皇帝起到了更加专制的作用，然而在洪武皇帝的个人行政机构中，他任用处理奏章（一天多达百件）和起草皇帝回复诏书的大学士。最后大学士的地位高于六部，非正式地形成类似内阁的机构。但大学士仍然只是统治者的助手，不能自己主动决断事务。

最后获得相当大权力的一个集团是宦官。洪武曾竭力警告防止这种可能性。他在宫中立了一块三英尺高的铁牌，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他限制宦官的数目、品级、

称号和服式，禁止他们处理公文，赶走议论政事的宦官并规定宦官不应识字。然而因为皇帝需要子嗣就要有一群妃嫔，所以宦官仍是内廷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皇帝在内廷中长大，他们个人常对作为自己童年伙伴和抚育者的宦官很信任。宦官在宫中的品级和职责都有增加，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展到整个行政机构。15世纪20年代在宫中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宦官的数目增加到几千人。在北京的东厂，他们收集有官员个人的秘密材料，只有皇帝可以调阅。他们像今天的国 183 家安全系统一样已实际上成为行政机构的一个单独部分，这是因为作为宫廷近臣的宦官不要对家庭效忠，完全依靠自己的主人，有其独特的内部地位，比任何士大夫更接近皇帝本人。后来宦官作为皇帝信任的代理人有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去军队监军或去各省巡视。在明代宫廷内部的宦官和大学士之间以及这些内廷的集团和在京城外廷的高级官员之间都不断地为权力进行着斗争。

皇帝统治的专横还能从另一个习惯上看出来——对高级官员的廷杖。洪武皇帝早就沿用蒙古人公开杖责官员的先例，他曾几次因怀疑有人在上奏祝贺的表文中用了侮辱性的 184 双关语就杀了十二个官员。这样的做法违背了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教条，以赞颂经籍条文闻名的明政权又因违背这些经籍的精神而名声不佳。

明代宫廷另一个现象是党争。各官员集团激烈地卷进一场又一场争斗，憎恨自己的对手，得势时任用本集团的成员，失势时就攻击那些掌权的人。然而皇帝的无限权力和官员的党派之争主要只在对整个帝国来说人数很少的中央一级官僚中起作用，而在地方一级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皇帝的权力在这里是有所保留的，很少得到行使。

政府机构

明代皇帝保留着前代的中央政府机构：第一，六部和其他机构组成的文官官僚体系；第二，集中的军事机构；第三，独立的监察机构。在西方人眼里，都察院可能是三者中最有意思的，都察院在北京的官署有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另外，各部还有一个特别的监察机构以监视其行动。从整个文官官僚体系中抽调的监察官员一般都是个人品行正直、品级很低的年轻官员，他们常常是作为为期一年的巡按派往各省，检查司法和礼仪的情况以及仓储和学校的状况，听取地方官的汇报和百姓的诉怨。他们的权力直接来自皇帝，既能弹劾其他官员又能规劝（冒着危险）皇帝。因为监察官员通常在任职九年或少于九年的情况下就要离任担任固定的官职，所以他们广泛的权力就受到了限制。像所有官员一样，他们也取决于皇帝的心血来潮。既不能得到终身任期制的保护又不能免遭自己主子的斥责，这些“皇帝的耳目”实际上也是像其所有同僚一样的官僚，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危，靠奉承上司得到好处，有时也不免有人行贿或施加恐吓。

明清时期这种三重的行政机构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晚近的政权具有令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1928年以后，中国是靠政党、军队和政府这三个主要部分加以统治的。中国现代的执政党可以看作皇室的继承人，从中选择统治者并对他们负责。与军队和文官政府并列的政党机构还继承了古代¹⁸⁵ 监察机构的一些功用。这种中国的三位一体不像美国宪法中规定的那种分权或是权力制约，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行政制约制度。军队维护政权的存在，文官们管理政府，监察官员（还有宦官）监视一切。

明代地方的文官行政机构分为十五个省，后来到清代增加到十八个省。每个省再分为由更小的单位“府”组成的地方单位，在明帝国一般认为有一百五十九个府，二百三十四个州，县的数目达到一千一百七十一个。在清代总数增加到大约有一百八十三个府和一千四百七十个县。地方行政官员按照回避的法律不准在自己出生的省份任职以免被诱与自己的亲朋故旧串通一气。这些官员从下向上有知县、知州和知府，他们的行政机构都由省里的一位布政使管辖。省里还有一个管司法、有自己属员的按察使，第三个省里的高级官员是管军事的指挥使，因此每一个省都在一群官员统治下，这群官员起到了与在首都的行政、军事和监察这三重机构同样的作用。最后又在每个省的上层增设巡抚作为协调人。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还有巡按御史监视整个行政机构。

洪武皇帝在五千六百人的卫的基础上发展了明代的军事制度。每个卫分为五个编制各为一千一百二十人的所，由在册的职业军人组成。1393年在兵部之下有四百九十三个卫，在五军都督府管理下，这些卫分驻在亚洲腹地边境地区、沿海地区、大运河沿线和京城这些战略地点。因此原来的卫就成了驻防军，不依赖于地方文官行政机构。在册士兵的地位是世袭的，许多人分得用于耕作维持生计的土地，希望能实现古代兵农合一军队自给自足的理想。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数量远远多于契丹、女真和蒙古军队的中国驻军发现在一个不好战的社会中难以使军队保持战斗力。

像京城的情况一样，各省新的行政机构开始时是非正式的，后来才走向制度化。其中有道台，先是受权处理与食盐专卖、治安、关税、河工以及类似的特定事务。最后各省根据不同目的分为一些道，组成在省和府之间一级新的行政机构。另一发展是从京城派出新的巡回监察官员和特派官员去

制止腐败和弊政，这些官员被授以在指定地区内一定的行政、监察和军事权力，以便能使地方行政机构更统一的施政。到明中叶这两种官职发展成为已经提到的巡抚职位以及正式管辖两个省的总督职位。

土地、人民和税收

明代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是以对土地和人口作详细登记为标志的。1393年的人口登记估计为一千万户六千万人。这一登记并非建立在现代类型人口统计基础上，造成总数不如汉代时人多。我们只可以揣测1393年时的人口可能两倍于这个数字。1393年的土地登记表明有人耕种的土地总数约为一点二九亿英亩，少于晚近所估计的耕地数的一半。每块土地都按类型和产量分类并照此征税。

税收按传统照 8 世纪的两税法征收。（参见第 120—121 页）明代的夏税在八月征收，所征的对象是冬天播种夏天成熟的补充性粮食作物。秋税在二月征收，对象是前一个夏天播种在前一个秋天成熟的粮食，主要是长江流域的大米。通常由政府征收的茶盐专卖税也继续维持。如同宋元时期一样，明代继续发行纸币，但不能兑换为硬币（铜钱或银铤），因而纸币变得毫无价值，到1450年只得不用。

各户被分为三、五、九等（很复杂），必须按照十六至六十岁之间在册的男丁数服劳役。一种劳役是在地方上承担与收税和公共工程有关的事，这种劳役在里甲制度下被组织起来。按照设想每一百一十户相邻人家组成一个里，在里内每年再由十个大户中的一户去管理余下一百户中的十户组成一个甲，承担这年当地应服的劳役。其余的甲在十年的周期内轮流服役，因此这种里甲制度与从宋代继承来的互相担保

的保甲制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区别。另一种也是成年男丁服的劳役是在衙门中当差，也可以向衙门交钱免役。还有其他形式要百姓服的劳役是在政府的驿站和本地的民兵中当差。

明代的法制表现出重新采用传统原则的同一模式及从未有过的彻底。1397年首次颁布了一部内容广泛有关行政和刑事的律法。

然而按现代的标准明代早期的政府仍然是表面的。它宣称有组织和控制社会各方面的特权，但实际上它没有干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各省只有大约两千个主要官职，如果加上次要的职务，¹⁸⁸ 迟至1800年清帝国文官的总数也只有两万人左右。用如此之少的官员来控制国家还行得通，仅仅是因为在每个地方都有占统治地位的名流士绅在发挥作用。

第三节 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科举制度

在明代对中国恢复纯粹汉族统治的过程中，其生气勃勃的精神又回复了蒙古人统治前唐宋的制度。这很快显示出科举制的重要性，在明清时期有三种主要层次的考试活动：首先是县里的初级考试，通过者有资格参加在府里举办的三年考两次的考试。府里的考试给通过者最低一级的功名“秀才”，使之进入享受免服劳役免受体罚的文化人的特权阶层中。为了拥有这一下层士绅的地位，士生们必须通过通常以三年为期的例行考试。第二级考试也是一场初级考试，是在省会举

行的三年一次的大考。几千名考生在考场一排排隔成的各个小屋里被禁闭好几天，身边只有毛笔和纸。每一两百名考生中有一人成为“举人”，有资格参加在北京举行三年一次的第三级考试——会试。假如在京城通过考试就成为“进士”，去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的殿试，然后获得品级去就任官职。

官僚制度灵活地允许有些人不用参加考试就可任官。一种方式是由继承得来的特权，一个有很高品级官员的儿子可以借此获得品级地位，有时考虑到他父亲的功绩甚至可以获得官职。像以前的所有王朝一样，明清时期的另一种方式是让人用钱购得品级地位，其做法是向帝国的财库捐献。一般说来买官者被允许得到的仅是品级地位，而不是实际的官职。这就是承认此人进入了士绅阶层而不是官僚阶层。因此靠花钱得到的品级显然意在把一些有钱人（大多数是商人和地主）归入士大夫名流一类，使这些人在社会上获得资格的
189 承认来作为其拿出钱来的报偿，而真正的士大夫仍然有着最高的声望。用这种方式出卖品级地位，部分是一种安全阀门，让野心勃勃的非知识界人士能进入权势集团；部分是作为一种财政来源，特别是在急需之时对王朝有诱惑力。在19世纪，大约三分之一有最低品级的人是花钱买来的。

一般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大多数官员，成功地把国内最有才能的人选进政府任职。对各县各省能通过考试的人数都有限额以保证地区的代表性。在阅卷前有时还誊录考生的考卷并不注上名字以确保不见考生名而公正无私。在省里举行乡试时，主考官由京城派出，科举考试由礼部掌管而不是由负责监督官员以后表现的吏部掌管。所有这些做法保证了选拔过程的完全公正。

190 科举制度的一个缺点是把考试范围限制为四书五经。四

书是在宋代被定为儒学精义的，而五经也是用朱熹学派的宋代学者的重新解释本。为使科举考试有个正规形式，1487年明代规定书写考卷的固定格式，有八个主要部分，总共不超过七百字，要多用排比对偶。这就是著名的“八股文”格式，后来被人指责是束缚人思想的僵死文章结构。

培养参加科举考试考生的机构包括在县府各级建立的所谓县学和府学，但这些学校的主要作用是把读书人招收进来并举行定期的考试，而不是提供系统的教育或给以住宿之便。读书人所受的实际教育是在家里开始的，有时是在宗族的私塾里开始的。这对那些能请得起教师的显赫家庭中的青年有利，特别是对那些士大夫家庭的青年有利，在那些家庭中父辈的榜样和家庭的传统成了学习的动因与指导。

明清时期成百万人背诵的主要启蒙读物是13世纪编的《三字经》，这本书以诗句的形式在三百五十六行三字一组的韵文中简单概括了基本的知识和说教。文中开头几行复述了孟子人性本善的主要教义，这是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但证明对相信原罪说的西方传教士来说却是个阻碍。因此启蒙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宣传哲学教义的过程。

学术

在明代思想界金字塔顶的是翰林院，由一批经精心挑选有名望的进士组成，他们为宫廷执掌机要文书，明初民族中心主义的反应集中表现在这一儒家教义的堡垒中。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还按照宋代的模式建了大约三百所私人的书院，通常在高官或富商的庇护下作为学术研究、讨论和编纂的中心，有些书院还得到了皇帝的奖励。这些书院汇集杰出的学者、士子，他们得到免费生活照顾和教育，并免费使用小型

图书馆。书院还出版学术著作并储藏木雕印版。

- 皇帝对文学艺术的提倡是他保持自己作为儒家国家和文化领袖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传统使得在1407年出现了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卷的巨著《永乐大典》——编进了前代流传下来的有关历史、政府、伦理、地理等内容的所有主要著作。¹⁹¹ 有两千多名学者参加编纂，因篇幅太大而不能印刷，只有不到四百卷手稿保存下来。后来的两个世纪由宫廷、官员、书院和一些家庭发起又继续出版了大量著作。要想记述这时的文化发展情况、所写的巨著、大量的学术论文以及许多纯文学作品不比记述同一时期整个欧洲的文化发展情况更容易，例如在出现了几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以后，一位学者（李时珍）花费二十六年时间编了一部有插图的《本草纲目》，记载了大约二千种动物、植物和矿物药，并有八千多张药方。这部书完成于1578年，书中记载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方法以及汞、碘、大风子油、麻黄和其他贵重药物的使用，现代世界仍在利用这些药物。另外，一本有精美插图的工业技术手册（宋应星著，印于1637年）记载了种稻、织丝、晒盐、冶炼金属、采煤、造纸、制造武器和许多其他中国近代前技术产品所使用的方法与工具。
- 明代学术的活力反映了宋代曾繁荣一时的同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明代两个世纪的国内和平带来物质经济的发展——¹⁹² 农产品和人口以及商业和工业都有大的增长，因而城市生活繁荣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印刷发行的书更多，教育更加普及以及城市文化更加文雅、更民主化。一个人数更多的儒士阶层以及一个扩大的官僚阶层从中产生了。然而中国人生活中的问题激增，这就迫使儒家思想家竭力保持关于社会的综合看法并规定了儒士在社会中的作用。

后来在中国和日本最有影响的明代哲学家是王阳明

(1472—1529)。作为一位得志的高级官员，他鼓吹通过冥思的自我体验实现精神的启示以及在社会中积极的能动主义，因而背离了朱熹的正统思想。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宋代的思想——新儒学中的理想主义学派或是心学学派，这一学派来自一个与朱熹同时但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朱熹理性主义学派的小学派。总的说来，这一心学学派倾向于否定朱熹体系中认为天和人以及“天理”和“人欲”之间有明显区别的二元论，反之心学学派认为这两者是同一个体中的组成部分，这种看法接近于佛教观点。按照这个说法，王阳明的学说在儒家学说内就像是禅宗一类的反叛思想：非常强调冥思和直觉知识。朱熹对经籍中的一句话（来自《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所作的解释因此可以修改。王阳明鼓吹可以通过个人内心中“理”的体验获得“致良知”以代替“格物致知”，做到这一步的过程像佛教禅宗一样主要是冥思导致一种启示。但儒家的自我修养不像脱离世界的佛教徒那样要消灭一切欲望，而仅是灭私欲，以便更好地尽力与别人及万物协调。这使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他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一直到现代都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一种理想。

士绅阶级

在整个明代，进士的总数仅有二万五千人，但下层拥有功名的人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多达五十万。这些有各级功名的人在中文中称为“士绅”，在英文中对这些人用“gentry”一词，但这个词需要仔细地弄清其含意。这是一个语意含糊的词，因为它既用于个人也用于家庭，可能还有其政治社会或是经济的含意。严格加以定义，士绅是有功名的个人。然而在中国，家庭超过了个人，可以想见会有士绅家庭存在（也

就是说家庭中有成员是得到功名的人）。个人靠获得科举功名成为士绅，但是在以农业为基础人口众多的社会中，占有土地是士人读书的主要经济依靠，所以地主—士绅家庭就很常见。有功名的人和地主两者已重合到相当大的程度，但具体程度不甚清楚。

儒家政府的特殊力量在于士绅在地方社会不领官俸，但处理了相当多的公共事务。他们通常住在集镇上自己的大宅邸中，但也与城市有接触或在城里有房产。作为有影响的人，他们承担了许多今天是由官吏来承担的责任。他们为公共工程筹款并监督工程，比如建造和维修灌渠、运河以及堤坝、道路及道路上的桥梁和渡口。他们还对公共道德负责，维持地方上的孔庙并祭孔。他们资助学校和书院，编修地方史志。在丰年时他们收养孤儿、照顾老人，在灾年时发放救济。面临混乱之时他们或许会被允许组织地方民兵作为防卫力量。在绝大多数这些活动中他们得到官方的鼓励或承认，但没有被特别任命官职也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可以拿他们与在

194 完全不同社会中起作用的其他阶级作一粗略的比较，诸如古罗马的骑士阶层、现代美国的实业阶级以及其他在地方社会起领导作用不任官职的集团。

政府的兴趣是在士绅中保持道德和一种公共精神以反对自私的机会主义。为了这个目的，在地方孔庙中背诵儒家教义，天子发布他的道德劝谕。1397年洪武皇帝的六条律令被下令晓谕所有村庄，这些律令具体条文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因此在
195 一国之主的鼓励下读书的伟大传统被用来向普通人民宣传儒家教义，而士绅阶级作为地方名流便在村庄有秩序的生活中起领导作用。虽然从世袭意义上讲这不带有贵族色彩，但这确是一个上流人物管理的制度，因为这些有科举功名的人连

同他们身边的家庭肯定不到人口的 2 %，但他们却在本身不大的官僚阶级之外拥有最高的社会权力。

第四节 对外关系

进贡制度

洪武皇帝一登基就立即也像在国内一样企图重新设计中国对外关系的庞大蓝图。他派使臣去周边国家朝鲜、日本、安南（越南）、占城、西藏和其他国家，宣布他的登基。进贡使团很快从这些国家以及从蒙古远征军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前就去过的那些国家，沿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固定航路来中国。

中国统治者和其他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宗藩关系表现出传统的“文化主义”，中国不仅被假定为世界各国中最大最古老的国家，而且还确是其他国家的母本和文明之源。进贡关系不仅涉及到要叩头，“三跪九叩”，而且还有许多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方面：交换使节和外交关系的处理、人员的遣返以及引渡、对中外贸易的管理以及中国人特有的对外族部落和统治者采取恐吓、哄骗和收买的方式以求自保的努力。简言之，把外国的统治者纳入尊卑等级以及按礼仪这样做仅仅是中国统治者企图在国内保持的儒家社会制度在外部世界的延伸。藩属的国王还得到册封并被授予在上奏章时要用的王印，奏章上全用中国统治者的年号记年。天子对进贡国家国内的政治有着父亲般的兴趣，批准新王的继位，有时还提供军事保护以击退入侵者，通常还给予与中国通商的优惠，另外还要对他们进行道德的说教和规劝。这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帝国主

义，反之这是文化主义防卫性的表现：外国统治者假如要与中国交往就必须接受其条件，承认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中国的贸易可能很有价值，而进贡品是必要的代价。像其他许多重要规定一样，这也没有能很好地执行，然而中国的编
196 年史家至少在史籍中记下了进贡物品的内容使之好像很重要，而进贡国常常不这样看。

实行进贡制度有许多目的。为了让“倭王”制止日本海盗袭击中国港口，洪武皇帝1369—1372年间三次派出使臣去日本，用了许多诱使就范的办法——遣返被俘的日本海盗、亲自写了威胁性的国书、派中国和尚为使臣，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效果，日本海盗继续劫掠骚扰。虽然进贡使臣来了，但他们不都是恭顺的，也不都是由日本统治者派来的。“尔等愚
197 钝东夷”，洪武皇帝给日本的统治者足利家族的幕府将军写信说，“居沧溟之中，妄自尊大，纵民为盗。”这个日本将军和气地回信说：“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

永乐时期进贡活动到达顶峰，这时有一个短时期日本以很恭顺的言词公开表示效忠中国，但这被日本统治者仅仅看作是由他们垄断与中国之间有利可图贸易的一种手段。1403年永乐皇帝在南部沿海省份重新开放1374年关闭的三个市舶司，并在每个市舶司建造馆舍以接待进贡使臣。这时在好几年内日本使团每年都来，按通常的方式中国朝廷准备了一些编号的纸质贸易凭证“勘合”并留有存根，这些勘合被送给藩属国统治者，再留下存根。当一个使团来到指定的中国港口送贡品并进行贸易时，船只、货物和人数都受到规定的特别限制。这些都记在一张编号的勘合中，并可以用存根来核实。因此所有的使臣得到更好的接待而防止了冒充者。日本的幕府将军能够保持他对贸易的垄断，而中国人能识别出海盗。1433年至1549年间，十一批通常由几百人组成的大规模日本

使团在勘合制度下借道宁波来到中国朝廷。无数的问题出现了——在日本为获得官方勘合的争斗、在中国与无法无天的日本武士的冲突、在北京为给贸易商品定价进行了无休无止的争论，这些商品中包括数百吨的铜和硫磺矿石以及上千把日本刀。使团的成员也带来了自己用于私人贸易的商品，另外他们还得到皇帝——像幕府将军所做的那样——赠送的大量礼物。

海上远航

永乐皇帝的重要事业之一是将南亚和东南亚纳入进贡体系。当他的设想还在筹议之中时，这一雄心勃勃的冒险事业已由七次海上远航开始。这些远航始于1405年，止于1433年。大多数远航由一个名叫郑和的穆斯林宫廷宦官率领，此人来自云南，作为一个穆斯林很适合与南亚的穆斯林统治者交涉。第一支船队在1405—1407年由二万八千人乘六十二艘船出航，和第二次、第三次一样到达印度。1413—1415年的第四次航行到达亚丁和环亚洲航行的海角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第五次航行也远达亚丁。第七次航行是在1431—1433年带二万七千五百人出发，再次抵达霍尔木兹。中国的船队访问了 198 遥远的非洲东岸，几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瓷器和铜钱在那里就为人所知。船队中有七个中国人还到了麦加。

世界上的船队以前还从未取得这样大的成就。这些中国船队跨越整个印度的航行几乎早于葡萄牙人1498年绕非洲航行到达印度一个世纪，早于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绕英格兰影响西方历史的短途航行一百五十年。郑和的航行之所以能够成功归功于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以及在南海航线上航海技术的发展。他的远洋船只规模巨大，有些船有四百多英尺长，

有四层甲板，水密舱多达十二个。船员按照详细的航海指南航行，还使用罗盘。这些扩大了中国海上贸易来源的远航不仅到达了东南亚沿海，而且还远达锡兰、印度南部的东西海岸以及中东和东非。除了已成惯例的进贡国如越南和暹罗外，还访问了大约五十个新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也成了进贡者。霍尔木兹和非洲沿海的使者四次来中国，孟加拉使者十一次来中国。苏门答腊和锡兰的统治者是用武力搞来的，船队远航回国时还带回了鸵鸟、斑马和长颈鹿，长颈鹿被乱说成是中国传说中吉祥的“麒麟”。

这些蔚为壮观的海上远航活动表明一个有着伟大活力时代的到来。对那些率领船队的宦官来说，他们从事探险，得到了荣誉，可能还有经济利益。在早期贸易中已建立的航路上无疑能获得商业利益，中国移民已经在东南亚港口建立了大规模的海外华人社会。另一个动机可能完全是政治性的，把中国的进贡制度带给已知的整个世界。陆上通商的遥远地区已成为定期进贡者，海上通商的地区为什么不能这样？这一宏大的观念在蒙古皇帝的头脑中有过，在明代天子一统天下的思想中也很明确。

对明代远航起因的思考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活动为什么突然中断，后来没有再起或被仿效？中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开支浩大，明初对蒙古的战争以及营建北京城，开始耗尽了帝国的国库。有人批评庞大的舰队是奢侈的冒险，除了带来一些铺张荒诞的故事外，完全是徒劳无功。同时这些远航是宫廷宦官促进的，而宦官的活动遭到士大夫的反对，以致郑和的业绩在历史记录中实际被忽视了。

因为中国人的思想中即使实际上不是根本否定政府和官方政策也是采取极不重视的态度，所以明初所显示的海上扩张能力就更为突出。不过能力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异之大，

即使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进行贸易和海外扩张的世界这个角度来看，也确实令人惊讶。

中国在广州、厦门、泉州和宁波的渔船与商船基础上建立的海上力量稳步增长，中国正处在能成为统治东亚的海上强国的边缘，明朝舰队正在发展运输大量军队和贸易商品去南海任何一地的航海与后勤供应能力。但在1433年以后，这一刚开始的事业中断了，没有一个航海亲王亨利^①来坐中国的皇帝宝座。明代朝廷与当时的葡萄牙朝廷不同，远洋上没有固定的利益，也就没有控制海权的可能。明代航海没有继续下去，仅是一个孤立的辉煌成就。

明代的反重商主义

这种悬殊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郑和是在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和其他几位伊丽莎白女王的船长开始奠定英帝国基础一个半世纪前在世和航行的。中华帝国当时比欧洲所有国家版图都大，即使不计外贸，它国内贸易数量也比欧洲所有国家要多。然而有着如此大能量的明代中国却未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因为这个失误，东方海洋甚至中国沿海很快就被一连串中国以外的海洋民族——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和美国所统治。这些国家通过商业和海军终于控制了东亚海域，它们进行的帝国扩张最终使传统的中华帝国蒙受耻辱并导致了解体。郑和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宫廷宦官恰恰缺少后来鼓励欧洲冒险商人的那些动机，他的权力和活动，甚至航越印度洋都要依靠皇帝。郑和是一个

^① 航海亲王亨利（1394—1460），葡萄牙亲王，曾设立航海学校，奖励航海事业故名。——译者注

组织者、指挥官、外交家、能干的宫廷人员，但他却不是一个商人。他的航海活动没有导致建立特许公司，不像弗吉尼亚公司或东印度公司那样被授权去建立殖民地或在海外建立政府。中国人对东南亚的移民已在进行，而在这一地区中国人的数目在任何时候都会超过可能到达那里的欧洲人。但中国仍然对在海外进行商业和殖民活动的可能性不感兴趣，明清政府的大多数收入来自田赋，而不是商业税。他们拒绝加入正在开始横扫世界的伟大商业革命。

200 为了理解这种反重商主义，我们可以建议探讨以下几点，制度、经济、思想和战略几个方面。制度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早期环境，中国北部平原远离海洋，在这里作为收税人的官僚阶级奖掖农业，征收供应他们自己和国家的农产品。在这种农业官僚社会中，商人一直从属于官僚阶级，并为其所用。增长的经济利益集中在国内商业而不是国外商业上，这仅仅是因为当时中国次大陆也像现在那样是相对自给自足的。但在唐宋元时期商业发展后，明清政府为什么回到早期传统的以农业为中心的观念中去呢？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已提到过的文化主义，特别是正统新儒学已确立为明代思想之源。这恢复了古典的价值，包括古代对商业的轻视。对外贸易交给了有权势的宦官，这更使官僚阶级对此不屑一顾。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战略上的——明政府决心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

蒙古问题

洪武皇帝所关注的粉碎蒙古人势力的问题仍是明初对外关系的焦点所在。他的目的不是征服整个蒙古，而是破坏使他们有巨大力量的各部落之间的联盟。甚至在明王朝全部统

一中国以前，明朝军队就越过草原击溃了蒙古军队，两次占领和林。因失败、害怕、被收买和用其他方法被招抚的蒙古酋长被安置管理边境上蒙古的移民，他们得到了封号、荣耀、钱财以及贸易活动的机会。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中国人试图让内蒙古的半游牧民成为自己在边境上的同盟者以对付外蒙古完全过游牧生活的流动部落。

在中亚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征服者帖木儿（1336—1405）在1369年获得政权。他从首都撒马尔罕向各个方向大力扩张，蹂躏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击败了俄国南部的金帐汗国，甚至短时期内侵入了印度北部。帖木儿与中国朝廷有一些来往并怀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当1405年他死时，他已有一支大军正向东开去征讨中国，以把中国变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可是他的死标志着蒙古时代的结束，尤其是不能再统一中亚以威胁边境上的农业文明地区。一个统一的中亚的完结也减少了东西方之间通过中亚的贸易和接触。明清时期这一陆上通道被切断，蒙古部落更加 201 依赖唯一的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在15世纪初，蒙古部落分裂：在蒙古东部的是鞑靼部，在蒙古西部的是瓦剌部。中国的战略是使他们彼此敌对。永乐皇帝是靠领兵远征蒙古人并在边境的蒙古人中寻找同盟者才获得政权的。在1403年夺得皇位后，永乐皇帝亲自率领五支大军越过草原远征。1410年他动员了十万多人的大军，用三万辆车运送给养，威吓瓦剌部，给了他们礼品使之保持中立，然后越过克鲁伦河，击败鞑靼部。然而1414年瓦剌部向东扩张，永乐皇帝率领军队又来到克鲁伦河，这次打败了瓦剌部。这两次征战，明军都使用了火炮。不久鞑靼部又敢于袭扰边境，1422年永乐皇帝率二十三万五千人的大军远征，用十一万七千辆车和三十四万头驴运送给养。可是鞑靼部向

西逃窜，1423年和1424年的两次出兵也未能追上他们。

1421年永乐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标志着明代全神贯注于防范蒙古人。帝国的战略集中于边境地区，北京在这里守卫着附近从蒙古进入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南口）。这样，大明帝国的首都离中国传统的北部边界长城不到四十英里。这一地点被注重亚洲腹地的各朝代用作首都——辽、元、明、清，还有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方建都是在南方产生或注重海外贸易的政权采取的行动——南宋的杭州，明初、太平天国（1853—1864）和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统治时的南京。北京远离中国人口聚居和生产发展地区的中心，北京其战略地位易受游牧民族入侵，还得依靠通过大运河从长江流域用船运来的粮食，这些都是令人吃惊的事实——令人极为吃惊因而在北京建都不会只是偶然的事。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中国的首都也必须作为亚洲腹地非汉族人居住地区的首都。“夷狄”不断成为中华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组成部分，结果首都也就向外移到中国的边境地区。

明代惩罚蒙古的远征是用胡萝卜加大棒方法消除其危害努力的一部分。例如1408年瓦剌部与明王朝建立进贡关系，几乎每年都派来使臣，这实际上成为一种变相的用钱财让他们保持安宁的办法，一种反过来的进贡。他们每年派来北京²⁰²的使团总人数达两三千人，其中包括几百名从中亚来的商人。这群人通过山西北部的大同进入长城，因为像今天被请来北京的文化代表团一样，进贡使团是中国的客人，所以地方当局不得不安排款待他们。作为进贡者，瓦剌部献上他们当地主要的特产马，得到的“回礼”主要是绸缎。他们在紫禁城献上贡物以后，便进行几天的自由贸易。在这种有利可图的商品交换情况下，“夷狄”默认作为传统宫廷礼仪的“三跪九叩”。在得到游牧民臣服的同时，中国不得不忍受他们在边

境到京城之间道路上所作的劫掠以及他们在北京醉酒后的吵闹。对蒙古人来说，这种旅行富有魅力且有利可图，穆斯林商人付给他们的费用就抵得上进贡使团所花的钱。许多带“贡物”来的人实际上是自称代表遥远有时是不存在君主的商人。《明会要》上列了三十八个通过陆上通商的天然通道——哈密来送贡品的西域国家，例如迟至1618年，《明会要》还记载进贡者包括小亚细亚的鲁迷王国（Rum，也就是很早以前灭亡的东罗马帝国）。明代看重这一少量的中亚进贡贸易的政治价值而不是财政价值，借此让那些惹麻烦的武士在边境上安定下来。

在15世纪30年代，正当海上远航活动结束时，亚洲腹地边境再次面临严重的蒙古入侵的威胁。有一个瓦剌部的新酋长征服了哈密，然后将其影响扩大到东部直至朝鲜的各个部落，1449年下半年他抛弃了进贡的形式，动员了手下沿边境的骑兵出兵逼近大同。作为宫廷生活产物的明代皇帝在其宦官首领胡乱出谋划策的控制下，由宦官愚蠢地将他带往战场进军大同去作战。瓦剌部出兵击败并追趕中国军队，然后将其消灭，俘虏了皇帝。当他们进军到北京城下时，发现兵部尚书和其他人已用火炮准备了防卫，并拥立了一位新皇帝，且对被俘的皇帝不感兴趣。在城下相持了几日，瓦剌部退回蒙古。第二年他们送回了无用的皇帝，然后重新开始对他们有利可图的进贡关系。

下一个世纪明代与蒙古的关系是边境袭扰与进贡使团同时并存的时期。1550年一个新的首领蒙古东部的俺答汗联合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从东北进入长城，在北京附近劫掠了好几天才撤走。明代防卫用的城墙、烽火台以及在边境上的军垦区都遭到了帮助侵袭者的中国叛兵破坏而失去作用。这些 203 汉人帮助俺答汗建立一个固定的行政机构，俺答汗在大同西

北长城外的归化(呼和浩特)建立都城。在16世纪70年代他终于被招抚得到“顺义王”这样嘉勉性的封号。可是一直到满清帝国兴起时为止，蒙古人随意劫掠，继续骚扰着中国的边境地区。

与日本之间的麻烦

从为日本和蒙古的进贡使团所花费的费用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明代朝廷为什么要在15世纪上半叶以后让进贡制度在海外处于相对停止的状态。为数百名来北京的官员和商人所花费的接待、运送和赠送礼物的费用不是他们所从事的贸易能补偿的。来自东南亚的使团越来越少，只有琉球群岛仍然正常地进行两年一次的海上进贡，实际上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的间接渠道。在这种已失去辉煌色彩边境处于混乱的情况下，1514年第一批欧洲人葡萄牙冒险家从海路来到中国。这对中国人来说好像只是中国沿海普遍增长的海盗活动和令人讨厌的对外关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在英国以那些绅士海盗的业绩引以为荣的伊丽莎白时代出现前整整一个世纪，日本不断增加的航海能力就导致与以后英国差不多相同的海上冒险。像德雷克和霍金斯一样，日本人只要机会允许也能边贸易边劫掠。他们最大的船能载三百人。海盗们突然登陆用长刀进攻村庄，从而获得给养、人质和劫掠物品，然后溜之大吉。虽然这些人在汉语中被称为“倭寇”(有贬义的“矮人”含意)，但实际上也包括许多中国人。与蒙古人的袭扰不同，背叛的汉人在袭扰时不只是作为谋士而是主要参加者。到明代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国人实际上组成了“倭寇”的大部分。

明代对这一不断增长的不安的反应是禁止海上贸易，这

反映了朝廷以农业和土地为基础不关心整个对外贸易的倾向。海禁起了强迫水手和船长以走私或海盗活动为生的作用，1550年后海盗袭扰成了实际上的入侵。海盗在上海以南的舟山岛建立基地——这里后来在1840年成为英国的基地，1552年他们进攻浙江内地城市，另一股沿长江而上。在防卫中，明代的捕盜官用钱和赦免来收买其中为首者脱离海盗，还进攻在舟山的海盗巢穴。但是灾难进一步加深，只是因为16世纪后期日本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才使得日本人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骚扰减少了。204可是这次重新统一把日本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对明代朝廷形成更大的威胁，并更消耗其力量。

通过在日本的间谍，也通过朝鲜，北京得知日本想借道朝鲜侵略中国。1592年当日本进攻朝鲜时，朝廷内部在讨论是从南部省份派一支舰队去进攻日本，还是驻扎一支军队在朝鲜边境，还是缔结和约。最后朝廷决定必须行使宗主国的责任去援助朝鲜以便保护满洲南部和中国北部。明朝军队直到整个朝鲜半岛都在日本手里时才越过鸭绿江，在1592年夏季，中国军队进攻平壤，遭到惨败，遂开始进行谈判以赢得时间。1593年初，中国军队突袭日军，将他们赶出平壤，并进军到首都汉城的郊区，但因中埋伏又被打败。中国骑兵的短剑证明不能与日本步兵的长刀、矛和火枪相对抗。谈判和耗竭精力的冲突一直延续到日本人最后在1598年撤走（在1597年又一次用武力入侵之后）。明代用于对付日本第一次入侵朝鲜的开支总数肯定达到一千多万两白银，后来对付第二次入侵也花了大致这么多费用。在不断付钱给蒙古和重建北京的宫殿以后，行政机构的财政已接近于破产。日本入侵朝鲜是日本对北京日益减少的财库的最后一次耗竭，为1600年以后中国内部的盗匪和外部的“夷狄”入侵者的兴起铺平

了道路。

第五节 明代经济

经济发展

在研究明代经济史时，我们必须不断地将帝国政权和整个国家区别开来。我们注意到朝廷的反重商主义态度和做法导致最后的破产，但假如我们把明代后期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材料证明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有发展——人口、耕地的面积、对外贸易的数量、手工艺品和工业产品的生产，甚至可能还有货币的使用。

新都城北京不得不从淮河和长江下游的稻米生产区运税粮（西方作家称之为“贡米”）来加以供养。在山东附近的海运不断遭到倭寇的阻碍，而且代价高昂，所以永乐皇帝疏通了在山东西部被废弃的“会通河”，这条河最初是由忽必烈作为第二条大运河水系的一部分而修建，并建有十五道水闸。这205时有三千多条平底船在运河上航行，1415年以后放弃了海运。但把漕粮运往运河边上的仓库仍作为农民所服劳役的一部分，已成为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所以永乐皇帝的继承人就把运输的任务完全交由当地驻军的一些军事运输队承担，这批人不得不从十二万人增加到十六万人。从15世纪30年代起，这一新水系每年通常向首都提供三百多万担（约合二十万吨）粮食，有时要超过五百万担。

中国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贸易受到北京和运河水系发展的刺激，在长江和中国南部的贸易也有发展。例如当时在现代

安徽所在的最南部地区的商人，他们的活动遍布其他各省。他们被用一个旧地名称为“新安商人”，他们经营各种商品——附近江西景德镇的生产中心出产的瓷器、当地出产的茶叶和丝、盐、木材以及食物。自然他们还与官吏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各处活动需要后者的保护。

由于市场扩大以及有了一些大规模的生产作坊，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在景德镇官窑出产大量的瓷器供宫廷和上层社会使用，甚至也供出口。当时称为高岭土的特殊粘土（高岭是景德镇东面的一座山，土质为有氧化铝成份的含水硅酸盐），适当配以其他物质并在约摄氏一千四百度的高温中烧制，就成为洁白半透明的瓷器，质地坚硬，连铁器都不能留下划痕。这种瓷器在不懂技术的欧洲人眼里确是高超的产品，他们恰当地称之为“中国陶器”（chinaware）。另外苏州成为国内一个贸易、金融、加工工业，尤其是丝织和印染业的中心。在上海内侧的松江附近地区成为明代后期棉织业的中心，从南方和北方别的省获得棉花作原料，再将产品送回棉产地出售。广州的铁锅（直接放在火上用的平底炒锅）出口遍及中国、海外和中亚。

国内商业的发展导致在16世纪建立了许多地区行会，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建造会馆。这些机构主要是由来自同一地区（同一省、府、县和城）的官员和商人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在遥远的外地主要是在北京有一个方便的交往和互相帮助的中心。

同时明代后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在进贡体制的范围之外稳步发展起来。从东南亚和南亚来的使团少了，而去海外活动的中国商人却更多了。总之，中国不再主要依靠像阿拉伯人 206 那样的中间人从事对外贸易，而这时的对外贸易是由中国商人带着中国货物去海外，回程时载着外国货物回来，这些商

人很容易就汇入中国海岸帆船运输的洪流之中。政府一点也不鼓励这种贸易，有时还加以禁止，但这种贸易继续发展。

一条鞭法改革

在16世纪，传统的赋役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改革过程，将许多小的项目合并为一加以简化并以货币形式交纳。这整个改革称为“一条鞭法”改革。

赋税制度上的弊病起初是地方户籍的不实，正如我们在第186—187页所看到的，明代初期的土地占有和户籍是分为等级的，并规定每十年左右重分等级，每个人的税务负担起初完全看他在本地户籍中的等级。但这一制度的实行是由大户——富裕的人家负责的，因此他们有机会在登记时用假冒的方法逃避规定的负担。采用串通和贿赂的手段，这些有关的当事人能把自己应交的税减得很少，只要他们能增加穷人家的税务负担以抵上这个地区总的税额。有许多方法可用：隐瞒男丁的数目、将土地从帐册上划去、把土地登记在仆人或佃户名下、把私田登记为公田以及把普通人登记为官员。因为富户享有特权，所以小户人家为了寻求他们的保护，把自己的土地转到名义上的所有者名下以逃避赋税，当然要私下付给大户人家钱财。结果不出几代官方的登记变得毫无意义，赋税情况混乱——成为强者对弱者的敲诈。国库的收入短缺，上面的政府蒙受损失，下面的穷苦农民比以前受到更沉重的压榨，而位于上下两者之间的大户人家和小官吏却在他们相互之间的串通中获利。因为这一在农村由大户人家组成的中等阶层通过考试或花钱许多人有了功名，所以他们越发成为一个“地主—士绅”统治阶级。

各种各样的赋税造成了情况的混乱。土地占有的形式复

杂：田地的占有权可能归一人所有，而使用权又归另一人所有，这人可以把田地的使用权租给一个佃户用，这个佃户又可能再转租。租佃也有许多形式，劳役的内容甚至更复杂。

劳役是按照比土地更不稳定的因素即男丁的数目为基础而分配的，或许还会依当地的需要和当地掌权人物的决定而有所变化。随着风气变得更加败坏，压在贫苦农民身上的劳役负担如此之重，以致起初以户为单位后来以甲为单位最后以里为单位开始逃亡。因为税额难得减少，所以这一增加的负担进一步压在留在原地不走的人身上。最后当越来越多的税收项目要折算成钱交纳时，收税人利用一切机会增加额外税和附加费用，不等价地将劳役折算成银并在已不需要服原来劳役的情况下维持原定劳役数额。结果在农民身上缠绕了一张没有限制的货币税收网，以各种名目在一年四季征税，确定的税额很不公允且记录又不完整，另外又没有总的计划，且不受上面的控制或指导。

一条鞭法是许多感到压力很大的地方官员在一个又一个地区逐步推行的，竭力想维持有一个可靠的税收结构和固定的税额。一条鞭法主要是在1522—1619年间推行的，这是明代行政机构仍有效率的最后一个世纪。一条鞭法有两个主要的做法——将所有各种名目的税收合为一个或几个部分以及一律征银。一个基本的改革是简化土地类别，用两三种土地税率代替以前多达一百种的不同土地税率。另一个改革是统一土地税，将有时多达三四十种的税合为两三个项目，同样劳役也统一了。其次，两种主要的地税和劳役有时并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最后，还统一了征税的日期和衡器，以减少敲诈和欺骗的机会。

由此造成的财政状况可能不比美国每个县有着不同所得税的情况更简单。一条鞭法只是走向现代税收结构不完全

的一步。在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政府用征收的税银付给雇佣的差役，这些人所干的是以前由普通人服的劳役，百姓不再为政府粮仓运送漕粮。一条鞭法还废除以前通过粮长和里长的间接收税办法，这时纳税人直接将税银交进地方衙门前的政府的税银箱中并得到一张官方的收条。

有好几个以前的王朝开始先依靠实物形式的税役，只是在这一制度遭破坏时才实行改革，主要采用货币税收方法以 208 简化赋税制度。在明代后期货币使用的增加与已经提到过的经济的急剧发展特别是与白银流入国内有关。

第六节 明代统治的覆灭

即使我们考虑到历史学家们个人的偏见——他们能在卷帙浩繁的历史记录中找到可以对事件作差不多任何一种解释的证据——但明代后期的戏剧性事件仍具有一个王朝衰落的所有典型特点：软弱无用的统治者、乱用统治者权力的腐败宠臣、官员中党派的嫉妒、财政破产、自然灾害、反叛的兴起，最后还有外族入侵。在明代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些弊端因这样一件事而更为突出，在张居正所进行的一次激烈改革以后这些弊端紧接着就出现了。张居正是当时的一位重臣，在万历皇帝统治的前十年（1573—1582）作为首席大学士获得最高权力。张居正与外廷的关系很好，对年轻皇帝也有影响。他试图对免税土地重新征税以增加田赋收入，他还试图限制官僚阶级和皇室不断增加的额外收入和特权。然而张居正作了种种努力还不能限制皇帝的贪欲，在他1582年去世以后，直至1620年又统治了三十八年的万历皇帝变得完全不

理朝政。他连续多年不见大臣，拒绝处理事务或作出必要的任命，结果弊端丛生，耗费了国家的财源。1620年登基的十五岁的皇帝是个主要兴趣在于木工活的白痴，他让自己乳母的密友、宦官魏忠贤（1568—1627）控制了政府，此人曾是皇帝母亲的总管太监。魏忠贤使宦官的危害达到高峰，他有控制宫廷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宦官军队和遍布整个帝国的间谍网的支持，从官员中搜罗一些无原则的投机者，罢免自己政敌的官职，并在各省征收勒索性的新税。

党争：东林党

儒家对这些弊端的对抗主要是由一个士大夫集团来进行的，他们长期的斗争和最终的失败成为中国政治编年史上令人痛心的一章。东林是长江下游无锡一所书院的名称。在十几个落职官僚士大夫的领导下——这些官僚中大多数人都是在朝廷的竞争中丢官的——东林党成员在附近一所他们的书院中讲学，其影响很快扩大到各地的士大夫和官僚之中，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谴责自从王阳明出现以来在16世纪越来越流行的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这一折衷主义似乎使儒释道三种学说混淆不清。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斥责各级掌权者，包括大学士和宦官。209

自然东林党的改革家们在德行上并非尽善尽美。1610年他们被人指责为“党”，也就是传统上被指责为对皇帝的权威和官僚间和衷共济有破坏作用的一种有组织集团。党派间的政争更集中在大臣的道德品质上而不是集中在谈论国家政策上。他们指责别人也被别人指责，东林党的改革家们时起时伏。在1620—1623年间他们占上风，这正好是在宦官魏忠贤

完全掌握权力之前。1624年一个东林党领袖控告魏忠贤犯有二十四条大罪，其中包括谋杀和迫使皇后流产。魏忠贤动员了这些改革家的政敌，进行恐怖的报复。黑名单上记有大约七百名东林党支持者，主要成员遭到斥责、定罪、革职、贬黜、下狱、折磨，甚至打死，到1627年魏忠贤失势时东林党集团实际已被消灭。这次宦官利用天子的神圣地位以作恶，从而使明代政权在道德上完全堕落。

反叛的兴起

然而明代的崩溃可能应该归咎于没有政府而不是政府治理不良，归咎于明政权不能应付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宦官的不道德。真正的问题不是税收负担过重而是税收不足，行政机构遭受的灾难更多源于瘫痪而不是专制。

当1628年西北部的陕西遭受饥荒严重打击时，有一个名叫李自成的驿卒因政府不明智的裁员而失去了工作。李自成加入已成盗匪的他叔叔的队伍，并把营盘安在华北平原的边缘山西南部的山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队在这里也不能赶走中国的非正规军。李自成袭扰河南和四川，获得了较多的追随者，并最终建立了具备一定组织形式的政权。至少有两个文人加入了他的队伍，劝告他如何赢得人民拥护。他们散布有关李自成英雄品德的歌谣和故事，帮助他向饥民发放食物、任命官员、宣告建立一个王朝、授予封号，甚至发行李自成自己的硬币。1643年李自成已占据了湖北、河南和陕西的大部。在1644年初正当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在俯视紫禁城的景山上自缢时，李自成从西北来到北京登位。

同时李自成的主要竞争者是名叫张献忠的反叛者，他获
210 得的屠夫的名声超过他作为起义组织者的名声。大约从1630

年起，他在中国北部四处袭扰，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到处劫掠。最后在1644年他侵入四川建立了一个政府，六部和大学士齐全，以一个掌管科举考试和铸币的真正的进士为首。但张献忠主要关心的是用恐怖手段扑灭反对派势力，特别是用来对付士绅。他失去了士绅的支持，满人在1647年杀了他。

因此明王朝是在“夷狄”入侵者取而代之以前就被汉族的反叛者毁灭，但满族征服者保留和采用了在明代发挥作用达两个多世纪的主要政府体制。所以明朝统治的垮台肯定不应主要归咎于这些体制的结构，而应归咎于在作为王朝循环末期特点的积聚起来的压力下这些体制的失灵。

²¹¹ 第九章 清代：传统中国的极盛时期

第一节 满清王朝的兴起

清王朝开始于17世纪初，与美洲殖民地同时，至1911年结束，因此清代跨越了近代的大部分时期。然而这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改变甚少的政权和社会秩序，清代是传统中国的最高峰和最低谷。在18世纪帝国的人口和疆域达到空前的水平，行政管理的手段和稳定也达到高峰。然而在19世纪出现了难以缓解的灾难。

在这里我们只是考察这一活剧的第一幕，即到19世纪初满人在统治中国国家和社会方面取得的成功。可是在我们研究其成就时，不禁想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他们保持传统秩序的极大成功可能会成为这一秩序后来崩溃的一个因素。中国的传统建立得这样牢固以致很难想象能对制度和价值观作彻底的改变，满人更成功的是做继承者而不是革新者，他们也未能重画中国的蓝图。

满人成功的经历类似于成吉思汗统治下蒙古人成功的经历：在一个有利的时机一个强有力的首领统一了他的人民，给了一个他们共同的名称，率领他们进军直至其后代统治整个中国。全民武装的满族与金王朝(1122—1234)建立者同样是源于通古斯人的女真部落，他们在中国文化和行政区域的

边缘地带强大起来，在这里他们可以在不被完全征服或汉化 212 的情况下，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向自己的前辈蒙古人以及中国学习。

满洲最南部又称辽东（“辽河之东”，包括辽东半岛），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像中国北方一样是适合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类型地区并曾受汉帝国所管辖。这里从海路很容易与山东半岛来往，在明代是山东省的一部分。但辽东在战略上易受攻击，很容易失去控制，没有什么天然的屏障保护它免受来自北方的威胁。另一方面像整个满洲一样，这一地区可以在长城与海相连的山海关被轻易地切断同中国陆上的联系，任何人只要能占有山海关山海之间的几英里平川就能像塞住瓶口的软塞一样控制进出满洲的通道。结果辽东虽然是中国的，但却是汉人与“夷狄”交相杂处的地方，在这里强大的“夷狄”能控制从事农业的汉人并与统治王朝对抗。

中国对此所作的防卫不是依靠静态的边墙，而是依靠人情关系，通过“羁縻”建立中国对部落政治上的领导权。洪武皇帝在蒙古边境上设立卫所，永乐皇帝又将这一制度扩大到满洲的部落。单在永乐时期，作为中国分而治之政策的标志在这里建立了一百七十八个卫，这些卫是在自己世袭部落首领领导下的部落军事单位。这些首领得到官爵和官印，每年要派人去进贡。首领的家庭可能会得到一个汉姓，女儿可能会成为皇帝的妃嫔。有姓自然促进了家谱的编写并产生了正统和继承的观念，同时就像在整个英联邦仍然在做的那样，由皇帝授予爵赏起了将“夷狄”与帝国连在一起的作用。另一政策是让部落首领离开成为遥领者，将他们的住所迁到中国城市甚至京城比较舒服的环境中，因而使之汉化。

1403年在辽东东北建立了第一个女真人的卫。当满洲的部落数目越来越多时，每年有一批批人数各为二百至六百的

部落民去北京，沿途骚扰百姓。明代在满洲南部盛京（即今沈阳）附近的北部边境开放了一个马市以便阻止这种在长城以南的旅行，正是在这一边境地区当明朝逐步衰弱时满人力量上升。中国防卫的办法是汉化“夷狄”使之成为帝国的忠诚臣民，然而这一过程使得“夷狄”有机会将自己原有的作战力量与他们所能了解的所有的中国方法结合在一起。结果在满洲出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各种制度的混合体和一个新的国家政权。

汉化满人国家的建立

满人国家的建立者努尔哈赤(1559—1626)在为自己死去的父亲和祖父报仇的借口下追随成吉思汗的传统用武力为自己获得政权开路。他的父亲和祖父是在一次与中国在辽东的守将及其盟友——一个女真首领——作战时被杀的，这个首领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打击的对象。在接受了汉人任命、继承他父亲的官职后，据说努尔哈赤动员了自己的家人和部落在1586年消灭了这个对手。他加固自己的根据地，娶一个有势力首领的女儿以及另一个首领的孙女为妻，并镇压盗匪，赢得中国的称赞。通过三十年的谈判、通婚和结盟，以及断断续续的战争，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人在北方的四个主要部落，逐渐壮大到公开反抗明王朝的地步。同时他在马市做交易并经营据说可作药用的人参。人参当时已经是满洲出口的一种珍贵商品，供中国老人补养用。在辽东的东北边境努尔哈赤建起了一座围以三四道城墙的设防要塞，正中一个城堡供他本人和家族住，中间约有三百间房屋的一个城堡供他的将军和亲信住，外围的城堡供几千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住。汉族的工匠和谋士帮了他的忙。有一个汉人给努尔哈赤当了三十

年谋士。

努尔哈赤避免与明王朝和西面的蒙古部落发生冲突，集中力量团结他的人民。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新的行政制度，尤其是1601年以后逐渐形成的“八旗”制度。起初以三百名武士为一牛录，把他们组织起来分为四旗，颜色为黄、白、蓝、红。后来又增加了四旗，颜色相同但镶以红边，而红旗则镶以白边。在这八旗之下，所有的部落民都被编入，因此部落组织转变为官僚组织。所有的人包括他们俘获的汉族奴隶，这时都在他们所在的各个旗登记入册，并通过作为这个新国家行政单位的旗来收税和集结，各旗很快任命了官员以及管帐的人员以取代世袭的首领。当这个新国家征服了附近的民族并有了依附者后，增加了八个汉人旗和蒙古人旗，总数为二十四个。1644年，有二百七十八个满人牛录、一百二十个蒙古人牛录以及一百六十五个汉人牛录，组成一支约有十六万九千人的大军，而满人不到总数的一半。

旗和组成旗的牛录不作为作战的单位，每个牛录在有事时出一定数量的人组成军队，例如1634年远征内蒙时每个牛录提供二十名骑兵和八名卫兵，组成一支约有一万一千人的军队。这些旗与明代的驻军不同，旗民们分得的土地分散在各地，与非旗民所拥有的土地混在一起。因此旗民们即使有自己的土地并以此为生，他们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

努尔哈赤的另一成就是为行政管理而创造出一种文字。他让他的译员用改进后的蒙古字母来记录女真语，后来在字母旁加上圈点符号。很快用这种满文翻译了《孟子》，因此这种新文字使得迅速吸收儒家的立国思想有了可能。

1616年努尔哈赤称后金国皇帝，似乎是1122—1234年金王朝的继续。1618年他公开进攻明朝，占了辽东的一部分，215并在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文官统治机构。1625年努尔哈赤把

首都移到东南的盛京。1626年去世以后，他得到太祖的庙号。在他之后有其他三位能干的领袖：他的八子皇太极（1592—1643），十四子多尔袞（1612—1650），此人真心拒绝皇帝称号而拥戴皇太极六岁的儿子，但实际上是作为摄政王在统治；最后一位是努尔哈赤的曾孙康熙皇帝，在他从1661年至1722年六十一年的统治时期王朝得到稳固的确立。

为了确立他们的领导地位，早期的满族统治者起初不得不集体决策使氏族领导机构从属于一种新的君主制原则，皇帝所在氏族的首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因而从属于该会议。最后满族皇帝所在的氏族整个被排斥在行政机构以外，不过其成员还集中在京城。这样做的主要政治作用是使皇帝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而避免妇女、宦官专权的弊政。

就满族统治者而言，他们比其蒙古前辈在采用儒家政府形式上要高明得多。他们的成功依靠的是按中国方式组织的国家政权以及使用汉人合作者。随着用官僚制代替部落制，满族统治者从辽东的汉人中选拔有文化的幕僚和行政官员。这时在辽东的汉人人数已有约三百万，估计约是当地满族人数的十倍。这些汉人为参加一个强大、有成就的“儒家”形式政府的前景所吸引。1631年，在盛京建立了与北京相似的六部，还有一切都按明王朝的模式建立的监察机构和其他官僚机构。

满族政权华夷结合的特点在其形成时期可从辽东汉人在满人机构中任职人数的增加上看出来，例如1633年前后有三个明朝官员从辽东去投靠满人。后来这三人率领军队去征服中国南方，他们都被封王，其中一人有二十三个儿子，十一个儿子在清代成为将领，三个儿子成为大臣。

满清的征服

在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和行政管理机构以后，早期的满族统治者就成为北京皇位的主要争夺者。1627年皇太极进攻朝鲜，1636—1637年又再次进攻，使之成为一个藩属国。1629年、1632年和1634年，他率领远征军越过长城关口，袭击华北。他打败了内蒙古人，并使之臣服。经过四次远征，他控制了阿穆尔河（黑龙江）地区。在这一激烈的扩张过程中，1636年皇太极重新命名他的王朝为清。

1644年满清征服中国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是个明朝将领叫 216 吴三桂（1621—1678），他是辽东本地人。当造反的李自成逼近北京时，明朝皇帝召他入援。可是在他到达前京城已陷落，李自成出兵来对付他。吴三桂没有向汉人盗匪造反者投降，而是选择向满人多尔袞投降，多尔袞的八旗兵当时正在山海关东面待命。他们联合打败了李自成，将他赶出北京并加以消灭，因此边境地区非汉族的反叛者就能在汉人的帮助下消灭国内的反叛者。结果表明，从长城以外夺取皇位比从长城以内夺取政权容易，有自己便于防卫的外部基地的满人国家能够发展成为有问鼎实力的皇帝政权，而中国国内的反叛者却不能摆脱盗匪的习性。

在攻下北京后的三十年中，吴三桂帮助稳定了满清王朝，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他在云南和贵州建立了自己的藩国，实行贸易垄断，还耗费清中央政府的国库开支来维持他的军队。辽东的汉人将领在广东和福建建立了另两个藩国，因此在许多年内中国南部仍在满族的汉人合作者控制下，他们的地方政权与北京的中央政权相对抗。当1673年吴三桂兴兵反叛清王朝时，很快另两个藩国紧随其后，这就是所谓

三藩之乱。这场大规模内战使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大吃一惊，对满清王朝的存在造成威胁。直到1681年叛乱才被镇压。

中国最后被并入的部分是台湾岛，这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称呼，葡萄牙人称之为福摩萨（“美丽岛”）。虽然商人和海盗经常去那里，还有福建人向那里移民，但台湾不在明代行政管辖之内^①。从1624年至1662年，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岛上建立了几个据点。最后的反对满清的斗争是由郑成功（1624—1662）和他的家人在台湾进行的，他的父亲作为一个在海上进行贸易和海盗活动的冒险家起家，与澳门的葡萄牙人（这些人使他皈依基督教）、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及长崎的日本人都有接触，在长崎娶了一个日本妻子，生了郑成功。郑成功后来成为先在南京后在福州明代流亡朝廷的宠臣，朝廷赐他以皇帝的姓“朱”，因此他有了一个为人熟知的称号“国姓爷”。从1646年至1658年，他以厦门地区为基地（包括金门），控制了福建沿海的许多地区。

清王朝对付国姓爷海上力量的战术是过去陆上封锁的传统做法，他们采用明代对付倭寇的战术，限制对外贸易。国姓爷进行反击，企图一举攻下南京。在被打败后，1661年他率领大约九百条船去台湾，赶走了在1663—1664年间曾派舰队帮助清王朝对付他的荷兰人。在国姓爷死后，他的儿子继续控制政权，这时清朝采取严厉的政策，极力迫使中国沿海的居民离开岛屿迁到离海十英里或更远在海防线以外的内陆，以便切断台湾取之于大陆的人力、食物和丝绸贸易的来源。这些做法对台湾政权没有什么损害，但后来台湾政权卷进了对三藩之乱的支持。在镇压了三藩之乱以后，1683年清军占领了台湾岛。因此尽管有1644年突如其来的胜利，满清

^①此言不确。明在澎湖设巡检司，辖台湾。——译者注

的征服实际上从1618年至1683年花了两代人的时间。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的统治

直到近代，不控制亚洲腹地就难以保持对中国的控制。 218
从一开始清王朝就动手把内蒙古的蒙古人并入他们的新国家，这促使它在17世纪后期征服了外蒙古，在18世纪征服了新疆，并成为西藏的保护者。

满人开始击败内蒙古人，然后使他们成为藩属，但同时又以蒙古八旗形式将他们变为同盟者，清王朝给了蒙古人发挥才干的场所和机会。清代还进一步完善明代汉人遏制蒙古人的方法——将各部落固定在指定的地区、核准新首领的继位、封授爵号、监督部落间的议事会和邮驿、允许在固定市场从事合法贸易以及对定期来进贡的使团按惯例赠送礼物。总之，清代继续利用中国作为文化、贸易和奢侈品来源的长处，他们保持天子作为正统、荣誉和宠爱之本的作用。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用内蒙古人反对外蒙古人、以正统原则反对篡权者、以帝国的结盟者反对叛乱者，因而防止任何一个蒙古人领袖积聚力量。为了实行这一复杂的制度，满人创建了一个与传统六部平级的新机构——理藩院。

这一制度的推行要靠不断的安抚和偶而的战争。在17世纪后期，1449年俘虏明朝皇帝的蒙古首领的一个后裔在新疆北部的草原兴起，这一地区位于阿尔泰山脉和伊犁河谷，是去西亚常走的通道。这个新领袖是西蒙古人的一个部落准噶尔部的汗噶尔丹。噶尔丹曾在拉萨当喇嘛受过教育，因此他获得了西藏对他在道义上的有价值的支待。在17世纪70年代，他占有了向东远至哈密的绿洲和穆斯林居民，后来他终于越过外蒙古，劫掠蒙古东部，远至克鲁伦河。因此清康

康熙动员了军队，最后在1696年像明永乐皇帝一样，亲自率领大约八万大军分数路去克鲁伦河。噶尔丹的势力在乌尔加南面的一场大战中被消灭，在这场大战中清军所用的火炮预示着一千年来自游牧骑兵势力的终结。

在18世纪50年代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在蒙古部落长期的叛乱、谋杀、篡位、入侵和迁移以后，清军在1755—1757²¹⁹年连续三次占领伊犁地区，事实上消灭了准噶尔部，而在1758—1759年还镇压了发生在中国新疆地区的一次穆斯林叛乱，并建立了对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和其他绿洲的控制。继汉朝、唐朝和元朝之后，这是中国的天子第四次统治塔里木盆地远至帕米尔高原的重要时期。

西藏并入帝国

在征服西蒙古人的过程中，清代统治者也不得不确立对西藏的控制，因为以拉萨为中心的喇嘛教不仅对藏族人而且对蒙古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几个世纪中藏族在中华帝国的边疆都起过作用，在唐代他们作为一支不大但很强的军事力量出现，能够对印度或中国进行袭扰劫掠，远至长安。在元代²²⁰风行的喇嘛教迅速在蒙古人中传播（参见第98页、第111页和第169页）。明代前期定期记录有与西藏的朝贡关系，特别是有关永乐皇帝接待西藏使臣、授予封号、核准官职任命的内容。然而在西藏的教会中兴起了一场改革运动：有一个从未到过中国本土的喇嘛叫宗喀巴（1357—1419），他是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想在西藏的佛教中恢复寺院的戒律。他采取的做法是强使僧侣独身并规定聚会、祈祷、隐修和寺院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常规。他的宗教改革运动按照信徒服饰的颜色一般被称为黄教，以与旧的红教相区别。在明代后期，黄教

的影响传到蒙古，因而蒙古人也卷入了喇嘛教既有的红教和新的革新的黄教之间政治一宗教的竞争。

按照喇嘛教转生的信仰，作为黄教首领的宗喀巴的继承人要在新生的婴儿中找到。当他的第三个继承人到达蒙古时，东蒙古人的一个有势力的汗王授予他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封号达赖喇嘛^①。1588年达赖去世时，找到一个蒙古婴儿作为他转生的继承人。用这种方式，东西蒙古人和西藏的两个教派都纳入了教权政治。黄教中第二位尊者是主寺庙在拉萨以西札什伦布寺的札什喇嘛，一般称为班禅喇嘛。第三位人物是大约1600年在外蒙古库伦（即今乌兰巴托）作为永久掌教者出现的所谓“活佛”（蒙古语为“呼图克图”）。

后来在亚洲腹地的这一宗教政治领域终于形成了制度，首先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世俗领袖，其次中国的清统治者建立了对他的保护权。虽然达赖喇嘛长时期被承认是黄教领袖，但他只有逐渐通过巧妙地利用蒙古人和满人的支持才获得在西藏的世俗权力。甚至在满清征服中国以前，有一个西蒙古人部落就在1641年代表黄教进入拉萨。这个部落打败了红教的支持者，在外来蒙古人的统治下统一了全境，将达赖 221 五世（1617—1682）安置在拉萨精神领袖的宝座上。在拉萨，达赖五世重修了他的雄伟宫殿布达拉宫。

当康熙皇帝面对西蒙古人时，他自然把达赖喇嘛看作控制蒙古的一个关键，因为蒙古喇嘛教寺庙已经吸收了大量年轻人来过寺院的和平生活。康熙皇帝关心的结果是在清王朝的道义支持下1705年蒙古人又一次进入拉萨。紧接着西蒙古

^①全称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金刚持”的意思。“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译者注

222 人的准噶尔部反对清朝的干预，结果这又引发了清朝1720年第一次用武力直接干涉。1727—1728年的一场西藏的激烈内战很快导致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清军的第二次干涉。这时达赖喇嘛的行政机构被置于清朝两个驻藏大臣和一支驻军的监督之下。1750年准噶尔部重施阴谋以及发生多次谋杀促使清军第三次干涉。清代解决这一政治失控局面的办法是在清长期保护之下最终建立达赖喇嘛拥有完全世俗权力的地位。自此以后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和一千五百人的清军监督下通过噶伦会议统治西藏，因此在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之后，西藏的政权被牢牢地并入清帝国之中。

第二节 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

满人对权力的把持

满人在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使自己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少数民族能够一直掌握权力。他们的人数至多只占帝国人口的2%，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不得不保持自己特殊的地位、特权和俸禄，与汉人相隔离来保持他们的种族意识和特性。

保持皇族统治权力的一个办法是建立其物质基础。其来自所占大块田产、特殊税收以及投资等方面的收入可与国家的日常收入相比，但都必须在内务府单独秘密的掌管之下。这笔钱不仅用于宫廷开支，还供皇族成员所用，这些皇族成员由一个特殊的官衙来管理，同时从亲王以下分为十二个主要品级。这些品级由儿子继承后就要比父亲低一级，以激励

儿子展示自己的才能。还有分为三十一个等级的满族贵族，他们从皇帝那儿得到爵禄。

其余的满人都是旗人，他们得到用于耕种的土地和俸禄，不受制于汉人的地方司法机构。另外禁止所有的满人经商或做工，禁止与汉人通婚以及遵从汉人的习俗。他们继续保持传统的氏族制度，接受满语义务教育，另一方面所有的汉人都要像满人一样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再把其他头发剃去作为臣服的标志。

为了保持满人在军事上的控制，清政府拥有八旗兵。在官方的名册中，八旗兵人数从1644年的十六万九千人左右增加到18世纪时的三十五万人左右，不过这种名册上的人数实际上并未足额。²²³ 八旗兵在西方人称为“鞑靼将军”的满人将军率领下分布在各地。驻军分驻在三类地区——首先在北京四周的二十四个小据点；其次为对付来自中亚的入侵驻于西北的战略要地；再其次汉人聚居的中心城市（成都、南京、杭州、福州、广州）和南方的战略要地。每支约有四千人的八旗戍军都带着家人驻在城中他们自己的设防营区中，而不是像13世纪他们的蒙古前辈那样驻在城外。

明代的残余部队和另外征集的汉人组成保安部队——“绿营兵”。17世纪后期绿营兵人数达到五十九万四千人，到19世纪初有一千二百零二个营六十四万人，分散成各个小的单位和哨营。作为一支用于镇压盗匪的地方治安军队，绿营兵很少集结，也不具有八旗兵的攻击力量。总之，军事指挥权被仔细地分割了——在汉人和满人之间、京城的兵部和军队与各省的驻军之间以及整个帝国高级文官和高级将领之间分权。再加上军费的不足，这就防止了任何军事力量发展到不受朝廷控制的独立地步。

作为保护自己并维持对中国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满人

还使自己的故乡成为一直不受汉人生活和文化影响的根据地。在完成征服以后，满人好像有汉化的趋势；在中国的满人学习汉语，同时在满洲汉人从辽东向北迁移。为制止这一趋势，1668年满洲中北部对汉族移民关闭。柳条边（明代开始修建的一道沟墙，沿沟种上柳树）延长了几百英里，从山海关到盛京以北再直到鸭绿江边，以标出汉人居住地区的法定界线。因此拥有自己猎场、森林和河流的大多数满人仍然过着部落生活。关闭这一地区的一个特殊动因是官方对人参的专卖。这种人们认为作药用的植物根是在乌苏里江和其他河流旁的山上采集的，由专门的官员按照食盐专卖制度的一般模式每年向约万名采参人卖出特许证。

人数有限的满人是如何能统治大约是其五十倍的一个民族的呢？现代汉人对这一历史事实感到耻辱。对此有这样几种解释。首先，像满人这样的非汉族民族也像汉族一样是东亚伟大“中华”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帝国在亚洲腹地人数不²²⁴多的“夷狄”长于征战和执掌权力。满人的数量仅够在一个包容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帝国充当皇族、上层监督者和卫戍者，像19世纪在殖民地的欧洲人一样，满人承担着统治的重负并为此也感到精疲力竭。另一些人强调另一方面——清代中国的90%仍由汉人统治，清代政权从一开始就不纯粹的满人²²⁵政权而是满汉混合的政权，满族统治者只有像其臣民一样汉化，才能维持其权力。

这两种观点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也并不与须进一步考虑的事实相悖：中国人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由官僚垄断的专制国家，因此无论谁掌握权力，中国的民众都与之不相干。帝国的政府是表面的，仅限于社会上层，而没有深入村庄之中。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的混合体，其国家部分高度集中而文化完全散布于民众之中。国家可以被一个外来的专制

政府所统治，而中国的文化生活继续牢牢地植根于人民之中。

清代的行政机构

在统治长城以内的中国时，清代对明代行政结构的改变仅是在现有机构中注入满人的权力和实行满清王朝的控制。清代统治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留作后备的主要军事力量、由天子行使的最高政治权力以及满人对行政机构中汉人合作者的监视。从一开始满族统治者就与中国上层的地主士绅家族、作为地方社会领袖的士绅以及明代的官吏和解。地方的地主和行政官员只要臣服一般就不予干涉。满人没有举起社会革命或土地革命的旗帜，相反他们在北京礼葬明代皇帝，宣称他们是来镇压反明的反叛者，恢复中国的和平与秩序。这一做法促使北方的大多数地方官员承认了新王朝，这类人中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洪承疇(1593—1665)，他是个进士，曾在明代出任五省总督。他在1639年被调去征讨满人，被俘后受到优待。在北京陷落后他就任大学士，1645年至1659年洪承疇在搜罗财富，为在华南作战的清军提供补给的行政事务中起了主要作用。

1644年后北京的行政机构成为满汉复职制。六个大学士中三个汉人三个满人，六部中每部有尚书二人，满汉各一人，侍郎四人，满汉各两人。因为这种制度是用一个集体代替以一个大臣为首，所以清代的六部被西方学者称为“六委员会”(Six Board)。满人(加上一些蒙古人)同样在各省行政机构的高位上也与汉人共负其责，初期主要依靠的是已成为旗人的汉人或是实际是满人奴仆(原为家奴)的汉人。清代又任命同等数目的满人和汉人进都察院，完成了他们的双重

226 控制制度。在各省五十六名监察御史被分在十五个道中，满人汉人一起办公。总之，在汉人官员中任用许多忠于清朝的汉族旗人为官使这种复职制度得到了保证。

清代将明代的十五个省又分出三个，在长城以内有十八个省。这时每个省（直隶和四川除外）设立一个巡抚为这一地区各级官僚之首，这一官僚等级由下至上为知县、知州、知府、道台和四个省级行政机构的首脑（主管民事、司法、科举考试和盐务专卖）。每两个省设立一个总督，不过也有一些例外。设有巡抚和总督的省的重要事务必须由这两人联合上奏皇帝，各省一般是由一个汉人巡抚和一个满人总督共同

227 治理。每个省有自己的军队，但主要省份的军队通常是满人将军率领的八旗兵。

满人汉人在共事之初就遇到了翻译的问题。清初的政权使用两种语言，起初通常是由汉族旗人充任的汉人译员被任命去协助所有满人高级官员。直到清代末期，清王朝继续保留在北京将汉文文书细心译为满文这种徒具形式的做法，但两种语言互译的需要很早以前就不存在，因为满人已学会了汉文。康熙皇帝统治时为了有助于继续使用满文编了满文字典，这主要是让后人别忘了这种文字。在这同时，整个清代地方政府都用汉文，地方官员几乎都是汉人。

清代的专制主义

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是元明清时期一直未曾中断的趋势。在清代所有重要的和许多不重要的行政立法司法决定都必须由皇帝亲自作出。康熙的继承人雍正统治时更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个人手中，1723年至1736年雍正在位，他这样做可能部分出自于他继位时的环境。

康熙从十三岁开始生了无数的女儿和三十五个儿子，其中二十个儿子长大。当指定的太子精神错乱时，在他的兄弟中为了继承皇位有人策划了阴谋。当康熙去世时雍正在军队支持下立刻在北京当了皇帝，并大胆地宣布他的登基。嫉妒的反对者散布谣言，说雍正违背了父亲的意愿，甚至可能还杀死了他。总之雍正利用各种手段保卫他皇帝的权力，他的五个兄弟死在狱中，他们的支持者都被害。他还进一步剥夺了皇族亲王控制八旗兵的权力，他禁止再指定太子，把皇位的继承留到皇帝临死时决定。雍正在行政机构中广泛地利用间谍和密告，他规定一种新的文书“密折”只应该让他个人知道，再直接还给上奏人，以便他能够直接从帝国各地他信任的官员那儿得到密告。

清代在明代的行政机构以外增加的主要机构是1729年雍正建立的高级决策机构——军机处。内阁继续处理大多数日常事务，而新的军机处直接与皇帝在一起处理紧急公务，很少用正式的文书和复杂的程序。在通常五六名军机大臣中，经常有两三人是大学士，使军机处与内阁之间有某些相通之处。军机大臣每日清晨与皇帝见面，军机处事务由三十二个经过特别选择的军机章京处理，他们中间一半是满人，一半是汉人。

皇帝工作非常勤奋。雍正批阅了无数的文书，1736年至1795年长期在位的乾隆，大多数时间同样恪守其职。“吾等十余同僚”，有一个军机章京写道，“每五六日轮班值早朝，即便如此，亦甚感疲惫。皇上日复一日听朝，真不知如何？”

国家与文化的统一

把满人控制这一做法与旧有的行政机构相结合只是满人

统治成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有才干的汉人。这一在较高层次连续竞争分级严格考试的制度淘汰了弱者和非正统者，在清代，三年举行两次的县级科举考试每次约有二万五千人选获得最低一级的科举功名。在省城三年一次的考试中，通常约有一千四百人成为举人，以后在北京举行的考试中又会有二百多人成为进士。进士一般年龄为三十多岁，是国家的出类拔萃者。他们获得了进士这一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称号，可以被任命为知县。

通过主持作为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殿试，皇帝个人成为授予勤奋忠君读书人功名的圣贤之师。一旦入选，士大夫就把他们的皇帝主子看作是道德教诲的源泉以及学问和艺术的恩主。对满族皇帝的真正考验是他们能否成为中国学术的保护人以便在天下独尊的天子统治下国家和文化保持统一。为了统治中国，需要文化的领导权以及政治和军事的领导权。

康熙皇帝(1691—1722年在位)是行使这些领导权的杰出代表。他七岁继位，十三岁开始亲政。到二十七岁时，他遇到了三藩之乱的危机，后打赢了这场历时八年的内战(1673—1681)。他率领大军进入蒙古(参见第220页)，在满人中培养了骑猎征战的传统，并在长城以北的热河建立了夏宫。作为中国的统治者，他六次大规模去南方巡行，远达士绅的大本营

229 ——长江下游各省。在帝国的发展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努力阻止淮河和黄河水系的泛滥并维持通过运河往北京的漕粮运输。1670年他制定了被称为“圣谕”的十六条道德箴言，要求官员和乡绅每半个月讲解一次以告诫举止要适当。

康熙在思想上的主要成功之处是争取了汉族士大夫阶层。他本人对经籍很有造诣，对学术有浓烈的兴趣。一些主要的学者拒绝与满人的一切合作，但在1679年康熙开特科考试挑选《明史》的编纂者，成功地在他邀请来的一百八十八人

中录取了一百五十二名最有声望的学者。他还选用汉族的文人、书法家和艺术家在他的宫廷服务。他赞助编纂一些重要的著作，常由他亲自为之作序。这些著作包括著名的《康熙字典》、一部帝国行政地理志以及朱熹的全集。他还支持编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篇幅比《不列颠百科全书》大得多，最后印成时有五千卷。因此满清皇帝就像任何 230 明代皇帝一样成为学术热心的杰出保护人。

对地方百姓的控制不仅仅靠采取惩罚使人畏惧这样的有形措施，还包括一些文化措施和大量的道德规劝。在全国有形成网络的官办粮仓以控制饥荒；有书院和各地的“私塾”传播经籍学问；还有一套官方的荣誉制度以尊敬年高德劭者；各地由官府出面祭神并由官府派人宣讲“圣谕”。

儒家和法家做法的结合，在邻里编组互相负责的制度上最好地体现出来。正如我们所知，这一法家的制度最初为秦国所采用，后又为汉、北魏、唐和宋各朝代所继承（参见第 53—54 页、第 187 页）。其名目的变化多于实际的变化，在宋代被称为保甲制度，尤其适用于植根土地的静态农业社会。明代以里为单位实行互相负责，通过确认所有人的身份和鼓励邻居告发一切可疑的坏人来维持秩序。

清代完善了保甲机构。理论上由一百户组成一甲，十甲组成一保，保长里正由村民选出，可以不是士绅。他们对本地人口的登记负责，注意每户人家居住的人数与门牌上的人数是否相符。这算不上是一种“自治”的形式，只能算是一种由官方强加的非官方的国家权力。通过保甲，政府和地方统治阶层把这一家庭制度用于治安目的。

第三节 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

学术：“考据”学派

17世纪的中国学者当时主要面临的是明代汉人统治的失败以及“夷狄”征服者的再次出现，王朝的更替占去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也提出了许多道德问题，比如如何用儒家的理想反对明代后期宫廷中宦官的腐败，以及是否可以由忠于旧王朝转为忠于新王朝。明代末期仍然崇拜唐宋文化厌恶蒙古人暴政的学者，深为外族的再一次征服所困扰，他们拒绝认为中国以外非汉族的尚武民族能作为未来的政权执掌者具有组织政治能力。许多人仍然坚定地忠于明王朝，拒绝在满清统治下任职。反之他们还抱着传统的假设，认为只是因为国
231 内的混乱才会有外来的入侵，他们企图找到道德沦丧的原因，他们感到就是因为道德的沦丧才给“夷狄”入侵者打开了大门。

持这一新学术观点的一个主要人物是顾炎武（1613—1682），他效忠于明，曾参加过抗清斗争，后受到政敌迫害，约从1650年开始他过着边旅行边研究的生活。他遍游中国北方，直接接触到农业、商业、金融，甚至工业和采矿这些问题。他的旅行记和研究成果编成了一部大部头的地理著作和一部涉及许多问题的广泛流传的文集。

顾炎武拒绝为清王朝效劳，为探寻明王朝崩溃的原因他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他谴责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空泛无用的哲学流派，即宋代的新儒学——所谓“宋学”或朱熹的“理

学”。他还特别攻击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参见第192—193页）进一步发展的新儒学玄学分支，顾炎武正确地发现王阳明强调冥思和自我修养实际是受了佛教禅宗的影响而不是古代经籍的影响。他抨击对先入之见的盲目接受，及其通过四书和科举制度将之宣传为对经籍所作的先见正统解释的做法。他认为这样把中国人的思想限制在一个固定模式里，因而不能面对政治现实或使中国免遭“夷狄”征服。他声称“八股文”比秦始皇的焚书更有害。

为了补救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学术上的失败，顾炎武鼓吹追求“经世致用”。但这种对“宋学”的攻击决不是对经籍的攻击，相反顾炎武是清代的一个大学派汉学的主要创立者。汉学是从宋代以前的著作着手试图重新研究经籍遗产，他们认为汉代学者对经籍所作的注解在时间上与那些古代的哲人比较相近，又没有新儒学的主观偏见，因而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经籍的原意。这时被奉为正统但又遭人攻击的宋学只是在慢慢地退却，不过在清代新的思想主要是由这一新汉学的信奉者提出。

随着这股新潮流出现的是归纳方法的运用，从大量材料而不是在少量经过选择的文献中搜集证据，然后用新的假设去验证证据。这种做法先用于音韵学领域（研究古诗的音韵以确定古代的读音），然后扩大到文献学、词源学和校勘学的研究领域。这被称为“考据学”方法，大大地扩大了经籍 232 研究的内容。确实这种研究使得确定古代文献的真伪有了可能，例如有一个大学者在研究《书经》三十年以后，他用文献的分析和史学的推理证明这部受人尊敬的经籍，即所谓“古文”《书经》，虽然一千多年来都得到承认并为官方科举考试所用，却道地是部伪书。因此汉学经过顾炎武以后许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国大多数古典文献提供了新的评判。

这种工作受到有些人的好评，看作是中国在现代以前科学方法的一个发展，但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文化研究的有限领域，不能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中国的许多早期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更多地是与热爱自然的道教徒有关而不是与学究气十足的儒士有关。中国对自然的研究开始很有希望，但从没有像西方的现代科学那样自觉地使之系统和理性化。清代的学者继续与实践需要以及手工作坊的管理毫不相关。

清代对新儒学的重新评价对正规的哲学也有影响，例如戴震（1724—1777）抨击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是以对经籍的一个错误理解为基础的。宋代的哲学家被道教和佛教思想引入歧途，承认“理”在人的自然天性之上，并对人的物质欲望加以适当的限制。相反戴震提出“理”是事物的内在结构，是包括欲望在内的生活过程中所固有的。他否认新儒学学者认为只有通过反省冥思才能掌握“理”实现顿悟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通过研究，即“博学、细察、精思、明证、慎行”才能掌握“理”。虽然几句话不能评判清代的哲学，但很清楚像戴震这样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改变了宋代的伟大传统，但没有毁坏这一传统。他们的成就仍然是“传统以内的变动”。

官方对文化的控制

18世纪的许多思想文化活动都是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的。雍正资助书院使学者们有了职业，1736年至1795年在位实际执政六十一年的乾隆曾倡议由一大批有学问的文人编了大约五十七部大部头著作。清代的学术从属于官方，即使这种从属是间接的。例如布商的儿子戴震发现自己主要是靠在达官贵人家中当教师或编书维持生计，他是1773年乾隆任

命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学者之一，这部书分四部分——经、²³³史、子、集。这标志着丛书汇编传统的高峰，丛书就是将以前出的书编在一起，有时按一个共同的主题汇编。乾隆的特大丛书《四库全书》多达一万五千人抄写，编书时间长达近二十年。编书人先从明代大部头的《永乐大典》（参见第190页）抄录稀见著作，《永乐大典》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而《四库全书》由三万六千多册组成，包括三千四百五十种完整著作，共抄写七部，印制的目录评介了约一万零二百三十种书目。

皇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统治还表现在对文化的镇压上。²³⁴这镇压持续了大约十五年，与编纂《四库全书》同时进行。搜寻所有的重要著作提供了禁绝对清统治者不利著作的机会，有大约二千三百种著作完全被禁，另有三百五十种著作部分内容被禁，目的是销毁有反清意识或是有反叛内容的著作、对以前的“夷狄”王朝有侮辱内容的著作以及涉及到有关边境或防卫问题的著作。某些作者的所有著作乃至他们写的墓志铭全都被毁，一些似乎有异端内容或仅是用词不当的著作也被毁。“此书虽无叛逆之证”，在一个案卷中御史写道，“然数处言词乖谬，徒沽虚名，应焚”。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可从诸案中的一例看出来，有一位不幸的字典作者，失礼地在字典中详细列出孔子和清代皇帝个人名字用字，这些字是应该避讳不提的。他和家中的二十一人都被押到北京，他被处死，两儿三孙被贬为奴隶。

文化生活

在为官方计划预先搜罗人才时，清代政府以士绅阶级为对象。普通百姓还不足以在文化典籍上留名，对他们来说，道教和佛教仍给了他们对世界的主要解释，家庭和村庄仍是

他们生活的中心。但要想描述现代以前各个世纪中国村民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情况都是有关通常不与农民在一起生活的统治阶级地主的生活。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有财力和闲暇观赏自己的私人花园或收藏古玩以及练习书法绘画。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还看小说并去城里戏院看戏。江西景德镇官窑的瓷器以明代的青花瓷和清代的彩绘瓷最为精美，自然在风行欧洲以前很早就为中国的鉴赏家所赞赏。这一伟大传统的继承者首先是有着浓烈好古兴趣的收藏家、鉴赏家和批评家。他们的业余爱好是他们所受古典教育的自然结果，他们的目的是人文主义的，包含着这一传统的原则以及特有的价值。

这种文化生活虽然传播很广，但仍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商业城市，其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杭州以美丽的西湖、林木葱郁的山丘和许多庙宇而著名，苏州的妇女在整个帝国中是最美的，民谣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235 文人的一个主要爱好是绘画，这种趋势在明代就已是如此，在清代继续延续下来。明代有一千多位画家的名字为我们所知，清代的画家自然就更多。明代皇帝曾资助艺术家，宣德皇帝(1426年至1435年在位)本人就是个有才干的画家。一种保守的画风是仿效南宋时的山水画，像马远和夏珪这些大师一样画上薄雾朦胧的远方、苍劲的松树和嶙峋的悬崖。另一个画家团体集中在苏州，这些士绅艺术家们业余爱好的理想由富裕的批评家董其昌(1555—1636)表达出来，他总结了这样的观点，认为绘画和诗歌、书法一样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表现，反映了人与自然力量的交流，必须认真向过去的绘画大师学习，才能掌握技巧并获得避免粗俗感伤的艺术情趣。这种观点把学习传统与欣赏自然结合起来。艺术家很注意绘

画方法，例如17世纪著名的《芥子园画传》描绘了画家的各种技法。董其昌和与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对中国绘画的全部遗产作了评价和分类。在清代，私人藏品被收到在北京的宫廷，乾隆即使说不上有什么鉴赏能力但他也有很大热情，他使皇室的藏画数达到八千幅左右。

中国的绘画是唯一包含道教和佛教精神而不是儒家精神的最明显的人文主义艺术。本书着重论述政治和经济组织体制，这些体制只是形成了中国人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其全部。公开场合为社会圣贤所控制，而大多数个人私下的思想肯定不是这样。因此，上等阶层的日常生活情况通过了解他们为娱乐而读的几本书，或许能更近地接触到。

文学

一本流传广泛的著作是蒲松龄(1640—1715)写的《聊斋志异》，这本书继承了唐代奇异神秘的传奇故事传统。例如其中典型的故事是有一个单身的年轻男子相继与两个漂亮姑娘来往，两个姑娘竞相用各种方法取悦于他。在他差点死于磨难后发现这两个姑娘实际上一个是化为人形的鬼，一个是狐仙（狐仙是一种怪物，平时是住在洞中的狐狸，但常变作美女出现在人中间）。在这样的故事中环境和活动都不受儒家的影响，更不用说故事中的人物了。但因为作者写成此书用的是带有很多文学引喻的古代文言文，所以只有受过教育的社会上层人士才能看懂，在这些人中这本书实际上很流行。

对广大社会公众来说，白话小说故事丰富，主题寓浪漫色彩，细节又具现实内容。这些小说的成形部分出自于宋代后期和元代，但大多数著名小说都是在明代写成的。其中很流行的一本是《水浒传》，出自1121年左右在世的一个盗匪的

故事，他率领三十六个同伙可能在黄河和大运河连接处附近的一个大沼泽中安营扎寨。职业的说书人用说书的形式发展了有关这群盗匪活动的故事，其中还夹有供说书人唱的韵文。元代的剧作家也用了这些题材，有几个故事段落在1300年前后被记在说书人的话本中。到这时这些盗匪已成为“忠义”的英雄，受到被压迫百姓的拥护而遭到邪恶腐败官吏的迫害，他们的人数也增加到一百零八人。《水浒传》最后的定本是一部由好几个作者写的作品，这确实是部流行的小说，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群众的口味——这是大量对社会提出抗议文学作品中的一例，这种抗议是儒家制度所引起但又竭力试图回避的（参见第176页）。

由单独一位作者（虽然仍不知其名）完成的第一部伟大
237 现实主义小说是写于明代后期的《金瓶梅》。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城市日常生活中寻欢作乐的故事，避免了流行传奇、英雄冒险和神怪的俗套，令人信服地把妇女主人公当作人看待。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对社会风俗和家庭生活的反映，而不因其有色情描写而逊色。

曹雪芹的《红楼梦》最充分地描写了中国的家族制度，他的祖先为满人效力而跻身富裕阶层。曹家的开基先祖曾被满人俘获在皇室为奴，后代得到了很有油水的官职以致于曹雪芹的祖父能有钱在康熙四次南巡时出面接待。曹雪芹的祖父是书法家和作家，他还资助文学，印刷了精美的御批唐诗，所以他死后欠债就不足为奇。1728年雍正皇帝没收了曹家财产以抵充欠朝廷的一些债务，这时曹家包括奴仆有一百一十四人，在南京约有十三处住宅和三百英亩土地。曹雪芹带着早年对繁华逝尽家庭的回忆过着穷困的生活，他在自己主要写于18世纪50年代的小说中记述随着一个富裕士绅家庭的逐渐衰落人与事的变化以及书中人物的得志与潦倒。两个表

兄妹之间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只是几个互相交织主题中最悲惨的一个。

当职业说书人在市场上说的故事被有才干的作家逐渐编为白话小说时，戏剧却很少向书面文学发展以广泛供人阅读。歌舞、武打和世俗幽默结合但对话极少的戏剧剧本难以发展成为让士大夫阶层有兴趣的文学体裁。

随着对这五个半世纪的研究更加彻底和详尽——正如日本对同时代所作的研究那样，现代人对中华帝国晚期文化的印象将会改变。然而我们对明清时期总的印象是其文化丰富但过于深深植根于过去的传统之中，以致其危机已存而创新不足，有时甚至是重复和倒退。例如在建筑上北京壮丽的宫殿建筑采用古代常用的建筑格式——汉白玉平台和支撑巨大金色琉璃瓦屋顶的红色柱梁。在大屋檐下木梁用重彩装饰，然而其结构表现出建筑风格的退步。唐宋建筑是由木柱顶着一套复杂的大直径木托座支撑沉重瓦屋顶的重量，这种唐代风格的大型双架托座现在在日本奈良还可看到，它既有建筑 238 的功用又有装饰的效果，使得木结构富有韵律且又美观，通过托座几根木柱撑起富丽堂皇的屋顶。可是到明清时代，托座越来越小，数目越来越多，一套连着一套，只是在起屋檐的作用——总之从建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退化为纯粹的装饰。

第四节 王朝衰落的开始

军事力量的衰落

到1800年衰落的某些预兆至少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八旗兵军事上的无能、上层官僚的腐败以及大量增加的人口生计的困难。统治东亚大陆近两个世纪的八旗兵正在失去其活力，在乾隆统治时，实录上记有十全武功，但其中大多数与早期的满族征服不一样。

十全武功包括三场已经提到过的战事——两场对付准噶尔部和一场平定土耳其斯坦的战役，这些在18世纪50年代取得的战略上的成就扩大了清王朝在中亚的控制地区。但另外七场战事更多是具有在已建立统治的边境地区进行平叛行动的性质——两次镇压在四川的叛乱，另一次镇压在台湾的叛乱（1787—1788）、四次对外的远征是惩罚缅甸人（1766—1770）、越南人（1788—1789）和在西藏印度之间尼泊尔的好战的廓尔喀人（1790—1792），对廓尔喀人的战事算作两次。乾隆的将军几乎都是满人，他们忙忙碌碌，例如福安康（死于1796年）曾在四川、甘肃和台湾统兵，后来去对付廓尔喀人。为了与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作战，他率领一支军队于1792年行军一千多英里越过世界屋脊，将入侵者赶过喜马拉雅山口，使之逃回他们在尼泊尔的老家，自此以后廓尔喀人每五年派人去北京进贡一次直至1908年。

所有这些后期在帝国边远地区发生的战事都是由一批职业的满人将军去领兵作战的，这就使得常有大笔战费要经这

些将军之手。例如在四川云南交界山区的叛乱者，虽然他们人数不到三万户，但在他们家乡的山道旁建了上千的石堡，最后只有用火炮才平毁了这些石堡。第二场对付这些叛乱者的战事花了五年的时间和七千万两白银，等于北京国库两年多的收入。只有详细研究了清代中叶的战事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到贪污这一因素在其中可能起的作用。在每场战事中帝国的大笔拨款使得延长战事可能给将军们带来好处。我们知道，福安康从1780年至1795年不仅在许多省份连续就任总督，而且他还是和珅（1750—1799）的亲信。239

和珅是个典型的奸臣，让人想起以前臭名昭著的宦官，他的得势是皇帝开始衰老的征兆。满清王朝极其谨慎地实现了防止困扰以前王朝统治的大多数弊端再次出现，皇族的亲王、边境上的军事将领、新的“夷狄”入侵者、盘踞在各省的大地主、在宫廷的宦官、皇后及其亲戚，甚至还有官吏中的党争——都受到小心的防备，以便国家的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不致被削弱。有一个东西是不能防止的，这就是皇帝本人的年龄。当乾隆六十五岁时，他喜欢上了一个二十五岁的漂亮侍卫，这是个聪明但品行不端的满人，成为皇帝的亲信当上了宰相，以后误国二十年。和珅像一颗新星一样在一年内由五品官升为大学士，自此以后他把持着掌管财政和官员任命的重要职位，让他的儿子与皇帝最小的女儿联姻，有时他本人兼任的官职多达二十个。他建立了一个由他遍布全国的亲信组成的集团，这些人与他一样贪污腐败，他向所有的官员敲诈勒索，在他倒台以后他的政敌没收了他的据说价值约十五亿银元的私人财产。240

有和珅在北京带头，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军事将领的腐败是怎样与文官的腐败同时发生的。八旗兵的供给渐渐不足，训练很差，士气低落。以军饷为生的军官和士兵受到了

价格上涨的压力，在驻地试着靠饷米过活的穷困八旗兵不得不去当手艺人、小商人或干些坏事以弥补生活。最后在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相对和平的生活以后，满清军事力量的衰退在一场农民大起义中令人吃惊地暴露出来。

白莲教叛乱

在湖北、四川和陕西交界的山区，汉江上游和长江三峡之间相对闭塞的地区，1796—1804年间爆发了一场称为白莲教叛乱的大规模暴乱。从人口稠密的平原来这里定居的穷苦移民在这贫瘠的山里创造了新的社会，他们仅能勉强维持生计。虽然政府鼓励移民，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文官行政机构、通讯设施和军事控制。显然由于小收税人的勒索引起了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的表达为那些自称继承古代白莲教（参见第179页）的人所引导。白莲教是一种在元代后期和明代很活跃的宗教信仰，这时的白莲教向其信徒允诺弥勒佛将出世，明朝会恢复，将要拯救人们摆脱今世和来世的苦难。叛乱一旦开始就激烈地反对满清统治，但没有更进一步在思想上有所发展，也没有建立政府机构或建立王朝。在早期，叛乱是缺乏组织的成群起义者和缺乏效率的帝国军队之间的一场没有结果的争斗，清军竭力控制山村因而也就是控制地方军事力量的支柱——人员和食物的供应。可是和珅控制的腐败行政机构使这一军事上的努力无法奏效，直到退位的乾隆皇帝死于1799年初时为止和珅一直当权。

241 在双方扰害地方多年之后对白莲教叛乱的镇压表现出许多典型的特点。首要之事是恢复八旗兵的纪律和士气，在嘉庆皇帝1799年掌握实权并支持更有朝气的满人任指挥官后这有了可能。一个系统的计划是实行“坚壁清野”，也就是把农

民集中在数百个有围墙或木栅的村庄中，并在田野清除所有食物来源。就这样集结起来的各地男丁被组织在部分费用由官府开支的自卫团体中，因为叛乱造成的破坏和穷困使得组织这种团练比较容易。有些团练还被训练成有战斗力的军队去追击叛乱者，在追剿的同时，政府还辅之以招抚的政策，企图用赦免投降的普通叛乱者以及悬赏叛乱首领人头的办法来分化为首分子与其追随者。因此清代的镇压是多方面的，包括断绝叛乱者的食物和兵源，在各村组织团练武装以及鼓励人逃离叛乱队伍等。这一计划终于起了效用，八旗兵在经历了开始的失败后又能振作起来，但满族士兵已丧失了其战无不胜的声誉。这次官府的取胜实际应归功于所使用的大约三十万地方团练，后来官府又不得不试图解散这些团练。

人口的增长

在这次世纪之交的民众叛乱的背后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国内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可是人口的增长最终破坏了作为人口增长原因的繁荣与和平。官方估计的人口统计数字每年都在增加，从1741年的一亿四千二百万人上升到1851年的四亿三千二百万人。这样的增加或许在一个正迁入移民实行工业化的新国家才有可能，而在像近代早期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人口稠密的农业国家，这样的数字令人吃惊。

清代的人口数字从其登记和上报的方式来看显然是官样文章而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从1741年起由村里的保甲长登记上报人数，登记在每户门牌上的人数只是他们关心的许多事情中的一项。他们还必须报告当地发生的种种不正常活动——诸如盗窃、赌博、隐藏罪犯、私铸钱币、卖私盐、结伙拉帮以及陌生人的出现。而且，上报的生死、性别、妇女、

儿童、民族和迁徙等的程序既不统一又不可靠。总之处在现代社会以前的中国没有进行合乎现代标准的人口普查。相反，
242 每年上报人口数字已成例行公事，有些省每年上报的人口数字都是均匀增加，常是比上一年增加一个固定的百分数，比如0.3%或0.5%。正如乾隆所说：“数目年年增之如一，此事甚谬。”

清代人口数字是纸上数字的特点表明，人口数字急剧增加是夸大的结果，中国的人口在清初多于人口数字，在清末则可能少于人口数字。比如在明代所估计的人口总数从没有超过六千万，这一数字约在一千五百年前的汉代就已达到。我们可以猜测，到1600年明代的人口实际已接近一亿五千万，这样的数目为清代所承继。18世纪初在行政管理上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将人丁税与土地税合并为一，并规定各省所征收的税额仍然应该以1711年征收的税额为标准。这可能就改变了估计人口总数的动机。一个地方官以前可能会把他估计的人口数压低以逃避正式按人口和土地总数征收税额的增加，而现在他要报告在他治下人丁兴旺意在取悦皇上。皇帝要求事无巨细都要报告也造成上报的人口数字大大增加，到1800年人口总数可能约为三亿，而不是向皇帝报告的三点五亿。

即使如此，在一个工业化尚未开始的古老农业国中这也是人口的巨大增长。历史学家对此所作的解释认为主要是归因于18世纪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以及通过开垦荒地和种植早熟的稻种使食物的供应增加。在古代，将秧苗从秧田移植到水田以后，水稻还需要一百五十天左右才能成熟。对占城（在现在的越南南部）早熟稻种的引进和改良使得生长期缩短为一百天，后来又缩短为六十天、四十天，在19世纪甚至到了三十天。这就有可能一年种两熟甚至三熟作物。另一个因素

是种植了新的作物，玉米、甘薯、烟草和花生都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从美洲传到中国。因为甘薯能在不宜种稻米的沙土地里生长，并且它在单位面积田里提供的食物能量比大多数作物都多，所以甘薯成了中国南方穷人的食物。人口增长的其他因素大概是各地区有关公共健康的卫生条件的改善，对外贸易以及与此有关的手工艺品的生产和贸易的增加，另外还有其他没有提到的国内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口统计数字增长的原因不管是什
么，清代的行政
管理能力却没有相应的发展。百姓可能增加了一倍，而统治
人民的官吏阶层及其差役以及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军队并没有
增加一倍。相反，清朝政府恰恰在国内问题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在各方面好像变得更无效能。这两方面的发展自然相互关
联，治理不良的政府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呈螺旋形下降的
过程中相互作用，这种情况在以前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屡见不
鲜。可是这一次因为有外来的因素介入，这一螺旋形下降的
过程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整个传统的政府和社会制度
都未曾遭遇过的危机中达到顶点。这一过程因西方的入侵而
复杂化，有些人说这一过程因西方的入侵而被“扭曲”。

243

第五节 早期与西方的接触

欧洲的扩张是个常被人说起的故事。从偏狭的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在近代初期去征服世界的欧洲人是受到他们的优越文化的驱使，这一文化出自希腊—罗马和犹太教—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并造就了近代的欧洲国家。欧洲人把他们近代力量的兴起追溯到黑暗时代以后城市的兴起，欧洲黑暗时代与

繁荣的唐朝处于同一时期。他们强调十字军东征、商人阶级的发展、威尼斯和热那亚与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贸易以及意大利人和伊比利亚人对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控制权的争夺这些方面的影响。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生活在欧亚大陆西北半岛的欧洲人好像是穷困的民族，他们住得太北（北纬35至55度之间）因而生产不出多少稻米、糖、菜和棉花，所以不得不像以前的许多蛮夷一样来与中国通商。

从任何观点来看，很显然唐宋时期以至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就其幅员和成就而言都比同一时期中世纪的欧洲要文明得多。作为一个标志，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多少主要的成果从中国传入欧洲，而不是从欧洲传入中国：首先是经过中亚直到罗马的丝绸贸易；其次是来自中国的一大批发明——传播文化的纸和印刷术、便于保持洁净的瓷器、汉代军队所用的弓箭、铸铁、运河的闸门、手推车、在海上行船的舵、航海用的罗盘、火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与这些物质技术发明相对应的还有中国的先进的官僚政府形式，其中包括文官考试制度，更不用谈像绘画这样的艺术了。总之，欧洲人的扩张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心，而且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他们的落后。

244 来自一个可能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小国的葡萄牙冒险家首开中欧关系。在1498年绕过非洲以后，他们于1511年占据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到1514年他们到达了中国东南沿海，在那里以前只有像倭寇这样的海盗曾制造过麻烦。他们所声称的与中国人平起平坐的话看起来没有得到证明，许多人坐着中国船夫的中国帆船来中国。当时大多数欧洲人还不习惯每天洗澡，他们通常走出拥挤恶臭的船舱时，身上的毛比大多数亚洲人多，身上的味道也重。

第一批进入中国水域的葡萄牙探险家就未能表现出欧洲

人在文化上的平等地位。1517年葡萄牙人派出一个使团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见“中国国王”，一到广州，这个使团就按照西方的习惯方式燃放礼炮，但这被中国人看作失礼行为要求葡萄牙人立即道歉。使臣们像任何其他进贡使团一样被安置在市舶司衙门，再按通常的中国方式被带往北京。同时其他葡萄牙人在珠江口外的岛上建了一个堡垒，并按他们通常的方式架起了大炮。这些类似海盗的葡萄牙人阻碍贸易并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人指控他们抢劫，敲诈，从中国的拐骗犯手中买进中国儿童。1522年所有的葡萄牙人被赶出广州，他们的第一个使臣死在广州的狱中。直到16世纪中期他们才得到中国地方当局的同意，在澳门的小半岛上建立了他们的贸易基地。这个半岛被中国当局用墙隔开，并继续（直至1887年）征收土地税和关税，但同时让葡萄牙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在明代后期，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地位逐渐被荷兰人所取代，1641年荷兰人夺占了马六甲，但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印度群岛上。

耶稣会士成功的经过

欧洲人与中国人在两个方面相遇——贸易和宗教教义，但宗教的接触起初比商业的接触更活跃。在明代衰落和清代征服时期，一批耶稣会士精通中国文化，获得了大官僚的庇护，并在北京朝廷供职。

这些耶稣会先驱者中最有名的是1582年被派来中国的利玛窦（1552—1620）。利玛窦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意大利人，身材高大，很有活力，卷须碧眼，声如洪钟。利玛窦和他的同僚一样在来中国前曾获准住在印度和日本，受这段生活经历的影响，他们将自己的使命与当地的环境协调起来。像在

日本一样，他们在中国从上向下活动，求助于上层人物。他们尽可能地用中国方式行事，避免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之间
245 的一切公开联系。他们很快脱掉佛教和尚的袈裟换上儒家士大夫的长袍，他们不是在布道，而是与中国的士大夫交谈，拿出棱镜、时钟并以他们的地理知识来激起这些士大夫的好奇心。尤其是他们能说中国北方的标准官话，还精通中国经籍。这使利玛窦能够把基督教描述成是与汉代儒学一致的知识和道德体系。

到1601年时利玛窦像有才干的中国人一样获得了大官僚的庇护，并能够在北京定居。当他献上使皇帝着迷的两座时钟和一台钢琴时，他和他的同僚被带进宫中表演这些机械是怎样动的。利玛窦最后使自己脱离了进贡者的行列，作为学者领取皇帝给的俸禄。在几年内，他和他的同僚发展了大约二百名基督教徒，其中甚至包括国家的大臣。

利玛窦的后继者发现他们自己最为有用的地方是用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来修正中国的历法。天子对制定准确预告天体位置和季节时间的历法负有特别的责任——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北京的钦天监内，相互竞争的穆斯林天文学家和旧246 式的中国天文学家已经过时，1610年他们预测一次日食有几小时的差错，这样的错误给了耶稣会士机会。耶稣会士日耳曼人汤若望（1591—1666）1622年来到中国，他是个经过训练的天文学家，在宫廷中获得了官职，1632年他在宫中做了第一次弥撒。

到明末耶稣会士在皇族中有了不少信徒，皇帝本人也逐渐受基督教影响。这些耶稣会士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大约有七千卷书的西方文化图书馆，再以这些书为基础用中文译写著作。17世纪期间，在热心的中国士大夫的帮助下他们写了大约三百八十本这样的著作，这些著作主要与基督教有关，但

也包括有关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气象学、力学、药物学、解剖学、动物学、逻辑学以及欧洲的政府和教育的学术性著作。

明代政权的腐败使得许多中国的士大夫不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明王朝，西方的科学和基督教的道德教义相结合吸引了一批著名的教徒，他们能真正地把两种文化结合起来。最著名的教徒是徐光启（教名为保罗·徐，1562—1633），他甚至1604年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前就已成为基督教徒。与利玛窦一起他完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前六卷的翻译工作。1632年徐光启成为大学士，他使这些传教士进入了高级官僚的圈子，还帮助他们用文字优美的中文著作宣传基督教。徐光启和汤若望还帮助明朝廷获得西方的武器。为与满人作战，汤若望在1636年建立了一个铸造作坊，浇铸了大约二十门大炮。总之，西方的技术比西方的宗教更容易得到承认。

在1644年满人征服以后，清王朝仍任用汤若望为主要的天文学家。年轻的皇帝在几年内多次见他，称他为“爷”，并允诺在北京建一座基督教堂。在康熙长期统治的中间几十年内，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影响达到高峰，传教士与皇帝来往密切，有时几乎每天都见到他。他们曾给他一种新药奎宁，他们还受托用西方方法在中华帝国进行测量并绘制地图。他们的地位是皇帝的廷臣，像其他官员一样行表示完全臣服的叩头礼，巧妙地卖弄他们的知识，在宫廷中送礼交朋友。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关系

耶稣会士在两大文化的交往方面是先驱者，面对两种方式，他们终于遭受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然而有意义的是主要的攻击来自他们的欧洲竞争者。

主动与中国交往的欧洲起初受到中国的影响更大。通过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所写的著作描述出来的中国的形象，在启蒙运动中被当作是自然道德完全独立于天启宗教的古代社会的范例，在讨论有关道德和宗教关系的哲学争论中，耶稣会士所描述的中国得到伏尔泰和自然神论者以及重农学派的称颂。²⁴⁹ 18世纪欧洲人喜欢中国的东西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不仅对合乎理性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政府的开明专制制度加以理想化，而且还狂热地喜爱中国的艺术风格，喜爱中国建筑、瓷器、家具和装饰的风格。

在北京耶稣会士继续为皇帝效劳，充任天文学家、译员、绘图师、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工程师——第一批从西方来东方的技术专家。在北京附近的旧夏宫圆明园中，他们仿照凡尔赛设计了巴罗克式建筑和成排的喷泉，作为宫廷中模仿欧洲时尚的一部分。但耶稣会士主要还是传教士，他们努力将基督教的普遍原则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使之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总之是中国化。文化的适应事实上是耶稣会士在亚洲总是获得成功的秘密，在中国正如徐光启所说基督教“弃佛从儒”。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帮助儒学的实践，取得这种地位的基础是承认儒家的典章经籍是“古贤哲言”，否认大量中国人对这些经籍所作的注释讲解，认为其中许多内容是异端邪说，这些注释形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新儒学这门学问的主体；对道教和佛教则攻击它们崇拜偶像。

耶稣会士的妥协遭到了敌对传教士的挑战。对在家庭祖宗牌位前祭祖应该是只当作一种“民间礼仪”允许基督教徒采用呢？还是把祭祖看成是“异教崇拜”加以禁止呢？对国家的祭孔和地方官员的求雨又应该怎样看？对许多神学家来说很显然耶稣会士所作的妥协走得太远，早期的耶稣会士为了让中国读经籍的士大夫接受基督教不惜违背基督教一神教的教

义。因为异教世界毕竟不把上帝当作精神的支柱，所以其经籍中的内容不能用来谈论上帝。

到17世纪40年代这场礼仪之争由从菲律宾来福建的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提交到罗马。他们根据自己在像墨西哥和菲律宾这些较少文化对抗地区的生活经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传教方式，在那些地方缺乏能阻止在普通百姓中进行直接不作更动传教的强有力的地方官僚机构。结果他们学托钵僧的样子沿街布道，而忽视耶稣会士传教的主要经验。到1701年在中国有五十九个耶稣会士、二十九个方济各会士、十八个多明我会士、十五个不进修道院的传教士，他们主要来自法国海外布道会，还有六个奥斯定会士。单单耶稣会士就有七十处传教团住地和二百零八所教堂，据估计整个基督教社 250 团有三十万人，但其领导层处于分裂状态。“礼仪之争”在中国各教会团体和传教机构以及他们在欧洲的支持者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甚至在教皇和清朝皇帝之间，整整一直闹腾了一个世纪（约1640—1742年）。

同时儒家学者仇视基督教是因为有这样几点理由——在理性上怀疑原罪、圣灵感孕和耶稣神圣这样的教义，在文化上保卫道教、佛教和儒家的教义，极为厌恶据说是基督教徒的所作所为，比如男女关系混乱、拐骗小孩以及挖掉死人的眼和心。在中国人中，基督教的主要反对者是杨光先（1597—1669），他是个好动感情但又能言善辩的排外主义者，他为了唤起中国人的自豪感引证耶稣会士的著作，这些著作中说中国人是古代信仰上帝的希伯来人的一个支裔，但直到利玛窦来之前他们失去了真道。他还控告汤若望对最近病死的顺治皇帝念了咒语。这震惊了满清朝廷，因为他们相信萨满教的咒语。被判处死刑的汤若望凑巧为一次地震所救，因为这表明上天不同意这次判决，但五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天文

学家被处死。基督教仍然遭到怀疑，因为其信徒私下建立的组织像一个与外国有联系的秘密团体，其教义也不好理解，这确实有破坏作用。

耶稣会士的失势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所促成的。正当1700年在巴黎为礼仪问题争论不休时，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为自卫接受了康熙的圣谕——支持耶稣会士接受中国礼仪的观点。这真是火上浇油，因为康熙这时对神学表了态，这却是教皇的特权。代表葡萄牙和法国以及与耶稣会敌对团体利益的基督教传教士这时开始破坏基督教在北京好不容易获得的地位。在皇帝和教皇的力量较量中，耶稣会士大多站在皇帝一边，康熙派耶稣会士带着六十九份文书去罗马送给教皇，教皇的回答是发布1715年训谕重申反对耶稣会士的立场。

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礼仪的妥协在一个多世纪中都为北京的朝廷所接受，康熙发现在他的长期统治中传教士一直很有用也很可靠。这时传到中国的教皇对耶稣会士的攻击是一种侮辱，令人难以相信也无法接受。康熙派了一个耶稣会士作使者借道俄国去罗马，但教皇唯一的回答是谴责的调门更高。²⁵¹ 1722年以后，雍正皇帝转向反对总是卷入宫廷政治的传教士，开始积极地镇压中国的基督教。许多教堂被没收作世俗之用，除了北京以外传教士被迫躲藏起来。1724年雍正对他父亲的“圣谕”增加了一条说明，谴责基督教是邪教，这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是清朝的基本政策。1742年另一个教皇训谕为以后的两个世纪解决了礼仪之争，这个训谕要求（至1938年）天主教徒要经过严格的宣誓，禁止所有基督教徒采用“中国的礼仪和习俗”。在乾隆统治时，北京以外的传教士不断地遭受迫害，他们被迫在生活和旅行中乔装打扮，远离城市。教徒人数锐减，反对基督教的民间传说在群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早期中俄关系

欧洲人经海路与中国的接触以及耶稣会士寄自北京的来信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掩盖了另一早期来中国的渠道，这就是从陆路经西伯利亚来的俄国人。在这条道路上俄国人自然会面临更大的后勤补给问题。西方人的船只可以载着他们全副武装、自给自足和机动性强的军队去马六甲或广州，不需要经过别的国家。海上力量能够突然施加很大压力，葡萄牙人或是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人的帆船能够载的货物比骆驼商队要多。

作为一个特点，俄国人越过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的殖民扩张是缓慢渐渐推进的，但相对来说又是长期不断的。1637年俄国人到达太平洋，几乎与英国人建立新英格兰一样早，但他们对东亚的渗透后来落后于从海路来的西方人。英国的舰队或许会像一阵台风袭击东亚，不可阻挡但不长久，俄国殖民者像一座冰山一样向前移动。今天的美国人继承了西方欧洲人从海上与远东接触的传统，俄国人的传统是不一样的。

从1580年前后渗入鄂毕河流域开始，俄国人越过了向北流入北冰洋的几条大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紧密相连的上游流域。那里气候和地形都不好，也没有人口聚居的中心。由莫斯科来的官员建立的统辖这一广大地区的行政机构是寄生性质的，他们通过由驿道相连的设防的分站网向当地部落征收毛皮贡品。因为粮食供应不足，所以俄国的探险家就试图寻找产粮区。他们不可避免地被阿穆尔河（黑龙江）所吸引，在这条河上夏天乘船冬天坐雪橇可到达物产较丰饶的地区，最后直达海边。1643年后，来自雅库次克的哥萨克

分队沿河而下，与当地部落作战，建立设防据点。其他哥萨克远征队从叶尼塞斯克经贝加尔湖而来，1656年在阿穆尔河主要支流旁的尼布楚建了一个据点，1665年在东面的雅克萨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边区村落和一座要塞。

在阿穆尔河流域内的这些据点使得俄国人与清帝国发生了冲突。满洲北部的部落向北京新王朝的君主求援，可是在第一代的满清与俄国的关系中，清代统治者的地位还不强大。他们对中国的征服实际上到1681年才结束，同时他们对蒙古人的主权因在遥远西北部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落的兴起而受到可怕的挑战。西蒙古部落已经在他们北面的西伯利亚与俄国人有接触，东蒙古人已经在尼布楚与俄国人进行贸易。康熙皇帝的目的不仅要把俄国人赶出阿穆尔河，而且要阻止他们不断地接近蒙古人。

早在1619年中俄外交关系就非正式地开始了。1654年有一次比较正式的外交活动，沙皇派了一名使臣带着一封给中国皇帝的信来北京。这位使臣的目的是在不承认中国宗主权的情况下与中国通商，因此他拒绝行叩头礼。接待他的官员对贸易不感兴趣，这个俄国使臣顽固地要求得到欧洲类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威胁到清代对东亚统治权的思想基础。这个使臣没有得到朝廷的接见就被打发走了。另一个俄国使臣是很有特点的 N · G · 斯帕法里—米列斯库（“斯帕法里”实际上是个爵号），他是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受过教育的聪明的希腊人，曾到过西欧的许多地方。他在1676年到达北京，并第一次带来了用拉丁文写的国书。他雇用耶稣会士充任译员，在接收皇帝送给沙皇的礼物时也因为拒绝跪拜而被打发走了。

康熙在17世纪80年代初巩固了对中国的统治以后，就着手系统地修建从满洲南部到阿穆尔河地区陆上和水上的驿

路，设置驿站，建立粮仓和军事屯区，还建立了一支在满洲河流上活动的水军。俄国人很快被赶出阿穆尔河下游。一支力量占优势的清军围攻了唯一留下的雅克萨小要塞。在这一压力下俄国朝廷决定谈判，派了一个谈判代表去尼布楚。时机很有利，因为清王朝的地位仍受到西蒙古人的威胁。仿照斯帕法里—米列斯库的先例，康熙任命两个耶稣会士为与俄国人谈判的译员和顾问。在经过很多的混乱、疑惑和讨价还价以后条约达成了，在此期间两个耶稣会士不停地渡河来往于敌对双方的营帐之间，耶稣会士用拉丁文起草了条约的正式文本，其他文本用满文、汉文、蒙古文和俄文写成。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在条款上是平等的，它制止了俄国进入阿穆尔河地区但给了俄国人在北京有一个进行商队贸易的稳定基地。俄国人同意平毁雅克萨，从阿穆尔河流域撤出。这一条约确定了满洲北部的边界，但满洲西部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边界仍未确定。

通过尼布楚条约，康熙阻止了俄国人对东蒙古人的援助。在1689年以后的十年内，他最后打败了噶尔丹（参见第218页），开始建立对西蒙古人的统治。这时俄国的商队拿着官方的护照经库伦穿过蒙古来北京，通常还有有着半商人半外交官身份的使臣陪同。在理藩院的管辖之下，这一早期的商队贸易被纳入了向中国进贡的范畴。使团名义上被限制为二百人，最后还实行了发放编号凭证的制度。在北京他们被安置在与贡使馆相似的俄罗斯馆内，还有人守卫。俄国的使臣行叩头礼。

在清代控制亚洲腹地的复杂战略中中俄关系一直很重 254 要。在18世纪初准噶尔部不断地与俄国人争战、贸易以及谈判，这时在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人正在不停地蚕食准噶尔部的西部边境。就俄国人来说，他们想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

的商业外交据点，拥有自己的译员，不再依靠耶稣会士。这一方面的努力结果是要建立俄国东正教传道团，理由是要满足在清王朝首都一个人数很少的俄国移民社会精神上的需要。17世纪90年代莫斯科开始以此为借口派俄国东正教神父随同商队来北京，1722年以后雍正皇帝欢迎俄国教会传道团的建立以抵消耶稣会士的影响。他还想在西部阻止俄国与准噶尔部的结盟以及消除俄国人在东蒙古人中的影响。

这样俄国的商业利益和满清的战略利益使得在1727年又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定，俄国谈判代表带来了一千五百人的军队和由一百人组成的随员。在北京谈判了六个月以后，他回到蒙古西伯利亚交界库伦以北的恰克图。在那儿签订了条约，规定了俄国和清帝国的边界并明确表明俄国势力不得染指于蒙古。作为回报俄国人可以在恰克图从事固定贸易活动，允许俄国人每三年派一次官方的商队来北京，在北京保留一个俄国东正教的宗教外交使团，建立自己的教堂，派遣学生来学语言。但在1730年前的一个世纪中有一大批俄国传教士来到北京，而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来北京的俄国传教士仅有六名。清代朝廷对贸易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政治上的稳定，所以最好的政策是保持孤立。清王朝的现实主义还体现在他们派了两个使臣去俄国以争取俄国对西蒙古人保持中立，一人在1731年去莫斯科，另一人在1732年去圣彼得堡。满清的使臣行屈身叩头礼，屈膝跪拜三次，这是俄国宫廷要求东方来的使臣行的礼仪，就像清王朝要俄国使臣在北京所行的叩头礼差不多。清代的这一讲究现实的外交很成功，到1760年清代的权力在西藏牢牢地建立起来，在土耳其斯坦西蒙古人的威胁也被粉碎，与俄国的交往控制在遥远的边境地区。

广州贸易

清代通过限制接触以保持稳定的对外政策在广州的海上贸易中就不容易奏效。在18世纪中国遇到了新的更为有力形式的欧洲扩张，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设在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湾的其他特许公司一样是私人企业，这家公司在集中控制下得到大量资产，并依靠国王发的 255 特许状获得了在海外统治的广泛权力，垄断国家在某些地区的贸易。它建立了武装的据点，对那些地方的英国人行使司法权，发展了海军和运输船队，实际上拥有既是商人又是政府的特权。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了印度直至1858年它的特许状到期。英国发展与中国的贸易是以印度为基地，商业精神在公司的活动中仍占主要地位。当英国公众对中国茶叶的需要量不断增加时，英国、印度和中国很快加入了一场三角贸易，因此英属印度的收入开始部分依靠在广州的贸易。

1699年有一个英国的商站在广州建立。在以后的六十年中，英中贸易逐渐制度化，我们可以称之为广州制度。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英国人最后把他们所有的商行都集中到广州，出口贸易逐步集中于茶和丝。在18世纪期间茶叶贸易极为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茶叶贸易本身进一步发展——英国人为谋利在国内实行茶叶专卖，在国外通过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茶叶贸易赚钱，而清政府力图在广州对这一贸易进行管理，以此向北京提供钱财。

就中国方面而言，在清代海上贸易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其超出了进贡制度的范围。在广州与欧洲人的贸易仅是在进贡制度外发展的两大贸易利益关系之一——另一个是中国商人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这些中国商人实际上在进贡制度外

的贸易发展方面开了路，西方人仅仅是走上了他们开辟的通道。在这种中国的“帆船”贸易中，中国的船只大小可与欧洲船相比，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欧洲船的数目。最大的船可能有一千吨的载重量，载有一百八十名水手。中国帆船平均载重量为一百五十吨，这些船船尾高耸，条板撑起的三角帆利用顺风航行，船速为每小时六海里，甚至达到八海里，这样的船完全可与东印度公司的船媲美。这些顽强的商人即使不到几千人也有几百人，他们每年定期航行于厦门或广州与马六甲海峡之间，冬天南下夏天北上。他们按照详细的航海指南航行，沿途停靠许多港口。因为与东南亚的贸易是由中国船从事的，所以不能按照旧的进贡形式来管理。清代官员代之采用了一种传统方法，任用商人机构“行”（参见第135页）作为特许的代理商负责这一贸易活动。

用类似方式管理广州与欧洲人之间贸易的中国商人逐渐
256 组成被西方人称为公行的商人行会，整个公行由六至十二个代理行组成，拥有与西方人贸易的垄断权。这与中国国内贸易中采用的限制做法属于同一类型——行会垄断、由官吏特许并对官吏负责、很少有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余地。在广州主管外国商人征税的是个北京户部特别任命的高级官员，外国人也就称他为“Hoppo”（户部）。中国的行商们付给他很多的钱并要对外国的船只和商人负责，每一艘进广州的船都由一家行商担保作为这艘船的“担保商”。就外国人这方面而言，东印度公司设在广州的委员会对英国所有的船只和人员负责。到1760年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都以这种形式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外国商人受到许多规定的限制（不许外国人带妻子来、不许乘轿等等），不许他们进广州城，只许他们在被称为“十三行”的沿河一带。他们的贸易由法律限制在公行进行，同时

所有的外国人仍然服从中国的刑法程序，这一法律极少给个人以公民权利，可能还要让人遭受专横的监禁和折磨。

在广州如诗如画般的生活和贸易现在已成为传说。对住在十三行的年轻西方商人来说，在这种异国情调的环境中偶而与著名的行商接触就有获得大笔利润的机会。贸易的集中使得人们只能说洋泾浜（即“商业”）英语，这是一种按中国的词序使用有限的外语词汇的混合语言，现在在香港还能听到。年轻人只要他们不死于疟疾就能很快赚到钱，但他们极少学习中国的文化。英国与中国之间在广州的关系相当简单，由一个商业公司而不是主权政府在操纵，没有提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问题。

就这样广州被卷入了世界贸易之中，尽管中华帝国在思想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政治上还是将广州与世界分开，然而情况仍是如此。破除中国传统上轻视商业发展的思想对保守地贪图眼前利益的东印度公司来说似乎不很迫切，但对为英国工业品寻找出路的政府领导人来说就要迫切得多。有人已经在鼓吹在东方和西方用自由贸易代替重商主义，1784年有进取心的年轻美国人开始在广州参加竞争。私商鼓动要进入印度市场，废除公司的垄断，这是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的背景。

这个使团出使的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承担，他从英国国王 257 身边乘一艘战舰去天津。马戛尔尼要求允许在宁波、天津和其他北方的地点通商，可以占用一个或几个岛作基地以储存英国货物和整修船只，还要求以一种固定的印花关税代替在中国除正式费用以外还要向私人送礼的制度。从一开始，这个使团就遇到了他们要被纳入进贡体系的问题。他们带来的精美礼物被中国官员贴上了“贡物”的标记，中国官员还要马戛尔尼叩头，但他坚决拒绝这样做。皇帝颁旨赞扬英王乔治

三世“恭顺之诚”，但又指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从这次直接接触中，英国人对中国有所了解，但广州制度没有改变，进贡的框框在中国的档案中再次重申。1795年来的一个荷兰使团增强了这一看法，因为荷兰的使臣们在中国的新年里与从中国边远地区来的使臣站在一起，他们还多次行叩头礼。

在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后面隐藏着在广州的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这一利益十分巨大，东印度公司在其末期的行事又十分谨慎，以致广州制度不受任何外交活动影响，继续保持不变。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准备得不如马戛尔尼使团好，不幸的是当这一使团到中国时正值英国人在与中国的进贡国尼泊尔作战。当阿美士德到达北京时，护送他的中国人对他说三道四，皇帝没有与他见面就下令让他离开。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欧洲人正要以新的压倒一切的活力对外扩张时，西方与北京之间的接触不比17世纪更多。作为中国帝国传统继承者的清代统治者完善了他们的国内控制制度，稳定了他们与伊犁、拉萨、恰克图和广州的非汉人之间的关系。欧洲甚至北美都与中国有了接触，但头三个世纪的接触被控制住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仍然基本上不受干扰。

第十章 19世纪中国面临 的人侵和叛乱

258

第一节 传统中国对变革的抵抗

19世纪中叶，中国、日本、越南以及朝鲜相继受到西方国家扩张的威胁，被迫扩大与西方的交往。每个英国人都引以自豪的维多利亚时代给东亚人民带来的却是沮丧和灾难，对庞大的中华帝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当西方列强敲击中国大门的时候，它已滑入王朝循环发展的下坡阶段。伴随着19世纪岁月的流逝，国内外的麻烦接踵而来。对于学者来说，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解中国内部叛乱的发生和外部西方入侵的冲击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至于一方对另一方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两者都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时时刻刻处在相互作用之中。

影响中国现代变革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的重心深埋于中国内部。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于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传统模式的惰性和固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自给自足，相对来说使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产生了抵抗力并使它无视这种挑战。在日本，一种经济和社会变动已在酝酿中，部分由于对与西方接触作出反应，这种酝酿将发展成为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在庞大得多的清帝国内部，却没有发生这类变革。学者们似在争论中国的这种变革为何如此姗姗来迟。

259 统治阶级及其乡村意识

造成中国死气沉沉的原因之一是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意识，这个统治阶级介于人口众多的农民和规模相当小的帝国政府之间。的确，明清两代的统治阶层包括多种类型的人——收租的地主、商人、有科举功名的文人、在野官员。所有这些人在乡村的集镇以及行政中心形成了地方高贵阶层，即满清王朝的地方势力。

统治阶级饱读诗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使他们自身抱成一团，脱离农民。统治阶级的力量来自长期存在的家族制度，实际上，上层阶级都是由庞大的望族组成的，这些家族千方百计维持自己的存在和地位。一个家族或宗族的族长们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富，编写家谱并在家族祠堂主持祭祖仪式，发放救济，供可造就的子弟上学，训诫不务正业的族人，以免被抓进官衙和监狱。婚配由家庭安排，个人不能自主，通婚主要着眼于维持家族结构。当然，家族确实打破了阶级界线，将贫富家庭连结起来，提供了在一个家族内部地主家庭与佃农家庭之间进行接触和凝聚的渠道，这有利于家族上升到统治阶层。但是在人口增长的时代，把土地分割，然后在子嗣中间进行分配的做法又导致家族地位的下降。总的看来，地方高贵阶层中的血缘关系似乎使家族制度能够稳定和继续存在下去，并允许它有一定的机动性，以便在此制度中容纳穷苦但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成员。

这一士绅集团的理想是乡村型而不是都市型的，他们重节俭而轻扩张基业。儒家学说重田作、轻商贾，瞧不起商人的寄生性活动，“知足者常乐”是中国一则古老的格言。从思想上说，人们应该满足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就像那些过着鸡

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生活的道家名士们那样过纯朴自然的生活。

拥有土地是地方高贵阶层的主要支柱，他们希望通过科举制度得到升迁，这一事实使田园诗般的怀旧世界观保持着活力。儒家学说认为，自我培养，特别是在修习经籍基础上的学习，将使人成为一个人上人，并且经过政府的科举考试，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科举功名的人，甚至可能做官。这种理想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科举制度甚至对富有得足以买通他们晋升道路的非读书人也有利，故而他们也支持科举制度。有低级科举功名的人——尚无资格为官的下层士绅分为 260 两种类型，大多数是已通过初级考试、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他们叫生员），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通常是捐来的科举功名（监生），得到科举地位是对他们“捐献”的回报。像在以前的朝代一样，也有少数功名是世袭或靠举荐取得的。到1800年，这一低级科举功名阶层总数大约超过了一百万人，并形成了一个候选集团，从中产生高级士绅和上层的官员。包括那些有资格为官的人在内的在职和离职的上层官员，总计在十二万五千人左右，他们享有使自己有别于下层的特权。这样，科举制度便具有某种弹性，既允许那些付得起买路钱的人上升到统治阶级，同时在正常情况下又保证那些特别是在上层占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在实际掌权者中据主导地位，举足轻重。这反过来又保证了正统理想的持久统治地位。

中国的前现代经济

与西方的接触最早是以商业形式开始的，远在外交关系建立或西方思想传入之前，贸易就很重要。但是像统治阶级一样，中国经济亦反应迟缓。这是因为中国幅员广大，且高 261

度自给自足。19世纪早期，大约有三亿人生活在中国农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其基本财富主要是土地本身。他们投入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建造有护堤和灌溉渠的水田，甚至在常常不可能灌溉的西北部建造梯田，营造漕运和灌溉两用的水道；利用沟渠、水闸以及脚踏水车设备把水灌进农田。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靠此改良土地。这种农田经济意味着过去进行了大量的劳力投资和将来还要继续大量使用人力以维持其发展。至于其他基本装备——供役使的牲畜、工具、房舍以及贮藏设备——更是少得可怜。由于没有技术革命，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劳力资源却是丰富的。18世纪人口迅速增长，使年轻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土地有限、资本缺乏，而劳力却很丰富，并且一般来说都熟练地掌握了传统的生产方法，几乎没有任何进行节省劳力的技术革新的途径或动机。生活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泾渭分明的职业区分也阻碍了革新。农夫和工匠基本上仍旧是文盲，而有知识的人又很少碰到田地和工场里实际的、机械方面的问题。

262 就商业而言，地方贸易集中在集镇，每省都有数十个这类集镇。在平时每三天或四天举行一次的定期性集市上，汇集了来自集镇周围村庄的产品。这些村庄通常有十几个，赶集者利用牲口、手推车，或肩挑，或从水路坐小船一天即可以往返。坐地小贩和流动商贩把农民自己无法生产的少数基本日用品带到集市上，其中主要是食盐、金属和纸张，也有低级奢侈品、纺织品、陶器、茶叶和城市工匠的产品或其他地区的产品。

在这种集市范围内地方贸易的细胞型结构之上是地区之间广泛进行的某些特殊产品的贸易，如铜、瓷器、毛皮、棉

花、丝或木材。中国的国内贸易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人在广州的贸易只是它的一条小小的支流。

水运是地区间贸易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茶砖（为了便于运输把茶做成砖型）溯长江及其支流逆水而上，然后由商队运往蒙古和俄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利用大运河和近岸海路交换商品，福建茶和安徽丝沿赣江穿过江西运往广州。各种四川产品顺长江而下，而往返于近岸海路的帆船队，特别是从宁波北上直达满洲和从厦门南下东南亚的航行，则构成了另一个广泛的运输网。帆船队将大豆和豆饼运出满洲，而把亚热带产品运到北方。这种中国水路载运贸易将证明是西方人打入中国经济的突破口，因为在这里引进轮船能够迅速改变传统的技术。

另一方面，对外联系却不能改变这种庞大的国内经济的模式。像茶和丝之类的出口产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村手工业产品，不会轻易受现代化的影响。地方居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和用于贸易的资本都仍然是极为有限的。几乎没有创办信贷业，只有以铜板和银锭形式出现的有限的流通货币。商人受官员控制，依靠官员的保护，或者就是商人自己变成半官半商。他们显示出的是包税人精神，而不是生产企业里投资者的冒险精神。

就政府方面而言，它在19世纪早期并没有起到领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家的经典学说毫不重视经济的增长，强调节约使用地税而不是创造新财富。也许存在着一定规模的贸易，但海关的进口和出口税率相同，没有通过出口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财富的重商主义概念，官方的垄断和特许制度减少了竞争。

总而言之，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第一，中国把

自己看成——事实上也确实是一—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统一体，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既不大力提倡也不课以重税。第二，当欧洲正在把科学和发明制度化的时候，中国尚未这样做，所以新技术的发展微乎其微。第三，由于对外贸易和发明新技术都缺乏动因，并且备受政府时刻准备对任何新兴的获利经济企业进行垄断或超常课税之苦，使得在英国工业化中极为重要的那类企业在中国则完全不可能建立。除非在官方的羽翼之下，否则资本积累便靠不住，根本没有立法保障、投资市场和合股公司。最后，在资源利用方面，丰富的人力在所有过程——灌溉、稻米种植、运输和手工业等中的利用率达到很高程度，但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政府的惰性

清政府也同样具有对外国刺激反应迟钝的特点，这一特点首先表现为清朝的地方统治相当消极，这是因为它的统治分布得如此广泛，通常一个知县所辖地区有三百平方英里，人口二十五万。政府里的一位下级官员必须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他无力压服刁民或地方士绅，无力制定新政策，同时他有关统治的哲学也不容许他做这类事情。地方官可以得到随他一起到任并由他支付工钱的师爷和家仆的协助，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地方官必须管理地方衙门的所有人员，包括半常驻的政府职员和各类下属——衙役、典狱、捕快以及各种随从。地方官必须对他治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负有不能解脱的责任，他的管辖权是地区性的和面面俱到的，而不具有职能

性和专门化的性质。由于他的德行被视为榜样，所以对于所有发生在其辖区以内的事他都要以一种近乎礼仪的方式予以褒贬，就像皇帝在自己的帝国内所做的一样。这种我们可以称为礼仪责任的教条使得官员们千方百计地力求避免出现麻烦。由于希望在三年内能够升迁一个新的职位，地方官员对在其辖区内避免直接使他难堪的事比对促进其辖区的长期发展更感兴趣。公开镇压骚乱因而承认其存在比隐秘不报更容易断送个人前程，通过招安将土匪编入团练的方法比公开剿灭更为可取。其结果是导致产生一种姑息，即协调各种地方因素而不是对它们进行变革的根深蒂固的趋势。所以，中国的宦海精神是消极的，官员们坐等事情的发生，盼望不要出事。

制约和平衡的政府结构旨在使国家之船保持传统的航向，而不是使它转向新的方向。即使在最高层，皇帝的个人统治也是消极的，他的职责在于进行美化了的公文交换，而不是制定政策。公务程序以写呈皇帝奏折开始，以皇帝发下圣旨告终。公务量如此之大以致使皇帝日益被迫充当一个各种建议的简单转达者和挑选者，而不是制定大政者。这是中国国家在面对西方挑战时无力变革的原因之一，即领导权在下层形同虚设，在上层则化为乌有。各省中的官员难以创新，而在北京的皇帝却因太忙而无暇创新。官僚机构职责广泛，但在地方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首创和革新能力，维护帝国权力的沉重负担使官僚机构丧失了变通能力。

腐败导致的衰弱

财政管理进一步限制了政府的反应能力，因为这种管理容忍有组织腐败的增长，到19世纪中叶，这种腐败耗尽了清

王朝的财政资源。官员同时也是包税人，他们希望既维持他们的官职又保住他们从征税中所捞取的个人利益。这种公私资金的混杂，像今天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官员管理和责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官员的岁入并不完全以货币征收（某些是以实物或劳役的形式征收的），税收也不按预算和审计制度计算，而是根据在各种层次上表明旧中国特征的个人关系和讨价还价中的极端复杂的相互影响来征收。纳税的实际数目并不固定，而取决于各种利益相互影响的具体情况，其中包括缴税人的利益，收税人及其上级的利益，还有国家的利益。接受非官方规定的税金或“勒索”成为惯例，只有在超出勒索的习惯界线时，才算是真正的贪污。

对于统治阶级和政府是怎样靠农民养活的，我们在中央政府的税收数字中仅能获得最肤浅的认识。在和平时期和丰年，所有三方均可收支相抵。但是，一旦统治阶级自我克制的儒家道德水准下降，那么政府和地方高贵阶层的利益便不可避免地趋于分歧。地方地主阶级的本能总是为了自己而加强勒索，如果对此不加限制，这将使政府承担无休止增加人民负担的责任，并使政府失去不违“天命”的地位。因此征税的官方定额和给北京的报告只是表面文章，在其背后是地主、官员和百姓三方之间无休止的斗争。
266

例如，在长江流域下游这一剩余稻米的主要产区，土地税主要包括两项。第一项是固定的地丁税，这是一种按土地数量最初对十六到六十岁男丁征收的混合税。但自18世纪初以来，它变成了对每一行政区征税的纯财政定额。第二项也按定额征收，它是向北京缴纳的贡粮，缴纳实物和货币皆可。收税官不仅在既定税额上另加若干名目，而且千方百计地在征收过程中牟利。一般来说，这些利益是靠厚颜无耻的

方法获取的。依靠这些方法，每石稻米就可扣掉即“勒索”掉好几升，或以银代米缴税时按高于当时市场价的价格征收；或在以铜钱代银缴税时按高于通行的铜银兑换率征收，超征和克扣有时会高达原税的十倍。收税者的这些个人所得通常要与在这一体系中给予合作的地方士绅以及高级官员分享。收税人、士绅和高级官员抱成一团，靠农民的“血汗”生活。胥吏和文书则靠掌管征收各种搬运、巡视、进门等费用来实现自己的勒索。

在所有这种形成惯例的腐败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官吏和大“户”的联盟。一般来说，那些通常拥有士绅地位的大地主以低于中农和贫农的税率缴税，这使税收制度成为“累退的”，即穷人负担反而更重，而不像现代所得税那样是“累进的”。一个家庭越富，就越能与官吏达成较好的协议。社会中拥有功名的士绅，即使他们不是地主，但由于仕途有望，税吏也得不同样予以照顾。每一省都可颁文规定富人以低于穷人的税率缴税。在大户付四千铜钱便可抵一石税的地方，小户村民可能必须付两万。衙门走卒总是准备通过硬逼欠租佃农来帮助地主。结果，穷户便寻求托庇于大户，以便按照后者比较有利的条件缴税。就大士绅户而言，他们也乐意代表他们的小户邻居付这些税，并从这种交易中获得好处。为他人缴税的大户被称为“包税户”，这样，地主士绅赚取了中间人的好处，国家在税收上被蒙骗，小民在占优势的地主官僚联盟面前不能保护自己。
267

前面我们已对19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作过不同的解释：第一，广大农民缺少经济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以改善他们的命运；第二，对其产品的腐败而不合理的分配使他们遭受到地主官僚统治阶级的盘剥。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相左。下面的研究将把重点集中在形形色色迄今几无研究的中

国众多的地区多样性上。

第二节 学术与思想

“今文”和“经世”学派

在白莲教叛乱（1796—1804）以后，王朝衰落的惯常征兆并没有逃过士大夫阶层的眼睛，他们凭其训练特别觉察到并且相信王朝循环的作用。腐败和叛乱曾经缩短了以前王朝的寿命，清朝怎样逃脱这一命运呢？

这种关心促进了学术的新发展。到19世纪，汉学（参见第231页）已经确立了其新的正统地位，但此时两个新趋势变得重要起来，一是批评经学的“今文”学派的继续发展。作为正统的汉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东汉时期的经籍，据说“古文”经籍是在那时发现并被奉为正统的。然而，在17世纪后期，所谓“古文”《书经》被证明是伪造的。于是大胆活跃的学者们便开始对其他“古文”经籍产生怀疑，并从中找到了伪造和窜改的进一步证据。因此，“今文”学派似是而非地信奉在西汉被重新发现并被接受的较老的经籍文本，宣称这些经籍比自东汉以来曾被接受的正统“古文”更古老、更真实。同时，“今文”学派在这些“今文”经籍中，特别是在《春秋·公羊传》中发现了可以影射迄今讳莫如深的政治问题并看起来好似与19世纪事态演变过程有关的激进的新含义。简言之，《公羊传》中的变革思想可以当作倡导改制的基础，这为19世纪末对经学传统的大规模抨击作了准备。这将为对传统本身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和真正的革命打开了大门，但是，直到19世纪90

年代，“今文”运动仍处在不断积聚力量的阶段。

19世纪初期的另一个新趋势也是一种较早研究方法的复兴，就是“经世”学派。它主张将学问应用于政府统治问题以反对直观知识、思辨哲学和形式主义。王朝衰落的迹象促进了这种关心统治政策和过程的学派的复兴。局限于研究古代经典特别是语言学的清代主要学术传统提供了以前历代帝国典章制度的详细知识，包括祭祀、丧服、运输工具，甚至发型，但对如何解决清代晚期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则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良策。随着衰落的不祥之兆日益明显，反思者如同他们在17世纪明清交替的混乱时期所做的那样，再次开始指责学者们不切实际以及只专心致志于枯燥无味、毫无用处的书本知识之中。顾炎武的著作（参见第231页）产生了特别的促进作用。这场新运动的口号是“经世致用”。运动的领袖们为自己规定了研究如何维护帝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任务。

“经世”学派的努力在魏源（1794—1857）的经历中得到了体现，他是一个来自湖南的豁达大度、务实的士大夫。他在北京研究过宋代新儒学和汉学，他对这些正统学间的批判为“今文”运动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他还领头倡导学者的才学应该应用于迫切的实际管理问题。当大运河断航的时候，魏源于1825年写了一篇论文，倡导从海上向北京运输大米。他的崇拜者、一位致力于改革的江苏巡抚在1826年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在仅仅一年之中，就将一千五百船大米运到天津。在19世纪30年代，魏源协办淮北盐业专卖的改革事宜。后来，在1850年魏源亲自掌管部分盐区，树立了样板，所以，魏源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学者。

1826年，魏源应邀编纂了一部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书中收录了两千多篇论述经济和其他管理问题的论文。此书成为这类文集的范本，后来出现了十多种续本和增补本，以使

士大夫要关心政府问题的思想易被接受。随后魏源在北京得到了大学士属下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接近档案，看到了清统治下积累的大量未公布的奏本、文章、报告和决定。他开始

269 编纂一本有关清代征战的大部头当代史著作——《圣武记》。在书中，他披露了清征服中国、蒙古、西藏、新疆和台湾，击败俄国人、缅甸人、越南人和白莲教叛乱者的令人难忘的记述，正是在1842年这个遭受英国人所造成的空前灾难的时刻，他完成了这部著作。

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像魏源一样关心时事政策，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茫茫人群中犹如沧海一粟。在镇压不同政见者和禁止在政府渠道以外对官方政策进行学术讨论的同时，清朝劝诱文人的一贯政策已使满族征服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所呈现的早期活力转向了正统的、无其他目的的版本研究或典籍考据。怀疑主义和批评已主要限于语源学和经籍训诂之类的事情，那时学者的才学都用于狭窄的版本目录学或纯粹古典文学的研究，阮元（1764—1849）的情况可能会说明问题。他是一个著名的目录学家和学术事业的促进者，1817—1826年这非常重要的十年中在广州任总督。他多次担任巡抚和总督，建立了许多图书馆和书院，出版了至少十一二本大部头
270 著作——艺术品的目录、诗选、《十三经注疏》、珍本文集等等。他在广州任职的十年中，与英国的灾难性冲突正初见端倪。就在这一时期，他又建立了一所书院，编纂了地方志，刊印了共计三百六十六卷训诂一百八十种经籍的集子，发表了自己大约五十卷诗、散文和书目笔记，出版了一百八十三卷的江苏诗选。他还对中国画、数学以及古代金石铭文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整个这一时期他都是负责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高级官员，难怪他对在广州的西方人一般实行让步和消极的政策。

中国人眼里的西方

由于像阮元这样的正统而勤勉的士大夫以身作则，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几乎不可能对海外的民族感到好奇和有兴趣。郑和下西洋和明代欧洲人首次来到中国所留传下来的民间知识被草率地连同错误、误解以及其他一切抄写出来，并被当成1800年有关欧洲的信息。这是一种经过无数次转抄已经过时的知识，除了这种知识以外，唯一的其他知识来源是那些到广州来的西方人本身，但他们为数很少并且与商人的交往比与学者的多。在缺乏比较准确的资料的情况下，19世纪早期中国的研究者们把千百年来在与亚洲邻近民族打交道中产生的 271 的旧框框套在欧洲人和美国人身上，就像亚洲内陆草原上时隐时现、不断变换名称和居住地的游牧民族一样，那些派商人来广州的西方民族，在中国著述的记载中，幽灵般地变换和改变着身份。它们的名称已完全搞混了，1819—1822年阮元主持编写的广东省志中，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被说成居住在奎隆（在南印度）和摩鹿加群岛之间，而且只谈到明代的事。葡萄牙的位置被说成在马六甲附近，而英格兰则被作为荷兰的别名，或是荷兰的属国。法国最初是佛教国家，后来变成了天主教国家（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佛教的旁支），最后，法国被说成与葡萄牙是同一个国家。

这给人们留下了学者们对了解西方不感兴趣的印象。当一些如魏源那样的与众不同的人打算了解西方的时候，他们只好寻找西方著作的译本。中国尚未发现事情的真相，具有扩张性的西方使中国大吃一惊，四个世纪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突然失灵了。

第三节 广州制度的崩溃

区域贸易和私商

印度的私人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东印度公司业务所不可或缺的扩展，是与亚洲贸易和收入来源相联系所必需的。私人企业以所谓区域贸易的形式出现，即在公司的特许状所限定的商业区域内由私人从事贸易。区域贸易首先在印度及其周围兴起，英属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向英国和印度的区域贸易商出售可以在加尔各答或伦敦支付的汇票，这样便可以把商人的利润作为开公司支票的一种手段。为了创造获取利润的更大机会，区域贸易向东扩张，例如，孟加拉的鸦片供应由公司垄断，它由公司拍卖，由区域贸易商买走并转运出口，起初主要是出口到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私人商号促进了区域贸易，他们建立了“代理行”，不仅向他们自己的航运投资，而且在委托的基础上为其他私人集团办理处理货物、航运、货栈、保险和销售业务。他们处在英国商业、金融以及工业扩张和现代国际经济的最边缘。

272 区域贸易从印度很快扩大到了中国。早在17世纪80年代富于创业精神的英国臣民就已开始驻在广州充当其他欧洲政府的挂名代表，以躲避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控制。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例如，在1823年，马地臣是丹麦领事，托马斯·登特是撒丁的领事。要在这类私人企业中取得成功并不需要什么资本，但要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和才干。于是，登特、马地臣以及其他在广州的“非官方英人”很快开始拥有船队，建立

保险公司，开办银行业务。这些私商是与在印度相类似但规模更大的代理行商人在远东的关系户和朋友，而且往往是亲戚。东印度公司于1813年停止垄断英国在印度的贸易以后，这些代理行便站稳了脚跟。这些商行和广州的商行一样，最终与伦敦的英国世界性经济扩张中心发生业务往来。在这一扩张中，通过提供四分之三的英国对广州的出口，区域贸易大约在1817年后完成了两件事：第一，它为印度的出产提供了出口口岸，并将利润汇回印度；第二，它继续为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茶叶提供资金，伦敦的英国政府通常通过对茶叶征税而获得利益。

在中国方面商业利益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尽管迄今对此尚未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广州是茶叶及丝、棉织品的出口口岸，这些出口品主要是中国南部农村手工生产的。棉织品主要是因南京而得名的“南京布”，因为中国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是在南京附近的苏州和松江一带。这些向西方出口的产品完全是中国国内生产的，它们的主要市场仍旧是中国民众，直到进入19世纪，区域贸易从印度主要进口供应中国自己纺织工业的原棉。行商起漏斗的作用，通过这个漏斗，流动商在华中产地收集来的茶叶和丝绸等货物被运送出去。使用驳船和苦力的从江西到广州的运输路线被大大发展了，尽管贸易量还比较小，但广州贸易已经在积累资本、创造商业机制和形成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方面，成为重要的发展中心。“广州利益集团”指的是那些从广州对西方的垄断贸易中获利的商号和帝国官员，它成为考虑中国政策的一个因素。273

鸦片贸易的兴起

英国从事印度和中国间的鸦片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

中国抽鸦片者的增长。因为鸦片是一种易于上瘾的麻醉剂，所以它是一种比当时英国视作罪恶的杜松子酒更加严重的社会祸害。在中国，罂粟久为人知并被加工成麻醉药，但是，抽鸦片（实际上是吸水蒸气）只是在17世纪烟草从美洲通过马尼拉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的。在18世纪后期，每年大约有一千箱鸦片从印度运入中国，从1800年到1821年，每年平均四千五百箱，但到1838年每年总量增加到约四万箱（每箱通常重一百三十三磅）。毫无疑问，鸦片瘾的扩大与其他前面叙述过的趋势相关，如人口压力、生活水平的可能降低以及政府腐败的加深和人民中造反精神的增强。总之，那个时代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作为这种风气象征的抽鸦片在衙门皂役和士兵中蔓延得尤其严重，这两个集团代表了政府与普通百姓间的联系。

在鸦片贸易增长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英属印度对占其岁入5%到10%的鸦片贸易愈益倚重。当孟加拉在公司控制下种植鸦片并在加尔各答由官方拍卖给私商的时候，印度西部的鸦片种植不受公司控制并在初期还与孟加拉的产品进行竞争。但到19世纪30年代，公司已经控制了船运码头，如孟买，这使公司可以征收转口税并获得相应的利益。
274 与此同时，孟加拉和印度西部之间的竞争刺激了更多价格低廉的鸦片的生产。

在中国的鸦片商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尽管价格随供给量而波动。在1821年以前，一箱鸦片可以卖到一千甚至二千墨西哥银元，到后来供给增加的时候可以卖到二百至一千元。这一投机贸易引起了剧烈的竞争，外国商人开始使用最早类型的快速帆船，以便赶在对手的前面。他们把货物发给“趸船”，这些“趸船”是戒备森严的流动货栈。中国的鸦片商组成经纪行，通常包括二十或更多的合伙人。这些鸦片商的资

金用作资本进行投资，他们的走私船有严密的武装护卫，由六十或七十名划手驾驭（这使它们获得了“扒龙”或“快蟹”的中国名称），通常从外国趸船中提取鸦片箱。到19世纪30年代，有一百到二百这类中国船从泊在广州外水域的大约二十五艘外国趸船上提取鸦片箱。起初，鸦片的国内销售是沿着广州西部，特别是广州北部的陆上路线运往华中，但是后来，随着外国船在广州东北部的中国沿海进行销售，鸦片贸易又出现了一个新阶段。

清朝的政策与官方的执行背道而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禁止这种贸易上的无能。早在1729年，皇帝诏谕就禁止买卖和吸食鸦片，1796年又禁止进口或在国内生产鸦片。1800年以后，这些禁令常常重新颁布，但是随着这一贸易的增长，官方也愈益对此给予默许。鸦片买通了自己的路，成了一个新的腐败之源。官吏的贪婪之中又加进了恐惧的因素，因为鸦片批发商们与秘密会社沆瀣一气，并且可以用武力反对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官员。高级官员们发布了禁令，而低级官员们则默许这种贸易，将他们的部分不义之财孝敬上司，无疑这种不义之财可以直达朝廷。当高级当局变得易受揭露、恫吓或检查之害时，他们发现最安全的做法是把这种非法贸易逐出自己直接管辖的范围以外。1811年，总督阮元就强迫趸船离开广州内河锚地，向外移往伶仃岛。外国商人开始向东北在南澳岛和泉州寻找口岸，这种“沿海贸易”甚至比在广州三角洲所受的控制更少，19世纪30年代其进口额开始与广州相匹敌了。

鸦片贸易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不仅英国的商业扩张已经变得依赖于鸦片贸易，而且这种贸易本身因强有力的、组织完好的走私系统而在中国巩固下来，这个系统随着大烟鬼的增多而腐蚀了政府。一个多世纪以来，北京的皇帝

已经习惯于从广州贸易中获取收入。鸦片不只是增加了非官方的收入，而且加强了“广州利益集团”。同样，英国对鸦片的兴趣使英国在中国进行商业扩张这一长期一贯的欲望得到新的增强，它进一步刺激了英国蓄谋已久的要求。

这时，公行商人的财政匮乏增加了英国人的不满。行商中最著名的是伍记商号的老板伍浩官，他发了大财，通过波士顿商号旗昌洋行中的美国朋友与外国进行贸易，甚至对外国投资。但伍浩官是个例外，大多数行商经常被迫向政府“进贡”而缺少资本。他们定期向东印度公司举债，东印度公司则预付资金购买下季的茶和丝绸。然而，没有收回所欠外商债务的法律机构，于是行商未偿付的债务越积越多。
276

西方人对中国刑法事实上允许随意逮捕和折磨被告也感到不满。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传统和中国法律传统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对个人权利和义务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1784年以后在广州的英国人便拒绝将杀人案提交中国司法机构审理，1821年以后美国也这样做了。实际上这已经发展成某种程度的治外法权（由外国司法机构审理外国国民），但并未得到中国方面的明确认可。

英国君主取代公司

1834年爆发了危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促使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垄断，并使英国政府派遣了一位官方商务监督到广州，以取代公司负责督察商务。这个监督是一个没有外交经验以前也从未到过亚洲的苏格兰人（律劳卑勋爵）。在没有得到适当指示、准备和支持的情况下，他被派去执行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英中之间创建将导致中国古代进贡制度告终的平等关系。不出所料，地方官员们

拒绝了他在他们之间进行平等交往的要求，不久他们便停止了与英国人的贸易，这是他们控制外国商人的通常做法。于是律劳卑用中文发布公告，指责清官员无视贸易及其利益。作为回报，清官员断绝了对英国人的所有供应。律劳卑的两艘快速帆船强行闯入主要河口并与中国的炮台交了火。皇帝下旨，命令用武力制服英国人，或将他们驱逐。

行商和迫切期望和解的英国自由贸易商从两边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这场怒不可遏的冲突。律劳卑退到澳门并于1834年10月病死在那里，此后四年他的继任者执行一种“沉默政策”，同时关于英国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的两种思想流派都得到了发展。以查顿及马地臣合伙的怡和洋行（前身是一些早期商号，1832年后改为现名）为首的商人多数派要求英国海军弥补律劳卑所受的侮辱，争取开放更多的港口。以颠地洋行为首的反对派赞成心平气和地获得商业利益。广州官员要求英国委任一名负全责的首席商人。

到1836年，广州制度便这样崩溃了。贸易不再限于广州，公行也不再垄断中国方面的贸易（特别是鸦片进口），行商经常无力偿还债务，垄断公司让位于彼此竞争的私商，²⁷⁷其控制英商的职能由一位反对接受行商命令的官员行使。贸易量在增加，其非法性也更为严重。

第四节 鸦片战争

在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1839—1842年的中英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场战争由中国政府努力取缔罪恶的鸦片走私贸易促成，由英国战舰的优

势火力结束，随之而来的则是使西方人在中国拥有特权的屈辱性条约。当各派爱国的中国人近来回顾这个事件时，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

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到19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立场，像日本当时的锁国政策一样，已经过时，难以为继。工业化的西方在技术、组织技能和军力方面迅速领先，不能再像对待18世纪的欧洲那样对待它。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已经形成，这必然会导致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巨大变化。进贡关系的旧秩序迟早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军力相对软弱，而且因为一些思潮——例如科学学问的概念，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正开始席卷整个世界。在要求外交平等和商业机会中，英国代表了所有西方国家。如果英国没有这样做，其他西方国家迟早也会提出同样要求的。对中国的贸易中，有活力的英国商业利益不仅集中在茶叶而且集中在鸦片上，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如果中国的主要需求继续是印度原棉，或者总而言之如果清代后期的中国像其早期一样不存在鸦片市场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鸦片战争”。然而根据西方扩张不可遏制的活力和中国制度墨守陈规的惰性，某种形式的中外战争可能还是会爆发的。

禁烟运动

当清廷面临威胁其切身利益的鸦片贸易，尽管为时已晚
278 但仍尽力控制广州的局势时，英国被迫诉诸战争。禁烟运动是一场道德整肃运动，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出现的那样，这场运动与实际利益也是一致的。

直到19世纪30年代，无论是衙门差役和兵士中间大烟鬼的增加，还是无耻的走私和官方对走私的默认，都没有促使北京采取持久的禁烟行动。但就在这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鸦片的流入好像正在引起白银外流，而这似乎又反过来正在破坏中国的双重货币制度。日常交易使用的铜钱和政府财政结算使用的银锭（按重量和含银量以两为单位）之间的兑换率开始改变。按铜钱衡量银变贵了，对政府来说，这是真正的危机，因为它造成了各阶层的困难：农民必须交更多的铜钱以完税，而用银完税使收税人剩下用以中饱私囊的铜钱也更少了。实际上，这种情况由许多因素造成：第一，由于铜钱大小和重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引起铜币的贬值；第二，官方每年铸币量的增加，而伪造劣币以及贮藏白银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问题；最后，1821年后的某个时候开始了白银实际上的外流。直到这时，中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白银净入超的地位——在与日本、马尼拉、英国、美国、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贸易中都是如此。但是，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受白银净出超之苦，主要是银锭流向印度以支付鸦片。远在平衡发生实际变化以前表面的流失就受到注意，因为中国观察家们看到购买鸦片造成白银外流，却没有看到出口茶叶白银又流了回来，结果，他们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1825年的一次检查把白银外流特别与鸦片流入联系起来，并且很快普遍接受了一种观点，认为铜银比价变化引起的财政危机主要是由于鸦片贸易所造成的白银流失。

到这时，鸦片的罪恶如此之大以至于根除鸦片好像成了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一些现实主义者，尤其是一个与阮元在广州建立的书院有联系的集团，建议采取折衷政策：一方面继续反对文人、官员和士兵抽大烟，另一方面以征收鸦片进口税的形式使其进口合法化，以打击走私，与此同时，只

用中国货物而不是用白银购买进口鸦片，以防止白银外流。1836年5月当阮元在北京任大学士时，这项建议被奏呈皇帝，又被送往广州征询意见，很快外国商人得知了，他们一度预感到合法化将会出现。1836年9月，广州当局支持这一
279 建议。然而，其间在北京的争论已转入另外的方向，合法化运动开始后仅四个月就失败了。1837—1838年间，中方对广州贸易的禁止更为严厉，但沿海走私仍在继续，进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838年下半年，整个帝国高级官员用奏折进行的一场大规模辩论证明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结论，但是，1838年底皇帝最后决定对这一祸害在各个方面均予以毁灭性打击：打击种植者、销售者和吸食者，对他们都要处以死刑。根据1839年颁布的这一诏谕，对输入鸦片的外国人也同样处以死刑。

到这时，广州的禁烟运动捣毁了烟馆，处死了鸦片贩子，使鸦片贸易陷于萧条，1838—1839年冬这一贸易几乎停顿下来。但这促进了沿海贸易，并导致外国鸦片商在武装走私活动中起到更积极、有力的作用。这时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它不能“通过支持或限制走私者的活动”来进行干涉，禁烟只能由清政府来实施。

在这一时期纷乱的事件中，有一点特别突出，即中国政府试图一箭双雕：消除鸦片罪恶，同时维持对外关系中的进贡制度。除非通过行商，广州当局屡次拒绝与英商务监督打交道，并要求商务监督的信件必须像下级递呈上级那样用“稟”开头。这样，两国政府间达成任何形式的商业协定或作出合作努力就都是不可能的。两个世界处于对抗之中，中国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是在英国反对进贡制度这一背景下向前发展的。

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

被挑选来根除鸦片罪恶的林则徐（1785—1850）是一位“经世”学派的实践者和廉洁、能干的行政官员。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以后，他开创了翻译西方资料的先例，如他搞到了译自瓦特尔《国际法》关于一个国家有权控制其对外贸易的一段话。他还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两封有说服力的信（从未送出）：“若别国有人贩卖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责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也……”

林则徐的纲领是清除广州的中国鸦片进口与销售网络，他事实上完成了这一任务。使用武力反对外国商人不是他的目的，更谈不上对英国开战。但不久他便发现，强迫他们交出鸦片存货是必要的，为此目的，他于3月24日把大约三百五十名外国人拘禁在十三行。在没有仆人但未被断绝供应的情况下，这些外国人在拘禁中度过了六周。在英国商人交出鸦片存货以后，林则徐释放了他们，然后将鸦片公开销毁。这样，他迫使英国人交出了大约两万箱鸦片，但有两件事使这成为虚假的胜利：第一，鸦片市场已经崩溃，但同时对中国现有的和从印度运来的鸦片已上升到大约五万箱，因此，鸦片商只对他们的鸦片价格感兴趣；第二，英国商务监督代表英国政府，对交出鸦片负有个人责任，正如马地臣曾经对查顿所说：“中国已经陷入了使自己直接对英王负有责任的困境。”林则徐对英臣民和官员的强制完全与传统进贡制度的不平等实质一脉相承，但是，从近代国际社会的观点来看，这给了英国政府开战的口实。

1839年7月，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传统地位进一步产生了问题，当时喝醉的英国水手杀死了一名中国村民，他在有关司

法裁判权的争论中成为一个象征。中国当局要求交出罪犯，英国则拒绝承认中国对英国臣民的刑事裁判权。随着争论的扩大，它加剧了中西有关外交关系司法裁判权以及鸦片贸易的冲突。

英国侨民在压力下先后从广州退到澳门，1839年又退到香港，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居住、面积约30平方英里的岛屿，一个世界上最优良的深水港将它与九龙半岛内地分隔开来。小规模的敌对行为逐渐与谈判同时进行，1839年11月发生了第一次海战，但甚至在战争期间广州贸易也依然存在。美国商号旗昌洋行与其行商朋友伍浩官密切合作，在美国旗下替英国人办理大量的旺季茶叶出口业务。同时，沿海护卫良好的鸦片贸易仍在继续，这超出了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管辖范围。英国远征军1840年夏到达，并占领上海南面的舟山岛，接着在靠近京城的天津南面进行谈判。这时很显然，林则徐禁止鸦片罪恶、维持广州制度的双重努力没有成功。11月，皇帝将其贬职召回，同时英国准备以武力解决争端。

战争与谈判

清政府对战争毫无准备的原因在于其军队技术落后和军事管理腐败。²⁸¹ 军队的训练注重毫无内容的形式，用剑和矛摆些毫无意义的花架子，要组成一支军队对付土匪和叛乱者，就得从许多不同的卫戍军中抽调小部队，这样使大的军事单位无法发展成士气高昂、领导相对稳定的突击力量。军队通常很难管束；在训练很差或纪律涣散的情况下，他们在战场上缺乏技能和勇气，敌人到达前便会逃跑，只有对付孤立无援的平民百姓时才显得毫不畏惧。

清力量的衰落在海上比在陆上更为明显。在海军的传统

中从来没有关于建立一支常备不懈并能够实施海权的机动突击力量的概念，而代之以每一沿海省份都维持一支由战船组成的小舰队，用以在沿海指定水域维持秩序。由各省分散统帅，既未进行过深海巡航，也未进行过联合演习训练的中国“水师”不过是一支水上保安队而已。所以，海盗可以用与土匪同样的战术来保护自己——溜过管辖分界线，这样受他们之害的省便不能追击他们，而他们逃入的省则尚无理由对他们采取行动。在一个商船可载千吨的时代，中国海军船舰却仍旧很小——大约载重三百吨，长一百英尺，船上有一百人和六门大炮。它们没有能力保卫中国，抵御19世纪西方的海军。

为了惩罚清政府，英国派遣了一支拥有几千人的小型机动部队，装备有最新的战争工具，譬如可以防风、防潮、防火攻和要塞炮击的平底、吃水浅的铁甲蒸汽船。用弓箭和过时大炮装备起来的中国战船像他们在炮台上固定的海岸炮和糟糕的炮术一样无用。英国要削弱从广州到上海沿海的中国要塞并不困难，真正的问题是利用这一军事优势以便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秩序。除像香港之类的商业基地外，英国别无领土野心，攻击中国平民也不是它的目标。除广州外，中国平民总的来说是被动的战斗旁观者，并为侵略者做苦力以赚取工钱。但是，使皇帝同意西方人在中国的新地位意味着古老的理念和实践的终结——简言之，即意味着进贡制度的毁灭。

1840—1841年战争的第一阶段，林则徐的继任者、一位富有的满洲贵族，于1841年签署了一项流产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中国将割让香港，给予英国外交平等地位和赔款，并重新开放广州，但两国政府都拒绝了这个不成功的协定。1841年5月，旺季茶叶装运完毕后，一支二千四百人的英国

282 小部队攻击了广州，但在索取了六百万银元的“赎金”后便从城外撤退了，由于受官方煽动，士绅领袖动员地方民团对撤退的英军进行威胁，这一事件（发生在三元里）便被作为广州平民对英军的胜利而欢呼，某些历史学家还把这看作中国民众近代民族主义精神的第一次表现。

战争的第二阶段（1841—1842年），英军占领了厦门港、舟山岛（他们早些时候曾将其放弃）和宁波等沿海要地。1842年春在得到增援后，他们占领了上海，夺取了大运河穿过长江处的镇江，并向南京外围挺进，击败了清政府任何形式的抵抗。这种抵抗包括许多方面：中止与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贸易，在广州动员民团，封锁港口与河口，建造战船，从许多省份调集军队。1842年3月，中国对英国占据的宁波城发动突然袭击，但是，这种传统方式的中国反攻在指挥、组织和装备上都是无效的。另一方面，在防守中，满洲八旗军队以毫无希望的勇气抗击英国人。

283 只是在英国的进攻已迫使清廷同意对英中关系作出全新安排以后，新任全权特使璞鼎查爵士才进行谈判。满清朝廷为了自保而投降了，作为异族征服者的后裔，北京的统治者对如此多的“汉奸”与侵略者合作极为敏感。秘密会在鸦片走私中和在香港都很活跃。继续败给英国侵略者就会削弱朝廷对中国的控制，朝廷必须对英国侵略者作出让步以便维持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中国的改革家林则徐禁烟失败了，此时另一位满洲贵族耆英（死于1858年）被派去安抚英国人。

第一次条约解决

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废除公行在广州对外贸的垄断，允诺实行“公平、正规

的关税”，割让香港给英国，对英国侨民和英国贸易开放五个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些为建立新秩序开辟了道路。二千一百万墨西哥银元的赔款用来偿还行商债务、赔偿没收鸦片的损失和英属印度政府的战费。但1843—1844年又签订了三个条约作为对第一个条约的补充：中英《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和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10月24日）。由于“最惠国”条款——对每一国都可享受以后给予他国的任何特权的承诺——这些条约相互加强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条约体系。由于中国主要是出让主权，因此这一体系被恰当地称之为“不平等的”。当然，这一体系不是一天内创造出来的，实际上花了十八年持续进行的贸易、外交直至战争才最后建立起来。

因此，第一个条约仅仅是个开端，它使英国在五个口岸设置了领事馆，在那里英国侨民受其领事的法律裁判，也就是说享有治外法权。西方法律程序的保护不仅包括商人和传教士的人身，而且包括他们的货物和财产，有时实际上扩大到了他们的中国仆人和助手。于是西方和中国的企业相对摆脱了官员们的任意敲诈勒索，以旧帝国关税率为基础的成文关税极为粗略地定为4%到10%。中国贸易垄断或行会如广州公行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被禁止。顾盛与耆英谈判达成的《望厦条约》完善了英国人关于治外法权的条款，使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英国人曾为之而战的全部特权。

**东亚的“开放”：“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主要条约 284
(1842—1943)**

特征：开放口岸，治外法权，最惠国条款，协定关税。

起始条约	续订条约	结果
中 国		

1842年与英国订南京条约，1843年附加虎门条约	1844年与美国订望厦条约，1844年与法国订黄埔条约，1858年与英法美俄订天津条约 (1876年与英国订烟台条约，1885年批准 1901年订辛丑条约	1919年与德国、奥匈，1924年与苏联订平等条约 (继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1928年条约认可后) 1930年关税自主 1943年与英美订新的平等条约
日 本		
1854年与美国的柏利订神奈川条约， 1854年与英国、 1855年与俄国订约	1858年与美国订安政条约	1894年与英国修约，1899年结束治外法权， 1911年关税自主
越 南		
1874年与法国订西贡条约，(1862年即曾订约)	1883年与法国订顺化条约，确立为保护国 (1885年中国承认法国的保护)	1946年在“法兰西联邦内的自治”，1954年越南共和国独立
朝 鲜		
1876年与日本订江华条约	1882年与美国订朝美条约	(1905年为日本保护国，1910年与日本合并) 1948年(大韩)民国建立

第五节 西方通过早期通商口岸 产生的影响

与西方的接触不可避免地会削弱传统秩序，从1840—1844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条约到1856—1860²⁸⁵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条约，这种接触逐步有所进展。在这期间，清统治者，无论满汉都最终发现了他们所要对付的是什么，但为时已晚。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已首开向西方侵略者学习的先例。他把自己搞到的译本转送给他的士大夫朋友魏源，1844年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这一关于世界地理和西方状况的资料集也包括如何对付“外夷”问题的讨论，魏源的战略思想是一种新旧混合体，他把“以夷制夷”的古代思想（如以法、美制英）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观念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学习战舰、火器以及养兵和练兵的方法。根据这一观念，就是要通过借用西方的发明创造和技术发动中国的自强运动。这是把魏源等人所倡导的解决国内问题的那些“经世”思想直接应用于对付西方侵略的问题。引用周代经典中的战争艺术可为对西方知识的渴求提供充足的根据，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幸的是，中国是一个过于广大的国家，每年有众多受传统束缚的文人从内陆省份这个大水库流入宦海，以致很难被那种仅限于沿海的与国外思潮的联系所动摇。西方榜样的刺激作用主要限于香港和通商口岸。

商人和传教士

英国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遭到北京拒绝，但在条约所没有提到的向北直至上海的沿海一带，鸦片贸易仍在继续和扩大。除五个通商口岸外，“接收站”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这是一些没有明确宣布但却是外国鸦片进口商和中国鸦片销售者之间进行定期、一般来说是平和的鸦片贸易中心。大烟鬼增加了，19世纪50年代，进口量上升到五万甚至六万箱，比30年代早期广州的数额高了一倍。旗昌洋行之类的美国鸦片商过去在广州用从土耳其运来的鸦片与印度货竞争，现在可以通过充当印度船货经纪人的方式直接与查顿和颠地竞争了。鸦片贸易也使美国人财运亨通，就像对中国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印度祆教徒一样。中国国内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预示着将最终取代从印度进口。但在 19 世 纪 中 286 期，少数大商号依靠其快速帆船、护卫良好的趸船、雄厚的资本和优越的设施，保持着对市场的控制。茶叶出口上升到一亿磅以上，丝绸也有类似的增长，但外国主要用向中国出口鸦片获得的钱支付这两项商品，中国市场对纺织品和其他英国制造品的需求仍旧有限，令人失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民的自给自足和贫穷，他们仍然自己生产自用纺织品并且几乎无钱可花。在广袤的次大陆边缘落脚的外国商人，没有认识到这种状况，他们继续相信，即使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增加一英寸，也够兰开夏的工厂忙几十年。

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代表了以有组织竞争为基础的一种进取的、极为活跃的新秩序。大约二百家商号，其中主要是英美商号，在贸易的各个方面展开生死竞争，尽管它们都属于上海和广州的商会。这样，在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形

成了一个单独的社会，受到主要是英国的炮舰保护，居住着年轻并且流动的人口。使中国“异教”群众皈依的同样有组织的竞争和同样越来越大的希望激励了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也由于中国反应的迟缓而受到同样的挫折。1773年耶稣会瓦解，法国的遣使会士取代了耶稣会士在北京的地位。287在对北京的传教士秋毫无犯的同时，清政府试图逐步镇压其他地方的基督徒。除在东印度公司保护下从1807年起一直住在广州的第一个新教开拓者马礼逊以外，从1801年到1829年只有少数新教传教士得以进入这个国家。新教使命是严厉的工业化在精神方面的产物，即18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和新英格兰平行开展的福音传播运动。马礼逊在学习中文和翻译《圣经》方面取得了成功，为避免广州的敌意，1818年他的同事们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

1830年到达广州的第一批美国新教徒是受美国海外布道会派遣的，这是一个由几个教派于1810年建立的代理机构，但它最终成为公理会的代理机构。这些美国新教徒创办了一份重要的月刊《中国丛报》(1832—1851)，杂志的编辑之一卫三畏编纂了一本颇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论著《中国总论》(1848年)。伯驾通过在广州开办一所眼科医院宣告了医务传教团的诞生。卫三畏和伯驾后来都供职于本国的外交部门，就像马礼逊以及其他英国传教士为他们自己的政府服务一样。然而起初他们把重心放在用中文传播福音上，尤其是通过第一个皈依者梁亚发(1789—1855)写的那类小册子去传播。为使福音易于接受，他们开始尝试罗马化即用罗马字母写出中文发音的翻译。但在很长时间内皈依者极少，是以十而不是以百来计数。

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传教团继续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复苏。作为天主教传教团的近代卫护者，法国政府于1844年和

1846年促成清帝颁布宗教宽容的诏谕，使基督教不再受到取缔，并恢复了一些教堂。经过由中国教士和受圣餐者组成的当地僧侣集团的努力，天主教终于能够开始广泛发展了。1814年恢复的耶稣会在上海郊区徐家汇（利玛窦的了不起的同事徐光启的老家）建立了其主要中心。耶稣会士、遣使会士、多明我会士以及其他欧洲传教士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一起干劲十足地在几乎每一个省恢复了天主教团体。在内地，这一仍旧非法但却广泛开展的天主教活动比新教传教努力规模大、组织好，但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挑战却不如后者尖锐。天主教教士的衣着、居住都仿中国式样，并且他们的学校也不教欧洲语言，而新教徒则随之带来了更多自身的世俗文化，更直接地攻击佛教和道教的“偶像”，攻击中国宗教和社会习惯。于是，虽然天主教传教团在中国人口中的渗透广泛得多，但最终却是新教徒产生了更为革命性的影响。

广州人的作用

西方的影响是通过广州人而产生最直接作用的。家仆、与外国进行合法贸易的中国商人、中国鸦片批发商、基督教书贩（销售宗教著作的人）起初全都来自较远的与西方联系时间最长的南部地区，特别是广州。这些广州人陪外国商人到上海和厦门，讲一种陌生的“方言”（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语言）并组织自己的社团，他们在与当地人民的竞争中构成了一种不能同化的外来成份。如果他们在新加坡或香港定居，就会携带表明自己英国臣民身份的证件。如果这样或他们成为被允许在通商口岸设立的外国商业“机构”的成员，他们就可以在治外法权下要求得到外国保护。他们通常穿西式服装以炫耀自己的特权地位。

19世纪40年代后期，这些与外国商人有联系的中国人以苦力贸易的形式助长了另一种社会罪恶，即男性劳工根据契约主要从厦门，也有从澳门和其他口岸被用船运到需要廉价劳工的新开发地区，如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马来亚等地。中国向东南亚移民已有好几个世纪，但现在几种因素的综合加速了它的发展。一个是世界范围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为替代奴隶便产生了对契约劳工的需求；另一个因素是外国船——帆船，后来是蒸汽船的引进，使得以低廉费用转运大批苦力成为可能。在这种挂外国旗帜的新贸易中，中国“人贩子”（为劳工牵线者）在招募劳工并将其关在仓库（临时收容所）等待装船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犯下暴行，就像一些外国船只重演早期非洲和美洲之间奴隶贸易时的情景一样，英国政府试图用领事视察船只的方法避免虐待事件发生，清政府的政策则首先是维持传统做法——禁止移民。

广州公行的废除导致新型中国商人——买办——的崛起，他们根据契约受雇，掌管洋行与中国商人业务往来中国方面的事务，包括收集商业情报、进行买卖等，所有这些将其训练成在通商口岸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新型中国实业阶级中的近代企业家。因此，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在中华帝国沿海边缘初具规模的现代国际贸易经济。

第六节 叛乱的兴起

在1850年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以农民为主力的叛乱席卷了十八个省的大部分地区。鉴于1850年以前西方影响的范围有限，人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影响是这些

巨大动乱的主要原因。叛乱的起因在于中国的整个局势，这种局势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很容易导致叛乱发生。如果我们引用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口继续增长。根据有选择的例证判断，面对不断增多的问题，官场追名逐利泛滥成灾，所产生的压力使政府的腐败日益加深。举个例子来说，加固河堤并没能清除黄河和大运河的淤塞反而使之更趋严重，运河运输谷物的作用越来越小。1852年黄河终于决堤，开始了将其主河

290 道由山东半岛以南改到以北的漫长的、灾难性的过程。这是黄河自1194年以来第一次重大改道。人口、洪水、饥荒、贫穷、腐败以及由此引起的政府无能所产生的压力在许多地区由匪患、骚乱和小规模暴动的增加而得到反映。

随着清政权日益衰弱，反对力量由秘密会社组织起来。一般来说，这些组织在中国北方称作“教”，意思是一个宗教派系或一派教义，在南方则叫“会”，是会社或协会的意思。1813年白莲教（1900年义和拳的先驱）的支派出现在中国北方并很快遭到镇压，但南方的颠覆活动则不易控制，在那里制造不安定的主要组织是三合会，也叫天地会或洪门以及其他一些名字。据说此会乃福州附近一所寺院里深受赃官之害、富有斗争精神的和尚于1674年所创，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
291 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秘密仪式，献血为盟拜为兄弟，其成员发誓要根除满清统治。当然三合会的日常职能比较平和、乏味。像西方的共济会一样，它是一个忠于高尚的道德原则和成员间实行互助的兄弟会式的组织。对于经常易地而居的人——流动商贩、船工、搬运工、小官或走私者——来说，它特别有用。在商路上的一个陌生地区或新加坡、巴达维亚之类的海外中心，使用秘密的三合会标志和切口可保平安无事。

19世纪40年代晚期中国南方的普遍混乱达到了高潮。有

两个因素削弱了帝国政府对那里的控制。第一，这里是满清最晚征服、控制最软弱的中国区域，仅广州驻有满洲八旗兵。第二，南方是包括受到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系的扰乱性影响最久的地区，这种影响在鸦片买卖和与英国的战争中达到了顶点。的确，广州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这种民族主义是最受西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榜样刺激的焦点。武装起来驱赶英国人的广州民团于1841年感到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当他们后来被清政府遣散的时候，他们便对英国人以及满清对英国人的姑息都心怀不满。因为上海靠近茶、丝产区，所以1843年上海的开放使得沿途广州的运输帮失去了工作。最后，英国海军于1849年开始实施剿灭海盗计划，它的胜利迫使海盗帮派沿西江从沿海转向内地，进入广西省。²⁹²

太平天国

像在影响最大的叛乱中一样，宗教迷信也为最终在广西出现的造反运动准备了狂热的组织基础。创建者洪秀全（1814—1864）及其主要同党都是客家人，即早在几个世纪前就至中国南部大批定居的来自北方的一个方言集团的后裔。他们没有被完全同化，有时在地方上陷入与“当地”人的争斗。洪秀全还是一个失意文人，他不止一次在广州考场名落孙山。最后，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性格反复的人。他患的疾病和宗教经历使他相信自己是一个新救世主。洪秀全的宗教迷信以新教《圣经》为基础，1836年他在早期皈依者梁亚发写的中文传教小册子里首次对《圣经》有所认识。洪秀全曾长时间神志不清并看到幻象，随后阅读这些小册子使他得到了解释：他看到了上帝和他自己的哥哥耶稣基督，现在，他作为耶稣的弟弟必须拯救人类。洪秀全在

广州与新教传教士有过一些短暂的接触，但他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主要是借用旧约中好斗的教义，而不是新的仁爱。他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十诫，但已不是基督教的登山宝训。

洪秀全在花了许多传播新信仰以后，其信徒利用当时的特有条件建立起军事组织。在帝国官员无力镇压土匪和解决争端的时候，他们通常组织地方民团维持治安。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有饷银并由作为自然领导者的士绅成员来统领，但秘密会社或宗教派别也可以组织民团，可以从强迫纳贡、收税或敲诈中筹措资金。然而，中央权威的继续下降很快使这些地方力量陷于彼此争斗之中，这有些像成吉思汗崛起以前的草原部落，这些军事单位很容易被一古脑儿地卷入一个巨大的正在扩张的“部落”。

19世纪40年代后期由洪秀全的信徒组成的“拜上帝会”，吸引了各种不满之人——客家人、三合会成员、海盗以及无家农民。1850年7月，在广西西江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们开始了对帝国军队的武装反抗。他们发展迅速，1851年9月向北攻克永安县城，竖起了反抗朝廷的旗帜，洪秀全号称“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这个词除了新近用于翻译《圣经》外，它在经籍中、在以前的叛乱者以及许多中国王朝的年号中都曾使用过。另一位领袖杨秀清(死于1856年)是烧炭工出身，后来成为东王和军事总指挥，而其他几位领袖则分别当上了北王、西王、南王和翼王。^①

由于在永安受到帝国军队的围困，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沿途不断补充壮大。由于缺少大炮，他们未能夺取广西省会(桂林)和湖南省会(长沙)，但却在1853年初夺取

^①“王”，古代指国王(king)，北京用以指帝国亲王，对外国统治者也称“王”。在英语中太平天国的“王”有时亦称为“princes”(亲王)。

——原注

了湖北省会(武昌)，并乘一支庞大的船队顺长江而下，向帝国第二大城市——南京进发，1853年3月攻克了该城。

紧随这一惊人的军事胜利之后的则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纪录。一支远征军被派去攻打北京，但这支军队被迫西进山西，又退回直隶，忍受中国北方寒冬的折磨，最后于1853年晚些时候折回到天津附近。同时，太平军在从广西北上所经地区没有建立行政机构，他们缺乏胜任的地方官人选。他们的军队曾进入十八个省中的十六个，占领了大约六百座有城墙护卫的城市，但他们无法统治自己所征服的地区。在长江沿岸富裕的心脏地带驻扎下来以后，他们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府传统的六部，但是它们似乎与在乡村中实行的军事统治形式毫无二致。

在他们的军事一宗教社会中，早期有一段时间男女严格地分住不同的营地。贞洁是对男女双方而言，妇女被组织起来成为劳工，甚至组成战斗营，废除缠足并任命妇女担任军官和行政官员，这些都是男女平等的表现。太平军清教徒式的狂热也使他们反对蓄奴、通奸、巫术、赌博、酗酒、吸鸦片和烟草。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成份与中国成份有吸引力的混合体。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洪秀全被尊奉为“天命”所归的新天子，他的信徒向民众布道，向上帝献祭；他们毁坏偶像和庙宇，消灭道教徒、佛教徒和儒教徒；他们的第一道德信条是敬上帝、耶稣和洪秀全，但他们的第二道德信条却是孝顺，人的兄弟情谊不论不类地与等级地位的社会结合在一起。

很多太平天国的制度事实上来自中国的传统。由于《圣经》没有提供详细的蓝图，洪秀全和杨秀清在经典《周礼》中找到了原型，像王莽(公元9—23年在位)和王安石(1069—1074)²⁹⁴之类的激进改革者都引用过这本书。中国的乌托邦传统在原

始共产主义经济中反映出来，所有人都将自己的财产贡献给共有的圣库，为其服务同时从圣库中支取生活费。土地和人民都要进行再分配，占有土地视其产量分为九等，农户根据其成员的数量得到同等的生产分配。每二十五户在一名军官的领导下组成一个单位，有一座教堂和一个公共府库，军官负责支出、宗教、教育、争端裁决和军事组织。从理论上讲，每个农民同时也是一名士兵，政府统治集团兼备文武性质。（平分土地、几户家庭组成相互依赖的单位以及农民团练无疑都是古代中国的制度）。由于太平军事实上没有建立土地管理机构，所以不能确定土地使用的平等化到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的蓝图主要是在南京的最初几年付诸实践的。平均主义理想是有限的，因为每个王都建起了自己的宫殿、行政机构和军队。

由于洪秀全强调个人的超凡神灵的作用，他幻想某些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情况的事情，同时又夹杂着传统中国基于内在自然秩序的相当理智的主张。太平军的狂热减弱了他们的号召力，他们将反满与对儒教及整个社会秩序的攻击结合在一起。他们既将保守的士绅阶层排斥在外，又未能实现与造反的三合会联合。太平军借用了一些三合会的术语，并有许多三合会成员加入了太平军的行列。但是，南京并没有帮助1853年在厦门和上海发动地方起义的三合会成员。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低估了上海作为一个获取外援之来源的价值，几乎没有作出发展对外贸易的努力。

然而，叛乱运动最初发动者之间的猜忌被证明是运动失败的根源。马基雅维里式的杨秀清从一开始就部分通过入定和接待天父下凡得到了权力。较少奸诈的洪秀全尽管宣布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但没有宣布自己与上帝有同样的沟通。最后，杨秀清向洪秀全的权威发出了挑战，1856年洪秀全让北王

(韦昌辉)杀害了杨秀清。韦昌辉做过了头，杀死了杨秀清的家属及数千名部下，洪秀全不久又不得不派人杀了韦昌辉。洪秀全初期的将军们被清除了，现在任命平庸的亲属去统治他的王国。叛乱运动屈服于荒淫和腐败，只是由于一个新的军事干才(李秀成)的出现运动才得以继续。1859年李秀成被加封忠王，太平天国的最后几年中他在长江下游一带指挥太平军。

尽管19世纪50年代各省均有叛乱发生，但清政府由于继续垄断那些知道如何在中华帝国进行统治、训练有素的行政人才，它仍能发号施令。这些人的忠诚是对文人政府传统、对康熙及其继承者在统一国家和文化方面的成就的一种尊敬。文人阶层拥护满清按照传统方式的统治，而反对由非正统的叛乱者实行的汉人统治。最后，太平军被在主要来自湖南的汉人士大夫领导下的新汉人军队所镇压。²⁹⁶

这支新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曾国藩(1811—1872)，他的经历反映了整个过程。1838年曾国藩成为进士，以后十年是在北京官僚和文人圈中度过的。1852年他领受了组织团练保卫其家乡湖南的任务，他根据儒教原则组建了湘军，以保卫中国的传统社会。曾国藩是一位折衷的文人，一位“经世致用”的倡导者，他虽不才华出众，但却能持之以恒。首先，他网罗地方士绅作为对他个人效忠的军官，然后通过纪律、训练和家长式的统治培养起军队的士气，这包括一些基本道德：(1)尊重长官，(2)关心普通人民，(3)培养优良习性。在受派拯救其他省份危局的时候，湘军首先从一支防守力量发展成为进攻力量。其次，它建立并训练了一支在华中河道上使用的水师。²⁹⁷再次，在1854年曾国藩的军队收复武昌以前，他一直拒绝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出湘作战。即使是在1854年，帝国军队仍没有统一的指挥，叛乱仍在蔓延。

捻军和回民叛乱

由于受到1853年太平军占据长江流域的鼓励，同年在黄淮之间的大运河西部地区爆发了另一场起义。这一地处四省交界的地区长期以来就聚集着简称为捻（“股”）的秘密会社土匪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白莲教。尽管这一带没有重要城市，但却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常有好斗的中国回民少数民族参加的家族之间和村庄之间的械斗，再加上洪水、饥荒和难民在这一地区肆虐成灾。1853年以后，由于选出了一位最高领导人，捻军最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数百地方组织在族长和村长的领导下，以其深沟高垒的村落为基础在广大地区取代了中央政府的官员。他们招兵买马，自己征税，并很快开始以骑兵袭击和劫掠毗邻地区。到1855年，捻军发展成为一支包括打着黄、白、蓝、黑和红色旗帜的五个主要股的联军。捻军使用秘密会社流行的秘密标志、歃血盟誓和繁琐的仪式，还模仿太平军蓄长发。捻军和太平军多次合作，然而捻军运动仍然是分散的，从未试图扩大地盘和夺取大城市或建立对抗朝廷的中央政府。当然，捻军领袖们曾在大约十万平方英里的地区逐渐创建了有战斗力的军队，其中主要是骑兵，并建立了有力的控制——首先是对地方民团、然后是对人口和给养的控制。到1860年他们使帝国政府面临着捻军运动和太平军运动结合的危险。

一场持续时间甚至更长的反清造反在遥远的云南兴起。自元代以来，回教就已在中国西北和西南牢牢地扎下了根，云南的中国回民少数民族甚至组织了地区性的宗教社团，并不断与其非回民邻居发生战斗，特别是在矿区，那里用近代前的方法开采铜、锡、铅和贵金属，这些日益减少的资源是

冲突的主要原因，驻在这一遥远山地高原的清廷官员人数极少且软弱无能，完全不能制止1855年在回回掌教领导下开始的动乱。掌教是一位虔诚的、学识渊博的人，他曾去麦加朝圣，认为伊斯兰信仰和儒家的社会说教并行不悖。1861年他被诱恢复了对清动摇不定的忠诚，但云南西部的反叛在一位精力旺盛的斗士杜文秀的领导下又坚持了十二年。在1856年²⁹⁸杜文秀就把大理（曾是中世纪王国南诏的首都）定为他的新伊斯兰王国的首都并自封为苏丹。他的政权设法通过缅甸获得一些军火（杜文秀起义有时亦称Panthalay起义，这是缅语，意为穆斯林），在1872年甚至派了一个劳而无功的使团去伦敦寻求援助。同时，1862年开始的另一次猛烈的回民造反震撼了中国西北，而贵州山区未开化的苗族自1854年起就造反了。

尽管这些较小的运动——捻、回民和苗人——都不具备太平天国的规模，但它们同样也是中央政权崩溃的标志。现在清王朝处在“内忧外患”两种力量的冲击之下，但正当这些内地造反证明无力创造取代传统体制的制度时，通商口岸的西方人精神抖擞地抓住时机在沿海建立了新秩序。

第七节 条约体系的最终建立

与自相残杀数百万人和彻底毁灭参与大规模叛乱的城市销毁农业资本（如作为养蚕业基础的桑树）相比，仅伤亡数千人的鸦片战争的确是一个极小的事件。同样，早期的鸦片贸易、传教士运动以及第一批通商口岸规模都很小。它们没有直接影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但通过使旧秩序受到怀疑，

它们开始了逐渐破坏中国社会制度的长期过程。然而，就短期而言，外国外交活动的影响并不总是革命性的，相反，中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之一是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阻止了政治变革。在1851年到1860年叛乱兴盛的十年中，西方列强将与北京进行谈判的政策发展为强制的政策，接着在实现了第二次条约解决以后又发展为与清廷合作的政策。

19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崩溃导致了地方当权者的兴起，在通商口岸和广大的内地省份都是如此。然而，在通商口岸，外国领事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西方式新机构，而不是建立由各种造反政权或内地士绅领袖建立的那种中国式的统治机构。在上海，外国人居住区内挤满了逃避太平军的难民，1853年三合会占领了这座围有城墙的城市，毁坏了帝国海关，赶走了自道台以下的帝国官员。外国人居住区组织了西方商人自己的地方民团——洋枪队，1854年7月，英、美、法领事共同促使道台同意几项章程，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政府并为后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些租界拥有征收地方赋税、维修道路、维持市政警察的权力。这样，位于长江入海处的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中心，变成了由在条约赋予的治外法权保护下当地外国土地租用者统治的半外国城市。
299

同时，在没有帝国海关的情况下，英国领事一直在征收协定关税，以阻止中国在内地对外国贸易的征税。由于中国关税征收者和相互竞争的外国商人进行勾结，对各国一视同仁地征收众所周知的协定关税的想法已证明无法付诸实施。但是没有平等的关税，就会损害自由贸易和合法商业的稳定增长，所以，1854年7月英、美、法领事商定由他们任命的人充当道台的关税征收人，努力使对外国商人的征税公正无

私，同时也要保证道台的岁入。中国海关的外国总税务司便由此发展而来，从1855年开始，一位英国人（李泰国）以私人身份被中国政府雇用来掌管中国外贸的征税事宜。公共租界和外国总税务司都不是在中国政府能进行有力统治的比较正常的时期出现的，在危机的压力下，它们是英国善于作出特殊安排的产物，是中国在边境上对与强大异邦进行合作所作反应的产物。

英法与中国的战争

甚至在叛乱广泛蔓延的时候，中国外贸在茶、丝绸和鸦片方面也有增无减，但广州丧失了其贸易优势，在那里排外情绪不断增强。西方人仍旧被排斥在城市的城墙之外，这变成了英中之间一个有关“面子”的问题。到1851年，英国准备再次强迫中国给予更广泛的贸易特权，但又承认外部侵略可能增加中国国内的动乱并因此而妨碍对外贸易，太平军似乎不可能比清廷更有力地促进与西方的贸易，西方列强也因此对叛乱保持中立。

1854年，英、美、法在广州、上海和天津近郊的预备性谈判中试图同北京正式谈判修改条约，但谈判被拒绝或推托了，而民众对西方居民的偶而袭击引起了外国尊严的问题。
300 当时正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签订贸易条约的西方国家急欲强行要求按西方条件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联系，由于相信如果不重新肯定和扩大条约体系联系就会衰落，1856年英国找到了一个借口。当时领事宣称在香港注册的一艘中国船上的英国国旗受到侮辱，这艘船是欧式船身的“亚罗”号（欧式船身是指西式船体、中式装备的帆船）。当一名法国传教士在叛乱区内被当作外国颠覆分子而抓获并在广西被处决的时候，

法国发现这正是与英国合作迫使中华帝国就范的依据。

英国人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使天子接受西方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的概念，但他们花了四年的时间方才如愿。在耽误了一些时间之后，他们于1858年占领了广州，使中国广东巡抚成为在联军委员会控制下统治这一城市的傀儡。

为了威胁皇帝，英法谈判者将其舰队径直开往天津，1858年6月他们在那里签署了条约，规定他们的公使可以根据外交平等的条件驻节北京。美国和俄国的全权代表以“中立者”的身份也来到天津并签署了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条约。由于西方使团常驻北京将结束中国地位优越的古老传统，清廷越来越下定决心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尽管它已接受条约草案。当一年以后的1859年6月英国和法国公使到达天津附近准备到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时，他们被禁止进京。在试图溯河而上强行进京时他们被击退了。四艘英国炮艇出人意料地被击沉，伤亡较重。于是1860年英法不得不派遣更强大的军队卷土重来，为了这最后的决战，英国向中国北部派遣了四十一艘战舰、一百四十三艘运兵船、一万零五百人的军队和一支二千五百人的由广州人组成的劳工队。法国派来了一支六千三百人的军队和六十多艘舰船。联军击败了在蒙古僧格林沁亲王指挥下的庞大得多的帝国军队，于10月进入北京，这时皇帝已逃到了长城以外的热河。

在北京驻扎期间，由于法国在中国没有商业利益，它渴求民族荣耀，这导致了英法间的冲突，而同时英国的谈判代表（额尔金勋爵）还必须限制“中国通”的扩张主义要求。但是，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在打着停战旗时被抓，并且大约二十名随行人员在他获释前被处死。额尔金便对皇帝个人采取报复行为，毁坏了北京西北大约有二百座建筑的皇帝夏宫（圆明园）。圆明园已被侵略者以及中国村民洗劫一空。缺少弹

301 复行为，毁坏了北京西北大约有二百座建筑的皇帝夏宫（圆明园）。圆明园已被侵略者以及中国村民洗劫一空。缺少弹

药和冬天来临的威胁使联军必须尽快寻找解决办法并撤退。他们与皇帝的兄弟、此时代表朝廷的恭亲王签订了新的条约。这些文件确认了1858年的条约，增加了赔款，新添了几处租界，例如英国得到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法国则略施小计为天主教传教团获得了在内地拥有财产的权利。

这第二次条约解决对中华帝国向西方开放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没有采纳任何激进的新原则的情况下，这次解决扩大了英国领导下在五个早期通商口岸已经得到发展的外国特权的范围。

俄国在满洲的扩张

根据最惠国原则，俄国也获得了这些特权，但同时它的使节们还在其他地方积极活动。按照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清帝已成功地将俄国人赶出黑龙江流域和遥远的外蒙古边界之外，这使俄国的扩张转向亚洲其他地方。1741年白令发现了阿拉斯加，俄国在堪察加半岛建起了界标。俄国还开始与日本建立联系。1799年，俄美公司得到特许，通过垄断太平洋地区的俄国贸易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相匹敌。从1812年到1839年，它甚至在加利福尼亚维持了一个前哨站，位于旧金山的墨西哥人前哨站的北侧附近。同时，从1727年直到1860年后，在俄国恰克图镇对面的中国边镇外蒙买卖城定期进行中俄贸易。尽管贸易使团停止前往北京，但俄国传道团却继续呆在那里，计有四名教士和六个学语言的学生。这一传道团变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心，也是半官方联系的据点。

通商口岸的开放与俄国不断地向中亚发展相吻合。不久以后中亚这一地区被称为俄国土耳其斯坦。18世纪期间俄国稳步推进，建立了防备大草原上流动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部

落的前哨警戒线。这些前哨站很快从里海向北延伸到奥伦堡，随后又沿额尔齐斯河向东伸展。这一弧线逐渐稳步向南推进。在这条线上俄国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贸易像与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汗国的贸易一样有了发展。1851年，中俄条约在伊犁地区的主要城市固勒札签订，以调节这个地区沿原302先在更东面的商业中心恰克图确定的商路所进行的贸易。俄国的商队在选定路线、季节、代理商和住宅等方面受到严密节制，但均受他们自己驻固勒札领事的控制。这一协定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好像是清帝国和俄帝国间联系的特点，特别是在这遥远的边界上双方都是征服者并在反对好战的当地部族中具有某些共同利益。

受到英国在华胜利的鼓舞，俄国又开始了向阿穆尔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1689年后俄国曾被迫从这一地区退却。1847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领导了这次进军。1854年以及随后几年，他派遣由驳船组成的俄国船队顺阿穆尔河而下，在北岸直到乌苏里江与阿穆尔河交汇处的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了前哨站。俄国军队和移民很快建立起强大的据点。1858年5月16日，甚至在天津条约缔结以前，穆拉维约夫就在瑷珲签署了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阿穆尔河北岸给俄国，乌苏里江与大海之间的区域由中俄共管，其归属仍悬而未决。穆拉维约夫占领人烟稀少的边界地区的计划现在赢得了他本国在圣彼得堡的政府的支持，而在这之前政府的支持是很勉强的。

根据1858年6月的《中俄天津条约》，虽然俄国得到了所有西方拥有的全部贸易特权，但仍没有解决满洲东部的边界问题。这个问题留给了精明的外交官尼古拉·伊格纳切夫将军，去巩固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所得（1859年北京拒绝《瑷珲条约》以后，这样做更为必要）。在谈判中，伊格纳切夫使用了

好几种计策，清军在天津附近赢得击沉英国炮艇的胜利后，他于1859年6月到达北京，住在俄国传道团，进行了好几个月毫无成果的谈判。1860年他去了上海，靠他在北京所了解的情况巴结其他西方全权特使。当联军打开了通向首都的道路以后，伊格纳切夫与之随军同往，充当起英法联军与清廷之间的调停人。英法撤离后于1860年11月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是对他调停的报偿。这项条约确认了《瑷珲条约》，另外还把乌苏里江和太平洋之间的滨海省让给俄国，1860年7月穆拉维约夫就已在这里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意为“统治东方”）。这样，当俄国开始割占清帝国的领土时，西方列强赤裸裸地打开了对清帝国贸易和传播福音的大门。

第八节 清政府的中兴

303

要根除国内混乱和外国入侵的祸害，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高层领导，但太平军叛乱者实际上很早就已证明自己没有准备也无力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天命”从未真正降临到他们身上。到1860年，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唯一希望看起来取决于北京，这里出现了真正的“中兴”，朝廷领导的复兴，就像以前中国历史上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叛乱以后所发生的中兴一样，其最明显的例子是东汉的建立和唐中期的中兴（参见第85页和第120页）。帝国领导的这一复兴与当时斗争中——首先是镇压叛乱者的战斗的一系列转折点相吻合。

1860年帝国军队在南京城下的大营第二次被强悍的太平军指挥官李秀成摧毁了，这次灾难迫使清廷最终授权湖南儒

将曾国藩统一指挥整个镇压活动。1860年8月，他被任命为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统辖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军政全权。他任命其他汉人儒将为各省巡抚并最后开始包围叛乱军队，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给予清廷内死硬排外派以致命一击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另一转折。皇帝的兄弟恭亲王出面签署了条约，通过接受条约体系安抚侵略者此时被认为是拯救朝廷的唯一办法。最后，1861年8月咸丰皇帝去世，其弟恭亲王和年轻的皇太后、刚登基的幼帝的母亲慈禧通过一次宫廷政变掌握了政权。在处决了与之对立的具有较强排外情绪的亲王以后，他们遵照两条主要原则以强有力的满族领导进行新的统治：第一，在条约体系的实施中谨慎的合作；第二，在镇压叛乱中全力支持在曾国藩领导下的汉人士绅。正如恭亲王所言，叛乱者是中国的心腹之患，而外夷只是肘腋之患。新的年号为同治，意为“联合而治”。

外国援助和太平天国的覆灭

为了援助湘军，曾国藩令其有才干的年轻门生李鸿章（1823—1901）建立了淮军，这是一支同样以地区为基础、由士绅领导的攻击部队。就在湘军已因长期折损和财源不足而走向衰落的时候，李鸿章于1862年4月乘租用的外国轮船，在士绅商人的支持下成功地率其新编的淮军进入上海。李鸿章
304 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以后，逐渐在长江三角洲建立起自己的地盘。除了征收贡粮以外，他还得到一些控制新海关税收和上海地区其他商业税的权力。他利用这些收入购买外国武器，将淮军扩建到七万人，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他和曾国藩建立了兵工厂，制造洋枪和轮船，在首先镇压叛乱者而后“自强”的过程中，把他们自己的亲信拉入官僚机构。

采用外国武器的推动力之一来自一支配备外国军官、驻扎在上海的雇佣军，这支雇佣军开始是外国冒险家组成的地方武装，由中国商人出钱，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华尔任领队。当1862年初叛乱最后一次得势，太平军进攻上海郊区时，英法为保卫上海和宁波的通商口岸放弃了中立。这时华尔训练了一支大约四千人的小规模中国军队取代外国军团，在长江三角洲的水路上使用洋枪和机动的两栖战术打赢了一百多次战斗，从而获得“常胜军”的称号。1862年华尔死后，从英军中借来的戈登少校最后继任指挥，并且像华尔一样接受了巡抚李鸿章所授的中国军阶。“中国的”戈登和他小规模 305 的中外联军协助攻克苏州，一支类似的中法联军帮助克复了杭州。

最后，经过殊死战斗，曾国藩之弟在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情况下于1864年7月攻占南京。这样，太平天国在血雨腥风中结束了，这场在初期充满活力和理想主义的大规模运动缺乏适当的领导，盲目走进了分裂、腐败和最后失败的迷途。在好几年中，当西方列强一段时期实际上与清政府交战的时候，太平军有机会谋取外国的援助，但这一机会从未被抓住。最后，是曾国藩动员的庞大汉人军队进行了镇压叛乱者的绝大部分战斗。中国对外国军队的使用谨慎地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正如1862年的一份诏书中所指出的，“时下吾用洋人练兵，权作自强之策……”西方对清王朝事业的援助与其说是通过外国人的干预来进行的，倒不如说是通过中国领袖们在“自强”精神下自己使用外贸收入和使用洋枪、洋船以及西方训练方式来进行的。汉族士大夫拯救了满清王朝，他们对之效忠是因为它代表着儒家秩序的一部分，在连年不息的战争的最后几年，他们发现以西方的援助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是有成效的。19世纪中期的其他叛乱捻军(1853—1868)与

西南（1855—1873）、西北（1862—1873）的回民叛乱，都是在没有西方参加但使用一些现代武器的情况下被镇压下去的。

中国的开放

中国接受第二次条约解决使西方列强与既定秩序有了利害关系，因为它们此时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列强开始扩大它们自己的机会，又有十一个通商口岸最终开放，包括中国北部和满洲、台湾以及溯长江而上远达武汉的某些地方。在中国的沿海和内河港口中，外国船只继续参与中国国内航运业，这是一项在大多数国家中禁止外国人享有的权利。在缴纳中等水平关税的基础上，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只要交付2.5%的附加转口税，各类外国进口货都可以自由地在内地通行了，这项税大约相当于进口关税的一半，这样它们便可以与当地产品进行竞争。外贸管理由经充实的上海外籍税务司负责，这使帝国海关署成为北京政府的一个由外籍人员组成的部门。此时，
306 传教士持护照在内地旅行，可以接触所有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久都开始在内地获得并支配新财产。

在所有这些商人和传教士扩张机会背后的支柱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实力。这些国家以停泊在通商口岸的炮舰为后盾，其驻北京公使的首要职能就是实施条约规定之权利，结果导致西方挑战的急剧增强。新的“外夷”此时确已破门而入，然而，中国人尚未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这种威胁作出反应。进贡制度被摧毁了，然而条约体系虽只是向现代国际关系迈出了半步，但它却使人荒谬地想起中国的传统政体——在治外法权下，签订条约的各国侨民只是加入、而不是替代

了拥有特权的满汉统治阶级，以前曾如此经常地容纳异族统治者的传统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仍旧完好无损。欧洲人的激烈竞争似乎给了朝廷操纵这些侵略者自相残杀的机会。于是1864年以后清廷有了一个喘息的时期，中国有了一个在西方帮助下实现自卫现代化的机会。

³⁰⁷ 第十一章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第一节 以自卫为目的的早期洋务运动

从1868年到1912年明治时期日本的成功更突出了同一时期中国的失败。两国都被强加予损害其主权、威胁其经济独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它在其内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仅靠一代人的努力，便赶上了近代西方世界，并最后在1905年的一场全面战争中击败世界强国俄国，这是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中国在这方面的无能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理解，显然，日本取得成就的一个原因是它实现了那种西方民族在民族主义感召下所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

像在西方国家一样，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对编纂历史和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的理解也产生了影响，日本历史学家们怀着对日本成就的固有自豪感详尽地记叙了明治时代的历史。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旧秩序的崩溃仅留下了几个忠诚的编年史家去记载那为他们留下的一幕漫长的悲剧。毫无疑问，我们能知道日本崛起和中国衰落平行的历史带有某种倾向，即倾向于成功者——或至少可以说成功者的记载比较丰富。晚清史在1912年以后也仍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因为革命尽管创造了历史，但却几乎没有提供记述它的机会。简言之，日本的历史编纂随着日本自身现代化了，而在我国，编

史工作像众多的其他学科一样仍然在更长的时期内遵循着传统的方式。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我们期望本书关于中国 308 对西方反应的描述将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而作出修改。

我们自己的观点是，中国应战的主要决定因素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而不是其外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惰性，它使洋务运动的努力流于形式——仅对直接危险作出暂时反应，一旦危险过去这种反应便消失了。更广泛地说，我们认为，传统的中国根本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社会幅员如此辽阔，组织如此牢固，以致无法迅速地转变成西方的组织模式。从这一角度讲，只有等到大部分传统社会的虽已腐朽但仍在延续的结构被摧毁以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一过程比在日本要缓慢得多，因为日本较小，反应也较快，另外，日本还拥有更易于接受西方制度和思想的特征。

这是从社会学和制度上对中国现代化所以缓慢作出的解释，它不同于另外一种解释，即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与西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现代化过程的缓慢主要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有害影响。这一观点以极端的形式认为所有与西方的联系都是有害的，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这种观点没有解释为什么势不可当的“帝国主义”影响在日本和中国却产生了如此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西方对两国的影响起初都是微弱的，促进因素大于消极因素，并且推动日本迅速、成功地作出应战。中国的版图和惰性，还有儒家的国家型社会所独具的某些特征，如已经描述过的文化主义，阻碍了中国的应战。到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影响加深和积累起来时，对中国来说要再成功地作出反应为时已晚了。即使如此，某些早期的中国现代化努力还是颇有朝气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日本的悬殊差距只是到

后来才出现的。19世纪60年代，一个局外人很可能把赌注押在另一方。

1860年清政治结构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英法对北京的侵略迫使天子接受平等对待外国君主的要求，从根本上削弱了天子是四海共主的古老说法；第二，在长江下游重新兴起的太平军威胁迫使满清朝廷起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士绅领导武装镇压叛乱，这些士绅领导建立了地区性的汉人军事势力，削弱了满清的控制。这些体制上的变化把中国引向了日本即将走的同一方向：使中华帝国成为国际上地位平等的国家中的一个，并使其军事力量建立在中国普通人民的基础之上。但这些很快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是在³⁰⁹中国则是很久以后才成为现实。与具有革命性新开端的明治维新不同，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改革只是曲折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

“自强”与合作政策

自从1860—1862年太平天国运动在上海和宁波附近因英法参与而被击败以来，19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真正感受到了西方的军事优势，以军事为内容的洋务运动被当成解决国内问题和对外问题的办法。曾国藩引用孟子的话说：“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恭亲王建议利用镇压叛乱者作为得到西方武器的途径。19世纪40年代魏源提倡的中国传统的方法——以夷制夷——现在看来是不够的，这样，魏源的另一句话得到了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便出现了“自强”运动。这一运动1861年后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外交、财政、教育和军事。“自强”运动这时开始取代过时的进贡制度。

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受到驻北京的西方公使的欢迎，他们

间的合作政策。阿礼国(1865—1869年任英驻华公使)曾是条约体系的总设计师。像他这类外交官试图在外国条约权利和中国合法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并试图限制通商口岸的英国商人咄咄逼人的要求。阿礼国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包括“一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革命”，但进步的速度却不能快，19世纪60年代的“合作政策”旨在帮助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

为了掌管与西方的外交关系，1861年设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部，而只是军机处的一个下设机构，直到1901年设立外务部以前，它行使外交部职责。外交政策的决定仍然必须由皇帝作出，总理衙门只是在北京负责对外关系。在沿海省份另外任命了两个负责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他们同时也是驻南京和天津的总督，直接向皇帝报告。这一分权的做法适应了与太平军斗争时就已出现的地区势力的增长。

海关

英国的谈判代表对外交事务新秩序的创立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自1855年以来，李泰国一直是由中国支付俸禄的“外籍税务司”，他在上海干劲十足地管理着关税征收事务。从海关离职以后，凭着对条约关系和中国语言的精通，1858年他在天津威吓满清的条约谈判者时起了关键作用。后来他帮助扩大了新的海关。1861年1月他被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随后不久受命为中国政府获取当时最厉害的武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炮舰。但李泰国在英国不仅得到了一支由八艘使用英籍水手的舰只组成的舰队，而且进一步

试图把这支舰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当1863年这支强大的舰队到达中国时，恭亲王和曾国藩均拒绝接受李泰国的安排，李泰国被解职，而舰队则被英国人处理掉了。李泰国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为中国当局工作，而不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他说：“一个绅士在亚洲野蛮人领导下行事的观念是荒谬可笑的。”

1863年接替李泰国的赫德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建设海关。赫德来自北爱尔兰，1854年来到中国，先在英国领事馆任职。**311**他告诉海关的外籍官员：“凡享有俸禄、充当中国政府雇员的人”是当地官员的“兄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他指令其外籍官员监督海关程序的各个方面，但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每一通商口岸海关的中国监督（通常为地方道台），这些中国监督实际上负责接受关税收入。赫德本人仍然负责领导全部外籍职员，到1875年他们包括二百五十二名英国雇员和一百五十六名来自十六个其他欧洲国家的雇员。这样，他凭着超人的机智、耐心和远见，为清中央政府增添了一个行政臂膀，这个臂膀使用外籍雇员对付外国商人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出力。

新的关税收入像赫德深思熟虑的建议一样为北京的一个新机构——同文馆提供了后盾，设立同文馆的目的是使中国外交官摆脱对外国翻译的依赖。就像总理衙门所主张的那样，“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见识其性情。”或如李鸿章所言：“先知其用心，通晓其意愿，及……其理之曲直所在。”上海、广州和福州都开办了类似的小型学校，但结果令人失望，因为举荐的学生主要是来自满洲八旗的中年人。

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引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要求。**312** 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尽其最大努力，最后共同在上海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1868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中国

工人已造出了他们的第一艘轮船，尽管使用的是外国发动机。西方科技论文和手册的翻译是这一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1866年，在法国的帮助下在福州建立了另一个兵工厂和海军船厂。

几乎所有这些洋务运动的步骤在北京都是通过新的总理衙门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采取的。19世纪60年代执行的政策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混合体，清政府用条约规定的贸易和联系安抚外国侵略者，为了抵挡外国攻击和镇压国内叛乱而学到了西方军事力量的奥秘，但清朝同时又努力恢复旧式儒家政府，其主要目的实际是恢复国家与文化合一的传统秩序，用以自卫的洋务运动则是次要的。

第二节 儒家政府的中兴

我们已经阐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在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以及其他方面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平衡和自足以致其整体的活力可能会有所衰落，而它仍能抵御外部影响的侵蚀。在统治过程中，对秩序的需要、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儒教的保守意识全都汇集起来并相互加强。结果，19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国侵略和内部叛乱的双重威胁所作的基本反应，就是重新确立或“中兴”旧的儒家制度，而不是使之现代化。它对新事物既不向往也不为之自豪，外来事物则更是不值一提。正如一位主要的顽固派所指出的：“何以非学外夷不可？……彼乃吾之敌也。”

1860年后清中央政权的政治软弱加重了这种制度上的和心理上的惰性。中兴是在严重的叛乱之后王朝统治卷土重

来，其目的是按照传统方式复兴而不是创新。但朝廷已被严重动摇，皇帝必须指引道路，而同治皇帝（1862—1875年在位）却是一个由其母亲——慈禧太后（1835—1908）所操纵的摄政集团控制下的孱弱的孩子。这个非凡的女人——通常据其一长串称号的头两个字称为慈禧——是一个聪明、意志坚强但思想狭隘的人。作为她儿子的摄政之一，她很快学会了利用任命、提升、褒奖、考查、贬黜和惩罚官员的帝国权力使自己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她的权力巩固了，在宫廷太监和她所信任的高级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统治，但她没有着手

313 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结果，中国式的儒家统治中兴颇有起色并取得了部分成功，而现代化的进程则陷入了困境。

对叛乱的镇压

1864年攻克南京消灭了太平天国这一朝廷权力的唯一真正的争夺者，但大片地区仍处在叛乱之中。捻军叛乱者以其“根据地”周围以土墙的设防村落为基础，实行“坚壁清野”的防御战略。这一战略就是把农业人口和田里收获的农作物都集中到围以土墙的村子里面，这样，来犯的帝国军队既找不到人力也得不到食物供应，同时捻军骑兵对北方省份则实施打了就跑的袭击。太平军余部加入捻军，1865年曾国藩因此而受命镇压捻军。

尽管曾国藩两次占领捻军的根据地并两次夷平围墙，但毫无成效；乡村民团的士兵和首领都继续支持捻军，围墙又重新修了起来。于是曾国藩试用一种传统的战略，公布捻军首领姓名，把他们列入处死者名单，但允诺赦免并保护其投降的部属和村庄首领。通过建立四个坚固的据点和封锁线将根据地孤立以后，曾国藩的军队侵入了根据地，谨慎地铲除

一个又一个土墙环绕的村庄，以五户联保的方式进行平民登记，并正式任命村长。同时，他们在受到毁坏的地区恢复耕种，重新控制人民和食物供应，因而切断了捻军袭击力量的人力和粮食来源。于是，“坚壁清野”被用来打击叛乱者。

1866年晚些时候，因为当时使用的军队主要是李鸿章建立的淮军，所以他接过了镇压捻军的任务。在太平军失败以后，曾国藩已正式解散了他的湘军，以摆脱军队中财政、领导权和纪律等紧迫问题的困扰。李鸿章的淮军取而代之，成为中国主要的近代军队。由于得到上海新兵工厂的武器补给和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的贡米，淮军很快有了至少三万支前装式来福枪以装备其七万人的军队，另有船载大炮和七千骑兵。1866年后捻军分裂为两支流动部队，分别在华北平原的东部和西部活动。两支部队被一千英里长的封锁线分隔开来，封锁部队有十万人，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边界大运河和黄河沿线驻守。捻军被逐步包围起来，1868年1月东捻军被消灭，8月西捻军也被消灭。

在杜文秀已于1856年建立其回民国家的中国西南地区，重新建立中央权威的斗争更为漫长。杜文秀作为一个回教徒显然对不信回教的汉人没有什么领导权威。清廷的目标似乎最终能给混居的各民族带来更有秩序的统治和不偏袒的公正。一些清朝将军原来就是充任团练首领的地方士绅，甚至信回教的汉人也发觉站在清廷一边是有利的。在经历了死亡和迁徙以后，人口当时已减少了一半多，像云南府（即今昆明）这样的有城墙护卫的城市经受了长期的围困。回民政权一度以五十三座有城墙的城市为基础，帝国军队常常用血腥的大屠杀一个又一个地攻克它们。1873年大理终于被攻克，杜文秀自杀。同一年贵州的苗民也被镇压下去。

在中国西北甘肃省那条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贫瘠的“锅柄”

形狭长地带，18世纪80年代就爆发过回民叛乱，这些叛乱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称为新教的狂热教派的鼓舞。19世纪中期一次更加集中反对腐败的地方官员而非清廷的新的叛乱看来已在兴起，1862年西安附近爆发了反叛并向西扩大。好战的新教的主要领袖在宁夏附近建立了基地，这一西北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对该地区的收复须等到太平军和捻军先后于1864年和1868年被镇压之后。这一任务交给了一位得胜的湖南士绅将领——左宗棠，他花了五年（1868—1873年）时间收复了陕西和甘肃，与他的预言完全吻合。他对部下的调配、对拉长的供应线的维持以及对地方文官统治的恢复，似乎都证明了传统方法的功效。他循序渐进，不折不挠地攻克叛乱者的山寨并尽可能多地屠杀叛乱者。到1871年，正如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言，他的妻子死了，自己的头发白了，大部分牙齿也脱落了，得过痢疾和疟疾，并因进展缓慢正受到批评。然而到1873年，尽管人口已经大大减少，和平回到了西北。

19世纪60年代的中兴是传统形式的战争和文官政府的胜利，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著名的士大夫官员。他们的成功不仅是由于苦战，而且是由于运用儒家道德和政治原则，鼓励经济复兴和有效的税收，另外他们还一定程度地使315用了西方技术。但“中兴”并没有使中国恢复从前的状态，而是实现了一个新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掌握省统治权的重要官员们尽管仍忠于朝廷，但已拥有强大的地区权力。朝廷中央权力的恢复归功于地方主义的增长，因此，它也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

内战的经济后果

像美国一样，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也面临着一个巨

大的重建任务。在发生了比美国时间更长、地区更广的战争以后，中国却缺乏强大的近代工业来医治国家的创伤。资本的严重损失已经出现，例如，西北的灌溉工程和华中的桑树就受到战火殃及，而桑树是养蚕业的基础。大量无家可归的人需要养活并安置工作。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靠普通人民的坚忍和努力工作。在官方的支持下，在地方行使领导权的主要是士绅，赈济粮的运输和分配，施粥所、孤儿院、避难中心以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以工代赈”——都由士绅和官员 316 共同掌管。政府的行动主要表现为道德规劝和掌握方向、土地税的广泛豁免、税率的降低以及偶尔提供种子和工具以重新安置农民等等。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更多地帮助了地主而不是农民，前者可以付更少的土地税，而后者却很少能获准减租。

19世纪50年代内战爆发后，中央政府的国库很快消耗殆尽，同时来自富庶省份的土地税也断绝了。由于北京卖官鬻爵的增加，使得士绅阶级更为膨胀。但岁入危机不能靠增加土地税来解决，因为1712年皇帝曾乐观地下令“永不加赋”，各地区税额是固定的。清廷财政因毫无变通余地而陷入困境。

为了应付财政危机，1853年在江苏对商人开征了一项低额税，后来称为厘金（“值千抽一税”）^①。这项新税有三个重要特征：因税额过低而不值得设法逃避，因此很容易征收；征税范围限于消费商品，征收方式是当货物通过厘卡时征运转税，或者是在货物销售的地方征销售税；最后，厘金税收主要存于地方士绅参与管理厘金制度的各省手中。到1860年这项税收几乎扩大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征募军队的士绅和官员通过征收厘金来筹措军费。到和平恢复的时候，这项税收已变得不可缺少了。

^①厘金应为值百抽一税。——译者注

1850年前中央政府的岁入主要征自农业经济部门（参见第317页表）。到19世纪末，新的商品税已是原收入的两倍多，在交给北京的各项税收中，厘金起初是最重要的。但新的海关税在19世纪60年代上升到一年约七百万两，随后又大大上升。关税包括对从印度仍不断增加进口的外国鸦片所征的税。中国政府再也不能靠表面集权的农业一官僚国家的古代方式来筹措资金了，地方军队的加强和厘金制度的推广开始出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分权化或地方主义的趋势，尽管这一趋势受到对儒家思想重新肯定的制约。

中兴的哲学和领导权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兴中，西方思想显然只起了很小的作用，相反，中兴的领袖们重新肯定了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并强调通过“经世”将其应用于实践（参见第268—269页）。这种起作用的道德观的主要思想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命题：中国社会的和谐依赖于等级森严的组织和上下发挥适当的作用；每一个人都应遵循社会的行为准则，即中国古代儒家的“礼”或“社会习俗原则”；圣人的道德榜样使之具有道德权威，法律惩罚和武力的使用只是通过公正的道德榜样来辅助政府。叛乱者必须受到严惩，或予改造或予根除，但在使用武力之后必须有一个廉洁、公正和仁慈的政府，这样国内和谐就能够恢复，繁荣也就会接踵而来。与近代的平等趋势正相反，这种哲学具有强烈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等级色彩，它希望自己的模式符合古代的黄金时代，没有一点进步的近代观念。经济政策的主要重心不是放在增加生产和税收上，而是放在节俭上，即适度使用固定的税收和资源。中兴的理想是僵硬的和谐，而不是充满活力的增长，其眼光局限于古

代的儒家模式。这包括一个循环变化或“在传统内部变化”的学说，它可以被用来支持改革。但改革基本上仍是保守的，它受到两个信念的限制：其一，提供“民生”的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其二，精心挑选“贤人”精英是好政府的根本^①。

中央政府岁入估计

(按帐面北京预期收到的数额，单位：百万两)

	1851年前	19世纪90年代初	20世纪初
土地税和贡粮	30	32	33
盐税	5 或 6	13 ⁽¹⁾	13 ⁽¹⁾
旧式关税	4	1	4
新关税	0	22	35
厘金	0	15 ⁽²⁾	14 ⁽²⁾
卖官鬻爵及其他	1	5	4
小计	40	89	103

(1)包括盐厘金；(2)包括当地鸦片厘金。

19世纪60年代，满汉统治者的利益和思想变得几乎一致 318 起来，这是因为双方都下决心使传统制度重新运转。直到 1850年，满族人出任大约一半的京官，三分之二的各省总督 和三分之一的各省巡抚。但是，随后在镇压叛乱中所出现的新干才几乎全部是汉人，他们过去总是充任低级官员。此时 满族人在各省的任职更少了，到19世纪60年代不再严格地将 汉族移民关在满洲门外，满族八旗不再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 量，满族的语言也极少使用，不准满汉通婚的禁令也不再有 效。满族统治者几乎已与汉族上层同化。直到19世纪90年代

①见玛丽·克莱博·怀特，《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1862—1874年》（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

——原注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将朝廷作为异族进行攻击以前，朝廷一直按照传统的中国体制行使职能。那些指责这一时期汉族领袖仍忠于清廷是“卖身投靠”异族统治者的现代批评家们所运用的是与时代不合的民族主义忠诚标准。

319 发掘中兴所需“贤才”的第一步是恢复正常科举考试、重新开办地方书院、重印合乎正统的著作。另一个努力是把考试题与当时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例如，怎样有效地训练、部署和维持军队？这种实践因素随“经世”学派而来，它强调更熟练地运用传统的方法。必要的一项措施是限制买卖科举功名，科举功名的买卖规模不大，但已具有双重价值：在紧急时刻它能提供应急的款项；它确保了富裕阶层的忠诚，那些人没有学问，但在不损害文人优越地位的前提下被允许用金钱谋求跻身于文人阶层之列。买得的“非正规”的科举功名，显然有别于“正规的”科举功名。19世纪上半期，每年定期出卖科举功名所得超过一百万两，经常多达二百万两。花钱而成为“非正规”的士绅处于士绅的最下层，他们大致占整个士绅阶层的3%，到1850年为止的任何一年中，整个帝国大约有一百一十万士绅。

中兴试图杜绝任何官职买卖，同时限制品级买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这方面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在许多省中通过考试授予初级科举功名的人数增加，这使“正规”士绅不断增多。在发生叛乱期间，作为对捐助的报答，科举功名的数额逐渐上升了大约18%。较富庶的地区所获得的名额较多，这可以使本地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士绅阶层。在清代大部分时间内，来自长江下游富庶而文化发达都市中心的士子在北京考试及第者中占很大比例，其中约五分之二来自江苏一省，满清王朝在那里获得大米供给，而且最需要在那里拥有支持者。

同时“非正规”士绅增加的速度甚至比“正规”士绅更快。到19世纪后期士绅总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资格是买来的，这个比例无疑表明了商人晋升士绅的倾向。这样，尽管科举制度恢复了，但其作为儒家政府之源的地位最终愈加削弱。最后，中兴对最低层次即那些主要靠习以为常的收费或“勒索”为生的低级胥吏的影响最小。在这里，传统道德观是最淡薄的，人们不可能从这一层次中挑选或培养“贤才”，也不能提供近代政府所需要的专门化技术。

第三节 对基督教传教团的反应

尽管就目的和精神而言，恢复儒学说教都是防御性的，但它的一个后果确确实实是由于传教活动的增加而引起了反基督教运动。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和新教传教团颇为不同，在 320 1800 年天主教仍保持有大约十五万散布于各省的受圣餐的人，这为随条约而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870年他们的团体有将近四十万人，由大约二百五十名欧洲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遣使会士、多明我会士和其他教派的教士，再加上许多中国教士和宣教者掌管。1860年中法条约对传教士允以完全的宗教宽容和归还以前的财产，法国还做了手脚，因而条约的中文文本还允许他们（所以也包括所有其他外国人）出租或购买土地以及在任何地方建房。这样教会变成了地主，除经营管理学校、神学院和育婴堂以外，还出租土地。天主教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后，已在中国社会中牢固地扎下了根。感人的仪式标志着不同的阶段：皈依者先是成为崇拜者，接着变成宣教者，最后便接受洗礼。节日和礼拜、

家庭祈祷、道德行为说教、教堂的自给自足都把信徒吸引到天主教团体之中。经历了过去迫害的磨炼，全部活动都精心地加以调整，使之符合中国方式。

相反，新教传教士仍然未能深入中国。1850年，他们总计只有约八十人，代表二十个传教会，几乎完全局限于五个通商口岸、澳门和香港。由于缺少天主教神父经过考验的方法，新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其中很多也是传教士）显然仍只是中西通商口岸社会的一部分（参见第344页数字）。到1870年有三百五十名或更多的新教传教士，但他们的皈依者大约总计不到六千人。与罗马的传道总会相比，没有一个单一的机构协调他们的活动，这些活动几乎像西方商人的活动一样分散。除了像伦敦会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公理宗）这样的先遣机构外，这时还有了许多其他教派——荷兰归正会、福音浸礼会、卫斯理宗等等。来自北欧国家和北美的新教传教士与天主教传教士之间泾渭分明，后者把宗教改革的结果看成危险的异端。对新教徒来说，罗马是反基督的，天主教信仰是一种敌对宗教。基督教两个支系间的合作甚至联系都是最低限度的。

1866年一位杰出的英国组织者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该会最终成为所有传教机构中最大的一个，全力从事于福音的传播。戴德生确信，通过信仰基督来得救是避免永恒的地狱之火的唯一方法，对他来说中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321 后来说：“在那块土地上每月有一百万人死去，死时未得到上帝的拯救。”他从所有国家的新教派别中召募传教士，明确告诉他们没有固定薪金，宣布“上帝将指引”并派遣他们到内地去朴素地生活在人民之中，穿中国式服装，引导中国人的灵魂得救。在他使除祈祷以外不谋求任何支持的信念广为人知以后，戴德生发现捐助和应募者源源而来。在天主教扎根

已久的内地省份，新教传教团也逐渐开始出现了。

士绅的敌意

自17世纪杨光先时代开始(参见第250页)，儒家就已批评基督教教义是迷信和异端邪说。他们质问，为什么全能、仁慈的上帝要允许原罪呢？自1724年被斥之为异端邪说以后，直到1846年天主教的处境仍未改变。这就使中国文人阶层在理智上对基督教没有好感，迫切的政治考虑更加强了这一倾向：太平天国叛乱者自称是基督徒，而西方强有力的外夷侵略者也信仰基督教。最后，中国士绅此时发现，在履行其社会职能方面传教士开始作为他们潜在的对手出现在自己面前。

首先，传教士是以教师的身份来华，他们进行宗教训诫、建立学校，这样便有权跻身于非儒学文人阶层之列。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传教士们发现向社会秩序提出疑问——至少通过暗示来做到这一点是必要的，而士绅则是这种秩序在地方上的中坚人物。

他们在诸如孤儿抚养、济贫和在灾荒年月提供赈济之类的实际事务中与士绅展开竞争，试图据此来取代士绅的某些传统职能。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教士所要求得到的或根据治外法权强加而得到的那种特权地位。就像士绅由于免受体罚具有接近和影响官员的特权而使他们与中国老百姓地位不同一样，传教士也具有不可侵犯的特权。他们不受官员压制，可以向中国官方说情，而且如果未达到目的，还可以求助于本国政府。天主教主教在华丽的装饰和仪式上尤能显示出半官员的地位。在拥有特权地位以后，传教士像居领导地位的士绅一样，经常承担保护中国人、主要是其皈依者的

利益的责任，这些中国人则把传教士看成庇护人和保护者。当中国基督徒和非基督教团体之间发生冲突时，传教士便吁请地方官员干涉，要求惩办罪犯、支付赔款。敌意因下述事实而无所缓解：皈依者有时是机会主义的“为衣食而受洗礼者”，或来自下层社会中那些很少依靠儒家学问作为晋升之路的人。基督教似乎一心在鼓动对现实不满的人。

用近代民族主义标准来衡量，士绅对那些言谈奇特、举止粗鲁并显然具有颠覆意图的外来教士或福音主义者所持的敌意有凭有据。传教士在救济和拯救其教徒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图无疑对传统的中国秩序有着颠覆作用，中国文人阶层的敌意并不令人吃惊。中国人的反抗相当猛烈，在1860—1899年间激起数千起小事件和大约二百四十起骚乱或对传教士的袭击。然而，这还不足以遏制传教运动，在寄回西方的传教文献中也不占重要地位。

反基督教运动是在各地士绅的分散领导下开展的，这些士绅使用传统的方法激起民众的敌意。他们的第一项措施是散发印刷品，在一个读书识字仍是上层阶级标志的国土上，印刷品具有权威性。许多传统的指责言辞被重新付印——基督教只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分支，其信徒们从事不道德和邪恶的活动，掌管临终涂油礼的教士乘机挖取垂死之人的眼珠以作炼丹之用等等。19世纪60年代的淫秽书籍生动地描述了宗教集会中男女基督教教士和信徒淫乱的情况，这种赤裸裸色情描写吸引了读者，同时也诋毁了基督教的声誉。狂热反基督教的人下一步便求助于在公共场合散发匿名传单以挑起事端的古代方法，特别是会考时在举行考试的城内散发，那时成千上万紧张的投考科举功名者在一起度过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地方问题可能会由传教士试图出租地产或建立破坏地方“风水”的建筑物而引起。

争吵几乎没有平息过，夸大其词的谣言亦不绝于耳。最激烈的愤慨是由天主教仁慈堂希望领养流浪儿和孤儿，有时甚至付一小笔钱以鼓励把这类社会弃儿转交她们抚养的意愿引起的。老百姓对这种善行的误解可能与古老的关于人贩子的民间传说有关，传说中人贩子诱骗孩童然后将其拐走。为了获取一小笔钱，人贩子也许确实利用过一些孩童，这却是社会的爆炸性事件。只要贴出号召所有道德规范的维护者在某一时间和地点进行示威的告示，就可能引起公开的行动。地痞流氓也可被用来制造事端，骚乱、破坏、纵火、殴斗甚至杀人都可能发生。人数较多、易受袭击的中国皈依者比传教士本身更常遭难。在中国许多地方，几十年来都在重演的这类事件应看成是对旧秩序大规模的无组织的保护，其领导者是那些感到最受与西方联系威胁的上层阶级中不甚受人尊敬的成员。

323

1870年的天津教案

这一事件揭示了西方和中国在目的、态度方面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立场，从而将十年的建树毁灭殆尽。英国的目的一直是把实施条约体系的责任强加于清中央政府身上，同时帮助中国开始实现现代化。但心平气和的劝告并不能完全代替武力威胁，特别是当维护传教士根据条约所拥有的权利时更是如此。例如，戴德生在长江正北的大运河边的扬州建立了一个中国内地会的传教点，当他1868年8月遭到大批暴民围攻时，英驻华公使阿礼国终于派遣了四艘炮艇到南京，压曾国藩撤职查办玩忽职守的扬州地方官。还有其他一些类似案例。中法关系更糟得多，由于没有商业利益需要保护，法国驻华外交官便试图利用保护基督教传教团作为扩张

324 法国政治影响的手段。为维护这种保护权，他们使用了炮艇，并直接与省级官员谈判有关传教士的事件。

在天津，法国仁慈堂为抚养孤儿花了钱，于是谣言不胫而走，局势紧张起来。6月21日一群暴民聚结起来。粗暴的法国领事要求驱散他们，并向地方官开枪，但未击中，自己反被撕成了碎片。随后暴民又杀死了另外二十名外国人，其中主要是法国人，包括十名修女，还摧毁了天主教建筑物。既愤怒又担心的外国列强调集了天津附近的炮舰。

危机发生在现已年老多病的曾国藩任内，但他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性格和勇气。他作了调查，并向其同胞宣布了他发现的不受人欢迎的事实：没有中国人拐买人口的确切证据，或传教士挖眼、掏心的确切证据。同时他抵制苛刻的法国人的要求，而发生在欧洲的事件最终帮了他的忙，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使它变得软弱无力。后来，李鸿章以其淮军为后盾于1870年以直隶总督的身份接管了天津。天津教案使中西关系由于怨恨和恐惧而更为恶化。

第四节 条约体系下的经济发展

西方经济侵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中国商人进行的，因此，这种侵略不像早期西方军事力量的入侵和传教士的涌入那样引起直接具体的防卫性反应。然而，中国在模仿西方工业发展方式方面依然进展迟缓，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成了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问题。

治外法权和通商口岸的体制

在通商口岸，大片土地由英、法政府永久租借，每年向清政府交付少量地租，这些地方被称为“租界”。19世纪60年代，英国在广州、厦门、镇江、九江、汉口、天津、牛庄拥有租界，法国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拥有租界。随着时间的流逝租界数量在不断增加，在这些租借地内，外国领事馆又以九十九年为期将土地租给土地租用者。根据治外法权，领事馆还可以对自己的国民行使司法裁判权，并逐渐具备了税收、警察及其他市政府的特征。这样，中国的主权尽管没有被摧毁，但在主要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中却主要处于服从地位。同时，当 1863 年英美租界合并形成上海“公共 325 租界”时，上海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市政府。在这里的二千或更多的外国侨民中，英国人居首位，美国人次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工部局代表着外国土地租借者（或叫“纳税人”），这个工部局从外国领事及其治外法权中获得自己的权力。上海工部局逐渐开始处理一个大城市的所有问题——诸如道路、码头、下水道、卫生、警察以及像赛马场之类的娱乐设施等。像在中国统治者的统治之下一样，中国居民要纳税但没有代表权。上海仍是中国的领土，但在条约体系下它不向中国纳税而处于外国领事的控制之下。

对商业具有特殊用途的西方法律也随着西方的控制而来，诸如合法的合并与强制执行合同的做法等。西方国民受自己国家的领事法庭的约束，中国原告只能在这种法庭上对西方国民起诉。英国把其处理在中国和日本司法事务的高等 326 法院从香港迁到上海，以便受理所有英国领事法庭的上诉。但来自法国领事法庭的上诉必须送到西贡，来自西班牙、荷

兰或俄国领事法庭的上诉则需分别送到马尼拉、巴达维亚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使得中国原告很难对领事判决提出上诉。1864年的一项新措施是“上海会审公廨”的建立，它由中327国地方官主持，但外国领事馆的“会审官”作为共同法官与他坐在一起。法庭使用西方法律程序，审理当地中国人之间的案件和中国人为被告的案件。这样，外国被告和中国被告都拥有根据他们本国的法律在自己国籍的法官面前受审的权利。

上海的实业在治外法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随着中国人大量涌入和实际地值的上升，外国土地租用者通过转租他们的已租土地获得了高额利润。当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和其他中心发展成近代大城市时，依赖于治外法权的既得利益也随着相应增加。开始主要是用来保护西方人免受中国司法惯例折磨的法律手段现在则更主要地成为保护洋行和外国公司逃避中国税收的手段。那些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的国家的国民通过成为条约国领事的被保护者而获得治外法权，例如，法国领事取代中国政府对在中国的默麦尔^①、摩纳哥、波328斯和罗马尼亚公民行使裁判权。最惠国条款继续将任何一个条约国所取得的所有特权给予每一个条约国。始自19世纪40年代为控制五个通商口岸的三百五十个外国人的这一体系在20世纪最终发展为大概控制包括约九十个通商口岸和开放港口、约二十五个（轮船）停靠港和约三十多万外国侨民的体系。新通商口岸城市的西方人发展了西方都市化的市政设施——报纸、学校、图书馆、医院、供水排水系统、铺石道路和照明系统。他们还连同西方的肉食、皮鞋、弹簧床、现代抽水马桶一起带来了他们更高的生活标准。所有这一切都使外

^①默麦尔（Memel）是今立陶宛克莱彼达的旧称。——译者注

国人在中国成为一种上层阶层，它像中国上层阶层本身一样按自己的方式拥有特权和权威。

修约的失败

19世纪60年代后期，那些在北京积极推行“合作政策”的西方和清朝的官员都希望中国在避免再遭灾难的情况下逐渐适应外部世界。每一方都有需要加以对付的反对者。通商口岸的商人要求增加特权——对外国轮船、铁路和矿山企业开放内地，废除厘金和转运税，允许外国在任何地方居住等等。在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排外顽固派受到清政府在镇压叛乱方面所获胜利的鼓舞，某些人准备依靠中国舆论的强大力量用武力驱逐传教士。在这两个阵营——一个贪得无厌，另一个誓不屈从——中间，西方外交官和清廷高级官员试图建立和平与安全。

1865—1868年间，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特别是由海关的赫德和英国公使馆的威妥玛提出的建议被呈递上来，他们提出的观点在几十年后才得到中国改良派比较充分的利用。与西方的联系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对外问题，这一问题要求用国内现代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来解决。赫德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与西方加强联系似乎是帮助中国改造其文明的最好方法之一。自1861年就是“合作政策”台柱、已离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868年作为中国第一位使臣被派往西方世界，他享有帝国一品顶戴，与随员游历了西方各国的首都。在华盛顿，他以相当平等的条件签订了一项条约。但蒲安臣又是一位雄辩家，他关于西方化和基督教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在古老的中国出现的论断，既显得过于幼稚又使人误

入歧途。1870年他在俄国突然死去，其使命也随之告终。

同时，由于条约可以在十年之后予以修订，阿礼国在赫329 德的帮助下于1868—1869年之间进行了冗长的谈判，试图就租界问题达成一项既部分满足英商要求、同时也不会被中国顽固派完全拒绝的协议。1869年10月签订的须经批准的《中英新定条约》中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条款今后将把英国在中国的扩张以及整个条约体系置于一个比较平等的基础上，但是，由于阿礼国试图限制并最终稳住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所以他的草约在英国受到了对华贸易利益集团的猛烈攻击，于是英国政府拒绝批准。在中国方面，恭亲王已同朝廷和军机处及各省督抚进行了磋商。这项条约对中国来说似乎是一个外交胜利，而皇帝的恩准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所以，英国对条约出人意料的拒绝严重损害了19世纪60年代温和的“合作政策”。这次挫折与1870年更为引人注目的天津教案一样，表明中国和外国在华的鸿沟有多么巨大。

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变化

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英国在中国的地位不断强大，在赫德领导下的海关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它既促进了依照条约的贸易，同时也支持了中国通过新制度走向现代化的努力。首先，海关确保北京有了一个不断增长的、有保证的和不受约束的新税收来源，并保持了严防走私和腐败的严格的帝国关税。为了制止中国人从香港自由港向附近中国领土大规模地进行鸦片、盐以及其他日用品的走私，以下两项措施是必要的。第一，1887年原葡占澳门港正式割让给葡萄牙，使其成为外国领土；第二，海关在九龙和浪白（靠近澳门）设立关所以遏制用中国帆船进行的走私。海关还完成了中国

沿海航海图的绘制工作，设置了灯塔、信标、航标和其他近代航海辅助设施，负责所有港口设施的管理，出版贸易统计和商业及科学报告。在各港口的外国税务司像在北京的赫德一样周旋于外国条约权利和中国利益之间，经常履行准外交职能，而海关的中国职员则为培养文官提供了现代训练基地。1875年海关有四百名西方雇员和一千四百名中国雇员，到1895年分别增加到七百人和三千五百人，西方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英国人。简言之，赫德及其海关处在条约体系的中心，无论对整个条约体系作何评价，他们的工作是条约体系最富建设性的方面之一。

随着通商口岸发展成近代城市而来的是使中国不断更接近于外部世界的技术进步。1869年苏伊士运河把到欧洲的距离缩短了一半；1870—1871年间，海底电缆把符拉迪沃斯托克、长崎、上海、香港和新加坡连结起来，这样便建立起了经伦敦到旧金山环绕整个世界的电报通讯系统。于是，中国更进一步卷入世界经济，变得更易受到国际价格、商业危机和外国竞争变化的影响。当白银产量上升，许多国家继续保持金本位，从而导致它们国家白银贬值的时候，19世纪后半期中国贸易受到了世界性银价下跌的影响。协定关税是按固定银钱比率制定的，1858年时大多数情况下的税率是5%，但由于随后几十年价格的上涨，总的来说税率变低了。外国进口和中国出口商品在通商口岸与内地之间不管向哪个方向流动都要附加2.5%的子口税（这是关税的一半），然后免除中国纯国内商业中的商品必须缴纳的所有厘金和其他税。同样，多纳2.5%“海口”税就可以免纳用外国船从一个港口运往另一个港口的中国商品应纳的所有附加税。这些措施防止 331 了中国征收保护性关税，它是对主权的肆意践踏，给予外国商人凌驾于中国竞争者之上的特权。

一心指望有机会发财的外国商人，当其理想中的黄金国成为泡影的时候，也相应地受到挫折。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并没有为西方产品提供预期的市场。到189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仅有五千万英镑，少于许多小国的贸易额，并已被日本的外贸超出。这一停滞的主要原因无疑是中国的贫穷、自给自足和保守主义。但英国商人把这归咎于官员的阴谋，因为子口税仍然阻碍着中国市场的“开放”。

就贸易的货物而言，19世纪中期的大宗商品——鸦片进口和茶叶出口——都达到了最高额，然后便下降了。因1858—1860年条约而使之合法化和纳税的鸦片进口于1879年达到了八万七千箱的最高点，但此后便减少了，其原因是332中国内部的鸦片生产（数倍于进口量）对仍在扩大的中国市场的供应量不断增加。同样，茶叶向英国的出口从19世纪30年代的三千万磅上升到80年代一亿五千万磅的顶点，但是此后由于19世纪中期从中国移植到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开始占据英国市场而下降了。中国未能使其茶叶工业现代化，印度茶叶是在由资本投资建造的大种植园中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印度茶叶严格分级并免纳出口税，中国茶叶则是从小规模的个体农民那里收集来的，暴发户商人并不保证茶叶的质量不掺假，而且茶叶转运和出口都要交税。中国最著名的产品丝绸在1900年后也开始出现同样的衰退，因为在欧洲和日本由于养蚕科学防疫、缫丝机械化和现代市场组织生产出了更高质量的标准化产品。清政府无力执行其他国家的政府正在执行的商业领导和管理职责。

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中国棉花生产为庞大的手工业提供原料。在第二次条约解决以后，棉产品的进口直到1890年都没有出现英国所希望的巨大增长。主要的增长不是棉纺织品，而是棉纱，棉纱的进口主要来自印度，从1870年到1890年

增加了二十倍。这是因为机器纺纱大约是手工纺纱产量的八十倍，而机器织布仅是手工速度的四倍。这样，国外进口的廉价棉纱削弱了当地中国人的棉纺工业，但却为中国的棉织业提供原料，而中国的棉织业在许多年里仍像以前一样用安在农户家中的手摇织机进行生产。

关于对外贸易对19世纪中国的最终影响，观点是有分歧的。认为机器工业产品能摧毁落后国家小农经济式的手工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似乎只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卷入世界经济并没有达到东南亚那些完全殖民化地区的程度。当茶和丝绸出口下降的时候，中国开始出口多种产品（菜油、桐油、猪鬃、皮革和毛皮以及大豆）。它们并不是种植园和工厂的产品，而主要是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小农户的副产品。

买办、银行家和企业家

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士绅的对立不同，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是相互需要的。在广州贸易中，行商是外国商人与广大的中国市场之间主要的中间人，1842年以后他们在通商口岸的位置由买办替代了。但是，在那些行商已是政府领照的中国式掮客的地方，买办还只是外国商行的契约雇员，替外国商行经办涉及中国方面的事务。买办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语言、333制度鸿沟上架起了桥梁。唐廷枢是最著名的买办之一，像最早的买办一样他来自广州三角洲，在接受了传教士提供的英语教育以后，他担任了香港政府的翻译，随后又在上海任海关职员，1863年成为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他的例子很典型，他捐资买得了功名，跻身于官僚阶级，同时又成为通商口岸的资本主义企业投资者。

买办一商人只是中国国内贸易增长中最显而易见的要素，另一个要素是私人银行业。这一行业通过集中在宁波一带的沿海地区，同时非常不可思议地集中在闭塞的西北地区山西的某些城市的钱庄系统也发展起来。长期以来山西就是帝国统治的战略中心和商路枢纽——处在蒙古与四川之间、华北和中亚之间，同时也是骆驼队及中国北部和中部漕运的转换地区。山西商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并在其他省开办当铺业务，同时也开始通过雇佣私人骑兵来为白银船运护航。由于土匪横行危及了银铤的船运，发货人开始利用银行。由军队护送白银要花费其价值的2—3%，而这些私人汇款银行只收取所汇数0.3%的汇费。

1800年左右山西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个开染坊的商人，他在天津有一个商号，在重庆建立了购买原料的机构，由此而开办了汇款业务。银行数目最终发展到二十至三十家，以山西中部为基础组成三个主要集团。为了得到北京户部的执照，新银行必须有一个已营业的银行作担保人，山西银行通过不给外省资本家提供担保人的方法保持了近乎垄断的地位。高层省级官员是最大的现金汇款人，一般通过“勒索”积聚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高官开始依赖这些非官方渠道的银行家，银行不仅将他们的官银转运至北京，而且擅长对付从省库到户部沿途的贪官们。银行还贷款给有希望得到肥缺的官员。自1826—1850年以来，银行家们用汇票为广州商人调拨资金以在中国中部购买茶叶、丝绸和支付鸦片进口款项。

在销售外国进口货物时，中国商人的行会组织及其对地方状况了如指掌帮了他们的大忙。最初洋行在各个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而后又开始关闭这些机构，而将自己的业务集中在像香港、上海之类的主要航运中心。在口岸间的贸易中，即从一个通商口岸至另一个通商口岸的中国国内贸易

中，中国商人成了外国船舶的主要租用者，外国船比当地船更安全可靠，总之，中国资本家也可以从条约体系的安全和便利中获利。买办辞去外国商行的工作后，变成了通商口岸的企业家，这只是这一趋势中最引人注目的典型而已。

主要由英国洋行组成的汇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上海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兴起。汇丰及其他外国银行向中国商人和中国银行提供资金，在口岸间汇兑资金，办理华侨汇款，甚至发行本行钞票。不动产投资的安全性和当地工业的需要把中国资本吸引到通商口岸，当地工业能就地加工商品、提供公共设施和都市住房，并支撑航运业。这种中外合作的发展吸引了中国资本和人才，例如，1862年旗昌洋行开办了一个轮船运输公司，而其从美国的合股人、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及中国商人和买办那里筹集到大致相等的资本。该公司购置了吃水浅的美国明轮船，开通了两星期一班来往于上海和汉口间的定期航班。这样，这家美国人领导、中国人为后盾的企业开创了长江轮船运输的伟大时代。

1870年以后，通商口岸经济的增长促进了资本投资和经营方法的发展，在有利的环境和适当的时机，它们可能被用来使中国度过工业化的关键阶段——进入靠自己发展的阶段。但通商口岸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部分，日本同一时期的经验表明，工业现代化的成功还依赖于更多的中央支持和更加庞大的规模。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环境——更明确限定的民族政治目标、一个更稳定的法律和金融运行体制、更坚强的政府领导、更独立的企业经营形式，而这些正是中国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区所缺少的。

第五节 早期工业化的困境

在1870年以后约二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速度尽管相当可观，但落在了日本和西方的后面。航行于长江上的轮船步着密西西比河上轮船的后尘，但其后的铁路时代却没有像在美国西部那样随之而来。当工业化扩及整个日本的时候，它在中国却仍局限于几小块飞地。中国工业化的缓慢可以归结为许多因素——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行政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35

政府领导的不力

如果我们能用日本的例子来衡量的话，那种认为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观点就过于简单化了，也无法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决策首先是中国政府的权力，只是政府的无能才使通商口岸后来确立了决定性的地位。条约体系具有限制性的影响是积累而成的，那些后来显而易见的罪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简言之，中国政府无力发挥领导作用是中国工业化缓慢的首要因素。

北京的这种无能在两个方面最为显著：财政和政策。北京过时的财政体系仍以包税制为基础——就是说，省级官员须上缴一定数额供北京使用的税款，而他们把征收到的税款的其余部分留给自己及府衙使用，编制预算、清理帐目、中央计划和控制等都是不可能的。大约在1890年，北京列举的年税收入总计约八千九百万两（参见第317页表），但在这些

上报的税款中，北京只得到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拨给各省使用。然而，没有申报的税款大约是这些北京列举统计数字的三至五倍，因此，中央政府没有调度财政的权力。

在各省，官僚阶层愚蠢的反对阻碍了工业化。这种思想上的保守主义显而易见，曾国藩的经济观点便是明证。1867年他相当反感地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为贪婪地占有物质利益而争吵不休，它们的商人在通商口岸以损害中国为代价追求利润；现代轮船、铁路和电报如果由外国人或依附于外国人的中国人掌管，将会威胁到民生；儒家政府必须保护民生，以免引起民众的愤怒。曾国藩虽是“自强”的领袖，但却没有现代经济发展的观念。在回顾工业化的失败时，现在有些人对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进行指责，但是人们当时抨击他们企图实行过多、过快的变革。洋务运动的抨击者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看到了许多国内的革新却无法看到更广泛的奇怪现象，即尽管中国的变化速度相当可观，但它正逐渐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上层阶级既不接受进步观念（意味着不停地变革和反对停滞），也不接受 336 民族主义观念（意味着在平等基础上的国际竞争）。

在清领导者惰性的后面，他们维护当时的权力结构并在那一结构内只把现代化应用于个人和政治目的的既得利益。在直到189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朝廷仍旧处在皇太后慈禧的控制下。她稳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官僚机构，控制了年轻的皇帝，据说她甚至鼓励皇帝过纵欲的生活，这种生活使皇帝在1875年1月十九岁时就死去了。为使自己保持权力，皇太后此时破坏了神圣的朝廷继承法则，这一法则规定，为了保持孝道所要求的礼仪，新皇帝必须从下一辈中挑选。相反，她把自己的外甥（她妹妹的儿子），一位与先帝属同一辈份的四岁孩子扶上了帝位，年号光绪（1875—1908），这样，她动摇

了礼仪传统。直到光绪皇帝1889年亲政，慈禧一直统治着帝国。1884年她把恭亲王赶下台，整个帝国的官员都对她俯首贴耳。

皇太后坚强的个性对保守的目的起了重大作用，这一目的就是靠在传统的中央政权和新的地区势力之间保持平衡来维持朝廷的存在。各省主要官员的现代化项目——他们在各省中心建立的新兵工厂和工业加强了地方主义，只有通过与337 地方权贵合作并操纵他们，皇太后才能保住满清王朝，而所有这些怀着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地方权贵仍然尊崇清帝，乞求得到皇家任命和由皇帝作出最后决断，他们还没有想过要行使军阀的独立权力。

李鸿章的工业帝国

李鸿章的经历（参见第303页）表明了地方权力和对朝廷忠诚之间脆弱的平衡。在187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李鸿章仍然继续在天津当权，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这完全违反了即使是最高级的官员也必须每三年或最多六年调任一次的传统。李鸿章的地位基于三个因素：第一，淮军，这是一支二万五千至四万人的强大军队，驻扎在直隶和山东，有许多年还驻在江苏，由设在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兵工厂提供装备；第二，大约二百名青年军官、官员和技术专家的官僚集团，他们当中有许多来自安徽李鸿章的家乡（合肥），把李看成恩主而追随他；第三，地方省级税收再加上为保卫京城所在地直隶省而征收的税收，这些税收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地区。在把李鸿章调往华北的时候，皇太后显然已决定与李鸿章日益增加的权势通力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他们两人开始在政策和获利事务中相互依赖。李鸿章的机构像美

国城市大亨的机构一样，通过私人之手周转公共基金。这样，他在洋务运动中长期的领导地位便夹杂了爱国的和个人的、意识的和物质的动机。

在指导新的经济项目时，李鸿章和其他人都运用了“官督商办”的原则，意思是说这些企业由商人经营、官员控制，旨在营利。这仿效了盐业专卖的传统，专卖是一种从非弹性需求的大宗垄断商品中获取官方捐税和私人勒索的财政方法。这种静态的、包税式的传统与创立近代工业有活力的、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的传统正好相反，它的作用是分配利润而不是再投资，是牟取暴利而不是为了工业化。

李鸿章的第一个冒险项目自然是轮船。北京的食品供给仍然依赖于长江下游的贡米，贡米用驳船溯正在淤塞的大运河而上或用海上平底帆船绕过山东运往北京。1872年李鸿章建立的轮船招商局部分地得到了政府为贡米运输所拨年度款项的资助。开头李鸿章完全不恰当地指派在用平底帆船运输贡米方面具有经验的人担任总办，但不久他就改派在怡和洋行供职、会讲英语的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了。唐直接掌管招商 338 局的轮船以及他自己和其他中国人拥有一些轮船的航运事宜，在唐廷枢领导下的面貌一新的招商局里，持有股份的商人基本上都成了具有官品的各级管理者。他们享有津贴并拥有授职权，于是便可以再指派亲戚朋友当职员。这种企业接近代标准既不是官办的也不是私营的，而是一个官员和商人在其中共同发财的混合体。在贡米津贴的帮助下，招商局在中国的水路上成功地与外国航运公司进行了竞争。1877年，它买下了更大的旗昌洋行的船队，成为最大的轮船公司，以后便按与英国航运公司达成的协定共同垄断了中国水运。然而，后者更精明地用其利润进行再投资，而中国商人经营者们则取出全部利润，听任船队衰落。英国船最终在中国国内

运输业中重占了主导地位。

轮船招商局是其他企业的样板。“官督商办”制度在一个又一个企业里证明，这是一种传统的而非现代的制度。首先，它受偏袒裙带关系和小集团、勒索、缺乏冒险开创精神的损害。其次，由于是官督，经营者宁可立即分享利润，而不是积累利润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以免政府将利润悉数充公。最后，“官督”通常带来某些垄断权利，这些权利最初是为帮助其与外国人竞争而给的，但不久它们便被用来充当补偿低效益的工具。

李鸿章和他的总办唐廷枢在工业需要协同发展的逻辑推动下于1876年开始在天津以北的开平建立一座近代煤矿。其目的是为招商局的船只提供燃料，并在这些商船向北运来贡米以后为它们向南返航时配载货物。近代水泵、风扇和卷扬机的使用很快就从旧式中国挖煤工已废弃的煤层中获取了利润。新建的拥有十几名西方工程师和近代设备的开平矿务局到1883年建立了机械厂，生产出自己的发动机、机车、拖船，安装了地方电话、电报，铺设了一条七英里长的铁路线。不久年产煤量就达到了二十五万吨。然而，唐廷枢于1892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与清廷关系甚密的汉族旗人，一位勒索专家，他将公司的资产扫掠一空。公司日益依赖于外国贷款，终于在1900年由一家以美国工程师赫伯特·胡佛（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英国公司接管。1912年以后，开平并入了中英开滦矿务局。

因此，在华北，轮船促成了煤矿的开采，而煤矿的开采又需要铺设铁路。早期的铁路计划被那些决心阻止外国剥削的官员们否决了，1876年由外国人建立的一条短距离的、未经批准的上海至吴淞的铁路，第二年即由南京的总督买去，并迅速将其拆毁。为了运输开平煤而开始修筑的铁路只能缓

慢地延伸——1888年向南延伸到天津，1894年向东北延伸到山海关，1896年延伸到北京郊区，全长大约二百四十英里。除了台湾的一小段铁路线外，这就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争辩之后对铁路时代的全部反应。反应迟钝的原因是很有启发性的。第一，水路运输网得到充分发展并在除华北以外的地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轮船已深入内地水路驶抵中国各地，但是铁路则不可避免地更直接侵害中国人的生活，它穿过运河和稻田，破坏坟场的安宁，这很容易引起平民百姓的迷信和仇外的斗争。当昂贵的地价与民众的情绪结合的时候，会使获得任何筑路的权利都要花费巨大投资。资本不易筹集，政府财政拮据，而发行公债和其他获取贷款的手段尚不成熟。北京的防守战略是既反对外国人修筑铁路也反对外国对中国铁路提供巨额贷款。

在李鸿章的工业帝国中登峰造极的官僚工业家是盛宣怀（1844—1916）。在出任轮船招商局的会办以后，盛宣怀开办了另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电报总局。尽管使用类似于官方的名称，但这家公司通过向“商人”，特别是向盛宣怀和其他参与经营的人出卖股票的方式筹集了大约二百万银元的资本。政府对电报线路提供贷款并派警察保护，以防线路遭到那些因害怕高杆干扰“风水”的占卜效力而感到愤怒的乡民破坏，股东获得的年利高达20%。直到1900年以后公司的线路逐渐国有化为止，李鸿章通过其副手盛宣怀一直控制着全国的电报业务，任命电报局职员并保护他们不被指控犯有贪污罪。

在许多国家的工业化中，棉制品的机械化生产是先导工业，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棉纺织厂办得极为成功。早在1878年李鸿章就开始发起建立中国的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以与外国的进口商品进行竞争。朝廷给予它免税和为期

十年的生产棉布和棉纱的垄断权，外国机器和工程师到达了，但商人股份的认购数不足，而且第一任会办又愚蠢地进行资金投资。盛宣怀于1887年接管这家工厂以后，用来自他兼任总办的轮船招商局和李鸿章的直隶省政府的贷款资助织布局。1890年开始，大约四千名工人很快生产出了优质布和纱，1893年的红利约为25%，但就在那一年未参加保险的织布局不幸被烧毁了。李鸿章和盛宣怀大胆地计划再建造十一座纺织厂，垄断新兴的中国纺织工业，根除外国进口货。当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断了他们的计划的时候，已有五家纺织厂投入生产。

第六节 现代化的缓慢发展

思想和文化创新自然与通商口岸及其商业与工业的物质增长并驾齐驱。然而从与西方交往中获得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只是中国传统洪流中的支流。蓄长辫、文人的长袍、妇女缠足、婚丧大礼以及官员招摇过市的轿子等等，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未受任何西方时髦事物的影响，而这类时髦事物正在席卷当时的日本。变革的思想在传播，但非常缓慢。如果我们看到了诸如现代邮局、出版社和出国留学之类的新发展，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在每一方
341 面都受到西方榜样的鼓励，但必须建立在原有旧制度的基础上，旧制度的力量仍是如此强大，以致减缓了对于革新的需求。

邮政系统和出版业

赫德早就开始为建立全国性的邮政系统而工作，但这项工作花费了他三十年的时间，因为他发现中国这方面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尽管是在前近代水平效率上的满足。第一，从北京通向整个帝国四面八方的五条主要道路上建有长达一千六百年或更长历史的官方驿站，这一古老的体系运送官方的人员、信函、货物和钱币，但只为政府服务。第二，为满足普通人民的邮政需要，商业性的“书信馆”发送私人邮件，视路途远近和获利多少而收取一小笔邮费，但其业务范围并没有遍及全国各地。到这个世纪末，在二十四个通商口岸登记注册的书信馆约有三百家，在全国就更多了。最后，西方政府在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城市间设立了自己的邮政系统，并对外国侨民开放这一系统。中国最终有数十个这样的外国邮局在营业。

为了在所有这些既得利益之间发展现代国家邮政，赫德利用了海关的力量。在接受了在冬季经由陆路把使馆邮件转送至北京的任务后，海关逐步建立了一个邮政部门。最后，这一部门用外国轮船在中国水域只运送帝国邮局的邮件，1896年帝国邮局作为海关的一部分正式成立，它变成了包揽船运私人书信馆邮件的代理机构，并开始把其旧式的竞争者排挤出这一行业。

现代化的另一个标志——专业报刊的兴起也有其令人尊敬的先驱。著名的《邸报》至少可以回溯到唐代，它刊印朝廷公布的官方文件，但它既不是官方出版物，也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形式。北京的私人商号也出版并发行以商业为基础的所谓报刊，在整个帝国的文人一士绅阶层中传播宫廷新闻和帝

国文件。在城市，新闻也由商业传单或报纸传播，这些东西作为印刷所的副产品印刷出来并在街上出售。由行会分发的价格表和通常由官方或士绅资助的书籍出版是传播印刷品信息的其他传统方法。

新教传教士给这些古老的渠道注入了革命性的因素。由于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被拒之于内地之外，他们早就运用出版业传播用白话而非文言译成中文的福音。1815年伦敦会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出版社，用中文出版了一份月刊，其他传教士也步其后尘。³⁴²除了中文的传教期刊外，还有英文报纸，如《中国差报》（香港，1845—）和《北华捷报》（上海，1850—）。它们为贸易团体服务，并成为中国近代报纸形式的直接楷模。

当颇富文采的人开始发表政论性观点——一种朝廷严格禁止的、只能在通商口岸保护下才有可能从事的活动时，中国报刊业最终超过了纯粹事实报道的水平。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是王韬。他原是一个经学学者，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任伦敦会出版社的中国编辑，60年代帮助理雅各完成了其不朽的译作《五经》（参见第41—42页）。这期间王韬和理雅各在苏格兰共同度过了两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70年代王韬成了独立的报界人士，他在香港创立并编辑自己的日报，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欧洲和日本的旅行使自己更加博学多识。王韬是一个先驱者——内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思想上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批评者，他与西方的交往产生了爱国主义和改革两种思想。

留学

一个甚至更大的改革推动力量来自在西方受教育的经

历。“留学生”的先驱是一个来自澳门的穷孩子容闳，他在教会学校学会了英语并被传教士送往美国学习。他成为基督徒并成了美国公民，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自己说，在耶鲁所受的教育向他展示了“被愚昧蒙上了眼睛的人绝不可能看到的责任”。他相信，“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强大”。但直到1872年容闳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下得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梦想。按照这一计划，主要来自广州贫穷家庭的一百二十名穿长袍的孩子分四个班、每班三十人奔赴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他们在康涅狄格谷地一带的居民家中寄宿，但定期到监督驻所接受中国经学教育。然而不久，他们就在言论和衣着上发生了“逐渐的但显著的转变”，藏起了自己的辫子，并在体育运动、活力充沛、不拘礼节等方面得到发展，总之，变得美国化了。这时已同一位美国姑娘结婚、并在世界观上更是一个公理会教徒而非儒生的容闳，鼓励这种文化移入，但他保守的同事则吓坏了，并且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在北京引起了反应。留学生花费浩大，加利福尼亚的排华运动也一直在发展，在那里，排斥东方人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基于多种原因，1881年留学计划被放弃了。从哈特福德回国到达上海向道台跪拜的学生们受到了怀疑的接待，人们疑心他们会为未经改革的古典考试制度下所有文人的既得利益产生威胁。后来，容闳的弟子们在海军、电报和铁路管理部门、外交部门以及开平的矿山，主要通过应用西方的技术和管理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只有十二人成为正式的官员。

新教传教团和现代化

那些关于朝气蓬勃的开拓和成效一般的结果共存、非凡

的努力和巨大的挫折同在的记录，反映了传教运动的特征。1870年外国天主教教士大约有二百五十人，1896年约有七百五十人，而到达中国的新教徒则大致每十年翻一番。新教传教点也相应地从1860年在十四个地方的三十五个增加到1900年三百五十六个地方的四百九十八个。然而到1890年，当一千三百名新教传教士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过了天主教传教士的时候，他们的信徒则仅有三万七千人，与五十万天主教徒形成了对照。大部分地方，新教传教团包括大致相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或农村地区，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当大多数新教传教士仍拘泥于传播福音的时候，人数正在增长的少数新教传教士开始明白善行比单纯的福音可能更有效。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改革，他们改变个人行为的努力，起劲地反对许多社会习俗——一夫多妻制、童婚、缠足、赌博、算命、其他宗教的偶像崇拜，甚至还有儒家思想的敬祖，以及溺婴和吸食鸦片恶习。接受福音必须识文断字和上学，并且福音的传播也需要受过教育的当地牧师。到1877年第一次新教传教士大会审查这方面情况时，已有了二十所教会学校，二百三十一名学生。新教的初级学校逐渐发展成中学水平，逐渐被称为“书院”（像1879年后在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在那时变成了新英格兰和中西部那些教会学院的姊妹院校，即使不是分校的话。这样，1881年来自奥伯林的传教团成了“海外传教学生志愿运动”的先驱，这一志愿传教运动开始招募美国学院里的年轻人从事传教工作。医药布道会、药房、医院以及培养中国医生的医务学校也有同样的增长，到1890年第二届新教传教士大会召开的时候，传教士们已有了一个与他们的“中华教育会”相当的“中国医药布道会”在开展活动了。对基督徒来说行善的机会是无限的。

在山西与1877—1879年可怕的饥荒作斗争的一个施洗礼

者是李提摩太，他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爱尔兰人。他相信，与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成果的总程度相应，作为西方文明动力的基督教能够更有效地赢得中国。西方式的人类进步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善行，特别是教育，是进步所必需的。从1891年开始，李提摩太作为同文书会的总干事力求在文人和官僚阶层中传播改革思想。他和来自佐治亚的林乐知协同工作，林乐知当时已是一位翻译和编辑，从1868年起出版每周一次的、面向中国基督教大众的《教会新报》。林乐知把它扩大成《万国公报》（《教会新报》后来的名称）。经过中国学者的出色编辑，这一杂志向有学问的中国人提供了广泛选择的西方思想和信息。事实上这家杂志已成为19世纪90年代后期维新运动的一个源泉。

但是像王韬的社论和容闳的留学计划一样，传教士对中国改革的支持所触及的只是中国人生活的外围，是通商口岸一个新的中西合璧社会的产物，而远远地脱离了农民或士绅。直到1895年日本取得巨大胜利时，中国人的思想的主体仍然牢牢地拘于传统之中。

346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

第一节 外国势力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1870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进行蚕食，它们之间的争夺加剧了，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欧洲，民族主义经济利益推动英法这两个民主国家带头进行殖民扩张。每个欧洲国家中有文化的公民借助城市新闻业的发展，对世界新近发生的事件有所了解，因而对在海外进行掠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热情。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这些民族主义思想涂上了理想化的色彩，认为种族之间和民族之间必然会为生存而竞争，唯有适者生存。一些行政官员意识到“白种人的负担”，他们的理想与传教士的宗教热情产生共鸣。报纸的读者在心理上对每天发生的事情好似身临其境，他们对这些事情或感到惊讶或感到欢欣，因此他们吵嚷着要求采取行动。

随着殖民地的争夺日趋发展，中华帝国的边界显得既不明确又不固定。地图一般都不可靠，历史上对于边界提出的要求也时常相互矛盾，而且对清代权威范围提出的质疑也日益增多。除了地界模糊不清外，北京对各藩属国提出的宗主权要求既含糊空泛又不理直气壮。进贡制度毕竟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制度。这种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儒学伦理观和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和军事支配的基础之上。在需要平定藩属国的动乱、赔偿受

损害的外国人或遇到放弃藩属管辖权的要求时，北京首先的反应是逃避责任，避免赔款。因此，琉球群岛、台湾、越南、³⁴⁷朝鲜和中亚地区都成了外国殖民扩张的宰割对象。

俄国在中亚的威胁

19世纪70年代，清帝国的领土完整在位于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遭到了威胁。清代的战略家们对其中的三个地区表示关切，第一个地区是哈密周围地区，它是由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经沙漠之路通往中亚地区的咽喉要道。哈密和附近的一些西部要塞曾是满清政府进一步向西进行军事扩张不可缺少的后勤基地，同时也是支持清帝国征服和统治中亚的那些操突厥语的盟友和官员们的主要居住地。

第二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以伊犁河谷的草原地区为中心，它的北面是阿尔泰山脉，南面是天山山脉。这一地区原是西蒙古准噶尔部落的家园，在准噶尔部落于18世纪50年代被并吞之后，该地区成为充军地和军事设防地，由驻节在主要城市固勒札的将军进行统治。在固勒札和清帝国的其他前哨地方，人们用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和棉织品交换来自西北哈萨克部落方面的马匹。³⁴⁸

第三个地区由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塔里木河盆地的绿洲城镇组成。这一地区有时也根据主要绿洲和商路中心的名称而称为喀什噶尔，清政府在这里的统治最为薄弱。在这一带的城镇中，大部分居民操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那些从事贸易的绿洲地区的情形大体相同。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这两个中亚地区因语言、宗教、文化、贸易和政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曾先后受到蒙古人的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13—14世纪)(参见第165

页和第200页)的统治。从14世纪起尚武的莫卧儿人虽然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但却称他们自己是蒙古人的后裔，将这两个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其统治延续到17世纪。

清以前最后一个统治该地区的是和卓家族，该家族属于先知穆罕默德所传下来的一个宗教部族，它在17世纪晚期取得了对许多绿洲城镇的统治权。因此，喀什噶尔地区的和卓统治者与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并能从那里得到支持。当他们被清政府赶出这一地区后，他们的一些后裔在山脉西侧的浩罕汗国寻求避难，浩罕汗国成为商业扩张的中心，并与清帝国建立起以进贡为条件的贸易关系，它也是反清叛乱者的基地。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的将军将“伯克”的封号连同土地和农奴一起封给约二百七十名当地的部落首领，受封的这些首领们便组成了当地的统治阶层，他们名义上臣服于北京，但是，他们处在中华帝国的最边远地区，所以北京无法轻易地控制他们。

到1860年，清政府在这里的统治仅一个世纪之久，正对外扩张的俄罗斯帝国和英帝国对中国的新疆(或称“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愈来愈感兴趣。特别是俄国人，他们通过吉尔吉斯和哈萨克草原地区向南方和东南方不断进行蚕食，下一步是占领盛产棉花和通往英属印度北部的战略要地——西土耳其斯坦(或称俄国土耳其斯坦)。与此同时，北京对喀什噶尔和伊犁保持着薄弱的统治，它们之间相距三千五百英里，通过驿站要走六个星期之久。这种统治更多地是出于对蒙古西部边界战略价值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其经济价值的考虑。

1862年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民叛乱导致新疆地区爆发了一场骚乱。这场骚乱得到了在浩罕汗国的和卓家族的支持。
349 一名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不久便攫取了统治权，他在

1865年至1877年之间将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进行统治。1871年，俄国人为了排斥阿古柏和英国的影响，派兵进入具有战略意义的伊犁河谷地区，占领商业中心固勒札。从1858年起，俄国便在固勒札常驻一名代表，并保持正式的贸易往来（参见第302页）。俄国人对北京作出许诺：只要清政府恢复其统治，他们就随即撤出伊犁地区。

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面临着一场危机。尽管左宗棠的军队在1873年镇压了西北部的回民，但是他的军队远在甘肃，离阿古柏的统治中心喀什噶尔的距离大约相当于堪萨斯市与洛杉矶市之间的距离，其间有一条长达数千英里的沙漠之路相连，商队走完这段路程要用九十天时间。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了纷争。

这场危机导致两种不同的战略观点的产生。李鸿章和其他一些人主张“自强”，通过加强海防抵御来自海上的侵略。他们反对为左宗棠花费浩大的远征提供资金，收复远在中亚的不毛之地。在这场大争论的奏折呈送给皇帝御览之后，左宗棠的观点占了上风。中亚在清代防御蒙古人的传统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恢复这一地区是必要的，因为这能显示对清皇室列祖列宗的崇敬。左宗棠在上海借用中外贷款购买西方的大炮，他还在兰州开办一座兵工厂和一座毛纺织厂。同时，他迫使农民们种植粮棉为军队提供粮食和军服。左宗棠在甘肃建立了一个基地，并向西深入建立了一些前哨基地。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沿着沙漠之路向西挺进，攻占乌鲁木齐和其他战略要地，残酷地屠杀北部地区操汉语的回民叛乱者，将他们作为国内的叛徒加以严惩。随后他们进入塔里木盆地，将操突厥语的维吾尔人视作边境地区的叛乱者，采取较为宽大的惩治措施。阿古柏死于1877年。到1878年，

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新疆的所有地区。

这一辉煌的胜利使北京对俄国提出从伊犁撤军的要求。

满清政府的第一位谈判官员愚蠢地对俄国作了巨大的让步，他几乎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随后，外交冲突和战争恫吓便接踵而至。但是这场危机终于平息了。根据1881年达成的又一个条约，俄国从中国获得更多的赔款，但将大部分伊犁地区归还给清政府。在1884年，这一地区被划为一个省，定名新疆，即“新的疆土”。这一令人满意的结局使中国恢复了自信心，验证了顽固派关于轻易击退外国入侵的狂言和反对洋务运动的自满立场。

中国迟缓的外交反应

北京迟迟不向国外派出使节的原因何在？这些使节本来能够观察敌国的国内状况，并维护中国的利益。350 西方国家的公使从1861年起就常驻北京，但是直到1877年，中国的外交使团才在国外执行公务。这种迟缓的根源既有心理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根据传统的做法，在国势强大时，使者去国外广布皇威；在国势衰弱时，使者则去与蛮夷之邦议和。一旦皇威随着不行叩头之礼的西方使团常驻北京而化为乌有时，对外关系便具有令人羞辱的色彩。这种遭到伤害的自尊心也对政治产生影响。随着与西方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诸如李鸿章这样的洋务派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只有通过容忍顽固派尖刻的指责，才能对洋务派加以有效的约束，以取得平衡。顽固派将所有与外国人的联系活动都指责为叛国行径，这样，皇太后在倾听双方意见的同时，从这种僵持局面中渔利。

外国扩张主义者还能从北京优柔寡断的做法中捞到不少

好处，就像日本人在处理琉球岛民在台湾被当地居民杀害事件中所得到的那种好处。总理衙门很愚蠢，它没有与日本争夺对琉球群岛的主权。尽管从1609年起该群岛受到日本萨摩藩的控制，但是它在以前一直是中国的正式藩属国。更为糟糕的是，为了逃避补偿日本的损失，总理衙门宣布放弃对台湾居民所承担的责任。因此，不肯善罢甘休的日本武士在1874年对台湾发动惩罚性的远征。战争虽被阻止了，但是中国不得不为日本人撤出台湾而支付赔款。李鸿章和其他官员指出，假如中国向日本派驻使节的话，这次破费巨大的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1875年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当时英国的一支远征队从缅甸出发进入云南，开辟一条新的陆上商路。其中一名英国译员被持有武器的中国人击毙。英国提出赔款、道歉、修改中外交往法规和贸易让步等要求。这些要求都包括在条约体系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条约——1876年的《烟台条约》之中。这个条约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于1877年被派往伦敦向英方道歉。郭嵩焘是湖南人，翰林院学士，他还是曾国藩的朋友。他在发自伦敦的报告中对铁路、电报和矿山等称赞备至，并对他见到的学习英国技术的两百名日本人倾慕不已。郭嵩焘对洋务运动不加掩饰地进行宣扬，这触怒了顽固派。他们对他加以谴责，迫使他于1879年离职。到这个时候，中国已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和英国设立了公使馆。

中国因不愿通过派出使节来承认外国统治者的平等地位而陷入困境。当外国势力占领中国的藩属国时，这种困境演变成一场危机，尤其是在越南，这场危机降临了。西方的侵略、藩属国的软弱和中国无力坚持西方类型的宗主权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摧毁了进贡制度的旧秩序。

第二节 中国在越南败于法国

以河内周围的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北越于公元前 111 年被汉朝吞并，直到公元 939 年它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这里的居民不讲汉语（越南语与泰语相近）并与其他东南亚民族在主要的文化特性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但是这里的中央集权制的行政体系、汉字书写方式、儒学经典和家庭教育、科举制度以及中国式的官僚作风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印记。939年以后的历任越南统治者都定期向中国朝廷进贡，并在司法和文化方面效法中国的榜样。越南是仅次于朝鲜的藩属国。

越南在19世纪的软弱状况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越南的疆域范围和狭长形的领土是一个因素。北部的河内三角洲曾是古代的人口、生产和权力中心。西贡以南的湄公河三角洲直到不久以前才划入越南的统治范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况，它是越南扩张的边远地带。阮氏王朝(1802—1945)的新都顺化坐落在沿海狭长的可耕地之上，该王朝面临的任务是将越南北部和南部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社会方面，非越南民族的少数民族阻碍统一的实现。越南位于中国文化和受到印度影响的东南亚文化的文化分界线上，它没有达到中国在种族和社会方面所具有的同一性的水平，与朝鲜和日本相比差别更大。按照儒家思想建立的国家机构及其官僚阶层踞于与其不同的乡村社会之上，但是它们不能在效忠于国王的同时，依靠那些受传统教育的乡村精英或士绅阶层治理乡村地区。兼蓄各种教义的宗教教派大量出现和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大地主仍然拥有私家武装。

法国的蚕食

由于不可能在漫长的海防线上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因此阮氏王朝的统治者们尤其对排斥外来影响束手无策。这一局面有助于天主教势力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不断增强起来。经过两个世纪的改宗之后，天主教成为当地的一个教派，它在越南拥有的教徒比在整个中国拥有的教徒还多。该教深深地渗入越南政治、村庄间的械斗和不时出现的分歧之中。阮氏王朝按照皇室的正统观念建立在依靠道德统治的儒学原则的基础之上，其统治者及其保守的支持者们日益感受到外来宗教的威胁。他们采取措施反对外来宗教，在到1860年为止的十余年时间内，约有二十五名欧洲教士、三百名越南教士和三万名越南天主教徒被迫害致死。这给予法帝国的建立者们提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机会。

由于法国不像英国那样在外贸方面具有较重要的利益，³⁵²因此它在试图赶上英国时遇到许多挫折。野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这时发现法国能在维护天主教东亚传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与英国一起于1857年至1860年之间共同与中国作战的同时（参见第299—301页），法国还派军队进攻越南。1859年，法国占领西贡，随后又占领了该城周围的三个省。南部很快爆发了越南人反对法国侵略的起义，地方官员逃亡在外，因此法国人无法通过他们来进行统治，不得不亲自进行直接统治，建立交趾支那殖民地。考虑到通过湄公河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法国在1863—1864年之间在相邻的柬埔寨建立了保护国。

法国之所以能在越南南部取得这个立足点，主要应归功

于海军，传教士仅起了次要的作用，而商人则几乎没有参与这一行动。1866—1868年之间对湄公河所进行的地理考察激起了法国公众建立一个印度支那帝国的欲望，但是这次考察证实湄公河不可能成为通往中国西南部的一条商路。这时，法国寻找商路的兴趣转向流经东京地区^①的红河。在这一地区，法国扩张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在恢复法国的活力，与英、美的优势地位进行竞争，并帮助弱小民族。

中法战争

到19世纪80年代，法国根据1874年的《西贡条约》，而中
353 国则根据自1664年以来越南统治者向北京的约五十次进贡的事实，其中最近的两次进贡分别是在1877年和1881年，双方都对“安南”（中国和西方对越南的称呼）提出主权要求。但是，法国控制了南部的交趾支那殖民地，对越南首都顺化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法国与中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在越南北部沿中国边界地区不断发展。近十年来，东京地区一直不安宁，这里不仅存在着对统治越南的阮氏王朝的不满，而且还有中国武装人员渗入。这些武装人员是太平军和回民起义军的残部。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局面使得法国无法行使根据新的条约所获得的权力，诸如红河通商权等。越南统治者鼓动中国起义军残部打击法国人，同时又要求中国军队前来攻打法国人和中国起义军残部。1882年，法国终于攻占河内，根据条约，在安南建立了一个保护国，并随即派出驻军。1883年，中国派遣正规军从云南和广西越过边界进入东京地区，与法军激烈交战。

^①东京(Tongking)，越南北部地区旧称。——译者注

1883—1885年之间，中法之间的敌对行动和谈判同时进行，这使当时的观察家们困惑不解，也使从那之后的历史学家们困惑不解，其中一个复杂的因素是政出多门。双方的谈判代表都被他们的同胞们搅得心神不定，每当某一方打败仗的时候，另一方要求战争的呼声便随之高涨。在与俄国之间发生伊犁危机期间，清政府内就产生了一个主战派。^{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镇压了各处叛乱之后} 354 中国的官场充斥了身着文官服饰的旧军人，他们因清军在中亚取得的胜利而振作起来。被称作“清流党”的十几名年轻的学士在北京鼓吹在外交事务中实行最为好战的不妥协政策。这伙人是围在皇太后周围竭尽吹捧之能事的逢迎之徒，他们抨击以前宣传“自强”的人是在姑息养奸，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来对抗俄国和法国。1884年，当法军的胜利导致恭亲王被撤职和军机处被改组之时，“清流党”曾一度大权在握，但由于法军又连连获胜而倒台，在政坛上销声匿迹。该党中最精明强干的，同时也是唯一没丢官的人就是张之洞(1837—1909)。他在1884年就任两广总督，并在支持战争方面显示了他的实际才能。

中法谈判几乎与军事行动一样很早便开始了。1884年5月，李鸿章终于与一名法国海军军官达成一项协定，即《李福协定》。该协定规定：中国撤回在越南的军队，承认法国通过东京地区进行贸易的权利；法国则占有安南，拥有行使按照条约所规定的权力，同时不对中国提出赔款要求。由于这一协定，主战派连上四十七道奏折严责李鸿章。朝廷也拒绝放弃宗主权，因此，双方的战斗继续进行，尽管交战次数减少但打得更加激烈。谈判虽遇到挫折但也没有停止。赫德当时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但未参政，他开始进行秘密会谈。1885年，赫德派遣海关驻伦敦的代表前往巴黎，并在朝廷的恩准下以《李福协定》为基础达成了各项议和条款。李鸿章于

1885年6月签署了这个和约。

这一年的军事冲突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1884年8月，一支法国舰队进攻台湾北部，另一支法国舰队则驶入福州港与一支中国新式海军舰队——福建水师停泊在一起。福建水师拥有十一艘由福州建造的小型木制军舰，以蒸汽机为动力。相比之下，八艘法国铁甲舰吨位大，火力强。北京在长达五个星期内未能作出决断，8月23日，法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到期，法国军舰在几分钟之内击毁九艘中国军舰及在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于1866年建成的造船厂。

在陆地上，法国的优势要小得多。过于狂妄的法军在东京地区的丛林中不时遭到中国军队和越南军民的伏击。法国人占领了河内周围的三角洲地区，沿大道向广西边境推进，终于夺取了镇南关以南的谅山。1885年3月，中国出乎意料地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法国内阁因此而倒台。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自尊心。

抗法战争是中国自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以来所355 进行的第一次抵御一个现代化敌国的战争。这场战争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没有现代的组织和指挥，那么现代武器也将毫无用处。在缺乏必要的训练、战术、补给、通讯、战略和指挥的情况下，中国人手中装备精良的欧洲枪炮如同一堆废铁。比如说，福州港与大海相隔约二十英里，其间有一条狭窄的航道相连，岸上修筑了拥有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制造的新式大炮的炮台。然而，由于指挥系统消息闭塞、组织混乱、优柔寡断，因此中国军队既没有很好地使用现代化的武器，也没有充分施展传统的封锁和骚扰战术来打击法军。再比如说，中国在1884年拥有五十多艘现代化军舰，其中大356 部分是由中国造船厂建造的。但是这些军舰型号不一，分属四个不同的指挥官指挥。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分别属于驻在

南京和天津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指挥。这两个舰队的规模比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大，但它们都停泊在各自的海域中采取守势。谨小慎微、官场争斗和官官自保都妨碍了国家进行战争的努力。

但是，中法战争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尤其是在广东。该地是驻东京地区军队的主要后方基地，广东人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排外主义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而变得更加强烈：对法国人进攻的恐惧，福州战败后中国的宣战，张之洞采取传统的做法，悬赏捕杀法国人。即使这一地区并未遭到侵略，但是骚乱和抢劫到处发生，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是主要受害者。香港的现代化中文报刊向远远 357 超出知识分子圈子的广大社会阶层传播具有煽动性的消息，这似乎也助长了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

中国的“自强”努力

在中法战争于1885年结束之后的十年里，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经历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时期。为了对付俄国、法国和日本对其边远地区的侵犯活动，中国致力于加强陆军和海军力量。这推动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激励各界实现国防现代化。但是由于缺乏坚强的中央领导，这些努力一直有赖于某一身居要职的改革派官员的不懈工作和拥有地方利益的反对派的相对弱小。

这种依靠个人支持的发展的弱点在台湾暴露无遗。1885年，台湾从福建省中分出来成为一省。以士绅为主的保守势力相对软弱，首任巡抚是李鸿章的一个部下（刘铭传），他在六年任期内取得了一些显赫的成就：刘铭传在省会台北开办了一座兵工厂，建立了一支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澎湖列岛为 358

基地的海军部队，以土地清查和人口登记为基础实行土地税改革，此外还创办了其他现代公用事业。不幸的是，这位巡抚并不是一位精通儒学的士子，他本是乡村团练中的一个有魄力的头领，在这个世纪中叶镇压农民叛乱的过程中发迹起来。顽固派的进谗者们在1891年将他赶下了台。

张之洞是地方上权力更大的改革者，与法国作战的惨痛经历使他转而走上现代化之路。他在1885年之后崭露头角，是在地区影响和官僚政治方面能够与李鸿章相匹敌的主要人物。张之洞于1885—1889年之间在广州任总督，1894—1896年在南京任总督。虽然如此，他在地方上的主要根基是在武汉打下的（武汉是汉水汇入长江处武昌、汉阳和汉口的合称），张之洞在1889—1894年之间和1896—1907年之间在这里任湖广总督达十五年之久。如此之长的任期有助于他建立起地区权力体系，包括他的随从官员、地方岁入来源、军事力量、工业和政治上的靠山等。张之洞渊博的学识和主张排外的经历使他在搞现代化时不像其他人那样容易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他比李鸿章迟二十年成为独霸一方的重臣。虽然他不如李那么博学多才，但是他更为清廉刚正，急切地希望为现代化创立哲学基础，从而在理论上使之符合中国的古老传统。

当张之洞创建一个又一个现代机构的时候，他面对着按儒学传统建立的秩序被“自强”逐步侵蚀这一事实。举例说，加强国防需要文官习武、武人知文，这就打破了文尊武卑的古老秩序。再者，军事指挥官必须掌握实用军事技术，这也混淆了高贵者（“劳心”的士大夫）与低贱者（“劳力”的工匠和其他小民）之间的界线。张之洞在加强国防、引进越来越多的西方技术的同时，不断地致力于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他主张通过“自强”——运用西方的技术为中国的 目标服务——来进行保守的改革，从而拯救中国，他是这一主张的主

要倡导者。

中国加强国防的主要努力旨在建立一支海军。在法国人于1885年消灭福建水师之后，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海军衙门，意在表明政府统一管辖海军的决心。但是事实上，地方主义的离心势力仍然使四支舰队分驻在中国沿海的四个地区。驻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建北洋舰队，它是海军的主力舰队。他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在中国北部修筑炮台和基地，包括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和威海卫的设防补给品仓库。李鸿章没有像福州那样由自己建造军舰（福州仍继续造军舰），而是 359 向英国和德国的大军火商购买军舰。直到1890年为止，一名英国海军军官一直担任他的首席顾问。这时，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约二十五艘舰只，其中包括九艘现代战舰。

晚清政府建立海军的努力毁于朝廷之手。朝廷决定在北京的西北角新建一座颐和园作为1889年引退的皇太后的隐居地。宽阔湖面上的那条遐迩闻名的石舫便是这一事件的缩影，它使人想起四个世纪之前使明王朝崩溃的万历皇帝的奢侈之风。总管太监和其他朝臣支持这项决定，以乘机中饱私囊。户部对从各省以“海军军费”名义征收来的款项大肆挥霍，并向怡和洋行借款。这样，在19世纪90年代初，数百万两白银用于修建颐和园，而北洋舰队却未得到新拨的军费。与此同时，欧洲的海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本海军也新增了九艘快速舰只。北洋舰队的一些吨位小的舰只甚至还担负着在旅顺和烟台之间运送旅客的任务。到1894年，李鸿章意识到他的舰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他尽可能避免与日本一决雌雄。

第三节 中国在朝鲜败于日本

如同越南北部的情形一样，朝鲜北部在公元前108年被汉王朝吞并。在此后的四个世纪中，中国在平壤驻扎军队，平壤也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的边远城镇。当朝鲜在公元7世纪统一的时候，基本上师承了中国的文化。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差异，因为它包含了一些东南亚文化的要素。但是朝鲜却根据自身需要全盘接受了中国文化，这使它成为中国的头号藩属国，尽管朝鲜人由于语言和历史的不同而具有强烈的独立民族感。这种状况使朝鲜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于公元935年统一朝鲜的高丽王朝延续了四百七十四年，其后的李朝(1392—1910)统治时期几乎与明清两朝的统治时期一样长。

当越南暂时沦为一个通过海上进行扩张的欧洲国家的被奴役者时，朝鲜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注定成为中国、日本和俄国这三大帝国之间遭遇和冲突的场所。而且，朝鲜受正统儒学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进贡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在许多世纪里，朝鲜的对外联系仅限于定期向中国进贡和不定期向日本进贡。尽管朝鲜历代国王地位软弱，仅仅拥有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力，但是他们极其厌恶与西方交往。朝鲜国王们实行严格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对外交谋略一窍不通。朝鲜在外交目标方面反应迟缓、对策混乱，这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因为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帝国主义者起初在这里的扩张只不过是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外界进行的挑战而已。当然，这种扩张在下一个阶段是无法抵御的。

朝鲜的叛乱与复旧

19世纪60年代，朝鲜就像中国和越南在数年以前的处境一样，在国内外两方面都困难重重。在国内，一场由一个宗教派别领导的大规模农民叛乱爆发了。这是几百年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叛乱，尽管这次叛乱主要是为了反对贫困和腐败的统治，但是它也是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事件的影响下爆发的。但是，朝鲜的国内叛乱与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和中国的情形不同。

驻北京的耶稣会士首先将用中文书写的天主教经典带入朝鲜，天主教便以这种方式传入该国，并获得了“西学”的名称。第一个中国天主教传教团迟至18世纪末才到朝鲜各地传教。正当天主教教徒日益增多之时，该教很快便在1801年和此后的时期里遭到镇压。天主教被视为异端教派和来自国外的威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该教成为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由中国神父主持宗教活动。1836年以后，改由偷渡入境的法国神父主持其宗教活动。

19世纪60年代，一个融合多种教义的宗教派别在激烈反对“西学”的斗争中产生，这个教派名为“东学道”。但是，“西学”本身对于“东学道”的产生还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东学道的教义取之道家、佛教和新儒学，甚至还汲取了天主教的宇宙秩序论，同时它也吸收了朝鲜本地的萨满教，着重于在神启下达到信奉者与造物主精神统一的境界。这个新的宗教派别自然对贫困潦倒的农民具有吸引力，因此传播迅速，对于1862—1863年朝鲜东南部和南部起义的爆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世纪60年代的朝鲜统治者运用闭关自守的反基督教政

策和恢复、改革传统体制的方法来对付国内的动乱和西方的挑战，东学道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担任朝鲜摄政的大院君在1864—1873年的十年里进行了颇有魄力的保守改革。大院君是年幼的高宗国王(1864—1907年在位)的父亲，他还准备变革一切现存制度。大院君寻求通过改革来“恢复”王朝创立时的黄金时代，以此应付李朝面临的国内危机。

然而，尽管大院君努力复兴传统，甚至运用现代手段去维护传统，但他是一个顽固的排外主义者。当他处死法国神父而于1866年招致法国海军的入侵时，他手下的指挥官用正统的儒家思想严厉训诫这些入侵者：“你们岂能要求我们背弃祖先之遗训，接受他人之妖言？”在法军撤离(朝鲜认为法军被击败)之后，大院君继续迫害天主教徒，但是通过设立海关，将外交事务交给北京政府处理。

朝鲜开国

在与俄国发生伊犁危机和与法国在东京交战的困难时期，李鸿章始终密切注视着对华北威胁最大的危险因素——日本势力的加强，尤其是它在朝鲜势力的加强。日本继续在釜山进行有限的贸易活动，这与荷兰人在长崎的贸易活动相类似。汉城有时还派遣外交使臣去江户拜见幕府将军。除此而外，朝鲜奉行严格的锁国政策，仅存的与外界的定期交往是每年由礼部主持在北京举行的进贡典礼，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

在19世纪，进行勘测或观察天气的西方船只更频繁地出没于朝鲜沿海，朝鲜经常救援遇难船只，并将它们驱往中国水域。但是朝鲜坚决拒绝开国通商，甚至拒绝进行这方面的谈判。这引起列强之间相互竞争，看谁能比得上柏利准将，

“打开”朝鲜的大门。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率五艘军舰泊于流经首都的汉江江口水域。他派勘测人员溯江而上，两名美国人被打伤。这位公使要求朝鲜方面道歉，但遭到拒绝。美国舰队采取报复行动，摧毁五座炮台，击毙约二百五十名朝鲜人，但是，最后美国舰队不得不撤离。这一胜利坚定了朝鲜人拒绝谈判、奉行锁国政策的决心。

这时，邻国的扩张势力开始比来自远方的西方人更具严重的威胁。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四千名受贫困生活和残暴政府逼迫的朝鲜难民公然蔑视锁国政策，到北方俄国新设立的滨海省定居。与此同时，屡遭挫折的日本武士的既定目标是在朝鲜挑起战争。1873年他们的入侵计划被日本更为冷静的人士所阻止，但是，东京决心打开朝鲜的大门，将它从中国手中夺走。

1875年，一伙日本人从游弋朝鲜沿海的军舰登上朝鲜海岸，遭到对方枪击。东京政府虽然此时仍然坚决反对入侵朝鲜，但决定以优势兵力为后盾，通过温和地提出举行谈判的要求，兵不血刃地“打开”朝鲜的大门。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仍然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旧道德观念，但对藩属国行使宗主权不力，认为：“朝鲜虽系中国之藩属，然非中国之属地，故朝鲜对其内政外交享有自主权。”中国方面最终说服朝鲜进行谈判。日本军舰和运输舰停泊在仁川港外，于1876年2月仿照西方国家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条约达成了一项不平等条约。³⁶³该条约规定开放三个港口——釜山、仁川(当时叫济物浦)和元山与日本通商，宣布朝鲜为“独立国家”。

中日较量

对外交往的增多在朝鲜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

中国被迫在朝鲜政府和朝鲜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不愿进行干涉的中国只提出一项温和的改革方案，与来自日本更为激进的现代化影响相抗争。

诸如大院君这样的顽固派强烈排斥中国和日本的影响使改革变得复杂化。虽然大院君自1873年起就失去权力，但他仍在1882年参与煽动一起排外的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暴徒们袭击了日本公使馆。中国和日本都派出了军队，但中国军队的人数多于日军。中国方面劫持了大院君，并将他带回中国关押达三年之久。日本人的怒气因一笔赔款而平息下来。此时，李鸿章试图发展中朝之间的特惠贸易关系，任命顾问官员，并左右朝鲜的政治。

按照惯例，礼部尚书负责处理与进贡国之间的事务，从1880年起，中国与朝鲜之间的事务改由李鸿章管辖。李鸿章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建议下制定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政策，首先，他希望通过中国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来促进“自强”，从而与中国加强海军和陆军力量的努力保持一致。其次，他敦促朝鲜与所有的通商国家建立有条约保障的关系，而朝鲜的独立将使这些国家通过贸易来获取利益。李鸿章希望用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法确保朝鲜免遭日本或俄国的兼并。一名美国海军外交官员（R·W·舒费尔特准将）仿效柏利的做法，首先通过日本进行谈判，旨在达成一项条约。在这种尝试失败之后，他又于1882年在天津通过李鸿章进行谈判，结果取得成功。李鸿章代表朝鲜参加谈判，但他未能将说明朝鲜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附属国”的条款写入条约，而该条约却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1883—1886年之间其他西方国家在与朝鲜达成的条约中也承认了朝鲜的独立。

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朝鲜面临的主要威胁似乎来自俄国，当时最令英国感到忧虑的国家也是俄国。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争夺朝鲜控制权的斗争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起初，中国在英国的支持下似乎占了上风，但在朝鲜国内，比较激进的改革派都倾向日本一方，因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快于中国。这样，朝鲜国内激进的改革派和传统的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反映了它的两大邻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朝鲜所存在的基本问题依然是朝鲜的守旧主义和派系斗争，大院君被中国废黜之后，其政敌闵氏家族掌握了大权，该家族在王宫 364 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宗国王的王妃（通常称为“闵妃”）。这时，闵妃和她的家族与中国站在一起，废除了大院君的一些改革措施，反对那些要求效法日本的人所作的种种现代化努力。派别之争的根源表明朝鲜民族内部分裂，这一局面始终阻碍着朝鲜实现独立和现代化的进程。

外国影响大规模地渗入朝鲜政治之中。继1881年文化代表团出访中日两国之后，一个朝鲜代表团于1883年出访美国，另一个代表团于1888年在华盛顿设立公使馆。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影响除在日本十分强大之外，也通过那些负有传教使命的教育家和富有同情心的外交官扩大到了朝鲜，他们都支持朝鲜的独立。纵然华盛顿方面从未打算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施加压力，正如它后来对待“中国领土完整”的态度一样。

一个悖理的现象是，在1882—1894年之间中国在汉城占有支配地位的时期，日益增多的具有西方民族主义和改革思想的爱国者们主要通过与日本进行交往来汲取力量。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日本自由主义者努力使日本在朝鲜开创一个新时代，如同美国在日本所做的那样。在80年代初，金玉均和朴泳孝等年轻的改革家们曾就教于福泽谕吉。他们主张以日本为榜样，走西方国家的道路。但是他们发现掌握政治权力的闵妃集团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中国势力阻碍他们实现其理想，

因此这伙人于1884年发动政变。在日本公使馆知道的情况下，他们杀死一些顽固派大臣，劫持国王，只是等到年轻有为的中国将领袁世凯到来时才被挫败。袁世凯打败了日本公使馆的卫队，救出了国王。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在天津举行谈判，达成《天津会议专条》，解除了这场危机。在该文件中，双方都作了让步。根据谈判议定，两国同意从朝鲜撤出各自的军队和军事顾问；如若朝鲜发生变乱，任何一方需事先通知对方才可出兵。

在这种僵持局面的背后隐藏着日本的一项决策，即日本在参与国外的军事冲突之前必须进一步加强其自身的力量。这个决策是在东京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作出的，伊藤坚信时间对日本有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行朝鲜战争只会使俄国获益。李鸿章则认为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对中国有利，他积极推行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迫使朝鲜进行多方面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正是二十年之前英国人曾迫使中国所进行的那些，其内容包括：从中国海关借调数名西方人士掌管朝鲜海关，任命一名美国人任外交事务顾问，铺设电报线路，进行365军事操练。李鸿章的心腹、年轻傲慢的袁世凯于1885—1894年之间在汉城任“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他竭力维护中国的各种宗主权。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和传教士与其他人士一起衷心促进朝鲜的独立，而且在1885年以后的十年中，日本对年轻的朝鲜爱国者的影响不断增强。

中日战争

朝鲜政府对于改革的迟疑态度丝毫未能减轻民众的苦难，东学道运动仍然对被压迫者具有号召力。1894年，顽固派人士联络东学道徒，利用其分布广泛的组织在朝鲜南部起

事，要求改革腐败无能、鱼肉人民的地方行政机构。这次起义导致了中国和日本的干涉。中国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派去一支小部队，而日本随后便派出一支规模较大的军队进入朝鲜，要求改组朝鲜政府，不久又控制了该政府，并迫使它对中国宣战。8月1日，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随后进行的军事较量是对中日两国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所取得的军事现代化成就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庞大的中国能够依靠其国力赢得这场战争，但是日本很快便证明其现代化更为成功。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朝鲜，接着又侵入满洲。但是，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对比，由于没有铁路，海军控制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通道。中国舰队规模较大，而日本舰队的装备更为精良。9月17日，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之外运用英国的现代海军战术重创中国舰队。中国舰队当时摆出骑兵作战的阵势，以横列编队应战。日本人随后攻占位于满洲南部的海军基地旅顺港，并围攻位于山东北部沿海的威海卫，在此包围了中国舰队的残余力量。随着威海卫的陷落和舰队的投降，中国被迫求和。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于1895年4月17日签署了《马关条约》，条款十分苛刻。假如李鸿章没有被一个日本亡命之徒开枪击伤的话，条约的内容也许会更严厉。中国被迫将台湾及附近的澎湖列岛和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承认朝鲜的独立；支付二亿两白银赔款；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此外还达成一项商约，这项商约于1896年签署，它除了规定日本享有西方国家在中国享有的所有特权之外，还给予日本在通商口岸雇用廉价劳动力从事“工艺制造”的特权。

然而，西方国家炫耀武力，使日本的胜利很快变得黯然失色。对满洲和朝鲜存有野心的俄国深惧日本的成功，它说

366 服德国和法国于1895年4月23日采取外交干涉行动，“建议”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慑于这个不可抗拒的胁迫，日本接受了三国的“建议”，同时获得三千万两白银的附加赔款。

第四节 对中国的强权政治

日本击败中国的影响

当日本新式海军于1894年9月在鸭绿江口外海域出人意料地击败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时，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这一事件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反响，并促使帝国主义列强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竞相扩张势力。

这时，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的近代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水平：使用蒸汽动力的现代海军和铁路以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后勤供给能够支配地球上相距遥远的地区。从欧洲向外进行扩张的列强经过争夺，已对非洲和近东的许多地区提出要求。日本作为一个陆上和海上的列强突然崛起，暴露了清代进贡制度的最终崩溃和英国以不平等的条约体系为基础建立的非正式商业帝国的弱点。因此，东亚的国际关系进入整整十年的激烈动荡时期。

19世纪90年代的强权政治纷乱无章，但如果考察一下横贯亚洲大陆的英俄对抗，人们便能找到理清这堆乱麻的方法。英俄对抗的地区从近东和印度西北不远处的阿富汗边界经中亚、西藏和蒙古地区直至满洲和朝鲜。英国势力盘踞在这一线的南侧，它统治印度、马来亚和缅甸等国，同时又是在暹罗、中国及邻近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贸易强国。法国在暹罗和

缅甸与英国进行争夺，而争夺在非洲尤为激烈，1893年以后法俄的结盟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导致欧洲列强在远东争夺激化的一个因素是俄国依仗其横贯亚洲北部的陆上强国地位而加快其行动步伐。

在穆拉维约夫于19世纪中叶成功地入侵阿穆尔河（黑龙江），并于1860年取得滨海省之后（参见第302页），俄国的扩张在食品供给和交通运输方面遇到严重的困难。哥萨克居住的六十个村庄沿阿穆尔河形成一条交通线，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难以种植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夏季，他们只有历经千辛万苦才能乘船逆流而上；冬季，他们缺乏冰上运输的牲畜。随着阿拉斯加于1867年出售给美国造成在太平洋地区海獭皮贸易量的下降，甚至连俄国在东北亚的驻军和海军力量也削弱了。最后，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通航之后，俄国人利用阿穆尔河发展中国与俄国欧洲部分之间贸易的希望破灭。

到1880年，俄国在远东地区的人口仍不到十万人，来自满洲³⁶⁷的汉族移民、通古斯移民与朝鲜移民的总人数多于俄罗斯人，贸易主要控制在非俄罗斯人手中。这一地区与俄国的欧洲部分主要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通过陆路来保持联系。俄国的地位软弱，政策上处于守势，在1881年伊犁危机消除之后，俄国人加强了远东的防御。在这里他们面临着清帝国在满洲的积极移民、李鸿章加强他的北洋舰队和旅顺港海军基地的行动以及同时期日本舰队的增强。

然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6年断言俄国的所有这些弱点，包括人口、食品供给、陆上运输和海军力量等方面弱点，都能够通过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来克服。这条铁路将会增强俄国在远东的陆上力量。俄国的外交在其他地区所遭到的孤立和挫折使俄国更加自然而然地将其注意力再次转向东方，而且俄国能够得到法国的资本。1891年，筑

路工程同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两端开工，预定于1903年建成。该工程成为俄国重工业方面的国家工程项目中的重点工程。在铁路开工之后，当时的思想家们将俄国向东方的挺进称之为向东方传播西方文化的一项神圣的“历史使命”。

随着俄国势力和利益的如此增长，其东亚政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日本在1895年取得的胜利促使俄国立 即采取行动，在说服法国和德国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之后，
368 俄国便加强其优势地位。1895年，它促使法国和俄国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贷款额约合中国所欠日本赔款数目的一半。1896年，俄国征得中国的同意，修筑穿过满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长达九百五十英里的中东铁路。通过这条捷径，俄国可以省建许多花费昂贵的隧道和桥梁，如果沿阿穆尔河筑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将绕道三百五十英里，免不了这些隧道和桥梁。1896年6月，李鸿章在彼得堡签订关于中俄结盟的《中俄密约》。该约规定中俄两国将共同作战，打击日本对大陆的任何扩张行动。俄国人在要了许多花招和经过一段混乱之后，又在这项密约之外，于1897年12月派遣一个海军中队进驻旅顺港，并于1898年3月获中国允许取得租借满洲南端的辽东半岛的权利，租期为二十五年。同时俄国还获得修筑一条连结旅顺港和中东铁路的南北走向的铁路的权利，这条铁路就是长度为六百五十英里的南满铁路。

争夺势力范围

俄国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不冻港，并通过铁路与欧洲相连结。这一成功展示了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的新阶段中所使用的新方法。这种新方法是运用贷款、铁路、租借地、降低关税、地方司法权、治安权和矿山开采权等建立事实上的

‘势力范围’。相互争夺的列强竭力加紧行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美国，彼此有争夺有合作、有阻挠有利用，争相从即将崩溃的中国获取利益。

列强争夺中国的主要事件的顺序大致是这样的：由于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歹徒杀害，1897年11月一支德国舰队占领位于山东半岛胶州湾中的青岛港。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俄国舰队紧接着在12月占据位于满洲南部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到1898年4月，一支法国舰队占领广州以南、靠近印度支那的广州湾。英国则租借了香港对面的新界和在旅顺港对岸、山东沿海威海卫的一个海军基地。所有这些要求和占领都通过与中国签订条约加以合法化，通常都规定长达九十九年的租借期，由此确立了所谓的“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中国保留了主权和征收关税权，但是外国取得了对一些重要地区的控制权和开发权。不管是当时的外交官还是今天的历史学家都未能弄清这些行动的细节，但是列强的行动的确形成了一些模式。

首先，任何一个列强都没有按照单一的、直接的模式采取行动，因为每个列强都受到其他列强的影响，同时也经常受到来自本国的相互矛盾的各种压力的影响。比如，上述俄国人³⁶⁹人的行动只是许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件，而且这一行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其他列强所采取的行动的反应。1895—1896年德国和英国都极力怂恿俄国在东亚加紧行动，以减轻它在其他地区的压力。而俄国只是在威廉二世皇帝的鼓动下，并在他以身作则派遣他的军舰于1897年11月开进青岛以后才于同年12月占据旅顺港。俄国的决策人员中经常产生意见分歧，因此它的许多努力遭到失败，事件的发展经常难以预测，大胆的行动和懦弱的迟疑交替出现。其他列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

其次，欧洲列强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联合行动。法国和俄国这两个盟国几乎没有参与海上贸易，它们分别从位于南方的印度支那和位于北方的俄属远东地区的陆上基地侵入中国。事实上，法国首先行动，于1895年6月攫取了在中国西南部开采矿山和将东京地区的铁路延伸到中国这一地区的特权。英国和法国经过数十年争夺修筑进入云南的铁路的斗争，法国取得了胜利。接着，法国便动工修筑从河内沿红河而上直到云南府(昆明)的窄轨铁路，并于1910年完工。而且，在陆上边界地区，法国和俄国都迫使中国削减其关税。通过一家比利时辛迪加从中斡旋，法俄于1897年5月还取得了修筑穿过中国腹地的京汉铁路的特权。

在另一方面，英国、德国是贸易和海上强国，它们与中国之间没有意义重大的陆上边界。英德分别在长江流域和山东寻求其势力范围。两国还拥有巨额资本，其银行家们向中国出借了它所需支付日本赔款的大部分款项。但是，在这两大海国中，英国是为了维护它长期以来所确立的贸易地位，它控制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五分之四；德国则是一个新手，但已经是英国的主要贸易竞争者，它肆无忌惮地寻求市场和海军基地。德国皇帝与他的表兄弟俄国沙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在其他地方作过夺取海军基地的尝试之后，赢得了沙皇对德国于1897年11月占领胶州湾的默许。德国的这一行动是大争夺的先声。

在随之发生的混乱中，英国政府在中国协会和其他为对华贸易与帝国扩张辩护的代言人的强大压力下，推行注重实利的“补偿”政策。在继续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和所有国家贸易机会均等等传统原则的同时，英国却事实上按照两强标准划出了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标准规定英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必须拥有能够与任何其他两强相当的海军

力量。结果，法国获得包括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势力范围”，³⁷⁰同时还在广州湾获得一个海军基地（1898年4月）。与此同时俄国和德国分别得到满洲和山东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每一块租借地周围都有一个中立区，并有连结主要港口的铁路。但是，英国同时还从广州溯西江而上进行贸易活动，以开发中国西南地区，并计划修筑缅甸铁路（1897年2月），从而与法国并驾齐驱。而且，通过一项不让渡协定（中国不得将其领土转让给任何其他国家），英国得到整个长江流域，即上海背后的全部地区，占中国市场的一半。此外，英国还获得特权修筑长度约二千八百英里的铁路，这个长度约等于法国（四百二十英里）、俄国（一千五百三十英里）和比利时（六百五十英里）获许修筑铁路长度的总和。而且，英国租借了与旅顺港相对的威海卫，将它用作海军基地，并通过租借香港对面的大陆而使这一区域扩大了八倍。英国还寻求在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并要求在英国对华贸易的比例占据首位时仍由英国人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从而确保条约体系维持下去，而这一条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的杰作。但其结果却削弱了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因为它获取“补偿”的行动只是确认了其他列强在云南、山东和满洲的特殊地位，危及它在这些地区的利益。

1898年争夺的结果在政治方面最为明显。它在条约体系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更为不幸的时期，因为“势力范围”显然在把中国变为完全的欧洲殖民地的道路上又向前跨了几步。到这时为止，以英国为首的贸易列强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外贸、港口和内河。此时，德国和俄国正通过新建的铁路、矿山、工业和海港等将好几个省的全部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租借地和铁路沿线地区将成为半殖民地，满洲和山东将由外国人进行统治和维护治安。对中国领土完整所造成

的影响比通商口岸的旧租界更加广泛、更加危险。简而言之，帝国主义用灭绝手段来威胁清帝国，这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和义和团暴动。

第五节 维新运动

没有人比那些反对现代化的顽固派对中国1894年的失败更感到震惊的了。他们虽远离战场，但仍被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所震动。这些人激烈地指责李鸿章的卖国行为，并强烈反对议和。他们要求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在二十天的时间里，朝廷收到由约二千五百人签名的一百三十份奏折，这种爱国主义情绪的迸发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奏折强调相当于北京三年岁入总额的赔款将使帝国沦为外国的债务国，而其他条款几乎使帝国完全丧失了威严和权力。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一位来自广州的激进改良派人士康有为率领一千二百余名在北京参加三年一次会试的各省应试举人，于1895年5月2日呈交了《万言书》或《公车上书》。《万言书》要求拒绝和约、为长期战争而迁都于内地和进行多方面的变革。这一事件引发了维新运动。在此后的四年中，维新运动成了士大夫阶层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所提要求的威胁性日益严重。

随着中国的战败，堤坝崩塌了。列强采取行动瓜分这个帝国——“切开中国这只甜瓜”，而统治阶级则采取比“自强”走得更远的步骤，即“改制”，以此来挽救传统的政体和文化。维新运动是一场对制度进行改革的运动，由于这场运动导致了那些没有官职的士大夫就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它

与清代的定规发生抵触。早在1652年，皇帝以党争导致明代衰败为鉴，禁止士子发表政见，禁止“与其他阶层广泛接触，或结社串联”。雍正帝和乾隆帝将所有官员的会社斥之为谋取私利的“党”，认为这些官员在决定政策时不可能不持有偏见，因此要求每一个官员都要以皇帝的“好恶为己愿”，衷心忠于皇帝。

尽管这种专制主义在19世纪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如以前那样严厉，但是应试举人们在上书时提出的许多改革主张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而士大夫的政治协会或“学会”的兴起更具有革命意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895年8月至9月间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该学会的分会和其他类似的学会很快便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建立起来，这些学会得到诸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主张变革的高级官员的财政支持。士大夫一旦从政便很快成为记者，学会开始发行报刊杂志。当康有为的弟子和同仁梁启超从1895年8月起为强学会编辑一份日报时，他借用一份传教士办的月刊名《万国公报》作为这份日报的名称，并重印了这家月刊的许多文章。在一段时间内，年轻的梁启超确实曾支持具有维新思想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改良派在维新运动中开始用团体组织、研讨会和活跃的新闻工具进行活动，其方式与传教士极为相似。随着识字率的提高，这些方式所起的作用远不止仅仅动员士大夫阶层参政。

对在学习过程中深受包括一切儒学社会理论影响的士大夫们来说，变革必须具备思想依据。经两代人的努力，维新理论得到了缓慢的发展。像林则徐大臣这样相信“经世致用”学派行政改革主张的人们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就首倡使用西方

的武器。但是随着在自卫方面要求效法西方的压力的增强，论证这一要求合理性的需要也随之增强。怎样才能按照西方的方式维护中国的传统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区分什么是需加以维护的、什么是需加以利用的，即区分目的和手段。日本维新派提出的口号是“和魂洋才”。就中国而言，对“自强”的确认最终概括在张之洞于19世纪90年代所宣扬的一句口号中，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对于一个具有批判思想的人来说，这个口号既华而不实又可能使人误入歧途，它借用了宋代哲学上关于“体”与“用”之间所存差别的思想，这一对术语指出了某一事物的内部物质与外部功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它们用来说明杰出人物内心的自我修养和外表感染他人的力量，或表示统治者在精神上是一位圣人、在行动上是一位国王。但是，张之洞在这里发挥了新儒学的旧思想以粉饰新的洋务活动，这一提法遭到了诸如严复这样的批评家的强烈反对。严复于19世纪90年代翻译了J·S·穆勒、T·H·赫胥黎和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西方作家关于进化论和功利主义的著作。因此，他对两种文明都有所了解。严复提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体一用公式是一个悖论，因为方法将会影响价值，而所采用的手段也将会决定目的。

另一个途径是在中国自身传统之内找出洋务的依据，这是“以古论今”的习惯做法的一个变种。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科学源自于古代中国的数学”之类的说法，被用来证明京师同文馆学习西方的知识是完全正当的。在19世纪80年代，为洋务活动所进行的拙劣的辩护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推理的。举例说，将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作为化学的起源，由此而把化学当作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更进一步的方法就是在中国的过去找出变革的学说。这样，古代的“变法”思想被通过扩大“法”这个字的含义来逐步延伸内涵。“法”的字面意思是“方法”，但是，在更广的意义上又含有“法律”和“体制”的意思。因此，空泛的“变法”这个词在此时便具有进行最根本的“体制变革”的含义。比如，19世纪90年代初的一些文人著文提倡创建议会，他们引用“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这句经典警句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但是，在中国传统中仍没有与关于进步的能动思想相当的说法或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极大。

康有为的儒学新释

康有为这位1895年激进的上书者终于重新进行考证，经他考证，经学能够论证洋务，儒学则可以概括进步。康有为出生在广州的一个颇有名望的士大夫家庭中，他在学习经学时具有超常的能力。但是，他不久便发现经学著作“皆空疏无有”。康有为后来曾说过：他的老师“谆谆诚吾傲”，但当他二十一岁时对世界进行思考时却“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他努力做一个圣贤之人，纵论经学传统。

首先，康有为进一步开展“今文经学”运动，该运动对孔子一些经学著作的正统“古文经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参见第66页和第267页）。对于那些按经学传统行事的改良派来说，“今文经学”的考证颇具吸引力，因为它打破了新儒学正统学说的一统天下。康有为总结了“今文经学”学派的研究成果，于1891年将几部经学著作斥之为伪经。他的结论是：“汉学”的基础有误，而“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康有为的猛烈抨击并没有被士子们广泛接受，但是他的论点既博大精深又启迪人心，因此，这是19世纪90年代

学术界里引起最大反响的一种观点。高级官员们于1894年焚毁了印制他的书籍的印版，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于1895年成为进士和翰林院学士。他此时已达到功名的峰巔。

在摒弃了正统的观点之后，康有为继续进行对“今文经学”的考证工作。1897年，他宣称六经是孔子所作，推翻六经是孔子所编的说法。孔子将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这一观点如果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就近乎于借圣人之名进行一次革命。经基督教的启发，康有为把孔子奉为中国国教的中心。不仅如此，他还合并两个经典来源，得出了一个进化的过程，包括(1)乱世，(2)升平和小康世，(3)太平和大同世等“三世”。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一直处于乱世的折磨之中。³⁷⁴通过康有为的改良，世界此时正进入升平和小康世。这样，中国的经学就被说成是包括进化和进步的理论了。

1898年激进改良派的当政

虽然康有为在思想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维新运动并没有立刻取得优势。1895年的失败引起的恐慌不久便消失了。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都遭到了镇压。只是一些官员和士绅仍在一些省份中推进维新运动。比如在湖南，尽管这个省的士绅极端仇视太平军叛乱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但在此时他们却屡屡标新立异。由于得到了总督张之洞的保护，这个省的官员们在省会长沙倡导现代化，其成果到处可见：经过铺设和架有街灯的街道、河上的汽艇、通往外地的电报线、现代警察系统、设置现代课程的学院和进行演讲与讨论等活动的学会。这些在士绅和官员合作下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各地一场正在兴起的运动的象征。

当帝国主义者在1897年末重新造成危机局面时，康有为

的机会来了。一些坚持正统的“自强”观点的温和派人士将他作为力主维新的青年专家推荐给皇帝。到1898年中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显然已做好瓜分中国的准备，因此必须采取行动。康有为已想出许多计策，而热情的年轻皇帝终于对他表示信任，这位皇帝当时二十七岁。康有为受到召见，第一次召见历时五个小时，康有为说：中国“覆亡无日”。“皆守旧者致之耳”，皇帝答道。康有为指出：“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鉴于中国传统的牵制与双重牵制、分权和对当权者的监督制等是用来保护王朝统治免遭国内敌人伤害的手段，康有为的方案主张重建国内行政系统。这时，在抵御外敌时，原来庞大臃肿的行政机器不但无用而且有害。因此，康有为提议起用受过现代教育的专家，建立由十余名大臣组阁的内阁制行政系统，以取代运转不灵的六部和军机处。如同日本人一样，康有为认为西方的国会不仅在征税、防止腐败和促进公共福利方面行之有效，而且能够加强君民之间的儒学纽带。他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甚至建立地方“民政局”，在士大夫的参与下进行维新。在他的追随者中，各种各样的狂热思想正在流行，包括民主思想，简化书面语言，甚至包括男女平等思想和提倡西方服饰的主张。

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这个百日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作为顾问置身幕后，由光绪帝发布了四十余道上谕，几乎涉及所有能够想到的问题：创办现代学校、重定考试制度，修订法律作为摆脱治外法权的开端；振兴农、医、矿、商各业，鼓励发明和出国留学；实行陆军、海军、警察和邮政系统的现代化。除了湖南之外，这些上谕几乎没有得到实施。官员们等待自从1889年隐退的皇太后对这个维新方案的反应。当然，顽固派的反对异常激烈，除了皇帝之外，所有

改良派都是汉人，而皇帝裁撤闲职的措施对许多在职的满人形成威胁，一些满人担心皇帝将会撤掉所有满人的官职。将寺院改为学校的计划使和尚们惊恐万状，他们在宫内的太监中拥有许多朋友。军事改革威胁到了古老的满人八旗兵和维持治安的汉人绿营兵。抨击作为官职资格考试的旧科举制度威胁到了所有具有仕途之志的士子的利益。谴责腐败则对几乎所有官员造成了影响。总之，当皇帝的计划公之于世时，他发现不仅与他的养“母”太后，而且与整个既成制度处于敌对状态。慈禧太后当时已六十三岁了，但依然精力充沛。

1898年的争论并不是集中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而是集中在是推行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还是继续坚持温和的“自强”路线的问题上。在洋务运动中，“自强”路线已坚持了近四十年。“自强”的目的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得到了概括。《劝学篇》在百日维新时期出版，陈述反激进主义的立场。这本受朝廷之命发行的书影响颇大，它首先主张通过恢复儒教的社会秩序来维护满清王朝。因此，该书提倡“三纲”（孟子所述五种重要关系中的三种，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烈反对西方的平等主义、民主政治、君主立宪制、“民权”学说、议会、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权利。其次，张之洞主张通过教育来挽救中国。他提议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学校、大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不同等级的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上儒家经学与西方技术并重。这是一项效法日本的计划。它还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实行普遍兵役制等内容。第三，张之洞希望通过工业拯救中国。在这一方面，他在武汉创立的军事“自强”事业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楷模，其目标之一就是减少中国对进口钢铁的依赖。张之洞已于1890年在汉阳³⁷⁶开办了一家铸铁厂和一家枪炮厂，于1894年在湖北的大冶兴办了一座铁矿。他提出，在一个中央铁路行政机构的主管下，

修筑穿越中国心脏地带的京汉广铁路。

皇太后发现她的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康有为的威胁。康有为抨击维系她的统治的两大支柱——经学和腐败的官僚系统。她等待时机，同时反对维新的势力也在加强，终于在1898年9月21日，皇太后在满族高级军事指挥官荣禄的帮助下，在一场政变中囚禁光绪帝，从而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但是六名其他改良派人士，包括来自湖南的富有才华的年轻折衷主义哲学家谭嗣同在内均被处死。皇帝被软禁起来，当皇太后最终于1908年去世时，他先于她一天神秘地故去。

百日维新的骤然告终导致了大部分旧秩序的恢复。然而，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保留了下来，诸如裁撤某些闲职和建立现代学校等。但是，1898年事件的主要意义在于，按日本明治维新的革命方式所进行的革命性的激烈尝试遭到失败，尽管在此后的十年中温和的改革仍在进行，但是皇太后的反对派们认为，任何真正的革命性变革只会从社会下层发起，而且很可能诉诸暴力。因此，渐进主义由于步伐过慢反而使暴力革命更容易爆发，但这仍是将来的事。皇太后轻而易举发动的这场政变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在1898年还没有具备革命的条件。在来自西方世界的进攻和推动已历时六十年之后，中国的传统秩序仍然十分强大，并具有猛烈抵御现代化的能力。

第六节 义和团暴动

义和团运动

1898年的激进维新是处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中国士大夫通过使整个清政府现代化来抵御外来威胁的一次富有勇气的行动。失败之后，其积极性转入由一个按传统方式建立的秘密团体所领导的民众运动之中，西方人将这个秘密团体的名称“义和拳”粗略地译作“侠义和谐之拳”，或者简略地译作“拳众”。这一名称表明该团体以“义和”为其名，操练其独有的中国拳术。这套拳术通过一套不同的架势和动作来达到身心的和谐，从而为格斗做好准备。它是将道家的巫术和一种规定的仪式融合在一起的一种魔法——其成员念诵三遍咒语，通过咬紧的牙缝吸气，然后便口吐白沫，神灵附身，这些神灵保佑他们在外国人的枪弹射来时刀枪不入。拳民们尊奉诸如《水浒传》之类的小说中那些半真半假的文学人物和古代大规模暴乱中的英雄豪杰，他们在1899年初提出的早期口号是“反清灭洋”。

377

反对基督教的敌意情绪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19世纪90年代传教士活动的稳步加强激化了几十年以来积累的所有矛盾。一些基督教徒嘲弄神圣的家族关系，拒绝赞助当地的节日，不容忍当地所敬的神，并且动员传教士进行干涉，以便在冲突中帮助自己。在法国的支持下，天主教神父能够迫使地方官员就范。各种反基督教的粗鲁咒骂到处都可以听到。

经济和政治形势也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一个原因。1898年，黄河洪灾在山东造成了普遍的饥荒，华北各地发生旱灾，贫困的乡民到处流浪。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口外国棉织品和石油打击了本地的工业，而修筑新铁路的计划则似乎威胁到了车夫和运河船夫的生计。事实上，在19世纪90年代末，18个省中的每一个省内都发生了动乱、闹事、盗匪活动或地方暴乱，这与19世纪40年代末太平军叛乱前的局势十分相似。总之，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日益加深的危机在行动上所作的直接反应。

这场运动在1899年从满汉官员的支持中获得了拥护王朝的原动力。清朝那些满族顽固派亲王中的核心人物只受过宫廷教育，缺乏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对外界也了解甚少。这些人于1899年接受了四十年前曾激怒日本武士的同样一句愚蠢的口号——“驱逐洋寇！”在试图借义和团之手打击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借用古代的思想，即民众正义的愤慨是政治的最终公断，这一思想与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相对应。1899年秋，政府军在山东击败和捉拿了一些反对清政府的义和团暴徒时，排外的官员与拥护清政府的义和团之间的联盟业已形成。义和团的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它与秘密团体通常的反清战斗口号截然不同。

清政府的官员分成亲义和团派（这一派最终取得统治地位）和人数众多但士气低落的反义和团派，后者鄙视义和团的迷信狂热，但对其目标亦表示赞同。在1900年的头五个月中，直隶省成百甚至上千支义和团遍布广大乡村，团员们焚烧传教士的房舍，屠杀中国基督教徒。满族亲王们似乎已经使皇太后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魔法是真的。在1900年1月 378 和4月间，外交使团不断递交照会，要求镇压义和团。作为答复的上谕却语义含糊——攻击传教士和攻击中国信徒“不

能混为一谈”；负责镇压他们的官员必须对其优劣分子加以“区别”。外交使团对西方的优势地位深信不疑，它们很难认识到在按照不平等条约而强制施行了几十年外国特权之后，皇太后还会最终准备让这场大规模的运动用暴力对西方进行挑战。

对北京使馆区的围攻与后果

因此，由于朝廷决定安抚而不是镇压恐怖的义和团，这样在并不需要外国进一步挑衅的激怒下，最终冲突的爆发已成为必然，况且外国人的挑衅已达六十年之久。双方都预料到了这种情况，1900年6月，义和团在京、津两地同时围攻外国人。外国列强集结海军力量，派援兵前来救援，清政府对他们宣战。在首都以外的华北地区，约二百五十名外国人被处死，其中大部分是在山西省的传教士。尽管有些分散的教会组织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安全，但是仍有更大数目的中国基督徒被杀。

这种发生在仲夏时节的疯狂暴行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在整整一个月没有得到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的外交官们、传教382团领导人、赫德爵士和其他人的消息之后，有可靠的报道说他们都已遇害。与此同时，清政府非中央集权的性质显示出它的一些实际作用，当朝廷中无知的满人打算将外国人斩净杀绝时，老于世故的地方官员玩弄手腕来减轻这一灾难。此时在广州任总督的李鸿章与南京的刘坤一、武汉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一起决定对朝廷的宣战置之不理。他们提出如果外国不向长江流域增派军舰的话，驻在那里的总督们将能维持当地的秩序。这一行动使除了北方省份以外的整个中国处于中立的地位。当时有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杜撰的谣传，

称义和团的行动其实是一种“叛乱”（这种说法一直沿用下来），而不是受朝廷支持的行动。

因此，义和团战争这场19世纪中国反抗西方列强的第四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只局限于华北地区。与此同时，其他各省的督抚们用和平的方式忠实地维护王朝的利益，通过电报与北京的朝廷保持联系，使皇太后战和两者俱可兼得。她在宫中有权势的满人的要求下推行灭绝政策，同时又在她的国外使节和南方的官员们的急切恳求下实施和平政策。清政府这种相互矛盾的政策即使在北京也显而易见，七十六名外国人在守卫使馆区时阵亡，但由于指挥其中一部分政府军的军官的缘故，其他外国人保全了性命。尽管震耳欲聋的炮击接连不断，但是这些政府军并未使用可调用的全部大炮，也没有发动竭尽全力的进攻。联军于7月14日解除天津租界之围，于8月14日又解除了北京使馆区之围。

当西方入侵者在当地势力的支持下开始劫掠这座已遭义和团劫掠的城市时，皇太后与皇帝乔装打扮乘车离开北京。皇太后在六十五岁时也空前地遇到了苦恼她臣民们的那些寻找吃住和抵御土匪流寇袭击的种种麻烦事。皇室成员抵达西安，并在那里逗留了一年多时间。七十七岁的李鸿章与往常一样被指定出面收拾残局，他熟练地与外国人周旋，使他们相信这场敌对冲突根本不是一场战争，而是镇压暴乱的一次共同行动。尽管德国公使是唯一被杀的德国人，但是德皇仍要求得到任命联军总司令的权利。德籍总司令到10月才抵达北京，他的主要活动是对华北的一些城市进行了十余次惩罚性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延续了六个月。到1900年末，驻扎在华北的外国军队已达四万五千人左右。俄国人占领满洲则为时已久，他们正在打另一场战争。

1901年9月7日，一名满族亲王和李鸿章（他在两个月

383 以后去世) 终于与十一国代表签署了《辛丑条约》。该条约要求处决十名高级官员并惩罚其他一百名官员，正式道歉，中止在四十五个城市中的科举考试，其中半数在山西省，以打击士绅阶层；扩大使馆区，外国派军队修筑工事并永久设防；拆除炮台，由外国军队占据铁路沿线要地，以确保从海边到北京通道的畅通；将进口税率提高到 5%，巨额赔款。

1902年的一项英国商约在改善贸易和福音派新教会的条件方面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废除阻碍贸易的厘金税，建立全国性的货币制度，进行为取消治外法权铺平道路的司法改革，以及采取日本曾在19世纪70年代所采取的其他许多走向现代化的措施，都不可能得到实现。义和团暴动和《辛丑条约》标志着清朝在对外关系方面跌到最低点，清朝统治亦无望长期延续下去。然而，并没有出现替代的力量。

第七节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 中国的反应

外国对中国的财政剥削

在1901年之后，帝国主义者新的控制权并不是只局限于“势力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了北京的整个财政体系中。到1893年为止，外国在华金融机构向中国政府机构提供的贷款约二十五笔之多，但是，尚未偿付的债务总额却微不足道，这些债务均以海关税作抵押。中日战争赔款额约一点五亿美元(二点三亿两白银)，1895年、1896年和1898年从外国银行得到的巨额借款都用于支付这项赔款，而借款条件十分苛

刻：中国得到的借款均打折扣（比如九四折等）；须支付长达四十五年的高利息，而且要按浮动的金银兑换率用黄金支付。《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额为四点五亿两白银（约三点三三亿美元），这笔赔款将用利息为4%的黄金债券支付。这样到1940年全部付清时，本利合计为九点二八亿两白银（相当于七点三九亿美元）。

以上用于偿付这两笔赔款的借款与用于生产的贷款不同，它给中国造成了纯粹的损失。用于这方面的支出耗尽了清政府通过海关从外贸中征收的税款，而这笔税款以前则用在武器装备和现代化建设上。（由于关税是1858年按固定的金额数确定的，而价格的上涨在百分比上降低了关税的价值，因此关税收入进一步减少了。）从此，甚至连各省岁入、厘金税和盐税的一大部分也将连同海关税一起支付给了外国的债券持有人。

当然，帝国主义有时叫的比要的多，这笔赔款便是明 384 证。由于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倒台，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放弃索取赔款要求和发生的其他变化，这笔赔款最终只支付了原来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一弱。同样，日本通过1898年4月的一项禁止让渡协定所提出的在福建建立势力范围的要求也从未实行。意大利于1899年3月提出的在浙江建立势力范围的要求被断然拒绝。许多在19世纪90年代末得到的铁路筑路权也从未积极地予以利用。“瓜分中国”未能实现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具有使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牵制以保持平衡的卓越才能。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极为有限。然而，列强在金融帝国主义时期所进行的肆无忌惮的争夺和提出的贪得无厌的剥削要求，使得它们在前几十年中所进行的更为平静的商业渗透和经济发展相形见绌。这也使爱国的中国人从此对整个条约体系充满难以消除的仇恨，

他们将它称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

美国的扩张与门户开放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与欧洲列强不同，它从未在亚洲参与战争，也没有在那里掠取殖民地，因此当时有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由衷的自豪。诚然，美国传教士和商人所享有的特权中的一大部分是靠英国海军获得和保持的，然而，甚至按美国人的观点来看，美国的行动事实上表明，正如它没有在欧洲卷入“纠缠不清的联盟”一样，它在东亚也没有参与“帝国主义”的事务。通过援引英国关于最惠国待遇和机会均等的学说，美国并未使用鸦片，也没有承担义务，却从英国这个自由贸易帝国那里得到了好处。但是，随着欧洲国家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激化，新的扩张主义趋势和某些偶发历史事件使美国也以一个列强的身份登上东亚的舞台，美国人对帝国主义病的易感染性比他们所愿意想象的更严重。

美国的扩张与欧洲列强的扩张一样也具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从它本身的情况来看，制造廉价出口产品的工业的兴起、国内未开发地区的消失和向国外进行传教的传统等便是其中的几个原因。正如海军中伟大的海上强权论者 A·T·马汉上校所指出的那样：当美国“将视线投向外 部世界”的时候，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白种人优越论已为美国在寻求市场、殖民地和海军基地等方面赶上其他国家提供了依据。在马汉宣扬建立海外基地的同时，国会于1890年作出建造一流作战舰队的决定。公众也强烈要求开凿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运河，以便让美国舰队能够在两大洋同时作战。而且，美国在夏威夷具有长期以来所保持的商业利益，当地糖料作物种植园的白人园主们要求将这一群岛并入美国。

美国在东亚的扩张。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事先已要求杜威海军准将和驻在香港的美国亚洲分舰队做好进攻驻马尼拉的西班牙舰队的准备。杜威于5月1日拂晓发动进攻，到中午时分，西舰队的军舰或被击沉或仍在燃烧。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美国于1898年夏季派一支一万一千人的军队占领了马尼拉，并于12月根据一项和约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对菲律宾的统治权，随后即对已成燎原之势的菲律宾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进行镇压。同年7月，国会采取行动将夏威夷并入美国。美国还从西班牙手中得到了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美国的这些胜利使它获得了珍珠港、关岛和马尼拉等这些潜在的海军基地，还获得了夏威夷群岛和整个菲律宾群岛，美国得到的战利品超过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的利益。恰恰在这一时期的中期，即在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了他的第一次门户开放宣言。

海约翰早些时候曾任驻伦敦公使。1898年初英国曾于伦敦与他商量怎样面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个现实的情况下保持机会均等的传统，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此时，海约翰接受了赫德手下在中国海关工作的一名主要税务官的建议，结果，美国的第一次门户开放宣言反映了赫德和海关对维护条约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特殊兴趣——在所有通商口岸对各国贸易所征收的税率应一视同仁，而不论这些口岸是否位于新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们要求：第一，所有列强均不得对“势力范围”之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既得利益”进行干涉；第二，只有中国政府有权按条约关于关税的规定在以上那些通商口岸对贸易征税；第三，任何一个列强均不得在其“势力范围”内对本国公民收取具有优惠性质的码头税或铁路运费。总之，第一次门户开放宣言旨在维护在中国的均等

通商机会，而不是维护中国政府。英、德、法、意、日等国均同意在所有列强接受这一宣言的条件下接受这一宣言的各项条款，而俄国却作了近乎否定的答复，因此海约翰的成功相当有限。但他彬彬有礼地告知所有有关国家：它们对他的宣言的一致接受属“最终的决定”，以此来尽力巩固他的成功。

由于义和团暴动招致外国军队在1900年夏季进入华北和满洲地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的机会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海约翰的第二次宣言在1900年7月以通牒的形式发表，该宣言宣称美国旨在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从而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各国都接受了这一宣言，“门户开放”也公开确立为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此时，

386 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不仅是要维护外国的商业机会，而且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保持其作为国家的地位。但是该政策的实质是一个相距遥远的海上强国为维持条约体系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扩展而作的努力。它用文字陈述原则，字里行间表达了良好的意愿，而没有考虑到以武力行动作后盾。与此同时，美国在菲律宾得到了一块殖民地。毫无疑问，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国国内似乎比在其他地方更辉煌。

中国的软弱和强大

当我们试图解释发生在1900年的事件时，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帝国主义列强确保反动的清朝政府掌握统治权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特权。它们事实上在不平等条约存在的六十年中与既存制度进行了合作。许多事实可以表明外国列强如

果不是贪得无厌的话，至少也在十分顽固地维护它们在中国的利益。但它们也有挫折，如1869年的《中英新定条约》（参见第329页）和1902年英国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对条约体系进行修改的一项条约。外国人似乎很少对巨大的变革感兴趣，他们宁愿支持旧制度。

很显然，中国是外国列强的牺牲品。这个论点自然对现代中国的爱国者们具有吸引力。但是，以下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没有对外国的侵略更早、更强烈地作出反应？那些通过使传统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驱逐帝国主义者来抵御西方侵略的中国革命者在何处？在20世纪，这样的领导者出现了，那么在19世纪他们到底在何处？

19世纪中叶的反对满人的叛乱者是潜在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缺乏现代思想。其中最强大的是太平军，它在经过十年的发展之后表明它是旧式的争权者，同时也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改造传统制度的能力。此后的“自强”运动是一场防御性运动，而不是一场创造性运动，它是为避免激进的现代化而作出的保守的妥协。1898年改良派的计划虽然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质，但是改良派将他们自己视为王朝的忠臣，并完全依靠天子的统治权。帝国领导权的崩溃最终从那些满族显贵们身上反映出来，这伙显贵接受了义和团愚昧无知的野蛮主义。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

在以传统方式保持中国的这种发展势头时，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日本之所以在变革和现代

化方面具有截然相反的能力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样，中国对外国的刺激感到麻木不仁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综合因素的最高水准来看，我们认为日本已经具备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它的人民已做好准备，从而为民族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但中国却不具备这种基本要素。在这个抽象的水准之下，每个观察家都可以从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中选择他自己的衡量水准。

比如，从物质水准上看，中国拥有巨大的资源，但其开采方式仍是传统的，现代开采方式不能轻易地取而代之。而日本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其现代化所需的原料，如铁等相当贫乏，但日本人民以他们的毅力和适应力来迎接这个挑战。中华帝国幅员广大，这使它具有世界强国的潜在地位，但它在许多方面反应迟缓。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在战略上，它虽然会遭到一些失败，但它几乎不可能被征服。海上列强能够控制中国的许多城市，但无力控制辽阔的内地。而日本则完全暴露在列强面前。外国的影响尚未渗入中国人口稠密的内地，如湖南、四川等省，这些地方是传统观念和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才的一统天下。这些地方的社会精英人物不看报纸，而是研读经学著作，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制度比物质条件造成了更大的差别。日本的封建制度已经造就了各藩忠诚的行政官员、商业资本家、研究荷兰的学者以及具有爱国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的武士等，这些人足以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从而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中国的模式不同，它缺乏这种竞争机制。中国古老的制度经过充分的平衡和调和，以保持三个阶层之间的均衡——君主及其官员、地主、士大夫、士绅阶层和不识字的农民。在这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业资本家或手工工匠，还是外国商

人或国内的发明家和投资家们都不能形成打破这种均衡的中坚力量。总之，中国人被他们的过去所束缚，事实上，他们的国教是对过去的崇拜，子孙们虔诚的主要德行是敬奉祖先。思想界亦滋生了对儒家经学的崇拜，统治者们不能触犯王朝创立者的戒规，官员们也不能破坏先例。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受制于旧习俗，甚至连叛乱者们也只是借用过去的传统，而无法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被它自身超乎寻常的历史传统和古老学问的魔力镇住了，而这些传统和学问都是通过书面语言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这种以自满地向后看为内容的精神生活使中国的领导者们具有两大特征：第一，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倾全力于中央王国的事务，因此他们对外国的事物视而不见，进而横加 389 蔑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国思想体系的陶醉感使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屑一顾。第二，由于他们是大同国家的支持者，因此中国的领导者们缺乏民族主义思想。这个位于东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虽然以它人口稠密的地区为中心，但它长期以来不得不接纳亚洲腹地的边远民族，特别是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这些民族的骑兵在中国国内的权力政治中一直起较为重大的作用。尽管有些中国编年史学家认为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的影响不值一提，但是这些征服是这个庞大帝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现象，而不是表面现象。清政府大肆压制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这是在外族征服下建立的王朝所采用的华—夷行政统治中最耐人寻味的例子。通过科举制度，清政府遴选有才能的官员，这些官员自我培养了忠于上司的思想，这就使任何有关官员应代表下层民众的正统学说失去立足之地。通商口岸报纸的出现和传教士教育事业的兴起使大量外国思想传入中国，但直到这个时候，整个统治系统仍由身居高位的精英人物所把持，缺乏现

代民族主义的象征、术语和实践。特别是精英人物所受的教育是效忠于统治者和过去，他们在进行变革方面缺乏有关民族目标的常识，这就抑制了为现代化所必需的强大的中央领导权。满人不能动员汉人参与政治生活，生怕清王朝显得更加难以相容、更加无足轻重，以致于落到被遗弃的地步。

在这种特殊的和很少被理解的政治形势下，中国对西方所作的反应确实受到一个不同寻常的、非民族主义的因素的影响，形成一种倾向：允许“外夷”渗入中国文明的外围，甚至与边疆地区的强大入侵者在共同的事业上进行合作。通过他们根据条约获得的特权、特殊能力和物力，外国人成为渗入中国旧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新因素，这就使通商口岸能够长期连续地发挥其作用。否则，这种现象是无法解释的。通商口岸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现象，因为外国政府在地方上控制这些口岸地区，同时王朝继续对整个帝国的广大内地进行统治。海上列强和陆上列强、外国习惯和利益与中国习惯和利益在通商口岸处于一种特别的、相持的和谐之中，而现代民族主义对此是不可容忍的。中国官员与外国官员也分享权力，而商人们则分享利润。这时，中国政府在不改变其性质的情况下，通过在海关和其他机构中雇用外国行政官员和顾问的方式来应付它与西方交往的问题。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对外国人的雇用，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将它作为迅速向

390 外国人学习并摆脱他们的机会，而是更像在亚洲内陆实行的老做法。在这些地区，中国承认那些无法击败的强大“夷狄”在帝国中的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将这些“夷狄”的同族人拒于边界之外。在19世纪的对外关系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人仍在照搬过去的那一套。

结果，反民族主义的清政府在它的王朝循环濒临终结时完全处于守势——它仍有足够的力量坚持传统、镇压叛乱，

然而它无力领导变革。因此，晚清的外交档案——关于中国怎样从软弱的地位相当成功地对付帝国主义列强的记载——就显得更加显著突出。中国运用其明显的软弱地位驱使外国人相互抵消其野心，清政府的谈判官员们散布谣言，泄露机密，他们给人以一种诚惶诚恐和孤立无援的印象，他们在让予利权时收受贿赂，但是，中国生存下来了。中国的外交由于它比局外人的想象更加卓有成效而值得重新评价。

³⁹¹ 第十三章 从君主制度到军阀政治

第一节 晚清的改革

中国20世纪初仍处在日本19世纪60年代所经历过的那种早期革命阶段。旧制度在1894—1895年日本的进攻之后开始崩溃瓦解，但其政治结构继续存在了十五年。

清代从1901年到1911年的最后十年与其说是处于崩溃时期，倒不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创时期。制度和社会的变革开始较早，而政治灾难直到最后才降临。事实上，直到1911年为止，中国政府一直按19世纪90年代所宣扬的、但未见成效的那些方式逐步进行重建。皇太后和她的顽固派支持者们在1898年解除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的权力，但在1901年之后却采取行动实施他们的大部分激进的改革计划。确实，皇太后和顽固派没有其他路可走，义和团战争表明了纯排外主义的破产，而反清叛乱的威胁促使清政府采取创造性的步骤来拯救自己，因此，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运动就是保守的改革。共和革命已在边远地区兴起，但直到1905年为止，这场革命仍处于分散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此之后，它仍是变革潮流中的一个小小的漩涡而已。

为革命铺平道路的主要力量是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中国人的生活中终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与之不相容的清王朝竭力想控制变革的方向，但它无法避免反清势力和离心

势力的滋长，而正是这些势力最终摧毁了它的统治。政府将学生送往国外深造，在国内训练新式军队，并鼓励商人在国 392 内开业，在各省召集政治会议。所有这些措施都先后对王朝造成了危害，在政治的流沙上，王朝越是挣扎以挽救其生命，它就陷得越深。因为此时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预示着满人统治的终结。

但是，沿着这条通往政治灾难的单行路，晚清的改革作为解决中国现代化特殊问题所进行的尝试，值得进行研究。张之洞和刘坤一这两位长江流域的“总督”（他们分别是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在1900年曾明智地既不与外国人交战又效忠于朝廷，他们在1901年 7 月向皇太后呈上三道奏折，概述了与1898年百日维新计划相类似的内容广泛的计划。他们懂得一些明白无误的真理：“……民众之情感与三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民众倾慕外国之富庶，鄙视中国之贫困”。他们羡慕外国的军队和海关的“公平对待”以及外国租界内井井有条的秩序。“叛逆徐起”并散布颠覆之邪说。他们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比以往都多，但具有意义的是教育仍放在首位——创造一个新的精英阶层。

教育：新式学堂与新学者

教育改革计划的宗旨是更有效地培养和挑选官员。其目标不是在中国人中进行大众化教育，也不是对个人进行自由主义的教育。其主要难题是如何安抚当时那一代官僚士大夫和苦读经学以求官职的士子，解决的办法是实行妥协：按照各级政府的建制——县、府、省和京城等建立各级学堂，从而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相对应。大约在十年之后，以公众的捐赠为财政来源的新式学堂将取代旧科举制度。与此同时，人

们还希望这两种制度能够并存。在新式学堂中就读的应试者和按传统方式就读于私塾的应试者都应有资格参加定期考试，这种考试将在内容方面有所现代化。作为最初的措施，“八股文”被废除，旧式书院亦被强令改为政府的学堂。

不幸的是，事实很快表明：通过就读于私塾来准备考试从而跻身仕途的传统方式比新的方式更省钱、更容易，也更具吸引力，因为新的方式要求接受多年学费昂贵的学堂教育。大部分旧式的有志于仕途的士子都不愿进新的政府学堂就读。另一方面，在那些不甘心安于现状、具有现代观念的

393 青年当中，新的政府学堂又受到设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中的基督教传教士办的教育机构的竞争。到1905年，新教传教士开办了约三百八十九所“初高级中学和学院”，在读学生一万五千人。这些教育机构通过广泛地传授基督教、个人主义、妇女教育思想和西方生活方式，树立起革命性的榜样。这些教学活动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传教士办的学校拒绝让学生对孔子或皇帝行效忠礼。而在政府学堂中，学生们都要这样做。（北京通过禁止教会学校毕业生跻身仕途的方式来进行对抗。）中国民办现代教育也开始了，1904年，一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张伯苓在天津开办了一所拥有一座校园的中学，到1909年又发展成为南开大学。

旧式的士子仍抱着科举考试不放，而具有现代思想的学生又投奔到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的门下。面临着来自以上两个方面的竞争，张之洞于1903年断言直到科举制度不再作为一种选择存在之前，新的学堂系统既招不到学生又得不到公众的财政资助。1905年，几位主要的省级官员敦促立即废除科举制度。次年，科举制度被下令废止。此时，政府教育希望全部寄托在新学校上，学部于1906年设立，负责管理这些新式学堂。

这种按日本模式建立的新教育体系要求在学完中学课程后再进行专门教育，从而为政府培养专门人才。1904年公布的那部内容繁杂、规定详细的学堂章程以日本为榜样，要求学生应依次就读高级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五年）、高级中学堂（三年，授举人）和京师大学堂（三年，授进士）。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创办，曾在1869—1895年间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出任主持西学教研的首任总教习。1902年，同文馆并入这所大学堂。但在这个最高级教育机构以下，遍及全国的新式学堂系统却缺乏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员、校舍、教具、资金和管理。创办大学堂比创办中学堂容易，而创办中学堂又比创办小学堂容易。这个系统的基础部分最为薄弱。

各省的教育家们也主要从日本借鉴办学经验。张之洞派遣两个代表团去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购买日本的课本。他开始认识到普及大众教育的必要性，目的在于从大众之中发现人才。不久，张之洞请来日本教师，他们至少能用书面语言与中国同事和学生交流思想。张之洞开始将日本看作是新一代中国学堂教师的最佳培养地，因为日本离中国很近，比在西方培养教师省钱；日本的“语言、文学和习俗”与中国相近，许多西方书籍已译成日文，在日本培养教师也更加省力。此外，在日本的中国学生更便于中国政府监督官的管理。

中国青年去东京接受现代教育始于1896年。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被镇压之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仍不断增多：1899年约二百人，1903年为一千人，1904年达到一千三百人，1905年底约八千人，1906年增至一万三千人或更多一些。但是，去日本的人数远多于在正规学校中注册的人数，而注册人数又远多于最终毕业的人数。事实上，1912年以前

每年从日本有名气的学校中毕业的中国学生从未超过七百人。在清代最后十年里赴日深造的数万人中约有一半人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其中主要是得到省级政府的资助。留学生经常在新的省立学堂中做好留学准备，通常在年度派遣中前往东京。到那里后，他们便按照中国的做法，在同省同学中组建协会或会，这些会与许多世纪以来在北京的官员、士绅和商人们组建的同乡会相类似。结果，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和在更能激发团体内聚力的情况下，新教育制度使青年男子、甚至一些青年女子团结起来，亲密相处，这是旧的科举制度所难以比拟的。正如在中国新的学生生活培养了省意识和对省的忠诚一样，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培养了民族主义。

中国教育以这样的方式平静地进行了革命。经学课程让位于混合的中西课程。以就学于私塾、为三年一次科举考试的传统题目作准备的教学方式被全日制学堂所替代。学生在学堂中接触到更多的思想，进行更多的社会和知识交流。新教育制度不是灌输学者—士绅们的那种对孔子和天子的忠诚，而是造就了革命者。张之洞能够详尽地规定学生必须穿淡蓝色长衫，戴饰有红缨的帽子，同时必须遵守各种规章、讲究礼仪，他还确定了一首具有教育意义的歌：“天子筹划自强……卫生使人强壮……孝敬父母，尊敬官长……”但是，一旦科举制度被废除，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变革的浪潮。

中国新式教育的知识内容如同日本一样，包括许多来自西方的知识成分。尽管在以往许多年里与西方的交往一直在增强，但只是在1900年之后中国的学者阶层才开始接受西方思想。著名的西方小说传播者林纾通过听说法（即听别人的口译）用中文翻译了狄更斯、仲马、司各特、巴尔扎克和其他人的作品，共达一百五十六部。在文学作品源源而至的同时，严复翻译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严复曾在中国海

军里服过役，在19世纪70年代去过国外许多地方，尤其是去过英国。他断言西方强大的奥秘就是西方思想。严复成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他相信个人奋力追求的自我实现必定有助于他的国家的竞争和生存。严复感到更需要用自由原则来促进中国的繁荣和强大，而不是培育个人的自由，民主自治则还不成熟。这位翻译家特别注意把对晚清时代的中国最具有意义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思想介绍过来。1898年，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被译成古汉语，严复还为译文加了批注^①。在此后的十年中，亚当·斯密、J·S·密尔、孟德斯鸠和其他人的著作也相继被译成中文。严复的译作和批注通过宣扬西方的逻辑、法律、科学和进化论，严厉指责中国的圣贤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但严复是用隐蔽的方式行事的，他的那些用古文完成的译作和批注是写给文人们看的。

新军：袁世凯的崛起

到1901年为止，中国从它遥远的过去和最近的过去继承了三种主要的军事组织。仍然依靠不足的军饷维持的满人八旗兵和分散的汉人治安力量（“绿营兵”）既衰弱又无用。1862年，几千名八旗兵用现代枪炮武装起来，组成“神机营”。此后，经过挑选的一些绿营兵，特别是驻扎在北京周围的绿营兵也配备了现代武器，并进行操练。军官的选拔仍然根据他们马上马下的箭法、剑法和拉弓举石的本领来决定，而这些滑稽可笑的本领在现代毫无用处。1901年8月，政府下令废止旧式武举，并设立新式军事学堂。

^①严复的译本称《天演论》。——译者注

第二种军事组织是由汉族文官指挥的地区性军队。其原型是由曾国藩在1852年以后所创建的没有先例的湘军（参见第296页）。士兵的来源是农民，由士绅担任军官，每五百人为营，外加一百八十名运送后勤物资的役夫。每三名士兵配一名役夫。尽管曾国藩曾正式解散湘军（参见第213页），但是湘军仍存在下来。此外还有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左宗棠组建的与之相类似的军队和其他在这个世纪中叶镇压叛乱的军队。这些由士绅指挥、从某一地区招兵的军队并不是只由团练组成，而是主要由职业军人（勇）组成，团练则指那些身兼军人和农夫双重身份的人。通过这些军队指挥官的个人关系网和地方的支持与资助，这些军队成为一种特殊势力，它们在各省取代了八旗兵和绿营兵，并逐渐被通称为防军。淮军（由396 在天津的李鸿章指挥）和湘军（由在南京的刘坤一指挥）是这些军队中占有优势地位的相互对立的军队。尽管它们通常都配备了现代的步枪和大炮，而不是使用旧式火绳枪和滑膛炮，这些军队仍然缺乏标准化的武器装备和经过现代军事训练的军官和参谋人员，更不用说工兵、信号兵、军需官和现代运输工具或医疗队了。

第三种同时也是建立时间最短的军事组织是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而产生的。李鸿章和张之洞在19世纪80年代都创办了军事学堂，雇用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官团。1895年，张之洞按照德国的模式在南京创建自强军，该军队中的三千名士兵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待遇优厚的乡村青年。一支更具有意义的军队由袁世凯创建，袁世凯与其说是一名文官倒不如说是一名武将，他是从李鸿章驻朝鲜的全权代表这个职位上发迹起来的。1895年，他受命与德国教官一起训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的军费由户部拨给。袁世凯很快就在天津附近拥有七千名受训的士兵，这些士兵是从几个省征募来的，待遇优

厚。袁世凯在军队中采取防备措施，杜绝常见的腐败现象。

通过对这支新式军队的个人领导，袁世凯为“北洋军阀”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军阀之父”。他指挥的那支新军逐渐被称为北洋军，在他手下的那些早期军官中，至少有十人在革命后成为各省的都督，有五人（除了袁世凯本人之外）成为共和制的北京政府的总统或总理。397

随着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年和1902去世，四十多岁的袁世凯成为帝国军队的主要组建者。他继李鸿章之后在1901—1907年之间任直隶总督，与权势最大的满人——声名狼藉、贪污腐化的庆亲王关系甚密。自从恭亲王于1884年被撤职之后，庆亲王一直是北京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袁世凯的北洋军下属六镇，另外有约六所各种类型的军校和一个规模不大的参谋处。部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其军事演习颇为壮观。因此，各省都仿效北洋军的建制组建军队，但在完善程度和战斗力上均不如北洋军。

对于被地区和省的势力搞得四分五裂的清帝国来说，真正的军事中央集权化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1904年的改组仍然使中国军队基本上处于省一级的控制之下。按计划，新军的编制为三十六镇，但这支军队缺乏中央指挥系统、充足的军费和工业基础等基本要素。主要的创新是开办了像在北京附近的保定军校那样的新式军事学堂，培养出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事活动家——有知识的军官，他们将现代军事技术与学者的维护帝国秩序的责任感结合起来，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雇用日本教官比雇用德国教官省钱，所以前者的人数不断增长。中国候补军官们被派到日本的士官学校去学习。398这个异邦的榜样激发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年仅十八岁的浙江人蒋介石于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次年又赴日本留学。

行政改革：中央与各省的权力平衡

清代的行政制度承袭明代初年所立下的制度，并在从那时起的四百多年里得到完善。这种行政制度到大约1800年为止，仍能完全满足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帝国的需要。但是，正如骑兵弓箭手突然被铁路和步枪取代、帆船突然让位于汽船一样，帝国政府亦显得过时了。此时，中国需要具有活力的中央机构，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主动性和速度发挥新的作用，实施新的法律和财政制度，其领导和协调地位更加得到各省的充分承认。然而这种一元化的国家一级的行政机构将会打破北京和各省之间的那种自古以来的平衡。省级行政系统仍具有与京城的行政系统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仍然与皇帝保持直接的联系。京城的六部仅仅对各省实施监督、提供服务，而不是对它们发号施令、进行控制。对于北京来说，有一点是很不幸的：汉族士绅镇压了叛乱而造成19世纪末地方主义的兴起，而通商口岸工业的发展、地方贸易岁入的增加、地方军队的加强和个人官僚机器的强化则助长了这一趋势。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都增强了几个主要的省政府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这与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进行中央集权就既要对付旧既得利益者的官僚主义惰性，同时又要正视各省新兴势力的不安分的妒意。

北京的改革一般是由新机构发动的，这些新机构或设在政府的旧衙门之中，或处于其管辖之下。随着新机构的日益强大，旧衙门便败落下去。1901年，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总理衙门改为部门齐全的外务部。1905年，政府设立巡警部，它是内务部的前身。在1906年的改组中，新的学部接管了礼部主持考试的职权，原来由文官任尚书的旧兵部扩充为

陆军部，改由野心勃勃的满族将领任尚书。沿海省份的“局”提出的新政措施也被北京的各院和新设立的各部所采纳。在商务局首先在主要省份创办商会、商业报纸和实业、工业学校之后，商部于1903年在北京建立。后来，该部与工部合并为农工商部，负责铁路修建，安排工业品展览，确定标准的度量衡，进行商行登记，制定矿山规章和公司法，指导农业 399 协会以及实施其他现代措施。该部通常对经济上有成就者授予官衔，以示奖赏。

在北京建立新的机构比在全国推行新政容易。比如，司法改革，如同在日本一样，被外国列强认为是废除治外法权的必要前提。1904年，由沈家本主管的一个负责法律编纂的官署开始工作。六十五岁的沈家本是刑部一个经验丰富的学者，他起先试图用现代术语来表达传统的社会准则，但结果却导致了革命性的变革。1907年，沈家本以日本刑律和德国法典为蓝本提交了一份新刑律的草案。这部新刑律将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这就是说它将使儒学关于行为的训诫，如子女的孝敬等失去法律上的意义。沈家本还提出皇族以外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对以地位、年龄和性别差别为基础的五种关系和整个社会等级秩序是一个打击。他拟订的草案被拒绝采纳。

然而，沈家本还呈送了另一份较为保守的经过修订的清代刑律，并最终于1910年颁布，一直沿用到1928年之后。该刑律对现代化作出的贡献体现在：削减肉刑，废除火烙、夹棍和苦役等刑，禁止将头颅和尸体示众，以单坐法取代连坐法，区分民法和刑法以及阐明某些通则以指导数目繁多的特殊条款和“例”的实施。在清代，“例”的数目已积累到约一千九百条。其内容相当具体，但经常自相矛盾。地方官员在执法时难以保持一贯性，对审判结果也无法预见。由于用于审

判案件的法律内容庞杂、含义不清，再加上法律在中国社会中既不占主导地位又缺乏普遍性，因此地方官员的司法职能很不健全，更不用说法律哲学、法律术语和司法职业了。虽然沈家本削减了“例”的数目，但是他无法改变这种状况。

财政改革甚至更加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它威胁到许多人的“饭碗”（个人收入），而且因为承袭下来的财政制度过于薄弱，以至于无从着手。帝国每年税收的确定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无人知晓，而且也无专人做税收预算或进行这方面的统计。地方税收官员和他们的上司——各省当权者们的生计仍然依靠征收的税款来维持。而且，官方核准的税额也没有集中起来专列为“公共资金”，而且作为一个固定数额列入明细收支。一个省的岁入分批拨出去以满足其本身或其他方面的
400 需要。在十八个省中，十三个省向其他省的特殊用项拨出固定的款项。比如说，维持驻北京的八旗兵的七百万两白银取之于全国五十二个不同的用项。这种特定的程序使帝国岁入与无数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其中主要的是官员的俸禄和士兵的饷给。甚至在北京也没有一个单一的财政权威机构，据记载，1905年前后的帝国岁入约相当于七千万美元。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这个数目少得可怜。但是，新的贸易税——海关税和厘金税都用于偿付外国赔款，而传统的土地税依然如故。度支部尽管在1906年改组后成立，但它没有取得中央财政控制权。其他各部继续收支它们传统的岁入，甚至建立它们自己的银行，如交通银行（1907年）。

在编制国家预算方面所做的一次新的努力以1908年的全国岁入调查和1910年编制的概算为起点。在概算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支与地方的收支分开来列。根据这一概算，总收入为二点九七亿两，国家包括省的支出为三点三八亿两，地方支出为零点三七亿两。这预示着赤字将很可观（零点七

八亿两）。不幸的是，由于省不隶属于部，但却要上交岁入，因此中央各部和各省之间在制订计划与编制预算、汇总统计数字和确定税率等方面互不协调。这种缺乏中央统筹机制的基本弱点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习惯、政治准则和社会结构之中。清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虚浮的、被动的和完全寄生的状况之中，很显然，它只有通过大幅度地扩展其职能和确立中央领导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但对于一个处在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里的外族王朝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立宪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

当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于1905年战胜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时，立宪主义被证明是一个国家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团结一致的基础。这时甚至连俄国也在向议会制政府过渡。人们希望立宪主义在中国将会让日益壮大的各省努力在王朝政府中分享其具有意义的权力，从而使它们效忠于王朝政府。在1906—1911年之间，北京积极地推行一项包括行政现代化和立宪主义两方面内容的计划。但是，这种变化预示着中央政府内部以及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将爆发一场权力斗争。在京城，满族亲王们在避免进行任何真正的根本改革的同时，成功地保住了、甚至加强了他们对重要职位的控制。北京的这种亲满反汉的形势导致中国其他地区民族主义精神的兴起。

新的民族主义在1905年引起中国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 401 抵制运动，以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歧视，特别是它彻底排斥中国劳工的政策。在这次抵制运动中，由地方商会发动的旧式罢市斗争席卷全国各地的大部分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和广州。这两地的学生与商人一起召集公众集会，还参与现代报刊的鼓动活动。在好几个月中，美国的贸易遭到损害。北京

不愿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排外运动进行镇压，以免它将矛头也指向朝廷。

在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压力下，朝廷在1906年上半年派遣两个官方使团出国考察宪政。一个使团主要访问了美国和德国，另一个使团则去了日本、英国和法国。伊藤博文公爵对到日本的访问者们讲授皇帝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必要性，并告诫他们不要让这种权力落入民众的手中。在这批访问者回国之后，他们建议采纳日本的意见，即由皇帝颁布一个宪法和授予包括“公开讨论”在内的公民自由权利。这样就能够真正加强皇帝的地位，因为皇帝将能保持其高高在上的地位。1906年9月，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皇太后恩准“立宪政体”。1908年8月，她公布了一整套指导一项九年计划的原则。这项计划的内容是准备建立立宪自治政府，谘议局会议将于1909年召开，资政院会议于1910年召开。甚至连这种九年预备期的主张也是向日本学来的，日本于1881年同意在1890年召开国会。

皇太后于1908年11月15日去世，这使清代统治遭到巨大的削弱。在半个世纪里，“老佛爷”（一般讲话中对她的尊称）一直是处在权力的中心位置，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对此，至今仍几乎未作什么研究。比如说，她大力提倡丰富多彩、具有北方风格的“京剧”，但她不具备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康熙帝和乾隆帝的那种能力，即作为第一流的艺术鉴赏家和文学赞助者所具有的能力。在皇太后去世时，运气不佳但身体健康的光绪帝于前一天驾崩的噩耗亦公布于世。三十七岁的光绪帝的神秘之死使得中国丧失了向君主立宪制过渡的最好机会，君权也落入那些无知而自负的满族亲王之手。皇太后已指定她的年仅三岁的侄孙溥仪为光绪帝的继承人。溥仪在位时（1909—1912）称宣统帝，他的父亲，第二代醇亲王任摄

政王，辅佐他进行统治。总税务司赫德爵士于1908年返回英国。袁世凯于1909年1月被迫引退，张之洞则于同年10月去世。

这时，王朝所进行的极为勉强和缓慢的改革面临着许多它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说，新的中央行政系统由1906年改组而成的十一个部组成，这就需要通过一个内阁来协调它们的工作。但是这样的机构如果由首相来组织和领导的话，它 402 将可能取代国君的行政职能。清政府的摄政王不敢建立这样的机构。

到1910年2月，所有十六个新省谘议局代表汇集到北京。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的代表，他们向皇帝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这个要求被拒绝，但请愿并未停止。在1910年10月资政院会议召开之后，要求建立包括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会和内阁统治机构的呼声更加强烈。资政院会议包括皇帝指定的一百名代表和一百名谘议局代表。摄政王在压力下，同意在1913年召开国会。与此同时，他还终于在1911年4月建立了一个内阁。但出于不可思议的愚蠢，他任命了八名满族阁员、一名蒙古旗人阁员，而汉族阁员仅有四名！

铁路风潮

各省与中央政府在修筑铁路问题上的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19世纪末中国的政策是不同意修筑由外国投资和外国控制的铁路，但是，1898年的瓜分导致这一政策的破产。外国控制的铁路——俄国和日本控制在满洲的铁路、德国控制在山东的铁路、法国控制在云南的铁路——在这时成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标志着开采矿山、掠夺资源和侵占市场的开始。其他铁路尽管在名义上归清政府所有，但依靠与外

国银行集团达成的合同获取资金。外国银行集团通常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再将这笔资金作为外国贷款贷给中国政府。然后，银行集团便以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受托人的身份修筑铁路和管理铁路，将铁路作为贷款保证金的第一抵押品置于其控制之下。因此，中国在进入铁路时代时，却由外国银行家们坐收其利。

因此，一场爱国主义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大部分省中兴起。地方团体要求购回外国铁路和组建修筑中国地方铁路的公司。在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官员的道义支持下，张之洞于1905年得到一笔英国贷款，购回了华美合兴公司于1898年签署的关于修筑粤汉铁路的合同。但是，省的财源不能满足筑路工程的需要。尽管受到爱国主义和赢利欲望的激励，这些商人—士绅们的铁路公司在筹集用于购买路权、支付地税和购进外国铁路车辆的资本方面遇到了困难。投机和腐败也阻碍了工作的进行，而这种状况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中央负责铁路网的所有计划及指导工作的技术性要求相冲突。

盛宣怀是主张建立中央铁路体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先
403 后在李鸿章和张之洞的保荐下发迹起来（参见第337页和第354页）。1908年，盛宣怀取得了对轮船招商局和由张之洞在汉口一带兴办的工业基地的控制权。在那一年，他将汉阳枪炮厂、大冶铁矿（位于八十英里以外的湖北境内）和萍乡煤矿（位于二百五十英里以南的江西境内）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正如日本在八幡的钢铁厂从1896年起就依赖于大冶的铁矿石一样，盛宣怀开办公司的资金也早就依赖于日本的贷款。他已经从“督办”纺织厂、电报业和其他行业中获取不正当收入而致富，这时他又与北京的满族度支部尚书拟定向外国举贷，专门用于修筑粤汉铁路和从汉口通往四川的铁路。这就是所谓的“湖广铁路”（汉口至北京的铁路已于1905年建

成）。这样，铁路建设成了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北京在技术上对铁路发展的必要领导权及其所需要的铁路借款与盛宣怀那臭名昭著的腐败行为、各省对中央权力的对抗和普遍的反满情绪浑然交织在一起。

由于铁路借款已成为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的主要工具，美国此时也根据塔夫脱政府维护门户开放的方针，通过引起争议的“金元外交”政策狂热地卷入这一活动。菲兰德·C·诺克斯国务卿于1909年11月提出一个内容空泛的建议，要求使满洲铁路“中立化”。但是，这与英国在1907年之后所采取的默认日俄在满洲扩张的政策相冲突。诺克斯考虑不周的建议却促使了日本和俄国在1910年再度秘密确认它们在东北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1909年7月，塔夫脱总统通过发给北京摄政王的一份私人电报，干涉关于湖广铁路借款的谈判。他要求得到“美国资本的平等参与权”，这样可促进“中国的幸福和……它的领土完整”。这一干涉使摩根银行团成为1910年成立的四国（法、英、德、美）银行团中的一个成员。

银行团的议定合同于1911年5月与盛宣怀签订，这与盛宣怀提倡的帝国政令——铁路国有、购回路权和由北京控制所有各省的铁路工程——相符合。这种漠视地方利益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对各省的爱国者来说，这似乎表明满人和他们腐败的追随者为了自己获利而将中国出卖给外国银行家。一场“保路”运动波及各地，尤以四川为甚。人们举行群众集会，向北京苦苦请愿，但未收到任何效果。四川的运动愈加激烈，商店罢市，学校罢课，抗捐抗税，农村也被发动起来。9月，政府调集军队，向示威者开枪，逮捕士绅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都是获得科举功名的富人，既经营农业也经营商业，在日本留过学，此时是谘议局中的显赫人物，对铁路工程进行了巨额投资。他们排外的

口号“川人治川”反映了地方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此时具有强烈的反朝廷色彩。

因此，一场社会和制度变革发端于晚清的十年改革时期。在义和团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大量接受现代世界的影响，这加快了变革的速度。教会教育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已深入上层阶级和城市青年之中。抨击缠足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开始。两种在传统上遭人鄙视的职业——经商和从军——获得了新的声誉。那些在19世纪通商口岸专门处理口岸的外国人事务的官员和买办们被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官员和阅历更广的商业资本实业家们所取代。一些地主士绅不再指望参加官员资格考试和得到皇上的恩宠，他们开办地方商业和工业。这些地方名流基本上是守旧的，但他们支持立宪运动，他们希望北京的国会能够将他们与统治权力联结在一起，希望对国会负责、轮流执政的内阁能够使中国的财政、行政和公用事业现代化。1909年之后谘议局已成为新的政治机构和政策辩论及政治组织的中心。
405

重要城市的现代新闻业，其中大部分是在通商口岸，是新的政治生命的血液。到1895年，中国的杂志已经开始发行，其创办人主要是传教士。到1911年为止的十五年中，新闻界的刊物约六十种，但其中大部分完全由中国人创办，它们是商业新闻业与改革思想的统一体。继《申报》于1872年创办之后，上海出现了许多家新的日报。《申报》在1895年的发行量达到一万五千份。另一个现代出版界的先驱是商务印书馆，它创办于1897年，向学校发行新课本。到1911年，谘议局和新闻业为“士绅”阶层和“青年中国”——青年学生和军官这个新阶层提供了一个讲坛。当时的口号仍然是君主立宪制，但王朝的秩序已遭到革命思想的致命打击。

第二节 辛亥革命

日本的影响

新的中国统治者经常从外部基地开始其征服过程，如10—17世纪之间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征服者便是明证。在20世纪初，通商口岸、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华侨社区和日本帝国都是中国叛乱者的庇护所。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发动的。

西方人和中国爱国者对于日本具有奠基作用的观点感到不快，甚至不屑一顾。这因为前者的先辈们推进过中国的洋务运动，而后者则饱尝日本后来的侵略之苦。然而，在1898—1914年这个时期内，中国历史的进程受到了日本的重大影响，日本就像是清政府改良派的楷模，而且直到1907年前后，它还是反清革命者的大本营。中国主张共和制的人士去东京就读。日本对于中国的现代教育、军事和立宪主义的促进作用已在上文中提及，这是对中国民族主义普遍兴起所起的巨大作用的一部分。日本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所产生的影响比英国在19世纪或美国在1915—1949年之间或者甚至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有人对此可能会表示怀疑）所起的影响更加直接、深远和广泛。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日本的文化和邻近的地理位置，另一个原因是历史条件：在两国进入现代时代的黎明时刻，中国非常想学，而日本又非常想教。两国在民族利益方面不存在严重的冲突。

日本在1895—1905年之间成为一个强国，这样日本不仅 406

在其他国家爱国者的心目中、而且也在日本爱国者的心目中都被看作是亚洲的榜样。这增强了日本在整个亚洲领导现代化、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愿望。诸如东亚同文会之类的组织表达了日本对当时中国的兴趣，该会于1898年由一些政治、文化扩张主义者创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集中在东京和京都，当代研究中心设在台湾、盛京和上海，其中在盛京的研究中心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建立。为了促使日本在大陆上朝鲜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和与俄国进行对抗，极端爱国主义的阿穆尔河会（即“黑龙会”，源自阿穆尔河的中国名称）于1901年创立。它煽动日本冒险家们以学生、旅游者和实业家的身份渗入东亚地区。处于在野地位的自由党和进步党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以此作为其国内的政治策略，其中一些人对中国的改革和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此，日本在1898年为康有为和梁启超提供了保护和避难所（参见第373—376页）。康有为曾与进步党的创始人大隈重信一起度过一段时间。大隈重信在1898年短期担任过首相，他在所谓的“大隈主义”中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兴趣：由于日本已首先实现现代化，因此它在此时应当通过确保中国的自由和帮助其现代化来偿还它欠中国的古代文化之债。大隈重信的追随者犬养毅则蓄养了许多中国政治流亡者集团。1898年，犬养毅促成梁启超与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共同讨论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进行合作的问题。但是，康有为坚持除非孙中山成为他的门生否则就拒绝与孙见面，而且他仍然是一个君主主义者，顽固地效忠于他的光绪帝。从1899年起，他开始出访世界各地的华侨社区，建立他的保皇会组织，筹集资金，鼓动进行改良主义的宣传。在他的老师不在日本的时候，梁启超一度曾考虑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但被康有为所

阻止。日本促成其联合的努力没有成功。1900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这两个流亡的中国团体虽然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并都遭到北京的查禁，但是它们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在这些年中脱颖而出的众多领袖人物中有两位尤为著名，并且一直是重点研究的对象。

两位领导者：梁启超和孙中山

梁启超在1900—1901年间访问了檀香山和东南亚地区，1903年又访问了美国，但在这十年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梁启超已经是一位经学大师，他还真心实意地 407 汲取现代思想。他的著作涉及各种问题，其笔调华丽优美、简洁明了、雄浑有力，这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政论家。他是中国学生了解世界的窗口，他先后主编的一系列杂志的名称表明了他的思想发展趋势——《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 和《国风报》(1910—)。1903年，当梁启超仅三十岁的时候，他很快便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当时四十五岁，已过了更新思想的年龄。梁启超对他作出了评价，称他为“达尔文主义进入中国之前”那段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是“儒学的马丁·路德”。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了现代思想，他开始将中国的问题置于世界历史的范畴中进行考虑。为了论证改良的正确性，他运用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他将中国的悠久历史与它国的历史进行比较，将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与郑和进行比较，将伊曼努尔·康德与王阳明进行比较。他还回顾“今文经学”运动，他本人就曾是90年代该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并将这场运动与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文化的复兴进行比较。总之，梁启超跳出了中国经学的圈子，开始对正在发展中的中

国历史从现代的角度重新予以评价。

梁启超希望中国进行民族主义方面的大众教育，在道德方面使“民众更新”。他仿效福泽谕吉和其他在日本的西方人，推崇盎格鲁—撒克逊人关于自尊、进取心和热心公益的公民意识。他谴责中国政治的堕落，主张将对统治者的忠诚改为对民族的忠诚，将对儒学的个人关系的尊重改为对法律原则和新制度创立的尊重。这个新制度包括“宪法、国会和责任政府”。他还提倡出版文学刊物、创作短篇小说和其他小说以及翻译世界文学作品，主要是将日文本译成中文本。但在政治方面，他停止对满清王朝给中国造成的苦难进行谴责。如同其他士绅阶层的成员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样，他相信中国人对于代议制民主还毫无准备。因此，直到这个十年的结束时为止，他仍然是一个渐进主义者、君主立宪主义者和反共和主义者。他对革命并不积极，他于1907年组织的政闻社宣扬在维护秩序的情况下推动政治进程。尽管该社又陷入了以往的两面受敌的境地——受到清政府和反清革命派两方面的抨击，但是它对立宪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是知识界的上层人物和思想界的领袖，并不重视采取行动。而他的广东同乡孙逸仙（本名为孙文）则是现代的早期职业革命家之一，这两个人从不同的社会背景、相408 反的前提条件并通过各自的方式来考察中国的问题。当梁启超正在滔滔不绝地阐述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时，孙逸仙已创建了早期革命运动的组织。孙具有或者养成了许多革命领袖必备的杰出素质，他的家乡在澳门附近，这里受西方人的影响时间最久、受北京的控制也最薄弱。这是早年的“留学生”容闳的家乡，也是早期买办唐廷枢的家乡，从这一带移居到国外华侨社区的移民不计其数。如同他家乡的地理位置一样，孙逸仙的社会出身也很有利。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跟

参加过太平军的一位叔辈老师读书认字，他儿时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孙早年的经历也同样不会使他效忠于北京的皇帝，因为他在十三岁时便到檀香山他哥哥那里住了三年，在一所由英国国教会开办的寄宿学校学习英国的课程，在唱诗班中演唱并信奉基督教。他回到家乡的村庄时已是一个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他砸碎了当地的神像之后便被送走了。他在海外的哥哥的接济下在香港求学，又到檀香山去了一次。此后的五年（1886—1892），他在广州和香港学习化学、生理学、外科学等，并在一家英国教会办的医院中获得了医学学位。1892年，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由于他没有葡萄牙颁发的执照而被迫离开该地。自从1885年中国被法国击败起，他就一直为中国的命运而担忧。孙逸仙上书给当时的主要洋务派成员李鸿章，要求改革，但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行医受挫，又被当权者置之不理，他转而投身于一个新的行业。他既不去当商人、农民或学者，也不当医生，而是成为一个革命家，一个无阶级之人，随时准备与所有阶级一起工作。

孙逸仙早已与传统的反叛者组织——三合会（参见第290页）建立了联系。到1894年，他自己也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兴中会，在夏威夷和港澳穗地区都建有支部。1895年，该组织的第一项密谋计划，即夺取广州政府领导权的计划泄露，他的几个参加这一密谋的同伴被处决。但是孙逸仙逃到了日本，剪去长辫，蓄起胡须，身着西服，不久便被当作是一个名叫中山（意为“中央的山岳”，中文作中山，后来在民国时期许多公园、大道、教育机构，甚至连一种式样的服装都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日本人。这时，由于受到北京的“通缉”，他取道美国赴伦敦。1896年，他在那里的中国公使馆被认了出来，随即被“绑架”并拘押了十二天。公使馆准备

将他用船送回中国去处死，以前教过他医学并曾在香港教过他打板球的老师康德黎动员英国舆论促成他的获释。这样，孙中山在三十岁的时候已成为一名具有世界声誉的反清革命派的领袖，他感到自己是个受命运驱使的人。

410 1897年，孙中山返回日本，并接受了日本扩张主义者的援助和建议。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将几种起义的因素——有些是新的，有些是旧的——融合在一起。新因素包括来自华侨团体的财政援助和来自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的领袖人物。那些华侨团体是在传统的大陆社会以外发展起来的，具有新教的和商业的价值观。它们在政治上忠于民族主义，但对此感到灰心失望。那些领袖人物是些爱国的青年人，其中有些人是基督教徒。他们与孙中山一样，都来自广州地区这个中国现代生活的边缘地区。旧因素包括有组织的武装反叛者和反清的目标，那些武装反叛者能够通过大陆的秘密会社集中起来，而反清的目标则是通过某些暴力手段夺取地方政权，再希望以此引起一系列的反响，从而推翻帝国政府。1900年10月，一场为时两个星期的起义在三合会的支持下，在香港以北的惠州爆发。但日本从台湾运送的武器和人员尚未到达时，起义便逐渐平息下去了。孙中山采取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相结合的策略，于1903年加入设在夏威夷的三合会美国分会，并通过该分会向美国各地的华人筹集资金。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即怎样通过动员新一代的中国学生，尤其是在日本的留学生来与其他革命派进行竞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需要革命的理论基础。康有为仍然得到东南亚地区大部分相当守旧的华侨商人的支持，而梁启超的著作则促使新的学生阶层思想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在发动起义。革命社团、革命学校和革命刊物在各通商口岸及日本纷纷出现。上海一个由章炳

麟和蔡元培这样的经学学者领导的团体对康、梁进行抨击。1903年，他们办的煽动反清的报纸(《苏报》)被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查封，章炳麟被关押三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年创建了“华兴会”，试图将军官、学生和秘密会社的成员联合起来发动起义，但是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起义计划被发现，起义因而告吹。因此，革命活动正在增长，但它缺乏协调关系、明确的思想和长期的计划。

面临着这种竞争和机会，孙中山提出了他自己的思想。1903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为报纸撰写了第一批文章。1905年中期，他在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组建了中国学生的组织之后再次返回东京。他对目标忠诚不二，虽说并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采用的方式上却具有弹性。此刻，孙中山从他在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各种经历中综合出一整套思想来论证和指导共和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这个词包含民众和民族两层意思）、民权主义（字面意思为：“民众的权利”）和民生主义（这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其后来的含义相当于社会主义）。这三个内涵广泛的概念集中地反映了那个动荡时代的许多特征，然而它们的含义又能在特定的情况下作较大的变更。民族主义在这个时候既具有反满的含义，因此也具有赞成共和主义的含义，同时又具有反帝的含义，尽管那些为革命寻求外援的人并不强调后面这层含义。民权主义指在五权宪法保障下的反儒学的平等主义。该宪法（这个词是窃用梁启超的创造）所包括的五权指与美国相同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再加上从中国传统中继承的考试和监察或“监督”权。这个“五权宪法”显然是孙中山的创造。最后，孙的“民生主义”是为了对付工业发展造成的新问题，并不包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是接受了在当时十分流行的亨利·乔治的思想，即通过征收一种单一税来抑制未来那种不

劳而获的土地价值的增长，从而防止投机者和垄断者牟取暴利。因此，“民生”这个古老的名词在1905年时主要指具有特定的西方单一税思想的都市中的“平均地权”，而不是指重新分配耕地。尽管商人和地主的子弟们也许急欲举行一次政治革命，但是民生主义几乎不会在他们中间激起任何热情。

同盟会及其兴衰

所有这些因素——华侨的资金、秘密会社的联系、新的学生领导层和革命思想在日本人的促进下于1905年最终融合到一起。为了使相互抗争的组织联合起来，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安排他与黄兴和其他属于湖南团体的人会面。8月，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同盟会（“同盟”是秘密会社的典型名称）宣告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的位置居次，章炳麟和其他人均被提名担任要职。设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的海外支部与十七省的支部平级。在该会早期的约一千名会员中，来自湖南和湖北的人最多（到这时为止，两湖地区仍由主张教育现代化的张之洞管辖），广东人占第二位，四川人和长江下游的各省人分列第三、四位。

许多人都被孙中山的个性所吸引。在革命党人中间，三十九岁的孙中山不仅是年纪最大的，而且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去过的地方最多，阅历也最丰富。尽管他在长江沿岸诸省中的熟人不算多，但是他在日本和其他国家中熟人多于其他任何人。在另一方面，孙中山是一个外国化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个著名学者；他以他的密谋和果敢的行动而著称，而不是以他的文字作品而闻名；他确实富有理智却失之于肤浅，因此，他不能充当指导同辈人思想的现代圣人的角色。然而，考虑到由于中国伟大传统的衰败和各种外国样板的影响而造

成的多种文化并存的混乱局面，也许任何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都不能取得像孙中山所取得的如此之多的成就。

关于共和主义的新思想体系是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中那些做文字工作的副手们加以阐述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等这些撰稿人通过抨击梁启超的渐进改良和君主立宪的思想，相当成功地赢得中国学生对一个引人入胜的论点的支持，即中国通过一场迅疾的革命就能够赶上和真正超过西方（如同日本一样）。掌握强大领导权的“志士”能够推动现代化更快的进行，为现代政治生活作准备的渐进进化和普及教育毫无必要。《民报》支持孙中山的三阶段计划：(1)三年军政之治，各县逐一建立起地方自治政府；(2)六年约法之治，这一阶段在后来被称为“训政”；(3)最后为宪政之治，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这些乐观的设想和过于简单化的允诺不久便证明比梁启超那些更为冷静又富有理性的观点更得人心，梁启超所宣扬的开明君主制的观点由于1908年光绪帝的去世而失去了市场。

尽管革命运动实现了新的联合，但是它仍然屡屡受挫。在最反叛成性的湖南省，部分出于饥荒，秘密的哥老会于1906年10月单独发动了一次起义，江西萍乡的煤矿矿工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但是在一个月之后，起义被来自四个省的政府军所镇压。1907年，清政府的抗议导致日本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和黄兴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并在1907—1908年间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举行了六次暴动。但是，友好的法国人很快发现中国的暴动引起了越南的动荡，他们随即也将同盟会的密谋者们驱逐出境。到1909年，清政府的逮捕和处决，加上革命党人缺乏协调、连吃败仗，打击了华侨提供财政援助的积极性，并导致革命运动内部发生不和。事实上，这场运动出现了停顿，孙中山则再次到西方去寻求财政

成的多种文化并存的混乱局面，也许任何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都不能取得像孙中山所取得的如此之多的成就。

关于共和主义的新思想体系是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中那些做文字工作的副手们加以阐述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等这些撰稿人通过抨击梁启超的渐进改良和君主立宪的思想，相当成功地赢得中国学生对一个引人入胜的论点的支持，即中国通过一场迅疾的革命就能够赶上和真正超过西方（如同日本一样）。掌握强大领导权的“志士”能够推动现代化更快的进行，为现代政治生活作准备的渐进进化和普及教育毫无必要。《民报》支持孙中山的三阶段计划：(1)三年军政之治，各县逐一建立起地方自治政府；(2)六年约法之治，这一阶段在后来被称为“训政”；(3)最后为宪政之治，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这些乐观的设想和过于简单化的允诺不久便证明比梁启超那些更为冷静又富有理性的观点更得人心，梁启超所宣扬的开明君主制的观点由于1908年光绪帝的去世而失去了市场。

尽管革命运动实现了新的联合，但是它仍然屡屡受挫。在最反叛成性的湖南省，部分出于饥荒，秘密的哥老会于1906年10月单独发动了一次起义，江西萍乡的煤矿矿工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但是在一个月之后，起义被来自四个省的政府军所镇压。1907年，清政府的抗议导致日本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和黄兴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并在1907—1908年间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举行了六次暴动。但是，友好的法国人很快发现中国的暴动引起了越南的动荡，他们随即也将同盟会的密谋者们驱逐出境。到1909年，清政府的逮捕和处决，加上革命党人缺乏协调、连吃败仗，打击了华侨提供财政援助的积极性，并导致革命运动内部发生不和。事实上，这场运动出现了停顿，孙中山则再次到西方去寻求财政

指挥官的信任和积极支持。

清朝的覆灭

清朝覆灭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偶然，是地方仓促行动的结果，完全出于同盟会的控制之外。学生和士兵们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学会，这是一种更适合于准备起义的组织。与往常一样，他们的密谋计划（在10月9日）被泄露了，驻武昌的一些新军士兵为了解救自己于10月10日（从此人们纪念的“双十节”即指10月10日）发动起义。虽然在人数众多的新军中只有不到三千人参加了起义，但是满族总督逃离了这座城市，他手下指挥军队的统制也逃跑了。武昌落入起义者的手中，外国领事宣布中立。由于没有革命领导人在场，一个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领导人。这次反满起义受到各地强有力的支持，在几个星期以内，它促使另外约二十个重要城市或地区宣布反满，这种行动通常都得到了同盟会、新军和谘议局的支持。到12月初，所有南部和中部省份，甚至包括西北部省份都宣告独立。成为都督的清军军官与领导立宪运动的谘议局头面人物共掌大权，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发生了战斗。

由于最精锐的军队效忠于袁世凯，因此清朝廷这时将他 414 召回委以重任，但是他在达到他提出的条件——即出任新内阁的总理大臣和军队的统帅——之后方才出山。与此同时，举行起义的各省和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在一张丹佛出版的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他继续赶往英国，以寻求得到一笔借款和要求英国帮助，并阻止日本对王朝方面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孙中山到达上海时恰好赶上被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作为该政府的挂

名首脑。他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同时他允诺不论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何时支持新的共和国，他都将随时让位给袁。

尽管发生了一些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武汉三镇一带，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奇特的非暴力革命。而且，它还是一场无确定成果的革命，因为它的目的具有纯粹的否定意义，即摆脱满人的统治。各界普遍同意下列几点：省必须在国会中具有代表权；中国的统一对于防止外国的、或许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是必要的；袁世凯具有担任新政府首脑所必备的经验、能力和支持。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党人在12月末都普遍认为袁世凯是避免内战、动乱和外国入侵的主要希望所在。在袁世凯方面，他在他的将领们的支持下，以他为中心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与清皇室和革命党人及他们的南京临时政府举行各种级别的谈判，并逐渐达成一项总的解决办法：在1912年2月12日，年幼的宣统帝（后来以溥仪而知名）顺从“天意……体恤民情”宣告退位，清代以及古老的中国君主制和中华帝国亦结束了。孙中山随即辞去临时总统的职务，袁世凯被南京方面选为孙的继任人。但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兵变，这迫使袁留在当地，未能迁都南下。3月10日，他在自己管辖之下的北京就职，按照一部《临时约法》进行统治，直到选出国会和建立完全的立宪政府时为止。
415

身为总统的袁世凯正如他“背叛”了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清皇室一样，他后来也“背叛”了选举他为总统的革命派。但1912年时，他在那场前途未卜的运动中还没有碰到与他势均力敌的争权者，有财有势的汉人丢官失势，而在国家和社会的顶端行使专制皇权的天子亦不复存在。在这场政治大危机中，满人也许宁愿死战也不愿退位；北方军队也许会被用来攻打南京，不久便咄咄逼人的日本人也许会抓住一个早一些的

机会采取行动。但是，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袁世凯运用他的谋略和诡计赶走了满人，赢得了外国的承认，欺骗了革命派，在剧烈的动荡时期，保住了一个行政权威。日本人由于意见不一而无法就一项积极的政策达成一致的观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统一。孙中山和他那些拥护共和的同党既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在各省又没有大批的支持者。他们知道中国需要一种强大而统一的统治，而他们自己无法进行这种统治。由于各种民族主义的思想都要求在一个强有力的人领导下团结起来，因此这个人非袁莫属。

所以当中国古老的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当权者的出现减弱了这一震荡。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离开了天子必然遭到损害，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缺乏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必备的传统的思想依据和礼仪依据，中国的统治者与西方所说的神权统治者并不完全相同，但他具有无可争议的超于人类之上的地位，而袁世凯不具有这种地位。由于缺乏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代的依据，袁世凯和军阀这些天子的继承者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武力。数年之后，当新的依据最终被认可时，这些依据并不是革命派所朦胧企望的那种建立盎格鲁-撒克逊式政府所必备的依据。这样，1911年标志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政体的中央权力开始发生了长期的危机。

第三节 共和制蜕变为军阀政治

416

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伟大的现代变革如同潮水一般席卷整个世界，到1912年，这股潮水已将中国的传统文明冲得七零八落。因此，从那个前途未卜的时代生

活过来的中国人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动乱——个人的和大众的、实际的和理论的都有。其他任何地方在寻求建立新秩序、恢复民族力量和改变民族生活方面都不如这里这么拖延良久、多灾多难。

国内政治：袁世凯对付国民党

新任临时总统袁世凯承袭了已退位的君主的主要行政职权，不久便卷入与革命派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从1912年到1916年，袁世凯为了保住权力，采用贿赂、武力和暗杀等手段，胁迫国会，随意修改宪法，最后又企图复辟君主制。所有这些行径使他成为民众及其共和国的敌人。

1912年3月，袁世凯任命他的门徒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组成一个十人内阁，由此而建立起共和制的政府。唐绍仪是唐廷枢的侄子，曾在容闳的指导下在康涅狄格州留学。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会员，其中一人便是湖南的宋教仁，他是黄兴的密友和新的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份文件规定由总统和国会分享权力，但是在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事务的问题上很快便发生了纠纷。国务总理唐绍仪既不拥有政党组织、也没有任命官员的权力和编制预算的权力，而且也无法控制他的内阁成员。当他发现袁世凯不让他主持行政事务时，他和四名同盟会阁员于1912年6月辞职。从此，内阁开始对总统负责而不对国会负责。然而，袁总统为了避免分裂，遂邀请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孙、黄二人都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会见他们，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赞成，还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的全权。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这些老一辈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治国之术，无力实现政党统治，甚至连这个要求也提不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明、目标

未定、意见不一，而且政党制度本身也未在中国的条件下经过考验。事实上，政党正在两个传统中成形、产生出来。

一个传统是士大夫的会或党，如1895年以后建立的康有为的强学会和其他政治研究团体。这个因素对全国性的立宪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在1912年5月以拥护袁世凯统治的共和党的形式出现。梁启超从日本回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随后他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他将这些共和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小团体合并为进步党，仍支持执政的政府。另一个政党的传统渊源是秘密会社，它们的榜样曾导致革命派的密谋团体的产生。许多政治团体得益于这两个传统，一些政治家又同属好几个党派。所有政党都只不过是由一群靠个人关系聚集到一起的上层人物的团体，但这些人物缺乏选民的拥护、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和经验。总之，像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采用的建立政治协会和进行政治鼓动的西方做法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关于确属政党政策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辩论，因为关于政党制度的作用本身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的君主并没有在作为国家中枢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之下实行分权，而是根据传统将所有的治国大权集于一身。袁世凯控制了内阁和行政权，正进一步去控制各省的都督。他身负个人重责，未曾在经验或传统上准备好去鼓励“忠诚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也许会在声称更忠于中华民国的同时抨击他的政策、抗拒他的权力。然而，这正是西方的议会制政府所必备的条件。对于一个想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反对党来说，道路似乎是畅通的。有人进行了这种尝试，下一个时期的权力斗争是由宋教仁领导的，他此时在革命派中的地位仅居孙中山和黄兴之后。1912年8月，宋教仁说服四个小政治团体与同盟会一起组成一个公开的政党——国民党。以各

省十分有限的间接选举权为基础的全国大选使国民党1913年2月在两院制的国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宋教仁随即到华中地区广泛进行竞选活动，他批评政府，要求由国民党立即控制内阁，虽然袁世凯将留任总统。

这是现代中国议会民主的一个高潮，但是宋教仁所开创的竞选活动的结局却给这个有希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正如上海会审公廨后来用文件详细证明的那样，袁世凯雇用刺客，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用枪将不到三十一岁的宋教仁打死。⁴¹⁸袁栽赃于黄兴身上，一度迷惑了公众。

在此之前，暗杀是无权的反清革命党人的武器。但大权在握的袁总统此时却变本加厉地使用这一武器，他已用暗杀或处决等手段除掉了许多亲革命党人的将领。宋教仁被刺之事影响巨大，它确立了一项原则（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确认了一项策略（扼制反对派运动的最佳方式是除掉其领袖）。从那时起，这些原则和策略在中国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主。

由于袁世凯以接受苛刻的条件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借款和承认，因此对他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了。他一方面在国内打击政党政府，同时又将中国的岁入抵押给外国人。他这样做的原则在于他的财政方面的紧急需求。尽管此时袁作为统领大部分军队的都督们的老上司而取得了对他们的控制权，但是他在增加上交给北京的地税和其他数目不大的岁入方面并不比他的大清前任们更有能耐。清政府在1911年4月为了“币制改革和满洲工业之发展”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了一千万英镑，从而避免了财政破产。1912年6月，俄国和日本银行也加入该银行团组成六国银行团。袁世凯很早便寻求向外国大量借款，但是把持对华借款垄断权的银行团要求以中国的盐税作抵押，并要求建立一个类似于海关的中外联合机构负责征收盐税。各种爱国的中国人都反对这些要求。威尔

逊总统于1912年3月修正了塔夫脱在1909年的立场。基于借款条件威胁到了中国的行政独立，他拒绝支持美国参与这一行动。但是经过十四个多月的谈判，银行团的一笔数目为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仍然于1913年4月26日签订。这个合同是五国银行团的杰作，它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在同一天，有关宋教仁被刺案的证据公之于世。由于债券按九折售出，银行又收取6%的佣金，中国实得仅为84%，即二千一百万英镑。但是，中国必须到1960年为止按5%的利息偿还全部本息，总额达六千七百八十九万三千五百九十七英镑。

袁世凯在绞杀反对党的思想和向外国借款以支付军费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广泛存在的信念，即只有袁才能维持中国的统一与和平。1913年中期，他仍然得到进步党的拥护和北方都督们——他控制的北洋军阀集团中的成员的支持。许多国民党人也对他表示容忍。因此，袁世凯轻蔑地拒绝国民党所做的各种妥协，解除华中、华南地区支持国民党的都督的职务。为了对付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气势，⁴¹⁹七个省的政府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仍在1913年的7月和8月再次宣布独立，发动短暂的“二次革命”。这场革命由于缺乏广泛的支持和外国的援助，在两个月内几乎未经交火便被镇压。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领导人逃往日本，又回到了起义前的那种境况之中。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将领们则将他们的权力扩展到了大部分省份。

1913年9月，进步党在国民党温和派的帮助下在北京组阁，这标志着议会主义最后一个时期的开始。内阁中包括袁世凯的一些心腹，但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袁的目的在此时变得更加清楚了，他打算由国会通过公认的程序最终正式地选举他为总统，随后便将国会解散。贿赂笼络与武力恐吓迫使

使国会就范。10月6日，国会终于选举袁为总统。7日，他通过外交活动成功地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接着，他就对国会发难。11月，他命令国民党解散，并将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或曾加入过国民党的议员赶出国会。1914年1月他关闭国会，接着又撤销省议会。2月，内阁辞职。此时，五十四岁的袁世凯成了独裁者。

尽管袁世凯粉碎议会主义脆弱外壳的行动后来遭到爱国者的诅咒，但在当时似乎仅有小部分公众对此予以较大的关注。这是由于人数不多的潜在的议会主义者中的大部分仅仅在通商口岸和省会中开始出现，不论是列强，还是缄默的老百姓，或是城市商人阶层都没有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而官僚、军队和大部分各省的都督都赞成在一个具有独尊地位的人统治之下实现稳定。与日本政治的分权制不同，中国政治由一个单一的统治者平衡各种相冲突的势力，掌握作出决断的权力。袁世凯此时便是如此，他通过自己任命的机构和按照一部新的宪法——《中华民国约法》进行统治。这部新宪法于1914年5月1日正式公布，它授予袁世凯以广泛的独裁权力。袁世凯压制新闻界，支持由士绅和遗老们组成的地方“自治政府”，恢复检查机构和祭孔仪式。他乘防弹轿车到天坛去主持古老而壮观的仪式。到1915年底，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

对外关系：民国对付列强

新的中华民国开始失去对旧清帝国两个边远地区的控制。西藏和外蒙古开始脱离中国，它们分别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和俄国，而不是依赖于北京。中国革命以民族自决的

名义摆脱了满人的统治，因此它几乎没有对亚洲腹地提出主权要求。但是，袁世凯在北京执掌大权之后便坚持传统的主权要求，俄国、外蒙古和中国不久便就以下方案形成一致的意见，即中国对外蒙古享有主权，外蒙古拥有自治权（实际上俄国取得了控制权）。英国接着也同意一个类似的方案：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西藏拥有自治权（英国在此可拥有永久性利益）。俄国和英国最终于1913年11月7日承认了袁世凯政府。

列强势力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扩张与外国对中国国内税收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同步进行。继任赫德职务的英籍总税务司于1911年11月经帝国政府的同意对海关的税收工作作了根本的改变。此时这笔税收完全用作中国向外国借款和所欠赔款的抵押。以往，外籍税务司向北京呈报其税收帐目，而由管辖海关的中国官员实收税金。而此时，由于大部分省都宣布独立，海关与中国所欠外债的抵押关系靠这样一种方式维持：外籍税务司首次收取税金，并将税金通过总税务司转给设在上海代表债权人的国际银行家委员会。当领事团于1911年下半年将会审公廨（参见第325页和第327页）置于其控制之下时，外国在上海的地位在革命中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外国对上海和关税控制的扩大，加上在英籍盐务总稽查员控制下的新的盐务稽核所的现代化，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更早的许多方面一样具有自相矛盾的特征——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然而在短期内又能支持其政府。中国的信用得到了维护，这对偿付外债有利，盐税则大幅度增加。

条约体系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强国的贪婪都会由于其他列强的嫉妒而受到某种抑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转移了列强的注意力，日本则乘机走上侵略的道路。1914年8月，中国宣布中立，但日本却对德国宣战，通过向

中国领土派遣军队来嘲弄中国的中立。日本完全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随后，日本又于1915年1月18日秘密地向袁世凯提出五号共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要求通过派遣顾问的方式来控制中国政府，特别是控制警察、武器购置和兵工厂以及福建省的发展。袁世凯采取惯常的做法将这些蛮横的要求透露给外国新闻界，以此来迫使日本同意把第五号要求留作“日后协商”。但在日本5月7日最后通牒的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接受了前四号各条的大部分要求。尽管英国公使认为“日本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比德国对比利时采取的行动更为恶劣”，但是所有西方列强都没有出来帮助袁世凯。包括这些要求的1915年5月25日中日条约确认日本在山东和南满、内蒙古东部等这些很早就被承认是其势力范围的地区的统治地位。此外，中国还承认日本在华中的汉冶萍工业基地拥有特殊的利益，该基地长期以来被用作向日本借款的抵押，甚至连孙中山在1912年也是这样做的。虽然这个条约从未得到中国国会的批准，但它被日本当作是在大陆扩张的特许状。由代表日本新兴工业利益的内阁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目的基本上是经济方面的，但它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却主要在政治方面，因为这些要求激发了新的民族主义精神，这体现在群众集会、罢工、抵制日货和报刊的强烈抗议等活动中。

袁世凯君主制的失败

袁世凯自从在朝鲜发迹以来便以人所共知的坚定反日立场在1915年赢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但他的治国努力在思想贫乏的条件下屡遭挫折。帝制统治所依赖的古老的儒学道德约束力和礼仪形式都已失去作用，而现代信仰和大众统治体制——不论是相互竞争的政党还是政党专政——都还没有确

立。由于中国社会此时缺少政治信仰，甚至连对自己都无信心的袁世凯也运用更像“法家”传统的武力和权术进行统治，他只知道人类如同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惧刀枪而爱黄金”。

这种政治信仰的缺乏在袁世凯恢复君主制的努力中得到体现。1915年8月，袁世凯在幕后发动了一场君主制运动，通过成立拥袁为帝的“筹安”会、发起全国性的“民众请愿”、促成“当选”代表的一致性投票、呈递旧式奏折和相类似的方式来要求袁登基。袁世凯经过适度的推辞之后，对这种编造的要求作出响应，于1915年12月同意接受皇位。他将从1916年起使用“洪宪”年号。这一切到头来落得个一场空。

袁世凯失败的一个因素是他那些对他缺乏爱戴之情的将领们的不忠。另一个因素是日本政府的反对，它动员几乎一致的列强舆论，并以“规劝”反对君主制。加速这一进程的因素是中国国内的诸如梁启超这样的反对革命者挑起的军事方面的反对。梁启超等人仍然认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他们在此时宣扬维护中华民国的继续存在。梁启超与一个曾在袁世凯统治最薄弱的云南省当过都督的他的湖南籍学生密谋，4221915年12月25日云南省宣布独立。在此后的六个月中，有限的战斗和深入的谈判同时进行，南部和西部的八个省逐步转而反对袁世凯。与此同时，袁世凯这个心情沮丧的人先是推迟登基，而后又放弃帝位，最终于1916年6月6日去世。

思想方面和地缘政治方面其他势力都在幕后反对君主制的主张。在中国，对权力的认可不再来自表现为预兆的、民众默许的、非人格的老天爷。与此相反，人们认为人民，即民族的政治实体是历史的能动创造者。天子作为制度已在到1911年为止的许多年里逐渐失去了信任。天命被人民意志的观念，即被统治者的认可所取代。对“民”的神化充斥于新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中——“民军”、“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即

便只是上层阶级而不是普通民众需要关于代表制的现代思想，袁世凯这个有权势的人亦对这种思想嗤之以鼻。按照传统的说法，袁世凯对他的部下过于不义，因此他们也对他不忠。

地缘政治也与袁世凯作对，因为自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省作为独特的地理、文化和行政地区受北京的控制日益减弱。另外，中国南方和北方之间在天气、经济和历史上难以消除的差别导致这两地的利益和观念的不同，这个问题使各个王朝都受到困扰。在袁世凯去世以后，外国势力仍阻碍着中国的统一，继续挫败他的继任者争权的势力：首先，通商口岸的地方当权者可动用政治庇护权和战略资源而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其次，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所拥有的利益和权力使它们几乎控制全部的省份；再次，银行团内外的外国银行拥有通过同意或拒绝借款的方式来决定中国政府的去留的权力；最后，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装甲火车和自行车这些来自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流入对日益发展的中国文化革命和旧秩序的解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军阀政治的性质

在1916年和1928年之间，中国被许多相互对抗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分而治之，这种局面在边远地区延续的时间甚至更长些。这些军阀基本上是过渡性的人物，他们并不处于
423 新旧王朝的更替期，其间“传统内部的变革”将导致新王朝的产生。然而，他们也不是具有新秩序构想的现代派人物。他们新近扩编和拥有现代武器的军队使用新建铁路和汽船，能够更轻易地占据地利，但不能创建新的政体。1911年，那些

只拥有政党而不拥有军队的革命派未能获取政权，而此时这些拥有军队而不拥有政党的军阀同样也无法获取政权，他们反复利用及误用国会和口号恰恰表明他们缺乏适当的纲领和组织机构。从1913年起，军队扩充，政党分裂，所有人都无法将新的军事权力与一种新的政治组织相结合。在军阀的统治下，中国政府腐败下去，人民遭受苦难，中国社会经过一个世纪的衰退之后陷入了最混乱的状态。

在数百名佩戴勋章的军官率领他们士气低落的军队在这些年的历史舞台上招摇过市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些典型的特征。首先，一个军阀要有坚强的个性、下属军官和军队。他的问题是先要训练他们、赢得他们的个人忠诚，尔后要供给他们食用花费。为此，他需要得到对一座大城市、一个省、一条商路或铁路的税收或得到其他军阀或列强的支持。一个地区的地势也许会使他处于一种战略上的有利地位，但该地区的土地和人口在有农民支持的情况下仅能提供食物和人力，而不是具有现代游击战意义的根据地。典型的军阀军队并没有植根于当地的民众之中，而是他们苦难的根源。军队征收税金，依靠村庄提供给养。民众对军队既害怕又鄙视。因此，军队调驻一个新的省区也许至少可以得到暂时的好处。这种军队具有寄生性和流动性。

其次，由于军事势力只有在某些机构确认其合法性和作为中介的时候才能形成政治权力，因此军阀们都寻求正式的任命、官府的签章和也许由其他人签署的证件，而且通过表示支持公共福利和爱国原则来证明其每个行动的正当性。简言之，他们需要文职政治家和文官政府的帮助。军阀政治没有用军事势力替代政府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它只是使其保持一种不同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官政府已得不到支持和尊重，这一点业已提到。另一方

面是由于军阀具有更大机动性和更强火力的新的军事技术能力，它与新的政治机构的均衡增长不能保持平衡。当然，这成为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特征——物质的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发展超过了大众参与行政管理的发展。在这方面，军阀政治与其说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习俗——外国人一般都这样认为——倒不如说是一种不平衡的现代化的产物。在这种现代化中，武装力量的增长速度快于能够控制它的政治机构的增长速度。

424 最后，军阀政治的性质似乎使当时和后来的人们都感到非常迷惑不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军阀十分腐败而狡诈，忽而忠心耿耿，忽而又居心叵测，使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戏剧人物。但是，在旧的权力结构崩溃时，其下层的、地区级的那一部分仍在发挥作用，并努力在更高级别上创建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军阀的最终目标是政治的，他们寻找各种制度方面的途径来支持和扩大其权力，他们利用国会和省议会，甚至召集督军会议。由于缺乏建立现代政治组织的能力，相互对峙的军阀集团无法超出地区性的发展水平。但是，他们始终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在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继续在国外行使其外交职能并保留了它的许多行政部门。没有人胆敢宣布建立一个新王朝，时代已发生变化。军阀之间的斗争、国会内部政治家的斗争和军阀与政治家的斗争等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其总的趋势是国会的不断削弱和国家的分裂。在第一阶段中，梁启超和进步党的其他成员组成“研究系”，它总的来说致力于与北京政府合作，遭到南方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对。随着控制北方和中部十余省的北洋将军们日益将政府和国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与南方各省的关系疏远了。在第二阶段中，南方人于1917年对北京国会的背叛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这给孙中山提供了又一个机会。

在日本，孙中山重新采用他早期建立秘密团体的手段来进行革命。1914年7月，他建立“中华革命党”，这是秘密的有纪律的精英人物的组织，其成员要按指印，并宣誓效忠于孙中山本人。孙的目的是要克服“党纪涣散……我们失败的原因”，但黄兴和许多其他人拒绝宣誓。这种密谋活动的复活显然不具有民主性，而且不借助于当时正在兴起的爱国主义，因为孙中山从他1914年的新党纲中删除了民族主义的原则，这个原则的本义是反满（尽管它似乎不可思议），显然它对于孙中山来说已不再具有意义。孙此时的思想是倾向于与日本合作的泛亚思想，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由于与时代格格不入，因此孙中山对1916年袁世凯的倒台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但在1917年，孙中山再度出山，卷入军阀与国会之间的争斗。7月，他与其他前国民党的同事和大部分中国海军一起前往广州，召集了约二百五十名国会议员，组成由他自己 426 出任大元帅的军政府，但是地方上的军阀仍是实际当权者。广州的孙中山尽力与地方的当权者合作，而北京的梁启超则同样尽力在那里的军阀政府中加进文官的成份。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后，通过以准备对德作战为部分借口而从日本借得巨额借款，即所谓“西原借款”，来为其打内战提供资金。北京此时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引入日本军事教官，并与以安福系而知名的那个由政治家和军事家组成的亲日团体紧密合作。许多爱国者抗议当权者为了增强他们自己的军事实力正在再次将中国出卖给外国人，梁启超在受挫之后最终退出了政界。

在南方，孙中山的广州国会也陷入分裂，其中一个派系（政学系）与军阀合作。这些军阀开始暗杀孙中山手下的人，并迫使他于1918年5月回上海。此时，与安福系控制北方的情形大体相似，桂系军阀控制南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给北方和南方都带来了停止争斗的压力。1919年，双方在上海毫无结果的和平会议上举行了谈判。然而，中国的分裂进入第三个阶段：南方和北方那些不受地域限制寻求盟友的小派系剥夺了当权派系的权力，但仍无法稳定他们自己的控制。

1922年之后，中国国内行政机构的解体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在北方和南方造成了不同的后果。在北方，新的领导人物从军阀混乱中脱颖而出。这与他们早年经历中袁世凯的提携并无多少直接关系。有三个人最终站稳了脚跟。在他们三角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使自己与其他两人中的每一个轮流结盟反对第三者，因此每个人都被其他人出卖过。这三个人是：

(1) 张作霖（死于1928年），“满洲的军阀”，早年当过土匪，因与日本结盟反对俄国而发迹；1911年起在沈阳任都督。他依靠东三省的资源及其战略上易于防守的地位与华北抗衡。

(2) 吴佩孚（1872—1939），曾受过儒家经学的教育，而后又在保定军校接受日本教官的训练。他成为许多中国人和英国人为在华中恢复和平与秩序的众望所归的人物。

(3) 冯玉祥（1882—1948），一个农民出身的、身体魁梧强壮的人。他从十一岁起当兵，毕业于保定军校。1913年他接受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的洗礼。因为他要求他的纪律严明的军队推行新教主义、厉行简朴、促进实用教育和社会改革，所以他在他的外国传教士朋友中以“基督将军”而出名。冯玉祥于1924年占领北京，粉碎了北洋军阀的势力，最终捣毁了议会制政府的门面。

他们以及其他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难以详述。从1922年到1926年，跨省的战争数度爆发。这些战争在遭受连续不断的惊吓和重税压迫的民众中间造成难以估量的苦难。军阀政

治造成的重要后果包括通货膨胀、贸易崩溃、铁路和防洪灌溉公共工程失修以及鸦片灾难的回潮。清政府在1906年开始严厉打击鸦片的生产和吸食，这得到了广泛的具有爱国热忱的人们的支持。已降至每年五万箱的英属印度的进口量被逐渐削减，到1917年底进口停止。更大规模的中国鸦片生产本已接近绝迹，但当时由于军阀对适于种植罂粟的土地征收重税的措施，鸦片生产又复活了，因为只有用鸦片才能缴得起如此重税。

但是，军阀政治及其所有罪恶也许对爱国的年轻人心灵所造成的冲击最大。梁启超写道：“在今日之中国唯狡诈、虚假、卑鄙及无情之人能够得势。”一场首先从知识分子阶层中发起的新的革命在这段令人绝望和屈辱的时期孕育产生了。

⁴²⁸ 第十四章 国民党中国的兴衰

第一节 思想和文化革命

现代中国所经历的从混乱和衰落到复兴和更生的过程在规模上远远超过王朝更替所经历的过程。如果我们将19世纪初的社会弊病（其中吸食鸦片的增多是一种征兆）与近几十年来对毛泽东的革命热情和奉献相比的话，我们必须断言：整个文化不仅衰败了，而且也更新了。中国的衰落在1916年军阀政治盛行时降到政治上的最低点，其复兴始自政党专政制度。在思想方面，儒学的衰落最终导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适应。但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所经历的一段关键的转变时期中，西方的自由模式和思想都曾产生过影响。

军阀时期既是混乱的时期又是具有创造性的时期。这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在受传统约束的中国社会中，新的方式只有在旧的模式崩溃之后才能进行尝试。1916年以后的十年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实践、时尚和实验在不受官方限制的情况下争奇斗艳。随着政治的衰落，多种思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始了。在思想界激烈斗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和普遍的社会变革的进程。

经济和社会背景

当中央权力的衰落使得乡村发生骚动的时候，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输入中国货物量的下降有助于本国工业在外国治理下的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并不受在各省得势的军阀政治的侵害。政府1901年后的政策在古老的行会制度之外培植起一个新的商人阶层。到1914年，地方商会已达一千余个，拥有会员二十万人。但是，大规模企业中的大部分是英国开办的，此外还有美国（特别是在上海）和德国（到1915年为止在山东）开办的大企业。举例说，中国石油资源的贫乏使取代菜油用于照明的外国煤油的进口和与煤炭相竞争的燃油的进口畅通无阻。这些进口控制在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和于1907年成立的英荷合资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分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手中。长期以来棉纱及后来的棉织品的进口促进了为英国、日本在华开办的纺织厂和中国的纺织厂提供原料的棉花种植业。香烟市场首先是由美国人组建、以伦敦为基地的合资企业——英美烟草公司开发的。该公司创建于1902年，它不久便开始通过其买办将种子和贷款借给华北的烟草种植者。这家公司建立了烟草收购和烤制厂的网点，为该公司的数家大卷烟厂提供中国烟草。但是像1905年成立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样的中国企业很快具有了竞争力。

到1914年，一个现代的中国经营者和中间商阶级业已产生（它在后来由于时代错误而被诬称为“买办阶级”）。毫无疑问，这个阶级是在外国教育家、政治官员和实业家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这个新阶级在讲授中西混合课程的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中、在海关和邮政局（邮政局于1911年从海关中

分离出来，到1918年它雇用一百名外国人和二万七千名中国人）中、在轮船公司、纺织厂、商店和在从事商业的像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这样的旧通商口岸的洋行或在像亚细亚火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这种新的企业中获取经验。新生的中产阶级在通商口岸和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学会了现代经济管理方式，他们已积累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观念和技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提供了时机。

在其他实现工业化所应具备的因素中，中国的资本是在海外社区和通商口岸两个方面积累的。此时，这方面的事务由现代的中国银行业处理，其中一部分银行是政府开办的、一部分是由私人开办的。这种现代银行由1914年的十七个增加到1926年的一百零二个，旧式的山西票号由此而破产。然而，有许多因素仍然阻碍着财力的增强。比如，旧式的借款是另一种生产性投资，它的年利为12%或更多。尽管政府铸制的银元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已广为使用，其中大部分银元铸有袁的头像，但是币制改革和币制统一都仍未能废除另外一种货币单位——银两。

430 与此同时，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用于开动纺纱机或拣选烟叶，或用于制造火柴、面粉、罐头食品、水泥和其他批量生产的商品的工厂之中。这些通过新建的铁路和汽船而能够得到的就业机会为那种封闭的农民生活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军阀的征税和征兵、人口的增长（假定如此）和自然灾害促使人们移居城市。城市生活和工厂劳动打破了旧家庭制度的束缚，随着赚取工资的子弟们和妇女们在财政上获得自立地位，家庭不再是一个控制个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单位。相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非个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机能而不是地位或特定的亲属关系的机能。在拥挤的贫民窟和血汗工厂中，新的价值观开

始形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厂工人的数目开始缓慢地增加。到1919年，他们的人数多于一百万，或许达一百五十万之多。

社会变革不仅明显地反映在新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兴起，而且反映在年轻人和妇女的新的地位上。年轻人领导了辛亥革命，学生们此时要求得到士人阶层所具有的旧特权地位。到1915年，教育部在册的各类政府学校的数目是十二万所，学生约四百万。尽管入大学的仅几千人，但是这一增长超过了以往。1919年，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学校拥有约五十万名学生，新教大学为高等教育确立了新的标准，传教士还率先给女学生授课，女生在新教中学的学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有一万三千人。1915年，第一个女子高等学府——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开始招生。

商人—实业家、工厂工人和现代的学生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传统的有功名之士（狭义上的士绅）让位于更年轻的人，即在城市中甚至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学生。地主倾向于成为外住的城市居民，他们不再雄踞于乡村社会之上。总之，城市生活以及随群众运动而产生的阶层的兴起与乡村生活的相应衰落同时发生，乡村里大户的支配权在上层消失了，而广大农民在村庄中遇到了严重的问题。通过交通和公共卫生情况的改善，中国乡村地区的人口在数目上也许有所增加，但在其生活水平上却可能有所下降。佃农以及没有文化、没有定居地和没有工作的无地农民似乎有所增多，他们极易沦为土匪、军阀军队的士兵或极为廉价的苦力。

旧社会的这种崩溃驱使新的学生阶层挺身而出，成为领导者和拯救者。他们继承了士大夫们向当权者进谏和效命于
431
社稷文化的传统，感到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通过学习来“拯救”

国家并使国家现代化。从与外国的交往中，他们的主旨和思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大。日本接纳的留学生人数最多（约五分之二），但此时有三分之一的留学生去了美国。1908年，美国免除中国所欠美国的一千二百万美元（约三分之二）的庚子赔款，北京的清华学校因此而得以创办。自1911年起获奖学金的学生源源不断地赴美深造。（1924年，剩余的赔款被免除，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这笔被免除的赔款。）为了大战期间向欧洲提供劳动力，中国在1916—1918年之间招收了约十四万契约华工派往法国。在法国，像基督教青年会的晏阳初这样的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开始提出大众教育的措施。蔡元培等人已在这里的中国学生中发起了勤工俭学运动。所有这些活动促进了消除自古以来就存在于读书人与劳动者之间隔阂的漫长进程。

法国比美国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归国留学生的政治运动和学说的源泉。在欧洲为社会主义的存在提供依据的工业资本主义和产业工人阶级在中国的规模仍然很小，但欧洲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特别是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引起了普遍的反响。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著的《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的书中认为，尽管对自由的约束必须在合作能够得到发展之前就予以摧毁，但是互助如同互斗一样也是自然法则。在东京的中国学生，特别是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在宣扬平等主义、群众运动和包括暗杀在内的直接行动的同时，通过反对所有的权贵组织和所有政府（从这时起它本身已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用于中国的实践。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连同清教主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用公众意愿和自愿协会中的乌托邦式信仰摧毁既存制度的主张，都被主要城市中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所接受。

北大的新思想

思想革命之所以以国立北京大学(通常简称为北大)为中心，是由于北大在教育界具有最高学府的名气——其他由政府办的大学仅有两所，也是由于其新校长蔡元培于1917年所聘用的那批教员。作为一个传统的学者，蔡元培在二十五岁时便升入翰林院，但他后来参加同盟会，在德国研究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1912年在孙中山及其后袁世凯的第一届民国内阁中任教育总长。蔡在德、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后归国，即着手将北大从一所官办的培养闲职官员的学校变为世界上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竞争的学术中心。蔡元培于1912年提出的“教育高于政治……超越于政治”的响亮口号被袁世凯运用权力复兴儒学的努力所压制，它在将来还会再次受到政党专政兴起的压制。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的重建将会去寻求一种维护新政体的新的正统观念。但在军阀时期，政治制度的软弱（而不是处于多元法治之下的强大）使得思想自由以一种真正自由的方式盛极一时。蔡元培在北大鼓励提出各种完全不同的观点，甚至鼓励教师和学生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政治活动，由此而造成的思想界知识阶层的崛起与1911年的政治革命相对应。这场思想革命是由处于转折阶段中杰出的一代人保持下去的，这代人一般都生于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学方面打下根基后又在国外接受了西方文化。他们横跨两个世界——这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并以知识为依据，而不是出于无知来否定中国传统的正统观念。

蔡元培将一位最主要的革命新闻工作者陈独秀请到北大来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出生于一个殷富的官僚家庭，曾考取过功名，还到日本和法国留学，并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已

成为法国革命式的个人自由，即“自由、平等、博爱”的热情鼓吹者。他将中国的衰落归罪于儒学：儒学规定的家庭义务束缚了个人，而它对商业的轻视则使经济崩溃。在他于1915年创办的月刊《新青年》上，陈独秀号召中国青年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仅仅是想象的。”在北大，陈独秀继续编辑《新青年》，这本杂志成为开放性的讨论论坛。它刊载给编辑的信件，发行量多达一万六千份，激励了全国的学生阶层。

陈独秀在北大的主要志同道合者是更年轻一些的胡适，他也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官僚家庭，早年受过经学方面的教育。胡适在康乃尔大学转攻哲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学于约翰·杜威，他倡导许多革命者所宣扬的思想，即在书写语言中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明清的白话小说（参见第236—237页）和传教士的小册子已为用白话文写作铺平了道路。为反映美国诗歌中的“新潮”，胡适首先用日常用语写作中文诗歌。他和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为使用白话文写作辩护。

- 433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这场运动在《新青年》上发起，该杂志不久就全部使用白话文。

这场“文字更新”具有好几个目的：首先，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格式是为了与现代思想相一致。胡适宣称：“一种僵死的语言无法产生出具有活力的文学。”他对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的宣扬使他寻求精确的表达法——作为批判性思想工具的一种新的书面语言。第二个目的是要通过使文化更易于普通人掌握和通过创造一种直接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大众文学来对普通人施加影响。陈独秀要求摈弃“陈腐的铺张的”古典主义，提倡“新鲜的立诚的”现实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创造“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这场运动的另

一个目的是要通过消除曾“积蓄儒家伦理与道家迷信”的书面语言来解放个人。一种新的抗议文学不久便产生了，《新青年》于1918年5月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那个狂人确信人们要把他杀死并吃掉。他翻看一本历史书：“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更仔细地一看，他“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对旧社会的辛辣揭露是其作者鲁迅的典型文风，他的短篇小说和杂文很快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先驱。

这样，到1919年时，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来自国外和中国 434 传统的多种影响的交汇地。其他杂志也参加了《新青年》的讨论，在由此而形成的热潮中，当时所有在西方和日本流行的社会和哲学理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由于运用这些思想武器，对旧社会的全部批评支持着两位主要人物，即陈独秀所称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写道：“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思想和传播手段方面已为知识能量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大释放奠定了基础。

五四事件

“五四”这个词源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学生示威，但它用中文的数字表达法写成，一直是指约1917—1921年之间或更迟一些的整个思想运动。我们已提及了这场运动的开端。五四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方面的支配势力而问世。自从日本于1914年夺取山东和它此后提出二十一条

以来，爱国情绪一直在不断高涨。一些国家敦促中国于1917年8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使中国得以参与解决和平问题，以此来对抗日本在战时的扩张。但是，日本通过秘密途径已事先征得英、法、意同意它保持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一点似乎也包含在1917年11月与美国达成的蓝辛—石井协定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结束，这在西方激起庆祝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活动。但是既代表北京又代表广州的中国代表团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与威尔逊总统一样，不久便发现其自决和公开外交的主张并未能在东亚得到实施。1918年，事态有了进一步发展，北京的军阀政府签署了确认日本在山东地位的密约。中国年轻有为的外交官的观点未被采纳，中国公众表现出出乎意料的焦虑不安。数百个由华侨、学生、商人、教员、工会和政治团体组成的协会向巴黎发电报表示抗议。当学生们正对北京政府的秘密出卖感到愤怒时，巴黎和会决定让日本留在山东的消息传来了。5月4日，来自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签署一份宣言。随后举行的示威突然演变为暴力行动，学生们将一名亲日的官员作为“卖国贼”而痛打并焚烧一名阁员的住宅。

435 五四事件的历史影响来自于学生们随后进行的政治鼓动活动。北京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包括男生和女生的联合会。他们很快得到了全国新闻界和商界、孙中山和广州政府及军阀派系中安福系的支持。其他城市的学生以相类似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举行示威，开始抵制日货，在街上发表演讲争取支持。他们促使现代学者阶层——教授、教员、作家和记者们成立一个相类似的组织，以采取政治行动。5月底和6月初，学生的罢课使得两百多个城市中的学校关闭。在反日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学生们证明他们自己是一支新的政治力

量。坚信暴力的北京军阀政府在 6 月初动手镇压这场运动，将大约一千五百名进行鼓动的学生投入监狱，还将北大的一部分改作监狱。女生们此时作出反应，她们与男生一起走上街头。上海的商人们出于同情也关门停业，举行为期一周的爱国罢市。上海约四十个工厂的工人也由于爱国而举行罢工。这场由各主要阶级参加并在群众行动上达到新水平的真正的全国性运动取得了胜利，北京的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三名亲日的“卖国贼”官员被罢免，内阁辞职。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新文化运动

从五四事件的政治行动中，以政党专政为标志的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新民族主义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了，反帝斗争也展开了。与此同时，引起政治行动主义的思想热潮仍在持续，传播手段增多。人们热切地追求西方思想，更猛烈地抨击旧的弊端，并就新的社会准则进行辩论。由于缺乏社会和政治行动，这场思想运动在 1919 年 5 月 4 日之后的一年或两年中停顿下来，它被称之为“新文化运动”。作为其工具的数百种新办白话文期刊问世，尽管一些期刊只存在了很短时间。报纸也迎合了新思想及其对所有社会准则的再评价。包括西方译著在内的书籍出版剧增。通过这些方式，由三十多岁的青年教师和二十多岁学生所发起的这场思想革命从北大波及全国。出于各种目的而建立的团体遍及各地。第一流的外国学者前来讲学，约翰·杜威在中国呆了两年，他频繁地举办讲座，胡适经常为他做口译。伯特兰·罗素来华近一年，他宣扬国家社会主义，拥有大量的听众。

对旧的儒家等级制度和尊卑秩序的抨击否定了古老的

136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原有地位。这也否定了作为国家和家庭专制主义的三个与之相对应的道德标准——忠、孝、节烈。反儒教者抨击家长的霸道、包办婚姻和子女对家庭的依附。与西方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平等权利的运动相对应，妇女的解放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保守派人士打算将儒教定为国教，康有为仍像在1898年时所做的那样宣扬这一主张。这些人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对。儒家社会习俗的礼仪或规范被指责为加在个人身上的桎梏。以不平等地位为基础的社会和谐遭到强烈谴责。鲁迅写道，“中国的文化是为主子们服务的文化，而主子们的欢乐是以民众的悲痛为代价的。”

对儒学的抨击激起对中国古代遗产进行批判性的再评价，北大的那些“疑古派”学者重新鉴定经学著作的真伪。此时已退出政界的梁启超和胡适与其他人一起指导规模庞大的“整理国故”活动，在伟大的传统中去伪存真。因此，他们重新研究古代哲学家墨子、中国佛教史、白话文小说和清代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实利主义”所造成的幻灭强化了这种对民族遗产的珍视。从巴黎和会归来的梁启超确信西方文明在精神上业已崩溃，这种文明由于患了“精神贫乏”症，变得注重实利，并且萎缩衰败了。一系列的辩论围绕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是非曲直而展开。人们对宗教进行辩论，有人为之辩护，但众多的人对它进行诋毁。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于1922年在北京开会时，学生们已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宗教、反基督教运动。

随着思想和文化革命战胜了传统观念，它在其目标上出现分歧，在那些倾向于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进化的人和那些倾向于政治行动、造反和暴力革命的人之间发生分裂，人们部分根据他们的背景和个人脾性站到其中的某一边来。通

过实用的途径重建中国文明的领导者是胡适，他猛烈抨击各种“主义”——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包容一切的信条。相反，他敦促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用“溯源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问题。“没有一蹴而就的解放或一蹴而就的重建。解放是指从这种或那种制度、从这种或那种信仰、为这个或那个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循序渐进的解放。”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似乎不足以对付中国的问题，情感上也不令人满意。胡适的长期教育计划中没有短期的政治措施，它只能 437 产生要求军阀政府保障民权的自由主义宣言，但毫无用处。中国的个人主义拥护者们无法诉诸如同西方自由主义那样的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现成学说，后者源自西方关于天赋人权和法律至上的学说，而中国则缺乏与之相对应的能够支持真正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学说。相反，在军阀统治的中国，那些潜在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自私地”要求得到其民权之前就不得不去帮助创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因为他们还被要求对国家重新效忠。关注的焦点一度曾是如何使个人获得解放，但在1921年之后，焦点又回到更常见的问题上：如何使国家强大起来。民族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试图动员和控制个人及其文化活动的政治运动不久便再度兴起。

马列主义的传入

五四事件已经显示出学生们在为政治行动组织起来时所能创下的业绩。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很了解这种潜在力量，他着手吸收学生，将这项工作作为他重建国民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行动也对有浪漫性格的陈独秀具有吸引力，就在这个时刻，苏维埃俄国的榜样和学说以一种活生生的形式展现在眼前。如同一些主要的国民党领导人一样，新文化运动

的一翼不久便感到他们已找到了他们一直在寻求的行动纲领。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它自称具有“科学性”，而在那个时代，科学似乎是西方强大的奥秘所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为控制“生产资料”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动力，社会得以经过先后有序的阶段（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对于那些需要一个体系来解释“发展”和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简单化的学生来说具有吸引力。那种认为通过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能够避免阶级斗争和剥削的乐观信条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工业化、并刚接触工业化带来的所有问题的不发达国家来说尤具吸引力。而且，列宁关于革命先锋队——共产党，有纪律的思想精英的观念和他对殖民帝国主义应归因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原本旨在解决先进的工业社会问题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只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十分次要的地位，但是马列主义却是一种新思想。在1919年的中国，其救世主般的幻象由于苏维埃夺取政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而更加可信，它似乎将会提供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方法。在理论方面，马列主义提出了一种自相一致、具有普遍性和“科学性”的世界历史观，这使得人们能够用西方的“科学思想”
438 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西方，并将中国令人屈辱的落后状况解释为“资本帝国主义”（如日本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帝国主义”还与“军阀封建主义”相结合（如安福系）。在政治方面，列宁主义提出了新的、更为严密的关于建立政党组织的措施和夺取政权、动员群众和重建社会的方法——事实上，这是向西方世界借鉴政治谋略的最新步骤。最后，对于个人来说，列宁主义指出一条为了爱国目的

而勇于自律和牺牲的道路。

当这些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强烈时，它们正是在一个适宜的时刻开始起作用。此时，爱国热情正寻求用有组织的方式加以表达。中国在凡尔赛被“出卖”这件事为民族的真正敌人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证据。从此，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与反帝主义似乎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采取政治行动。李大钊这位十分关注中国农民解放的哲学教授已在《新青年》中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在1919年5月主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北京和上海的研究团体接受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一位曾在北大协助李大钊工作的湖南学生毛泽东于1919年3月返回长沙，领导另一个这类团体。）到1920年中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已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马列主义。9月，陈独秀会见其他人，计划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与其他11人于1921年7月参加上海会议时——现在这次会议被看作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规模不大的党支部已在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建立。

苏维埃对这个突然的进展所起的作用源于它作出放弃按旧沙皇的不平等条约所得一切特权的允诺，这一允诺引起广泛的亲苏热情。共产国际（1919年3月组成）的代表在上海帮助建立第一个拥有新闻机构、出版物和支部的共产主义组织，并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供帮助。在这一阶段，共产国际的实际知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战后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其中许多人来自湖南——于1921年在巴黎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位南开大学的毕业生^①周恩来成为从法国回国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人

①周恩来曾在南开中学就读。——译者注

中最著名的一位。

1921年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党组织的发展使知识分子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要么钻研学术不问政治，要么将学问从属于政治行动。胡适与陈独秀在经过四年的合作之后，他们于1921年初分道扬镳，他们就是作出这种抉择的代表人物。

439 不久，作家也面临相类似的抉择。如同在欧洲文艺复兴中一样，日常生活的书面语刚开始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作尝试性的应用。具有新风格和新主题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杂文、诗歌、戏剧和评论等还有待于中国语言方面的创新。人们已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但对此的研究还很少。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最能引起他们关注的事物是社会革命——旧制度的罪恶和为建立新制度进行的斗争。作家们相信他们的社会职责是教育民众，即教育他们的同胞们拯救中国。那些通常按英美模式独自追求浪漫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不久就在像鲁迅这样的具有社会目标的人面前相形见绌，后者希望像精神抚慰者那样来拯救他们的祖国。

早期最有影响的团体——文学研究会主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他们宣扬各种现实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翻译西方小说，奖掖新的有才之人，包括几位妇女。与之地位相当的另一个团体是由在日本的郭沫若和其他人组成的创造社，该社起初致力于彻底的、反叛的浪漫主义。它出版率直表达内心世界的自传体作品，作品中的性欲和爱国情绪等遭受阻扼，这通常使得主人公感到懊悔和负罪。但在20年代中期，创造社以同样的热忱转向马克思主义。正如郭沫若在关于他1924年的转变问题上所写的那样，“我此时能够理解所有我不愿接受的思想；我已经找到解决所有对我来说是自相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的钥匙。”——这句话概括了马列

主义的威力，预示了自由主义一个人主义者将文学作为纯艺术来对待的弊病。由于在新的条件下缺乏现代的传统和既成的艺术准则，作家们也许更乐意在革命进程中首先发挥社会作用。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乱达到顶点，为消除这种混乱的革命也兴起了。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国家统一，除此而外，革命在内外事务上还有其他目标。在对外关系方面，革命旨在废除外国接不平等条约所得到的特权，并消除其影响。每一个爱国者都是反帝分子，但在国内事务方面，各种利益发生冲突。通过工厂工人甚至乡村农民的群众组织，社会革命已具有可能性，但是，主要领导者最终转而反对社会革命，镇压群众运动，在民族团结和反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其权力。作为一个过程，革命在1921—1925年中期的准备时期内，首先汇集各种各样的要素，此后的两年形成高潮，然后 440 便退潮。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步骤，国民党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政体——政党专政已最终被用来取代王朝制度。条约体系也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它作了调整，以便让中国行使更多的主权，但以上这些发展半途而废。国民党的专政并未能牢牢地控制中国所有省份，使该党夺取政权的革命主要在城市进行，并未扩展到农村地区。同样，中国对主权的收复也未能废除治外法权，因此，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一样只取得有限的成果。

西方的影响也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论在通商口

岸的西方实业家还是在内地的传教士都无法对付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所有列强政府都无法为中国提供重建的模式，或指出为了工业化的目标而利用其新民族主义的方法。西方已协助摧毁了旧制度，但它此时怎样才能协助建立一种新制度呢？这个问题构成了1921—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外交和解的基础。

改约的缓慢进程

列强期望中国能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建成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由于所有条约都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达成的，而其中一国（中国）接受对其主权的限制，因此条约体系随时都可能崩溃。外国的外交人士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恢复中国全部主权的愿望上所存在的分歧并不如对实现这一愿望的速度和过程所存在的分歧为大。列强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努力是在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2日）上作出的，尽管会议作出的决定既没有包含制裁和施行方面的条款，也没有约束列强政治的义务，但它仍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可能使英国及英联邦^①卷入日美冲突的英日同盟在没有同样牢固的同盟取代的情况下被废除。其次，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目标——限制海军主力舰，因英、美、日之间的五:五:三的比率被接受而达到，其附带条件是英、美不得在新加坡以东和夏威夷以西建立海军基地。再次，日本同意撤出山东并撤出它在东北亚大陆地区的军队。1918年中期，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干涉使得协约国军队，特别是日本军队

^①原文如此，英联邦成立于1931年。——译者注

进入滨海省、满洲北部和东西伯利亚。这样，为了换取对它在西太平洋的海军统治地位的确认，日本在亚洲大陆上除了 441 朝鲜之外撤回到它在1905年时的控制范围之内。最后，《九国公约》正式宣布九国支持门户开放和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并通过召开有关中国关税和治外法权的会议来逐步废除条约体系。

作为这些协定的一个后果，日本撤出了山东，而英国则终于重新得到了威海卫。但是有关关税的会议直到1925—1926年时才召开，而且甚至到那个时候，该会议除在中国到1929年可以行使关税自主权这个重要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之外一事无成。与此相类似的是，治外法权委员会仅于1926年在北京开会，但未取得任何成果。由于缺乏有效力的中央政府，这阻碍了国际间帮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努力。土匪和军阀的暴行危及了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中国当局在履行其国际义务方面的无能削弱了它要求行使主权的权利。因此，中国的国内动乱阻碍了拟议中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修改。

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苏俄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的影响乃是西方影响的另一个方面。但与列强只是半心半意地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作一些渐进的改革不同，莫斯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国内革命的成功范例。早在1912年，列宁就已提出工业化的欧洲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支持那些可能由反殖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领导的亚洲民族革命。列宁在1920年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认为：正如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在其亚洲殖民地剥削廉价劳

动力、掠夺原材料来延长其生命一样，西方无产者现在能够通过“侧翼进攻”，即与亚洲资产阶级结盟以反对它们的敌人——“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是亚洲殖民地各国民的经济剥削者和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盟友。这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便适用于整个世界，这个理论在一种单一的宇宙论范围之内对中国政治的所有因素都具有历史意义。某一方的军事对手可以被诬为代表一个垂死阶层的“封建反动”的“军阀”，城市商人和中产阶级成员可以被划入代表历史上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此时这一阶段可能会被“超越”。在接受苏俄的援助和动员中国农民的情况下，一条由共产党内的“无产者”领导的“统一战线”能够形成。通过这一策略，“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可以被用来击败外国“帝国主义”，而与此同时（这一点是必要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可以在运动当中组织起来去夺取政权。列宁预见到

442 了很有选择余地的良机——亚洲的共产党可以在统一战线内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达成“暂时协议，甚至结盟”，或者它们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工农苏维埃”，并使之成为独立政权的中心。

这种在理论上的选择为列宁的继承者们所沿袭。托洛茨基主张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而斯大林则支持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个真正的政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因此斯大林不得不宣称国民党只是一个联盟或“四个阶级的集团”——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即后来所称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选择使苏俄对中国的态度具有内在的两重性——它或者可以强调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或者强调中国国内的无产者和农民苏维埃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派、地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的阶级斗争。在这两种策略之

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一些阶级反对另外一些阶级的联盟，如与“小资产阶级”结盟，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除了这种学说的灵活性之外，苏俄政府在公开的外交和革命颠覆活动两个不同方面对中国采取双管齐下的手法。在由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主管的外交政策方面，苏俄起初提出放弃前沙皇的特权。苏俄向北京派出了好几个代表团，于是引起艰苦的讨价还价，并事实上再度维护了前沙皇在东北亚的目标。1924年5月苏联最终与北京达成的协定规定共同管理中东铁路，苏联在外蒙古具有占支配地位的权势。同时，根据苏联的颠覆计划，共产国际的代表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发起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与北方的大军阀和南方的孙中山进行联系。此时，苏俄的事态使得列宁有必要于1921年推行紧缩的新经济政策——从共产主义“暂时倒退”。苏俄在孙中山及其追随者面前展示的形象就显得并不极端和可怕。

国民党的改组和与共产国际结盟

孙中山正在寻求一种能够从夺取政权向为纯朴的中国民众提供“政治保护”的文官政府过渡的政党组织，此时，苏俄的政党专政似乎是历史洪流的一部分，而1919年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则提供了一个不基于阶级斗争的政党专政的范例。五四事件激励孙中山着手复兴和改组国民党，新的规约、党纲和宣言于1923年元旦公布。改组在1924年1月该党的第443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完成。作为这一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逐步与共产国际建立了工作上的同盟关系。

孙中山是在好几种形势的推动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列强只与北京政府打交道，而在废除条约体系方面却几乎无

所作为。孙于1923年9月提出允许他的广州政府使用当地海关盈余款项的要求被断然拒绝，列强在广州集结海军舰只以防孙夺取海关。他多次要求西方给予援助，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他在国内的事业同样让人失望，广州的国民党残缺国会与北京的军阀国会一样濒临分裂。孙中山与当地军阀之间不和谐的合作已经破裂，孙被迫逃往上海。他需要帮助。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结盟意味着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1922年年中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赞成在并存或平等的基础上与国民党结盟，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共产党员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保持其独立的组织，而不是在政党之间结成同盟。这样，共产党人就形成了一个“内部政党集团”而不是一个“外部政党集团”。孙中山允许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时保留其共产党的党籍。接着，陈独秀也以与此相似的条件加入国民党，并被委以国民党的高级职位。其他人也仿效他们。

在苏俄的建议下，孙中山此时开始着手创建党的军队，派遣他忠诚的军事助手蒋介石赴苏考察军事。国民党开始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在1923年初返回广州之后，孙中山开始任命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他采纳一个精明强干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专门指导性意见，鲍罗廷起草了国民党的新党章，不久便建立一所政治学校向宣传员们讲授组织群众、争取他们支持的方法。按照苏联的模式，国民党此时建立起地方基层组织，再由基层组织依次选举更高级别（县和省）的代表直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各级均选举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则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的常务委员会此时能够通过“民主集中制”来控制一个集权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

在共产党方面，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对这种适宜的合作——“内部政党集团”式的联合以微弱多数予以认可，它同意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比如，作为共产党组织部门负责人的毛泽东曾一度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党的组织。但是党员人数不到一千人的弱小的共产党反对那种能使国民党过多地控制其党员的紧密合作。它此时的双重战略是在国民党 444 外发展其群众组织的同时从国民党内控制该党。

孙中山欢迎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他的党的态度既充满自信又讲究实际。他已看到学生们在组织工农方面是多么的卓有成效，几百名共产党员与数万名国民党员相比只占极少数。据说列宁在谈到孙中山时曾说他“无与伦比、纯洁天真，有人也许会这样说”。孙中山确信他的党肯定是俄国人在中国的主要合作者，而且他认为俄国人“不会被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人要弄的”。

国民党的思想和政党军队

为了能与新的政党机构相匹配，孙中山始终需要革命的思想体系。他在1918年及此后在上海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心理重建”的理论，这个理论包含“知难于行”的思想，承认革命到那时为止仍缺乏思想。在他的内心里，孙中山并不接受列宁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帝国主义的观点。他赞成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但他并不将这种斗争与各国内部的阶级斗争相联系。针对鲍罗廷要求国民党接受一种更为正规的思想的建议，孙中山反而提出了 445 他自己的经过修改的三民主义。在1922—1923年冬季那些漫无主题的讲演中，民族主义被强调为反帝国主义，而它在1905年时的含义是反满，在1914年时则被孙中山所忽视。民

族主义还包括汉族人民和中国各少数民族自强的思想。经常被译作民主的民权主义将人民主权论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区别开来。孙中山真诚地希望“使政府成为机器，人民成为机师”，但这只有通过选举、创制、复决、罢免等方式（以往的美国进步运动的翻版）来实现，但这些从未在中国推行过。由于孙中山明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点和重申他早期的以亨利·乔治所主张的单一税为基础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因此民生主义的内容仍最为空泛。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能够取得举国一致的核心。

与政党机构和政党思想同样重要的是经过教育的政党军队。蒋介石在苏联逗留四个月后回国，随即成为由一个苏联顾问团协助、设在广州附近黄埔的一所新军校的校长。共产党 446 党的主要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共产党人曾不断地渗入该部，但最终未能成功。不久，受训为孙中山思想而战的两个教导团组成了国民党的“党军”。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出乎意料地去世。他的形象成为革命崇拜的对象，这使人联想到对王朝创立者的那种祖先崇拜。他的著作成为“孙文主义”学说，为了继续他的事业，在革命正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之时，实行军事一政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于7月1日在广州建立，由孙中山的一个主要政治继承人汪精卫出任主席。

第三节 国民党夺取政权

工人组织

到1925年夏，两个革命政党——强大的国民党和弱小的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时机：爱国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富有战斗性的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汇合到一起。这些运动都有其自身的原因。五四运动已过去六年，列强仍然几乎享有它们先后获得的各种特权：日本在辽东半岛的租借地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南满洲处于支配地位。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英属开滦矿务局管辖中国最大的煤矿。在天津，租界地区仍由英、法、日、意等国治理。公使馆卫兵们仍在北京各处列队行进。上海的大部分仍由外国（主要是英国）纳税人通过上海工部局进行统治。华南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被香港控制。外国人仍然把持着海关、盐务稽核所和邮政局的最高职位，从这些部门获得的税收和收入主要支付给外国债权人。外国轮船和炮舰在远达湖南和四川的中国内河里往返行驶。许多现代的工业企业为外国人所有。

任何一个中学生都能在这幅令人屈辱的半殖民主义的图画上添加细节。在华北、华中和满洲相互争夺的军阀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其中一些军阀是半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引起反帝运动的因素在大的港口城市中——上海、广州、香港、武汉、天津——最为明显，新生的工厂工人阶级在这些城市中也高度集中。在中国，工厂劳动的罪恶已与人力的无限来源一样巨大：每天工作约十二小时、每周

工作七天，几乎没有节假日，非熟练的农民按件计酬，短工占很大的比例；童工与做母亲的女工们一起遭受剥削，她们需吃奶的婴儿经常就放在缫丝厂盛放沸水的大盆下面；对身体的过度危害；与中国包工头和外国经理、领班之间的摩擦；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家庭中的所有成年人都不得不去工作——这些条件使人联想起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它给了中国工人运动以内在的动力。

当然，一场现代工人运动需要新式的工人组织。在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同业公会中，商店老板仍然控制着工匠和学徒，只强调同业团结而不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旧式秘密会社也不适合于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强大的“青帮”和“红帮”始终停留在黑社会从事鸦片走私、卖淫、犯罪和敲诈保护费的水平。一些工人互助协会业已成立，其中大部分由矿工或铁路工人组成。但是，最强大的早期工会是由从事国际航运的中国海员在1914年之后建立的。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罢工浪潮席卷而来。此后，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和其他政治集团有组织的工作逐渐落到了共产党的后面。共产党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湖南、湖北和华北铁路沿线发动罢工。

到1925年，通商口岸的外国机构和各省督军在许多善于表达思想的中国公众看来已构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罪恶同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将这两种罪恶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敌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竞争的恢复，中国的实业家们更愿意去反对它们。在1925年初的上海，工会组织和罢工次数都在增多。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的商人抗议上海工部局的规章和“只纳税而无代表权”的待遇。工部局的英国巡捕于5月30日在南京路上杀害十三名示威者，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各阶级抗议、示威、罢工、抵制和富有战斗性

的反帝运动，这场“五卅运动”使以前所有的排外示威都相形见绌。6月23日在相似的情况下，广州的领事馆区沙面岛对面沙基堤岸上举行的示威引起黄埔军校的学生和英法军队相互射击，五十二名中国人被打死。接着一场长达十五个月的大规模针对香港的罢工和抵制运动发生了，导致英国在华南的贸易陷入瘫痪。这些偏激事件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事件和问题为学生骚动和为了伟大的民族事业动员各阶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共产党利用了这个机会，该党具有热情的年轻党员成为事态的中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人数到1925年末迅速增加到约两万人。共产党有希望夺取城市中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北伐与国共分裂

449

1925年五卅运动所造成的全国性反响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它还提出了关于革命最终目标的问题，并使在广州协同合作的各个性质迥异的组织之间的团结陷入紧张状态。在控制广州政府的雄心勃勃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支持下，共产党壮大起来。这使得国民党的右派处于守势。国民党右派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统一的、全民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它还需要有关民族团结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将具有多阶级的色彩，既要反帝，又要反共。对于共产党和控制该党路线的共产国际来说，要作出选择是困难的——要么冒被国民党压倒的危险，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要么仍然与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左派进行合作、反对右派，希望以此来离间这两派。共产党人正在工人运动中发展独立的势力并领导农民运动。

但总的来说，事件的发展似乎仍然证明国共统一战线是

正确的，斯大林决意继续保持统一战线。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继续保持统一战线，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左派在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大会在秘书处和组织部中保留了主要的共产党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人有七名（占20%）。这一安排得到了左派领袖汪精卫和主要军事指挥官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手下的黄埔军校学生已经在广州地区打败了当地军队，但是共产党为香港罢工和抵制运动组织了具有战斗性的组织，并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拥有武装、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中的政府。共产党的影响在国民党机构中和群众运动中扩展，实际上控制了海军。蒋介石于3月20日以自卫为借口在广州发动一场政变，驱逐了一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和一些苏联顾问，但同时又重申忠于广州—莫斯科同盟。这样，蒋介石在1926年春成为支持中国军事统一的主要人物。共产党再次面临是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还是转而反对它的选择。莫斯科再次赞同合作，正如蒋介石为了大规模的北伐而仍然需要与共产党合作和苏联的援助组成统一的革命力量一样，斯大林也需要与蒋介石合作，以此来作为驳倒托洛茨基的手段。

这场由孙中山长期策划的旨在打倒军阀和统一中国的重要军事战役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即超出在广州进行地方斗争的范围和扩大政府的征税地区。北伐于1926年7月开始，它以新近受训的宣传人员为先导迅速推进。当到达长江时，
150 北伐军已消灭军阀的约三十四个军或师。国民革命军尊重人民，受到了欢迎。只有一个团最终被证明是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在军队中广泛建立。1926年底，仍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命令共产党仍留在国民政府之中。因此，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内部的政党集团”，

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利用农民骚动和建立独立的军事势力。

随着北伐于1927年春继续成功地在华中地区步步进逼，国民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军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结果以其行动进行纯政治的控制越来越行不通。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反共观点不久就导致了一场分裂：首先，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军方人物联合国民党右派转而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接着国民党左派又转而反对共产党，并最终与右派重新携手。这样，旨在争取统一和新政治秩序的国民革命运动清除了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具有分裂性的共产党纲领。

这些事态的发展出现在蒋介石移兵于长江下游、占领上海周围盛产稻谷的地区和工业基地之后。就在这个关头，北京当局袭击苏联大使馆，获取了有关颠覆活动的证据（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事后被处决）。接着在上海，蒋介石的军队于4月12日在外国的赞同下支持当地反共势力突然发难，用恐怖手段摧毁了共产党武装组织并镇压了工人运动。

4月18日，蒋介石无视武汉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部分委员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政府。在这场危机中，莫斯科仍指令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执行斯大林的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路线。但是，国民党左派终于醒悟和警觉起来，它于7月份与其共产党同事们决裂并驱逐他们。8月1日，共产党军队在南昌举行的暴动开始了两党之间公开的内战。共产国际指责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采取导致失败的“机会主义”，“完全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陈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沦为斯大林错误判断的替罪羊。）毛泽东在1927年2月的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倡导与莫斯科在那个时期的指示相反的农民暴动，他这时在湖南领导了所谓的“秋收”暴动。这场暴动很快被镇压，共

产党在汕头和广州发动的暴动也都失败了。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或被杀、或在城市中转入地下、或被迫下农村。

451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来说，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家和实业家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左派讲和，并将他们在南京的政权建成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大门已经敞开了。军阀政治还没有被消灭，但中国比它在过去的十年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致力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重新维护民族尊严的政府。

革命与外国列强

列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猛醒所作的反应是对它的要求作出让步和予以承认。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国人增补进上海工部局，市立公园终于对中国居民开放，上海公审会公廨被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地区法院所取代。列强于1926年允许广州征收它们于1923年曾拒绝让孙中山征收的海关附加税。英国放弃了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

1925—1927年的战斗迫使大部分新教传教士从内地撤出，同时一支四万人的各国军队集结起来保卫上海。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3月攻占南京时打死六名外国人，英美军舰进行了保护性的炮击，但后来这件事得到解决。考虑到当时的情绪和恐惧，中外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微乎其微。尽管上海的外国人团体指责中国的排外主义是莫斯科的一个阴谋，但与英国一样，美国国务院严守中立，不受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困扰。西方列强几乎既没有阻止苏联对革命影响的加强，也没有促使它的削弱。

1928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攻占了北京，并将它更名为北平。到1928年底，国民政府已获得国际上的承认。满洲的

“少帅”（老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使东三省与中国其他地区形成政治上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在名义上完成了。在那些曾主要留学西方的新一代“留学生”的领导下，政府努力增强国力，废除不平等条约。主要列强仍享有治外法权，但南京颁布了新的法典并达成新的条约，从而将许多较次要国家的国民置于中国司法权之下。关税自主到1933年完全实现，此外对海关、盐务稽核所和邮政局的控制权也全部收回。外国租界从三十三个削减到十三个。

国民政府在取消条约特权方面充满活力的外交政策在1931年之后有所削弱，因为日本新的侵略使中国和西方列强出于防御的目的，共同对保持西方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感兴趣。由于南京转而反对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面临着日本的侵略，因此它降低了攻击外国特权的调门，并发现了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加拿大人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这些外国人仍以特权人物的身份在中国生活，管理大学、医院、银行、商行和投资。452

回顾一下共产国际在20年代的战略，它似乎没有成功的机会。像在欧洲那样为夺取政权而建立的城市工人的政治组织在中国仍然微乎其微。工会只能在少数几个港口城市中发展势力，而这里新的国民政府的领导力量和外国势力也最为集中。由于没有本党的军队，共产党无法夺取城市。而且它无法从国民党的内部来搞垮该党，因为共产国际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苏联模式的集中的政党结构，所以难以颠覆。同时在20年代，共产党也没有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大部分农民。在共产党如此弱小和缺乏经验以及莫斯科的指示来自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远方的情况下，共产党的胜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从其胜利中得到了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的、至关重要的结论：国家的政治权力基本上依赖于以工业

为后盾的职业军队。他们看不到农民组织所具有的潜力是政治权力的另一来源，看不到它也有能力对军队提供支持。这是比共产党人年纪更大的整个一代人的观点，他们与城市和地主的关系比与农民的关系更紧密，他们的志向并不包括乡村中的社会革命。

第四节 南京政府的十年

南京时期——从1928年到1937年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进攻——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面向西方世界，但不幸的是，西方正被自身的问题所困扰。在这十年中，苏联兴起了斯大林主义，美国发生了大萧条，德国则产生了纳粹主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受到来自东亚以外地区的制止。因此，南京在三种主要影响力之间——在广泛而又有些肤浅的与西方的联系、日本正在进行的侵略和中国农村中尚未解决的问题间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国民党政权从现代西方和中国的过去寻求推动力，但它却在两者之间不知所措。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及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所遭受的挫折可能是那些很迟才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进行现代化的新民族的典型特征，旧的政体和传统似乎已崩溃，而西方模式又不适应于当地情况，因此，爱国领袖们对这两者所寄予的期望是徒劳的。

453 国民党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现代管理和经济在相对的意义上处于小规模、不发达的状况。甚至在南京统治十年的末期，四亿或五亿中国人所拥有的现代公路的长度大约与二千五百万人口的西班牙相等，所拥有的铁路长度不如意大利

或伊利诺斯州，所拥有的电报线路不到法国的三分之一，其工业生产也低于八百万人口的比利时。

为了寻求促进中国民族发展的途径，30年代的这一代人在极大程度上模仿西方的模式，因为日本和苏联都不是友好推动力的发源地。对西方模式的依赖使南京与西方之间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有助于解释这个政权的浅薄性质。其现代化的计划近乎于西方化，这是因为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官员们很自然地将他们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加以应用，他们照搬工业化国家的行政体制、技术和对生活的价值观，而工业化国家中农业的落后和农民的不满并不是占支配地位的问题。结果，南京经常对于现代金融、外贸和交通通讯比它对于本国的内地更加了解，政府中具有现代观念的官员在乡村中很少感到是置身于自己的国家之中。

国民党的软弱还由它夺取政权的方式所造成。它首先将那些被攻占地区的在职官员拉入党内，接着便屠杀共产党内更为年轻、富有理想的对手。一旦掌握政权，国民党就放弃了它曾用来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维埃式组织，该党转而反对学生运动，不再详察地方行政，而且丧失了使命感。总之，该党成为官僚和反革命派的一翼。

蒋介石

尽管君主制在二十年前就寿终正寝了，但是中国政治仍需要有一个唯一有权作出决断的最高当权者。不管是总统制还是制衡立宪制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统一（反军阀）和抵抗（反日）是当时压倒一切的需要，当权者必须是一个军事领导人，这个职位非蒋莫属。蒋介石是一个献身于爱国事业、具有坚强意志和决心的人。他在政治上富有计谋，但在

思想上存在落后的局限性。除他早年在浙江受地主家庭熏陶和对曾国藩执着的敬仰之外，他又接受了一些日本士官学校的武士道思想，后来又在军队激战时期获得了军阀政治的经验。蒋介石从苏俄所学到的更多是有关军队方面的知识，而不是有关群众运动方面的知识，他相信与军事力量相抗衡时动员群众毫无用处。无论如何，他面临着所有当权者一直面

- 454 临的问题：如何继续掌稳大权。对付所有可能的对手就需要不断地、小心翼翼地对人事和物力加以控制。蒋的双重任务是在保住最高当权者职位的同时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1927年，蒋介石与卫斯理公会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孙中山遗孀的妹妹宋美龄结婚之后，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卫斯理公会教徒，并通过他的妻子、他的内兄宋子文（哈佛大学毕业生）和他的姻兄孔祥熙（耶鲁大学毕业生）与西方保持联系。蒋介石委派这些具有美国背景的亲戚担任最高财政职务，委派那些具有日本背景的老同事担任军事要职。在政党政治方面，蒋介石作为一个门外汉而不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党维护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与党在早期留下来的国民党领袖，特别是左派的汪精卫和右派的胡汉民进行合作并从中进行离间。1927年，蒋介石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与他们中的一人合作来反对另一人。在此后的三年中，他与胡汉民进行合作，使汪精卫处于无权的地位。当胡汉民和汪精卫于1931年联合反对他时，蒋介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表明他作为一个抗

- 455 目的军事领导人是不可缺少的。随后，蒋又与汪精卫携手四年。胡汉民死于1936年，蒋介石于1938年成为国民党领袖。曾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在1935年被刺，但幸免于难。他在1939年显然由于个人和爱国方面所遭受的挫折而投靠了日本人。

终于，“委员长”（外国新闻界对蒋介石所使用的头衔称

呼）的最高权力建立在军队、政党和政府这三根支柱之上。蒋介石在以上三个方面用他个人的官僚集团与地方或对立的集团相抗衡。军队由曾是他在广州的学生组成的“黄埔系”军官占支配地位，他们控制了众多的军事官僚和军统特务组织，并在与桂系军队和其他地方军队的抗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党内，蒋介石依靠以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为首的“组织系”（通常称之为“CC系”）。陈氏兄弟加强了培养文职人员的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秘书机构和组织部，握有人事档案、财源和中统特务组织。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政学系”，这是一个由那些与实业界有联系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组成的结构松散的团体，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梁启超的“研究系”发展而来的。

国民党从未能够对其党员实行严格的纪律，该党党员的实际人数保持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人之间。在其权力结构中，党员队伍的逐渐扩大被权力向最高层的不断集中所抵消。1924年该党一大有一百五十名代表，1945年的六大则有六百名代表，包括了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4年成立时拥有二十四名正式委员和十七名候补委员，但到1945年，正式委员的总数为二百二十二人，候补委员的总数为九十人。由于它每年只召开两三次会议，所以权力集中到它的常务委员会的手中，常委的人数起初为八人，但后来增加到五十人，常委会一周左右开会一次。不存在忠诚的反对派这样的组织，其趋势是将所有重要人物都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并使他们与领袖建立私人关系。由于是政党而不是人民在“训政时期”（1928—1948）控制政府，因此通常作为政府之首的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党的一些部——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海外部——行使中央行政系统的部分职能。这样，政党和政府相

互渗透，实际上已无法区分开来。因此，中国对政党政府所作的首次尝试在许多方面仿效王朝政府——分立的各部和文职官员只是在最高层才形成一个整体；它处于一个从具有法定权力的常设团体（政党）中推举出来的统治者的领导之下，这个统治者受到各级公开的和秘密的管理监督人员的支持。

456 军国主义的发展

日本的侵略使得军事防御成为当务之急，并转移了对国内改革的注意力，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点尽可以不吝笔墨。当日本军国主义在经过十四年（1931—1945）持续的侵略之后终被粉碎时，中国政府或当时所存在的政府在重建国家方面除了军国主义可资利用外几乎一无所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已迫使它走上同样的道路，消除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影响，并毁灭了所有用渐进主义、改革和进化主义来解决中国人民的问题的机会。

人们一方面无法否认以上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家而崛起的国内原因。在1927年决裂之后，南京采取非阶级斗争的方式致力于统一和民族发展。所创立的国民党工会（共产党称之为“黄色”工会）被用来对抗左翼工会，但农民协会被普遍镇压。在放弃了在乡村地区动员群众这个力量源泉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在对等的地位上与残余军阀进行激烈对抗。1929年为遣散过量的军队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军阀政治只是在缓慢地消亡，军事统一从未实现过。国民党的反蒋派聚集在广州，而在云南、四川、山西、新疆和其他省，当地军队的指挥官们只是在口头上听命于南京。共产党人在1934年前的江西和此后的陕西建立了地区性的对立政

权。日本人从1931年起在满洲、从1933年起在热河和河北部分地区建立了外国的地区性政权。中央政府的军队以国家统一的名义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年复一年地进行作战或谈判。南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相对的成功是蒋介石的成功，在蒋的领导下，国民党的军队成为一个在创建它的领袖领导下的准政府，而不是一支由国民党控制的苏式政党军队。

在1927年停止聘用苏联军事顾问团后，蒋介石转而聘用德国顾问、寻求其援助并实行与日本相类似的德国军事组织形式。总参谋长拥有自主权，与受行政院领导的军政部长各成一统。国军不受文官政府节制，也不受立法机关的制约。军事委员会出于经济、政治以及严格的军事目的，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部。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没有接受进一步训练的情况下把持了高级的职位，并在预算之外花费了大部分的政府收入。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中央军很快发展成为拥有三十万人的第一流军队，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长江三角洲构筑工事设防。兵工厂生产德式武器。德国专家颇有建树，虽然他们没有想到与农民的合作或最终发生采取军事行动和制造“焦土”的战争。457

经济

在南京政府时期，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那些不同程度的“极权主义”国家——纳粹德国、苏联和日本提供的。但是，试图与不受控制的军方共同制定预算和决算的国民政府从未彻底地控制其财政——更不用说控制国家经济——以推行发展计划。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萧条和“新政”上，它到那时为止还不具备有关政府间的外援计划的想法。

财政是政府经济工作的第一个要点。三十多家外国银行

在通商口岸营业，它们垄断了外币兑换，在某些情况下发行本行的货币，办理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和投机者的私人存款业务。有时它们拥有上海白银储备的一半，而白银是这个城市的基本交换媒介。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拥有五亿美元资产的汇丰银行。上百家属于政府、省和私人的现代中国银行发行大量不断贬值的货币，主要为短期商业交易提供资金或对政府部门放贷。

为了给革命提供资金，国民党于1924年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该行总裁。从1928年起，它在上海行使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和政府国库的职能。不久，中国银行（其前身是1905年创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于1907年）和中国农民银行（1933年）也成为与之地位相当的银行。这四家政府银行此时垄断了货币发行，形成了由四部分组成的欧式中央政府银行，它们拥有全部现代中国银行所拥有的资本和储备金的五分之二，吸收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

到1933年为止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进行了一场财政革命，他收回关税自主权、提高关税、废止厘金税、取消古老的货币计量单位——银两。这些改革使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处于政府的财政影响之下，并使政府有可能逐渐地控制信贷。从1934年起，美国的白银购买计划造成中国白银通货最为灾难性的外流。出于自卫，中国于1935年进行币制改革，用法定纸币代替银币，用外汇储备作为支持纸币的部分储备金。这个努力是为了稳定中国货币在国际上的价值，从而建设一个独立于外国列强的银行体系。

458 尽管在现代经济方面取得进展，但事实证明甚至通过信贷合作社或1937年建立的农本局，也几乎不可能使农业人口获得贷款。乡村银行信贷仍不得不用于满足具有季节性的短期需求，而不是用于长期的生产性投资，而且它只不过是用

来对抗旧式放债者的高利贷。许多完善的乡村计划已拟定出来，其内容从垦荒、重新造林、灌溉、水利到病虫害防治、种子和工具改良、作物的耕作和动物的繁殖等无所不包，其中一些计划已开始实施，美式的农场扩展工作着手进行。但没有任何持久的努力能够达到在全国乡村中广泛提高农民生产率所必需的水平。

政府财政表明其活动同样集中在现代的通商口岸经济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状况是由以下这个重要事实造成的：南京政府本来就无力控制内地的广大地区，于是它已放弃征收地税的权利，听凭省级行政当局享有这种权利，乐得以此做个人情。南京对这种曾是大部分朝代主要财源的税入的放弃表明它倾向于避免乡村问题的困扰，南京政府另辟蹊径从海关得到其收入的约50%（相比之下美国约1%）。此外，它通过加强对诸如烟草、煤油和面粉等日用商品征收间接税和通过垄断食盐来对消费者征税。由于不征所得税，这种税率递减的税收给普通消费者带来了与富人同样沉重的负担，导致大众购买力的下降。持续出现的赤字通过向四家政府银行借款来弥补，借款额占政府支出的25%。这四家银行轮流在国内市场出售债券，这方面的银行债务不久便超过了尚欠的巨额外债，支付这些债务的利息占总支出的约三分之一。国内的债券持有人包括许多南京的官僚，他们经常能得到高利率（若考虑到他们在买进债券时得到的折扣，利率可高达20—40%）。这种在中国国内由中国人获得的不义之财与外国列强在1901年之后得到的巨额赔款相比无疑并不那么令人憎恶。但是，南京的政策并不鼓励国内的生产和国外的投资，也没有为长期的工业发展筹集到资金和投资。国家的资本并未投入，而可用的财源主要用于支付军费或使马克思所称的“官僚资本家”获利。

文化生活与美国影响

- 尽管生活在镇压暴动和侵略迫近的阴影之中，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自认为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继承人的中国人仍分为两个主要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前一派的代表是那些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他们提倡科学、技术，学术与政治相分离。后一派的典型人物是那些主张采取行动的作家，他们努力创造一种社会革命的文学。
- 在文学界，鲁迅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激励青年作家、谴责国民党的检查制度和对左翼文学的迫害，与此同时他还对左派降低了的宣传标准深感痛惜。他断言：“好的文学作品从不依照别人的指令写成。”作为一名反对社会不公正的叛逆者，虽然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但他热诚地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1930年，他与其他人一起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广泛的组织及其所属的出版物和所采取的辩论术标志着在新近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共产党人跻身于文学界的开端。国民党既无法阻止这一发展，也无法与之相抗争，它日益促成青年学生世界观的形成。
-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改革影响在那些非革命的知识分子派别中最为强烈，这些知识分子受过外国教育，在学术和科研机构工作。十余所教会大学的收入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并在当地受到中国董事会的控制，华籍教员占三分之二，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接受外国教育。教会大学虽仅拥有六千五百名学生，而约一百所政府的高等院校拥有四万一千名学生，但是教会大学仍然是教学、生活水准和社会生活的典范。像北大、清华这样庞大的国立大学也拥有许多受过外国教育的教职员，其中大部分受过美国教育。美国的影

响在地质调查所、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的十几个研究所、南京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北平的由洛克菲勒资助的协和医学院以及那些得益于美国开拓性工作的国家卫生机构中也同样显著。这种机构的发展是在西方培养中国学生的结果，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在1901—1920年之间约二千四百人，在1921—1940年之间为五千五百人。他们在总共三百七十所大学中学习，所学专业主要是工程或商业经济等实用专业。回国后在上海的公司或南京的机构或像刚才列举那样的机构中工作的、受过现代教育的毕业生是新的精英；他们生活的物质水平和知识水平比贫困而没有文化的中国乡村要高得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新一代受国外教育激励的中国学者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具有开创性的成就，例如发现“北京人”和商代在安阳的都城（参见第5页和第19—20页），找出前所未闻的建筑遗址，出版和利用清代档案，并将一般的现代科学词汇和概念引入汉语。

那些仍然热衷于传教的传教士们对中国问题所作的反应也体现了许多现实的态度。1900年代表二十八个团体的约一千名美国传教士，到1930年已增加到代表六十个团体的三千多名。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此时要做的工作是将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本土化，即由中国牧师来主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外国传教士只是提供咨询和协助。随着基督教青年会更加直接关注社会服务而不是侧重于福音，它吸引了一些精明强干的中国年轻领导人，并在工厂工人中推行识字和社会工作计划。基督教的同情心还以其他形式予以表达，1920—1921年的华北饥荒导致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成立。到1936年，该委员会在地方政府的合作下花费五千万美元外国资助在受灾地区实施开拓性的乡村改良计划——挖掘水井、修造道路和河堤，并在华北建立拥有约二十万名成员的 461

农业信贷合作社。由于基督教会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对社会福利表示关注，因此，1922年由各教派参加的新教会议设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一方面是为了传播社会福音，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强“本土的”中国基督教教会。除了在城市的计划之外，这个团体开始推行一项乡村计划，鼓励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因此，到30年代，基督教传教团正着手于“乡村建设”问题。

这个运动的先驱是身为耶鲁大学毕业生及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的晏阳初。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充分支持下，于1926年在北京附近的天津开始工作。在这里，他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外国的资助下开始着手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倡导采用农业科学和普及基础教育。不久，该组织便正视农业信贷、销售、合作社和农民协会等问题。当最后这种组织与文化相结合时，它就能够反映农民的疾苦，并最终会提出关于土地使用权和地方政治等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们的渐进方法与地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那些地方当权者是以前“土绅”的残余，他们此时经常在军界头面人物或秘密会社的军事支持下施展权势。因此，“乡村建设”对现状形成了威胁。

出于本能，政府当局采取行动来控制和利用它。蒋介石
462 通过与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的蒋夫人，邀请美国传教士在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江西部分地区的农民中建立一个模范县政府，但是宗教或社区工作在如此贫困的地区几乎毫无进展。蒋介石通过发起新生活运动来实施他自己的复兴中国的计划，他强调古老的道德品行——礼义廉耻，并使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方法。该运动在1934—1937年间通过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个分会的组织网对公众进行指导。这场运动的后盾是蒋介石的以欧洲法西斯主义为样板的秘密蓝衣社组织，它

在蒋的领导下为国家的军事化服务，但公众对此并不知情。

这一时期在公众基本未觉察或数字资料基本未作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乡村社会仍在迅速瓦解。住在成百万个村庄中的广大中国农民仍处在国民政府或传教士改良工作的影响范围之外。乡村手工业者此时正受到工厂生产的强大冲击。被无情地卷入货币经济的农业仍投资不足。耕作者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他们无法储存其谷物、改良种子和工具或向高利贷者借钱。乡村中的贫困状况和道德败坏更加严重，而在很大程度上仿照西方重建乡村的非共产主义对策与计划仍显得散乱和无效。无论如何，乡村建设的希望被侵略和战争所扼杀。

第五节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在满洲和中国的反应

中国东北部的满洲是一个广阔的新边疆地区，其面积占中国本土的四分之一，但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弱。部分由于华北地区的移民进入，其人口从1900年的约一千一百万增至1930年的三千四百万，共增加了三倍，其中95%是汉族人。但在满洲的日本军队具有帝国使命感，国民政府的兴起及其根据满洲在种族上、历史上和法律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这一地区提出的具有爱国主义的要求与日本关东军暴烈的军国主义发生冲突。当日本军官1931年9月18日策划了“沈阳事变”的时候，中国所作的爱国主义反应和抵制导致在上海外国租界之外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1932年1月28日一

3月3日)。七万名日军在交战中遇到中国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之后，双方接受停战，而不是扩大战争。但与此同时，
463 满洲的一场成功的政变粉碎了国联的集体安全体系。无论是国联还是美国对通过武力获得利益的“不承认”政策此时都无法阻止日本扩张的势头。

注意到夷狄依靠汉族人的帮助征服中国的古老传统，日本人在满洲建立了一个由日本顾问间接控制的傀儡政府。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宣告成立。不久，前清年幼的皇帝溥仪登基为帝。当地的中国人被编入宣称“民族独立”的“自治委员会”。这个捏造出来的独立国在列强不承认新政府的时期内排除外国势力的做法提供了合理依据。满洲国的军队纲领强调工业化，给新公司颁布执照的特别动机是吸引私人资本。在一个中央银行的体制下，急需的货币统一得以实现，通讯、运输和水电得到迅速发展。战略铁路向满洲与苏联的边界延伸，以前为竞争而修筑的与南满铁路相平行的中国铁路被纳入一个单一的体系。所有这些在满洲形成了一个与日本国内相竞争的工业基地，它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日本的经济收益微乎其微，但是这个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陆基地满足了帝国的荣耀感，也为其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既得利益。

日本人坚定地向华北扩张，在长城以南的北平与天津之间建立了非军事区。在这一地区，中国傀儡政权鼓励向华北输入走私货物和毒品。1935年，华北按协定被划为中立区。日本官员试图策动一场将华北五省变为充当傀儡的“华北国”的分裂主义运动。这一努力在12月份北平学生示威面前失败，这次示威揭示了南京的窘境——何时何地用武力抵抗。

中国在沈阳事变后以抵制为形式的非军事对抗非常有力，它波及到全国和海外，禁止销售日货，甚至禁止与日本人的银行或商行打交道。在学生和商人的大力推动下，国民

党对抵制运动进行了协调。这次运动在通商口岸秘密地进行，必要时还使用恐怖手段。在其他地区，它通过群众集会、宣传、审查、罚款和对作恶者进行惩处来推行其纲领。日本对中国本土的出口下降了一半。日本的侵略激起全民族的反应，从而在公众参与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但是，南京对非军事抵抗和准军事(游击战)抵抗的效力表示怀疑，国民党的兵器专家们知道没有武器的民众是无力阻止日本的坦克和飞机 464 的。这种看法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得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常识和军事观点的验证，然而，它忽视了后来在许多国家中所显示的力量——当民众被动员起来支持和配合常规火力时所具有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在建设他那参战前接受德国训练的军队的战略方面表现出传统的智慧。在1931年之后的几乎六年里，他施展手腕和谋略，运用拖延、谈判、让步等方法，避免与日本摊牌。显然，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需要。但是除了他的新式军队，蒋介石在使用群众组织动员全民族方面几乎一事无成。相反，他反对共产党用来团结农民斗地主的阶级斗争。他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使用他的新军，因此在1931—1934年之间发动了五次反共的“围剿”。南京与中国反叛者作战而不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方针引起非共产党的爱国者的愤怒，他们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到1936年，共产党人经过1934—1935年以江西为起点的长征而存在下来，此时在西北地区拥有一个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1935年8月建议组成第二次统一战线，这一次是为了保国抗日。这一次策略转变的目标是为了消除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消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1936年后期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和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缔结加剧了侵略的危险。蒋介石于12月在西安被来自满洲的中国军队用武力劫持或“绑架”，因为他们更愿意去抗击日本

而不是消灭共产党反叛者。周恩来从中斡旋，使蒋获得释放。从此，第二次统一战线逐渐形成。

第二次中日战争

日本于1937年7月7日首先在北平附近、然后于8月在上海发动的全面侵略实际上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在中国持续了整整八年，比在欧洲进行的这场战争还长。在到1941年12月8日为止的头四年里，自由中国孤军奋战，而孤立主义的美国直到1941年中期仍带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向日本的战争机器出售必不可少的石油和钢铁。到那时为止，国民政府及其领袖既表现出令人鼓舞的顽强精神，又反映出曾体现在南京统治时特征的那些相同的局限性。这个面向对外贸易和对外关系的政权逐渐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并被困在内地，而它对于内地的问题几乎还未开始予以正视。蒋介石正确地预料到日本的狂热侵略将会或迟或早地使其他列强对中国提供援助，战争成了对耐力的考验。在上海，国民党的新式军队经过战斗阻止了日本人的推进，但损失惨重。他们在1937年末受到侧翼包围，便向西撤退，“用空间换取时间”，并使用“焦土”战术，摧毁了许多无法运往内地的工业设施。国民政府于1938年在汉口作短暂停留后迁往长江峡谷上游、位于四川腹地的重庆。许多兵工厂和工厂、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团体虽然还没有迁出日本飞机空袭的范围，但都完整地迁到日本坦克打不到的地方。
465

被占领的中国部分不久便由两个傀儡政权分而治之，每个傀儡政权都拥有自己的货币。在华北，日本军队利用铁路作为进攻路线，攻占城市。除了铁路网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游击战在此已初具规模——之外，日军已相当快地粉碎

了抵抗。华北日军通过在北平建立一个叫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政权而在与华中日军的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华北日军起用军阀时代亲日的旧人物充当傀儡。他们在反西方、反共的新闻宣传和学校教育中敦促恢复传统美德和泛亚合作。⁴⁶⁶ 在华中，日本也于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充当傀儡的维新政府。在广州和汉口于10月陷落之后，日本宣布建立它的东亚新秩序——用日本的霸权取代西方条约体系的书面计划。这一行动诱使那个不得志的爱国者、曾留学日本的汪精卫通过背叛重庆和蒋介石来寻求和平。1940年3月30日，经过多次谈判之后，汪精卫就任在南京重组的国民政府首脑。该政府在形式上是前国民政府的复制品，在名义上由“正统派国民党”——随汪精卫一起叛逃的那部分反蒋的国民党人团体——进行控制。这些在北平和在南京的傀儡如同满洲国一样以武力为靠山，骗不了任何人。但是正如不久以后的欧洲那样，侵略者占优势的武力使得城市中的抵抗成为自杀性的行动，而且也使得通敌几乎不可避免。此外，通敌者甚至能够在征服者手下做事以减缓其残暴，因此，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爱国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相对轻易地找到合作者和统治中国大片地区这件事表明，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做好了进行群众性抵抗的准备。

在日本侵略尚未染指的西南地区，国民政府在这片欠发达的内地存在下来。这使它卷入与共产党的对抗。从1937年中期开始了又一个国共合作时期，也开始了几乎不加掩饰的对抗。不久，国民党便看到共产党从战时的社会变革中，特别是从动员群众和武装农民中得益更多，它转而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打击这种发展势头。最终达二十万或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统一战线仅作为一种表面的团结而延续下去，以掩盖两种拥有武装的政党专政是争夺⁴⁶⁷

最高权力的对手这一事实。

国民政府在避免乡村中发生社会变革的同时，采取措施来巩固其政治权力。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知名人士中选出的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建立。尽管它仅被授予咨询权，但它迎合了关于代议制政府的要求，政府对该会提出的质询并非必须作答。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从1939年到1947年建立了与国民党并立的金字塔式的组织。但是，随着这些不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团员年龄的增大，该组织成为国民党的竞争者，最终又不得不被吸收到国民党内。在重庆设立的思想灌输工厂——中央训练团从全国各地招收一批又一批的各种地方行政官、军官、教授和行政管理人员，每一批受训人员经过两到三星期安排紧凑的听课、做体操和进行其他操练，领会国民党的原则，并能听到党的领袖讲话、目睹其形象。同时，于1939年在地方政府中推行“新县制”，旨在活跃县级的经济和福利活动——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也旨在恢复古老的相互负责、相互监督的保甲制——这个制度在维持地方秩序方面确有作用。这一制度的恢复，通过对村级行政机构中保长的选举反映了“自治”的特征，但几乎没有留下有关偏僻的乡村选举过程的记载。

所有这些措施如同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屈不挠的重庆战时行动一样，暴露了思想的贫乏。国民党的元老们仍然把持着权力，军事委员会越来越多地接管了文官政府的职权，曾一度拥有多达五百万现役军队。然而，对这项大规模工作的思想领导仅局限于蒋介石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所提出的贫乏的思想。它的第一个主题是反帝国主义，强调外国侵略所造成的屈辱和不平等条约的种种罪恶。不管人们是否同意现代化的许多挫折都是在西方牺牲中国的情况下造成的观点，爱国主义的不满情绪仍溢于言表。第二个主题是蒋介石

关于恢复儒家的社会秩序和个人对国家严格依从的古老美德的建议。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主张在一个宏大的规模上为国防而实现工业化，并为使农民成为务农的士兵而实现集体化。

持续的通货膨胀对那些从“下江”来的政府文职官员们来说等于雪上加霜，这些人已移居到战时住房拥挤、消费品短缺的四川。通货膨胀通过缓慢的扼杀过程吞噬了他们政府发的工资，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水准。尽管四川是具有大量食物 468 补给品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但政府并不能成功地推行税收制度而主要依靠发行货币来满足其财政需要。因此相对而言，乡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并未受到影响，但使城市靠工资生活者——自由中国的全部现代要素——遭受通货膨胀的压榨。白领工人的工资从来都是入不敷出，书籍、服装和家具都用来换取食物。营养不良导致皮肤病、胃病和肺结核，贫困使许多人走上堕落的道路以委屈求生。极少数实业界的特权人物宁愿囤积商品或黄金，也不愿将他们不需纳税的利润用于投资。自由中国的大部分现代阶层都遭到削弱，情绪低落，最终起来指责执政的政府。这恰好与国民党出于政治目的而在大学中发展和控制高等教育的做法同时进行，知识分子中做学问的一派开始向国民党领导人提出质问。

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在中国进行抵抗的头两年半时间里，国民政府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援助比从美国、英国和法国那里得到的援助多得多，一支全部由苏联人组成的“志愿”空军在中国对日本作战。但在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援助逐渐停止了。起初，自由中国的事业赢得美国公众的欢呼，但 469

几乎未能赢得任何援助。除了从海防到昆明的印度支那铁路（到1940年法国陷落时为止）和蜿蜒于高山深谷之中从缅甸的铁路终点站到昆明可通卡车的滇缅公路之外，自由中国实际上已被封锁起来了。

当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使重庆成为美国的盟友时，美国政府通过其军事援助首次开始在中国内部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战时同盟使得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不断发展的对中国事务的参与达到了顶点，1943年1月对英国和美国条约的修订正式宣告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结束。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战争行动使美国的存在——体现在拥有无线电网和航空线的空军及基地、训练学校、后勤补给、运输系统和其他战时机构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而广泛，最令人惊奇的是陈纳德将军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在阻止日本人轰炸自由中国的城市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但是，美国的援助遇到了一系列的障碍。首先，日本于1942年初对缅甸的迅速占领切断了滇缅公路补给线，唯一可
470 以替代的补给线是从印度越过缅甸北部多山的“驼峰”到达昆明的空运线——一条成本高昂、运量有限的补给线。其次，盟国先击败德国再迫使日本就范的战略使得遥远的中、缅、印战区处于次要的地位。到1946年初，根据《租借法》提供给中国的援助达十五亿美元，但只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供给所有国家的租借援助总额五百亿美元的约3%。对中国的援助十分困难，而且中国在战略上也不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顽强地开始进行重新收回缅甸北部的困难战役，以打通通往中国的陆路，作为向日本发动进攻的潜在基地。到1945年初，这场战役以一条公路的打通和一条输油管道的铺成而胜利结束，但是太平洋上的海军早已把战争直接引向日本了。

因此，战争压倒了外交。美国政策的最初目标是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从而有能力在日本战败后稳定东亚的局势。后又增加了一个与之平行的军事目标，即帮助国民政府增强其军事实力。假如盟国对日本的进攻果真从中国发起，那么战后的中国就会更具有活力，而且引起共产党发动对抗的可能性也会减小。但是事实上中国被忽略了，只充当一个次要的角色。这加剧了盟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不和，使得美英之间、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蒋介石和他的盟友之间，最终 471 在美中之间相互怨恨和指责。美国以击败日本为中心的战争行动反映了一个习惯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过和平生活的人民的观点。美国人自己从未遭受过侵略，他们将海外的战争只看作是一个简短的插曲。在另一方面，中国为了能在日本自1937年以来的侵略面前生存下来，已在主要的战争行动中耗尽了全力。国民党运用武力统一中国的理想和共产党为进行社会革命而夺取政权的希望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基础。美国急于赢得战争，因而逼迫国共两党在战争行动中进一步实现一体化，但这只能遭到失败。部分地由于这一问题，史迪威将军于1944年11月被召回。日本于1945年8月被打败之后，美国立即迅速地将本国强大的军队遣散。但是，它所提供的武装使得国民党的指挥官们对他们镇压共产党人的能力过于自信。他们的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负债、政治上不稳定，但却拥有占优势的军火。各种情况的结合，导致国民党卷入了一场使自己垮台的内战。

国民党早期曾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政党，但此后却走向衰落。这场悲剧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有些看法也许是具有启发性的：首先，自从1923年国民党改组为列宁主义式政党专政的政党时起，国共对抗便始终没有中断过。诸如动员农民参战参政等推动革命性变革的潜在力量不断增强，但是

国民党未能成功地控制和利用它们。其次，日本在1931年后的侵略一直是中国国家生活中的一个既成事实，它甚至比革命的潜力更加咄咄逼人。它转移了政府对许多建设性任务的注意力，促使政府走上军事化道路。再次，美国在1941年后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虽然是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帮助解决中国问题的高潮，但援助来得太迟了。假如美国政府在30年代前期就像它从1940年起给如此多的政权提供大量援助那样给南京提供援助，那么中国历史也许会改写。但是，美国在战时给一个承受巨大压力的政权所提供的迟延的援助充其量也只能用作支撑躯体的拐杖，而不是用作治愈其病痛的手段。

最后，在八年消耗战期间国民党的衰落既表明了无法改变的局势的影响，也反映了领导力的欠缺。至于两者所占的比重现在仍在争论。对于以沿海城市为依托的南京政府来说，迁都内地完全是毁灭性的行动。战时，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前线抵抗的沉重负担和耗尽重庆力量的那种国家责任的情况下，相对成功地扩大了它的势力。国民党军队牵制住了大部分在中国的日军，这大约相当于日本在海外驻军的一半，而且承受了中国三百万或更多的战场伤亡中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共产党政权在更加初级的水平上增强其权力（参见472第473—480页）。中国传统在看待历史时比现代社会科学更注重于个人方面，承担当权者职责的蒋介石一直因失去权力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是，研究将显示他很少控制住了自由中国的局势。他那宁直不弯的秉性表明全部政治传统缺乏活力，仍处在儒家帝国的阴影之中。在另一方面，正如西方的援助不能避免自由中国的衰落一样，西方的模式对于战时的中国共和政体来说几乎毫无用处。一些新的、所有中国革命中的最伟大的因素在中国的战争中产生了。

第一节 毛泽东领导的兴起

如同共产国际一样，中国共产党起初按照马列主义的正统观点认为农民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在1927年2月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著名报告中作出了不同的论断，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先锋”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毛泽东不久就从经验中懂得了农民的群众组织与军事势力相结合的必要性。他与身为军事领导人的朱德和数千人一起在1927—1928年的冬季藏身于湘赣边界多山的井冈山地区，他在这里按照起义者的传统方式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但是，毛泽东在使用的术语方面使他的运动保持思想上的正统性，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的瑞金被宣布是一种“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了列宁在1905年的口号，那部出色的劳动法在理论上对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称赞备至。红军被特定为一支政治的阶级军队。土地被用暴力重新分配，但集体化并未推行。

毛泽东只是逐步地成为领导人的。当由年轻的莫斯科留学生控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2年秋放弃上海来到江西的时候，这一进程受到延误。蒋介石于1931年末、1932年5月至6月和7月至10月以及1933年发动的前四次围剿都被诱使国民党军队进入深山的游击战术所制止。但是在1933年末

475 至1934年，沿着一排排碉堡进行的一场有计划的、德国式的国民党封锁和渗透，开始侵入共产党地区。结果，十余万共产党人于1934年10月逃出他们在江西的防御阵地，在夜晚急行军进行长征——共产党人用一年时间步行约六千英里，这是人类耐久力的伟绩，至今仍具有传奇性——而且沿途不断作战。只是在1935年1月当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脱离接触之时，党内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成员才被迫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即使如此，他们在此后的几年里继续在党的委员会中反对毛泽东的路线。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不到两万的军队在1935年到达陕北，从1936年底起将延安作为大本营。这个干燥、阳光普照、尘土飞扬的黄土地区被冲蚀成的沟壑分割得支离破碎，使得轮式车辆难以进入，却易于防守。但是该地区缺水、缺粮，地主也很少。这形成了一种简朴、平等，自己动手式的纯朴生活方式，完全没有受到城市生活方式中流弊的影响。十年延安时期为毛泽东提供了机会，他对整整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一位富有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经历过长征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时，他发现了一批充满自信、甚至乐观的老革命者。他们那朴实的作风
476 和对农民事业的献身精神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作了绝妙的描述，唤起了世界各地读者的想象力。

到1937年，很显然中国的抗日将会转移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同时也会转移南京对共产党的进攻。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日本人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发动进攻后不久便与国民政府结成新的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只不过是在

爱国主义热潮中开始的一种不稳定的军事停战，但这种关系不久便恶化了。共产党政权此时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民族抗战的形势下扩大势力，战争急需动员农民进行爱国主义的自卫。为有组织的抗战而建立的根据地均以不易到达的各省交界地区为中心，最早的晋察冀边区于1938年建立。到1945年据说有十九个这样的根据地，其中大部分称为“解放区”，拥有七千万到九千万人口，由约二百万民兵和自称总数为九十一万的共产党军队加以守卫。中国共产党人发展成为在华北领导农民抗日的最强有力的领导者，重庆的国民政府无力在这个方面与之相抗争，于是便封锁了延安地区。

战争期间，共产党人暂时放弃了没收土地的政策，主张减租。地主一般都拥有土地所有权，他们经过削减的地租收入仍有保障，并被允许参加当地的选举。共产党人宣布实行直接选举，用所谓的三三制来取代先前的苏维埃制度。他们将本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限制为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保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当日本人和他们的中国傀儡以及国民党为共产党政权提供了某种选择余地时，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八路军便随着老百姓在战时无约束的政治角逐中愿意支持他们的程度而发展。共产党的经济计划包括各地区军民在粮食补给上做到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用西方农业科学改良的种子和技术十分缺乏，但共产党人通过强调合作垦荒、农民中的换工、运输方面的互助和小规模的工业合作社来加以弥补。通过使农民参加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和通过领导与宣传来控制这些协会，共产党发现了一条通往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崭新道路。

毛泽东在1940年提出的三项目标是：坚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坚持抗击日本的武装斗争和坚持在共产党地区党的建设。第四个未作大张旗鼓宣扬的目标是建设一支百万大军。总的问题是如何在寻找尽可能多的盟友来与国民党人对抗、抗日和改造中国的同时又坚持长远的革命目标。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成为一种高超的、具有灵活性和富有效力的策略。他们努力孤立敌人，几乎像选区政治家那样区分出所有可能的盟友和中立者，求助于他们的影响，关心他们的特殊需求，但从未在共产党的完全独占性的问题上让步。在国民党地区的“统战干部”摆出一副非共产党人的样子，从不期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那些私下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未来具有信心的精明强干、无私奉献和勤奋工作的统战人员渗入到自由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之中。与此相类似的是，“友军”计划也渗入那些因战功而擢升的军人所组成的国民党军队之中。但是，统一战线也培养了一种在共同的事业中友好合作、勇于牺牲的战时精神，武装斗争可以用统一战线联成一个整体来打击日本人或在国民党顽固派被完全孤立时来打击这些顽固派。

共产党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四万人增加到1945年的一百二十万人。要使中国共产党继续作为一个具有纪律性的、由中央控制的列宁主义政党就需要进行顽强的工作，即使农民在此时被称为“乡村无产阶级”，该党的无产阶级成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其积极分子分布在二十五万多平方英里的地区。共产党人只有用适当的思想的方法才能进行控制，因此对新干部进行教

育是必要的。出于这一目的，延安的党校对数千名学生进行培训。

1942年，毛泽东发起了以“整风”为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即要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小组会上的反复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上的坦白认罪和表示悔改成为标准的程序。其目的是要在统一战线时期保持党的战斗力，从而使党为将来的任务做好准备。这场运动做了艰苦的工作，对那些仍然受到自由主义的环境、个人主义的习气或传统道德毒害的新党员进行再教育，使他们遵守纪律。

这场整风运动还标志着从中央委员会中最终清除了那些曾反对毛泽东的领导、由共产国际培训、从莫斯科回国的“国际分子”。共产党此时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在行动中得到检验，必须适用于农村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必须成为一种“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它代表了在共产党创立之后的二十年中——即在战时民族主义和受俄国影响最小的时期内——在中国发生的共产主义中国化。从此，它不再是一个外国的学说，其主要成就就是以农民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表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共产主义的组织事实上并不依赖于无产阶级。这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观点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并不是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源自于他所属的阶级。他的阶级属性此时由他的思想所决定，一个出色的农民能够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上的和政治上的思考行为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胜利。

毛泽东1940年写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是具有说服力的宣传文献，它证明统一战线的暂时存在是必要的，但又重申了党的长期使命。对于他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读者，毛泽东温和地宣称他继承了孙中山和五四运动的衣钵。而对于

马克思主义者，他含蓄地将他自己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同列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事实上，毛泽东的“创新”并不在理论方面，而是在实践方面。他的所有名言都能在更早一些的文献中找到。他的真正贡献在于在农村的根据地中创立了政党和军队，并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对老百姓怀有一种新的尊重和强调使他们得到“解放”的目的是要唤醒和动员中国广大农民。文化运动着重于以木刻 480 为形式的版画艺术，这种艺术作品能够很便宜地进行复制。合唱与一种古老的乡村舞蹈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秧歌。这是一种唱着民歌调子，脚踩一套步点，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穷人歌剧艺术，它给人以获得解放的欢乐感。老百姓的新信念包含了这样的革命理想——现代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能够用来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变并富裕起来。这种对老百姓的崇拜使干部和军队充满活力。党的工作者必须住在村庄里与农民一起干活，吃农民所吃，住农民所住，想农民所想。只有这样，党的工作者才能领导群众闹翻身。根据事物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解放”也成为对新的政党专政的认可：(1) 革命的目的是给群众以一种新生活；(2) 这只有通过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力才能实现；(3) 政治权力只有通过集中制的政党组织才能获得；(4) 一个政党只有在它的党员遵守严格的党纪时才具有战斗力。这样的政党具有不断前进的、生气勃勃的、肩负历史使命和超越个人的特性。

1945年4月至6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自1928年以来举行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通过采取具有灵活性的“联合政府”的路线而完善了战后时期的战略。在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与共产党军队交火——之后，政府已更严密地封锁共产党地区。一种普遍的恐慌在中国出现，人们担心内战将会紧接着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爆发。毛泽东此时断言中国需要一个“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出于权宜之计，这种政府既可以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统一战线——如同在1946年所提出的那样，也可以指联合小党派和开明人士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如同将在1949年做的那样。同时，这条路线对那些具有现代思想但很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

国共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名义上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印度为收复缅甸北部曾训练过中国军队，同时由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提供补给的美国空军也曾保卫中国城市并骚扰在华日军。但是盟国更直接地通过海路对日本进攻，却忽略了中国。美国援助的结果是使得在政治上软弱的国民政府拥有占优势的军队和自负感，而国民政府正是以此在1945年之后对付共产党的。身为赴华特使的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进行调处，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斯大林亦如此）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同时，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动员大众和内战方面进行工作。美国军队1946年后撤走，在华盛顿的马歇尔 481 国务卿也避免进行干涉。

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现代的大较量之一。一开始，国民党拥有约三百万军队，其中大部分装备了包括由美国援助的卡车、坦克和飞机等现代武器，所缺乏的主要是鼓舞普通士兵的奋斗目标。蒋介石不听从有经验人的忠告，坚持重占北部和东北部各省重要城市，而这些设防的城市不久便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依赖空中补给。与此同时，共产党

起初只有约一百万军队，但它不断从国民党的降军那里获得兵员和美国装备。共产党的野战军在乡村机动迂回，动员村民，摧毁国民党的铁路交通线，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交战，在规模和战斗力方面都得到了增强。这支军队得到了数百万农民的流动后勤支援，这些农民既能摧毁铁路，也能补充兵源，还能挖掘反坦克陷阱和报告战果。

国民党于1947—1949年的溃败与其说是武器的不足引起的，倒不如说是目标的缺乏造成的。蒋介石的军队拥有精良的武器，但缺乏振兴经济的能力，缺乏动员民众的计划，缺乏对中国未来的新远见。在国统区的城市居民由于剧烈的通货膨胀而愈加灰心丧气。导致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级军官中黄埔系与桂系的相互嫉妒、军阀式的守势和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经办补给方面的腐败行为、官兵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总司令对于遥控决策的执拗。到1948年中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兵员数量上持平。在10月，共产党军队迫使东北主要设防城市的守军投降。到1949年1月，它又迫使国民党的大批军队在南京以北的徐州平原投降。共产党人在1月进入天津和北平，4月进入南京，5月进入上海，10月进入广州，11月进入重庆。到1950年5月，他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领导人撤到台湾。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

第二节 人民共和国的创建

政治组织

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经过二十八年的考验和曲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着手创建新中国时已具有经验、远见和自信。20世纪50年代初又重现了一个伟大的重建时代，此时一个如同明朝那样的新王朝致力于消除外来影响，进行土地和人口调查并恢复帝国的秩序。但是，过去的延续并不如创新，即创造性地运用现代世界、特别是苏联所给予的一切那么引人注目。

军事接管使大部分地方官员仍留在政府内。共产党的干部们给这种接管创造了一种节日气氛——在大街上扭秧歌、宣布和平与解放。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蜜月时期，共产党人致力于消除国民党的残余影响，用一个联合政府取而代之，并改革中国的军队、对外关系和经济体制。

毛泽东将新政府确定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盟，同时它还是用来打击反动阶级和“人民的敌人”的一种专政。因此，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以统一战线的方式来为政府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同时消灭其敌人。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大笔一挥而被划入人民的敌人一类，这就为从人们中间查出反对者提供了一个具有灵活性的基础。

以周恩来为总理的新的中央政府允许几个党员人数不多的小党继续存在，并将一些重要的职务委任给党外人士，以实施有关联合政府的主张。上等阶级中的多数人受过教育，

富有才干，他们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而使用他们是必要的。
483 因此，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被赋予施展才干的机会，他们被委以高级职务，在各部与那些缺乏能力但更为可靠的党员共负重责。从西方回国的大部分爱国学者为他们祖国的未来而贡献力量。他们长期以来与国民党关系疏远，他们除了与共产党合作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与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人也由政党、政府和军队三部分组成政权，每一部分都自成体系，但由共产党的领导联结在一起。该党的党员从1947年的二百七十万人增加到1953年的六百一十万人、1959年的一千四百万人、1961年的一千七百万人和1973年的约二千八百万人。中央委员会到1962年扩大到包括九十四名中央委员和九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但权力由十九人组成的政治局、最终由约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来行使。在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的组织大体上可分为八级：主要是六个大区的局、二十八个省或大城市的委员会、二百五十八个专区委员会、二千二百个县或相类似级别的委员会、1958年后的约二万六千个公社委员会和一百多万个村庄、工厂、学校、军队或其他单位的支部委员会。

政府机构与政党组织并立，党员也在政府中兼职。人民代表大会从村庄直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首次召开）按不同等级建立。这些代表大会为大众参与“民主集中制”提供了舞台，但它没有实权。当新宪法（要与1956年的新党章相区别）削弱党外人士的作用并加强总理的作用时，政府机构于1954年进行改组。此时，周恩来是包括多达十六位副总理和约七十个部或相类似机构负责人的国务院首脑。行政机构划分为处理以下事务的主要职能体系：政治和法律（国内）事务；宣传和教育（文化事务）；农业、林业和水利（乡村工作）；工业和交通；财政和贸易。每个体系由国

务院的一个办公室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室共同领导。当它的下属分支机构在等级制度中的某个特定级别上也与从横向起作用的党委并立时，那种通过其下属分支机构对下面实施的“垂直式统治”便受到“双重统治”的制衡。对外事务和军事事务也通过职能体系来处理。

在全部运行机制中，政党制约政府，而政府机构则执行其政策。共产党还任命其党员担任大部分重要行政职务，党的地区、省和地方委员会能够在它们不同的级别上协调行动，发挥监督作用。在政府每个机构内部，党员有他们自己的党委会或党支部等组织，党的领导成员则组成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484

与政党和政府并立的是新的全国性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却听任它们衰落下去。比如，1922年创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1956年时宣称拥有一千三百余万会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3年的会员数为七千六百万）、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年的会员数为三千四百万）、合作社社员，即加入合作社的农民（1957年的社员数为一点六二亿）以及知识分子、学生和少先队等类似的组织也得到建立。这些群众组织以政府无法做到的方式按人们的职业或社会角色对个人及其亲朋同事起作用。每个群众组织都有明确的纲领和广泛的行政机构。这样，一半成年人参加了活动小组以及开会、学习和宣传等活动。通过学校和培训中心进行的庞大的培训计划旨在吸收积极分子。消除大众和官员之间隔阂的群众组织有助于使以前厌恶政治的大众政治化并推行“群众路线”的思想——共产党的领导方向必须通过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来确定，首先从党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有关群众问题和意见的全面而具体的报告，然后发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指示，最后使群众将这

些政策作为他们自己的政策加以贯彻执行。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对舆论进行灌输和操纵，当在地方的每一级进行协调时，所有这类机构都能够给每个人造成一种具有说服力和势不可当的公共压力。

施加这种压力的途径就是运动。运动在发起时可能看起来是自发性的，但它的进行唯有依照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运动很快使党、国家和群众组织的新的庞大机构行动起来，将不同的阶级及其习惯和传统作为靶子进行一次次的打击。

在这种致力于革命性变革的机构的背后是待遇优厚的公安部队和秘密机关，地方公安局还负责监督街道委员会。街道委员会的职责不仅在于促进福利事业，而且还督促邻里之间和家庭成员之间进行相互监督和告发。街道委员会非正式地处理个人之间的纠纷，公安局则处理更严重的案件，或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案件移交各级“人民法院”。在这里，被告通常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受到彻底的审问，完全服罪并交待了其他任何有关的人和事之后，刑事案件才受到审判。由于法485律表达了党的革命政策，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编集成法典而且变化不定。司法职业还未产生。国家方面对司法很有影响，它确使司法工作在每个案件中贯彻普遍原则应用于具体情况之中的精神，并尽可能地减少程序。诉讼不受重视，立法也不重要。尽管法典并未公布，但是通过政治灌输，行为规范当然为人所知。在这一切之中，有许多是对中国传统的因袭。在国家工厂和劳动营中的“劳动改造”仿效了苏联的组织，但也反映了古老的中国信条——个人的行为能够通过灌输和社会压力来得到改造。

经济重建

1949年，毛泽东宣布“转移到城市”和学习苏联工业化。共产党接管了三方面的经济：乡村自给自足的经济；通商口岸不同基础的外国工商经济；日本人在东北（外国人称之为满洲）这个不发达的地区所创立的重工业基地。一个任务是将这三种经济融为一体。

首要目标是将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东北，苏联通过占领已搬走了一半以上的重要设备，至少价值二十亿美元。在中国本土，铁路被破坏，城市工作陷入混乱。战时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封锁增强了乡村自给自足的能力，像棉花这样的市场作物必须恢复种植。约九百万人依靠政府的供给和工资生活（包括小部分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政府不得不增发货币抵消大约75%的预算赤字。上海的物价从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的九个月中上涨了七十倍。

遏制通货膨胀的第一个行动是通过增税使预算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首先在乡村地区征收实物形式的农业税，然后又在城市通过诸如征收由同业公会“民主评议”而确定的每种主要商品税及营业税等方法，从更富有的经济层次中获取金钱。其次，整个财政管理作了改组，以赋予中央政府对以前的地方税的控制权，取消私人银行经办官方资金业务的权力并普遍削减开支。通过接管银行，政府控制了货币和存款，并设立六个政府贸易公司，控制主要消费品的价格。

一种恢复信誉的方法是用按照一定数量的日用品换算的折实单位（商品“篮”的价值）而不用货币价值来表示工资、薪饷、银行存款、一些政府支出和债券发行的数量。一个典型的折实单位也许会包括一定量的米、面、煤和白衬衣。当价格

上涨时，以商品为基础的单位货币价值也作相应的上涨。由于用这种单位作为支付手段，因此人们能够免遭进一步通货膨胀的困扰。总之，通过采取各种在商品供给和货币收入流量之间保持平衡的措施，到5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被消除了。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就。

到1952年，旧经济的三个成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铁轨进行了重铺，其长度甚至从约一万英里增加到一万五千英里，公路重新开通，总长度达到约七万五千英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央银行体系，并流通唯一的一种货币。预算首次现实地开始执行。私营企业在形式上被允许继续存在，但事实上它越来越多地处于国家控制之下。通过控制信贷和原料以及垄断主要商品，国家此时能够控制生产和商业，此外国家还直接控制了大部分重工业、铁路和外贸。另外一件必要的事情是要实现控制土地剩余生产的传统目标。

从1950年中期开始到1953年初结束的全国性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目标，而且具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目标。进驻村庄的干部工作队首先揪出货真价实的敌人，如果有必要就把他们撇在一边，然后向贫农们解释土改的好处，并挑选积极分子领导即将到来的运动。经过这种准备之后，“阶级斗争”时期便开始了。在“斗争大会”上，群众积聚已久的不满能够通过“诉苦”和“清算”激发出来。不得人心的地主或“恶霸”可以被处死、驱逐或迫使其认罪、接受改造，而全体农民则通过采取暴力措施来表示自己拥护新制度。

下一个阶段是建立农民协会。农会通过全体农民同意的程序，将每个人划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或佃农等阶级成份，并对地产进行分类、没收和分配，随之而来的“平均地权”是农民暴动的旧传统。一般说来，地主士绅的残余在

人身或在地位上被消灭了，而党的代表确立了权威。此时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存在私人所有制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在1950年曾被宣称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农民中的土地私有制仍然没有比工商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延续更长的时间。政府毫不迟疑地着手建立新的农业集体化制度。改革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步骤，从北方发展到南方：先是建立临时的、通常是季节性的、 488 小规模的互助组，然后建立规模较大的、永久性的互助组，随后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农民们开始共同耕作，根据他们投入的土地、农具和劳动量的比例来享有共同的收成。合作社仍然肯定土地私有制和自愿性质的互利合作，但是，目标开始转移。不久，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彻底的合作化才能实现对工业化十分必要的农产品的增产。

社会变革

中国传统的祖先威严、家族凝聚力和孝悌观念等长期以来一直在被侵蚀，共产党的“解放”深化了这一进程。根据1950年的新婚姻法，妇女在结婚、离婚和财产所有权方面被赋予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这部法律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的不同寻常的成就，这是一场在整个世纪中一直在加速进行的长期变革，对此我们还缺乏深入研究。作为对旧的家庭制度的象征性的致命打击，孩子们因公开指责父母而受到称赞，这样就引人注目地否定了古老的以孝悌为重点的最高美德。广泛的家庭关系被斥之为封建的，而浪漫的爱情则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新政权试图取代中国庞大的家庭体系，作为人们主要忠诚的凝聚点，很像工业化一城市化的社会那样，将核心家庭作为典范。

由于1950年末的朝鲜战争，动员群众变得更加容易。关于中国早期的胜利和后来据称由美国进行的细菌战的报道，为摧毁在中国颇受好感的美国形象提供了有用的证据。两场主要的运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发动起来了。运动号召人们对亲戚和邻居进行爱国的暗中监视、公开检举，甚至对父母也不例外，并将这些人民的敌人送去“劳动改造”。被处死的这类敌人连同在土改中被“人民法院”判罪的人达数十万，有些人称有数百万人。蜜月结束了。

在这种恐怖和爱国主义的形势下，被指责为间谍的外国传教士或被投入监狱、或被驱逐出境。为了中国基督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而发动了一场“三自运动”，以摆脱所谓的传教士们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外界没有联系的“国家教会”最终得以建立，到1958年，“三自运动”统一了各地所有基督教派的礼拜仪式。

动员公众的压力来反对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各种行为方式的运动手段越来越直接地用于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1951
489 ——1952年的“三反”和“五反”运动被用统一的方法十分彻底地组织起来。“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矛头指向官员，它显然是要清理和振奋从国民党那里遗留下来的、自1949年以来迅速膨胀的庞大行政机构。“五反”运动是一场相类似的经过组织的打击商人和厂主（资产阶级）的运动，它专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就像在所有运动中一样，群众被动员起来，委员会纷纷建立，造成一种群众的巨大首创精神、正义的愤怒和对善的胜利所倾注的热情交织在一起的表象。随之而来的便是坦白、认罪、改造或通过自杀、处决或劳改营等方式来消灭犯罪分子。而且，从工商业阶层那里获取的资财也是巨大的。

刘少奇和其他组织工作者采取在延安使党列宁主义化（也用于改造日本战犯）的方法，提出了以经验为依据的思想改造过程，以对付各种敌人或支持者。当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人“承认”细菌战，并与俘获他们的中国人合作时，他们实际是受到了中共从对付各种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种种手段方式的影响。这些对战俘施行所谓“洗脑筋”的方法是极端的例子，更为普通的样式是共产党的真正革命努力——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思想改造一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对个人环境和个人可获取信息的控制（全国都如此）；理想主义和恐怖的混合刺激；在一系列阶段性的诱导启发下进行、并通过对人的罪恶感和廉耻感的控制来强化的冷酷无情的心理体验。中国人给它一个“洗脑筋”的俗称，或许是把过多的神秘色彩附加在一个从前在其他地方的宗教战争中也隐约可见的过程之上，而现在它只不过更加有组织罢了。心理学家能够解释失落感、持续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感与持久的疲劳感和反复的灌输相结合是如何能够泯灭个人的内在个性，并且制造出巨大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唯一能够逃避这种压力的途径是屈从于权威。就中国学生阶层——共产党曾不得不从他们中间挑选干部——而言，这种思想一感情改造是在作为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庞大的革命学院中进行的。

这种中心可以有大约四千名学生，每一二百人编成一个班，六至十人编成一个学习小组。典型的为期六个月的思想改造过程可以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组统一认识阶段——步调一致和相当自由、充满热情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学生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在一种共同努力的气氛下自由地交换看法，这促使他们真心地投入“思想动员”之中。

第二阶段是促使每个人的内心进行思想斗争的阶段。日程表使人的身体处于持续的疲劳之中，在幕后精心控制的那样一种气氛现在似乎笼罩了一切。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入以及被清洗的危险日趋明显，个人开始感受到了压力。个人内心中旧的恶念，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旧社会受到抨击，学生们努力找出自己的缺点并加以纠正。他们也许独自地、也许与同组的同学一起对大量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等进行“斗争”。每一个参加学习者，不论他是否具有抗拒情绪，都感到彻底的孤独。他很快感到有罪（他应受到惩罚），也感到羞耻。因此，他准备通过坦白和自责来达到心理上的净化。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再生阶段。当个人的最后的思想总结或检查被审阅和认可之时，他可能会感到振奋、纯洁，感到成为一个新人。他已受到控制，因此他的本性之源将他置于情感的压力之下，而摆脱这种自我造成紧张感的力量与党的外部权威相联系，从此他将依赖于这种权威。党的目标不仅是要确保对守纪律的积极分子的控制，而且要通过改变他们的目的和准则来提高他们工作的质量。他们否认家庭和父亲的原有地位，用党和革命取而代之。

就那些年纪稍长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归国的留学生来说，批评、自我批评和检查只是对一个成熟的人过去经历的一种掩盖。当北京的教授们抨击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时，其真正作用与其说是改造了这些个人，倒不如说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成为新制度支持者的盟友。这样，一个曾可能代表西方非共产主义影响的阶级已自我中立化了。

中国遗产中的权力主义传统可以用来为现代的目的服务。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列宁认为作为一种不仅为了解世界而且为改造世界的努力，理论必

须付诸行动。或者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儒学大师们，特别是王阳明（1472—1529），抨击知识与行动的二元性，认为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必须用相应的道德行动去反映他的道德观念。儒家的自我修养意味着知识见诸行动，而行动则丰富了知识。

尽管儒家的自我修身养性并不涉及群体，它强调用道德 491 手段改善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但古代中国人确信通过道德训诫和道德规劝，人可以被塑造为更具有社会性的人。确实，个人自我修养与群体的自我批评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两者之间也具有一些共同点。延安的思想改造使用了传统的中文术语，并借助了儒家的约束力。按照刘少奇的观点，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必须通过自我修养、通过“独自反省”来训戒自己，从而能够灵活机智地服从党的领导。这样，儒家学说训导人们效忠于家庭、父亲和皇帝，而毛泽东主义此时则将这种效忠转移到人民、党和领袖身上。古典学说被用来为此目的服务。

朝鲜战争和苏联援助

在1895年日本击败中国、把朝鲜从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分割出来之后，朝鲜于1910年被完全并入日本帝国。但是，朝鲜人民到1945年为止有关日本殖民主义的经历只是加深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在1945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又卷入了强国政治的漩涡，像德国人民那样被划归在两种制度体系统治之下，这两种制度体系分别代表着冷战中由苏联和美国来领导的两大国家集团不同的战略需要与社会目标。朝鲜的这一分裂发生在1945年日本战败时，当时苏联军队于8月9日

进入朝鲜北部，美国军队则于 9 月 8 日到达朝鲜南部，他们同意在三八线的北南两侧分别接受日本的投降。由于无法建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美苏于 1948 年分别支持两个国家——南部以在美国受教育的爱国者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和北部以在苏联受训的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政府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主张朝鲜半岛统一。当北朝鲜在苏联的支持下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突然入侵南部时，中国又一次卷入曾一度是它藩属国的灾难之中。

北朝鲜的突然进攻立即遭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谴责（苏联因抗议国民党中国出席安理会会议，已抵制该理事会达六个月之久，因此未出席会议投否决票）。杜鲁门总统注意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教训——不受控制的侵略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他将北朝鲜通过武力进行统一的努力说成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与美国后来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十分相似）。杜鲁门派遣美国军队去保卫南朝鲜，并立即以集体安全的名义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虽然南朝鲜提供了五分之二的地面部队，美国提供了一半地面部队以及大部分海军和空军，但是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十三个成员国也派出了军队。所有军队都处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统一指挥之下。
492

毛泽东于 1949 年初已宣布他的“一边倒”来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此后，他花了九个星期的时间在莫斯科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1950 年 2 月他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同盟条约》，但是，北京似乎并不希望参加由苏联武装的北朝鲜于 1950 年 6 月对南朝鲜的入侵。相反，中国共产党显然希望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台湾，但当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从任何路线发动越过台湾海峡的军事进攻时，这一希望无法实现了。随着朝鲜战争的演进，

中国在战略上的主要关注转移到它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位于南满的主要工业基地。

这场战争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北朝鲜的进攻下，人数逊于对方的韩—美军队起初被迫南撤，在东南端的釜山四周四十英里方圆的地区驻足抵抗。当从国外获得援兵时，他们击退了北朝鲜的猛烈进攻。在第二阶段中，麦克阿瑟于9月15日在首都汉城的门户——西海岸的仁川进行大规模两栖登陆，显示了现代军事技术的攻击力。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冒险，不久汉城被收复，北朝鲜的进攻被粉碎。

当美国军队于10月初越过三八线向北方的鸭绿江推进时，战争进入第三阶段。美军的目标此时已从击退北方的南进扩大到一项欠考虑的行动，即用武力重新统一朝鲜。这个源自麦克阿瑟的胜利和得到华盛顿默认的军事目标忽视了中国对于一个缓冲国的战略需要，而中国想以此来避免在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边界上存在一个公开的敌国。中国发布了一项进行干预的明白无误的警告。10月中旬，大批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军”，即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开始秘密地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他们在夜里穿越山区作长途行军，在白天则隐藏起来躲避空袭。等到11月末时，他们的兵力已达三十万人或更多。与此同时，两支向鸭绿江推进的美军主力分属不同的指挥官指挥，被五十英里“不可逾越”的山区分隔开来。中国出人意料的侧翼进攻突然迫使美国机械化纵队在严寒的冬天后撤二百七十五英里，一直撤到汉城以南，损失惨重。但是，中国通过它巨大的人力资源用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在此时被联合国军所遏制，最终在三八线一带形成胶着的局面。493

战争的第四阶段中，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开始，在板

门店的边界哨所延续了两年时间。这一时期，战斗仍在进行，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因苏联的重武器而得到加强。美国遭受的伤亡达十四万二千人，这使得朝鲜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在美国历史上位居第四的大规模战争。（南朝鲜的伤亡约三十万人，北朝鲜的伤亡约五十二万人，中国的伤亡或许达九十万。）停战协定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在1976年，这份协定依然有效，一条封闭的边界线横贯半岛。

人民解放军还于1950年10月进入西藏。在一年之久的战斗中重新确立了中国的控制权。此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运用了苏联的模式和援助。按苏联模式建立的职业军官团指挥着一支拥有约二百五十万人的常备军。

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国只有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1950年，为发展新疆的采矿业和其他类似的目的，中苏“合股”公司按照东欧的模式建立。但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些活动停止了，苏联还逐渐放弃了它在东北主要铁路线和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特殊权益。

在工业化方面，苏联的榜样和专门知识起初是中国最大的推动力。数千名中国受训者前往苏联，而数千名苏联技术人员则来中国帮助数百项工业项目的建设。在苏联贷款的援助下，中国战前的外贸模式作了调整，它与苏联集团进行贸易往来而不是与西方和日本往来。中国得到了必要的技术援助、数量不明的重型军事武器和重要设备，但它也相应地负债，贷款用原料偿还。

中国仿效斯大林苏式工业模式的能力受到某些特殊条件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事实上与1900年的俄国更为相似，而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的苏联有所不同。俄国1900年生铁、钢和棉织品的人均产量和每平方英里拥有的铁路里程数均高于1952年的中国，而且俄国拥有更多的受过

现代教育的技术和专业人员以及更发达的教育体系。因此，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强调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并不真正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中国过多的人口（据1953年的普查估计，有五点八三亿人，每年增加约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四百万人）加上可供开垦的新土地的相对缺乏，意味着中国人口对食品供给所造成压力将大于俄国。

第三节 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

494

中国革命在使农民成为公民和使群众参与政治方面作了最基本的尝试，但是中国的村庄还不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它所关注的事情源于一个更为初级的时代：如何生产出足够的农产品和如何去分配它。自古以来，仅次于饥荒和疾病的社會祸害是统治阶级——为数很少的特权人物本身，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其背景关系使他们易于得到土地和官职。由于统治阶级一般是从城镇统治村庄，因此毛泽东夺取权力之后的问题是如何深入村庄去使之革命化。如果他不能深入村庄并改造村庄的话，村民们将会保留古老的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比如，受过教育的人有资格去统治其他人，因此古老的村庄将会时刻准备接受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样，通过改造人来改造社会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成为思想、行为方式和阶级影响之间的一个处于半控制状态的斗争过程。

这场革命的一个特点是道德与政治的融合，因此，政策错误就是道德罪行。按古老的儒家观点，行为是品质的显示，或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理论和实践相互起作用。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统一之所以能够达到（或至少能作为目标）是因为如

同在威严的儒家学说控制下一样，人民共和国的道德和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按照这种中国观点，理论与实践是相互渗透的，因此思想运用到时事时，必须随着时事的发展而不断作出调整。

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将矛盾强调为相冲突的辩证过程的本质——如外部世界中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国内工业需求与农业需求的矛盾、人的内心中无产阶级倾向与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自由与纪律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以及在生活各方面的矛盾。矛盾在被觉察时便会导致斗争，两极分化最终在新的统一体中得到解决。因此，一场斗争只会引起另一场斗争，而不会使这一过程停顿下来。毛泽东很贴切地将这一过程称为“继续革命”——一种生活方式。这与旧的儒学的和谐理想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农业与工业

到1953年，土地改革和对城市及工业的控制使北京着手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制定计划。正在膨胀的城市将增加它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实现工业化也有必要从苏联集团进口主要货物，而这也用农产品来偿还。为了从农业经济中获取更多的产品，一种强迫性征收的机制必须以真正集体化的形式来建立。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会削弱推动力，但是它们似乎

495 是实行节俭和阻止“富农”阶级复兴的唯一可靠途径。

集体化的最初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快于人们的预料。到1955年中期，15%的农田和农户已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花了几星期的时间视察主要省份，考查地方上的民情，接着便号召两亿五千万农民按五十户为单位组成二百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约一百万个村庄中，每个村庄里都建立两

个合作社)。这个由充满热情的干部们所推行的大胆计划的实施又快得出乎人们的预料，到1956年5月，十分之九的农民据称已加入合作社。农民们很快又被要求放弃他们在合作社中的股份(按他们投入量而有所不同)，成为在完全合作化的合作社中领取报酬的劳动者，向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化的农业过渡。与苏联1929—1932年灾难性的合作化不同，中国的集体化并没有直接过渡到国家所有制，而是形成了由个人组成合作社所有制，合作社向拥有所有权的农民购买土地。这项计划在消除各个阶级的反抗方面显得卓有成效，至少几乎没有有关反抗的报道。即使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到此时只有五个年头，中国农民除了信任毛主席和共产党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与列宁不同，毛泽东是从乡村而不是从城市开始崛起的，所有反共的领导人都已被消灭了。

初级合作社发展成为高级合作社。每个村庄都有一至两个这种高级社，它们此时成为乡村生活的新中心，承办地方的公共工程和福利事业，而这些在帝国时期曾是士绅要人们的职责。按照传统，地方上大家族中取得儒家功名者——具有保守思想的、常常具有剥削性的精英——主动去修缮庙宇和桥梁或扶持学校和慈善事业，而此时取代他们的是地方合作社或合作社社长——通常是具有热情的党员。他们开始进行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照顾老人、改善当地的诊所、推广水泵或新式耕犁、或推动扫盲等工作。雄心勃勃的计划展现了光辉灿烂的前景：文化素质的提高、多种疾病和一切旱涝灾害的根除、森林的广泛栽植和劳动力的全部就业等。同样雄心勃勃的，是一项通过在主要河道上筑起“阶梯形”的四十六道大坝和其他水电站及多用途工程，以便控制黄河的长期计划。对于那些刚开始读书的农家子弟来说，这种充满自信的远景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对付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和持异议

的人，则有明确宣布的政策——“劳动改造”。

与此同时，为苏式强制性工业发展所作的准备工作已取得进展，银行、工业和商业实现了国有化。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前者的依附地位在1955年496宣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目标中显而易见：钢增加三倍、电力和水泥增加一倍，但布匹将只增加不到二分之一，粮食增加不到五分之一。农民的收成被用间接的方法和直接征收粮、税的方法拿走。正如在中国的战争中人不如武器那么贵重一样，中国在其农业发展中不得不将重点放在诸如防洪坝和灌溉渠这样的资本构成低、劳动密集型的工程项目上。增加养猪将能提供食品和肥料，但是化肥也许还很有限。同时，资本投资将集中于重工业。此时控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毛泽东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们预料人民的生产能力将从心理上得到解放，诸如竞赛运动这样具有激励性的方法将能同时使生产实现“多、快、好、省”。这种通过政府强制规划的工业化最终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落入政府之手，政府将其中的约一半用于投资。中国的工业发展似乎既快又令人生畏——它1957年的发展速度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

在这个时期，铁路也在东北延伸到外蒙古，还经过沙漠之路延伸到新疆地区。这些铁路线和同时进行的移民开发了干燥的亚洲腹地边远地区，为更大规模的开发创造了条件，而且还具有政治上、战略上的重要性，加强了已恢复的中国对内蒙古和新疆的控制。

知识分子和干部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动员每一个人，包括由约十万名仍

然主要是亲西方的技术、专业和学术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狭小阶层在内。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从精神上改造了”这个阶层并赢得了它的忠诚，但是他们又担心新的党的机构压制了文化生活。因此在1956—1957年，一场运动被发动起来，以控制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

一场更为自由地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于1956年5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传统的口号下开始了。这并不是为言论自由而发出的响亮号召，批评不能超越完全忠于党的最高权威这个绝对界限。在1956年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暴动和俄国人对这场暴动进行镇压之后——这恰好与在中国的不满迹象同时出现，毛泽东于1957年公开提出了他关于矛盾的学说：一些“对抗性的”矛盾存在于政权及其“敌人”之间；一些“非对抗性的”、正常的和可争辩的矛盾存在于官员与“人民”之间。根据这一学说，毛泽东希望通过运用他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使继续存在的关于实施政策的争论能够 497 健康地进行下去，并得到控制。如同在延安时期一样，这一辩论的过程将会引起批评，随后又将要去打击这种批评。反复的恳请终于释放出一股出人意外的洪流——知识分子和受过专业训练的精英对共产党的极权政治制度及其思想、目标和方法公开表示不满。党在1957年春末对此大吃一惊，于是粗暴地把它镇压下去。刚刚发表了批评的人们不久又被迫在“反右”运动中公开指责自己，并相互进行谴责。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面临着甚至更为严峻的问题——控制负责执行政策的庞大的干部队伍。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两场竞赛运动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随着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人造林和耕地的出现，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为此，中国的六亿五千万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无可

比拟的全国性的奋斗中被动员起来。这需要一支由数百万积极分子组织的庞大队伍来做党的工作，但这支队伍在很大程度上不够成熟，而且经验不足。可能有五分之四的党员没有受过中学教育，刚刚接受培训的青年干部也许很容易沾染上“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毛病，而不能通过讨论、推理和说服的方法去正确地对待农民。干部们更容易受到毛泽东思想指示的激励，而不易吸取教训或避免腐败和虚报。腐败和虚报长期以来一直是农民—官员关系的特点。事实上，农业集体化的进行伴随着相当程度的摩擦，农民被干部虚假的承诺远远地引入歧途。

意识到“脱离群众”的危险，共产党遂于1957年4月发起一场“整顿”党的干部工作作风的大规模思想运动，与诱使知识分子提出批评的运动同时进行。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都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下放”运动，即派遣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到农村去。这样通过与村民们一起进行体力劳动，他们就能避免“脱离群众”，也能帮助农民生产。

1958年的狂热

当中央委员会于1957年9月开会的时候，它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使新的国家和党的机构对经济有强大的控制权，此时各级党委都要就经济问题作出种种决定。但官样文章的增长快于生产，集体化实际上并没有使政府得到的农产品有所增加，政府面临着一个农业停滞的
498 紧迫问题。在1952—1957年之间，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但政府的粮食征收几乎没有任何增加。靠对农业征税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正走进死胡同。

为解决这个危机，有关大跃进的战略方针在1958年被采纳，以便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乡村农业部门这两个虽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方面取得进展。在农村，往往通过群众动员而空前地充分使用乡村劳动力：首先用于灌溉、防洪和垦荒方面，其次通过投入更多的人力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最后，利用当地可以得到的原料和设备发展小型乡村工业。官方希望这种使用中国充足人力的乡村发展不需要从现代工业部门获取大量的帮助，而现代工业部门将把它的产品用于出口以得到主要货物，或用于进一步建厂的投资。

大跃进是要利用中国乡村的落后和人力的剩余，实现毛泽东的信念：思想激励能够取得经济成就，新的精神能够开发至今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由于专业经济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因百花齐放运动而遭到贬斥，因此各地过于雄心勃勃的大跃进目标并不是由经济学家制定的，而是由那些受到竞赛的激励并时常对专家表示蔑视的干部制定的。使工业地方化的一个特殊方式是兴建能使农民投身于冶金业的小型土 499 熔铁炉（即使所生产的金属经常不能使用）。随着运动的发展，经济计划和管理出现了普遍的分权现象，中央的统计部门被解散，统计部门只在地方上设立。根据那些未受训的地方积极分子的上报结果，统计部门宣布1958年的粮食和棉花生产在一年之中几乎翻了一番。领导部门成了它所公布数字的俘虏，中央委员会对国外所宣布的那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不得不于1959年夏末羞辱地收回。

大跃进取得了混合性的成就。它仅靠人力兴建数万个水库、建造数千个水电站、铺设数百英里铁路、架起跨越宽阔江河的桥梁、开凿新运河、修成新公路、开发更多的矿山和耕种更多的得到灌溉的土地，从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这种施展全力取得迅速增长的努力造成了诸如新得到灌溉的土地

盐碱化和从农业抽调来的人力的巨大浪费等重大失误。

以发挥“群众中蕴藏的首创精神”的群众路线思想为基础的公社是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公社是通过合并许多高级农业合作社，即合作农场而形成的。公社在党的控制下拥有地方政府的职能，既包括军事职能，也包括治安职能，还包括地方商业、财政、税务、帐务、统计和计划等职能。它划分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生产队相当于原来的合作社，约等于半个村庄。私有土地被接管。农民们将在大食堂里吃饭，尽管这一点显然难以做到，而且所有劳动力都将被置于控制之下。农民的庞大队伍像突击部队似地前往攻击新的生产目标，他们原先在农田上的工作则为妇女所替代。人们用大肆炫耀的、乌托邦式的热情去实现这种宏伟的构想，所希望的结果将是由无产阶级化、离开自己土地的农民组成农业城市。

这场革命由于普遍的过量工作和精力耗尽、鼓动力的损害和管理的无能而失败。当按需计酬的平均主义报酬制度建立时，它降低了生产率。将劳动力像军队那样在公社范围内来回调动的做法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1958年12月，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将决策中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大队这一级，报酬又按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得的工分来支付。当1960年农业危机加深时，公社实行进一步分权，由平均约四十户人家组成的、能在一起劳动的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自留地得到恢复。1960年后的经济衰退和工业停滞比境况较好的苏联经济曾发生过的任何衰退和停滞都更加严重。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既遇到了造成歉收的不利天气，也经受了苏联撤回技术人员和援助的困难。结果，中国经历了好几年的严重经济混乱。国民生产总值在1960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营养不良到处发生。人民精疲力尽、心灰意懒。交通停顿，工业萧

条。政府认识到在过去十年中不受重视的农业在此时必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运用其政治权力在经济上确实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20世纪50年代中国革命中所推行的极端主义——将运动加快进行和将目标提高的狂热倾向——一直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的鼓励，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相信群众会接受马列主义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懂得如何解放潜在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据说是迄今为止一直被国内外剥削阶级所束缚的“创造力”。这一信念既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得到证明。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已懂得如何与共产党政权共处，就像他们在过去如何与专制政权共处一样，但是起初的革命热情业已耗尽。更糟糕的是，党的最高组织者与他们非凡的领袖之间的分歧加深了。在1959年中期，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因对大跃进的经济灾难感到痛心而指责毛泽东不切实际和极端主义的政策。毛泽东没有被这些批评搞垮，因为他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领导人，但他的一贯正确已不复存在，而且他不得不使自己脱离日常行政事务。从这时起，对外关系介入国内政策斗争，并很快使之复杂化了。

对外政策

中华帝国就是天下的一切（“天下”）或人类的“中央之国”（“中国”），此种民族中心主义传统使中国看重自给自足和非扩张性（在其具有战略意义的亚洲腹地边远地区除外）。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它远至亚洲腹地，包括藏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和其他几十个民族，人口之多前所未闻，总数达七亿或更多。占压倒多数的汉族人继承了一种思想，即统一的中央政府是唯一能够保证和平和繁荣、制止

内战和外国入侵的政体。与从基督教文化中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中国人具有要求整个中国统一的文化民族主义或种族民族主义的观念。因此，收复台湾是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北京称台湾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台湾的收复将结束国共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

501

国内的革命使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富有战斗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强调“美帝国主义”是敌人这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并强调中国的“解放”是所有前殖民地及不发达国家在一场伟大的世界范围内由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的榜样。在这些术语中，中国新近高涨的民族主义在更广泛的世界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此过程中，中国将苏联作为“老大哥”来依靠。20世纪50年代，北京以这种精神在对外政策中采取了强制与说服并用的做法，如同它在国内方面所做的那样。

1950—1954年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它在与美国遏制政策的交互作用下以一种好战的态势开始，这一态势特别被由苏联支持的北朝鲜于1950年6月对南朝鲜的进攻所激发。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那样，这预示着美国支持的联合国在南朝鲜进行防御和美国陆海军对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恢复援助。不久之后，中国军队开进朝鲜、进入西藏，并对印度支那的越盟提供军事援助。在两年的谈判之后，朝鲜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签订；而法国在奠边府战败之后，于1954年7月在日内瓦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参与了这一事件。但是，北京影响的扩大与美国承担义务的扩大是同时进行的。在这一冷战前线，双方都通过军事行动来寻求安全。1954年9月，一个共同安全体系——东南亚条约组织由美国创建，它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还与汉城（1953年10月）和台北

(1954年12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厦门湾内近海的金门岛问题上发生的对抗导致1955年初的一场危机时，中国在四个相邻地区所采取的行动都遇到了由美国领导和提供财援的反共遏制行动的挑战。

在早期的充满火药味的几年过去之后，一个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外交劝服的阶段来临了。在1954年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一起致力于在法国撤出后的印度支那建立稳定的秩序。在这一时期与印度和缅甸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也是他1955年4月在西爪哇的万隆召开的、有二十位亚非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所阐述的主题。为了与“万隆精神”相符，美国和中国大使于1955年8月起开始举行定期会谈——总共在日内瓦进行了七十三次会谈，此后在1958—1966年之间在华沙举行了五十八次会谈。

然而，这种温和路线不久便让位于强硬路线。在俄国人于 504
1957年8月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0月发射第一颗环绕地球的卫星之后，帝国主义似乎处于守势。11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周年，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毛泽东宣称“东风压倒西风”，号召在东西方关系中进行一场新的斗争。这一点不久便在台湾海峡变得很明显，美国在1951年重新开始加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国民党人越来越频繁地通过派遣间谍、进行侦察和撒传单的飞行以及突击队袭击等方式来骚扰大陆。他们还加固在金门“前线”的工事，向该岛派驻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终于，共产党人1958年8月至9月的炮击引起了第二次金门危机。这场危机平息下去了，但金门仍是冲突的焦点，国民党人将金门岛作为公认的大陆一部分加以固守。

另一个重新引起交战的地区是西藏，该地的人们被迫进

行一场相当于汉化的社会主义革命。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一次暴动，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暴动被中国人严厉地镇压了。在来年的夏季，中印在喜马拉雅边界两端的摩擦日益增多，并最终于1962年10月爆发了一场短期的战争。中国维护了对经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新疆与西藏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通道的控制权。尽管事实后来表明是印度挑起了中国短暂而具有毁灭性的反攻，但在当时对西方公众来说，人民共和国似乎是侵略者。

505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两条路线的出现

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的生活官僚主义化，但它和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没有满足人民的经济期望。随着人民不满的发生，它引起党委会内在选择政策路线方面的尖锐斗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确立了对中国的统治之时，其团结开始经受决策方面的严峻考验，而在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不得不放弃时，这种考验更为严峻了。从现实情况中产生的不同政策开始形成各自的领导人物，毛泽东代表一方，刘少奇最终代表另一方。

毛泽东的早年经历使他形成了一些特定的狭隘性——刚愎自用和关心普通农民。在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他曾与国民党合作。在1927年决裂之后，他懂得了武装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在这两个时期内，他主要是一个在共产党内工作的不顺从的党员。在他1935年后二十年的领导中，他的那种武装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由于革命运动对个人领导

权的需要，毛泽东的个人领导权逐渐得以确立。然而，在不同路线的斗争中，他显然代表着一条路线而反对另一条路线。506

两种有关革命的观点当然都是承袭了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一种观点将历史看作是道德剧，将革命看作是道德讨伐。另一种观点将技艺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技术发展看作是能使新的生产力创造新阶级的革命动力。在运用这些同类的思想时，毛泽东强调在道德上追求社会平等和无私的美德，而刘少奇则强调专业化技术和物质进步的实际需要。后面这种“科学马克思主义”假定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上层建筑”反映了其物质基础——生产关系，而物质基础必须先变革而后上层建筑才能够变革。相反，毛泽东所坚持的唯意志论（指意志而不是“志愿”）和群众主义断言群众的意志一旦转化为能量，就能征服一切。在毛泽东的背景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农民自古就有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特殊地位的憎恨。本世纪初，中国学生就曾受过消除一切政府和资本主义、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创造一个自由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背景中存有中国过去的其他残余：中国的古典思想断定所有人都有潜在的善，所需要的只是通过教诲来实现人们潜在的善，领导权必须由一个道德上的精英来掌握，而他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人们所处的环境。这种儒学的遗风肯定了贤明的英雄至高无上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的刘少奇和他的同事们在1956年的新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并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党内不同政策取向的二元性也可以用以下几组互不一致的观念来表达：领袖对部长，毛泽东是具有父亲般慈爱的高高在上的象征，而刘少奇手下的党的部长们则必须负责行使对地方的控制权。毛泽东居于他的同事们之上，是一个独特的人物。群众路线对党的建设，毛泽东主张斗争。他要求干

部为人民服务，动员人民，并在动员人民时贯彻群众路线的精神。刘少奇和其他党的建设者们更主张斗争服从于党的团结，强调将干部培养成为能够指导中国变革的新精英。乡村对城市，毛泽东的注意力一直是重塑延安那种简朴的生活方式。他鄙视城市生活，他的理想是植根于土地的全能的人——在自给自足的乡村中集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于一身的人。相反，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者们认为工业化需要专门技术，他们看到了城市精英的重要性和技术教育的必要性。唯意志论对计划，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大部分人赞成五年计划这样系统的计划、积累资本投资和发展工业。但是，毛泽东对政治比对经济更为注重。唯意志论是他的个人信仰，这促使他支持分散的地方主动性以对抗集中的控制、支持人民以对抗官僚主义、支持农民以对抗任何统治阶级的再生。最后，在所有这些不同点之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红与专——政治灌输与专业教育。

这些通往中国未来的不同道路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公报将它们称之为具有相同性质的原则（如同古老的阴阳之说一样）。刘少奇曾支持显然是毛泽东主义的大跃进中的乌托邦主义，但大跃进的失败预示着态度的硬化。在1958年12月之后，毛泽东“自愿地”将他的国家主席职位让给了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时面对着每一场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变革应在何时让位于稳定？或者应当如何确保革命精神生气勃勃？归根结底，这是个有关修正主义的问题——苏联也曾面临过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也使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变得更大。

中苏分裂

由于中国人和苏联人具有不同的历史、自我评价、需要和目标，因此他们在不同水平上同时发生重大分裂并不出人意料。留在记忆中的往事使他们相互不信任：蒙古游牧部落曾在13世纪奴役俄罗斯南部；沙皇帝国主义者曾蚕食中国的东北、蒙古和西北地区。在共产主义兄弟般的言辞背后，历史几乎没有提供相互倾慕的凝聚力，它们的合作——主要采取苏联提供给中国有偿援助的形式——是按其领导人的意愿进行的，而他们也能同样轻易地停止这种合作。意识形态是最初的凝聚力，因此它成为决裂点。

毛泽东不懂外语。当他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这一思想常常在翻译过程中已有所中国化了。而且，毛泽东是以采取革命行动开始革命生涯的。他在行动的过程中学到了思想，他不得不将共产主义的学说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本国的需要。俄国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认为只有由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权”居首位的、代表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才能够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主张通过渐进的、劝服的和非暴力的改造来做到这一点，这与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剧烈而暴力的变革很不相同。

1956年，当中国共产党仍求助于斯大林的名字时，苏联“非斯大林化”的做法使中国共产党迷惑不解。毫无疑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承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很多”，也就是承认了北京自称是亚洲的楷模的说法，但这一让步也使马列主义的学说发生动摇。从这时起，分歧扩大了。与莫斯科一样，北京此时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说的权威中心。国

际共产主义不再是铁板一块。摩擦——如果说不是决裂的话——是不可避免的。因苏联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处于峰巅时期的赫鲁晓夫指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左倾的、危险的狂热，而毛泽东则正以此声称中国正在超过莫斯科。作为反击，北京抨击苏联“修正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机会主义的投靠。尽管莫斯科曾于1957年允诺在核武器方面对北京提供帮助，但这种帮助停止了。苏联技术人员连同他们的图纸一起于1960年突然撤出中国。一种对于中国人的狂热和扩张的强烈恐惧在苏联逐渐形成。到1969年，边界武装冲突在黑龙江和中亚爆发。中国人大规模地挖掘防空洞。

随着中苏分裂的扩大，北京起初力图通过输出文化影响和军事宣传、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来夺取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和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支持者林彪将军思考如何才能将中国的革命模式推广到不发达的三分之二的人类中去，以反对工业化的帝国主义政权。1965年9月所使用的一种比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过中国主张民族革命
509 须依靠各民族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它意味着中国能够指引道路、但其本身不能通过其扩张来赢得世界革命（这使人们想起了古老的关于藩属关系的理论：中国是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但其他国家在这样做时须按其自身的意愿行事）。

林彪关于世界各国都应当依靠本国力量实现革命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任何正规武装力量在苏联核保护下对越南进行干涉，因为这种干涉将使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的努力降到次要的地位。1965年2月，美国开始持续轰炸北越。美国在对中国的门户进行侵略的同时还承诺不对北越发动地面入侵，因此北京遭受了无力保护盟邦的羞辱。与此同时，1965年还给北京的对外关系带来了其他挫折。中国组织一次将苏联排除在外的亚非会议的努力于6月遭到失败。10月，

印度尼西亚一场流产的政变导致对亲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屠杀。这些挫折和其他在国外的失败使中国将注意力转向国内。

党内的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内斗争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种种压力。首先是在人民之中。在这里，中国的贫困和它那新近积极投身于政治的公民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为了摧毁旧秩序，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一股狂飙，而此时它不得不驾驭这股狂飙。国民党曾是一个规模较小、失之肤浅的政权，而共产党则将权力贯穿到最基层。以前在旧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短缺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而此时的短缺则反映计划不周。

由于承受了如此沉重的负担，共产党建立了庞大的行政机构。但是，集体单位的官员们却倾向于成为官僚，他们对普通体力劳动者关心较少，近乎于形成为上等阶层。机会主义者追逐名利，名门望族重又出现，他们追求关系和特权、更好的教育和私有财产。比如，参加过长征的那一辈党的领导人并不反对为他们的孩子设立特别学校。总之，对普通农民的“解放”加剧了而不是消除了对跻身于精英阶层的竞争。新的政党—政府—军队的权力结构是一个精英组织，具有强烈的地位意识和安全意识，被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高级官员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更缺少革命性，同时低级官员感到陷入困境、灰心丧气。革命者排除掉古老的社会制度而仅仅承袭了它的种种弊端，这一点通过干部与中国公众之间宽大的鸿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诸如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等从事组织工作官员的支持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正在形

成。

在官僚结构之内，还存在士气和动力问题。党对所有党员的思想、行为、忠诚和纪律负责。党员有别于非党员，从事于“党的组织活动”，如经常开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下属的情况，并力图在人事、管理和监督部门的保密档案中保持一个良好的记录。不论是否在党内，一个干部的个人档案几乎比他本人更为重要。这个干部从未看过他自己的档案，但他知道档案中有他自己关于个人历史和背景的陈述、他的思想观点和所有有关他的家庭和其他亲属的情况。可疑的人会受到系统的审查。当然在运动中，一个有弱点的人可能会成为冲击对象。古老的科举制度有利于自我训诲，而共产主义制度则有助于自我恫吓。除了运动所抨击的那些特指的弊端之外，最终揪出某些人作为有组织批判和示众对象的做法足以使所有旁观者意识到如果不是党的宽宏大量的话，他们也可能会遭到同样的对待。这些令人不安的公众场面显著地重新肯定了党的权威，并促使那些感受到威胁的个人以非同寻常的激烈言辞批判他们那些受辱的同事。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运动——社会变革的火车头——在20世纪60年代丧失了其效力。干部们学会如何在不完全承担义务的情况下在会议上通过适当的动议。他们学会如何避免建立亲密的友谊，以免使自己卷入此后对私人细节的批判。积极分子发现了安然度过运动的方法：他们在动员阶段装出进步的、积极的样子，在巩固阶段则谨慎从事、多作自我批评。总之，党的机构已学会如何保护自身免遭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措施的左右，但它因此而真正丧失了动员人民的能力。

因此，修正主义这个问题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众多的党员已不再相信毛泽东的耽于幻想、疾风骤雨式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像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官员反对毛

泽东主义的狂热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只会阻碍经济复兴。在对付实际问题时，官僚们迟缓拖拉。毛泽东于1962年末号召进行另一场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场运动所作的不够充分的响应促使毛泽东将注意力转向军队。

官僚主义也在1955年建立的苏式职业军官团中出现。军官们对政委制度和“政治挂帅”提出挑战，他们赞同指挥一体化的苏联原则。军队中的党委地位下降，党员人数减少。但在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判大跃进和与苏联人有联系而于1959年被撤职后，林彪将军继任他的职务，林彪此时与毛泽东紧密合作。新党员被应征入伍，连队党支部得以重建。自成体系的不同级别的党员现在在直到连、班的各个级别上都拥有 511 自己的组织，灌输和监督都得到推行，负责政治的军官们确保这一制度的贯彻，防止观点相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小集团。在军队中进行了彻底的思想灌输，以至于在1964年有可能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竞赛运动。到1965年的秋天，军队已为毛泽东能够着手发动一场他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革命——的新运动提供了基础。

毛主席的运动

这是一场约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的规模巨大的运动。但结果表明它是一场二次革命而不是一次受控制的行动。当毛泽东着手打击那些公开发表言论的批评者时，他发现党对这些人的支持比他预期的要大。如同在1956年百花齐放时的批评一样，反对意见具有出乎意料的普遍性，但这一次来自党内。毛泽东对此作出反应，他以新的巨大努力去争取党外的支持。不久公众场合便被群众集会、游行和歌颂毛泽东

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宣传演出所占据。数百万青年中的巨大激情、甚至歇斯底里，导致精疲力竭、冷漠淡然和狂涛的再度掀起。在这样的条件下，领袖对党进行清洗。斯大林是秘密地、运用党的机构从党内清洗他的党；而毛泽东则公开地、运用诸如红卫兵这样的群众组织从党外清洗中国共产党。斯大林使用他的秘密警察，杀死了数百万人；毛泽东则依靠人民解放军，使用公开示众的方法。

毛泽东的第一个行动是通过攻击文化和教育部长及北京市委来从中心确保他对大众传播工具的控制。他抛开党的组织而发动一批批十几岁的青少年作为红卫兵投入战场，在他亲自写的大字报中号召他们去“炮打司令部”。他们将在“革命中学会革命”。而且在党的系统之外，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以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在内的文革小组为首的全国性文革组织。1966年秋季，在军队的后勤支援下，约一千一千万红卫兵来到北京参加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尔后便分赴全国各地与其他人进行串联，并进行他们自己的“长征”。在公众场合，他们猛烈抨击似乎代表“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的人和事。1967年1月，毛泽东鼓励“革命群众”像1870年巴黎公社那样从下面夺取政权，从而将革命进一步推向对党的组织机构的攻击。千千万万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给每个积极分子提供了大量可供思考的原理和可供挥舞以表忠心的法宝。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左右了宣传工具。党的当权派被击得七零八落，无法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结果，党的组织机构如果说没有被粉碎的话，那么也被彻底动摇了。

为取代旧的政权机构，毛泽东最终号召在各个行政级别上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由“革命群众”（新鲜血液）、军人和已充分革命化的原先的党的干部组成。党的组织在一个又一个地方猛烈回击，发动支持它们自己的红卫兵投入战斗，宣

布忠于毛泽东但又击败他的势力。最终，地方的派别在他们的斗争中开始使用武器。内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军队不得不被越来越多地调来恢复秩序。到1968年1月，革命委员会已在所有二十九个省和主要城市中建立，但富有效力的行政核心并未在它们中间建立起来。结果，对党的攻击使越来越多的军人掌握了地方上的权力，这些军人被指派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

在这种狂热的混乱之中，大学和学校被关闭。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正受到攻击，学生们则在打派仗中实现革命化。在1968年的秋天，包括原先的红卫兵在内的数百万青年学生被送往农场。1969年4月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军人占优势的新中央委员会。新党章提名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国逐渐转回到物质发展这项持续的任务上来。513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大学在缓慢地复课时，学生并不是通过具有竞争性的考试——这将仍然会培养出精英阶层——来挑选，而是在他们所在的生产单位由群众指定的。进入高校的候选者必须中学毕业后工作满两年，学成后他们还将返回他的原来所在单位去工作。这种将高等教育注入村庄的努力与对“赤脚医生”进行基本公共卫生方面的培训是同步进行的，这些“赤脚医生”将在老百姓中工作。与此同时，为了继续粉碎统治阶级的传统，城市机关工作人员轮流定期到“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农场）去，干校能使他们获得学习和在农田里进行体力劳动的经验。社会变革还在新的平均主义精神和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中得到明显的反映。

文革过去了，在此后的较为宽松的氛围里存留着某种程度的公众道德和自信。文革的许多受害者悄然复任要职。但文革的一个长期后果是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裂为激进派和务实派。20世纪60年代末猛烈的谴责和反诉已分裂了领导者。514

许多经历了这场运动并受到红卫兵冲击的老干部依然怨气未消，甚至有对抗情绪。

1971年9月，突然有报道说在文革和军方地位随之上升时期跃居高位的林彪死于发生在外蒙古的一次飞机坠毁中。事实真相逐渐披露了出来：林彪曾密谋篡权，甚至策划暗杀毛泽东，而当他卑怯的阴谋败露时又试图逃跑。不管这个不同寻常的事件真相如何，此后对林彪长期的反叛行径的详尽揭露，使他像他那个坐第二把交椅的前任刘少奇一样成为革命的叛徒，这就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如此恶毒的人是怎样得以窃取高位的？对于外界观察家来说，对权谋失败者的道德名声进行贬损的必要性，似乎是儒学的令人费解的残余。

第五节 中美关系

当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时，美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同的动乱——越南战争。如同中国和朝鲜515一样，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受到分别与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冷战国家集团结盟的势力之间所进行内战的破坏。但在这种力量构成中，其具体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越南民族主义是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法国殖民时期产生的。越南上流社会的成员起初与以往一样将中国视为楷模。但日本在1905年成为一个强国之后，越南的爱国者与中国人一样去东京学习。在20世纪初，在越南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由于法国人对旅行、邮政和出版物的控制以及对自由集会、工人组织和政治运动的镇压而被成功地置于无足轻重的境地。阮氏王朝(1802—1945)的皇帝和官员只是装装门面，而现代教育

的规模还很有限。同时，橡胶种植园、煤矿和其他以出口为目的的殖民地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人口已十分稠密的河内周围三角洲地区，无地劳动力的急剧增加。

在这种法国人统治下的经济剥削、政治镇压和文化停滞的局面的驱使下，越南爱国者于1927年按照中国国民党的模式建立了国民党。但一场更为职业化的颠覆运动——它秘密地组织起来以逃避法国警察的控制——是由胡志明（约1892—1967年）领导的。胡志明是一个具有非凡魅力的爱国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国，1920年帮助创立法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成为共产国际驻广州的代表。1930年，他将印度支那共产党统一起来。像越南国民党一样，该党也发动暴动，但被残酷地镇压。不过，该党的生存力更强。首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它提供了在邻国取得成功的思想和方法。因而，越南民族主义20世纪40年代在由胡志明领导的战时统一战线——越盟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找到了主要的表达媒介。当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时，胡志明出任新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元首。

和平使法国人卷土重来，他们先与河内进行谈判，接着便通过战争夺回了在印度支那的大部分势力范围。由于进行冷战的国际集团在1947年之后的介入，法帝国主义受到美国的支持，而此时更为公开的越南共产党则得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这场为期七年的消耗战只是到了1954年5月法国人在内陆的据点奠边府被越盟击败时才告结束。日内瓦国际会议同意将越南暂时划分为北越和南越，分别以河内和西贡为首都。南部是这个国家的新组成部分，它从1539年至1787年也曾处于类似的分裂状况。美国此时开始代替战516败的法国支持西贡的反共爱国者首领。

美国在越南的介入

美国对南越的进一步介入，在华盛顿看来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与显然具有同样坚定的野心的苏联和中国之间进行对抗的冷战时代，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所作的必要反应。那些对50年代初“丧失”中国的政治痛苦仍记忆犹新的美国总统、官员和议员决心不再“丧失”越南。在1961年，要做的似乎只需要运送军火和派遣为数不多的顾问来帮助西贡，要付的代价并不大。那以后经历了四个混乱的年头，其间发生了1963年的军事政变，此后一连串的西贡将军相继登台，南越前景变得越来越糟。到1965年，赌注便急剧地、灾难性地增加了。五十余万美国军队被派去拯救西贡政府，美国空军也被用来对北越进行有计划、有选择的轰炸。这是技术和后勤补给的成功。然而到1968年，美国的介入已处于公认失败的境地。它在国内导致通货膨胀和公众普遍的反感。正如1968年2月发动的猛烈的新春攻势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即使美国人也未能扫除在南越的共产党阵地。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对越南战乱的理解，似乎甚至还比不上他们的前任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革命的理解那么深刻。美国的舆论缺乏那些曾在越南经商、传教和从政的老手的指导，因为这些人都是法国人。而且越南从来与美国历史无缘。在这种缺乏思想依据的情况下，华盛顿认为即使在中苏分裂之后国际共产主义仍然是铁板一块，中国和北越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傀儡，而人民中国因其炫耀的言辞而天生是扩张主义者。在这种对主观意志坚信不疑的美国意识形态引导下，五角大楼的后勤官员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荒谬的心理：由于美国武器的威力会使敌人遭到“伤害”，因此敌人将会更快屈

服。轰炸当然具有反作用。然而，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都自信地认为合宜的技术能够用来打败政治革命者。越南共产主义者有其来源于强劲的民族主义和对于乡村及其人民的深刻了解的意志力，他们不会被这种观点吓倒。事实上，他们利用这种意志力来反对美国，熟练地将处于劣势的农民与最新机械化、自动化战争手段的斗争戏剧化了。

除了美国这种对于军事技术的错位信赖之外，来自西贡的使馆报告和新闻界的报道表明它对越南或东亚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它们过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西贡领导人身上，而不去考察他们在进行改革或争取下层支持方面的体制上和历史上的局限性。比如，它们没有认识到古代尊奉儒学的君主制留下的传统：统治者对于独裁效能的需要使他害怕接受合法的反对派。与此同时，来自这场越来越肮脏的战争的不堪入目的画面每天晚上都出现在数百万美国家庭的电视屏幕上，这使普通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越南的价值观被忽视了，而美国的价值观由于华盛顿—西贡所进行的挣扎而遭到巨大损害。和以往美国与三个其他东亚社会——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50年代的朝鲜和中国——所进行的战争不同，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了一场美国精神的深刻危机。1968年约翰逊总统放弃争取重新当选，而尼克松总统在当选时处于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之下。

华盛顿—北京邦交的恢复

美国在越南付出五万六千条人命和一千五百亿美元的代价之后所遭到的失败，加上当时的其他几个因素使得尼克松总统有可能对中美关系进行惹人注目的调整。首先，从1969年6月到1973年1月之间他按照战争“越南化”的政策有计划

地将美军撤出越南。在这个过程中，尼克松于1970年将打击范围扩大到柬埔寨，最终又对河内进行恐吓性轰炸，徒劳地试图用占优势的武力来抵消政治上的失败。1973年1月，华盛顿和河内同意停战、交换战俘，美军则撤出战争。但这场战争在北越和南越之间又持续了另外两个年头。

其次，美国从印度支那地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撤出之后即制定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继续竞争中所实行的缓和或谈判而不是军事对抗的政策。随之而产生的苏美在贸易上的合作和竞争、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所规定的军备限制、文化交流等改善了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形象。这转而又使得中美在中苏美三角关系的第三边进行接触显得很有必要。

再次，美国在南越的失败——那里的战争一直受到不入侵北越以免导致中国像在朝鲜那样介入的必要性的限制——使得毛泽东断定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相比，美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次要矛盾”。这 518 个关于俄国是主要危险的估价使得北京对尼克松政府有关恢复关系的慎重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从1970年到1973年，这些趋向集中起来导致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隔绝之后所发生的突破具有戏剧性。1971年4月，北京出乎意料地以一种“民间外交”的姿态欢迎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和记者。7月，尼克松先生突然宣布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后来任国务卿）为总统出访做准备已秘密地访问了北京。10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成员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并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这份文件陈述了双方在几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但同意共同努力以发展商务和文化交往，并向关系正

常化迈进。1973年5月，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以大使级主任为首的、以联络处为形式的准使馆。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有数十个代表团（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进行互访，数千名美国人（主要是华裔）访问了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方面，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纳入政府计划的有控制的参观访问活动，这样一种参观访问活动此前事实上已经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打开。外国人的参观访问活动是那项大规模的国内参观访问活动的扩充。根据这项计划，中国人组团到能够显示榜样的地方去学习那里的模范成就，比如农业方面有山西省的大寨大队、工业方面有东北的大庆油田等处。因此，和美国的交往与正在进行的改造中国的努力是相符的。

上海公报还确定了台湾的地位，美国方面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寻求“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据此，美国将本着最终彻底撤军的目标削减在台湾的美军。这份文件的含义和它对一个中国的概念的承认表明一项主张，即为了与北京达成“正常化”——正式外交关系，华盛顿最终将撤回对台北的外交承认。然而，由于从1949年起两个分立的政权便已存在，每个政权都声称代表唯一的中国，因此这种令人信服的措词很显然代表着一种理想（事实上是传统的中国国家的主要神话）而不是一种现实。这使得台湾的历史和局势变得特别重要。

第六节 台湾的发展

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发展

1895年，多山的台湾岛——二百五十英里长、六十至八十英里宽——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发展经济的绝好机会。台湾与日本本土诸岛只相隔很近的海路，它的人口相对稀少，只有约三百万勤劳的汉族农民和约十二万具有马来人血统的土著少数民族。该岛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但它能够出产亚热带谷物食品，以满足日本的需求。

在政治上，台湾几乎仍然是中国的边疆。它主要是从明代后期开始才有人定居，直到1885年自成一省之前习惯上通过遥控进行统治。在1895年中国大陆上的民族主义还未发动那场在1898年达到高潮的维新运动时，清朝便无能地将台湾让予日本，这没有给未来的爱国者留下任何领土收复主义的遗产。日本在那里接收的，乃是相当程度的前民族主义政治和前现代经济。

日本人在台湾的发展，只是到1898年儿玉源太郎将军被任命为总督和后藤新平医生被任命为民政长官时才开始起步。这两个日本现代化的领导人物接过了一个烂摊子，因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到乱世的摧残，中央行政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已崩溃了。他们着手使这个殖民地不论平时或战时都能在经济上自给，并成为日本的战略堡垒。他们建立秩序，然后通过调查土地、人口和关税情况，对自然资源实行强制性的科学开发。

为建立治安秩序，后藤重建了旧的保甲制，将它与现代警察系统相结合。这样，警方官员就能够与住户组织紧密合作，对于乡村共同负责。同时，当局通过赦免或惩处，到1902年中期根除了爱国的、绿林好汉式的抵抗。警察部队中的普通警察越来越多地从台湾人中招募，他们接受日本官员的专门教育和训练。警察的待遇优厚、纪律严明，他们以多种形式协助当局——户口登记、赋税征收、卫生和水源管理，甚至包括植树造林。

其次，日本当局整顿了土地所有制。地籍调查减少了土地所有权的混乱。在此之前，大地主将土地租给较小一些的地主，较小一些的地主再将土地转手租出。这样，好几个地主可能会同时对某一块土地收租。而且，中国政府的土地登记一成不变，许多新土地并没有缴税负担。日本人将新土地税登记在册，绘制地图，并于1904年用公债券购下不事耕种的地主的全部产权。这个措施造就了一个对其私有财产承担纳税 520 义务的、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阶层，并使地税岁入增加了三倍以上。

在社会方面，日本人确立了自己的优越地位，强制实行多种形式的歧视政策，使中国人处于隶属地位。出于进行统治和技术教育的目的，日语被广泛推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深化同化政策，小学开设日语课，但对台湾人进行 521 的更高层次教育还十分有限。

主要通过当局的领导和投资，物质发展相当迅速。由于采取了消灭流行病和疟疾的公共卫生措施，人口在1905年至1940年之间翻了一番。到1903年，铁路沟通了岛的北部和南部之间的联系，通往乡间的道路最终达到约六千英里。

经济生产以稻米、茶叶，特别是以甘蔗为中心。引进夏威夷甘蔗的农业试验站促进了为新建的日资糖厂提供原料的生

产。这些糖厂对土地改良、灌溉、施肥和运输进行投资。劳动力被吸引过来了，耕作者被说服去耕种新的无主土地，条件是要用部分土地种植甘蔗。度量衡和市场手段都得到了科学的发展。通过垄断糖厂，日资控制了这一出口工业。由于得益于大量的早期投资和保护政策（台湾糖免税输入日本），到1941年，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成就，台湾的制糖工业扩大了约四倍，从而满足了日本很大一部分的需求。

在台湾的中国人以民族主义为形式的政治抵抗发展得相当缓慢。首先，日本的统治并不需要对当地的统治家族进行镇压或彻底摧毁传统文化。它也没有摧毁乡村社区组织。相反，日本当局资助农民协会以促进土地改良（因而为此后的20世纪50年代乡村重建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台湾农民的砖房和对电力与科学技术的应用表明了他们在亚洲环境中相对富足的状况。因此，得到警察控制支持的经济进步阻碍了反日主义的发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旨在争取在台湾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地位平等的台湾政治协会纷纷成立。在日本的中学和私立大学接受教育的约两千名台湾学生毫不迟疑地对个人自由和政治改革等自由思想作出反应。20世纪20年代，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的请愿书不断提出，文化和青年团体得到建立，一些流产的共产党的行动也发生了。但随着日本在1931年之后对中国的侵略，它在台湾的警察镇压措施也得到加强。在日本于1945年被赶走之前，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事件爆发。

中华民国在台湾

1949年之后，仍然由国民党控制的流亡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尽管从1948年起它已经受宪法而不是“党治”的约束）认

为它只是暂时寄身于作为其一省的台湾，并仍然保持一副在军事上作好准备“反攻”收复大陆的架势。台湾的政治生活反映了流亡统治者的心理——傲慢地坚持那些维持其希望和历史延续感的要求。结果，尽管情况已完全不同，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民政府仍像在大陆上一样，继续将它的许多精力用在为反攻所作的军事准备而不是用在更为普通的发展上。在这种实行军事管制法的、军营般的氛围中，那种几乎等同于君主的个人领导传统消亡的速度很慢。不过自从天子逊位以来，毕竟只过去了五十个年头。

占少数的大陆籍统治者与占多数的台湾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在1947年3月遇到了最初的灾难。国民党接管当局的极端腐败在其大部分同僚来台之前便激起了广泛的示威。这些示威遭到镇压，数千名最有影响的台湾人被有计划地处死，整整一代当地的领导人物被大肆屠杀。随着时间的推移，约二百万来自大陆的政界头面人物、文职人员、教员和士兵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依靠国民政府发的为数不多的薪饷生活，而一千万或一千万以上的从事农业和商业的台湾本地人开始更直接地参与该岛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台湾人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参与政治生活。在省政府的领导下，选举程序逐渐建立。台湾人开始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占多数，并在地方政府中占据大多数职位，与此同时，“大陆人”继续控制着国民政府。

经济发展得到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土地改革的推动。在1948年只是为促进农业技术而在大陆创建的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发现减租、改进租约和最终实现由耕作者取得其土地所有权（于1964年实现）对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问题是必要的。通过农民协会（从日占时期遗留下来的）的帮助，技术教育者、乡村手工业者、贷款和合作团体发

挥综合效能，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国民援助计划的乡村发展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

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从前在经济上依赖于供应日本市场的食糖和稻米生产的情形不得不进行重大改变，以便取得更大程度的自给并在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推动工业发展。1905年时的三百万人口到1940年时已接近七百万；随着二百万或更多的人从大陆拥入，总人口到1958年时为一千一百万左右，1976年达到一千六百万。但与大陆相比，台湾的生活水平较高，而且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也高得多。发展是在政府控制 523 或垄断工业的总框架中进行的。约二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在促进这种发展。由于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致工业化后来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继续迅速进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和美国的投资。

美国在1949年的态度是拒绝对该岛承担责任——但继续提供经援而不提供军援，这是从中国脱身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1950年北朝鲜的侵略导致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与此同时，根据一项军援计划，1954年后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派驻军事顾问团以资协助。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进行印度支那战争，美国将台湾作为一个前哨基地来使用。当它在1971年被联合国剥夺代表中国的资格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与大部分国家的外交关系，但它的外贸仍在继续扩大。在1972年2月的尼克松—周恩来公报中，中国方面声明台湾的地位严重阻碍了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然而，美国此后对台湾的贸易和投资仍在增长，1954年的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当蒋介石于1975年去世时，他的儿子、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成为主要政府首脑。这样，台湾，或更确切地说美国所承认的民国政府——它仍然与强大得多的人民共和国处于战争状态——继续是中美关

系中一个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与美国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对待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有关的是日本的例子。1971年7月美国对华政策秘密而出乎意料的改变在东京造成了一次完全能够理解的“尼克松震荡”，促使日本迅速与北京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的中日条约重建了外交关系并重申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即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当日台外交关系结束时，在新建立的由原外交人员组成的非官方“协会”的帮助下，贸易和旅游关系仍得到保持。这样，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得到公开的确认，同时台湾单独自治的事实在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维持原状。

在上海公报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向两国关系正常化前进的速度因受到以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8月的辞职为高潮的水门事件调查的干扰而变得缓慢下来。基辛格博士数度出访北京，1975年12月福特总统也出访北京，重申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然而，北京和台北都继续在华盛顿驻有代表，这在其他任何首都或国际组织中都不曾有过。

第七节 转变中的革命

524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党的机构中“走资派”的攻击，使中国的领导层在70年代早期处于严重的分裂。一个部分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极端激进派别为了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而坚持开展毛泽东对追求私利的物质主义的道德讨伐。其迫害手段在“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的口号中显露出来。由大部分在职的行政官员组成的更讲求实际的派别仍对促进经济生产的物质刺激和

推动中国物质进步的技术手段表示关注。在毛主席的晚年，“激进派”曾一度控制了宣传工具，而“务实派”则掌握了行政大权（这些词是用来描述一种难以理解的形势的外国术语）。

在林彪于1971年9月倒台之后，军方在政府中的作用遭到削弱，党也得到重建。一千二百多名代表着二千八百万名党员的代表出席了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秘密召开，会期仅四天。代表文革积极分子的年轻人出现在领导层中。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基础更加广泛。在1973—1974年，尽管林彪、孔子二人在历史上相隔二千五百年，一场“批林批孔”的学习运动还是开展起来以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1975年1月，有二千八百名代表参加的、简短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通过了新宪法。这次大会力求显示党的团结的恢复，从而为领导人的变更作准备，因为任总理的周恩来和任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在当时都患了重病。

经过七年的默默无闻之后，曾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不久便恢复权力。他曾被指责为第二号“走资派”，并被当作文革的攻击对象。显然，他促进了军方在政府中作用的削弱。到1975年，邓小平是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军队总参谋长和政府第一副总理。当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时，邓小平任代总理^①，——这个身材不高、率直刚强的人决心有所建树。但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后仍在世，政治局在4月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任命相对而言不够著名的华国锋为代总理。在造成巨大破坏的1976年7月的唐山地震之后，毛泽东于9月9日去世。华国锋不久便继任党的主席。而在中央委员会最高层的四名文革领导者，包括毛的遗孀江青在内，几乎立即被剥夺权力。他们对北京电台和《人民日报》等

^①原文如此。——译者注

宣传工具的控制到此结束。他们被按照程序指责为反党分子，525而邓小平则再度复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的道德讨伐不会再次重现。

这些领导人的更替代表着有关政策的斗争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外国新闻机构经常认为的那样是赤裸裸的个人“权力斗争”。中央委员会不管具有如何的无私和奉献精神，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而在选择中，正当的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中国的领导人专心于按照革命学说制订大规模的计划，因此他们必须就一条内容广泛的全党路线形成一致的意见，这对于西方的那些自由放任的资本家和福利国家的立法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咄咄逼人或至少最不甘寂寞的利益集团将文革的精神当作一种神圣的信仰加以坚持。它拥护毛泽东继续进行精神革命以解放老百姓并改造他们的动机，主张与资产阶级的自私性、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由来已久的罪恶进行斗争，并专门给受挫的年轻一代的党的积极分子提供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事业。与之相对立的是具有竞争性的对于现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其用语比较容易为局外人所理解——如何使食品供应量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诸如在河北、山东沿海和近海等地新发现的储量丰富的石油，如何平衡保持自给和如何获得外国技术和资本，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大堆问题。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如何用毛泽东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动力来满足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国的爱国主义愿望。决策者们在是对国家力量进行投资还是对本国人民的生计进行投资的问题上不断面临着选择。

周恩来和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这标志着那些在1921年前后(五十五年之前)将马列主义作为中国救星的革命领导人的消逝。他们领导的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

无法作出评价——比如，中国人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并建成一个国家；他们创立了新的巨大的政府机构和工业体系。中国经历了剧烈的起伏。在这一代人的活跃时期中，统一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1923—1928）、南京政府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1928—1937）和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破坏，都为共产党人在延安建立新制度（1936—1946）和他们在内战中的胜利（1947—1949），并接着将中国重建为人民共和国等开辟了道路。当毛泽东和周恩来从1949年至1976年像位居国家和社会顶层的传统的天子及其宰相的继承人那样发挥作用时，
323 他们又是在以革命者的姿态致力于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他们的成就是全体人民的成就，这个成就是经过多年的艰难困苦、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动员集体力量的前提下取得的。但是，这样创立的新制度还有待于巩固，在关于中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社会革命的侧重点上仍存在争论。

由于其众多的人口，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特殊问题是如何在避免忽视乡村方面的同时加强工业、如何在建设强大的国家工业的同时使乡村的民众摆脱物质上的贫困。

在开始的二十五年中，中央对国营企业赢利的再投资的计划和控制有助于使中国工业产量每年增长约11%，即每七年翻一番。为了这个目的，生产资料起先从社会主义阵营进口（1952—1973年之间进口了价值六十五亿美元的机械），尽管西方到1960年为止禁止将这类货物运往中国。事实上，从1949年到1973年，机械制造工业每年增长20%，钢铁产量的增长幅度以及1965年后石油生产的增长幅度也保持在这个百分比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国。但是运输仍是一个薄弱点：20世纪70年代的五万公里铁路和六十五万公里公路对于幅员如此辽阔的这个国家来说是处于最低的水平上的。

另一个薄弱点是农业生产。怎样才能使之现代化从而提高其生产力呢？农业机械化是从用电动水泵替代传统的运水劳动开始的。到1973年，五分之二的耕地得到灌溉。与此同时，小型拖拉机在田地里和道路上使用，数十套化肥生产装置也已引进。分散在各地的小型乡村工业——铸铁厂、化工厂、面粉厂、水泥厂和砖窑——减少了乡村对运输的依赖，增强了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自给能力。但同时定量供应的粮、布和其他消费品的人均消费量并没有明显增长，物价和工资也是如此。勤劳的民众获得了安全和社会服务，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得十分缓慢。假定人口年增长率为1.5%左右，那么食品供应就必须增长2%左右，以使生活水平得到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提高。粮食进口将仍然是必要的。因此，不能指望情况会迅速改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将继续是按人均计算最穷的国家之一。

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建设的一个附带成果是考古学上的革命。许多新石器时代和商代的遗址得到发掘。秦朝和汉朝的第一代皇帝、唐朝和其他时代的坟墓中出土了令人惊叹不已、眼花缭乱的青铜器、雕塑、陶器、纺织品、墓中图画、铭文和其他艺术品，这些坟墓的位置和年代第一次得到精确的测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蔚为壮观的展品到日本、西 527 欧和北美等地展出。

中国的外交政策致力于领导“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去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所谓控制或“霸权”。作为对非洲提供外援的典范，中国于1975年完成了坦赞铁路的修筑。中国的国内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增长，工业生产在70年代中期可以比得上十五年以前的日本。与此同时，中国的卫星绕地球运行，核试验在缓慢地继续着，一支庞大的负责海岸防御的海军已建成——一个强国正在形成中。在

1977年8月，代表着三千五百万党员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确认恢复邓小平的最高领导地位。显然，这似乎将迎来一个工业现代化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束。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A

- Abhai, 皇太极, 215
Africa, Chinese aid to,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526
Agricultural Credit Administration, 农本局, 458
Aigun, Treaty of, 瑟珲条约, 302
Ainu, 阿伊努人, 6
Alaska, 阿拉斯加, 301, 366
Alcock, Rutherford, 阿礼国, 310, 323, 328-329
Alcock Convention, 中英新定条约, 329, 386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 367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中华全国总工会, 484
All Men Are Brothers(*Shui-hu chuan*), 《水浒传》, 236, 377
Altan Khan, 倭答汗, 202-203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海外布道会, 287, 320
Amherst embassy, 阿美士德使团, 257
Amoy, 厦门, 282, 283
Amur River, 阿穆尔河(黑龙江), 253, 302, 366, 508
Amur River Society, 阿穆尔河会(黑龙会), 406
An-fu (Anhwei-Fukien) clique, 安福系, 426, 435
An Lu-shan, 安禄山, 120
An Shih-kao, 安世高, 91

- An-yang, 安阳, 19—20, 21, 22, 27, 28; royal tombs at, 主陵, 30, 460
- Analects(Lun-yu)*, 《论语》, 42, 44, 149
- "Ancient text"(ku-wen), "古文", 66, 267, 273
- Anglo-Chinese trade, 中英贸易, 254—255, 256—257
- Anglo-Chinese War, 中英战争, 277—284
- Anglo-French war with China, 英法对中国的战争, 299—301
- Anglo-Japanese Alliance, 英日同盟, 440
- Anhwei Army(*Huai chun*), 淮军, 303, 304, 313, 324, 337, 395
- Annam, 安南, 352; 另见 Vietnam
- Anti-Comintern Pact, 反共产国际协定, 464
- Arabs, 阿拉伯人, 99, 136, 169; trade with, 与他们的贸易, 174
- Army of the Green Standard (*Lu-ying*), 绿营, 223, 395
-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A.P.C.), 亚细亚石油公司, 429
- "Autumn Harvest" insurrection, "秋收"起义, 450

B

- Bandung Conference, 万隆会议, 501
- Bank of China, 中国银行, 457
- Bank of Communications, 交通银行, 400, 457
- "Banner" (*ch'i*) system, 八旗制度, 214, 222—223
- "Bannermen", 八旗兵, 238, 247, 395
- Batu, 拔都, 165, 166
- Belgium, 比利时, 370
- Bering, Vitus, 白令, 维图斯, 301
- Black Dragon Society, 黑龙会, 466
- "Black Khitan" empire, 黑契丹帝国, 160
- Black Pottery(*Lung-shan*) culture, 黑陶(龙山)文化, 18, 19, 21, 31
- Blue Shirts, 蓝衣社, 462

- Board of Academicians (*Hsueh-shih-yuan*), 学士院, 124
Board of Censors (*yu-shih-t'ai* or *Tu-ch'a-yuan*), 御史台,
都察院, 105, 159
Bodhisattvas, 菩萨, 88, 89
Bon, 本教, 169
Book of Lord Shang (*Shang chun shu*), 《商君书》, 55
Borodin, Michael, 鲍罗廷, 443, 444
Boxer movement, 义和团运动, 376—382, 386
Boxer Protocol, 辛丑条约, 284, 382—383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B. A. T.), 英美
烟草公司, 429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 254—255, 256,
257, 271, 272, 273, 275—276
Bronze age, 青铜时代, 19—20, 27, 29
Buddha, 佛陀, 87
Buddhism, 佛教, 83, 84, 86—92, 106—110, 169; Mahayana,
大乘教, 88, 89, 107; Theravada (Hinayana), 小乘教,
88; persecution of, 遭受迫害, 109, 148; and literary and
scholarly talent, 与文学和学术才能, 114—115; and
Confucianism, 与儒学, 148, 150; and Kubilai Khan,
与忽必烈汗, 169; Tien-t'ai, 天台宗, 179; in Tibet, 在
西藏, 220; 另见 Zen Buddhism, 禅宗, 124
Bureau of Military Affairs (*shu-mi-yuan*), 枢密院, 124
Burlingame, Anson, 濮安臣, 328
Burma, 缅甸, 366, 370, 469, 480
Burma Road, 滇缅公路, 469—470
Butterfield and Swire, 太古洋行, 429

C

Cambodia, 柬埔寨, 352, 517

- Cantlie, James, 康德黎, 408
- Canton, 广州, 136, 169, 199, 283, 403; Western influence in, 西方的影响, 288—289; rise of nationalism in, 民族主义的兴起, 291; antiforeignism in, 排外情绪, 299, 355; capture of, 陷落, 300; Chiang's coup at, 蒋介石的政变, 449
- "Canton Revolution", "广州革命", 413
- Castiglione, G. (Lang Shih-ning), 郎世宁, 248
- Caucasoid man, 高加索人种, 5, 6
-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千佛洞, 109
- Censorate, 御史, 都察使, 184, 185, 234; 另见Board of Censors
- Central Asia, 中亚, 112, 200, 301; peoples and kingdoms, 民族与王国, 153; languages of, 语言, 153, 154; trade routes of, 商路, 170; colonial expansion into, 对其殖民扩张, 347—349; 另见Mongols
- Central Bank of China, 中央银行, 457
- Chaghadai, 察合台, 165, 166, 200, 348
- Ch'an sect, 禅宗, 见Zen Buddhism
- Chang Ch'ien, 张骞, 63
- Chang Chih-tung, 张之洞, 354, 355, 358, 371, 372, 374, 375, 382, 392, 394, 396, 401, 402, 411
- Chang Chu-cheng, 张居正, 208
- Chang Hsien-chung, 张献忠, 209—210
- Chang Hsueh-liang, 张学良, 451
- Chang Ping-lin, 章炳麟, 410, 411
- Chang Po-ling, 张伯苓, 393
- Chang Tso-lin, 张作霖, 425, 426
- Ch'ang-an, 长安, 77, 97, 105—106
- "Change of method" (*pien-fa*), "变法", 372
- Changsha, 长沙, 374
- Chao K'uang-yin(Sung T'ai Tsu), 赵匡胤(宋太祖), 123, 124, 125, 127

- Chao, Y.R., 赵元任, 432
Chao state and dynasty, 赵国与赵王朝, 37, 56, 94
Chefoo Agreement, 芝罘条约(烟台条约), 284
Chen-yen sect, 真言宗, 107
Ch'en Kuo-fu, 陈果夫, 455
Ch'en Li-fu, 陈立夫, 455
Ch'en Tu-hsiu, 陈独秀, 432, 433, 434, 437, 438, 443, 450
Ch'en dynasty, 陈朝, 82
Cheng Ch'eng-kung(*Kuo-hsing-yeh*, "Koxinga"), 郑成功("国姓爷"), 216—217
Cheng-chou, 郑州, 19, 28
Cheng Ho, 郑和, 197, 198, 199, 407
Cheng-hsueh Hsi, 政学系, 455
Ch'eng Hao, 程顥, 149
Ch'eng I, 程顥, 149
Chennault, C. L., 陈纳德, 469, 470
Ch'i("ether", "matter"), 气, 149—150, 232
Ch'i-ying, 菲英, 283
Chia-ch'ing, 嘉庆, 241
Chiang Ching-kuo, 蒋经国, 522
Chiang Ch'ing, 江青, 511, 524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398, 443, 445, 449, 450, 451, 452, 453—455, 456, 462, 464, 467, 470, 472, 473, 481, 522
Chien-sheng(degree-holder by purchase), 监生, 260
Ch'ien-lung, 乾隆, 228, 232, 235, 236, 240, 242, 248, 371, 401
Chin, duke of, 晋公, 39
Chin Ping Mei (*Golden Lotus*), 《金瓶梅》, 237
Chin-shih (degree-holder), 进士, 103, 104, 126, 188, 228
Chin Wu Ti, 晋武帝, 81,
Chin state and dynasty, 晋(金)国与晋(金)王朝, 35, 102,

131, 153, 159—162, 164; Western, 西晋, 81; Eastern, 东晋, 82; Later, 后晋, 122

Ch'in Kuei, 秦桧, 131

China, 中国, land and people, 国土与民族, 3—6; languages of, 语言, 6—8; geographical setting of, 地理背景, 9—11; tradi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传统经济与社会, 11—16, 20—22; classic, the golden age, 经籍, 黄金时代, 33—54; first empire of, 第一个帝国, 55—82; regeneration of empire, 帝国的复兴, 83—115; second imperial period, 第二个帝国时期, 96—115; late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唐代后期与宋代, 116—151; under the Mongols, 蒙古人统治, 167—176; under the Ming, 明代统治, 177—221; under Ch'ing rule, 清代统治, 222—230; late imperial, 帝国后期, 230—238; nineteenth century, 19世纪, 258—306; British relations with, 与英国的关系, 276, 277, 281, 282—283, 299—301; restoration of Ch'ing government, 清政府的复苏, 303—306, 312—319; opening of, 开放门户, 305—306; late Ch'ing period, 晚清时期, 307—312, 340—345, 358, 365; imperialism in, 帝国主义入侵, 346—370, 383—386; response of, to West, 对西方的反应, 349—350, 381—390, and Sino-French War, 中法战争, 352—355; weaknesses and strengths of, 软弱和强大, 386—390; Revolution of 1911, 辛亥革命, 405—415;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426; revolution in thought and culture of, 思想文化的革命, 428—439; Nationalist, 国民党统治, 452—462; Japan's aggression in, 日本的侵略, 462—472; the People's Republic, 人民共和国, 473—52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504—514; Sino-American relations, 中美关系, 514—518;另见Nationalist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Association, 中国协会, 369

-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中国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 431
-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 406—461
- China Mail,** 《中国差报》, 342
-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轮船招商局, 337—338, 403
- "China Revival Society"** (Hua-hsing Hui), "华兴会", 410
- China's Destiny** (Chiang), 《中国之命运》(蒋介石), 467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 中国共产党, 184, 438, 442, 443—444, 446, 447, 452, 464, 471, 473—482; split between KMT and, 与国民党决裂, 449—451, 480—482; cooperation of KMT and, 与国民党合作, 464—465, 475; ideology of, 思想体系, 477—480; cadres in, 干部, 479, 482, 487, 497, 506, 509, 510; structure of, 组织机构, 483—484; problems within, 内部问题, 509—511; purges in, 清洗, 511;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511—514; accomplishments and problems, 成就与问题, 523—526
-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中东铁路, 368, 442
- "Chinese learning for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Western learning fo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Chung-hsueh wei t'i, Hsi-hsueh wei yung*),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372
-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287
-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Chung hua Ko-ming Tang),** 中华革命党, 424
-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473
- Chinese Turkestan,** 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 218, 301, 347, 348, 349
- Ching-te-chen,** 景德镇, 186, 205
- Ch'ing, Prince,** 庆亲王, 396,
- Ch'ing dynasty,** 清代, 152, 177; rise of, 兴起, 211—222; rule extended over China, 统治扩展至整个中国, 222—230;

culture under, 文化, 237—238; decline of, 衰落, 238—243; and Western contacts, 与西方的接触, 243—257; nineteenth-century, 19世纪, 258—306; restoration of government of, 政府的复苏, 303—306, 312—319; late history of, 晚期历史, 307—345; and Western imperialism, 与西方帝国主义, 355—370, 386; late reforms in, 晚期的改革, 391—405; end of, 覆灭, 413—415

Chinggis Khan, 成吉思汗, 163—165

Chou, duke of, 周公, 22, 31

Chou dynasty, 周代, 21—22, 98; early, 前期, 31—32; Western, 西周, 33; Eastern, 东周, 33, 34, 35, 37, 40—43; Later, 后期, 33—40, 121—122;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 技术和经济, 34—35; states of, 列国, 35—37; political and social innovations of, 政治和社会革新, 38; military developments in, 军事发展, 38; search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in, 寻求政治稳定, 39—40; philosophers in, 哲学家, 40—54; Northern, 北周, 96, 100

Chou En-lai, 周恩来, 438, 446, 464, 482, 483, 501, 518, 523, 524, 525

Chou Kung, 周公, 22, 31

Chou-Li(Rituals of Chou), 周礼, 294

Chou Tun-i, 周敦颐, 149

Christianity, 基督教, Nestorian, 景教, 111, 169, 171, 174; the crusades, 十字军, 171; Jesuits, 耶稣会士, 244—246; in China, 在中国, 249—251, 287, 319—324, 436, 460—461; hostility to, 遭敌视, 250, 251, 287, 319—324, 377, 436

Chu Hsi, 朱熹, 147, 149, 150, 151

Chu Teh, 朱德, 473

Chu Yuan-chang(Hung-wu), 朱元璋(洪武), 179—180, 182, 183, 194, 195, 196—197

Ch'u state, 楚国, 35, 39, 40, 56

- Chu tz'u* (*Elegies of Ch'u*), 《楚辞》, 43
Chu-jen degree, 举人, 188, 393
Ch'u Yuan, 屈原, 43
Ch'uan-chou (Zayton), 泉州(刺桐), 136, 169, 174, 199, 275
Chuang-tzu, 《庄子》, 47, 48
Ch'un, Prince, 醇亲王, 401
Ch'un ch'iu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春秋》, 42, 43, 68—69, 267
Chung-kuo ("Middle Kingdom"), 中国(中央王国), 20, 202
Chung-shan, 中山, 见Sun Yat-sen
Chung yung (*Doctrine of the Mean*), 《中庸》, 42, 149
Chungking, 重庆, 465, 467
Chusan Island, 舟山岛, 186, 261, 280
"Circuits" (*tao*, later *lu*), "道", 后为路, 124—125
Classic of Changes (*I Chings; Book of Divination*), 《易经》, 42, 149
Classic of Documents (*Shu ching; Book of History*), 《书经》, 42, 66, 232, 267
Classic of Songs (*Shih ching; Book of Poetry*), 《诗经》, 41
Cochin China, 交趾支那, 352, 354
Cohong (*kung-hang*), 公行, 256, 276
Cold war, 冷战, 501, 515, 517
Collected Essays on Statecraft under the Reigning Dynasty (*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 《皇朝经世文编》, 268
Collected Statutes (*Hui-tien*), Ming, 《明会典》, 202
Comintern, 共产国际, 见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mandery (*wei*) system, 卫所制度, 212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405, 439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共产国际, 438, 442—444, 449, 450, 452, 464, 479
Communist Party of Indo-China, 印度支那共产党, 515

- Comprehensive Compendium (T'ung tien)*, 《通典》, 147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The (Tzu-chi ht'ung-chien), 《资治通鉴》, 147
Confucia, 儒学, 16, 41, 42, 44—46, 49, 50, 51, 91—92, 104; during the Han, 在汉代, 68—70; in China, 在中国, 74, 84, 193, 194, 195, 259, 312—319, 432, 435—436; return to, 恢复, 117, 147—151; and Christianity, 与基督教, 249, 250; reinterpreted, 重新解释, 312—319, 373—374, 490—491, 494; attacked, 受攻击, 436;另见 Neo-Confucianism
Confucius (K'ung-fu-tzu), 孔子(孔夫子), 41, 42, 44—46, 373
Connecting Canal (*Hui-t'ung ho*), 会通河, 204
Constitutional Compact, 中华民国约法, 419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立宪运动, 400—402, 411
County or district (*hsien*), 县, 160, 185, 188
Creation Society, 创造社, 439
Crusades, 十字军, 171
Cuba, 古巴, 385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504—507, 511—514, 526
Cushing, Caleb, 顾盛, 283

D

- Dalai Lama, 达赖喇嘛, 220, 222, 504
Defense Army, 防军, 395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417
Democratic Women,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484
Democratic Youth,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484
Dent, Thomas, 登特, 托马斯, 272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行记》, 171, 174

- Dewey, George, 杜威, 乔治, 385
Dewey, John, 杜威, 约翰, 432, 435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Yen-t'ieh-lun*), 《盐铁论》, 73
Disquisitions (*Lun heng*), 《论衡》, 84
Doctrine of the Mean (*Chung yung*), 《中庸》, 42, 149
Dominicans, 多明我会士, 249, 287, 320
Dorgon, 多尔袞, 215, 216
Double Tax, 两税法, 121, 187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Hung lou meng*), 《红楼梦》,
237

E

- East Asia, 东亚, 2—3, 3—8
East Asian Common Culture Society (*Toa Dobun Kai*), 东亚
同文会, 406
“Eastern ethics and Western science”, “和魂洋才”, 372,
Eighth Route Army, 八路军, 477
“Eight-legged essay” (*pa-ku-wen*), “八股文”, 190, 231, 392
Elegies of Ch'u (*Ch'u tz'u*), 《楚辞》, 43
Elgin, Lord, 额尔金勋爵, 300
“Empirical research” (*K'ao-cheng hsueh*), “考证学”, 232
Encyclopedia of the Yung-lo Period (*Yung-lo ta-tien*), 《永
乐大典》, 190—191
“Equal field” (*chun-t'ien*) system, “均田
制”, 100, 102, 118—119
Europe, 欧洲, modern rise of, 近代的兴起, 177; expansion
of, 扩张, 243—244; cultural relations of China and, 与
中国的文化关系, 246—251; trade with, 贸易关系, 254—257
“Ever-Victorious Army” (*Chang-sheng chun*), “常胜军”, 304
Exhortation to Study (*Chuan-hsueh p'ien*) (*Chang*), 《劝学篇》
(张之洞), 375

F

- Fa-hsiang sect, 法相宗, 107
Fa-hsien, 法显, 91
Farmers Bank of China, 中国农民银行, 457
Feng-shui, 风水, 322
Feng Yu-hsiang, 冯玉祥, 425, 426—427, 454
Finance Commission(*San-ssu*), 三司, 124
“Five-anti” movement, “五反”运动, 488—489
“Five Barbarians”, “五胡”, 94
Five Classics, 五经, 41—42, 190, 342
Five Dynasties(*Wu-tai*), 五代, 121—123
“Five elements” (*wu hsing*), “五行”, 50, 65, 372
Five Erudites, 五经博士, 69
Five Pecks of Rice band, 五斗米道, 79, 85
“Five-power constitution”, “五权宪法”, 411
Foochow, 福州, 283; arsenal at, 船政局, 312; destruction
of fleet at, 水师覆没, 354
Ford, Gerald, 福特, 杰拉尔德, 523
Formosa, 福摩萨; 见 Taiwan
Four Books, 四书, 42, 149, 190
Four Noble Truths, 四谛, 87
“Four olds”, “四旧”, 511
France, 法国, and Chinese treaty system. 与中国的条约体系
283, 284, 324, 325, 385; Shanghai concession of, 上海的
租界, 299; and Vietnam, 与越南, 361—362, 501, 515;
work-study movemen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中国学生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431, 438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士, 240, 320

Fu(prefectures), 府, 188
Fu("prose poetry"), 赋, 66, 114
Fu Chien, 荷坚, 94
Fu-k'ang-an, 福康安, 238, 239
Fukien, 福建, 136, 382
Fukuzawa Yukichi, 福泽谕吉, 364, 407

G

Galdan, 噶尔丹, 218
Gandhara, 檀陀罗, 112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1954年日内瓦会议, 601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见Chinggis Khan
George, Henry, 乔治, 亨利, 411, 445
Germany, 德国, in China, 在中国, 368, 369, 370, 379, 385
396, 420, 426; Nationalist Chinese relations with, 与国民党中国的关系, 456
Ginling College, Nanking,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南京, 430
Globe Magazine (*Wan-kuo kung-pao*), 《万国公报》, 345, 371
"God Worshippers Society" (*Pai shang ti hui*), 拜上帝会, 292
Gordon, Charles George, 戈登, 304—305
Goto Shimpei, 后藤新平, 519
"Government supervised, merchant operated" (*Kuan-tu shang-pan*), "官督商办", 337, 338, 340
Governor(*hsun-fu*), 巡抚, 185
Governor general(*tsung-fu*), 总督, 186
Grand Canal, 大运河, 102, 170, 204—205, 289
"Grand Constitutional Era" (*Hung-hsien*), 洪宪, 421
Grand Council (*chun-chi ch'u*), 军机处, 227, 310, 374
Great Britain, 英国, economic expansion of, 经济扩张, 271—
272, 275; and opium trade, 鸦片贸易, 273, 277—284, 285,

- relations with China, 与中国的关系, 276, 277, 281, 282—283, 300, 420, 451; and treaty system, 条约体系, 283—284, 385; colonialism of, 殖民主义, 346; East Asian policies of, 东亚政策, 366, 368—370
-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 497—500, 508
- Great Learning (Ta hsueh)*, 《大学》, 42, 149
- "Great Peace" (*T' ai-p' ing*), 太平, 293
- Great Wall of China, 中国的长城, 11, 38, 57, 64, 96
- "Green gang" (*Ch'ing-pang*), "青帮", 447
- Guam, 关岛, 385
- Guards system (*wei-so*), 卫所制度, 185
- Guild halls (*hui-kuan*), 会馆, 205

H

- Hami (or Komul) region, 哈密地区, 347
- Han-fei-tzu*, 《韩非子》, 53
- Hangchow, 杭州, 131—132, 234
- Han Learning (*Han hsueh*), 汉学, 231, 232, 267, 373
- Han state and dynasty, 汉国与汉王朝, 37, 56, 59—65; Later, 东汉, 59, 75—79, 84; thought and scholarship in, 思想与学术, 65—70; end of, 覆灭, 79—82
- Han-Yeh-P'ing Coal and Iron Company,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403, 421
- Han Yu, 韩愈, 146, 148, 149
- Hanlin Academy (*Han-lin yuan*), 翰林院, 190
- Hanoi, 河内, 517
- Hart, Robert, 赫德, 310—311, 328, 329, 341, 354, 378, 385, 401
- Hawaii, 夏威夷, 385
- Hay, John, 海约翰, 385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天地会; 见Triad Society
"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 (*T'ai-p'ing t'ien-kuo*),
“太平天国”, 292—293; 另见Taiping Kingdom and Rebellion
"Heavenly Master" (*T'ien Shih*), “天师”, 86
"Heavenly Principle" (*T'ien-li*), “天理”, 192
Hinayana(Theravada) Buddhism, 小乘教, 88
Historical Records (*Shih chi*), 《史记》, 66, 67—68
History of the Han (*Han shu*), 《汉书》, 68
Ho Chi Minh, 胡志明, 515
Hong Kong, 香港, 280, 283, 286, 329, 368, 370, 446, 447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汇丰银行,
334, 457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338
Ho-shen, 和珅, 239—240
Houqua (Wu Hao-kuan), 伍浩官, 275, 280
Hsi Hsia(West Hsia) kingdom, 西夏王国, 160, 185, 188, 467
Hsia dynasty, 夏代, 21, 30
Hsia Kuei, 夏珪, 144, 235
Hsiang Yu, 项羽, 59
Hsiao T'ung, 萧统, 114
Hsien (subprefecture, county), 县, 160, 185, 188 467
Hsien-feng, 咸丰, 303
Hsien-pei tribes, 鲜卑部落, 94, 153
Hsin("New") dynasty, 新朝, 74
Hsin-an merchants, 新安商人, 205
Hsiu-ts'ai ("flowering talent"), 秀才, 188
Hsiung-nu, 匈奴, 60, 63, 64, 76, 81, 94, 153
Hsu Paul (Hsu Kuang-ch'i), 徐光启, 247, 249, 287
Hsuan-te, 宣德, 235
Hsuan-tsang, 玄奘, 91, 107
Hsuan Tsung(Ming Huang), 玄宗(明皇), 98, 118, 120

Hsuan-t'ung, 宣统, 401, 415; 另见Pu-yi
Hsun-tzu, 荀子, 52-53
Hu Han-min, 胡汉民, 442, 454, 455
Hu Shih, 胡适, 432, 433, 435, 436, 438
Hua Kue-feng, 华国锋, 523—524
Huai-nan-tzu, 《淮南子》, 66
Huan, Duke, 桓公, 17, 39
Huang Ch'ao, 黄巢, 121
Huang Ho (Yellow River), 黄河, 8—10, 289—290, 377
Huang Hsing, 黄兴, 410—411, 412, 413, 414, 416, 419, 424
Hue, 顺化, 351
Hui Tsung, 徽宗, 130—131
“Hukuang railways”, “湖广铁路”, 403
Hulegu, 旭烈兀, 165
Hunan, 湖南, 374, 387, 411
Hunan Army(Hsiang chun), 湘军, 296, 303, 313, 395, 396
Hundred Days, 百日维新, 374—376, 392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百花齐放运动, 496, 498, 511
“Hundred Schools”, “诸子百家”, 49
Hung Ch'eng-ch'ou, 洪承畴, 225
Hung Hsin-chuan, 洪秀全, 292, 293, 295, 408
Hung-wu, 洪武, 180, 182, 183, 194, 195, 196—197, 212
Hung League, 洪门; 见Triad Society
Huns, 匈奴, 60, 76, 153
Hupei, 湖北, 411
Huxley, T.H., 赫胥黎, 372, 395

Ibn Batuta, 伊本·白图泰, 174
Ibsen, Henrik, 易卜生, 亨利克, 422

- I ching* (*Classic of Changes, Book of Divination*), 《易经》, 42
I-ching, 义净, 91
Ignatiev, Nikolai, 伊格那提也夫, 尼古拉, 302
I-ho chuan, 义和拳, 见Boxer movement
I-hsin, 契诉; 见Kung, Prince
Ili region, 伊犁地区, 218, 301, 348, 349
Il-Khans, 伊儿汗, 166
Illustrated Gazetteer of the Countries Overseas (*Hai-kuo t'u-chih*), 《海国图志》, 285
Imperial Chancellery (*Men-hsia-sheng*), 门下省, 105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户部, 256, 359
Imperial Secretariat (*Chung-shu-sheng*), 中书省, 105, 182
Imperial Universities, China, 京师大学堂, 393
India, 印度, 3, 112; Country trade of, 国家贸易, 271; opium sent to China from, 向中国运送鸦片, 273—274, 285, 316; tea exported by, 出口茶叶, 332;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504;
Indo-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印度支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501; 另见Cambodia, Vietnam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印尼共产党, 509
Inner Mongolia, 内蒙古, 218, 421, 496, 500
Intendants of circuit (*tao-t'ai*), 道台, 185—186, 299, 311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 洲际弹道导弹, 504
Interpreters College (*T'ung-wen Kuan*), 同文馆, 311, 372, 393
Islam, 伊斯兰教, 111, 119, 148, 169, 171, 174, 297, 348; 另见 Muslim rebellion
Italy, 意大利, 384, 385
Ito Hirobumi, 伊藤博文, 364, 365, 401

J

Japan, 日本, pirates of, 鎖寇, 196, 197, 203; Ming troubles with, 与明王朝的纠葛, 203—204; relations of China with, 与中国的关系, 350, 368—370, 384, 385, 415; rivalry in Korea, 在朝鲜的对抗, 362—365;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365—366; contrasted with China, 与中国的对比, 387; influence on China of modernization by, 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393, 401; Chinese students in, 中国留学生, 394, 431;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与辛亥革命, 405—406; aggression of, in China, 对中国的侵略, 420—421, 451—452, 456, 462—468, 471; after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440—441;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第二次中日战争, 464—468, 524

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 怡和洋行, 276, 280, 285, 333, 339, 359, 429

Jenghiz Khan, 成吉思汗; 见Chinggis Khan

Jesuits in China, 耶稣会士在中国, 244—246, 249, 250, 253, 287, 320; in Korea, 在朝鲜, 361

John of Montecorvino, 孟德高维奴的约翰, 171

Johnson, Lyndon B., 约翰逊, 林登, 517

Juan Yuan, 阮元, 269, 271, 275, 278

Judaism, 犹太教, 111

Jung-lu. 荣禄, 376,

Jurchen, 女真, 131, 153, 159—160; as origin of Manchus, 满族的起源, 211; growing power of, 势力增长, 212, 213;另见 Chin state and dynasty

K

Kailu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开滦矿务局, 338, 446

- Kaiping Mining Company, 开平矿务局, 338
- Kanagawa, Treaty of, 神奈川条约, 284
- K'ang-hsi, 康熙, 215, 216, 218, 220, 227, 228—229, 250, 253, 295, 401
- K'ang-hsi Dictionary* (*K'ang-hsi tzu-tien*), 《康熙字典》, 229
- K'ang Yu-wei, 康有为, 371, 373—374, 375, 391, 406, 407, 410
- Kanghwa, Treaty of, 江华条约, 284
- Kao Hsien-chih, 高仙芝, 99, 119
- Kao Tsu (Liu Pang), 高祖(刘邦), 59—60, 68
- Kao Tsung, Sung, 宋高宗, 131
- Kao Tsung, Tang, 唐高宗, 98
- Kara-Khitai, 哈喇契丹, 160
- Kashgaria, 喀什噶尔, 348
- Khitan (Ch'i-tan), 契丹, 122, 123, 124, 153, 157—160; 另见 Liao dynasty
- Khoja family, 和卓家族, 348
- Khokand khanate, 浩罕汗国, 348
-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晓夫, 尼基塔, 508
- Khubilai Khan, 忽必烈汗, 165, 167, 168, 170
- Kiahta, 怡克图, 302
- Kiangnan Arsenal,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312
- Kiaochow, 胶州, 369
- Kim Il-sung, 金日成, 491
- Kim Ok-kyun, 金玉均, 364
- Kipchak, khanate of, 钦察汗国, 165
- Kirghiz, 蒙古族, 120
- Kissinger, Henry, 基辛格, 亨利, 518, 522
- "Knowledge of practical use to society" (*ching-shih chih-yung*), 经世致用, 231
- Knox, Philander C., 诺克斯, 菲兰德, 403
- Kodama Gentaro, 儿玉源太郎, 519

- Korea, 朝鲜, Chinese relations with, 与中国的关系, 136, 359; colonial expansion into, 对其殖民扩张, 347, 359—368; rebellion and restoration in, 叛乱及复旧, 361—362; opening of, 开放门户, 362—363; Sino-Japanese rivalry in, 中日冲突, 363—365;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365—366
-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488, 491—493, 501
- Koryo dynasty, 高丽王朝, 359
- Koxinga(Cheng Ch'eng-kung), 国姓爷 (郑成功), 216—217
- Kropotkin, Peter, 克鲁泡特金, 彼得, 422, 431
- Ku K'ai-chih, 顾恺之, 112
- Ku Yen-wu, 顾炎武, 231
- Kuan-tzu, 管子, 37, 38
- Kuang-hsu, 光绪, 336, 374—375, 376, 391, 401, 406
- Kuang Wu Ti, 光武帝, 75—76, 80
- Kung, H.H., 孔祥熙, 454
- Kung, Prince, 恭亲王, 303, 309, 310, 329, 336, 354, 396
- Kung-sun Hung, 公孙弘, 68
- Kung-yang Commentary*(*Kung-yang chuan*), 《公羊传》, 267
- Kuo Mo-jo, 郭沫若, 439
- Kuo Sung-tao, 郭嵩焘, 350
- Kuomintang (KMT), 国民党, 184, 416—419, 440, 442—444, 453, 455, 456, 457, 459, 463, 468, 475; ideology of, 思想体系, 444—445, 477; rise of, to power, 掌握政权, 446—451; split between CCP and, 与共产党关系破裂, 449—450, 480—482; collaboration of CCP and, 与共产党合作, 464—465, 475; decline and fall of, 衰落, 471
- Kwangchow Bay, 广州湾, 369—370
- Kwangsi clique, 桂系, 426
- Kwantung Peninsula, 辽东半岛, 365—366, 446

L

- Lamaism, 喇嘛教, 88, 169, 219—220, 221
Lan-t'ien, 蓝田, 5
Lang Shih-ning(G. Castiglione), 郎世宁, 248
Lansing-Ishii Agreement, 蓝辛·石井协定, 434
Lao-tzu(Tao te ching) (The Way and Power Classic), 《老子》
 (《道德经》), 47
Lay, Horatio Nelson. 李泰国, 299, 310
Lazarists, 遵使会士, 287, 320
League of Left Wing Writers, 左翼作家联盟, 459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463
“Learning of practical use to society”(*ching-shih chih yung*).
 “经世致用”, 231, 268
Legalists(*Fa chia*). 法家, 53—54, 60, 70, 74, 230
Legge, James. 理雅各, 342
Lenin, V.I., 列宁, 437, 441, 442, 444, 473, 490, 495, 508
Leninism, 列宁主义, 438, 446, 479; 另见Marxism-Leninism
Li(fundamental principles), 理, 149—150, 193, 232, 317
Li(village), 里, 187, 207
Li chi(*Record of Rituals, Book of Rites*), 《礼记》, 42
Li-Fournier convention, 李福协定, 354
Li Hsiu-ch'eng, 李秀成, 295, 303
Li Hung-chang, 李鸿章, 303—304, 311, 313—314, 324, 337—340,
 342, 349, 350, 358, 359, 362, 363, 365, 367, 382, 395—396
Li-Ito Convention, 天津会议专条, 364
Li Ma-tou(Matteo Ricci), 利玛窦, 244—245
Li Po(*Li T'ai-po*), 李白 (李太白), 145
Li sao, 《离骚》, 43
Li Shih-chen, 李时珍, 191; *materia medica*(*Pen-ts'ao kang-*

- mu*) of. 《本草纲目》, 191
- Li Shih-min(T'ai-Tsung, T'ang), 李世民(唐太宗), 97
- Li Ssu, 李斯, 53, 56, 57, 59, 72
- Li Ta-chao, 李大钊, 438, 443, 450
- Li Tzu-ch'eng, 李自成, 209, 216
- Li Yu, 李煜, 82
- Li Yuan-hung, 黎元洪, 413
- Liang A-fa, 梁亚发, 287, 292
- Liang Ch'i-ch'ao, 梁启超, 371, 375, 376, 406—408, 410, 412, 417, 419, 421, 424, 426, 427, 436
- Liang dynasty, 梁朝, 82, 94
- Liao dynasty, 辽代, 123, 124, 153, 157—159
- Liaotung, 辽东, 212—213, 215, 367—368; 另见Kwantung Peninsula
- Lieh-tzu, 《列子》, 47
- Likin(*li-chin*)system, 厘金制度, 316, 383, 457
- Lin Piao, 林彪, 492, 508—509, 510—511, 512, 514, 523
- Lin Shu, 林纾, 394
- Lin Tse-hsu, 林则徐, 279—280, 283, 285, 372
- Lin Hsiu(Kuang Wu Ti), 刘秀(光武帝), 75—76, 80
- Liu K'un-i, 刘坤一, 384, 392, 396
- Liu Ming-ch'uan, 刘铭传, 355
- Liu Pang(Kao Tsu,Han), 刘邦(汉高祖), 59—60, 68
- Liu Pei, 刘备, 79
- Liu-pu, 六部; 见Six Ministries
- Liu Shao-ch'i, 刘少奇, 489, 491, 504—507, 509, 514
- Liu Sung dynasty, 刘宋王朝, 82
- "Living Buddha", "活佛", 220
- Logicians(*Ming chia*), 名家, 50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会, 320, 341, 342
- Long March, 长征, 464, 475

- Lotus Sutra*, 《妙法莲花经》, 88, 107
Loyang, 洛阳, 77, 81
Lu Chiu-yuan(Lu Hsiang-shan), 陆九渊(陆象山), 149
Lu Hsun, 鲁迅, 433, 439, 459
Lu state, 鲁国, 35, 40, 42
Lu Pu-wei, 吕不韦, 56
Lun-yu(Analects), 《论语》, 42, 44, 149
Lung-men, 龙门, 92, 95, 113
Lung-shan(Black Pottery) culture, 龙山(黑陶)文化, 18-19, 31

M

- Ma Yuan, 马远, 144, 145, 235
Macao, 澳门, 244, 245, 280, 289, 329
Mac Arthur, Douglas, 麦克阿瑟, 道格拉斯, 492
Macartney embassy, 马戛尔尼使团, 256—257
Mahan, A. T., 马汉, 382
Mahayana Buddhism, 大乘教, 88, 89, 107
Manchukuo, 满洲国, 463
Manchuria, 满洲, 212—213, 215, 318, 485; Russia in, 俄国在, 301—302, 367—370, 456, 462—464; railways of, 铁路, 368;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国际争端, 403; Japan in, 日本在, 421
Manchus, 满族, rise of, 兴起, 177, 211—222; preservation of power of, 保持权力, 222—225, 375, 389; in government, 从政, 318, 388; and Kuang-hsu, 光绪, 375; anti-foreign feeling of, 排外情绪, 377, 386; Wuchang revolt against, 武昌起义, 413; 另见Ch'ing dynasty
Mandala(*mandara*), 曼荼罗(坛场), 107
Mandate of Heaven(*T'ien-ming*), 天命, 32, 52, 60
Manila, 马尼拉, 385

Mao Tse-tung, 毛泽东, 428, 438, 443, 450, 473—475, 477—480, 482, 485, 490, 492, 494, 495, 496—497, 508, 510—514, 518, 523—525

Maoism, 毛主义, 491, 512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见 Polo, Marco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海关, 316, 329, 370, 383, 389, 392, 420, 429, 446, 451, 458; in Korea, 在朝鲜, 364; 另见 Hart, Robert

Marshal, George C., 马歇尔, 乔治, 480

Martin, W.A.P., 丁韪良, 393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in China, 在中国, 479, 490, 494, dualism in, 二元性, 506—507

Marxism-Leninism, 马列主义, 428, 437—439, 477—480, 500, 508, 524

Matheson, James, 马地臣, 272, 280

May Fourth Incident, and movement, 五四事件及运动, 434—435, 447

May Thirtieth movement, 五卅运动, 447

Meiji Restoration (*Meiji ishin*), 明治维新, 307—309

Mekong River and delta, 湄公河及三角洲, 351, 352

Mencius, 孟子, 51—52, 150, 190, 309

Mencius (*Meng-tzu*), 《孟子》, 42, 51, 149, 375

Mi Fu (Mi Fei), 米芾, 144

Miao tribes, 苗族, 298, 314

Middle Kingdom (*Chung-kuo*), 中央王国 (中国), 20, 179, 202

Militia (*t'uan-lien*), 团练, 395

Mill, John Stuart, 密尔, 约翰·斯图亚特, 372, 395

Min family, 闵氏家族, 364; "Queen Min", 闵妃, 364

Ming Collected Statutes (*Ta-Ming hui-tien*), 《大明会典》, 202

Ming dynasty, 明代, 152, 177—179, 210; government under, 政府, 179—188; phases of, 阶段, 180—181; despotism

- under, 专制主义, 180—184; society and culture in. 社会与文化, 188—195; foreign relations of, 对外关系, 195—204; economy of, 经济, 204—208; ending of, 覆亡, 208—210
- Ming History*(*Ming-shih*), 《明史》, 229
- Ming Huang, 明皇, 98
- Ming Ti, 明帝, 76, 90
- Mo-tzu*, 《墨子》, 50—51, 436
- Moghuls, 莫卧儿, 348
- Mongoloids, 蒙古人种, 3, 5—6
- Mongols, 蒙古人, 122, 153; China under, 统治中国, 132, 167—176; empire of the, 帝国, 162—167; in Ming period, 在明代, 200—203; Manchus and, 与满族, 218, 388; Lamaism among, 喇嘛教, 219—220; and Russians, 与俄国人, 252, 253, 254
-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395
- Morrison, Robert, 马礼逊, 287
-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 "最惠国"条款, 283, 301, 327—328, 384
- Mukden incident, 沈阳事变, 462
- Muraviev, Nikolai, 穆拉维约夫, 尼古拉, 302, 366
- Muslim rebellion, 回民叛乱, 297—298, 305, 314, 348—349
- Muslims, 回民, 穆斯林; 见Islam
- Mustard Seed Garden Painting Manual* (*Chieh-tzu yuan hua-chuan*), 《芥子园画传》, 235
- Mutual Aid*(Kropotkin), 《互助论》(克鲁泡特金), 431

N

- Nankai University, 南开大学, 393
- Nanking, 南京, 82, 180, 293; Treaty of, 南京条约, 283,

- captured from Taipings, 从太平军手中夺回, 305, 313;
puppet government in, 傀儡政府, 465
- Nanyang fleet, 南洋舰队, 355, 358
- Napier, Lord, 律劳卑, 276
-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352
- Narratives from Beginning to En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T'ung-chien chi-shih pen-mo)*, 《通鉴纪事本末》, 147
-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 461
- Nationalist Government (Kuo-min cheng-fu), 国民政府, 446
- Neo-Confucianism, 新儒学, 117, 147—151, 200, 372, 373
- Neo-Taoism, 新道家, 84—86
- Nerchinsk, Treaty of, 尼布楚条约, 253
- Nestorian Christianity, 景教, 111, 169, 171
- New Army, 新军, 396, 413, 414
- "New county(hsien) system", "新县制", 467
- New Culture Movement, 新文化运动, 435—437, 438
- "New Democracy", "新民主主义", 479, 487, 495
- New Economic Policy, Soviet, 苏俄新经济政策, 442
- New Life Movement, 新生活运动, 462
- New Order in East Asia, 东亚新秩序, 465
- "New text"(chin-wen) movement, "今文经学"运动, 267, 373, 407
- New Youth ("La Jeunesse", Hsin ch'ing-nien)*, 《新青年》, 432, 433, 438
- Nguyen Ai Quoc, 阮爱国; 见Ho Chi Minh
- Nien movement, 抢军起义, 297, 305, 313
- Nine Power Treaty, 九国公约, 441
- Ningpo, 宁波, 282, 283
- "Nishihara loans", "西原借款", 426
- Nixon, Richard M., 尼克松, 理查德, 517, 518, 522
- Noble Eightfold Path, 八正道, 87

North China, 中国北方, 422; archaeological record from, 考古记录, 17—20; overrun by "barbarians", 遭"夷狄"破坏, 93; Boxers in, 义和团, 382

North China Herald, 《北华捷报》, 342

"North China-land"(Hua-pe i kuo), "华北国", 463

North China Plain, 华北平原, 9, 17

North Korea, 北朝鲜, 491—493

North Vietnam, 北越, 509; U.S. intervention in, 美国干涉, 501, 509, 516—517; Democratic Republic of, 民主共和国, 515

Nurhachi, 努尔哈赤, 213—215

O

"Office lands", "职分田", 101

Oirats, 瓦剌, 201—202

"On the New Democracy"(Hsin min-chu chu-i lun) (Mao),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 479

Open Door policy, 门户开放政策, 369, 384—385, 441

Opium War, 鸦片战争, 277—284, 298

"Organization clique", "组织系"(CC系), 455

"Orthodox Kuomintang", "正统派国民党", 465

Outer Mongolia, 外蒙古, 218, 301, 419—420, 442, 496

Outline and Details of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T'ung-chien kang-mu), 《通鉴纲目》, 147

Ou-yang Hsiu, 欧阳修, 147, 149

P

Pai hua(written vernacular), 白话, 175—176, 237, 432

Painted Pottery(Yang-shao) culture, 彩陶(仰韶)文化, 18

"Palace memorials"(tsou-che), "奏折", 227

- Pan Ch'ao. 班超, 76
- Pan Ku, 班固, 68
- Panchen Lama, 班禅喇嘛, 220
- Pao-chia(mutual guarantee) system, 保甲制度, 100, 129, 187
230, 241, 467,
- Pao-p'u-tzu, 《抱朴子》, 85
- Paris Peace Conference(1919), 巴黎和会, 434
- Parker, Peter, 伯驾, 287
- "Peaceful coexistence", "和平共处", 501
- Pearl Harbor, 珍珠港, 385, 469
- Peiping, 北平, 451; puppet government at, 假偽政府, 465;
另见Peking
- Peita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 431—434, 460
- Peiyang Army("Peiyang clique"), 北洋军(北洋系), 398, 418,
424, 427
- Peking, 北京, 35, 170, 180, 181, 201, 229, 237; Russians in,
俄国人在, 253, 254; Anglo-French invasion of, 英法入
侵, 300; Sino-Russian, Treaty of, 中俄北京条约, 302;
seige of legations in, 围攻使馆区, 382, 384—385; May
Fourth Incident in, 五四事件, 434—435; Nixon's visit
to, 尼克松来访, 518; 另见Peiping
- Peking Field Force, 神机营, 395
- Peking-Hankow railway, 京汉铁路, 369, 376, 403
- Peking Man(*Sinanthropus pekinensis*), 北京人, 2, 460
-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Peita), 国立北京大学, 431—434,
435, 460
- P'eng Te-huai, 彭德怀, 510
- People, *The(Min-pao)*, 《民报》, 412
- People's Daily (*Jen-min jih-pao*), 《人民日报》, 524
-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人民解放军, 492—493, 510—511
- "People's livelihood"(*min-sheng chu-i*), "民生主义", 410—411,

-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国民参政会, 467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land reform in, 土地改革, 473, 477, 487—488, 494—495;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政府组织, 482—485; founding of, 建立, 482—491;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under, 经济建设, 485—488; social change in, 社会变化, 488—491; Soviet aid to, 苏联的援助, 491—493; struggle toward socialism in, 实现社会主义, 494—504;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504—507, 511—514; Sino-Soviet split, 中苏分裂, 507—509; Sino-American relations, 中美关系, 514—516, 517—518; in transition, 转变, 523—526; accomplishments and problems, 成就与问题, 524—525
- "People's rights" (*min-ch' uan*), "民权", 375, 445
- Perry, Matthew C., 柏利, 马修, 362
- Persia, khanate of, 波斯汗国, 165—166, 174
- Philippines, 菲律宾, 385—386
- P'ien-t'i-wen*, 骈体文, 114
- Po Chu-i, 白居易, 146
- P'o-hai (Parhae), 渤海国, 157, 158
- Political Culture Association (*Cheng-wen She*), 政闻社, 407
- "Political Study (or Science) clique" (*Cheng-hsueh Hsi*), 政学系, 426, 455
- Polo, Marco, 波罗, 马可, 170, 171—174
- Port Arthur, 旅顺港(阿瑟港), 367, 368, 370
- Portugal, 葡萄牙, 244, 329
- Pottinger, Henry, 瓦鼎查, 282, 283
- Progressive Party, 进步党, in Japan, 在日本, 406; in China, 在中国, 417, 418, 419
- Protector General (*Tu-hu*), 都护, 76
- Protect-the-Emperor Society, 保皇会, 406

- P'u Sung-ling, 蒲松龄, 235
P'u-yi, 溥仪, 401, 415, 463
"Pure Land"(Ching-t'u) movement, "净土宗"运动, 107, 108
"Purification clique"(ch'ing-liu tang), "清流党", 354
"Purity debates"(ch'ing-t'an), "清谈", 84

Q

- Quemoy, 金门, 501, 504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Mao Chu-hsi yu-lu),
《毛主席语录》, 511

R

- Rabban Sauma, 列班扫马, 174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保路"运动, 403, 413
"Rank lands", "品分田", 100—101
Record of Imperial Military Exploits (Sheng-wu chi), 《圣武记》, 269
Record of Rituals(Li chi; Book of Rites), 《礼记》, 42, 52,
149
"Rectification of names"(cheng ming), 正名, 44
Red Army, 红军, 473, 477
Red Eyebrows, 赤眉, 75
"Red gang"(Hung-pang), 红帮, 447
Red Guard, 红卫兵, 511, 512
Red River (Song Koi), 红河, 352, 369
Red Sect, 红教, 220
Red Star over China(Snow), 《西行漫记》(斯诺), 475
Regional commanders(chieh tu-shih), 节度使, 119, 120, 121,
123

- Regional guilds (*t'ung-hsiang-hui*), 同乡会, 205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417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 419; expelled from United Nations, 被逐出联合国, 518, 522
"Research clique", "研究系", 424, 455
Review of the Times (Wan-kuo kung-pao), 《万国公报》, 345
"Revive China Society" (Hsing-Chung Hui), "兴中会", 408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San fan*), 三藩叛乱, 216, 217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革命委员会", 512
Revolution of 1911, 辛亥革命, 405—415
Rhee, Syngman (Yi Sung-man), 李承晚, 491
Ricci, Matteo (Li Ma-tou), 利玛窦, 244—245, 247
Richard, Timothy, 李提摩太, 345, 371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收回利权"运动, 402
Rituals of Chou (Chou-li), 《周礼》, 294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国演义》, 424
Rome-Berlin Axis, 罗马—柏林轴心, 464
Roosevelt, Theodore, 罗斯福, 西奥多, 385
"Rural reconstruction", "乡村建设", 461—462
Russell, Bertrand, 罗素, 伯特兰, 435
Russell and Company, 旗昌洋行, 275, 280, 285, 334, 338
Russia, 俄国, China's relations with, 与中国的关系, 251—254, 384; in Manchuria, 在满洲, 301—302, 379; expansion of, into Central Asia, 对中亚扩张, 347—349; and Korea, 与朝鲜, 361, 363, East Asian policy of, 东亚政策, 366—368, 369—370, 385; and Mongolia, 与蒙古, 420; 另见 Soviet Union
Russian-American Company, 俄美公司, 301
Russian Treaty of Tientsin, 中俄天津条约, 302
Russo-Chinese treaty of alliance (1896), 中俄密约, 368
Ryukyu (Liu-ch'iu) Islands, 琉球群岛, 346—347, 350

S

- Sacred Edict(*Sheng-yu*), 圣谕, 229, 251
St. John's College, Shanghai, 圣约翰书院(上海), 345
Salt Revenue Administration, 盐务稽核所, 420, 446, 451
School of Idealism(or of the Mind)(*Hsin-hsueh*), 心学, 192
Secretariat-Chancellery(*Chung-shu Men-hsia*), 中书门下, 124
Selected T'ang Documents(T'ang hui yao), 《唐会要》, 147
Self-Strengthening Army, 自立军, 396
Self-Strengthening Society, 自立会, 371, 374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竹林七贤, 85
Shang Yang, 商鞅, 55—56
Shang dynasty, 商代, 20, 21, 27—31
Shanghai, 上海, 282, 283, 291, 310, 312; foreign settlements in, 外国的租界, 298—299, 324—327; foreign-officered force in, 外国人指挥的军队, 304; capital market of China, 中国的金融市场, 334; publishing in, 出版业, 405; foreign control over, 外国的控制, 420, 446
Shanghai communique, 上海公报, 518, 522
Shanghai Cotton Cloth Mill, 上海机器织布局, 340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洋枪队, 299
Shansi, 山西, 333
Shantung, 山东, 368, 369, 370, 420—421, 434, 440, 441
Shaw, 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459
Shen Chia-pen, 沈家本, 399
Shen Tsung, Sung, 宋神宗, 128
Sheng Hsuan-huai, 盛宣怀, 339, 402—403
Sheng-wu chi (*Record of Imperial Military Exploits*), 《圣武记》, 269
Shih ching (*Classic of Songs, Book of Poetry*), 《诗经》, 41

- Shih Huang-ti(First Emperor), 始皇帝, 56--59
Shih Lo, 石勒, 94
Shimonoseki, Treaty of, 马关条约, 365
Short Story magazine, 《小说月报》, 439
Shu ching(Classic of Documents; Book of History), 《书经》, 42
Shu Han dynasty, 蜀汉王朝, 79
Shufeldt, R.W., 舒费尔特, 284, 363
Shui-huchuan (All Men Are Brothers; Water Margin), 《水浒传》, 175, 236
Shun, 舜, 21
Shun-i Wang(Altan Khan), 顺义王(俺答汗), 203
Shun Pao, 《申报》, 405
Shuo wen(Explanation of Writing), 《说文》, 66
Siam, 暹罗, 198, 366
Sian, 西安, 314, 382, 464
Siberia, 西伯利亚, 8
“Silk Road”, “丝绸之路”, 76, 170
Singapore, 新加坡, 6
Single-Whip reform, 一条鞭法改革, 206—207
Sinkiang, 新疆, 3, 349, 496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 521
Sino-French convention(1860), 中法北京条约, 320
Sino-French War, 中法战争, 352—355
Sino-Japanese treaties, 中日条约, 421
Sino-Japanese War, 中日战争, 365—366, 383; Second, 第二次, 464—468
Sino-Russian Treaty of Peking, 中俄北京条约, 302
Sino-Soviet alliance treaty,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492
Six Dynasties period (Liu ch'ao), 六朝时期, 83—84, 116, 129

- Six Ministries(or Boards)(*Liu-pu*), 六部, 105, 167, 225, 374
398
- Six-power consortium, 六国银行团, 418
- Sixteen Kingdoms, 十六国, 94
- Smedley, Agnes, 史沫特莱, 阿格尼丝, 459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395
- Snow, Edgar, 斯诺, 埃德加, 475
- Society of Brothers and Elders(*Ko-lao Hui*), 哥老会, 412
- Society for Literary Studies, 文学研究会, 439
-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SDK), 同文书会, 345
-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elf-Strengthening (*Ch'iang-hueh Hui*), 强学会, 371, 374, 416
- Soong Ch'ing-ling(Madame Sun), 宋庆龄(孙夫人), 459
- Soong Mei-ling(Madame Chiang), 宋美龄(蒋夫人), 454
- Soong, T. V., 宋子文, 454, 457
- South China, 中国南方, 290—291, 422
-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3; "junk" trade with, 与其进行的舢舨贸易, 255
-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 东南亚条约组织, 501
- South Korea, 南朝鲜, 491—493, 501
-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南满铁路, 368, 406, 446
- South Vietnam, 南越, 352, 515; U.S.involvement in, 美国卷入, 516—517
- Soviet Union, 苏联, as example for China, 中国的榜样, 437—438, 493; aid to China from, 援助中国, 438, 468, 491—493; and Chinese Revolution, 与中国革命, 441—442, interest of, in Korea, 在朝鲜的利益, 491, Sino-Soviet split, 中苏关系破裂, 507—509, 另见Russia
- Spain, 西班牙, 385

- Spencer, Herbert, 斯宾塞, 赫伯特, 372, 395
"Spheres of influence", "势力范围", 368, 370, 385
"Spirits of wind and water" (*feng-shui*), "风水", 322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 h' un ch'iu*), 《春秋》, 42, 43,
68-69, 267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春秋"时期, 34, 42
Ssu-ma Ch'ien, 司马迁, 66-68
Stalin, Joseph, 斯大林, 约瑟夫, 442, 449, 450, 493, 508, 511
State Affairs, Department of (*S hang-shu-sheng*), 尚书省, 105
"Statecraft" (*ching-shih*), "经世", 268, 285, 317, 319, 372
Stilwell, Joseph, 史迪威, 约瑟夫, 470, 471, 480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iao-chai chih-i*),
《聊斋志异》, 235
"Strengthening the walls and clearing the countryside" (*chie-npi ch'ing yeh*), "坚壁清野", 313
Su-pao, 《苏报》, 410
Su Shih (Su Tung-p'o), 苏轼 (苏东坡), 146, 149
Subprefecture or department (*chou*), 州, 185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330, 366
Sui dynasty, 隋代, 96, 100, 102, 105, 116
Summer Palace (*Yuan Ming Yuan*), 圆明园, 248, 249, 359
Sun Ch'u-an, 孙权, 79
Sun tzu: "Know yourself, know your opponent; in a hundred battles, win a hundred victories" (*Chih-chi chih-pipai-chan pai-sheng*), 孙子: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51, 285
Sun Yat-sen, 孙逸仙, 孙中山, 406-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21, 424-426, 435, 437, 442-446, 449
Sung Ying-hsing, 宋应星, 191, handbook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by (*T'ien-kung k'ai-wu*), 《天工开物》, 191
Sung dynasty, 宋代, 116, 123-132; Southern, 南宋, 130-
132; Northern, 北宋, 131,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 商业革命, 132—138; society and culture in, 社会与文化, 138—147; Neo-Confucianism in, 新儒学, 147—151; Mongol conquest of, 蒙古征服, 166—167
- Sung(Liu Sung) dynasty, 宋(刘宋)王朝, 82
- “Sung Learning”, (*Sung hsueh*), “宋学”, 231
- Sung state, Chou period, 宋国, 周代, 35, 40
- Superintendencies of Merchant Shipping(*Shih-po-ssu*), 市舶司, 236, 197
- Superintendency of Dependencies(*Li-fan yuan*), 理藩院, 218, 253
- Sutras*, 经藏, 87
- Syntesis of Books and Illustration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Ku-chin t'u-shu chi-ch'eng*), 《古今图书集成》, 229—230

T

- Ta hsueh* (*Great Learning*), 《大学》, 42
- Ta-yeh iron mine, 大冶铁矿, 375, 403
- Taewongun, 大院君, 361, 363
- Taft, William Howard, 塔夫脱, 威廉·霍华德, 403
- Tai Chen, 戴震, 232
- T' ai-chi* (“Supreme Ultimate”), 太极, 149, 150
- T' ai Ping Tao* (“Way of the Great Peace”), 太平道, 79
- Tai Tsu, 太祖, 97, 123, 124, 125, (*Chao K'uang-yin*), 赵匡胤, 127, (*Nurhachi*), 努尔哈赤, 215
- T'ai Tsung, T'ang, 唐太宗, 97; Sung, 宋太宗, 123
- Taiping Kingdom and Rebellion, 太平天国及起义, 292—299, 303—305, 308, 315, 386,
- Taiwan, 台湾, 216, 217, 350; colonial expansion into, 对其殖民扩张, 347; as Chinese province, 作为中国的省份,

- 355, 519; Japanese relations with, 与日本的关系, 350, 519—520; Nationalist China in, 国民党中国, 492, 500, 521—523; hope of recovery of, 收复的希望, 504
- Tamerlane, 帖木儿, 165, 200, 348
- T'an Ssu-t'ung, 谭嗣同, 376
- T'ang Shao-i, 唐绍仪, 416
- T'ang dynasty, 唐代, 97—99, 116—123; landholding and military systems in, 土地与军事制度, 99—101; revival of centralized rule under, 集权统治的再兴, 99—106; prosperity under, 繁荣, 101—102; bureaucracy and examination system in, 官僚与科举制度, 102—104; government in, 政府, 105; Buddhism in, 佛教, 106—110, 114—115; culture in, 文化, 110—115; excavations of, 发掘, 526
- T'ang hui yao(*Selected T'ang Documents*), 《唐会要》, 147
- Tanguts, 党项, 124, 153, 159
- Tao-t'ai(intendant of circuit), 道台, 185—186, 299
- Tao te ching(*Lao-tzu*) (*The Way and Power Classic*), 《道德经》(老子), 47
- Tao Ch'ien(T'ao Yuan-ming), 陶潜(陶渊明), 114
- T'ao-t'ieh(animal mask), 龙首纹(兽面), 27, 29
- Taoism, 道家学说, 道教, 46—49, 65, 108, 143, 169; upsurge of, 兴盛, 84—86; assimilation of, with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与儒学和佛教的融合, 91—92; and art, 艺术, 235
- Tarim River basin, 塔里木河盆地, 348, 349
- "Tartar generals" (*chiang-chun*), "鞑靼将军", 223
- Tashi Lama, 札什喇嘛, 220
- Tatars, 鞑靼, 201
- Taylor, Hudson, 戴德生, 320—321, 323
- Temur, 铁木耳, 170
- Teng Hsiao-p'ing, 邓小平, 509, 523, 524, 526

- "Ten Kingdoms", "十国", 121
"Ten Thousand Word Memorial", "万言书", 341
Theravada(Hinayana) Buddhism, 小乘教, 88
Thirteen Classics, 十三经, 42—43
Thirteen Factories, 十三行, 256, 280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Ch'ien-tzu-wen), 《千字文》, 114,
"Three-anti" campaign, "三反"运动, 488—489
Three-Character Classic(San-tzu ching), 《三字经》, 190
Three Kingdoms(*San-kuo*) period, 三国时期, 79, 80, 81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an min chu-i*), 三民主义,
410—411, 422, 445
"Three-self" movement, "三自"运动, 488
Tibet, 西藏, 3; Lamaism in, 喇嘛教, 88, 169, 219—220;
incorporated in Chinese empire, 并入中华帝国, 219—222
T'ien-hsia("all under heaven"), 天下, 20
Tientsin, 天津, 280, 300, 378; Russian Treaty of, 中俄天津
条约, 302
Tientsin massacre, 天津教案, 323—324
Timur, 帖木儿, 见 Tamerlane
T'o-pa tribe, 拓拔部落, 94, 95, 153
Tong King-sing, 唐廷枢(景星), 333, 338, 407
Tonghak("Eastern Learning"), 东学, 361, 366
Tongking, 东京, 352, 355, 369
Tradition of Tso(Tso chuan), 《左传》, 43
Trans-Siberian Railway, 西伯利亚大铁路, 367
Triad Society (*T'ien-ti h'ui* or *Hung-men*), 三合会(天地会或
洪门), 290—291, 295, 408, 410
Tripitaka, 三藏, 87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 列昂, 442, 449
Truman, Harry S., 杜鲁门, 哈里, 491, 492
Ts'ai Yuan-p'ei, 蔡元培, 410, 414, 431—432, 459

- Ts'ao Hsueh-ch'in, 曹雪芹, 237
- Ts'ao Ts'ao, 曹操, 79
- Tseng Kuo-fan, 曾国藩, 296—297, 303, 304, 305, 308, 310, 311, 313—314, 323, 324, 335, 342, 395
- Tsing Hua College, 清华学校(后为清华大学), 431, 460
- Tso chuan*(*Tradition of Tso*), 《左传》, 43
- Tso Tsung-t'ang, 左宗棠, 314, 349, 395
- Tsong-kha-pa, 宗喀巴, 220
- Tsungli Yamen, 总理衙门, 310, 311, 312, 398
- Tu-chueh, 突厥, 96
- Tu Fu, 杜甫, 145
- Tu Wen-hsiu, 杜文秀, 298, 314
- Tun-huang, 敦煌, 95, 110, 217
- Tung Ch'i-ch'ang, 董其昌, 235
- Tung Chung-shu, 董仲舒, 68
- Tung-lin Party, 东林党, 208—209
- T'ung-chih*("Union for Order"), 同治, 303, 312
- T'ung-meng Hui*("United League"), 同盟会, 411—413, 416
- T'ung tien*(*Comprehensive Compendium*), 《通典》, 147
- Turkey, 土耳其, 285
- Turks(*T'u-chueh*), 突厥, 96, 153, 157; 另见Uighurs
- Twenty-one Demands on China, 二十一条, 420—421, 434
- Tzu-chih t'ung-chie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资治通鉴》, 147
- Tz'u-hsi. 朱熹, 303, 312, 336—337, 350, 359, 375—376
377—378, 384, 401

U

Uighurs, 回纥, 维吾尔, 120, 153, 163, 349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and Korean War, 与朝鲜战争, 452, 456, People's Republic admitted to, 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 518

United States, 美国, treaty with(1844), 望厦条约, 283; discrimination in, against Chinese, 排华, 342, 401; Chinese students in, 中国留学生, 342—344, 431; relations of, with Korea 与朝鲜的关系, 362, 364, 491—493; expansion of, 扩张, 384—386; and Nationalist China, 与国民党中国, 451, 460—461; aid given to China by, 对中国的援助, 469—471; and Korean War, 与朝鲜战争, 488, 491—493, 501; and Taiwan, 与台湾, 501, 522;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s,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514—516; and Vietnam, 与越南, 516—517

V

Viet Minh, 越盟, 501, 515

Vietnam, 越南, and "unequal treaties", 与“不平等条约”, 284; colonial expansion in, 对其殖民扩张, 347; Chinese influence in, 中国的影响, 351; French encroachment in, 法国的入侵, 351—352; Sino-French War, 中法战争, 352—355;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美国的干涉, 516—517

Vietnam Nationalist Party, 越南国民党, 515

Vladivostok,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302, 368

W

Wade, T·F., 威妥玛, 328

- Wai-wu P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外务部, 398
- Wan-li, 万历, 208
- Wang An-shih, 王安石, 128—130, 146, 149, 294
- Wang Ching-wei, 汪精卫, 412, 446, 449, 454, 455, 466
- Wang Ch'ung, 王充, 84
- Wang Hsi-chih, 王羲之, 112
- Wang Mang, 王莽, 73—75, 294
- Wang Pi, 王弼, 84
- Wang Yang-ming(Wang Shou-jen), 王阳明(王守仁), 192—193, 231, 407, 490
- Ward, Frederick Townsend, 华尔, 304
- "Warring States" period, "战国"时期, 34, 37
- Washington Conference, 华盛顿会议, 440
- Watergate, 水门事件, 522
- Water Margin(*Shui-hu chuan*), 《水浒传》, 236
- Way and power Classic, *The (Lao-tzu) (Tao te ching)*, 《道德经》(老子), 47
- "Way of the Great Peace"(T'ai P'ing Tao), "太平道", 79
- Wei Ch'ang-hui, 韦昌辉, 295
- Wei Chung-hsien, 魏忠贤, 208, 209
- Wei Yuan, 魏源, 268—269, 271, 285, 309
- Wei state and dynasty, 魏国与魏王朝, 37, 38, 81; Northern, 北魏, 94—95, 100, 102, 109, 153; Eastern and Western, 东魏和西魏, 95, 100
- Weihaiwei, 威海卫, 365, 368, 370, 441
- "Well field" (*ching-t'ien*) system, "井田"制, 32
- Wen,Duke, 魏文公, 38
- Wen Wang, 文王, 21, 31
- "Western Learning" (Christianity), "西学", 361
- Western Liao Empire, 西辽王朝; 见Kara-Khitai
- West_River, 西江, 370

- "Whampoa clique", "黄埔系", 455, 482
White Lotus Rebellion, 白莲教叛乱, 240—241, 267
White Lotus Society (*Pau-lien chiao*), 白莲教, 179, 240, 290, 297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369
Williams, S. Wells, 卫三畏, 287
Willow Palisade, 柳条边, 213, 223, 226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 伍德罗, 418, 434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 436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420—421, 426, 434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464, 468—471
Wu, Empress, 武皇后, 98, 107
Wu P'ei-fu, 吴佩孚, 426
Wu San-kuei, 吴三桂, 216
Wu Tao-hsuan (Wu Tao-tzu), 吴道玄 (吴道子), 144
Wu Ti, 武帝, 62—64, 65, 66, 69, 71, 73
Wu "dialect", 吴语, 8, 35
Wu Wang, 武王, 21, 31
Wu state and dynasty, 吴国与吴王朝, 35, 39—40, 79, 81
Wu-t'ai, Mt., 五台山, 114, 173
Wuchang revolt, 武昌起义, 413—414
Wuhan cities, 武汉市, 358

Y

- Yakub Beg, 阿古柏, 349
Yang Chien, 杨坚, 96
Yang Hsiu-ch'ing, 杨秀清, 293, 295
Yang-ko ("seedling song"), 秧歌, 480, 482
Yang Kuang-hsien, 杨光先, 250, 321
Yang Kuei-fei, 杨贵妃, 120
Yang-shao (Painted Pottery) culture, 仰韶 (彩陶) 文化, 18

- Yang Ti, 炀帝, 96—97, 102
Yangtze River and valley, 长江及其流域, 10, 324, 369, 370
Yao, 尧, 21
Yawata Iron Works, 八幡钢铁厂, 403
Yeh-lu Ch'u-ts'ai, 耶律楚材, 164, 167
Yellow River(Huang Ho), 黄河, 9—10, 289—290, 377, 495
Yellow Sect, 黄教, 220
Yellow Turbans, 黄巾, 79, 85
Yen, James(Yen Yang-ch'u), 垣阳初, 431, 461
Yen Fu, 严复, 372, 394—395
Yen Hsi-shan, 阎锡山, 454
Yen state and dynasty, 燕国与燕王朝, 35, 56, 94
Yenan, 延安, 475—477, 524
Yin-yang concept, 阴阳观念, 44, 49—50, 65, 70, 72, 81, 96, 152
Young China Communist Party, Paris, 中国少年共产党, 巴黎, 438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 基督教育青年会, 460
Young Pioneers, 少年先锋队, 484
Yu, 禹, 21, 30
Yuan Shih-k'ai, 袁世凯, 364—365, 371, 382, 395—498, 401, 414—415, 416—419, 420, 421, 422
Yuan Shu, 袁枢, 147
Yuan dynasty, 元代, 152, 153, 167—178
Yuan Ming Yuan (Summer Palace), 圆明园, 249, 300—301
Yueh-chih, 月氏, 62, 153
Yueh Fei, 岳飞, 131
Yueh state, 越国, 35, 40
Yun-kang, 云冈, 95
Yung-cheng, 雍正, 227, 228, 232, 250, 251, 254, 371

Yung-lo, 永乐, 180, 183, 197, 201, 204, 212, 220, 233

Yung Wing, 容闳, 342, 408, 416

Z

Zen Buddhism, 禅宗, 108, 109, 143, 231

Zoroastrianism(Mazdaism), 琐罗亚斯德教(马兹达教), 111

Zungars, 准噶尔, 218, 220—222, 254, 348